



中國古代都城制度史研究

楊

寬著

中國古代都城制度史研究

楊 寬 著

上海古籍出版社

滬新登字 109 號

中國古代都城制度史研究

楊 寬 著

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

(上海瑞金二路272號)

上海書店上海發行所發行 江蘇如東印刷廠印刷

開本850×1156 1/32 印張19.875 插頁12 字數481,000

1993年12月第1版 1993年12月第1次印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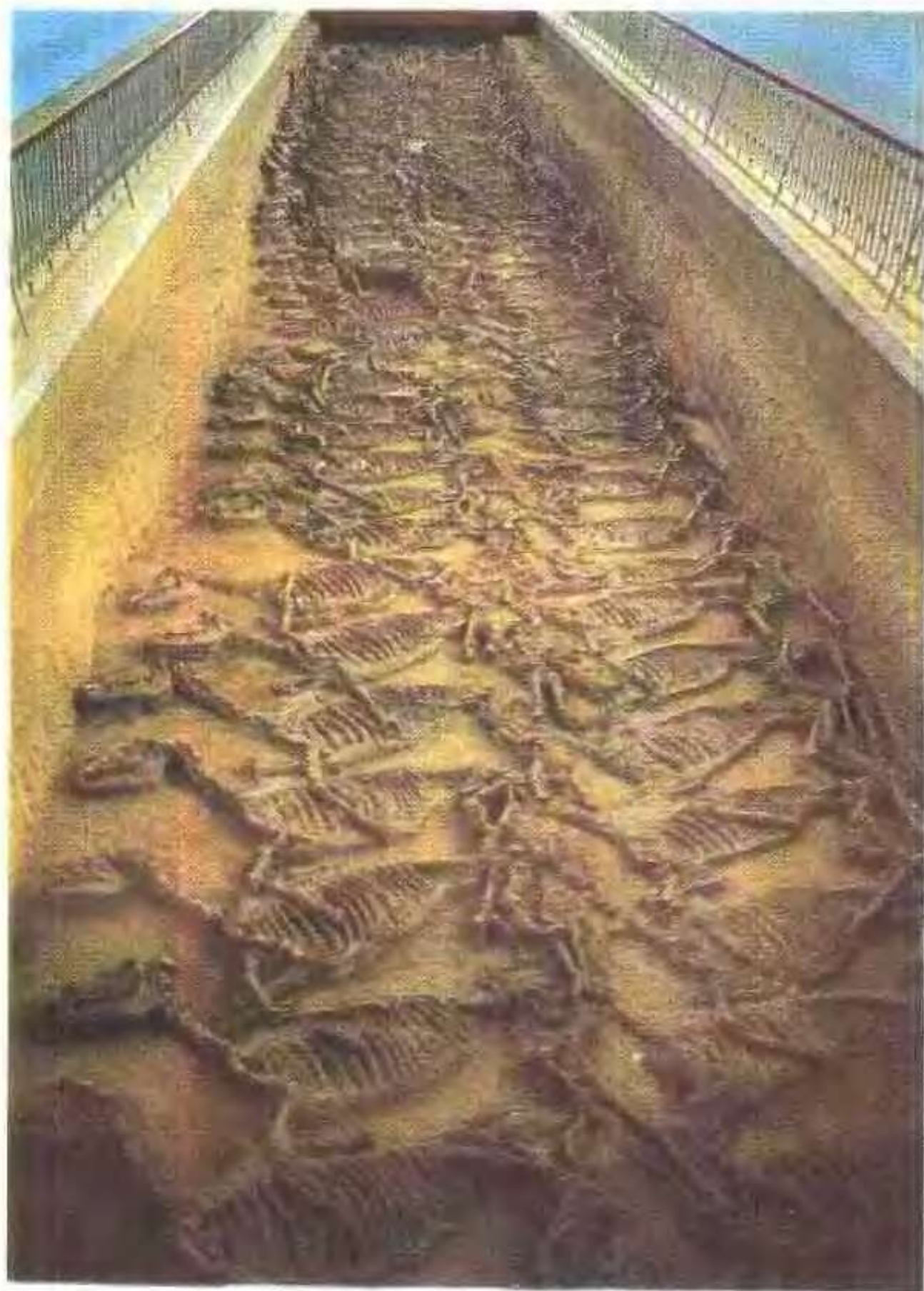
印數1—5,000

ISBN 7-5325-1580-X

K·153 定價16.95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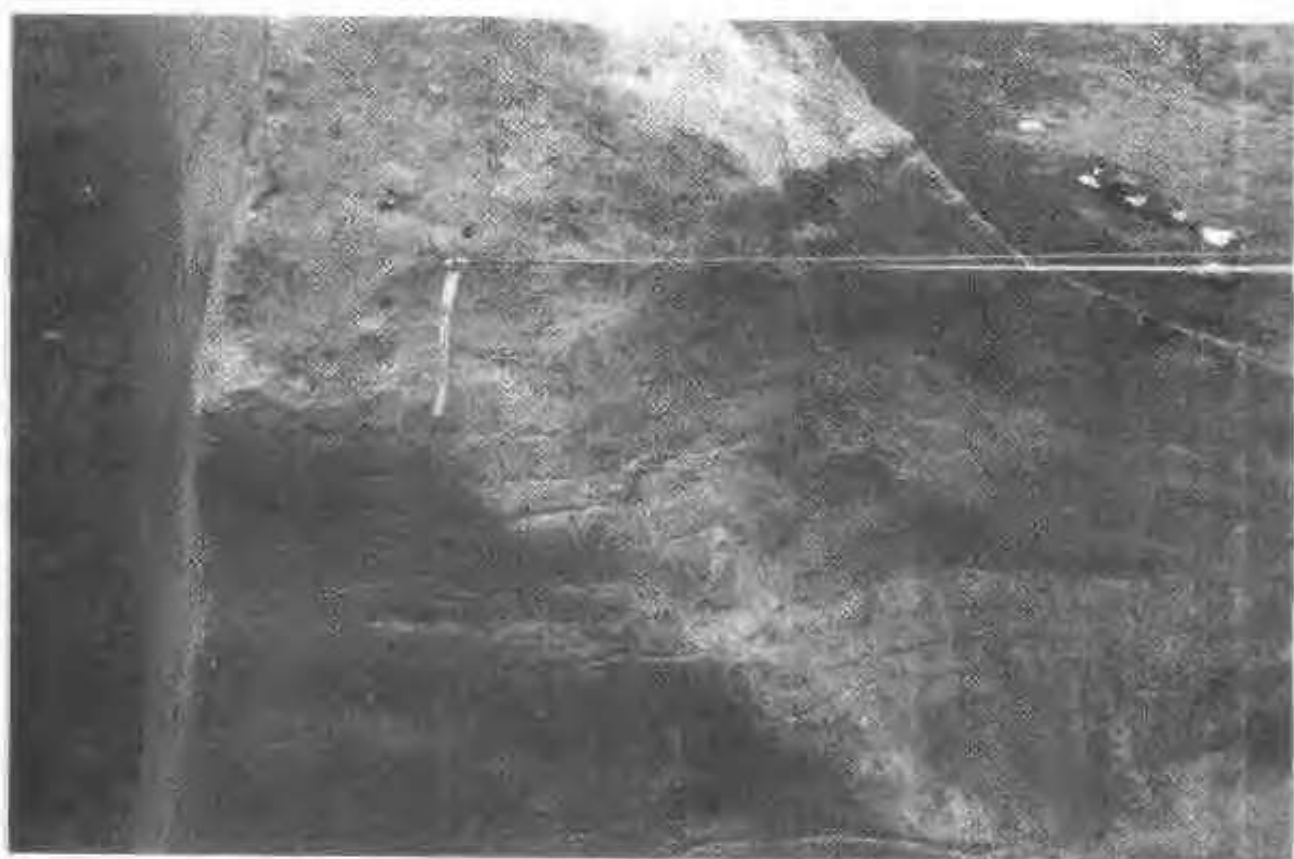
圖為一九八三年九月，作者在日本東京召開的第三十一屆亞洲、北非人文科學國際會議的第一部會上作中國古代都城史研究的報告。



圖一 齊·臨淄故城之殉馬坑
位於“大城”東北部，隸屬於齊景公墓。



圖二 半坡遺跡
圓形居址(上)與北側的濠溝(下)



圖三 鄭州商城遺址

骨器作坊遺址(上)與東壁的版築層(下),其左側為外部。



圖四 洛陽東周上城遺址
（位於羅家屯的西壁遺址內側(上)、外側(中)及其局部(下)）



圖五 晉·曲陽古城遺址



圖六 齊·臨淄故城遺址
“小城”內的桓公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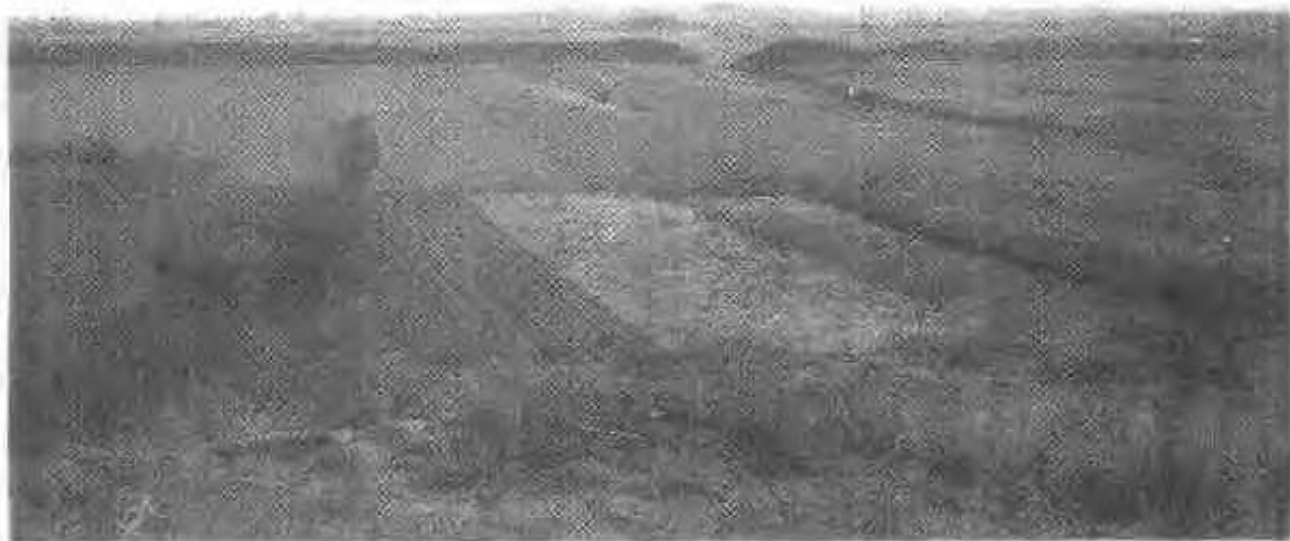


圖七 齊臨淄故城遺址
“大城”西北部的水門遺址(上)與“小城”北壁遺址(下)



圖八 鄭韓古城遺址

北壁遺址(上)及其局部(下)。下右圖的隧道為私人的農耕道。
下左圖為顯示版築狀況的外面部。



圖九 趙邯鄲古城(趙王城)遺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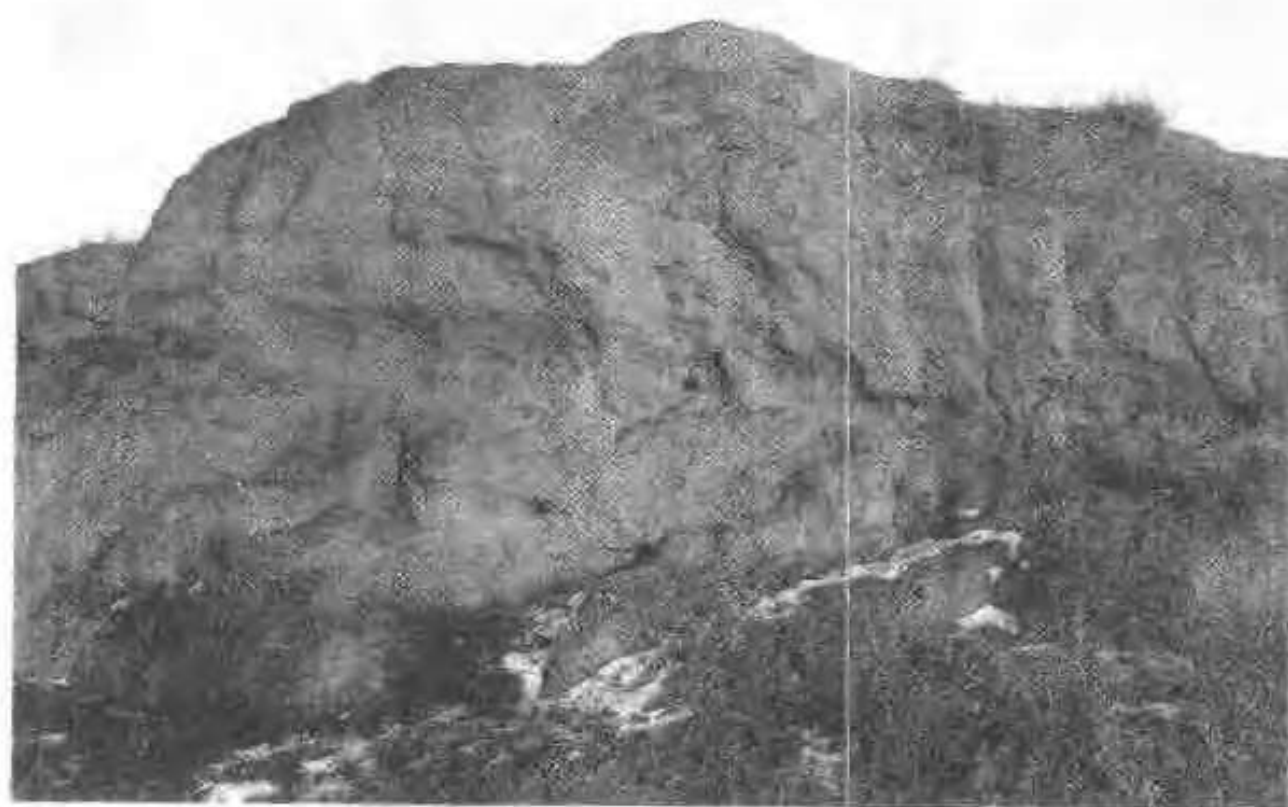
上圖爲白龍臺望西城南壁，下圖爲白東壁望龍臺。



圖十 魏·安城古城(禹王城)遺址
“大城”的西壁。



圖十一 楚·郢都(紀南城)遺址
自北壁上望東北角,近處能見到城門遺址之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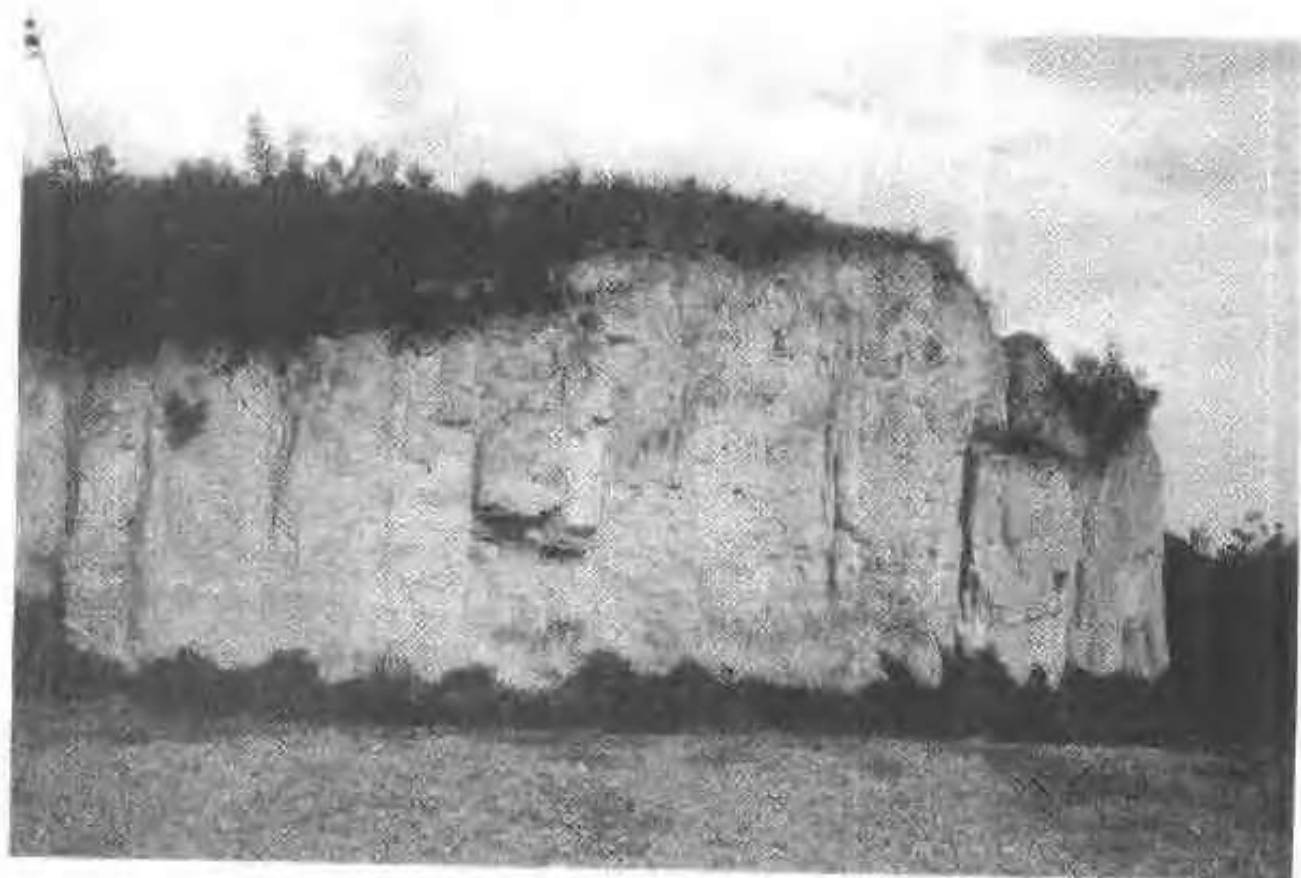
圖十二 燕下都古城遺址
上、下圖均為西壁。



圖十三 秦-阿房宮遺址
宮殿基壇全景(上)及其局部(下)



圖十四 漢·長安城未央宮前殿遺址
自東方瞻望之全景(上)及北端(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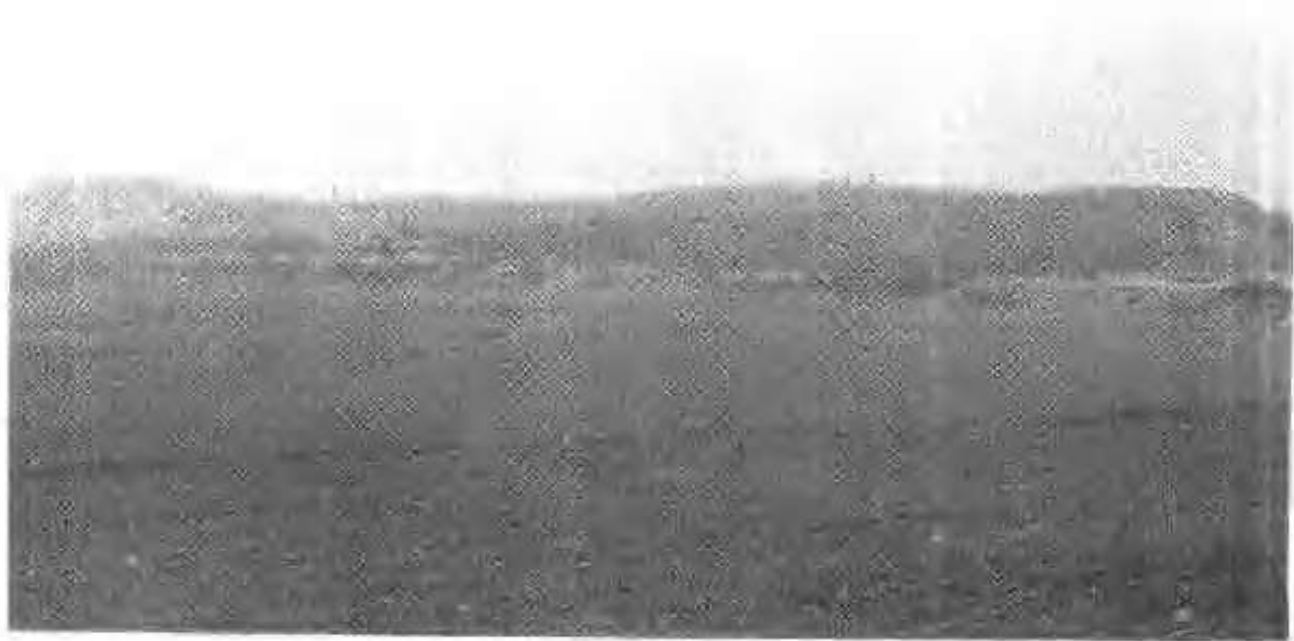


圖十五 漢·長安城址

左下角能見到“漕渠”痕跡的南壁遺址(上)與東壁的灞城門遺址(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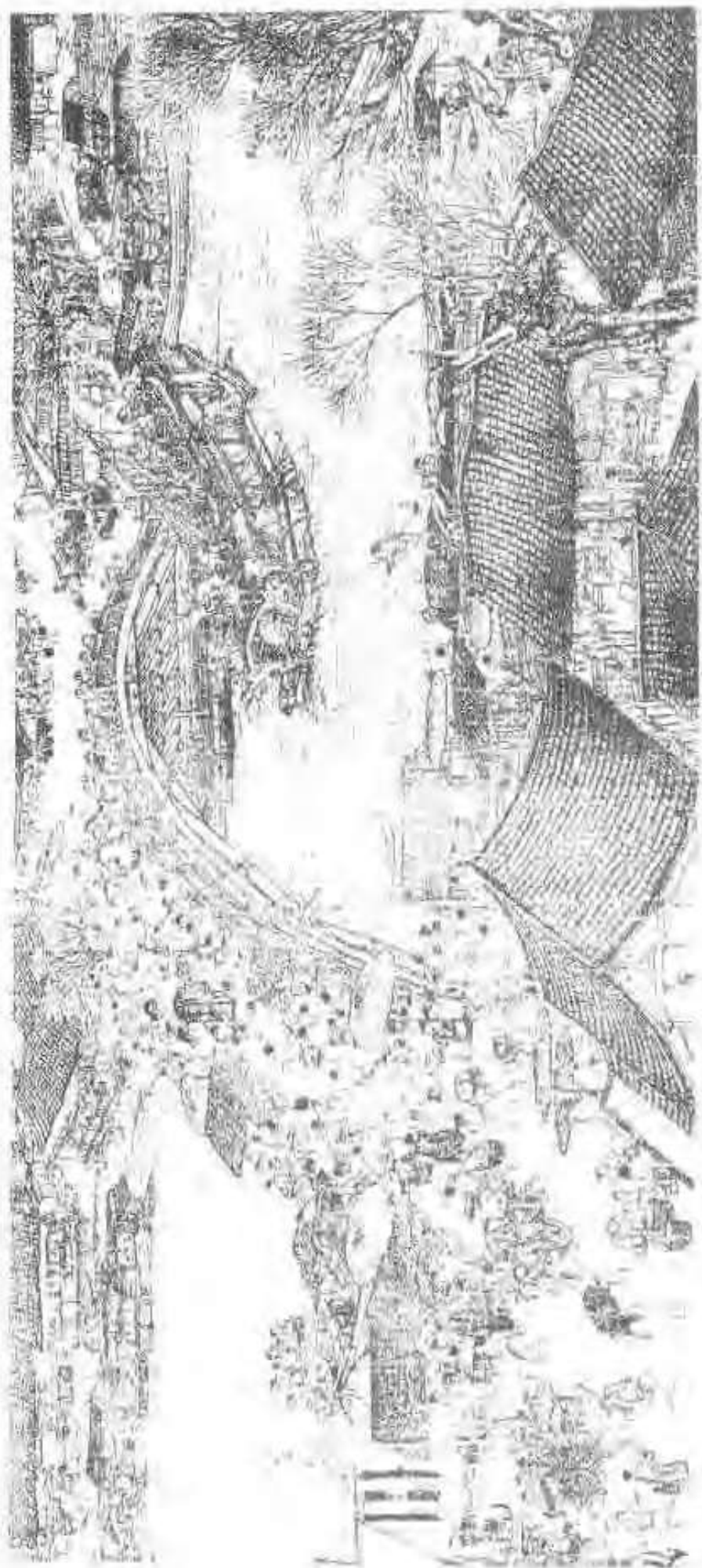
圖十六 洛陽漢魏方城遺址
東北角的城壁(上)與東壁中部(下)



圖十七 唐·長安城大明宮含元殿遺址
自東北而瞭望，左側之小丘為翔鸞閣遺址。



圖十八 唐·長安城大明宮龍尾道遺跡。
自翔鸞閣臺基上瞭望西方之柝城閣遺址(右內側之小丘)，右側為含元殿遺址。



圖十五 清州土河圖(植地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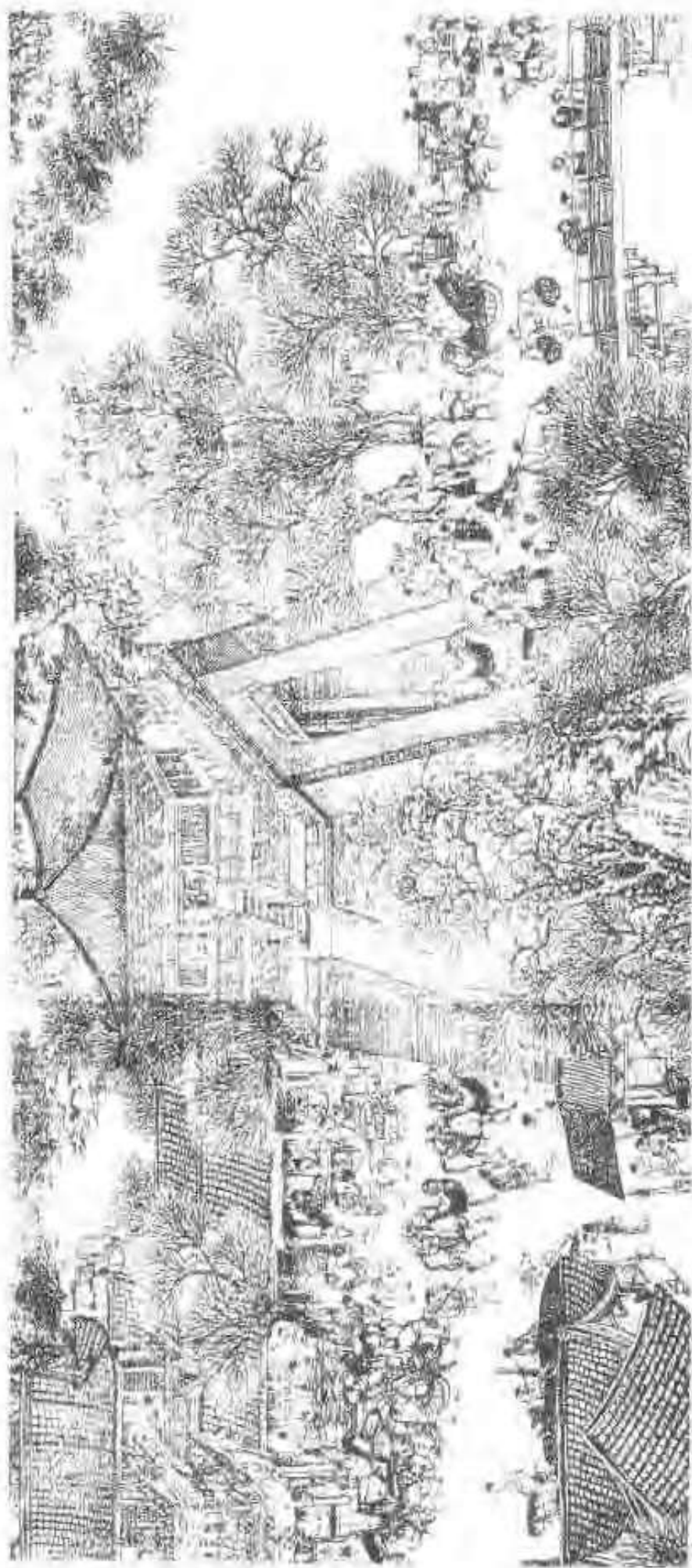


圖 11 清明上河圖(城門口)

序 言

筆者這部新寫成的〈中國古代都城制度史研究〉，和1985年已出版的〈中國古代陵寢制度史研究〉，可說是關係親密的姊妹篇。歷代君王實行“事死如事生”的禮制，陵園中陵寢的佈局和規格，常常是按照生前所居都城格局來設計的，因而研究陵寢制度就必需研究都城制度。而當我們深入研究都城制度時，却又不得不將它與陵寢制度結合起來探討。

我們現在對都城制度發展歷史進行探索，首先應該重視的，是“城”“郭”相連結佈局的發展變化和“郭”內居民所住的坊里以及市的發展變化。至於營建宮殿的“城”內佈局結構，還是次要的。從整個都城制度發展歷史來看，可以分爲前後兩大階段，前一階段從先秦到唐代，是封閉式都城制度時期，本書上編〈中國都城的起源和發展〉所談論的就是這個前階段。後一階段從北宋到明清，是開放式都城制度時期，本書下編〈宋代以後都城制度的變革及其重要設施〉探討的就是這個後階段。

所謂封閉式都城制度，主要指的是郭內存在封閉式的居民“坊里”制度和集中貿易的“市”的制度。居民衆多的“坊里”和開設商店的“市”，四周都築有圍牆，所有門戶都設有小官管理，早晚定時開閉，夜間不准出入。一般居民住宅只准造在“坊里”以內，不許當街開門。等到晚上坊門、市門緊閉，大街上就不准通行，而且都城內有嚴密的警衛設施。秦都咸陽“市”的“街”上已有

“亭”，設有“求盜”等官管理街上治安。西漢長安和東漢洛陽不但城以內“街”上設“亭”，而且每個城門口，郭外約十里還設有“外郭亭”。到唐代長安，城門口和沿着大街的坊角都設有“街鋪”，駐屯警衛，管理治安。

先秦到唐代這個實行封閉式都城制度的歷史階段，還可以按城郭連結的不同佈局劃分為三個時期：即商代是有城無郭的時期；從西周到西漢是西城連結東郭的時期；從東漢到唐代是東西南三面郭區環抱中央北部城區的時期。尤其是西漢和東漢之際，城郭連結的佈局曾發生過重大變化，這是我們研究時值得倍加注意的地方。

自西周初期周公在洛陽建設東都成周，開創了西面小城連結東面大郭的佈局後，城郭連結的佈局，就長期被推廣應用。《吳越春秋》佚文所說“築城以衛君，造郭以居民”（《太平御覽》卷一百九十三所引，《初學記》卷二四所引“民”作“人”，當出於避諱）的方式，就成為歷代都城建設的準則。西周這種西城東郭相連結的制度，不但為春秋戰國時代中原各諸侯國先後採用，而且也為秦都咸陽和西漢都城長安所沿襲。

由於秦都咸陽的城址毀於渭水不斷北遷之擾，西漢長安雖有外郭，却未建郭城，所以這兩個都城的佈局均未得到研究者應有的重視。但是我們只要把咸陽和長安放到整個城郭連結佈局發展變化的過程中去考察，就會清楚地看到它們在這個發展變化中的重要地位，就會提出這樣一個問題：既然在秦漢以前，西周、春秋、戰國時期中原諸都城流行着西城連結東郭的佈局，在秦漢以後北魏洛陽又有東西南三面郭區環抱中央北部地區的佈局，那麼在此兩者之間的秦都咸陽、西漢長安和東漢洛陽怎麼可能只有“城”而無“郭”呢？因此這個問題值得我們深入研究

和探討。

以秦都咸陽爲例。商鞅在變法過程中創建的咸陽都城制度，曾被作爲模式而推廣。秦惠王在滅蜀以後，曾派遣張儀、張若主持建設成都，“與咸陽同制”，成都因而有“小咸陽”之稱。成都就是採用西面小城連結東面大郭的佈局，文獻上明確指出，蜀都成都，“亞以少城，接乎其西”（左思《蜀都賦》），“接乎其西”就是說小城緊接在大城之西。具體說來，就是“少城與大城俱築，惟西南北三壁，東即大城之西墉”（李膺《益州記》，已佚，今有輯本）。成都古城略呈方形，每面三里，中間隔有南北向的城牆，把方城分隔成西面小城和東面大郭，小城與大郭的南北長度相同，只是東西寬度有大小之別，因此小城成狹長方形，大郭成較寬的長方形（參看王文才《成都城坊考》的“城郭”與“城門”部分，巴蜀書社1986年出版）。秦都咸陽該是同樣的格局，只是規模較大。模仿咸陽都城的秦始皇陵園，也正是同樣的格局，只是規模較小，西面建築陵寢和陵墓的雙重小城正是狹長方形，東面包括兵馬俑坑在內的大郭，正是較寬的長方形，兵馬俑坑正當在大郭的東門以內。由此可以推斷出秦都當年的城郭佈局。

我們回顧都城中“郭”的建設歷史，可以加深對西漢長安和東漢洛陽所存在郭區的理解。早期的郭，只是利用原有山川加以連結用作屏障，清代學者焦循在《羣經宮室圖》中已指出這點。利用河流及其堤防作爲屏障，原是古人慣用的方法，戰國時代各國在邊境上興建的長城，多數就是利用河流的堤防連結山地而成。因此我們不難理解西漢長安的北郭很明顯是利用渭水及其堤防作爲屏障的，東郭是利用新開的漕渠及其堤防作爲屏障的。宋程大昌《雍錄》把漕渠看作長安東郭的屏障，在宣平門外玉渠上寫明“郭門外”，並在旁標明“東都門”，是不錯的。東漢

洛陽很明顯是利用邙山、洛水、漕渠以及其他溝渠作為外郭的屏障的，直到北魏洛陽還是如此。

在西漢、東漢之際，都城制度發生了一次重大變化，整個都城的造向由“坐西朝東”變為“坐北朝南”，由西城連結東郭或西南城連結東北部的佈局，變為東西南三面郭區環抱中央北部城區的佈局。後來魏晉以及北魏的洛陽都沿用東漢的佈局，只是作了進一步的發展。北魏洛陽廢棄南北二宮的結構，只保留北宮，並在宮門以前建設兩側整齊排列官署的中軸綫。到唐代長安建成貫串皇城和郭城的南北向中軸綫，出現東西兩面郭區對稱的街道、坊市的棋盤格式佈局，這都是東漢都城“坐北朝南”佈局進一步發展的結果。

在唐宋之際，都城制度發生又一次更大的變化，就是從封閉式變成了開放式。這時期由於都城人口的急劇增長，廣大居民生活必需品的供求日益增加，同時由於社會經濟的發展，各種行業商人之聯合組織“行”或“市”的成長，從而使得沿河近橋或城門口內外，出現了許多新的經營日用商品的“行”或“市”，逐漸形成以新的“行”“市”為中心的街市，同時為適應社會交際需要的酒樓、茶坊也大為發展，逐漸形成以酒樓、茶坊為中心的街市。全國性市場形成。于是新的行市和街市代替了舊有的封閉式集中的“市”。隨着舊有集中“市”的瓦解，街市的興起和發展，居民區與商業區交叉存在，逐漸連成一片。大街小巷的交通網也逐漸形成，居民衆多的小巷不再相互隔離而直通大街，於是大街小巷暢通的結構代替了舊有的封閉式的街坊結構。正由於上述的種種因素，使得原有封閉式的都城制度逐漸趨向開放式的都城制度。當然這在唐宋之際是有一個比較長期的新陳代謝的過程的。

我們要特別指出在這個封閉式變為開放式的過程中，五代

的後周世宗作出了重大貢獻。他適應時代的需要，在汴梁（今河南開封）的宮城和州城外圍，加築一圈大四倍的外城，准許居民沿街造屋，並佔有街道十分之一寬度面積，用來種樹、掘井和搭蓋涼棚等，這是適應都市經濟發展的新街道制度。北宋東京就是在這個新規劃的基礎上發展起來，形成宮城、裏城和外城三重城圈的結構，出現以宮城為中心的全城四通八達的交通。到北宋末年，東京出現如孟元老《東京夢華錄》和張擇端《清明上河圖》所描寫的那樣繁華的街市情景，這是都城制度發生重大變化的結果。

唐宋之際都城制度這一重要變化，使得都城居民在生活上得到飛躍的進步。從飲食起居到文化娛樂都有了進一步的發展。唐代長安只是“市”上有表演雜戲的和講小說的，大寺院中有表演歌舞和百戲的劇場；到北宋東京就有六家稱為瓦子的游藝場分佈於交通要道上。唐代長安只是“市”上有書肆，北宋東京不僅相國寺集市上有專售書籍玩好的場所，而且在相國寺東門大街上也設有許多書鋪，書籍也已成立行市，稱為“文字行”。同時烹調作為一種技藝大為發揚。北宋東京不僅有各種地方性食店，如北食店、南食店、川飯店，而且設有分門別類的各種專門的飲食店，其中著名的店鋪出售名菜的不少。到南宋臨安（今杭州）時，各方面更有進一步的開展，民間講究詩文、武藝、技藝和戲曲的社會團體紛紛興起，城內外瓦子多到二十三所，民間文藝的創作和演出都有很大發展，出版圖書的書鋪增多，書籍的行市稱為“書房”或“文籍書房”。可見都城的發展和變化是和當時社會政治經濟文化的發展緊密相關的。

筆者從事都城制度史的探索，就是根據以上的見解，分成兩大步驟來進行的。

本書上編《中國都城的起源和發展》，論述先秦到唐代的封閉式都城制度的起源和發展變化，是1983年7月以前寫成的。預定於1983年9月在日本東京召開的第三十一屆亞洲北非人文科學國際會議，是促成我加速完成這部分初稿的契機。

這次國際人文科學會議的第一部會，以討論各國都城史為主題。我在1983年的年初接到邀請後就着手進行準備。1983年4月和5月，我又乘教學實習的方便，和三位研究生一起到許多古城遺址，作實地考察調查。承蒙各地考古單位和文物保管單位的專家們熱情招待，並引導到現場作具體的指導和說明，使我得益非淺。與此同時，在考察路程中，我又接受各地的大學歷史系和文物單位的邀請，作過多次有關都城制度史的專題演講，發表個人的一些看法，目的在於拋磚引玉。通過這次考察，使得我對都城制度發展過程有了深一層了解，同時在研究方法上，使文獻和考古資料得到進一步的結合。同年的6、7兩月，我就專心動筆寫作，經過兩個月的時間，完成了從先秦一直到唐代的初稿，共有十萬字以上。

因為這是一次大規模的人文科學討論會，分成許多部會同時召開。討論都城史的第一部會要同時討論亞洲北非各國都城史，討論中國都城史只安排一天時間，每人發言有一定的時間限制，為此我只能根據已寫成的初稿，約縮成五千字，題目改為：《先秦、秦漢之際都城佈局的發展變化和禮制的關係》，英文譯作：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Developing Change of the Layout of Capital Cities and Ritual in the Pre-Qin and Qin-Han periods。當討論中國都城史這天，我被安排第一個發言，日本許多大學、研究單位、文物單位的研究人員專程趕來聽講，濟濟一堂。我感到十分抱歉，

我没有能够充分说明对都城制度史的看法，同时展开讨论也不充分。会后不少人希望看到我所发表的新见解的全貌，承蒙東京大學名譽教授西嶋定生先生和東京大學教授尾形勇先生慨然許諾，組織領導翻譯拙作《中國都城的起源和發展》，作為先前已經翻譯出版的拙作《中國皇帝陵的起源和演變》的姊妹篇，同樣由日本專出考古圖書的學生社出版。又蒙高木智見同學參與這一翻譯工作。更蒙學生社社長橋岡旺巳先生、總編輯大津輝男先生為此設宴隆重招待。因為這部書，在許多問題上，引用古文獻，結合考古資料，作了新的論證，給翻譯工作帶來了許多困難，有不少地方需要商討解決，常常為了許多疑問反復通信討論。再加上，我不斷發現新資料，寄去新的《追記》和插圖，打亂了翻譯工作步驟，增加了麻煩。由於西嶋先生、尾形先生和高木同學繼續不斷的努力，終於克服了所有的困難，完善地做好了翻譯工作，這本日文譯本終於在1987年11月出版。同時《中國皇帝陵的起源和演變》的日文譯本也再版發行。承蒙西嶋先生為日文譯本寫了向日本讀者熱情推薦的《序》，系統地扼要地敘明了全書的綱領。又蒙尾形先生為日文譯本寫了《後記》，說明了認真做好翻譯的經歷，並蒙高木同學為日文譯本寫了《解題》，介紹了作者的治學方法和業績以及本書的特點。又蒙西嶋、尾形兩先生挑選好書內需要的插圖，並在短促時間內向朋友們借來許多都城遺址的照片，挑選作卷首的圖版，使得拙著能夠完美地和日本讀者相見。正由於以上各位先生不斷的努力，這一日文譯本得到了日本史學界的重視，並得到了好評。特別要提到的是，1987年8月下旬，當此書日文翻譯工作剛完成、將要出版之際，西嶋定生先生因出席日美歷史學會會議，來到美國洛杉磯，在會議結束之後，專程乘飛機到邁阿密海濱訪問，得以

暢叙闊別多年之情，探討彼此正在研究中的學術問題，也還談論到此書的翻譯出版事宜。這種隆情厚誼，使我永遠銘感心中。

本書上編除了第十二章講東吳建業和東晉南朝建康以外，全部保持原稿的本來面目，與日文譯本完全相同。原來第十二章因缺乏這方面的考古資料而沒有寫進去，後來是依據文獻來補充的。上編的插圖，也和日文譯本完全相同，只是其中有些插圖重新加以考核，作了修正並附加說明。

本書下編的初稿，是當年參加國際人文科學會議回來之後，趕緊繼續寫成的，後來曾不斷地加以補充和修改，以致篇幅大為增加。唐宋之際都城制度的重大變化，對於此後社會經濟的發展都市居民生活的改善起着重大的推動作用。這是我們特別需要作為重點來研究的。關於這一方面，三十年代日本學者加藤繁有開創之功，所寫論文收入在他的《中國經濟史考證》中（我國有吳傑同志譯本，商務印書館1959年出版）。近五十年來日本學者繼續有進一步的探索，但是這個新陳代謝的過程比較複雜，至今還沒有分析清楚，有待於我們作進一步的努力。因此本書在下編突出地着重這一方面的討論，對整個新陳代謝過程作了比較詳細的敘述與分析，寫法上與上編大不相同。

宋元以後的都城，至今還在延續使用，今天的城市基本上建築在宋、元、明的城市的基礎上面，系統的全而的考古工作不便展開，因而所得的考古資料有很大的局限性，幸而宋元以來編輯地方志的風氣逐漸流行，同時記述都城景象的筆記較多，有關文獻資料遠比唐以前的充分，因此我們不但可以比照今天的遺跡，畫出位置相對比較準確的各種示意圖，例加街道、坊巷、行市以及瓦子分佈的示意圖，也還可以進行綜合的分析研究，從中探索唐宋之際都城制度變革的來龍去脈。我在本書中所做的，只是

一種新的探索的嘗試，請大家指教。

在下編不斷修訂補充過程中，曾蒙高智羣同志和日本高木智見同學幫助我搜集資料或查閱材料，特此誌謝。這部書和先前的《中國古代陵寢制度史研究》一樣，承蒙上海古籍出版社的姜俊俊同志認真審閱，悉心校正，又蒙出版社美術組同志代為繪製插圖，在此一併表示謝意。

楊 寬

1988年1月作於美國邁阿密海濱

目 錄

序言	1
----	---

上編 中國都城的起源和發展

日譯本序	西嶋定生	3
一 前言		9
二 都城的起源		10
1 仰韶文化時期的氏族制村落		10
2 龍山文化時期的城堡		11
3 東下馮遺址的濠溝和城牆		16
三 以東北爲“重心”的商代都城佈局		18
四 商代“大邑商”及其別都的制度		28
1 “大邑商”的所在及其範圍		28
2 從“商郊牧野”看“大邑商”的“郊”“野”制度		31
3 牧即洙，是商代晚期的別都		32
4 鄭州商城即闕或管，是商代前期的別都		35
五 西周都城佈局的發展		43
1 西周都城制度的逐漸形成		43
2 東都成周開創的小“城”連結大“郭”佈局		46
3 成周建設大“郭”的用途		52
六 魯國都城曲阜的“坐西朝東”佈局		59
1 魯國都城佈局的分析		59

2	曲阜兩類墓葬和都城佈局	63
七	春秋戰國中原諸都城的西“城”東“郭”連結佈局	65
1	齊國都城臨淄	65
2	鄭、韓都城新鄭	70
3	晉國都城新田	73
4	秦國都城雍	75
5	趙國都城邯鄲	81
6	魏國都城安邑	86
7	春秋戰國時代中原諸都城佈局的特點	88
八	楚都郢、鄢和燕下都	94
1	楚都郢	94
2	楚的別都鄢	96
3	燕下都	97
九	秦都咸陽西“城”東“郭”連結的佈局	101
1	從成都故城推測咸陽佈局	101
2	從秦始皇陵園推測咸陽佈局	103
3	秦始皇擴建咸陽都城的佈局	107
十	西漢長安的西南“城”區和東北“郭”區	109
1	“坐西朝東”的長樂宮和未央宮	109
2	內城性質的長安城	114
3	長安城外北面和東北面的“郭”區	119
十一	東漢、北魏洛陽“城”和“郭”的佈局	133
1	東漢洛陽城的內城性質及其“坐北朝南”佈局	133
2	北魏洛陽城的內城性質及其“南向”佈局	138
3	漢魏洛陽城外的西面“郭”區	144
4	漢魏洛陽城外的東、南兩面“郭”區	149
十二	東吳都城建業和東晉南朝都城建康	158
1	東吳都城建業的佈局	158

2	東晉、南朝都城建康的佈局	162
十三	唐代長安、洛陽的“城”、“郭”佈局	169
1	唐代長安的內城及大明宮	169
2	唐代長安的郭城	176
3	唐代洛陽的“城”、“郭”佈局	179
十四	都城佈局的變化和禮制的關係	184
1	都城佈局的三次重大發展變化	184
2	都城佈局變化的原因及其與禮制的關係	191
	日文譯本尾形勇先生後記	204

下編 宋代以後都城制度的變革及其重要設施

一	封閉式的唐以前都城結構	209
(一)	封閉式的里制和坊制	210
1	先秦都城的里制	210
2	秦漢都城的里制	214
3	北魏都城的坊制	217
4	唐代都城的坊制	218
(二)	封閉式的集中的市制	222
1	春秋戰國都城的市制	222
2	西漢長安對稱的東西兩市制度	225
3	北魏洛陽“市”與“里”相結合的“大市”制度	226
4	唐代長安的東西兩市制度	227
(三)	封閉結構的警衛、治安設施	234
1	秦漢都城的警衛、治安設施	234
2	唐代都城的警衛、治安設施	239
二	唐宋之際都城制度的重大變化	248
(一)	商人“行”“市”組織的發展和沿河近橋及城門口新	

“行”“市”的形成·····	248
1 唐代長安的商人“行”“市”組織·····	248
2 客商需要邸店日益增長·····	250
3 後周世宗擴建東京外城和獎勵增建邸店的新政策·····	251
4 北宋東京沿河近橋新“行”“市”的形成·····	256
(二)新“街市”的形成和舊的封閉式“市”的淘汰·····	261
1 以新“行市”為中心的街市的形成·····	262
2 以酒樓、茶坊為中心的街市的形成·····	262
3 因衆多居民日常生活需要而形成的街市·····	263
4 新行市和新街市代替舊的封閉式“市”的過程·····	264
(三)民間文娛活動的開展和以“勾欄”為中心的“瓦子” 的形成·····	267
1 秦漢以前都城居民的文娛活動·····	267
2 北魏洛陽居民的文娛活動·····	268
3 唐代長安居民的文娛活動·····	270
4 宋代以“勾欄”為中心的“瓦子”的形成·····	273
三 北宋東京的新結構和新街市·····	280
(一)後周擴建東京外城的新規劃和北宋的繼續發展·····	280
1 後周在東京開創的新街道制度·····	280
2 後周和北宋特許的臨街市建邸店樓閣的規定·····	282
3 北宋東京一度恢復街鼓制度和對“侵街”的處理·····	285
(二)北宋東京的新結構和新佈局·····	287
1 三重方城的新結構·····	287
2 四條河流的對外疏通·····	290
3 宮殿和中央官署的佈局·····	291
4 社、郊壇、太廟和原廟的建置·····	293
5 “廂”和“坊”的行政組織系統·····	295
6 街巷的新佈局·····	298

(三)北宋末年東京的新“街市”	303
1 南面御街	303
2 東面御街	305
3 西面御街	306
4 北面御街	306
5 宮城宣德門前大街	308
6 宮城東華門前大街	309
7 景靈宮東門大街和相國寺東門大街	310
(四)《清明上河圖》所描繪沿汴河到東水門的街市和虹橋的橋市	312
1 沿汴河的大街和出東水門旁的大街	312
2 《清明上河圖》的主題	315
3 《清明上河圖》中虹橋的橋市	317
4 《清明上河圖》中通津門內的街市	318
(五)北宋末年東京酒樓、茶坊和飲食店的特色	319
1 東京酒樓的特色	319
2 東京酒樓、茶坊和集市	320
3 東京飲食店的特色	321
(六)北宋末年東京各種集市的分析	322
1 天曉的早市	323
2 酒樓、茶坊、集市的特點	324
3 瓦子的集市	325
4 相國寺的廟市	325
5 集市上的書畫玩好	327
6 節日的集市	328
(七)北宋末年東京瓦子的勾欄及其演藝	329
1 東京瓦子的勾欄	329
2 勾欄表演的技藝	330

(八)北宋末年東京街市的治安設施和服務性行業……	334
1 行政系統和治安管理……	334
2 軍巡鋪屋和防火措施……	335
3 官營藥局與服務性行業……	336
(四)南宋臨安(杭州)結構和街市的分析……	344
(一)“坐南朝北”的特殊佈局……	344
1 “坐南朝北”特殊佈局的形成……	344
2 御街的由南向北并通向西北……	345
3 “坐南朝北”的佈局和禮制的關係……	348
4 先兆的傳說和方位的選定……	349
(二)宮殿、官署、學校和官僚住宅的分佈……	351
1 大內所在和宮殿的分佈……	351
2 中央官署的分佈……	352
3 學府的所在……	354
4 官僚住宅和家廟的分佈……	355
(三)居民的廂和坊的分佈排列……	355
1 右一廂十坊所在……	357
2 左一北廂十九坊和左一南廂四坊所在……	359
3 左二廂十八坊所在……	361
4 右二廂十八坊所在……	362
5 右三廂六坊所在……	363
6 右四廂二坊所在……	364
7 左三廂八坊所在……	364
(四)熱鬧繁華的御街景象……	365
1 御街南段的街市……	366
2 御街中段的街市……	367
3 御街北段的街市……	372

(五)沿河近橋的街市特色·····	373
1 沿小河近橋的街市·····	374
2 沿大河近橋的街市·····	375
3 沿西河近橋的街市·····	375
4 一般街市和城門口的街市·····	376
(六)“市”、“行”、“團”、“作”的組織和作用·····	376
1 “市”、“行”、“團”的分佈·····	376
2 米市、肉市、蠶團以及其他日用物資行市的作用·····	379
3 “作”的組織及其作用·····	382
4 雇傭勞動者的“行”的組織·····	383
(七)花色品種衆多的食店·····	383
1 分茶店和麵食店·····	384
2 狍餅店·····	386
3 涼水·····	386
4 從食店·····	386
5 果子店·····	387
(八)分佈各處街市的酒樓、茶坊和歌館·····	388
1 酒樓·····	388
2 茶坊·····	390
3 歌館·····	391
(九)以勾欄爲中心的瓦子大發展·····	391
1 瓦子的創設和發展·····	391
2 臨安城內的瓦子·····	392
3 臨安城外的瓦子·····	395
(十)民間“社會”的組織和活動·····	396
1 講究詩文、武藝和技藝的社會團體·····	396
2 各種行市的“社”·····	398
3 “社”的主要活動及其作用·····	398

(十一)民間技藝的創作和演出的發展·····	400
1 小說·····	400
2 講史·····	402
3 嘌唱、諸宮調和唱賺·····	403
4 雜劇·····	404
5 傀儡戲·····	405
6 影戲·····	406
7 角抵·····	406
8 雜技·····	406
9 街頭藝人的表演·····	407
(十二)西湖及城內外風景的游覽·····	407
(十三)臨安的治安設施·····	410
1 臨安的密集人口·····	410
2 防火和治安設施·····	412
3 街市的治安問題·····	414
(十四)服務性行業和管理措施·····	416
1 寄藏財物的塌房·····	416
2 水井的建設和供水、清潔等服務行業·····	417
3 報曉和報天氣·····	418
4 修補家常用品的小行業·····	419
5 為筵會服務的“四司六局”·····	419
6 租借器物的行業·····	420
7 帶有服務性質的藥材業·····	420
五 遼金都城結構的變遷·····	427
(一)遼五京結構的變遷·····	427
1 遼上京臨潢府·····	427
2 遼東京遼陽府·····	430
3 遼南京幽都府(後改析津府)·····	431

4	遼中京大定府	433
5	遼西京大同府	439
(二)	金上京和中都結構的變遷	440
1	金上京會寧府	440
2	金中都大興府	444
六	元大都和明清北京佈局結構的變化	456
(一)	元上都的特殊結構	456
1	元上都的外城	456
2	元上都的內城和宮城	458
(二)	元大都的設計規劃和“坐南朝北”的佈局	461
1	大內(宮城)方位的選定	463
2	中心臺位置的選定和“坐南朝北”佈局的形成	464
3	城中部鐘鼓樓的建設	467
(三)	元大都運輸水道和宮苑用水道的疏通	468
1	通惠河的開鑿	468
2	金水河的開鑿	469
(四)	元大都三套方城的結構	471
1	外城的結構形制	471
2	宮城和蕭牆的佈局	473
(五)	元大都宮殿的組合和官府的分佈	477
1	主要宮殿的組合	477
2	重要中央官署的分佈	480
(六)	元大都郊壇、社稷壇、太廟和原廟的建置	482
1	郊壇、社稷壇和太廟	482
2	原廟的擴大建設	483
(七)	元大都的街巷和坊的安排	489
1	街巷劃分和“八畝”方地的分配方案	489
2	兩個赤縣所屬的坊	491

(八)元大都的行市和街市	498
1 城中心的行市和街市.....	498
2 城西的羊角市和西市.....	503
3 城東的舊樞密院角市和東市.....	503
4 城門口內外的行市.....	505
5 南城的行市和街市.....	506
6 節日的集市.....	511
(九)明代南京結構的新發展	513
1 明代南京應天府城的建設.....	513
2 明代南京皇城和宮城的佈局.....	516
3 中都臨濠仿南京之制.....	520
(十)明代北京城的改建	522
1 洪武年間緊縮北城牆和建設燕王府.....	522
2 永樂年間遷都北京、重建宮殿和拓展南城牆.....	526
3 正統年間建城門樓、月城樓等.....	529
4 商業中心南遷和嘉靖年間南面外城的興建.....	530
(十一)明代北京皇城和紫金城的重建及其官署分佈 ... 537	537
1 依照南京規制重建的皇城和紫金城.....	537
2 明代北京的廟、社、郊壇的建置.....	543
3 明代北京官署的設置.....	545
(十二)清代北京的建置	549
1 清代北京宮殿的擴建和改建.....	549
2 清代北京廟、社、郊壇的改建或因襲.....	553
3 清代北京官署的因襲、調整和增設.....	554
4 清代北京的地方行政設施.....	558
5 清代北京主要商業區的發展.....	560
6 清代北京琉璃廠“文化街”的形成和發展.....	564
附錄：西漢長安佈局結構的再探討	573
三論西漢長安的佈局結構問題.....	593

上 編

中國都城的起源和發展

日譯本序

本書是復旦大學教授楊寬先生的中文手稿的全譯本，大作基於都城的平面佈局發展與禮制及政治史相關聯這一新觀點，實證地、綜合地闡明了中國古代都城制度的發展歷史。

全書的主要觀點是，從周初在洛陽管建成周的城郭以後，中國古代都城的基本結構為：〈一〉由小城和大城（即郭）兩部分組成，小城是君主的宮殿及統治機構——官衙的所在，大城中則居住着士兵、庶民、被征服者，並分佈着製銅、製鐵等的作坊。〈二〉西漢長安城以前，小城多設在大城的西南隅，東向；東漢洛陽城以後，小城多位於大城的中央，南向。〈三〉這個變化，反映了從“坐西（南）朝東為尊”的以家為中心的禮制，到“坐北朝南為尊”的君臣關係禮制的轉變。〈四〉北魏洛陽城及唐代長安城的佈局結構是這一轉變的延續和發展。

楊寬先生的這一觀點，最初是在1983年9月東京召開的第三十一屆亞洲北非人文科學國際會議上發表的（Yang Kua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Developing Changes of Layout of Capital Cities and Ritual in the Pre-Qin and Qin-Han Periods），由於受會議發言時間的制約，只介紹了內容的概要，但是，學術界非常希望能在日本公開刊行這嶄新見解的全貌，楊寬先生也應允了，於是，決定將該書作為前作《中國皇帝陵的起源與變遷》的續篇，仍由學生社出版。楊先生歸國後不

久，就寄來了十多萬字的手稿，題為《中國古代都城的起源和發展》。

這份手稿與先前的發言內容相比，不僅考察的範圍顯著擴大，而且所涉及的地方無不有詳盡的論證。首先，楊寬先生參照考古學成果，考察了都城的起源，一直追溯到商代之前；並且還推斷，商代的都城制度是一種陪都制，這與歷來認定的一代一都的觀點是迥異的。接着，將考察的目標轉到成周洛陽營建中所出現的小城大郭連結方式上，隨後又結合以西方為上位而東向的“坐西朝東”禮制，探討了春秋戰國時期中原各國的都城。

對秦都咸陽和漢都長安的考察，稱得上是本書最為精采的兩章，其全新的觀點和周密的論證顯示了作者獨步於這一領域的氣勢。

關於秦都咸陽，作者確認其遺跡因渭水泛濫而被湮滅，但他用兩個方法“復原”了它。一個方法是依據文獻進行推論，即戰國時代的張儀仿照咸陽形制營建了蜀的成都，其結構方式就是大城和小城相連結，由此可以推定，成都的祖型——咸陽也是採用小城大郭相連結方式。另一個方法是從秦始皇陵的現存形態來推論。皇帝死後的陵墓一般是仿照生前的都城建造的。以現在所見秦始皇陵的圍繞墳丘的二重城牆為小城，那麼，在它的東面一定存在着包括現已發現的兵馬俑坑在內的廣大的外郭部分。如果秦始皇陵確是秦始皇生前模仿都城咸陽建築的話，那麼，咸陽的構造也定是小城大郭東西相連的都城形式了。

關於漢都長安，儘管人們已通過典籍記載和考古調查基本了解了它的城牆環繞形態及內部的宮殿佈局，但是楊寬先生還是在這個基礎上提出了更大膽的新見解。歷來的看法是，漢長安

城的整體佈局就在現在還殘存着的城牆之內，而楊寬先生認為，現存城牆只是小城部分，他運用了當時的文獻及其它材料，推斷在這個小城的東北部和北部還有大郭部分。根據這個推斷，我們不難設想，包括着內城(小城)、外郭的漢長安城的規模在當時是多麼的宏偉壯麗！

楊寬先生的這些新見解，也成了解決歷來存在着的疑點的鑰匙。正如書中所指出的，據《漢書·地理志》記載，元始二年(公元2年)，長安的戶口統計數為80,800戶。246,200口。現存城牆東西、南北(不規則)各長6公里餘，城牆內的面積大約為36平方公里，而且其三分之二以上為宮殿、宗廟和官衙所佔，因此，城內根本就不可能有這麼多人口居住的餘地。然而，若設想城牆之外還有外郭部分的話，那麼按傳統，郭內才是庶民的居住區，在那裏容納這麼多人口是並不困難的。

作者在新手稿中指出，這種小城大郭、坐西朝東形式的都城結構到漢魏洛陽城有了一大變化，這就是由“坐西朝東”變為“坐北朝南”，而郭這一部分則由位於內城東側或北側，變為分佈在東、西、南三面，這是與禮制的變化相對應的，其一就是從正宮到南郊圓丘進行郊祀儀禮時的出幸鹵簿，但決定性的因素，還是皇帝南面而坐、會見羣臣朝賀的元旦朝儀(元會儀)，即大朝會。

三面有郭、坐北向南的都城佈局形成之際，其內城部分與北牆是相接的，直到唐長安城才完成官城部分與皇城部分的分離。沿着這樣的方向，就可以把中國古代都城的起源和發展，與君權擴展的關係，在同一條發展綫索上，整體地、同步地進行理解了。

衆所周知，作者楊寬先生是當今中國古代史研究中最著名

的老大家，他的簡歷及主要成就已在《中國皇帝陵的起源與演變》的卷末附錄中作了詳細介紹。此後，楊寬先生於1986年從復旦大學光榮退休，並曾以同等身份為美國所聘，現居邁阿密市休養，為再著書立說而作準備。據悉，他的下一部作品將是一部巨著——《西周史稿》。另外，先生的《中國古代冶鐵技術發展史》（1982年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一書，1986年9月得到上海市頒發的“上海市哲學社會科學著作獎”。對這種不服老的旺盛的研究態度，我真是敬佩不已。作者在寄來本書大量的草稿後，又頻頻從美國寄來“追記”，這就使得原稿的內容更為充實了。今年夏天，我有機會赴美參加“日美史學會議”，特往邁阿密市拜訪了楊寬先生，在暢叙闊別之情的同時，更深感於先生夙鑄地潛心於研究的近況，從而反省了自己的怠惰。

本書先由高木智見擔任翻譯。高木氏畢業於名古屋大學，後在就讀於該校研究生院期間，留學於上海復旦大學，是一位受過楊寬先生親自指導的後起之秀，也是最熟知先生的思考方法和研究方法的人，因此，由他擔任譯者是再合適不過了。也正因為以上原因，高木氏在完成譯文後，還徵得楊寬先生的同意，讓他加上一些必要的譯注，並附以記述先生研究方法的《解題》一文，這就進一步方便了讀者對本書的理解。

高木氏的譯稿完成後，由最近從山梨大學轉到東京大學的尾形勇教授對照原文作了細致的校檢。兩人還幾次會面，共同協商對譯文的調整工作，一有疑問處，即向作者請教，質疑、答問的書信頻頻往返。此外，為有助於解讀，還增補進一些地圖和照片。完成了以上的翻譯工作後，我又閱讀了一遍，直率地提出了一些有問題的地方，這樣就大大地拖延了譯稿的最後完成。為此，我一直覺得辜負了期待着本書儘早出版的楊寬先生，故特

在此懇求先生的寬恕。

本書是一部充滿了創見及其論證的著作，我想，在或僅有論證而沒有創見、或僅有創見而沒有論證的論著為數不少的當今學術界，本書帶來的效果將是巨大的。

與前書的情況一樣，本譯稿刊行之際，承蒙學生社社長鶴岡正巳氏、總編輯大津輝男氏及出版部的羽佐田真一氏的特別照顧和理解，在此謹向他們表示深切的謝意。

西嶋定生

1987年8月

一 前 言

都城是每個朝代的政治中心。當每個新王朝創建的時候，開國君主及其輔佐大臣，總是把都城的建設作為其首要的政治任務。從選定地點，製定規劃，到具體施工，建築完成，都是按照他們的政治意圖和既定方針來進行的，都是為了適應統治階級政治上和經濟上的需要。因此每個都城的建設，必然對於當時的政治、經濟、文化的發展，起着重大的作用和影響。同時還應該看到，隨着社會經濟的發展，政治制度的變革，以及各個時期政治、軍事、經濟等方面的不同需要，都城的建設是不斷發展變化的；特別是在整個都城的佈局結構方面，在不同時期可以看到顯著的變化。我們在都城佈局的發展變化中，可以從側面看到古代社會經濟和政治制度的變革過程，因而很值得我們作為重要課題來進行系統的深入的研究。

要做好這個課題的研究，必須系統地、廣泛地搜集考古資料，結合文獻記載，作出綜合的分析探討。近幾年來，中國各地的考古工作不斷取得了新成就，對於歷代主要的都城遺址，有的進行了有計劃、有步驟的發掘，有的作了全面的鑽探調查，有的設立了文物保管機構，一面做好保護工作，一面進行調查研究。筆者曾經在一九八三年四月和五月，到這些主要古城遺址，作了實地考察調查，承蒙各地考古單位和文物保管單位的專家們熱情招待，引導到現場作具體的指點和說明，並參觀了不少

遺址的出土文物，使我得益非淺。本書就是在這次實地調查的基礎上，參考已發表的考古資料，並結合文獻記載，作進一步探索的結果。

二 都城的起源

當然，都城是在國家機構產生以後出現的。但是它的出現不是突然的，有一個逐漸形成的過程。根據現有的考古資料，可以清楚看到，在國家產生以前的原始社會裏，氏族村落已逐漸採用濠溝或圍牆作為保護安全的措施，整個村落也已有一定的佈局。這就是城市的萌芽，也可以說是都城的起源。

1 仰韶文化時期的氏族制村落

距今約五、六千年前，新石器時代的仰韶文化時期，氏族村落的周圍已開始用濠溝作為防禦措施，村落已有合理的佈局，現在以陝西省西安半坡村遺址和臨潼姜寨遺址為例：

(1) 西安半坡遺址 遺址略呈橢圓形，居民點南靠河流，北邊有弧形的濠溝環繞，利用河流和所挖濠溝作防禦設施。在濠溝和河流之間，朝東和西北都有缺口用作通道，作為村落的門戶。濠溝的東北方為製造陶器的公共窯場，濠溝的北方是氏族墓地。溝外空地還分佈有各式的窖穴，是公共的倉庫。居民點中央是公共活動用的大房子，周圍環繞着小住宅（參看卷首圖二）。

(2) 臨潼姜寨遺址 氏族村落西南靠河流，北、東、南三面被濠溝環繞。濠溝正東有缺口，西北沿河也有缺口，留有通道，作為村落的門戶。西部臨河邊為製陶區，濠溝以東有氏族墓地。

村落中心為廣場，是氏族集體成員集會、娛樂的場所，周圍分為幾個部分，每部分有一座大房子和若干小住宅，門口都向着中心（參看圖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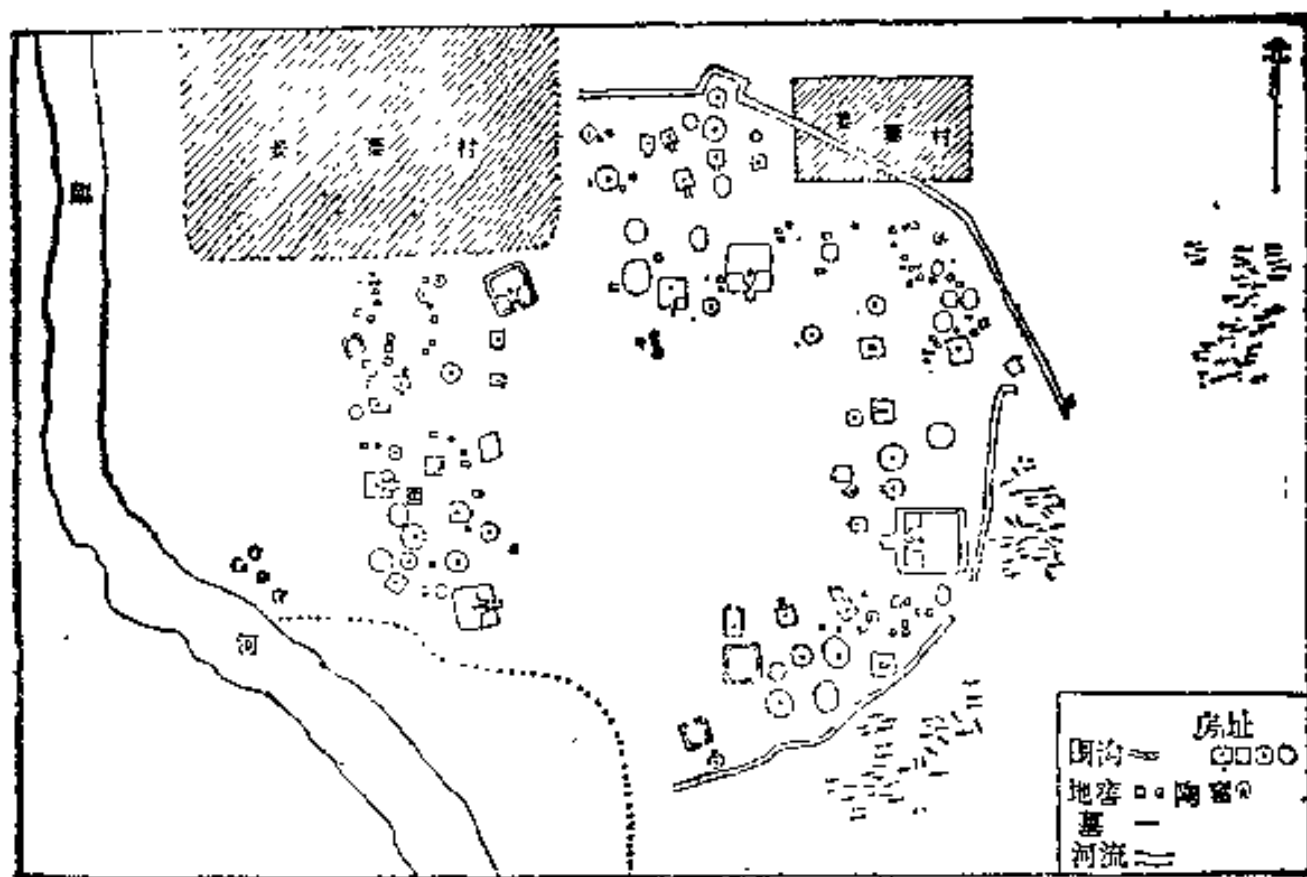


圖1 陝西省臨潼縣“姜寨遺址”氏族村落平面圖

（採自羣啓明《從考古資料看我國原始社會氏族聚落的平面佈局》，收入《人類學研究》，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 1984 年出版）

這種以大屋子或廣場為中心的居民點佈局，面向東方的向陽通道，南邊靠河流和北面挖濠溝的防禦措施，同時又以河流作為水源，並在周圍分設製陶區、窖穴以及氏族墓地的辦法，都是為了適應氏族集體生活和保護安全的需要。這種有計劃的佈局，就是後來城市的萌芽。

2 龍山文化時期的城堡

城牆是比濠溝進一步的防禦措施，它的出現要遲些。從現

有考古資料來看，至少在龍山文化的中晚期已有城堡的建築。比較重要的，有下列三處城堡遺址：

(1) 王城崗城堡遺址 在河南登封縣告成鎮西約1公里的王城崗，發現了東西相連的兩個城堡的遺址，1977年到1980年發掘。現東城只剩西南角部分，南牆殘存西段約30米，西牆殘存南段約65米，原來可能是正方形。西城緊靠東城的西側，南牆和西牆的基礎槽及夯土層尚保存於地下，南牆長82.4米，西牆長約92米，北牆殘存29米。在城堡以內，中部和西南部較高地帶，發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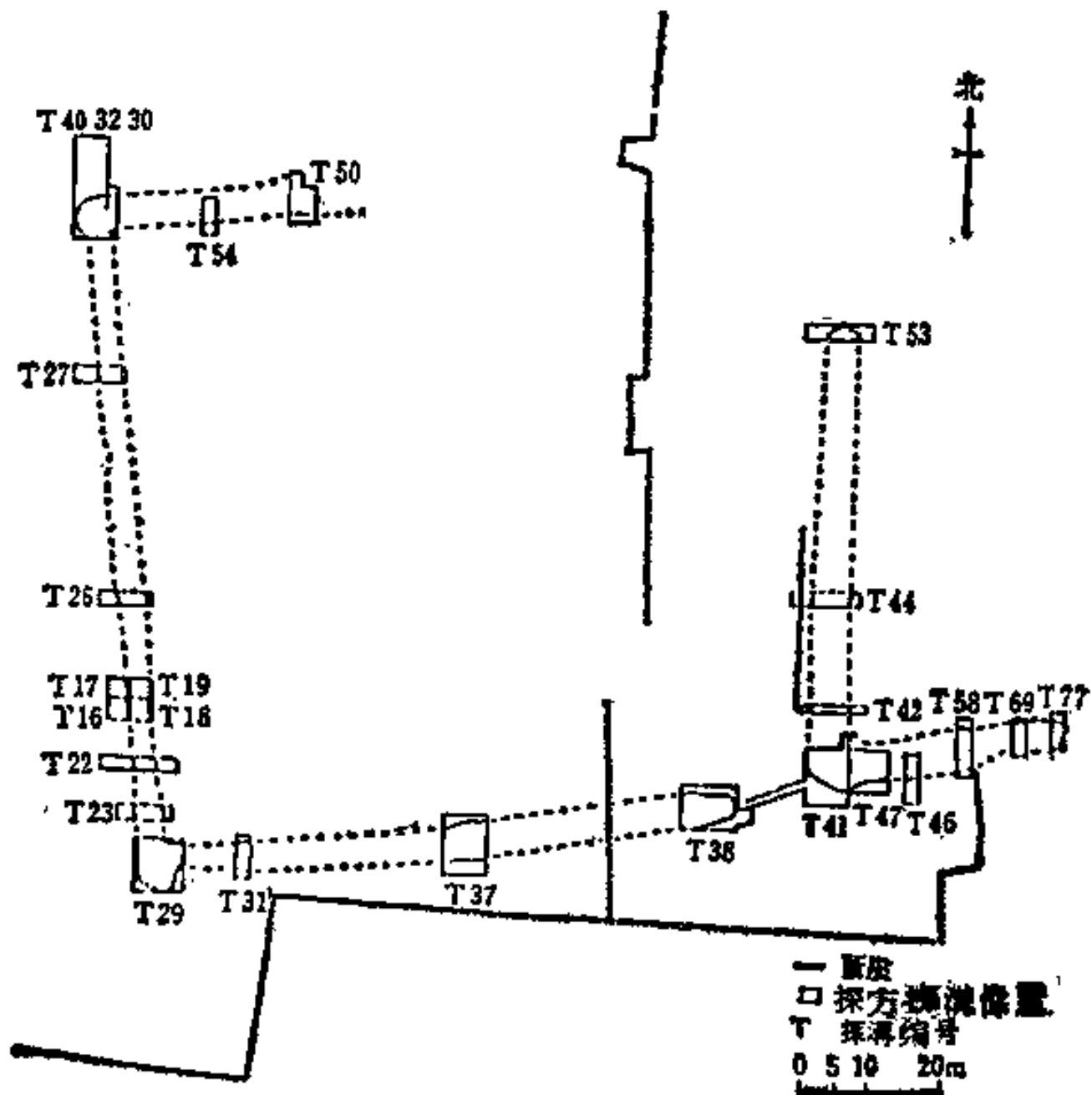


圖2 河南省登封縣“王城崗城堡”平面圖

(採自《登封王城崗遺址的發掘》，《文物》1983年第3期)

與城牆同時期的夯土遺存。有些夯築在圓形坑內，部分坑內的夯土層與夯土層之間，還填埋一些成年人和兒童的骨架，可能是建築的奠基坑。在王城崗第四期的灰坑內，出土了一件青銅容器殘片。城堡遺址的年代屬於龍山文化中晚期。以出土木炭的碳14測定年代，為距今 4000 ± 65 年，約當公元前2050年，相當於文獻記載上的夏代初期。地理位置與《古本竹書紀年》、《世本》所記載的“禹都陽城”相合，春秋戰國時代的陽城古城即在告成鎮的東寨外，相距很近。近人有推定為夏代初年都城的^①（參看圖2）。

(2)平糧臺城堡遺址 位於河南省淮陽縣東南4公里的大朱莊西南，稱為平糧臺或平糧冢，高出附近地面3—5米，1980年發掘。城址平面呈正方形，長寬各185米，城內面積34,000平方米，包括城牆及外側部分，面積達50,000多平方米。現存城牆下部寬約13米，頂部寬約8—10米，殘高3米。西南城角保存較好，外角略呈弧形。築城方法比較原始，先築成小型板築土牆，然後在其外側堆土夯實，逐層加高，再堆築出城牆上部，南北兩牆中心有城門和路面，南門兩側有相對的門房，門房面積都呈南北長方形，兩側門房的北部有相對的門口、門道。土路之下鋪有陶質排水管道，北端高於南端，便於向城外排水。城內東北部已發掘出成排的房基，部分房基底部築有夯土臺基，房基周圍有土坯牆和柱洞等遺存。平糧臺第三期灰坑中出土了銅鍊渣。這是具有豫東地區地方性特徵的龍山文化遺址。古城東南部出土木炭的碳14測定年代為距今 3960 ± 140 年，樹輪校正距今 4355 ± 175 年，時代比王城崗遺址略早而相差不遠^②（參看圖3）。

(3)城子崖遺址 位於山東省章丘縣龍山鎮，1930—1931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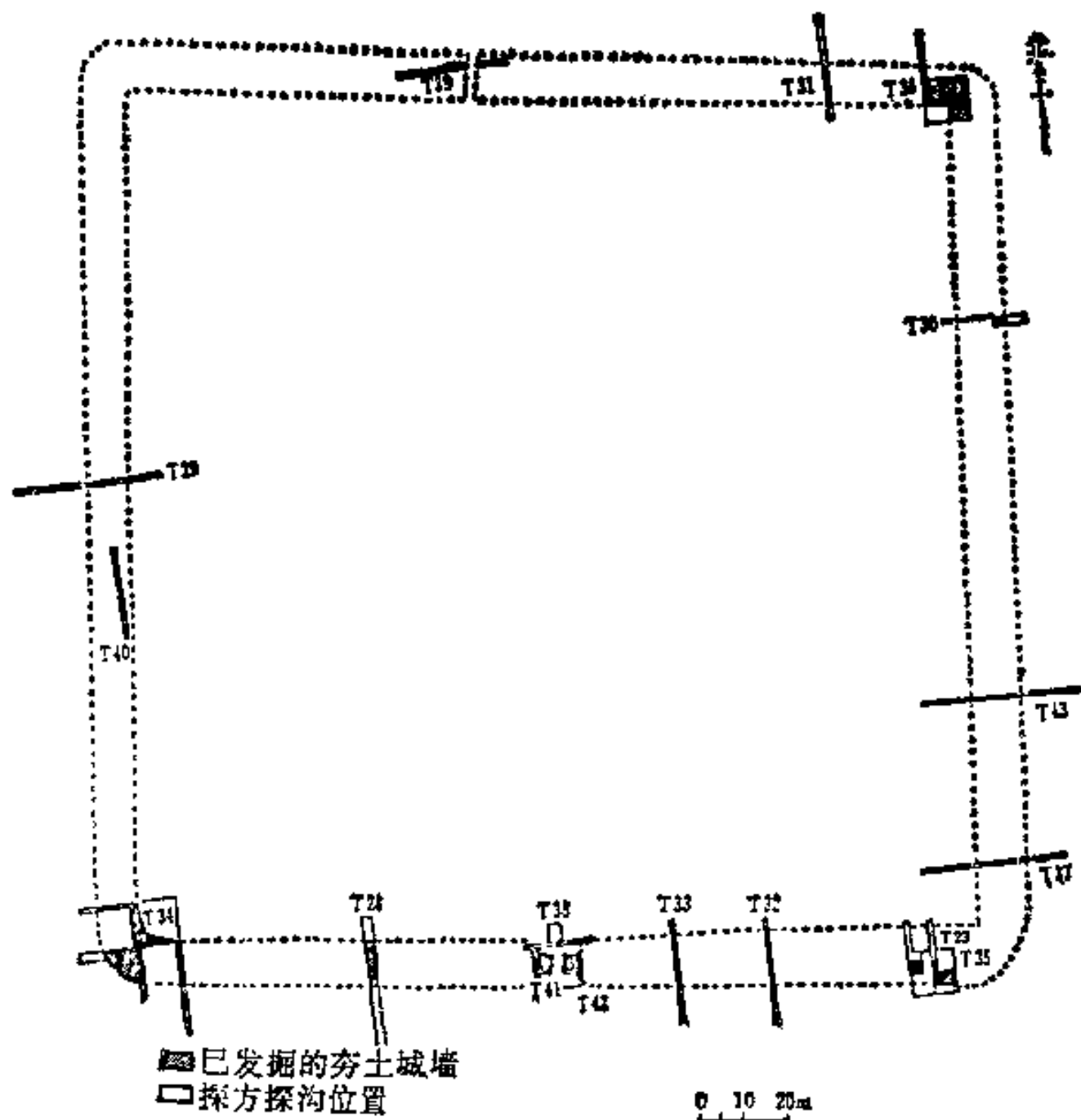


圖3 河南省淮陽縣“平糧臺城堡”平面圖

(採自《河南淮陽平糧臺龍山文化城址試掘簡報》，《文物》1983年第3期)

發掘。城址平面為正方向的南北長方形，南北約長450米，東西約寬390米。過去有人對此懷疑，認為這是屬於上層的東周文化層，不屬於下層的龍山文化層，從而斷定這是春秋時代譚國的城牆^③。現在由於王城崗、平糧臺兩處龍山文化中晚期城址的發現，可以推知城子崖也應是龍山文化時期的城堡。

上述這些城址的歷史年代，目前學術界正在進一步討論

中。其中有一種意見認為這些城址可能是原始社會末期的產物，原始社會末期已有城堡出現，不能根據小城堡和發現的青銅片作為已經建立國家機構的主要依據；同時王城崗的城堡的面積，比二里頭遺址一號宮殿還小（參見下文第三章追記），不大可能是禹都陽城④。

《禮記·禮運篇》記孔子說：

大道之行也，天下為公，……使老有所終，壯有所用，幼有所長，矜寡孤獨廢疾者皆有所養。……故外戶而不閉，是謂大同。今大道既隱，天下為家，各親其親，各子其子，貨力為己，大人世及以為禮，城郭溝池以為固，禮義以為紀，……以設制度，以立田里，以賢勇知，以功為己，故謀用是作，而兵由此起，……是謂小康。

這段話是符合歷史實際的。都城的建築“城郭溝池以為固”，是由於國家對外防禦和對內統治上的需要，必然有其政治上和軍事上的設施。目前我們還沒有確切的考古資料來說明早期都城的特點。

【追記：關於王城崗城堡的年代和性質，目前還有不同意見，見於《文物》1984年第2期和第11期。多數的意見，認為王城崗城堡不可能是夏代初年的都城。王城崗城堡的建造使用時期，相當於“王城崗第二期文化”，同期灰坑出土的木炭，經碳14的測定，年代距今 4405 ± 109 年，約當公元前 2455 ± 109 年。平糧臺城堡年代不晚於“平糧臺第三期文化”，經碳14測定，年代距今 4355 ± 175 年，約當公元前 2405 ± 175 年，較王城崗城堡略遲。碳14的測定，見於考古研究所實驗室《放射性碳素測定年代報告(七)》（《考古》1980年第4期）。兩者的年代，都比文獻上所說夏代要早。兩者比較起來，王城崗城堡的規模小，建築的技術水平低。王城崗西城的面積（約8,500平方米）只及平糧臺城堡面

積(約 34,000 平方米)的四分之一，前者城牆寬度(城牆基礎的槽寬 4.4 米)只及後者(城牆下部寬度 13 米)的五分之一。前者使用河卵石作夯具，後者使用四根木棍綁成的夯具，而且後者設施較前者進步，後者南北城牆中央設門，南門兩側有對稱的門房，門道土路之下有陶質水管道，這是目前發現的最早古城堡排水設施的資料。】

3 東下馮遺址的壕溝和城牆

溝池和城郭同樣是古代的防禦設施，但是從它的發展過程來看，溝池的起源較早，城牆的起源較遲，上面我們敘述的仰韶文化時期的村落和龍山文化時期的城堡，足以證明這一點。山西省夏縣埕掌東南青龍河兩岸臺地上的東下馮遺址，也可以說明這一點。

東下馮遺址，有上下二層文化遺存，上層是商代前期文化遺存，下層是二里頭文化遺存。東下馮類型遺存有壕溝二圈，呈“回”字形，平面呈上寬下窄的倒梯形，裏溝每邊長寬約 130 米，外溝每邊長寬約 150 米，平行的裏外兩溝的間距為 5.5—12.3 米。溝的縱剖面上寬下窄，裏溝口寬 5—6 米，外溝口寬 2.8—4 米，底寬均為 2—3 米。現存溝口到溝底深 3 米左右(參看圖 4)。居住址都是窰洞式的，窰洞掏挖在斷崖或溝壁的旁邊。出土遺物除石器、骨器、陶器以外，還有銅鏃、銅鑿等。

商代前期遺存有城堡，已全部埋在地下，探明的有南牆和西牆一部分。南牆中段有曲折，總長約 400 米。東下馮類型的倒梯形壕溝，正好包括在這座城堡的西南部。西牆的南段正包在壕溝的西邊，與壕溝平行。南牆的西段正包在壕溝的南邊，中段曲折處，壓在壕溝的南角上。建築基址都是圓形的臺基，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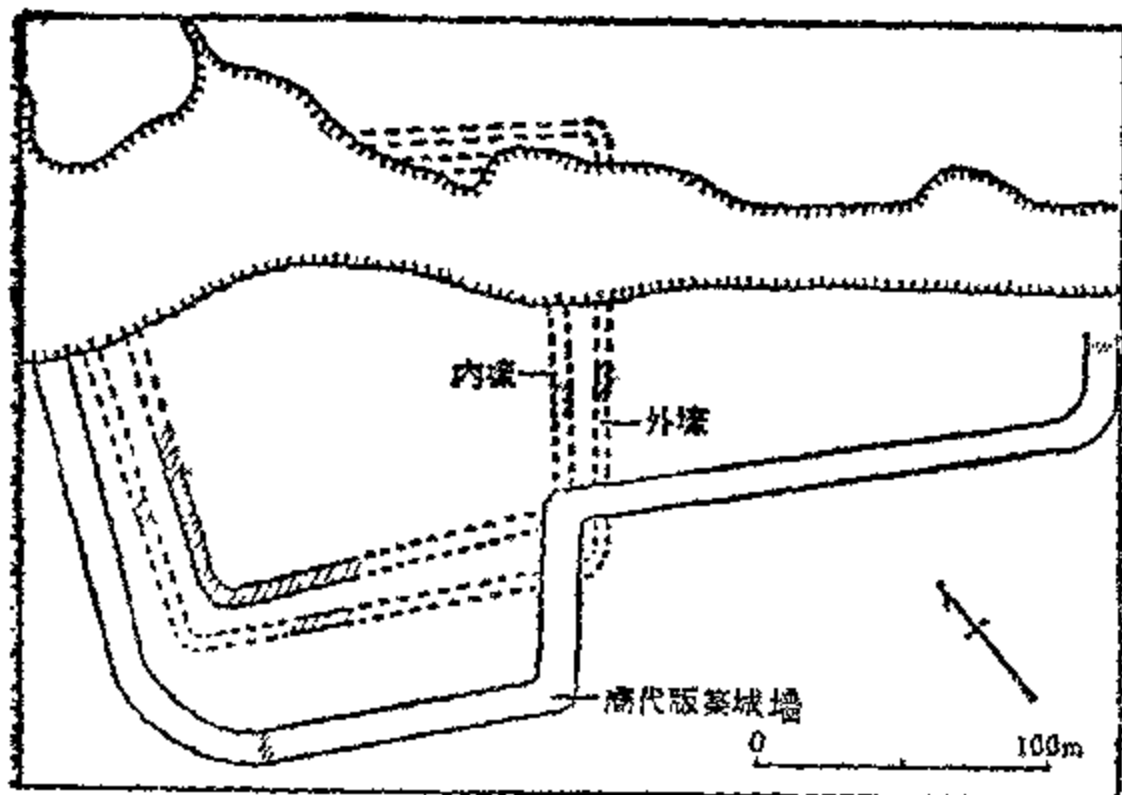


圖4 山西省夏縣“東下馮遺址”中區濠溝和城牆

(採自《山西夏縣東下馮遺址東區中區發掘簡報》，《考古》1980年第2期)

出當時地面 30—50 釐米，直徑一般為 8.5—10 米，臺基中心有大柱洞，周圍有二、三十個小柱洞。建築羣的排列，前後有序，左右成行，間隔均為 5 米，十分規整，顯然經過規劃^①。

從東下馮遺址來看，在今山西南部地區，二里頭文化時期還只有濠溝作為防禦設施，到商代早期才建築城堡。

總的看來，用濠溝或城堡作為居民點的防禦設施，在防禦設施的範圍內有一定的佈局規劃，是經過原始社會後期幾千年的歷史才逐漸形成的。在仰韶文化時期，氏族村落挖掘環繞的濠溝，只是為了防備猛獸的突然襲擊。到龍山文化時期，開始用城牆作為防禦工程，則可能因為當時部落之間已發生彼此掠奪的戰爭，為了防備其他部落的突然襲擊。等到國家機構形成，彼此間發生戰爭，城堡的建築就有進一步的發展。把城牆和濠

溝結合起來作為城市的防禦工事，出現的時代可能較遲。目前已發掘的商代都城遺址有三種情況，有的只有濠溝，有的只有城牆，有的城牆和濠溝結合起來。至少到商代中期已有城牆和濠溝結合起來的城堡了。

- ① 河南省文物研究所、中國歷史博物館考古部：《登封王城崗遺址的發掘》，《文物》1983年第3期。
- ② 河南省文物研究所、周口地區文化局文物科：《河南淮陽平糧臺龍山文化城址試掘簡報》，《文物》1983年第3期。
- ③ 李濟：《城子崖》，1934年。董作賓《譚譚》，《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第4本第2分，1933年。
- ④ 參看《中原文物》1983年第2期的簡訊：《中國考古學會在鄭州舉行第四次年會探討夏商文化和青銅文化》。
- ⑤ 東下馮考古隊：《山西夏縣東下馮遺址東區中區發掘簡報》，《考古》1980年第2期。

三 以東北為“重心”的商代都城佈局

已發掘的商代都城的城址，有商代前期的鄭州商城；有比鄭州商城稍晚的湖北省黃陂縣的盤龍城（當時商代南方的一個諸侯的國都）；還有商代後期的安陽殷墟。值得注意的是，它們已有基本上相同的佈局結構，主要有下列五點：

第一，商代都城，或者有城牆作為防禦設施，或者有濠溝結合河流作為防禦設施，或者以城牆和濠溝相結合作為防禦設施。

河南鄭州於1955年發現商代城址，建築城牆的年代相當於

商代前期的二里岡期下層文化，約公元前十五世紀中葉前後（碳14測定為公元前1620年，見《新中國的考古發現和研究》220頁）。城牆近於方形，只是北牆中心向北突出。整個城由東北而略為偏向西南。東牆、南牆長各1,700米，西牆長1,870米，北牆長1,690米，周圍共約6,960米，近7公里，全部城牆全用夯土分段版築而成。城牆橫斷面呈梯形，平均底寬約20米，頂寬約5米，高約10米^①（參看圖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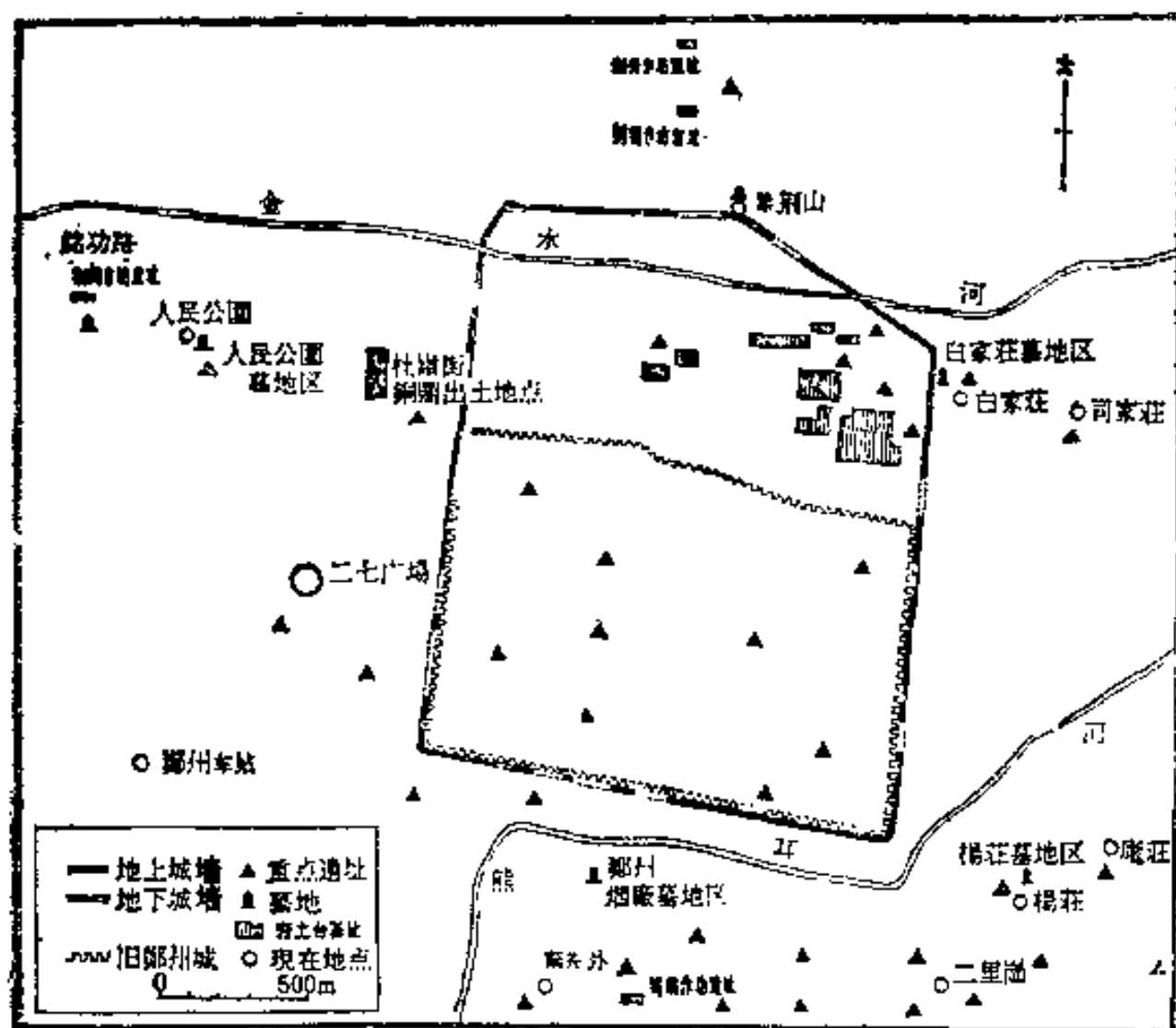


圖5 河南省鄭州商代城址

（採自《鄭州商城遺址發掘報告》，《文物資料叢刊》第一輯，文物出版社1977年出版）

盤龍城在湖北省黃陂縣盤龍湖濱的丘陵地帶，在武漢市北

約 5 公里，每逢漲水季節古城三面環水，枯水季節西岸湖底及其南方，發現有商代文化層和墓葬，可知當時地貌與今大不相同，原來整個城是陸地而相連的。古城平面近方形，南北長 290 米，東面寬 260 米，整個城也是由東北而略為偏西南。地勢東北較高而西南低窪。據當地老人說，幾十年前城牆高聳地上，每面中間有城門。從東南城角外斷面，還可以看到城牆外有寬約 10 米的城濠。城牆總長度和城內總面積，都不過鄭州商城的二十五分之一。築城年代相當於二里岡期上層文化，比鄭州商城略遲^②（參看圖 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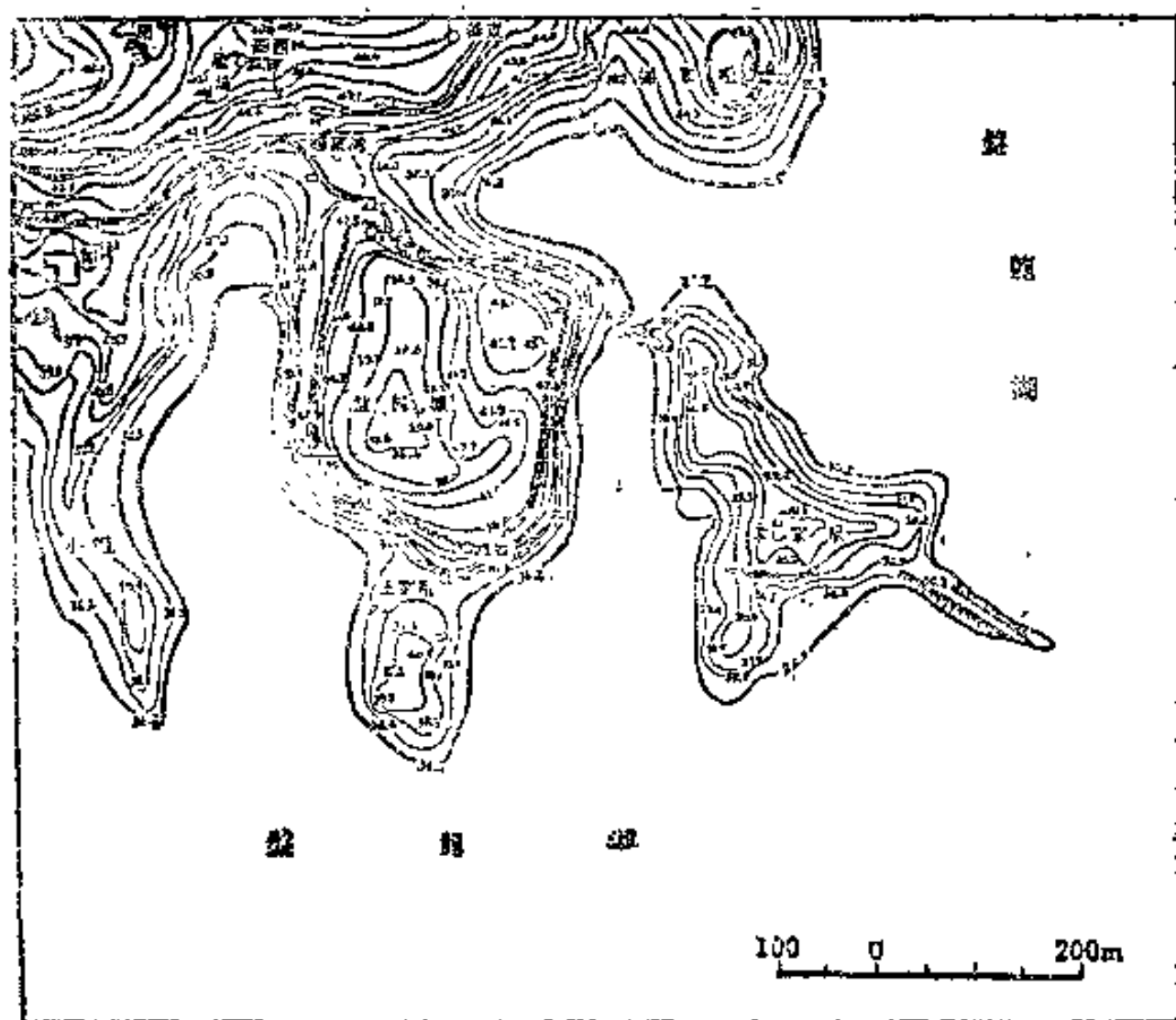


圖 6 湖北省黃陂縣盤龍城遺址

（採自《盤龍城一九七四年田野考古紀要》，《文物》1976年第 2 期）

河南省安陽市西北的殷墟，是商代盤庚以後的都城，總面積在24平方公里以上。新中國成立以來，考古工作者在這裏作了廣泛的發掘和調查，但是至今沒有發現城牆遺跡。宮殿區在今小屯村以北地方，正當洹水從西北向東南流的一個突出的河灣內（參看圖11）。根據考古調查，洹水從來沒有遷移過的跡象。在今小屯村中心以西約200米處，有一條巨大的商代濠溝，已探查750米一段，寬7—21米，深5—10米，這條濠溝從王宮區西南蜿蜒而向東北，填滿灰土，據推測，它可能與西北曲折向東奔流的洹水配合，成爲王宮周圍的防禦設施③。

第二，商代都城都已有一定的佈局，作爲政治中心的宮殿區都設在城內東北部，全城以東北部爲重心。

鄭州商城東北部發現二里岡期的夯土臺基數十處。整個範圍東西寬750米，南北長500米。臺基面積，小的100多平方米，大的2000多平方米，已發掘的宮殿基址有二處。一處在東里路以北，紫荊路以西，建築方法是先挖成長方形的基槽，然後在其中填土，夯築成臺基，在上面挖成長方形柱礎槽二排，現在北面一排存二十七個，南面一排存東部十個④（參看圖7、圖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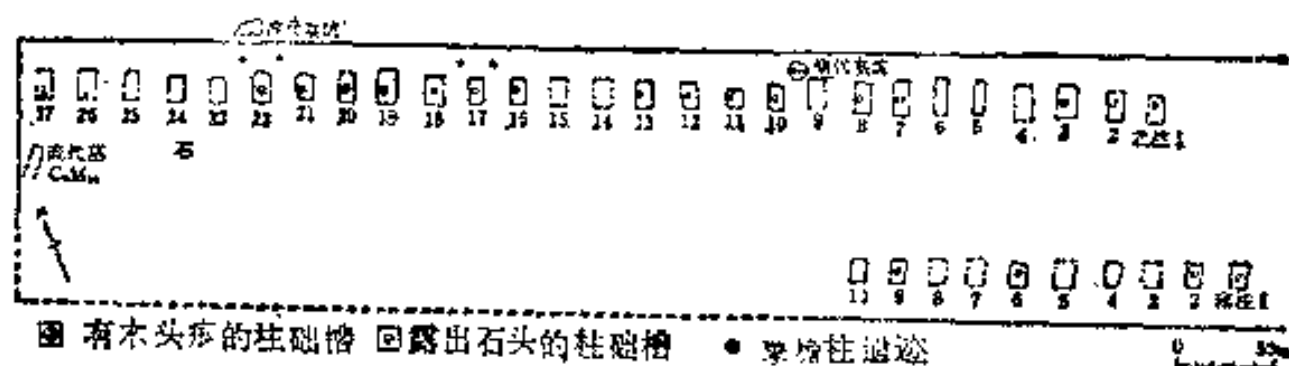


圖7 鄭州商代城址宮殿基址

（採自河南省文物研究所《鄭州商代城內宮殿遺址區第一次發掘報告》，
《文物》1983年第4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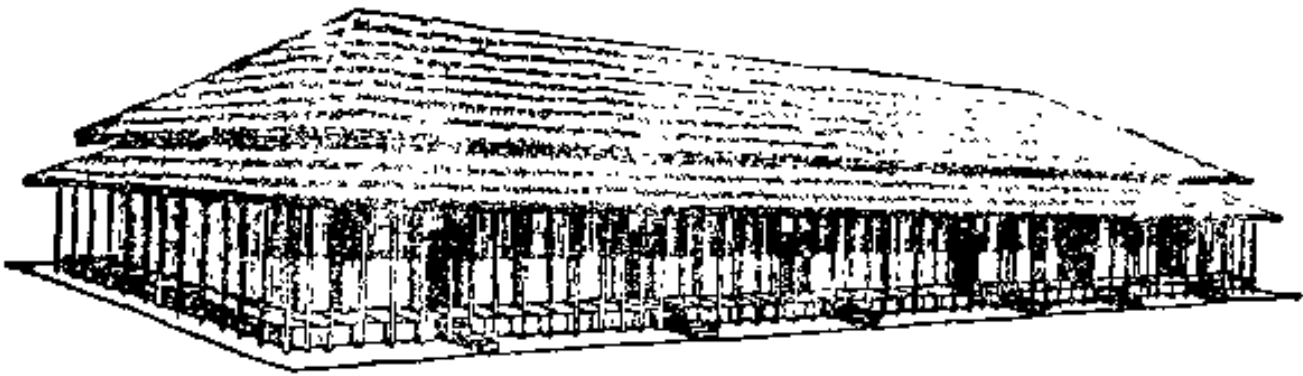


圖8 鄭州商代城址宮殿復原圖

(採自河南省文物研究所《鄭州商代城內宮殿遺址區第一次發掘報告》，
《文物》1983年第4期)

盤龍城東北角高臺(人爲的建築)上有密集的大型建築羣，建築方法是先往地下挖坑，再築起臺基，然後在上面立柱建屋。已發現宮殿基址三座，前後平行，方向同城牆一致。後面一座，外有回廊，四周有臺階，平列有四室，中間二室較大，前後有門，左右二室較小，只是前面有門(參看圖9、圖10)，可能是寢宮性質的建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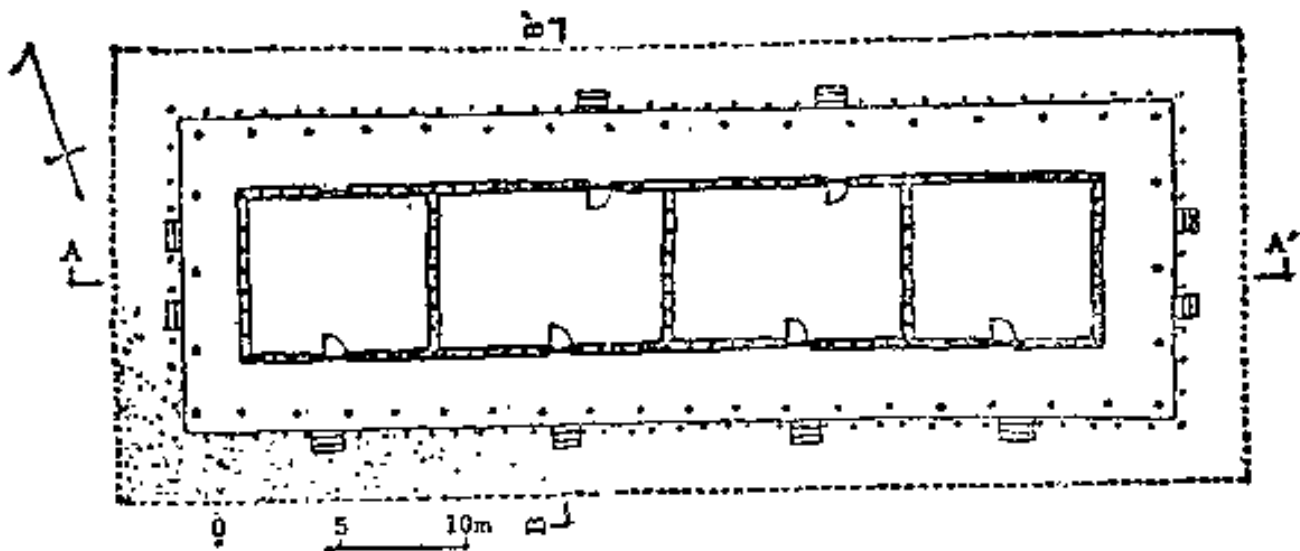


圖9 盤龍城商代宮殿基址

(採自楊鴻勳《從盤龍城商代宮殿遺址談中國宮廷建築發展的幾個問題》，《文物》1976年第2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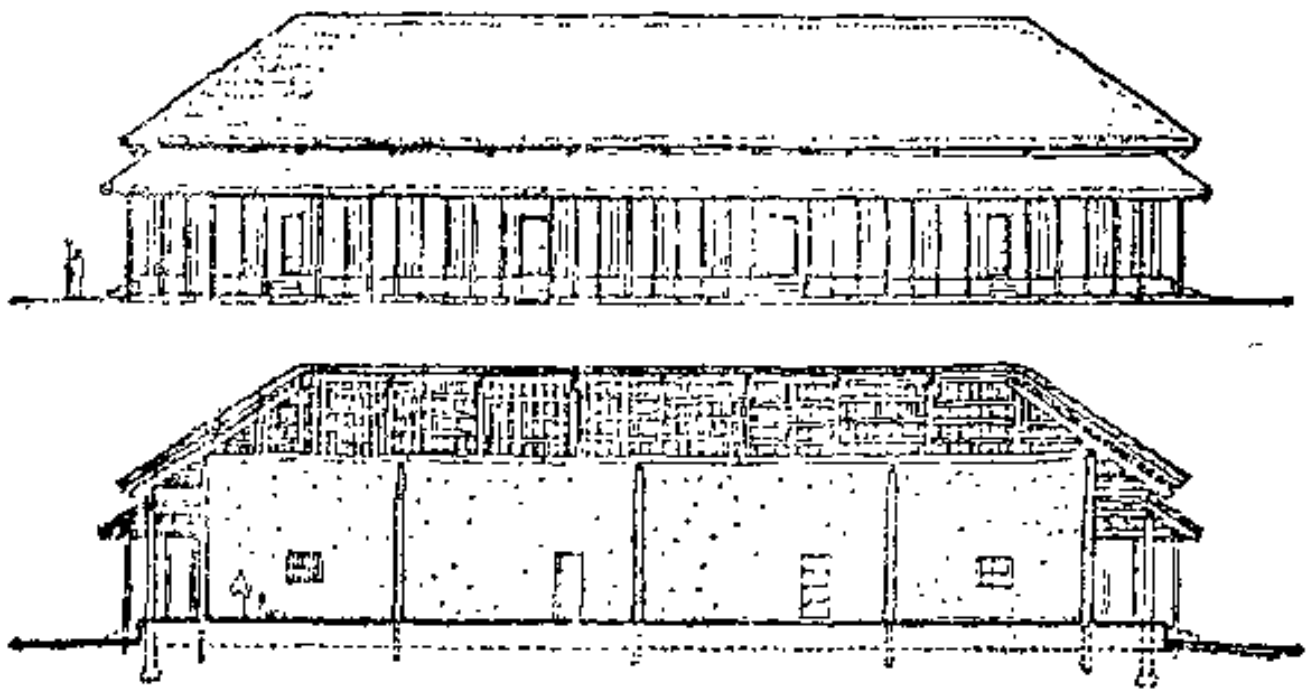


圖10 盤龍城商代宮殿復原圖

(採自楊鴻勛《從盤龍城商代宮殿遺址談中國宮廷建築發展的幾個問題》，《文物》1976年第2期)

殷墟雖然沒有城牆，宮殿區只有以洹水和濠溝相結合的防禦設施，但是從整個遺址的佈局來看，宮殿區正處於東北部。建築基址已發掘 56 處，形狀不一，有長方形、正方形、凸形、凹形、條形等。其中最大基址南北長 85 米，東西寬 14.5 米，相當於盤龍城已發現宮殿的兩倍多。

第二，墓葬區分佈在四周外圍地帶。

鄭州商城外四周都有墓葬區，城東北的白家莊，東南角的楊莊，南面鄭州烟廠，西面人民公園都發現有墓葬。盤龍城外，東、西、北三面都有墓葬區。殷墟宮殿區西北，洹河北岸的武官村、侯家莊、西北崗之間有王陵區和貴族墓地以及排葬坑。宮殿區東北，洹河東北大司空村有墓葬區。宮殿區西南後崗有貴族墓葬區(參看圖11)。

第四，手工業作坊也分佈在外圍地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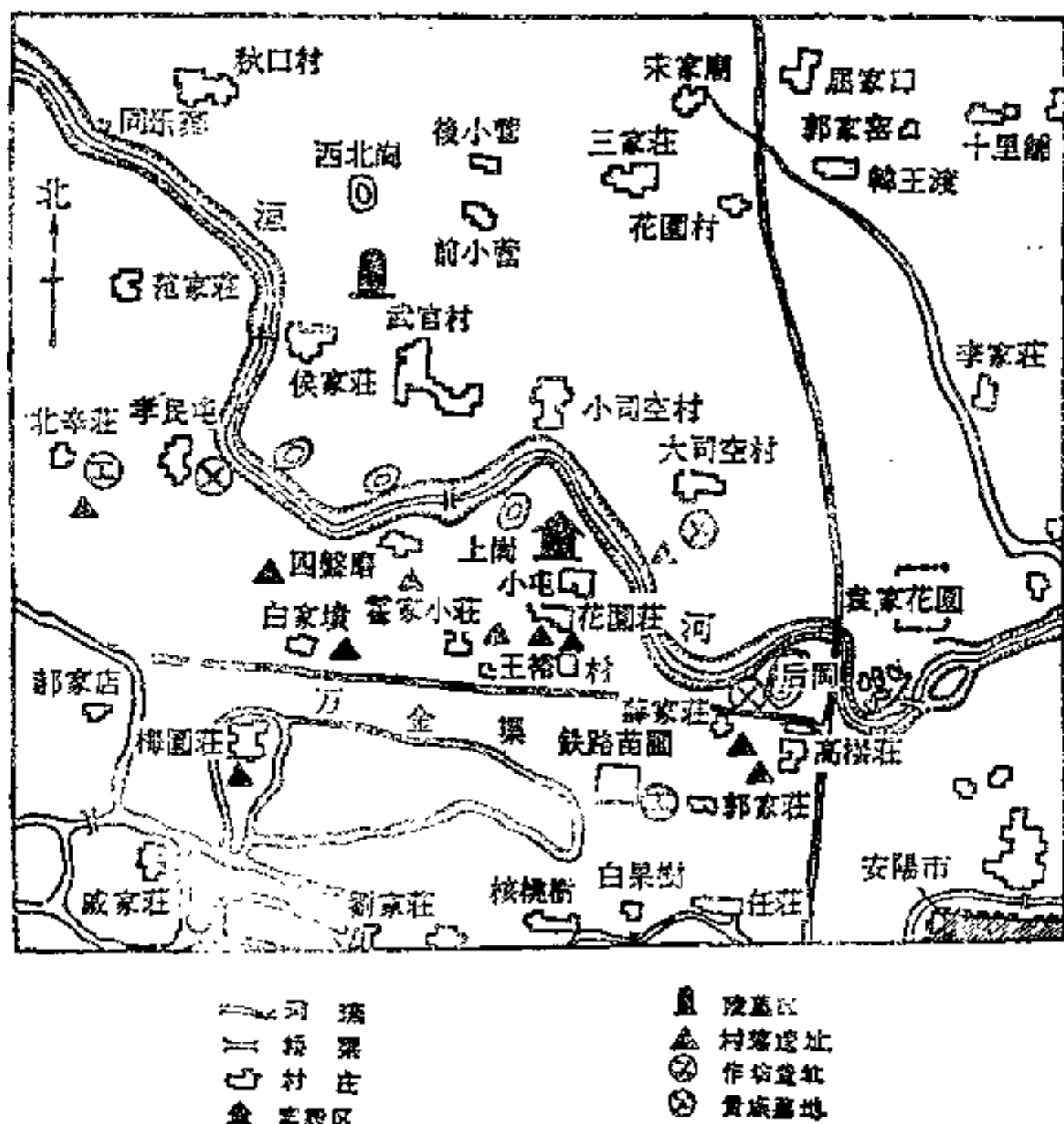


圖11 殷墟主要遺跡分佈圖

(採自《商周考古》第63頁圖41,文物出版社1979年出版)

鄭州商城北牆中段以北 200 米處有冶銅作坊，鑄造銅刀、銅鏃等兵器，兼作容器。再向北 200 米處有製骨作坊(參看卷首圖三)。南牆中段以南 500 米處有冶銅作坊，鑄造(大型)銅鑊等生產工具，兼作容器。西牆北段以西 1,300 米處有製陶作坊，殷墟宮殿區雖有冶銅、製骨等作坊，都是小型的。主要作坊還是分佈在宮殿區以外的周圍地帶，南向 1 公里鐵路苗圃和西向 2 公

里孝民屯都有冶銅作坊，西向 3 公里北辛莊和東北的大司空村都有製骨作坊。從殷墟出土大量玉石、海貝、大龜甲以及鯨魚骨、海蚌等物來看，也還有為貴族服務的商業存在。

第五，居民點分佈於四周外圍的農業、手工業地區。

鄭州商城外圍的紫荊山、白家莊、銘功路以及鄭州市北部任砦等地，曾發現中小房基 13 座，當是一般貴族所居住。西郊銘功路西側製陶作坊附近，發現有 14 座小型房基，半地穴式，面積在 10 平方米以下，小的只 4—5 平方米，很是簡陋，可能是製陶工奴的住所。殷墟宮殿區周圍居民點和作坊附近居民點，也發現不少小型房屋，有的建在地面上，可能是一般貧民住所；還有不少是半地穴式的，形狀不一，小的直徑 2 米左右，大的直徑 7 米以上，該是貧民和奴隸的住所。

上述鄭州商城、安陽殷墟和盤龍城，儘管時間有先後，有的相距很遠，但是城牆的構築，宮殿的格局，墓葬的習俗，都有很多相似之處，而且整個佈局有其共同的特點，即都是以東北為重心的。特別是鄭州商城和盤龍城的城牆都從東北而略為偏向西南，宮殿建築都從西北而偏向東南，說明當時商代疆域內，從中央到地方，建設都城已有統一的格局，可能已有規定的禮制了。

【追記：位於河南偃師西南的二里頭的早商遺址，中部發現宮殿建築的夯土臺基，臺基中部偏北地方有殿堂基座的遺址。從排列的柱穴來看，是一座面闊八間、進深三間的大型木結構建築。這是目前發現的時代最早的宮殿遺址。殿堂正南約 70 米處，沿夯土臺基南部邊沿的中部有大門建築遺址，沿夯土臺基周圍還發現有廊廡式的建築遺跡。整個宮殿由殿堂、庭、門、廡等組成。從出土遺物來看，遺址內有鑄銅、製骨、製陶等手工業

作坊。但是整個佈局還不清楚，還不能作進一步的探討。

1983年春，河南偃師的西南，洛河北岸的高地上，發現了商代早期的城址（以下參看圖12）。城址略作長方形，南北長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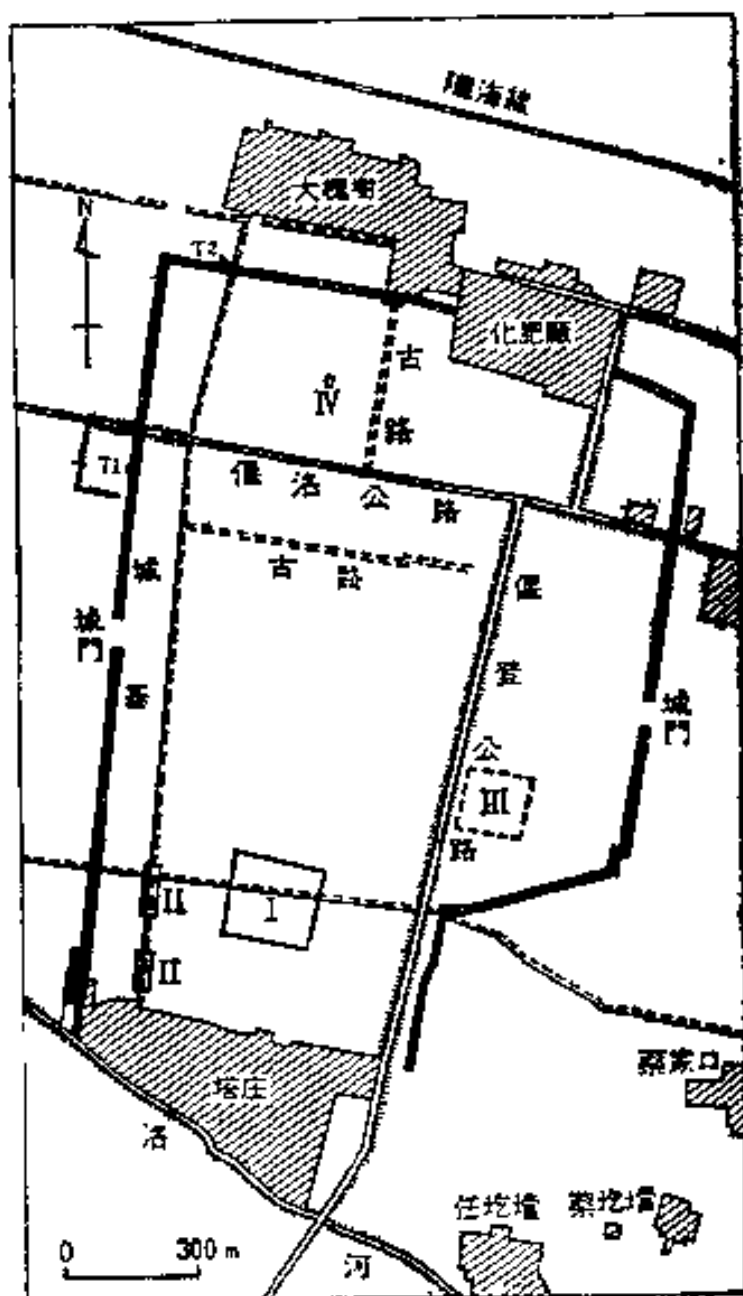


圖 12 河南省偃師商城遺址

（採自《偃師商城的初步勘探和發掘》，《考古》1984年第6期）

約1,700米，東西寬度因東城牆的南部向內彎曲收縮，北部寬1,120米，南部寬740米。面積約190萬平方米。北城牆中央有城門遺址，東西城牆各有三座城門遺址。已發掘的西城牆中間的一座城門遺址，門道寬2.3到2.4米，長16.5米，與城牆的厚度

相等。城門內側向南4米處，有東西向的“馬道”，從城牆通向城內東西向的大道，約長30米，西高東低，逐漸成斜坡狀，上寬3米，下寬4米，車馬可以從城內大道，經過“馬道”登上城牆。與“馬道”相連的城內大道，約寬8米。城內已發現四處大型建築遺址，其中三處分佈於城區南部，1號建築遺址最大，正位於城區南部中央，圍牆近方形，東西寬190到200米，南北長180到185米，牆寬3米左右。這個1號建築遺址，已發掘東部一組宮殿建築。這組建築，以居北的正殿為主體，中間有庭院，東、西、南三面有廡。正殿東西寬36.5米，南北長11.8米，南邊有四個長方形的三級臺階。庭院東西寬40米，南北長14米，北高南低，傾斜度十分明顯。南廡中部有門道。考古工作者推測，這個建築遺址可能是宮城性質。如果此說確實，這個早期商代都城是以南部為重心的，與以後商代都城以東北為重心的佈局不同。

根據出土遺物，其年代相當於商文化的二里崗期，廢棄年代約當於二里崗期的上層，或更遲一些時期。這是目前考古調查中發現的最早的具有規模的古城址。發掘簡報有《偃師商城的初步勘探和發掘》（《考古》1984年第6期）、《1983年秋季河南偃師商城發掘簡報》（《考古》1984年第10期）和《1984年春偃師尸鄉溝商城宮殿遺址發掘簡報》（《考古》1985年第4期）等。簡報根據文獻記載，商湯建都的西亳在漢代偃師的尸鄉（《漢書·地理志》河南偃師縣下注：“尸鄉，殷湯所都”），而古城址中部正有一條稱為尸鄉的長溝橫穿而過，推定此城即是西亳。目前正在進一步進行考古發掘中，整個佈局還不清楚。】

① 河南省博物館、鄭州市博物館《鄭州商代城遺址發掘報告》，《文物資料叢刊》（1），1977年12月出版。

② 湖北省博物館、北京大學考古專業盤龍城發掘隊《盤龍城一九七

四年度田野考古紀要》，《文物》1976年第2期。

- ③ 參見中國科學院考古研究所安陽發掘隊《1958—1959年殷墟發掘簡報》，《考古》1961年第2期。把濠溝看作王宮的防禦設施只是一種推測。這條濠溝到殷墟第二期已經廢棄，溝內填滿灰土，包含着商代晚期遺物，而且靠近洹河南岸已變成大面積的淤土，沿着灰溝東岸探出有用碎陶和礫石鋪成的一條道路，長約50米，寬2.3—5.2米。究竟這條大溝主要用於防禦或者用於排水，由於目前尚未全面了解，難於作出最後結論。
- ④ 河南省文物研究所《鄭州商代城內宮殿遺址區第一次發掘報告》，《文物》1983年第4期。

四 商代“大邑商”及其別都的制度

1 “大邑商”的所在及其範圍

殷墟卜辭中，有地名稱“商”，“中商”、“大邑商”的。卜辭中“中商”的地名見得次數很少，辭意簡單，究在何地，很難判斷。“商”的地名見的次數很多，其中占卜“王其入於商”的最多，該即指商的國都（即今殷墟）而言。但是，卜辭中的“商”，並不全指一個地點，有的很明顯是指商丘。例如說：“〔王卜才〕商，貞〔步〕於亳，亡災？”（《殷虛書契後編》卷上第九頁第十二片）。亳在今山東曹縣南①，這個與亳相近的商，當即商丘無疑。卜辭中有的“商”，可能是大邑商的簡稱，即是指王畿而言。

卜辭中多次提到“大邑商”，有的占卜“王其入大邑商”的事（《殷虛書契續編》卷三第四頁第一片），有的占卜王“才（在）大邑商”的事（《殷虛書契後編》卷上第十八頁第二片），有的占卜“告於大邑商”的事（《卜辭通纂》第五九二片）。也有作“天邑商”的，如稱“天邑商公宮”（《甲骨綴合編》第一八二片、第一八三片）。

羅振玉、王國維把“大邑商”解釋為王畿，是正確的。何尊銘文載：“王誥宗小子於京室曰：……惟武(武)王既克大邑商，則廷告於天曰：余其宅茲中或(國)，自之辟民”。成王所說武王攻克的大邑商，分明是指整個商的王畿。根據《逸周書·度邑篇》，武王克商之後，通宵睡不着覺，因為沒有“定天保，依天室”，主張創建新都於伊納、洛納(伊納指伊水入洛處，洛納指洛水入河處)之間。即何尊銘文所說“余其宅茲中國”。“中國”是指以洛陽為中心的中原地區的意思。《尚書·多士》記周公告誡殷貴族說：“今爾又曰：夏迪簡在王庭，有服在百僚。予一人惟聽用德，肆予敢求爾於天邑商？”這是說：“現在你們(指殷貴族)又說：殷曾選拔夏的遺臣留在王庭，在許多官署裏擔任職位。我只准使用有德的人，怎麼敢取用整個商代王畿的人呢？”“天邑商”也是指整個商的王畿。

商代王畿的範圍是比較廣闊的。《戰國策·魏策一》記載吳起(兵法家，公元前440—前381年)說：“殷紂之國，左孟門，右漳、釜，前帶河，後被山，有此險也，然為政不善，而武王伐之。”孟門是在今河南省輝縣以西太行山的一個重要關塞。這是說殷紂之國左有太行山，右有漳水、滏水，前面有黃河，後面有山嶺，都是天險。所說殷紂之國，就是指商的王畿，就是說商的王畿四面有這樣天險，並不是說王畿的範圍只有這麼大。《古本竹書紀年》(《史記·殷本紀》正義引)說：“自盤庚遷殷，……更不徙都。紂時稍大其邑，南距朝歌，北緣邯鄲及沙丘，皆為離宮別館。”所說“稍大其邑”的“邑”，就是指大邑商這個“大邑”，也就是指整個王畿。所講到的朝歌、邯鄲、沙丘等地，只是指建有離宮別館的城邑，並不是說王畿的範圍只限於這三個地點。但是，我們已經可以從《古本竹書紀年》以及《戰國策》所載吳起的話中看到，

大邑商的範圍是廣大的，在這個範圍內，包括有許多天險如太行山、黃河、漳水之類，還包括建有離宮別館的城邑如朝歌、邯鄲、沙丘之類。

商代後期所以選定安陽殷墟處作國都，利用天險，確是一個重要的原因。因為它的東面和南面正好有黃河，西面正好有太行山，所謂“前帶河，後被山”。但是作為王畿，決不限於黃河和太行山，肯定沿着黃河以東，以南和太行山以西還有不少重要的據點。否則這些天險就不容易防守。例如沙丘在今河北省巨鹿縣東南，就在古黃河的河道以東。

當時王畿的北境，至少在今河北省邢臺和巨鹿一帶。祖乙遷都的邢，當即在今邢臺市，今邢臺市西南發現有大範圍的早商文化遺址^②。

王畿的南境，應該越過黃河，至少包括今洛陽到鄭州一帶。這從武王進軍牧野（今河南淇縣西南，參看本章第三節）的路綫以及征服黃河以南地區的過程中，可以看得很清楚。武王進軍牧野是從盟津（今河南孟津東北）渡河的，渡河之前必然先佔有盟津附近的黃河南岸重鎮，作為進軍的後方基地。否則大軍是不可能大規模在盟津一帶橫渡黃河的。等到牧野之戰取得決定性勝利，取得滅亡商朝的戰果，武王就指揮大軍分路南下。這就是《大武》樂章所描寫的：“始而北出，再成而滅商，三成而南，四成而南國是疆。”（《禮記·樂記》）根據《逸周書·世俘篇》，當時武王命令大軍分為七路，除一路由呂望追擊殷將方來以外，其餘六路進軍目標是南國諸侯，由呂他伐越戲方（今河南鞏縣東南）^③，侯來伐殷將靡集於陳（今河南淮陽），百弇伐衛（即豕韋，今河南滑縣南）^④，陳本伐歷（即歷或櫟，今河南禹縣）^⑤，百韋伐宣方（不詳），新荒伐蜀（即蜀澤，今新鄭西南，禹縣東北）等等^⑥。

而黃河兩岸的重鎮洛邑(今河南洛陽)和管邑(今河南鄭州),沒有成爲進軍的目標。洛邑和管邑一帶該屬於商的王畿,商代並沒有在那裏分封諸侯,這時早已被武王所佔領。

洛邑和管邑在政治上和軍事上的重要性,武王是早就認識到的。所以他克商以後,就主張在洛邑建設東都,曾多次到管邑坐鎮,並把管邑分封給管叔而作爲監督原來商代王畿的“三監”之一。

2 從“商郊牧野”看“大邑商”的“郊”“野”制度

《尚書·牧誓》說：

時甲子昧爽,王朝(早)至於商郊牧野,乃誓。

商代把整個王畿看作一個“大邑”,稱爲“大邑商”,除了中央的國都以外,周圍廣大地區,包括許多城邑在內,稱爲“郊”。就每個邑來說,城邑以外的周圍地區,稱爲“野”。當武王率領大軍進抵牧野的時候,因爲牧野是商郊的一部分,所以連稱爲“商郊牧野”。古書上往往把牧野稱作商郊,例如《呂氏春秋·貴因篇》記載武王進軍牧野前,路上遇見殷的使者膠鬲,告知膠鬲說:“將以甲子至殷郊”,後來“武王果以甲子至殷郊,殷已先陳矣”。這裏所說的殷郊就是指牧野。《尚書大傳》(《禮記·祭統》正義所引)也說:“武王伐紂,至於商郊,停止宿夜。”可知牧野即在商郊的範圍內,可以通稱“商郊”。《尚書·牧誓》記載武王誓師,最後說:

尚桓桓,如虎如貔,如熊如羆,於商郊。非禦克奔,以役西土。勗哉夫子!爾所不勗,其於爾躬有戮。

“於”是“往”的意思。這是武王號召所統率的大軍威武勇猛地衝往商郊,準備決戰。商郊就是指包括牧野在內商代都城的“郊”區。商郊是個地區名稱,是指商代國都以外、王畿以內的

廣大“郊”區，包括許多城邑在內。

牧野也是個地區名稱，是指牧邑周圍的野外地區。《詩·魯頌·閟宮》說：“至於文武（文王、武王），纘大王（古公亶父）之緒，致天之屆（屆是罰的意思），於牧之野。”這裏稱牧野為“於牧之野”（《墨子·明鬼下》、《荀子·儒效》都作“牧之野”）可知牧野是指牧邑周圍稱為“野”的地區。古代都城有“國”“野”對立的鄉遂制度，“國”是指城邑及其四郊地區，“野”指四郊以外的廣大地區。《詩·大雅·大明》說：“牧野洋洋，檀車煌煌。”《毛傳》：“洋洋，廣也。”正因為牧野是野外廣大地區，是個很合適於決戰的戰場。《大明》正義引鄭玄說：“牧野，紂南郊地名。”確切地說，牧野是屬於商代王畿南郊的一個地區名。

附帶需要說明一下，今本《爾雅·釋地》說：“邑外謂之郊，郊外謂之牧，牧外謂之野。”有人根據“牧外謂之野”來解釋“牧野”是錯誤的。古書上都說“郊外謂之野”，今本《爾雅》有誤，當作“郊外謂之野，野外謂之牧”^①。《爾雅》所說“邑外謂之郊，郊外謂之野”，是指“國”“野”對立的鄉遂制度，以“郊”為分界綫，郊以內是指城邑及四郊，郊以外是野^②。這裏所說的“郊”，和商代稱王畿的周圍廣大地區為“郊”不同。《逸周書·作雒篇》記載周公東征勝利後，“乃作大邑成周於土中”，同時“制郊甸方六百里，因西土為方千里”。這樣把東都成周以外的“方六百里”地區稱為“郊甸”，是沿用了商代王畿的制度。西周時代在東西兩都的周圍建置“王畿千里”，就是在商代王畿制度的基礎上作了進一步的發展。

3 牧即沫，是商代晚期的別都

《古本竹書紀年》（《史記·殷本紀》正義引）說：“自盤庚遷

殷，至紂之滅，二百七十三年，更不徙都。”殷是商代晚期長期的都城。但是文獻上又有武乙遷都朝歌之說。《史記·殷本紀》載：“庚丁崩，子帝武乙立，殷復去亳，徙河北，”後人認為河北即指朝歌，又把武乙說成帝乙。《帝王世紀》（《史記·周本紀》正義引）說：“帝乙復濟河北，徙朝歌，其子紂仍都焉。”《水經注·淇水》武乙又誤作武丁，在朝歌下，引《晉書地理志》說：“本沫邑也”，又說：“殷王武丁始遷居之。”胡渭《禹貢錐指》卷四十、趙一清《水經注釋》卷九都認為“武丁”是“武乙”之誤。

把朝歌作為商代晚期都城的說法是有來歷的。《尚書·酒誥》是周公對封在衛國的康叔的誥詞，其開頭就說：

王若曰：明大命於妹邦。

妹和沫，聲同通用，春秋以後稱為朝歌。鄭玄解釋說：“妹邦者，紂之都所處也。”（《詩·邶風·桑中》正義引）《尚書·酒誥》又說：

妹土，鬲爾股肱，純其藝黍稷。

“妹土”和“妹邦”的意義相近，是沿用商末的舊稱。康叔封於衛，就建都朝歌。《史記·衛世家》說：“封康叔為衛君，居河淇間，故商墟。”所說“河淇間”，就是朝歌。所說“故商墟”，就是說商的舊都。《漢書·地理志》河內郡朝歌下說：“紂所都，周武王弟康叔所封，更名衛。”

牧野之戰在一天內就攻到都城。甲子這天清早，武王在牧野發動進攻，打得商師大崩潰，當天晚上便追到都城，迫使紂自焚而死。《逸周書·克殷篇》說牧野之戰，“商師大崩，商辛奔內，登鹿臺之上，屏蔽自燔於火。”《逸周書·世俘篇》也說：“越五日甲子，朝（早）接於商”，“時甲子夕，商王紂取天智玉琰及庶玉環身以自焚。”牧野之戰，在甲子一天之內就取得決定性勝利，

迫使商王紂逃奔到宮中自殺，即所謂“商辛奔內”。當時殷紂王所奔的“內”，所登的鹿臺，都只能在朝歌。

我們前面已經講到，所謂“牧野”，就是牧邑之野。事實上，牧邑即是妹或沫，也即朝歌。馬融說：“妹邦即牧養之地。”（《經典釋文》引）。清代學者段玉裁、陳喬樞、陳奐、馬瑞辰等，都依據馬融之說，進一步認為妹即牧野，妹牧雙聲通用^①。實際上妹或沫是指牧邑，牧野只是牧邑之野。《說文》“姆”，說：“姆，朝歌南七十里。”《後漢書·郡國志》河內郡朝歌下說：“南有牧野。”劉昭注：“去縣十七里”。“十七”當是“七十”之誤。牧野因為是朝歌之野，所以在朝歌以南地區。所謂七十里，是指其寬廣的里數。後人誤把牧野作為地名，把它定在朝歌以南的七十里處，是不對的。《水經注·清水》說：“自朝歌以南，南暨清水，土地平衍，據皋跨澤，悉姆野矣。”這是正確的。

為什麼《古本竹書紀年》說自盤庚遷殷以後，沒有遷過都，而實際上牧（即朝歌）又是紂居住的都城呢？合理的解釋，就是“大邑商”的“郊”區原有別都的建置，牧就是商代晚期的別都。牧不僅有離宮別館，而且駐屯有重兵，防守着南“郊”的重要門戶。牧是商代晚期重兵駐屯之地，所以武王要克商，必須進軍到牧野，展開決戰。一旦牧野的決戰取得決定性勝利，殷的都城便無法防守，整個“大邑商”就很快被全部佔領，商朝就滅亡了。直到西周初期，周朝的一支重兵“殷八自”仍然駐屯在這裏。小臣詵銘文說：

獻！東尸（夷）大反，自（伯）懋父以殷八自征東尸（夷）。惟十又一月趙（遣）自鬻自，述東陘，伐海眉（涓）。季厥復歸才（在）牧自。

伯懋父即康叔之子康伯髦，亦稱王孫牟。懋、髦、牟，聲同通用。伯懋父統率殷八自征伐東夷取得勝利後，返回牧自。這

個牧自即是朝歌，也就是衛的國都。十分明顯，西周初年封康叔於商的故都朝歌以後，沿用商代舊制，仍在朝歌駐屯重兵“殷八自”，由衛君統率作戰。這裏所以稱爲牧自，就由於駐屯重兵的緣故。

現在河南淇縣（即朝歌鎮）還保存有故城遺址。殘存的城牆有三道，頭道在鎮北20里高村橋一帶，第二道在鎮北3里，即淇縣車站東側一帶，第三道在鎮的周圍。第三道城牆的西北角，有地勢較高的臺地，稱爲摘星臺，在斷壁、城濠上發現有龍山文化層、商代文化層、春秋戰國文化層。在西部濠溝斷層上，都是春秋戰國文化堆積^⑩。第三道城牆當是內城，摘星臺當是宮殿遺址所在，第一、二道城牆當是北部的“郭”城。從第一、二道城牆相距17里來看，“郭”的範圍是較大的。這個城址有待於作進一步的調查或鑽探，才能看到全貌。

4 鄭州商城即闌或管，是商代前期的別都

關於鄭州商城的地名，近人有兩種不同看法，看來都難以成立。或者以爲是仲丁遷都的敖（一作鷲），（參看安金槐〈試論鄭州商代城址——隄都〉，見《文物》1961年4、5期等），但是敖的地望，從《帝王世紀》、《水經注》以來，都認爲即在敖山或敖倉附近，在今鄭州西北五十里地，與鄭州商城的位置不合^⑪。或者推定爲成湯所居的亳都（參看鄒衡〈論湯都鄭亳及其前後的遷徙〉，見《夏殷周考古論文集》），但是主要依據的，是商城東北部和北部出土東周的陶文中有八個“亳”字，證據比較薄弱，“亳”可能是製陶作坊所在的小地名。成湯所建亳都的地望，仍當以雷學淇、王國維所考爲是，在今山東曹縣東南，不應在今鄭州。

從沿革地理來看，鄭州商城當是西周初期管叔受封的管國。

《括地志》（《史記·周本紀》正義引）說：“鄭州管城縣外城，古管國也，周武王弟叔鮮所封。”《元和郡縣志》卷八“鄭州、管城縣”條，也說：“郭下本周封管叔之國。”所謂管城縣外城，所謂鄭州郭下，正是現在發現的鄭州商城。

根據考古發掘，得知在緊貼商代夯土城牆的外壁附加有一周戰國時代修築的城牆，其上有戰國文化層；漢代以後繼續利用商代和戰國城牆而加以修補，但城垣規模縮小了三分之一以上，在北部另築了一道北城牆，把三分之一面積隔開在外，這樣北部三分之一就成爲“外城”或“郭”。《括地志》和《元和郡縣志》把包括“外城”或“郭”的大城定爲管叔受封的管國，很是正確。戰國時，管原爲韓邑，曾被秦進攻，見《戰國策·魏策四》。後來被魏安釐王所攻取，見《韓非子·有度篇》^⑩。現在發現的戰國時代修築的附加城牆，當是韓國爲了加強防禦而修築。漢代此地爲管縣，以後成爲管城縣、鄭州或鄭縣。鄭州商城的歷史沿革很是清楚，不容懷疑。

然而必須指出，西周初期管叔封於管，是沿用商代的舊稱，並不是一個新定的國名。《史記·管蔡世家》說武王克殷以後，“封叔鮮於管”。管這個地名該早就存在，只是“管”是後起字，原來不寫作“管”。在《墨子》一書中，不作“管”而作“關”，曾兩次提到管叔作關叔。《墨子·耕柱篇》說：“古者周公旦非關叔。”《墨子·公孟篇》說：“關叔爲天下之暴人。”這個字，在商代、西周金文中作“關”，有下列五種不同寫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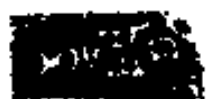
父關子鼎（《文史雜錄》圖版三十一）



父曰關（《商周金文錄遺》一四七）



蘭白（《頤齋吉金續錄》圖五十）



宰攄角（《三代吉金文存》卷一六，圖五十）



利簋（《文物》一九七七年第八期）

這個字從“東”聲，“東”或省作“束”，從“門”、從“問”或從“問”，都是形符。容庚《金文編》解釋宰攄角的這個字為“蘭”，是正確的。于省吾考釋利簋銘文，認為這些字都是“管”的初文，“古無‘管’字，管為後起的借字”^⑩很是正確。徐中舒也根據利簋銘文說：“辛未是甲子後第八日，蘭，其地必在殷都朝歌不遠，于氏以蘭為管叔之管，以聲韻及地望言之，其說可信。”^⑪而且《墨子》“管叔”作“關叔”，“蘭”與“關”，音義俱近，更足以證明“蘭”即是“管”。

利簋銘文說：

珷征商，惟甲子朝（早），歲（通作“歲”）鼎（通作“丁”）克，聞（通作“昏”），夙又（有）商。辛未才（在）蘭白，易（錫）又（有）事（官名）利金。

“歲”通“歲”，《說文》說：“歲，利，傷也。”“鼎”通作“丁”，“當”的意思。“聞”通作“昏”，夜晚。這是說：武王征商，甲子這天清早衝殺，當即得勝，到夜晚，很快佔有商的國都。到第八天辛未，武王在蘭白，把“金”賞給了利。武王在克商以後，第八天就到蘭白對臣下賞賜，說明蘭白是當時後方的軍事重鎮，肯定在進軍牧野之前已經佔領，並駐屯重兵防守，所以稱為“蘭白”。如同“牧白”一樣，原先當是商代的別都。

武王克商之後，所以要把他的弟弟管叔封在此地，作為監督

原來商代王畿的殷貴族的“三監”之一，正因為此地處於商代王畿的邊緣，是個戰略要地，是個軍事重鎮，便於就近進行監督。當年武王還曾親自多次來到此地主持政務。《逸周書·文政篇》載：“惟十有三祀，王在管，管蔡開宗循王。”惟十有三祀是克商後二年，“開宗”是說開啓宗廟迎接，“循王”是說遵照王命辦事。為什麼蔡叔會和管叔一起“開宗循王”呢？朱右曾說：“蔡叔食邑，疑即今大名府長垣縣之祭城，其後成王改封蔡仲於蔡，今汝寧府上蔡縣地。”（《逸周書集訓校釋》卷四）按《續漢書·郡國志》河南尹中牟縣下，有管城，又有蔡亭，說明管、蔡原是臨近的二個邑。《括地志》（《史記·周本紀》正義引）說：“故祭城在鄭州管城縣東北十五里，鄭大夫祭仲邑也。《釋例》云：祭城在河南，上有敖倉，周公後所封也。”蔡叔原來封在管的附近，後來因蔡叔參與三監叛亂，改封蔡仲到上蔡的。《逸周書·大匡篇》又說：“惟十有三祀，王在管，管叔自作殷之監。”說明這時武王到管，是為幫助管叔加強對殷貴族的監督管理。自從周公平定管叔、蔡叔及武庚的叛亂，建成東都成周以後，管的重要性就大為降低，但是成王來到成周的時候，也還曾到管邑視察。東鼎銘文說：“王來奠（用酒致祭）新邑，□旬又四日丁卯，□□自新邑於東。”新邑即成周，《尚書·洛誥》稱成周為“新邑”，《尚書·康誥》稱為“新大邑”，《尚書·多士》稱為“新洛邑”。東即闕，即是管邑。“於”是“往”的意思。

根據考古發掘的結果，鄭州商城建築於商代前期（二里岡下層文化時期），曾沿用較長時間。商代從湯起，前期建都在古黃河以南和以西，湯居亳，在今山東曹縣南；仲丁遷敖，在今鄭州西北五十里；河亶甲遷相，在今河南內黃縣東南。從祖乙遷邢以後，就到黃河以北，可能這個闕自，就是商代前期的別都。因

爲是軍事重鎮，所以到商代後期也還應用。又因爲是別都，有宗廟的建設，所以商王常到那裏，在宗廟裏對臣下賞賜。一九五九年安陽圓坑墓出土戊嗣子鼎銘文：

丙午王商(賞)戊嗣子貝廿朋，才(在)闡宗，用作父癸寶鼎。唯王
甗闡大室，才(在)九月。犬魚。

“宗”是指宗廟，“大室”是指宗廟里的大室。商王到闡對臣下賞貝的例子，還見於宰攄角銘文和父己簠銘文。

商代這種別都的制度，對後世是有深遠影響的。楚國在春秋時代曾推行這種制度。例如楚靈王在陳、蔡、不羹三縣築城，“賦皆千乘”，稱爲“三國”，見《國語·楚語上》，韋昭注：“三國，楚別都也。”楚國常把別都改建爲縣^①。武城原來也是楚的別都之一。楚王常到武城，武城就設有宗廟^②。鄢更是楚的重要的別都，作爲楚都鄢以北的重要門戶，並爲軍事重鎮。齊國到戰國時代還設有五都的制度，除國都臨淄以外，四境設有別都、平陸、高唐、即墨、莒，都是別都。別都同樣具有軍事重鎮性質，有所謂“五都之兵”^③。燕下都就是燕的別都，是燕國西南的重要門戶，也具有軍事重鎮性質。

① 毫的所在，從來有四種說法：即杜毫（今陝西省西安市東南）、南毫（今河南省商丘東南）、北毫（今山東省曹縣東南）和西毫（今河南省偃師西南）。雷學淇《商都殷毫考》（《介庵經說》卷二）主北毫之說，提出四條證據：（1）湯居毫，與葛爲鄰（《孟子·滕文公篇》），北毫離葛只五十里。（2）《左傳·哀公十四年》記宋景公說：“薄，宗邑也。”宋爲商的後裔，足證湯所居毫即是宋的薄邑。（3）湯居毫，出征亳、顧等國（《詩·商頌·長發》），地理位置也相合。（4）宋國都城的城門，都以面向的地名作爲城門名。其北城門稱桐門，

正因“伊尹放太甲於桐”(《孟子·盡心篇》、《史記·殷本紀》)桐在其北，也足以證明亳當即北亳，在今河南省商丘以北，山東省曹縣東南。王國維《說亳》(《觀堂集林》卷十二)與雷說相同，所舉三條證據即是雷學淇所提出的前三條，該是所見相同。

- ② 祖乙所遷都的邢，或作耿，音近通用。《書序》說：“祖乙圮於耿”。《史記·殷本紀》索隱以爲“今河東皮氏縣有耿鄉”，其說不可信，商不可能建都到今山西省河津縣東南。王國維《說耿》(《觀堂集林》卷十二)從段玉裁《古文尚書撰異》(《書序》第三十二)，謂即今河南省溫縣的邢丘，謂“其地正濱大河，故祖乙圮於此也”。按《通典》(卷一百七十八，州郡八，鉅鹿郡，邢州條)等書，都說祖乙所遷之邢，即是後來周公之子所封的邢國，在邢州，即今河北省邢臺市。《元和郡縣志》(卷十五，河東道四，邢州條)等書，又都說邢國是邢州城內西南隅小城，現在邢臺西南發現大範圍早商文化遺址(河北省文物管理委員會《邢臺曹演莊發掘報告》，《考古學報》1958年4期)，足以證明祖乙所都之邢確在邢臺。《書序》所說“圮於耿”，當因山洪沖毀。邢臺過去常有山洪爆發，沖決爲患，直到清代乾隆年間還爲此築隄防。參見《嘉慶一統志》順德府沙底河下釋文。
- ③ 《路史·國名紀·商世侯伯》認爲戲方即春秋時代鄭國的戲，見《左傳·襄公九年》。其說可從。《水經注·河水》謂汜水出浮戲山，《元和郡縣志》說汜水出縣東南三十二里浮戲山。越戲方該在浮戲山下，當在今河南省鞏縣東南。
- ④ 這個衛，不可能是後來衛的國都朝歌，因爲牧野之戰朝歌早已被周佔有。此衛當即豕韋之韋，古“衛”和“韋”同音通用。豕韋亦可單稱韋，見《詩·商頌·長發》。《國語·鄭語》記史伯說：“大彭、豕韋爲商伯矣。”《左傳·襄公二十四年》記范宣子說：“昔句之祖，……在商爲豕韋氏。可知豕韋到商代尚存，所以又成爲周討伐的對象。豕韋在今河南滑縣南。

- ⑤ 歷即春秋時代鄭國的歷，或作櫟。《國語·鄭語》記史伯說：“若克二邑，鄆、弊、補、丹、依、騷、歷、華，君之土也”。“歷”一作“櫟”，音同通用。《史記·鄭世家》：“厲公出居邊邑櫟”。索隱：“按櫟音歷，即鄭初得十邑之歷也。”在今河南禹縣。
- ⑥ 沈廷國《逸周書集釋》引沈祖綏說：“《後漢書·郡國志》，潁川郡長社縣有蜀城、濁澤，注：‘《史記》云：魏惠王元年韓、趙合眾伐魏蜀澤。’疑即蜀地。”按：沈說是。《史記·魏世家》作濁澤，《趙世家》、《六國年表》作涿澤，集解引徐廣曰：“長社有濁澤。”在今新鄭西南，禹縣東北。
- ⑦ 《詩·魯頌·駉》毛傳：“邑外曰郊，郊外曰野。”《詩·召南·野有死麕》和《詩·邶風·燕燕》毛傳：“郊外曰野。”《詩·鄭風·叔於田》鄭箋同。《說文》“一”字下說：“邑外謂之郊，郊外謂之野。”“野”字下說：“野，郊外也。”都沒有“郊外謂之牧”的說法。《文選·西都賦》李善注引《爾雅》亦作“邑外曰郊，郊外曰野”。陳奐《詩毛氏傳疏》、駉詁訓傳二九、王筠《說文句讀》（野字下）等書，都認為今本《爾雅》有誤。按《國語·周語中》：“國有郊牧。”韋注：“國外曰郊。牧，放牧之地也。”《詩·小雅·出車》：“我出我車，於彼牧矣”。毛傳：“出車就馬於牧地。”鄭箋：“牧地在遠郊”。當以鄭說為是。《出車》下文又說：“我出我車，於彼郊矣”，可知牧確在郊區。《周禮·地官·載師》：“以宅田、士田、買田任近郊之地，以官田、牛田、賞田、牧田任遠郊之地。”可知牧在遠郊，當是因牧馬的草地而得名。《爾雅》當作“郊外謂之野，野外謂之牧”。
- ⑧ 參看拙作《試論西周春秋間的鄉遂制度和社會結構》，收入《古史新探》，1965年中華書局出版。
- ⑨ “牧”，《說文》作“埇”。段玉裁《古文尚書撰異》、陳喬樞《今文尚書經說考》（卷十八，酒誥第七八）、陳奐《詩毛氏傳疏》（卷四，鄆柏舟詁訓傳四、桑中）、馬瑞辰《毛詩傳箋通釋》（卷五，鄆桑中）、王先謙《詩三家義集疏》（卷三中，邶、鄆衛柏舟第四，桑中），都認為“牧”、

- “妹”、“姆”雙聲通用。
- ⑩ 《文物參考資料》1957年第5期工作報導：《湯陰朝歌發現龍山和商代等文化遺址》。
- ⑪ 《帝王世紀》（《太平御覽》卷八十三引）說：“仲丁徙囂或敖，今河南之敖倉是也。”《水經注·濟水》說：“濟水又東逕敖山北……其山上有城，即殷帝仲丁之所遷也。皇甫謐《帝王世紀》曰：‘仲丁自亳徙囂於河上者也，或曰敖矣。秦置倉於其中，故亦曰敖倉城也。’古人爲了避開水災和便於防守，可能徙居高地或山地，《尚書·盤庚下》說：‘古我先王，將多於前功，適於山，用降我凶，德嘉績於朕邦’。盤庚歌頌先王遷都的德政，特別講到‘適於山’，即遷居山地。楚國最早都城丹陽也在山上。據《水經注·江水》，丹陽城在秭歸縣，‘城據山跨阜，周八里二百八十步，東北兩面悉臨絕澗，西帶亭下溪，南枕大江，險峭壁立，信天固也’。
- ⑫ 《戰國策·魏策四》說：“秦攻韓之管，魏王發兵救之。”又說：“魏攻管而不下，安陵人縮高，其子爲管守。”吳師道說：“秦攻韓管而得之，縮高之子爲秦守者也。”此說不確。秦攻韓管，因魏救而未得。縮高之子爲韓守。後來管爲魏所得。《韓非子·有度篇》說：“魏安釐王‘攻韓拔管，勝於淇下’。
- ⑬ 于省吾：《利簋銘文考釋》，《文物》1977年第8期。
- ⑭ 《文物》1978年第6期，《關於利簋銘文考釋的討論》。
- ⑮ 參看拙作《春秋時代楚國縣制的性質問題》，《中國史研究》1981年第4期。
- ⑯ 易本煌《春秋楚地答問》：“楚之武城，在今河南南陽北，又在方城之內，乃楚君有事北方駐次之所也。……昭四年靈王會諸侯於申，田於武城，曰：‘屬有宗祧之事，蓋田獵爲祭而備，是武城有楚先君之廟在也’。
- ⑰ 《戰國策·燕策一》載：齊宣王“令章子（匡章）將五都之兵，以因北地之衆以伐燕”。五都之兵又稱五家之兵，參見拙作《戰國史》

五 西周都城佈局的發展

1 西周都城制度的逐漸形成

西周、春秋時代，天子的王畿和諸侯的封國，都實行“國”“野”對立的鄉遂制度。“鄉”是指國都及近郊地區的居民組織，或稱爲“郊”。“遂”是指“鄉”以外農業地區的居民組織，或稱爲“鄙”或“野”。居住于“鄉”的居民叫“國人”，具有自由民性質，有參與政治、教育和選拔的權利，有服兵役和勞役的責任。當時軍隊編制是和“鄉”的居民編制相結合的。居於“遂”的居民叫“庶人”或“野人”，就是井田上服役的農業生產者。《尚書·費誓》說：“魯人三郊三遂。”三郊三遂，就是三鄉三遂，說明西周初年已經實行這種“國”和“野”對立的鄉遂制度^①。因此西周國都的佈局有一定的特點，既有貴族的宮殿區，又有“國人”的居住區，更有軍隊的駐屯地。

西周都城的這些特點，是在不斷建設的過程中，逐步形成的。《詩·大雅·公劉》記載周的祖先公劉遷居到豳（今陝西彬縣東北）的情況，已經注意到選擇有充分水源的肥美平原、適宜建築住處的大塊向陽高地以及駐屯軍隊的營地，還要開墾適合生產糧食的農田。《公劉》說：

篤公劉，逝彼百泉，瞻彼溇原；迺陟南岡，乃覲于京。京師之野，于時處處，于時廬旅，于時言言，于時語語。

“京”就是大塊的向陽高地，適宜修建許多宮室的地方。“師”就是指軍隊的駐屯地。“京師”連稱，因爲此地駐屯有重兵。後

來國都稱爲“京”或“京師”，就是起源於此。《公劉》又說：

篤公劉，既溥既長，既景(影)迺岡，相其陰陽，觀其流泉，其軍三單。度其隰原，徹田爲糧，度其夕陽，幽居允荒。

“其軍三單”的“單”，當讀如“自”或“堆”，是指三支駐屯的軍隊^②。從上文“既景迺岡”、“觀其流泉”來看，駐屯軍的營地是經過選擇的，選在郊外高崗和有流泉的地方，既爲了適宜駐屯防衛，又爲了適合起居生活。“度其隰原，徹田爲糧”，是說丈量低濕之地和平原之地，開墾田地，用來生產糧食。“度其夕陽，幽居允荒”，是說丈量了幽的西部地區，可以建築居處的面積是很寬暢的。“夕陽”是指夕陽所照的西部地區^③，“荒”是寬暢的意思。這種都城造在有水源的高地的辦法，都城駐屯軍隊的設施，居住區造在西部的佈局，對此後都城建設有深遠影響。

公劉所建的幽這個都邑，還是很原始的。這裏沒有城牆的建築，也沒有宮殿和宗廟的建設。到公劉之後第九代公亶父(即太王)，遷都到岐山之陽的周原(今陝西岐山縣東北)的時候，都城的規模就比較像樣了。根據《詩·大雅·緜》的描寫，公亶父帶領周族到達周原、選定地點之後，就“曰止曰時(通作時)，築室于茲”，就是在此定居，建築居室。接着“迺疆迺理，迺宣(通作畝)迺畝”，就是修起田界和治理農田，開築田溝和壟畝。然後就大規模建築都城，《緜》記載說：

乃召司空，乃召司徒，俾立室家。其經則直，縮板以載(通作栽)，作廟翼翼。

揀之綏隰，度之薨薨，築之登登，削屨(通作“屨”)馮馮，百堵皆興，鼙鼓弗特。

這裏，在建築“室家”的同時，就建設整齊的宗廟，所謂“作廟翼翼”，還建築大規模的土牆，所謂“百堵皆興”。對於板築土

牆的情況描寫得很生動，先要拉繩作為直綫的標準，要立上木柱，綑束長板，築成夾層的板牆，以便填土夯築成土牆。即所謂“其繩則直，縮板以裁”，築牆時，先要把土裝到簍筐裏，倒入夾層的板牆裏夯得結實，築成后還要把土牆上隆起之點削平。裝土入筐的的聲音，倒土進夾板牆的聲音，夯築結實的聲音，削平新築成土牆上隆起之點的聲音，都是很大而連續不斷的，即所謂“挾之陗陗，度之薨薨，築之登登，削屨(屨)馮馮”。《緜》還說：

迺立皋門，皋門有伉，迺立應門，應門將將；迺立冢土(通作“社”)，戎醜攸行。

皋門是宮殿的外門，應門是宮殿的正門，這時都已建造得高大而堂皇了。還建築有祭祀社神的大祭台，這樣就能把侵擾的戎狄部族嚇跑了。“戎醜”是對戎狄的一種蔑稱。《詩經》中說到的“醜”，或者用來指俘虜，如“執訊獲醜”(《詩·小雅·出車》)；或者用來指獵得野獸，如“升彼大阜，從其羣醜”(《詩·小雅·吉日》)。為什麼建築祭祀社神的祭臺就能把戎狄嚇跑呢？因為在古人的信念中，社神是主管殺戮罪人的，戰爭勝利以後舉行的獻俘典禮常常要在這種神社舉行^①。

《史記·周本紀》說：“古公(指公亶父)乃貶戎狄之俗，乃營築城郭室屋而邑別居之。”《緜》只說建立室家，建築宗廟興建宮門和土牆，沒有說到築城郭。所謂“百堵皆興”，當是指宮殿的圍牆。當時未必有城郭的建築，但是公亶父建設國都的佈局，影響是深遠的。皋門、應門等宮門的建築，宗廟和神社的設置，都是從這時創始的。使用司空、司徒等官吏大規模征發人民建設都城，也是從這時開端的。

西周都城有大規模的城牆的建築，可能是從文王建都于豐開始的。《詩·大雅·文王有聲》對於文王“作邑于豐”有所描

寫，講到“築城伊瀆，作豐伊匹”，“王公伊瀆，維豐之垣”。“瀆”，《韓詩》作“澗”，就是城溝。說明豐邑的建築，不但築有城牆，也還築有與城牆相配合的城溝。豐在今陝西西安西南灃河中游西岸。

武王克商以後，又建都城于鎬，稱爲宗周，在今西安西南灃河中游東岸。據《文王有聲》，鎬京有辟雍(大學)的建築。根據西周金文，宗周有宗廟，周王常在此朝見大臣。《逸周書·世俘篇》記載武王克商以後，在周廟舉行獻俘禮，講到“武王朝至燎於宗廟”，“武王乃以庶國誠(首級)祀于周廟，告于周廟”，這個“周廟”當是宗周的廟。

關於豐和鎬的佈局，沒有史料可供探討。但是有一點是可以肯定的，鎬京駐屯有大軍，當有駐屯的營地及其防禦設施。文獻上提到的“六師”(《尚書·顧命》、《詩·大雅·棫樸》等)，西周金文上見到的“六自”(豳貯簋、南宮柳鼎等銘文)，當即駐屯于宗周的軍隊。禹鼎銘文以“西六自”和“殷八自”並提，“西六自”當是由于駐屯西土宗周而得名。西周時代共有三支主要軍隊，“成周八自”駐屯于東都成周，“殷八自”駐屯于殷的故都朝歌(即朝歌)，“西六自”駐屯于西都鎬京。

2 東都成周開創的小“城”連結大“郭”佈局

在西周的都城中，特別應該重視的是東都成周。周公平定管叔、蔡叔聯合武庚以及東夷的叛亂以後，爲了防止殷貴族的叛亂，加強對中原地區以及四方的控制，繼承武王的意旨，在原來的洛邑建設東都成周。這是對商代建設別都制度的重要發展。這樣同時分設東西兩個都城以加強中央集權的統治，是中國政治歷史上的創舉。雖然西周的君王常住在宗周鎬京，有時到東都

成周來處理政務，但實際上由于地理位置的關係，成周的重要性超過了宗周。

關於成周的建設，《逸周書·作雒篇》有具體描寫：

周公敬念于後曰：予畏周室不延，俾中天下。及將致政，乃作大邑成周于土中。立城方千七百二十丈，郭方七十里，南繫于雒水，北因于邠山，以爲天下之大湊。制郊甸方六百里，因西土爲方千里。分爲百縣，縣有四郡，郡有四鄙。大縣立城，方王城三之一。小縣立城，方王城九之一，都鄙不過百室，以便野事。

這裏所說“乃作大邑成周于土中”，“大邑成周”是指整個成周的王畿而言，這是沿用“大邑商”的制度，包括“郊甸方六百里”在內。“土中”是說四方的中心。《尚書·召誥》記召公說：“王來紹上帝，自服于土中”。“土中”就是指“天下之中”《史記·周本紀》說：“曰此天下之中，四方入貢道里均，作《召誥》、《洛誥》”。

孔晁解釋“立城方千七百二十丈”的“城”是王城，是正確的。下文講到大縣“方王城三之一”，小縣“方王城九之一”，可以證明。《藝文類聚》、《初學記》等書都引作“方千六百二十丈”，以六尺爲步，三百步爲里計算，正好方九里。這和《考工記》所說“匠人營國方九里”相合^⑤。“郭”就是“郭”。宋本《逸周書》和《藝文類聚》、《初學記》等書引作“郭方七十二里”。《詩地理考》、《通鑑前編》又引作“郭方十七里”。金鸞、劉師培以爲當作“十七里”，孫詒讓認爲當作“二十七里”^⑥。從現有史料來看，都城設置小“城”和大“郭”，是成周新創的制度。但是必須指出，早期的郭只是“依山川爲之，非如城四面爲垣者”。成周的郭“南繫于洛水，北因于邠山”，就是利用原有山川加工連結而成。《管子·八觀篇》說：“大城不可以不完，周郭不可以外通（“周郭”原誤作“郭

周”從張佩綸校正)，里域不可以橫通，……故大城不完則亂賊之人謀，周郭外通則奸遁、逾越者作，里域橫通則攘奪、竊盜者不止”。可知周郭和大城，里域的性質是同樣用來防禦，但結構不同。周郭的作用在於防止“奸遁、逾越”，使不能“外通”。焦循《羣經宮室圖》“城圖六”的說明，依據這點認為“蓋周郭必依山川爲之，使其不可踰越”，是正確的。焦氏不但認為成周的周郭，依據洛水、郊山等山水加工連結而成，還引用史料證明春秋時代鄭國的郭，也是“依水而城”，這個見解是很高明的。

從上引《逸周書·作雒篇》來看，成周是東都的總稱，王城是成周的小“城”，而另有大“郭”。而《漢書·地理志》把王城和成周分成兩個邑，說王城即漢代河南郡的河南，成周即雒陽。也就是王城在今洛陽市的王城公園一帶，而成周在今洛陽以東三十多里地的漢魏故城，顯然是錯誤的。這個錯誤，首先出於《公羊傳》。《公羊傳》說：“成周者何？東周也。”（宣公十六年）又說：“王城者何？西周也。”（昭公二十二年）這是把戰國時代從周分裂成的西周、東周兩個小國都邑誤認為王城和成周的所在。我們從所有的春秋史料來看，也可以證明成周是東都的總稱，而王城只是周王所居住的宮城，關於這點，童書業先生《春秋王都辨疑》已經作了詳細的考辨^①，很是正確。西周文獻中講到成周，或者稱洛（《尚書·召誥》）、洛師（《尚書·洛誥》），或者稱爲新邑（《尚書·洛誥》）、新邑洛（《尚書·多士》）、新大邑（《尚書·康誥》），都只有一個邑，沒有兩個邑的跡象。這是很清楚的。

西周金文中，同樣稱爲成周或新邑（新邑見前引東鼎銘文）。只有令彝銘文中同時存在“成周”和“王”兩個地名：

惟十月月吉癸未，明公朝（早）至于成周，徯（出）令，舍三事

令，……舍四方令。既咸令，甲申明公用牲于京宮。乙酉用牲于康宮，咸既，用牲于王，明公歸自王。

唐蘭和陳夢家都根據這點，認為“王”即王城，成周和王城確是兩個邑^⑧。但是我們從令彝銘文的上下文來看，不可能是兩個邑。明公于癸未到成周，“舍三事令”和“舍四方令”完畢，次日甲申就用牲于京宮，再次日乙酉又用牲于康宮，接着就“用牲于王，明公歸自王”。從上下文看，京宮和康宮都是成周的宗廟，明公要在乙酉一天之內，用牲于成周的康宮，再用牲于王城，還要由此回去，如果成周和王城相距三十多里地，在當時的交通條件下，是不可能在同一天內舉行“用牲”的祭祀大典的。

陳夢家主張西周時代東西兩都，都是雙城，一為宗廟所在，一為王宮所在，王城是王宮所在，成周是宗廟所在。並且認為令彝銘文所說的京宮、康宮都是王城的王宮，明公去“用牲”是主持奠基典禮。試問王城建築王宮為什麼都要明公去奠基呢？顯然是講不通的。陳夢家還認為，王城只見於早期的令彝銘文而不見於以後的金文，因為以後不稱為王城而只稱為“周”。例如免簋銘文：“王才（在）周，既爽，王各（格）于大廟”。吳方彝銘文：“王才（在）周成大室，王各（格）廟。”陳夢家認為“應解釋為夜宿于王城而旦往于成周”。我們認為，在當時的交通條件下，要周王從王城出發，清晨趕到三十多里以外的宗廟舉行典禮，怎麼可能呢？當時宗廟不僅是祭祀祖先之處，政治上的重要典禮如即位、朝聘，策命等等，都要在這裏舉行，宗族內部的禮儀也要在這裏舉行，具有禮堂的性質^⑨。因此宗廟必須造在王宮的附近，凡是都城（包括別都）都必須有宗廟的建築。這到春秋時代還是如此。《左傳·莊公二十八年》說：“凡邑有宗廟先君之主曰都，無曰邑。”王宮和宗廟分造在兩個城邑的說法，是不能成

立的。

王城遺址，至唐代還留有遺迹。《括地志》（《史記·周本紀》正義引）說：“王城一名河南城，本郊廓，周公新築，在洛州河南縣北九里，苑內東北隅。”《舊唐書·地理志》也說王城故城“在今苑內東北隅”。所謂“苑內”，是指神都苑。神都苑的位置，東靠宮牆，北靠邙山。既然王城遺址在“苑內東北隅”，那末，王城必然在唐代洛陽城外的西北角靠近邙山地方。現在春秋時代的王城遺址已經發掘到，地點確是和漢代河南縣城址相同，只是面積較河南縣城為大，平面略呈長方形，南北比東西稍長，只有北牆保存完好，全長2890米，整個城處于澗水入洛處（參看卷首圖版四）^⑩。但是西周王城遺址尚未發現，據《括地志》所說“在洛州河南縣北九里”來看，可能還在東周王城以北的地方。

至于成周的大郭，應該在王城以東，橫跨瀨水兩岸。《尚書·洛誥》記周公說：

我乃卜澗水東、瀨水西，惟洛食；我又卜瀨水東，亦惟洛食。

“食”是說得到吉兆而採用^⑪。周公為營建成周而占卜，先在澗水東、瀨水西占卜得吉兆而採用，又在瀨水東占卜得吉兆而採用。說明整個成周的營建地區範圍，從澗水東一直到瀨水東。既然王城在澗水東，那末，大郭必然橫跨瀨水東西兩岸，如同唐代洛陽城橫跨瀨水兩岸一樣，只是西周成周的大郭位置偏北，在洛水以北，而唐代洛陽城位置偏南，直跨洛水南北兩岸（參看圖13）。

三十年來的考古發掘，在瀨河下游東西兩岸發現了許多西周墓地和遺址，北起邙山，東到馬坡、塔東、塔西，西到洛陽老城（金代以後舊城）西關。先後發現五六百座西周墓葬，其中以北窯龐家溝墓地最為集中，共有四百多座墓，已發掘三百六十七座，

面表現着對早周陶器的繼承，而且墓室沒有腰坑和狗骨。洛陽兩類不同墓葬的發現，正和魯國曲阜故城所發現的基本相同。

周公制定的東都成周佈局，即以西面的小“城”和東面的大“郭”相結合方式，對於春秋戰國時代中原各諸侯國的都城，特別是戰國時代齊、魏、韓、趙、秦等大國的都城，都發生很大的影響，甚至還一直影響到西漢都城長安的佈局，這是值得我們注意的。

【追記：葉萬松，余扶危〈關於西周洛邑城址的探索〉一文（收入〈人文雜誌叢刊〉等二輯〈西周史研究〉，1984年8月出版），根據瀋河兩岸西周遺址和墓葬出土物，認為這一帶既是西周貴族生活地區，但同時也有遷自安陽的殷遺民。而且所發現的鐙銅遺址又屬於西周前期；所以斷定“周公營建的洛邑城址可能在瀋河之濱”。這一看法和我們有相同之處，只是我們認為這一帶應是成周的大郭所在，大郭以西還連結有王宮所在的王城。筆者對於這一問題，曾寫成〈西周初期東都成周的建設及其政治作用〉一文，發表於〈歷史教學問題〉，1983年第4期，可以參閱。】

3 成周建設大“郭”的用途

周公建設東都成周，原是爲了完成武王的志願，目的在於防止殷貴族的叛亂，加強控制中原及四方地區。據〈逸周書·度邑篇〉·武王克商以後，爲了“圖夷茲殷”（圖謀平定這些殷貴族），主張建設東都，認爲“自洛納（洛水入河處）延于伊納（伊水入洛處）”“其有夏之居”。也就是周人應該建都之處。所謂“有夏之居”，就是周人之居。周人常常自稱有夏或區夏，見〈尚書〉的〈康

誥》、《君奭》、《立政》等篇^②。武王把這件事囑託周公，并“營周居于洛邑而後去”（《史記·周本紀》）。“營”是規劃定位之意^③，“周居”就是周人的都城所在。此後周在洛邑就駐屯有大軍，所以在周公沒有建成東都以前，洛邑已是個軍事重鎮，有“洛師”之稱，《尚書·召誥》說：“若翼日乙卯，周公朝至于洛”，《尚書·洛誥》又記周公說：“予惟乙卯朝至于洛師”。洛之所以稱“洛師”，猶如西周金文中稱駐屯大軍的某地為“某自”。

周公建設成周，所以要在小“城”之東，建築大“郭”，主要用途之一，就是為了駐屯大軍，做好防禦設施。西周有三支駐屯大軍，“成周八自”就因駐屯于成周而得名。另一個主要用途，就是用來遷居殷貴族。原來武王設置三監，對原來商代王畿的殷貴族，採用就地監督管理的辦法。等到平定管叔、蔡叔和武庚的叛亂以後，吸取這個教訓，就改用分散遷移殷貴族的辦法，以便監督管理和利用。當時除了把一部分殷貴族分批賞給分封出去的諸侯如伯禽等人帶往封國以外，大量殷貴族被遷移到洛邑來，以便集中監督和利用。當周公營建成周以前，已有許多殷貴族被有組織的遷移到洛邑來。他們就是原來的殷貴族首領“侯、甸、男、邦伯”帶到洛邑來的。召公、周公營建成周，主要就是使用遷來的眾多的殷貴族力量。《尚書·召誥》說：“大保（即召公）乃以庶殷（即眾多的殷貴族）攻位（營建地位）于洛。”又說：“周公乃朝（早）用書（發佈命令的文件）命庶殷；侯、甸、男、邦伯。厥既命庶殷，庶殷丕作（大舉動工）。”《尚書》的《多方》和《多士》，就是周公用“王命”來教訓遷到洛邑的殷貴族。《書序》說：“成周既成，遷殷頑民，周公以王命誥，作《多士》。”該是成周建成之後，周公又進一步把殷貴族遷移來。

——周公對待遷移到成周的殷貴族，採用監督兼利用的方針，仍

然分配給他們田地住宅，從而爭取他們服從和效勞。《尚書·多士》最後一段告誡殷貴族說：

今朕作大邑于茲洛，予惟四方罔攸賓（“賓”通作“擯”，是說不會對四方有所擯棄），亦惟爾多士（指殷貴族），攸服奔走（服役而效勞），臣我多遜（要臣服于我而多順從），爾乃尚有爾土（仍能分配給你們土地），爾乃尚寧幹止（寧幹止謂安心于事業和居處）。

所謂“攸服奔走”，應該包括服兵役，充當“成周八自”的甲士在內。這種遷移殷貴族的政策，可以說一舉二得，既可以減輕這些殷貴族在常住地的勢力，防止他們的叛亂；又可以加強對他們的監督，還可以利用他們充實“成周八自”，使“成周八自”的戰鬥力更加堅強。

周公這樣建設成周的大郭，用來駐屯大軍和遷居殷貴族，就充實了東都的“國人”力量，擴展了“國”“野”對立的鄉遂制度。按照“國”、“野”對立的鄉遂制度，國都的軍隊是以貴族作骨幹，並征發“國人”中壯丁編制而成。軍隊的編制是和“國人”的鄉里組織密切結合的。因此周朝十分重視對成周東“郭”的管理教導。《書序》說：“周公既沒，命君陳分正東郊成周，作《君陳》。”《禮記·坊記》引有《君陳》佚文，鄭玄注：“君陳，蓋周公之子，伯禽弟也。”所謂“東郊成周”，就是指成周東部大“郭”的“國人”居住區。當時“國人”的居住區稱為“鄉”或“郊”^④。“分正”是分別治理的意思。《書序》又說：“康王命作冊畢公分居里成周郊，作《畢命》。”所說“成周郊”，主要是指成周東郊。“分居里”是說“分別民之居里”（偽《孔傳》），就是加強對鄉里組織的整頓管理。

西周王朝創立了東西兩都，建立了東西連通的王畿，作為全國統治的樞紐，這是政治上的重要設施；對此後西周時代政治、經濟、文化的進一步發展，起着重大作用。《逸周書·作雒篇說》：成周“制郊甸方六百里，同西土方千里”。《漢書·地理志》也

說：“初洛邑與宗周通封畿，東西長而南北短，短長相覆爲千里。”其中東都成周在統治上的作用尤其重要，而且成爲全國征收貢賦的中心。即《史記·周本紀》所說：“四方入貢道里均。”成周不僅是對周圍“郊甸”徵發人力物力的中心，而且是對四方諸侯徵收貢賦的中心，更是對四方被征服的夷戎部族或國家徵發人力物力的中心。根據兮甲盤銘文，周宣王命令兮甲（即尹吉甫）“政（征）司成周四方責（積），至于南淮尸（夷）”，規定南淮夷既要貢納幣帛、積貯，更要“進人”（即進貢服役的勞動者），都必須輸送到一定的地點，否則的話，就要受到討伐。當時軍事上的征伐，主要目的就在於貢賦上的徵收，人力物力的徵發^①。

由此可見，成周的佈局，所以要在王城以東建設大“郭”，用來安置“國人”和遷居殷貴族以及駐屯“成周八自”，完全出於周朝加強中原以及四方統治上的需要。“成周八自”不僅用於征伐不服從的諸侯和夷戎部落，而且是鞏固統治的一種威懾力量。

① 參看拙作《試論西周春秋間鄉遂制度和社會結構》，收入《古史新探》，1965年中華書局出版。

② 《毛傳》：“三單，相襲也”這是讀“單”爲“嬾”或“禪”，說是軍隊更番徵調。《鄭箋》云：“適滿三軍之數，單者無羨卒也。”這是讀“單”爲“殫”，解釋爲“盡”。清代學者有種種解釋，都很牽強。我們認爲“單”當讀爲“自”或“堆”，“其軍三單”就是“其軍三自”，如同殷代“王作三自”一樣。

③ 《毛傳》：“山西曰夕陽。”《爾雅·釋山》同。《鄭箋》“夕陽者，幽之所處也。”陳奐《詩毛氏傳疏》（卷二十四，《生民之什》詁訓傳）根據這點，認爲“夕陽建國，則幽居在幽山之西”。我們認爲都邑不可能造在一座大山的西面，這對起居生活是不合適的。所謂“度其夕陽”，夕

陽當指作爲京師的大塊高原的西部地區，廟的主要宮室(即所謂“廟居”)就造在寬廣的西部地區。

- ④ 尚書·甘誓：“用命，賞于祖；弗用命，戮於社”。墨子·明鬼下篇根據齊春秋說：齊莊公有二個侄子“訟三年而獄不斷”，後來“盟齊之神社”，有罪者被羊角觸死。左傳·昭公十年：“(季)平子伐莒，取郟，獻俘，始用人於亳社。”因爲社神掌管刑戮，戰爭勝利後舉行獻俘典禮也要在神社舉行。所謂“始用人於亳社”，實際上是恢復使用了原始的禮俗。根據逸周書·世俘篇，武王克商以後舉行獻俘典禮，也是殺死許多俘虜來獻祭的，既“告於周廟”，“告於天、於稷(後稷)”，還“誓於社”。
- ⑤ 焦循羣經宮室圖卷上“城圖一”說明：“計每五步得三丈，每百八十丈得一里，以九乘之，千六百二十丈，與考工記九里正合。”金鶚天子城方九里考(求古錄禮說卷一)說：“七百七字，當爲六字之譌。蓋建城必合里之整數而無奇零。若城方千七百二十丈，計十里則不足，計九里則有餘，殊非法制。……千六百二十丈，是爲九里，此周天子之制灼然可據。”
- ⑥ 金鶚天子城方九里考說：“七十里當從前編作十七里，蓋傳寫之譌也。孟子言三里之城、七里之郭，七爲五之譌，則郭大於城不及一倍，今郭方七十里，大於城幾八倍，與孟子不合。”劉師培周書補正從其說，並引王應麟王會篇補注、詩地理考，劉恕通鑑外紀並引作“十七里”爲證，孫詒讓周書斟補說：“竊疑當爲二十七里，乃三城方之數也。周禮·典命鄭注謂城方九里者，宮當方九百步，九百步即三里也。若然，周王宮方三里，城方九里，郭方二十七里，皆以三乘遞加。”我們認爲，十七里之說比較合理，當時郭城不可能造得太大。
- ⑦ 童書業春秋王都辨疑，原發表于禹貢半月刊七卷六、七期(1937年出版)，後收入中國古代地理考證論文集(1962年上海中華書局出版)。分上下兩篇，上篇春秋時周室未遷都辨，下篇

《成周爲東都大名、王城爲成周內城考》。下篇引用《尚書》、《書序》、《春秋》、《左傳》、《國語》等書，證明洛邑即成周，成周即東都，王城即在成周中。《左傳·僖公二十五年》：“（襄）王入于王城”，而《國語·晉語四》作“（襄）王入於成周”，足證王城即在成周之中，《左傳·昭公二十三年》：“王子朝入于王城，次于左巷，秋七月戊申鄩羅納諸莊宮。”《左傳·定公七年》：“王入於王城，館於公族党氏，而後朝于莊宮”，說明莊宮在王城。而《左傳·昭公二十六年》：“（十一月）癸酉王入于成周，甲戌盟于襄宮。晉師使成公般成周而還。十二月癸未，王入于莊宮。”此又言莊宮在成周，也足證三城即成周的內城。童書業《春秋左傳研究》有“成周與王城”條（第223—225頁），又概括敘述了這一考證（1980年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楊筠如《尚書覈詁》（1934年初版，1959年陝西人民出版社再版），早就有同樣的看法，根據《尚書·洛誥》和《左傳》所說莊宮既在王城，又在成周的記載，斷定成周爲東都，認爲《漢書·地理志》以成周爲居殷頑民之地，王城爲周公所營之邑，其說大謬。但是，他認爲成周與王城“皆即《漢志》洛陽之成周”，反而以爲《漢志》之王城與周公所營東都無涉，（陝西版212—213頁）則是錯誤的了。

- ④ 唐蘭《作冊令尊及作冊令彝考釋》（《國學季刊》第四卷第1號）說：“三，王城也。《漢書·地理志》云……然則王城成周，實二邑也。用牲于三城者，亦祭禮也，羅氏誤以爲明公饗王，吳釋從之，疏謬最甚。”按唐氏以“用牲”爲祭祀，很對。“用牲”應該是用犧牲的祭祀大典。甲骨金文和古文獻稱“用”什麼的，都指用來祭祀。如卜辭常見的“用羌”，《左傳》所說“用人于亳社”等等。但是把王城與成周說成二邑，不確。陳夢家先生《西周銅器斷代（二）》（《考古學報》第十冊）說：“明公在癸未捨命于成周，而次日甲申用牲于兩宮，則京宮、康宮所在之王，去成周不足一日的路程，應是王城。”又說：明公在王二日，即還歸，正足以說明京、康二宮之用牲乃爲奠基。”我們認爲，這個解釋不符合銘文原意。銘文

明確說癸未明公到成周“捨三事令”和“捨四方令”，完畢之後，次日甲申“明公用牲於京宮”，再次日乙酉“用牲於康宮”，都完畢以後，才“用牲于王”。分明京宮和康宮都在成周，並不在王城，是祭祀京、康二宮之後，才到王城祭祀的。如果京、康二宮都在王城，那末，“用牲于京宮”，“用牲于康宮”，就是“用牲于王”，下文再說“用牲于王”，就不通了。陳夢家在《西周銅器斷代(二)》中，另有“西周金文中的都邑”一節，其中有“論王、周及成周、新邑”一段，說明令彝銘文中的“王”即是西周其他金文中的“周”，王之康宮即是周之康宮。認爲“王可以是周，但成王以後的周，既不是宗周，也不是成周”。這一說法也不能成立。頌鼎銘文既說“王才(在)周康邵宮”，又記王曰：“頌，令(命)女(汝)官司成周，貯卣家”，那麼周當即成周的簡稱，不能據此判定“周”與“成周”爲二地。

- ⑨ 參看拙作《試論西周春秋間的宗法制度和貴族組織》第一節“宗廟制度”。收入《古史新探》，1965年中華書局出版。
- ⑩ 考古所洛陽發掘隊：《洛陽澗濱東周城址發掘報告》，《考古學報》1959年2期。
- ⑪ 偽《孔傳》：“卜必先墨畫龜，然後灼之，兆順食墨。”俞樾《羣經平議》(卷六《尚書》四)認爲“食墨”爲吉利之說不確，“食”當訓“用”。楊筠如《尚書覈詁》又謂：“食亦事之假，事猶治也。”(陝西版212頁)總之，“食”是說得到吉兆而採用。
- ⑫ 《尚書·康誥》：“用肇造我區夏。”楊筠如《尚書覈詁》：“猶《大誥》與我小邦周矣。”(陝西版171頁)《尚書·君奭》：“惟文王尚克修和我有夏。”《尚書覈詁》：“此有夏即謂有周。”(陝西版248頁)《尚書·立政》：“乃倅我有夏。”《尚書覈詁》：“有夏即謂有周。”(陝西版268頁)《史記·周本紀》有與《逸周書·度邑篇》相同的記載，記武王曰：“自洛汭延于伊汭，居易毋固，其有夏之居。”《史記今注》屈萬里注：“此有夏亦當指周言。其，將然之詞。言此地將爲周”

之居處(意即京都)也。”甚是。

- ⑬ 《詩·大雅·靈臺》：“經之營之。”《毛傳》：“經，度之也”。《鄭箋》：“營，表其位。”《尚書·召誥》：“厥既得卜，則經營，越三日庚戌，太保乃以庶殷攻位于洛汭。”偽《孔傳》：“其已得吉卜，則經營規度城郭郊廟朝市之位處。”經營是規劃定位之意，所以隔三天就命令庶殷“攻位于洛汭”。
- ⑭ 從《禮記》的《坊記》、《緇衣》等篇所引《君陳》來看，都是教訓的話，例如說：“爾有嘉謀嘉猷，入告爾君於內，女(汝)乃順之於外，曰：此謀此猷，惟我君之德，於乎是維良顯哉”。(《禮記·坊記》引)這正是周成王任命君陳“分正東郊”時，教訓他如何對東郊的“國人”進行管理教導的方法，即使自己有好的謀劃和方針，也必須向君上報告，對外宣佈說是君上的德行。
- ⑮ 參看拙作《試論西周春秋間的鄉遂制度和社會結構》第三節“西周時代的六自、八自和鄉遂制度的關係”，收入《古史新探》，1965年中華書局出版。

六 魯國都城曲阜的“坐西朝東”佈局

1 魯國都城佈局的分析

現存周代諸侯國都的城址，經過考古調查，能夠證明它是西周時代建築的，只有曲阜魯國故城。由此我們可以清楚地看到當時諸侯國都的佈局(參看卷首圖版五)①。

魯國故城平面大致呈長方形，東西最寬處3.7公里，南北最長處2.7公里，面積約10平方公里。西北兩邊利用洙水作城濠，東南兩邊控有城濠和洙水連結。從南牆東門東側，西北城角和北牆東端三處的試掘中，都發現早晚期多層的城牆相互疊壓的層次。西北城角和北牆東端的早期城牆屬於西周後期，南牆

東門東側的早期城牆屬於西周早期，說明這座城牆創建於西周早期，改造修補於西周後期，經春秋戰國而位置沒有變動。

從曲阜古城的城門的設置和交通大道的佈局來看，重心在於西部和中北部，原來整個城的結構是坐西朝東的。

城門有十一座，東、西、北三面各三座，南面兩座。北部的城門，分佈較密，距離較小，約半公里左右。貫通全城的大道主要在北部，都是東西向的，共有三條。1號大道從西牆北門通向北牆東門；2號大道從西牆中門通向東牆北門，西段寬8—9米，靠近東牆北門加寬到14米；3號大道從西牆南門經過宮殿區南沿，通向東牆中門，西段寬10米，東段寬13—15米。這樣主要大道東西向，而東段路面又加寬，說明原來佈局是以東方為正門的。此外東西向的道路有二條，同是為通向居住區而特設的。4號道路寬8米，從東牆北門向西通到中部偏東北的宮殿區（今周公廟高地）。5號道路也寬8米，從東牆南門向西通到附近居住區（今古城村西南）。

城裏南北向道路，只有6號道路貫通城的西部，從北牆西門向南通到南牆西門，只寬6—7米。7號道路寬6米，只從北牆中門向南與1、2號東西向大道相交。南北向道路只有通向中部宮殿區的較寬，8號大道寬12米，從城北中部穿過1、2號東西向大道通到宮殿區。9號大道寬15米，從南牆東門向北通到宮殿區，與3號東西向大道相交接。但是，這些大道該是春秋初期才擴建的，在9號大道的兩側，就分佈着不少時代較晚的大型夯築遺址。

故城只有南牆東西兩門南口的東西兩側有夯土基臺，都是門闕的基址。西門的基址較小（東西寬19米，南北長16米），是漢代的建築；東門的基址較大（東西寬30米，南北長58米，高1米），門道直對城內中部偏東北的宮殿區，有9號大道通達。這座南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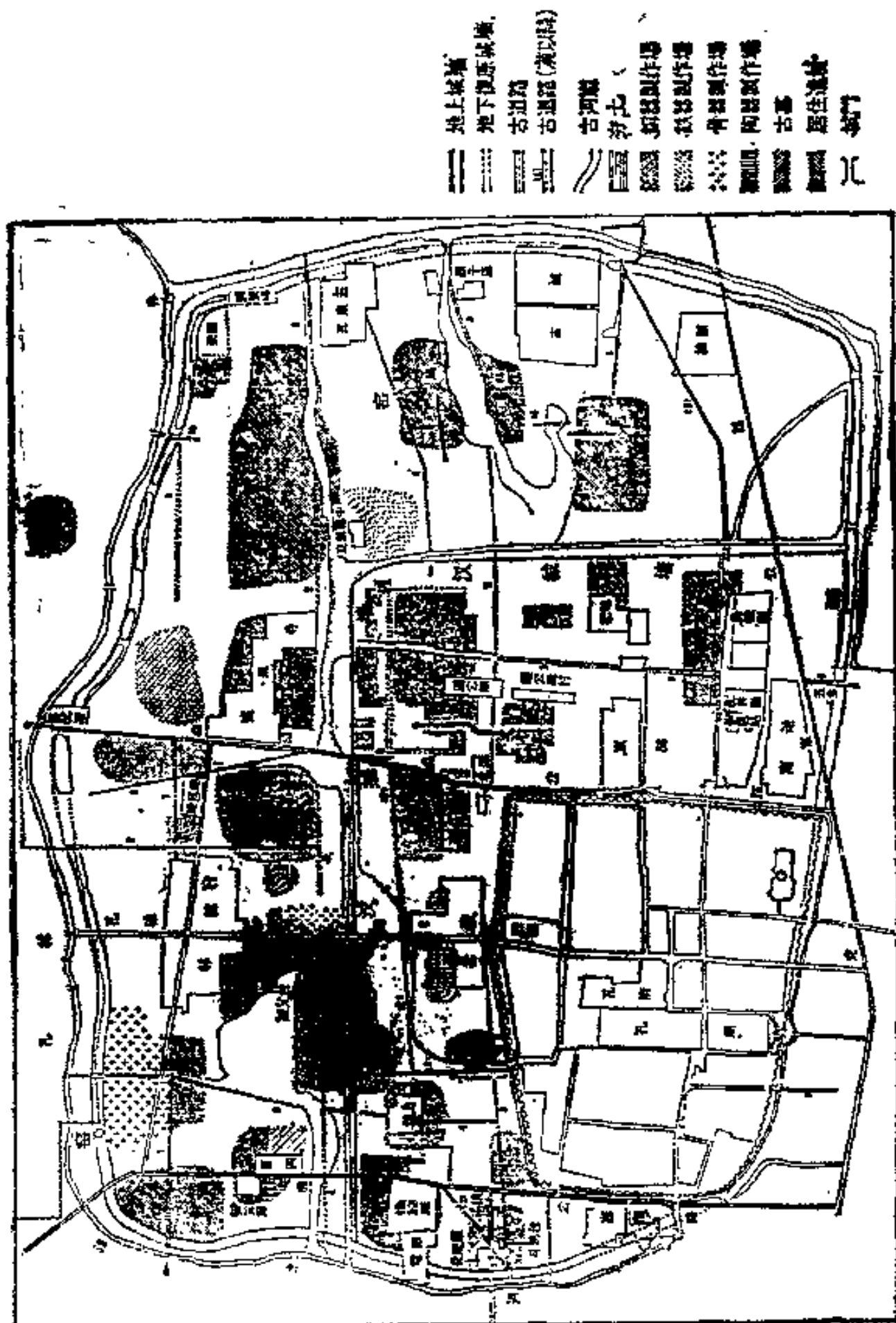
東門，當是魯僖公時代所擴建。《春秋·僖公二十年》載：“春新作南門。”杜預注：“魯城南門也。本名稷門，僖公更高大之，今猶不與諸門同，改名高門也。”《水經注·泗水》也說：“其遺基猶在，入地丈餘矣。亦曰雩門。”出這座城門正南1,735米處，沂水南岸，有雩壇，用于求雨的祭祀，即所謂“大雩”。魯僖公擴建這座城門，就是爲了“大雩”。9號大道也該是同時擴建的。

根據試掘結果，魯故城內遺址的時代，西部、北部早於東部、南部。宮殿區以北，今盛果寺一帶，是城內最大的居住遺址，遺址西部文化堆積厚2米以上，大致有五、六個文化層，從西周前期一直延續到漢代。魯城西北角內，今蘋果園西側的居住遺址，上層屬春秋時代，下層屬西周時代。靠近西牆南門有3號大道東西穿過的門鷄臺遺址，文化堆積也從西周前期一直到漢代。魯城內早期的手工業作坊，也分佈在北部和西北部。盛果寺的冶銅遺址開始於西周時代，延續到春秋。西北部今藥圃地方的冶銅遺址屬於西周後期。今位於藥圃北部和彈簧廠的製陶遺址屬於西周前期。在今周公廟高地的宮殿區，東西約長1公里，有規模宏大的宮殿遺址，上層屬於漢代，下層屬於春秋戰國時代，因未經大規模的發掘，還無法判斷西周的宮殿是否建築在這裡（參看圖14）。

總的看來，西周時代的主要居住區在城的西部、中央北部，手工業作坊也集中于西部、中央北部，西周晚期居住範圍擴展東北部，整個城的南部沒有發現早期的文化堆積。原來整個城是坐西朝東的，居住區和手工業區都偏于西部、中央北部。到春秋初期，爲了“大雩”，才開闢由宮殿區到南牆東門的大道，並擴建這座城門。這種“坐西朝東”的佈局結構，是和東都成周的

圖 14 曲阜魯國古城遺跡分佈圖

(採自《曲阜魯國故城》，齊魯書社1982年出版)



佈局一致的，但是魯國沒有採用小“城”連結大“郭”的格局，可能因為成周是王都，作為諸侯國的魯國，按禮制是不能效法的。

2 曲阜兩類墓葬和都城佈局

魯國故城內，墓葬基本上分佈在西部三分之一強的範圍內，東半部未發現墓地。值得注意的是，墓葬有甲乙兩組不同的類型，有不同的墓壙、禮俗以及隨葬品，很明顯屬於二個不同的部族。甲組墓地發現四處：(1) 故城西北部今藥圃處墓地，都是小型墓，主要屬於西周前期和春秋後期。(2) 靠近西牆南門的鬥鷄臺墓地，墓葬年代從西周初年延續到春秋初期。(3) 故城的西南部，在今縣城西北的墓地，都是春秋墓。(4) 解放初在西南部孔府後花園發現一座西周早期墓。乙組墓地只發現一處，在中部偏西北的望父臺，有大中型墓和小型墓，小型墓絕大部分是西周墓，大中型墓屬於春秋時代。

兩組墓葬各有其特點。乙組西周墓，墓壙較窄，寬度小於或等於長度的二分之一，有的只有長度的三分之一左右。尸體的頭向北，墓室沒有腰坑和殉狗。隨葬陶器一般只有鬲和罐，多數鬲只有一件，罐有二件以上。陶鬲仿銅器形式，不見有簋、豆、孟等陶器。另有九個西周墓隨葬有銅器，五個墓只有一鼎；一個墓有一鼎，一簋；一個墓有一鼎、二簋、一盤、一匜；一個墓有一鼎、一盃、一盤、一匜、一壺；一個墓有三鼎、二簋、二盃、二盤、二匜、一簋、一甗、一壺。有兩座墓出土有銘的銅器，墓主人叫魯伯忝和魯仲齊，後者官為司徒，肯定是魯國宗室成員。這樣以銅鼎、銅簋為主的銅器組合，肯定屬於姬姓的周貴族。

甲組的西周墓，墓壙較寬，寬度超過長度二分之一，尸體的

頭向南，墓室有腰坑和殉狗。隨葬陶器組合的器形種類較多，流行袋足鬲、圈足簋和豆，還有罐、盂、罍等，常常組成偶數的組合。甲組的春秋墓，頭也大都向南，腰坑、殉狗的風俗已消失。我們以甲組西周墓出土的陶器，和附近居住遺址出土陶器作比較，陶鬲、陶豆的形制基本相同，可知甲組墓葬即屬於居于都城以內的多數居民，即所謂“國人”。

魯國從西周初年起，就實行“國”“野”對立的鄉遂制度，有所謂“三郊三遂”。魯國軍隊就是以周貴族為骨幹，並以“三郊”的“國人”編制而成。魯國的“國人”主要是伯禽受封時所分得的“殷民六族”（《左傳·定公四年》）。《周禮·秋官·司約》賈公彥疏引《左傳》舊注，解釋“殷民六族”說：“殷民，祿父之餘民三十族，六姓也。”六姓共三十族，大體以十族為一“郊”，分設為三“郊”。春秋初期魯僖公有“公車千乘”，“公徒三萬”（《詩·魯頌·閟宮》）。如果像齊桓公時期齊國那樣從“國人”每家抽一人入伍的話，“公徒三萬”當來自“國人”三萬家。那時魯的“三郊”已有三萬家，每“郊”一萬家。當然，西周初期魯的“國人”戶數應該比較少。我們認為，現在發現的甲組墓，就是“三郊”的“國人”，也就是“殷民六族”後裔的墓葬，所以他們所用陶鬲的形制，不同于周人而接近殷人，類似殷墟出土的陶鬲。

魯國都城中，確實住有周貴族和“殷民”後裔兩種不同禮俗的集團，直到春秋末年還是這樣。陽虎在魯國掌握政權，曾經“盟公及三桓於周社，盟國人於亳社”（《左傳·定公六年》）。因為魯公和三桓是周貴族，必須在周社結盟，而“國人”原是“殷民”後裔，必須在亳社結盟。亳是殷的發祥地，又曾是湯的國都，因而殷民的神社稱為亳社。結盟的禮俗，周人和殷人既然不同，各有其神社，葬俗當然也不同了，這是魯國故城內所以會出現兩種

不同禮俗墓葬的原因。現在發現的甲乙兩組墓，春秋戰國時代的資料不全，甲組墓只有春秋時代的，乙組墓只有戰國時代的，但是以甲組的春秋晚期墓，和乙組的春秋末年、戰國早期墓作比較，還是可以看出兩者有顯著的區別。甲組的陶器組合，以簋、蓋豆、華蓋壺等圈足器為主，都有蓋；而乙組的陶器組合，以釜、罐、壺、鬲為主，都不帶圈足，沒有蓋豆；壺是罐式平底壺，與甲組的華蓋壺大不相同。說明直到春秋末，戰國初，兩族人的不同風俗還頑強地保持着，沒有融合起來。這就是陽虎必須分別要盟於周社和亳社的原因。

我們從墓地的位置來看，甲組墓地在藥圃、鬥鷄臺、縣城西北角，都在靠近西城牆的地區；乙組墓地的望父臺，雖然也在城的西北區，但比較靠近中心區。看來當時兩族人的居住區和墓葬區是鄰近的，周貴族主要住在城的中北部，而作為“國人”的殷民後裔，則住在城內靠西城牆一帶，這就是“三郊”的所在。

從魯國故城發現的兩種不同墓地，可以看到，它雖然沒有小“城”和大“郭”相結合的佈局，但是在一個大城內，分別有周貴族和“國人”的居住區及其墓地，這和當時的鄉遂制度有關。

① 山東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山東省博物館、濟寧地區文物組、曲阜縣文管會編：《曲阜魯國故城》，1982年濟南齊魯書社出版。

七 春秋戰國中原諸都城的西“城”東 “郭”連結佈局

1 齊國都城臨淄

春秋戰國時代諸侯的都城，保存比較完整，已經過初步調查

鑽探的，有齊國都城臨淄（在今山東淄博市）、鄭國韓國都城新鄭（在今河南新鄭縣）、晉國都城新田（在今山西侯馬市）、魏國都城安邑（在今山西夏縣）趙國都城邯鄲（在今河北邯鄲市）、楚國都城郢（在今湖北江陵縣）、秦國都城雍（在今陝西鳳翔縣）。其中除郢、雍以外，都在中原地區。中原諸都城有共同的佈局特點，就是由西“城”和東“郭”相結合。據我們推測，這種佈局是西周初期東都成周開創的，我們在前面已經談到。到春秋戰國時代，隨着諸侯中有不少大國的出現，又從大國爭霸一直到先後稱王，於是這種王都的佈局被先後採用了。

根據文獻記載，西周初年呂尚（太公望）受封於齊，建都營丘。到周夷王（公元前887—前858年）時，齊胡公（公元前884—前860年）徙都到薄姑（今山東博興東南），齊獻公又徙都臨淄（《史記·齊世家》）。但是從來注釋者，有的認為營丘即是臨淄，有的認為另是一地^①，關於這點，目前還不能作出正確的論斷。

臨淄故城東臨淄水，西依系水（今稱泥河），由西南小“城”和東北大“郭”連結而成。周圍有城濠。小城呈長方形，其東北部伸進大郭的西南角，兩相銜接。小城東牆長2,195米，西牆長2,274米，曲折多彎；北牆長1,404米，南牆長1,402米。大郭呈不規則長方形，北牆長3,316米，西部因系水關係有拐彎。東牆長5,209米，因淄水關係有多段拐彎，西牆長2,812米，南端與小城北牆相接。南牆長2,821米，西端與小城東牆相接（參看圖15）。

小城在大郭的西南角，從其城門和道路的佈局來看，是坐西朝東的，以東門、北門為正門，尤以東門為重要。小城有城門五座，東、西、北三面各有城門一座，南面有城門兩座。其中東、北二門是通向大郭的門道，都有門闕建築，東門的門闕比較凸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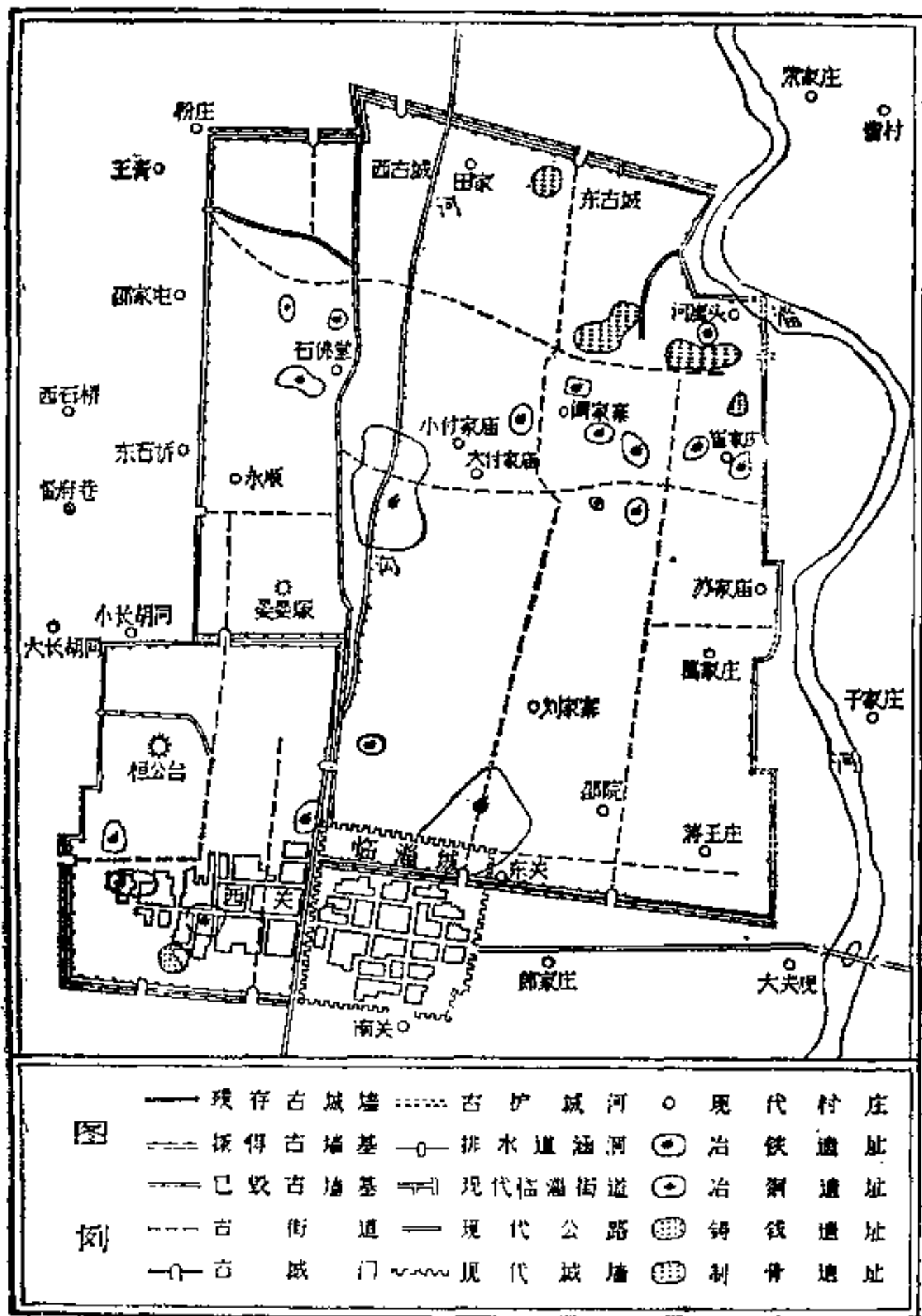


圖15 臨淄齊國古城平面圖

(採自楊寬《戰國史》卷首圖版,上海人民出版社1980年出版)

東門在東牆偏北地方，門道寬14米，門道外口兩側城牆向前有較大凸出部分，其上原來該築有門闕。北門在北牆中部，門道寬10米，門道外口兩側也向前略有凸出，其上原來也該築有門闕（參看圖16）。門道裏口兩側並有夯土基地與城牆相連，當是城門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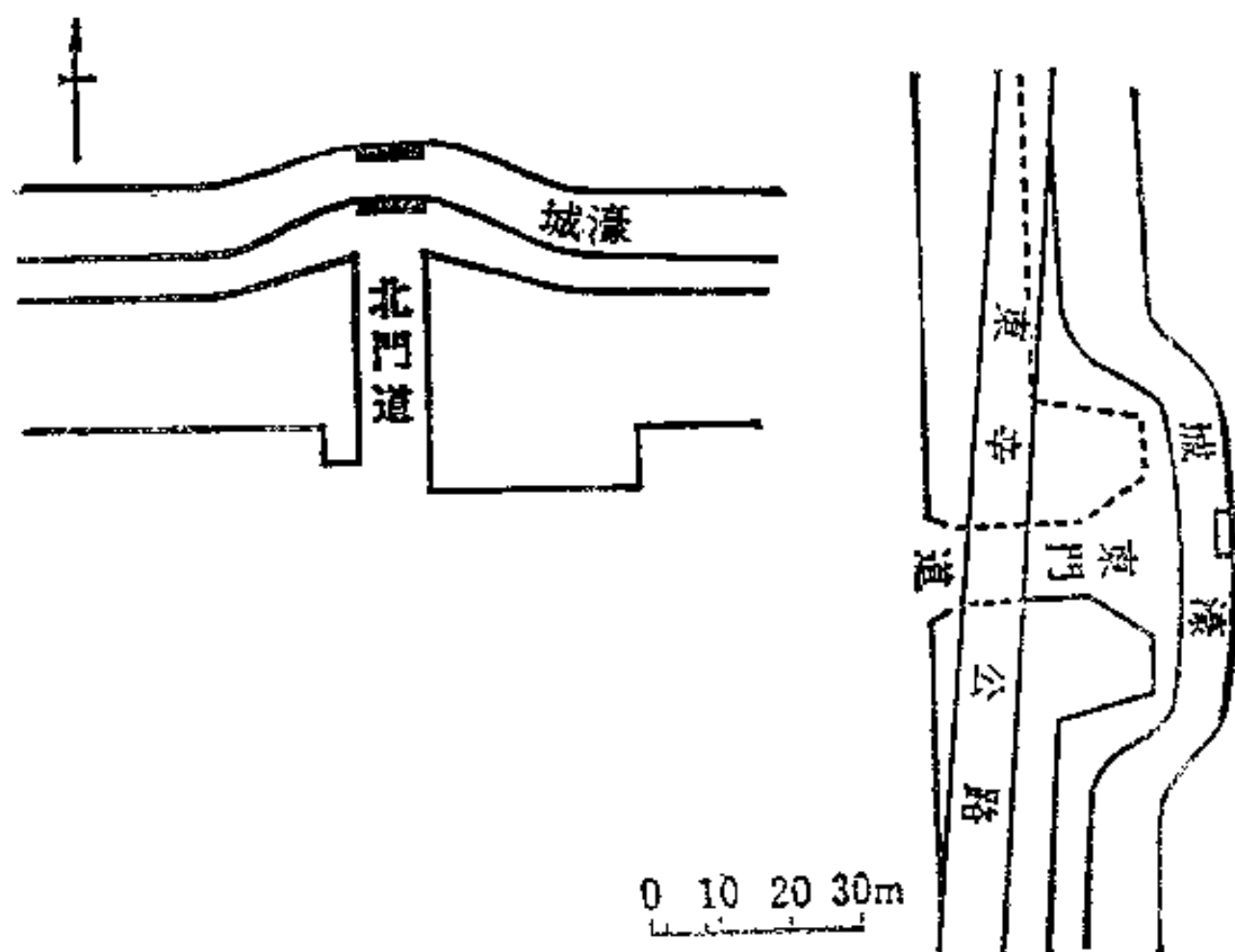


圖16 臨淄齊國古代的小城東門、北門及其城濠

（採自《臨淄齊國故城勘探紀要》，《文物》1972年第5期）

附屬建築，可能用於防衛。小城東牆和北牆在大郭內的部分，牆外都有城濠，而且要比南牆和西牆的城濠寬出近一倍，達25米左右，城濠通過東門和北門前有拐彎，寬度變狹，原來架有橋梁。小城南牆東門門道寬8.2米，南牆西門門道寬13.7米。小城西牆城門在南部，門道寬20.5米，門內南側有夯土基地與城牆相連，當有建築供防衛之用。

宮殿基址在小城的北部偏西地方，以所謂桓公臺為中心（參

看卷首圖版六)。小城交通大道都以宮殿區為中心。從北向南的北門大道(寬6—8米),通過宮殿區西側,南下與從西向東的西門大道(寬17米)相連接。從東向西的東門大道(已被破壞),向西通往宮殿區,中間與從南向北的南牆東門大道(寬8米)相接連。

大郭有城門八座。西牆一門在南部(寬11米),北牆有東門(寬17米)和西門(寬13米),南牆也有東門(寬11米)和西門(寬13米)。東牆有北、中、南三門,都被淄水衝壞,北、中二門尚有遺跡可尋。大郭內有橫貫東西兩條大道偏于北部,一條由東牆北門西行。略偏西北,直到西牆,路寬15米;另一條由東牆中門西行,略偏西北,到西部南北向河道中斷,路寬17米。縱貫南北的大道也有兩條,偏于東部。一條從城東北角穿過二條東西向大道,直通南牆東門,路寬20米。另一條從北牆東門穿過二條東西向大道,直通南牆西門,路也寬20米。東西向二條大道和南北向二條大道,相互交叉在河崖頭村,闕家寨村一帶的韓信嶺高地,說明這一帶是大郭中最繁華之區,文化堆積比較厚,曾發現西周晚期、春秋、戰國到漢代的堆積文化層^②。據文獻記載,春秋時代臨淄城中已有稱為莊的“六軌之道”,又有稱為嶽的里,在北門以內,內宮以北。到戰國時代,莊和嶽一帶極其繁榮,所謂“莊嶽之間”,是齊國人口最密集的地方。西漢初年仍然很繁華^③。估計該在韓信嶺高地一帶。

根據最近的考古調查,可以斷定臨淄大郭的時代早於小城。檢查大郭西南角和小城交接的地方,把交接處的截面解剖,可以證明大郭原來作完整的長方形,它的所以缺掉西南的一角,是小城建築的時候伸進來而截去的,現在大郭的西牆還有一段向南延伸到小城內的殘迹一百多米,足以證明。同時,大郭的東北角曾發現有人殉的奠基坑。築城郭的時候殺人來奠基,應該

是早期的一種禮俗。大郭東北部河崖頭村還曾發現西周、春秋時代墓地，有一座“中”字型春秋時代國君的大墓，墓室已被盜，而東、北、西三面有一個環繞的大殉馬坑，殉馬總數達600匹（參看卷首圖版一）。從已發掘的先秦古城址來看，早期貴族的墓葬往往就葬在居住區的附近。因此這一帶很有可能是早期齊國國君的宮殿區所在。當齊國最早建都臨淄時，只築有一個大城，他們仍然沿用商代的禮制，把宮殿造在城內東北部，所以大城的東北部文化堆積層最厚。大城的西部有一條南北向的河道，從北牆西門以東地方，向南直通到小城的東北角。河道以西的地勢較低，文化堆積較淺，不是古人主要的活動地區。目前有一種看法，認為東北部的韓信嶺高地就是齊國建都營丘^④，這只是一種推測，還有待於作進一步考古調查來解決。

據考古調查，臨淄大郭的建築可以早到西周時代，而小城的建築則在戰國時代。到春秋戰國時代，由於社會經濟的發展，成為手工業和商業很發達的城市。戰國時代有七萬戶，西漢初年發展為十萬戶，這是它的全盛時期。據調查，手工業作坊主要分佈在大郭東北部和小城南部。大郭東北部的冶銅遺址屬於春秋前期，又發現大塊冶鐵遺址屬於戰國時代。城西石佛堂一帶也發現有大塊戰國冶鐵遺址。小城南部發現有冶銅遺址和鑄造齊刀貨幣的遺址，屬於戰國時代。

2 鄭、韓都城新鄭

西周末年鄭國從原封地（今陝西華縣東）遷移到洛水以東地區，春秋初年鄭武公兼併郟、東虢等國；建都新鄭（今河南新鄭縣）。戰國初期韓哀侯（公元前376—前375年）滅鄭，從陽翟（今河南禹縣）遷都新鄭。因而新鄭連續為鄭、韓兩國的都城（參看卷

首圖版八)。

新鄭故城東南靠洧水(今名雙洎河),西北靠黃水,位于二水交接的三角地帶,呈不規則的方形,東西長約5,000米,南北長約4,500米。中間有一道南北向的隔牆,長4,300米,分成西“城”和東“郭”兩部分⑤(參看圖1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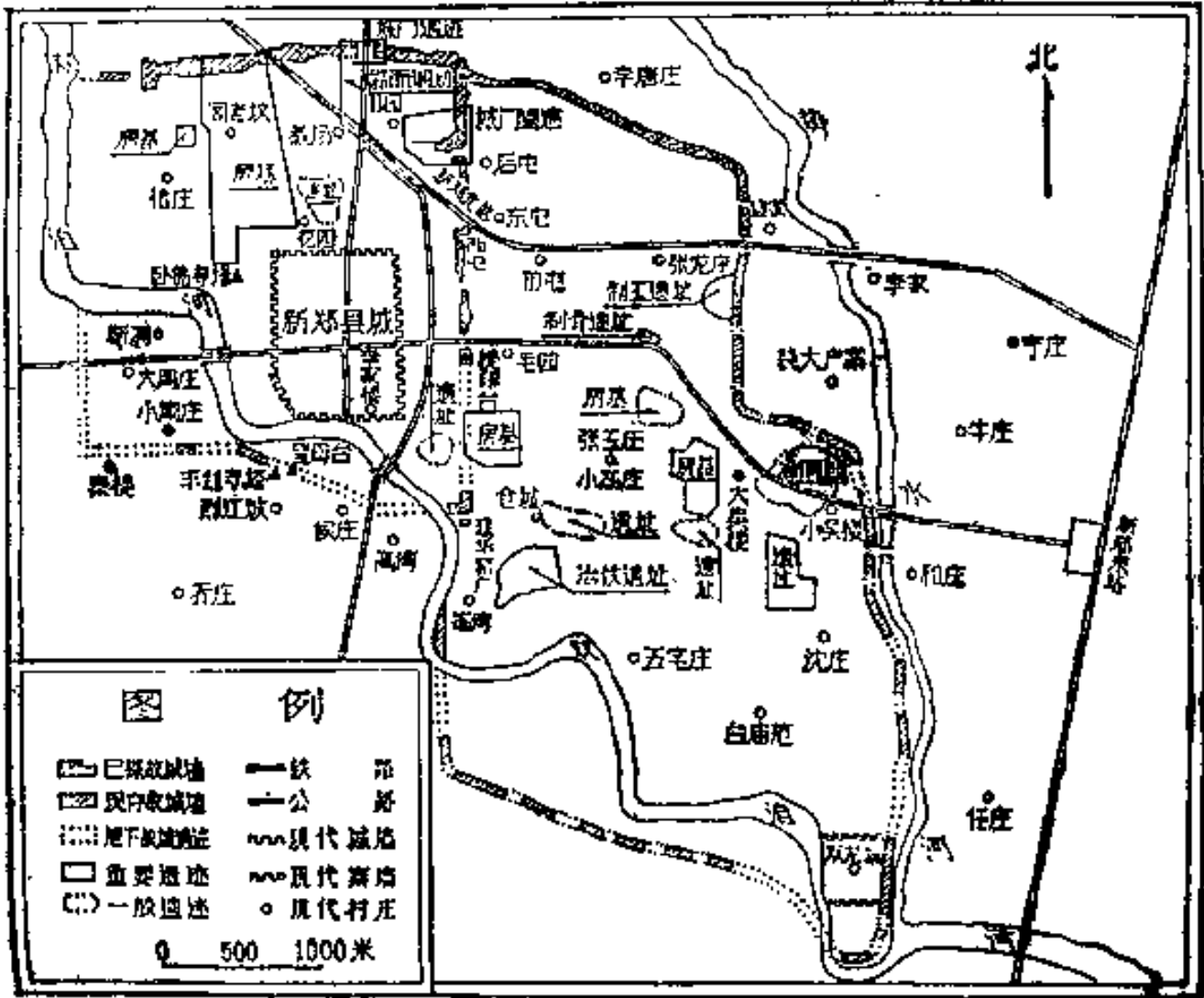


圖17 新鄭鄭韓古城平面圖

(採自楊寬《戰國史》卷首圖版,上海人民出版社1980年出版)

西“城”位於東“郭”的西北。中北部分佈密集的建築基址,中部有長方形宮牆,東西寬約500米,南北長約320米。宮牆內當為宮殿建築所在。宮牆以北有貴族居住區,西北部發現大型儲藏食品的窖穴。西“城”北牆中部有北門,門內兩側有長方形建築基址,隔牆北段又有東門,門內兩側也有長方形建築基址。東“郭”

東牆北段，靠裴大戶寨，有東門，門內南側有長方形建築基址。這些城門口內側的建築可能都用于防禦。從目前所得考古資料來看，西“城”的建築較早，東“郭”的城牆是後來修築的。從文獻記載來看，春秋前期已有郭和郭門，郭門以內有大道叫做“逵”或“大逵”，大道上設有“市”叫做“逵市”。但是，這時的所謂“郭”或“郭”，是“依水為城”，利用洧水、黃水等隄防連結而成，並不是四面建築有完整的郭城^⑥。現在的郭城遺址，當是春秋晚期或戰國時代建成的。

新鄭故城和臨淄故城的佈局基本相似，小城都連結在大郭的西邊，只是臨淄的小城在大郭西南，而新鄭的小城則在大郭西北，新鄭的大郭面積遠較臨淄為小。但是，整個西“城”和東“郭”的佈局，都是坐西朝東的，是以東門為正門的，手工業作坊和市區，主要都分佈在東郭內。

東郭主要有冶銅、鑄鐵、製骨遺址。東部小吳樓村有春秋戰國時代冶銅遺址，面積達十多萬平方米。遺址東北部邊緣，發現戰國文化層壓着春秋文化層。春秋文化層中發現有熔銅爐、木炭屑，陶範等。陶範主要是鑿、錘、銼、鑿等工具，以鑿範較多。戰國文化層中也發現有鑄銅爐、陶範等。東郭西南部倉城村南有戰國鑄鐵遺址，面積約四萬多平方米，出土有殘爐、烘範窯、陶範及鐵器等，陶範有鑿、鋤、錘、銼、刀、削、鑿、鏟、劍、戟、箭杆、帶鈎等十多種，出土鐵器也都是工具。東郭東北部張龍莊南還有春秋戰國製骨遺址，面積七千多平方米。同時東郭還有“逵市”存在。東郭中手工業作坊和市區的繁榮，該是春秋戰國時代社會經濟發展的結果^⑦。

3 晉國都城新田

近二十多年來，在今山西省侯馬市西北發現一組古城，位於汾水的東南，澮水以北。其中侯馬以西、侯河公路以北的白店（或稱白澗）古城屬於早期，牛村、平望、神臺、馬莊、呈王等五個古城屬於晚期，該即春秋中期以後晉國都城新田。平望、牛村、神臺三座古城，長寬都在1,000米以上，面積大小不等，相互連結成“品”字形，是這組古城中的主要部分。在這三座古城東北1公里多又有馬莊古城，在這三座古城以東1公里多又有呈王古城，馬莊和呈王面積較小，長寬不過3百米到5百米（參看圖1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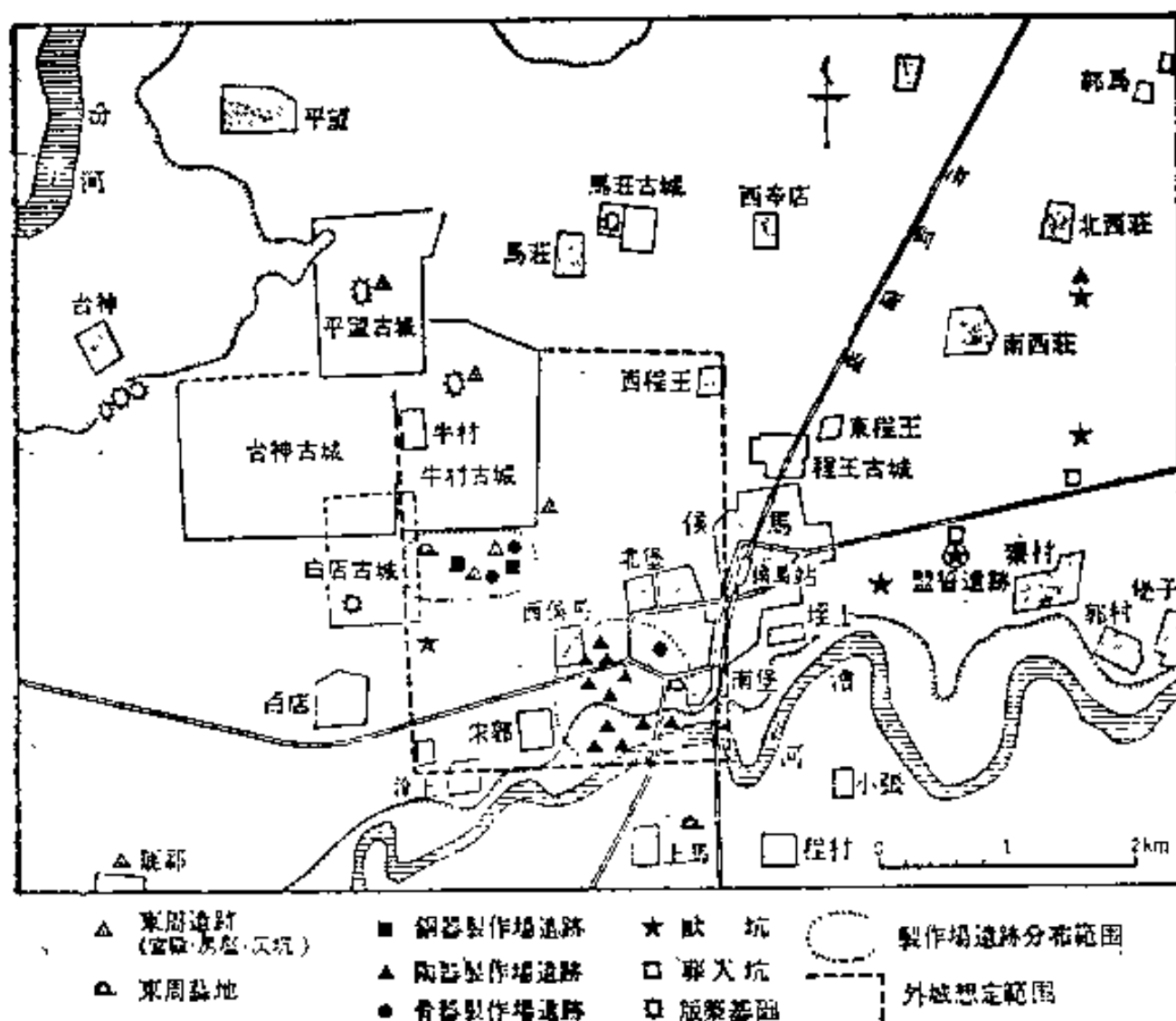


圖18 山西省侯馬市晉國新田古城平面圖

（採自日本江村治樹《侯馬盟書考》，收入《內田吟風博士頌壽紀念東洋史論集》，日本同朋社1978年出版）

許多宮城靠近或相互連結的設施，可能是春秋後期晉國都城的一個特點，後來為戰國時代趙國所沿用。現在已公佈的考古資料，只有牛村和平望古城部分^⑧。

牛村古城平面呈不規則的長方形，東西寬約1,100—1,400米，南北長約1,340—1,740米。西牆和南牆比較方正，東牆由東北偏向西南，北牆由西北偏向東南。平望古城東南角伸進牛村古城西北角，使牛村古城西北角成為90度的曲尺形，曲尺形的西牆和南牆都長300米。平望古城也是長方形，東北角有向外突出部分，面積較牛村古城小些。

牛村古城和平望古城都屬於宮城性質，城內有宮殿建築遺址。牛村古城的宮殿建築遺址在城內北部正中，平面呈正方形，每邊長52米，高6.5米，南緩北陡。平望古城的宮殿建築遺址，北距平望村1,200米，總高8.5米。臺基有三級，第一級基地方形，長寬各75米，南部邊沿正中有向南凸出長方形夯土臺，寬約30米，中部向南又有土路，寬約6米。第二級高出地面約4米，南部邊沿正中成坡形。第三級位於第二級的北半部，南北長35米，東西寬45米（參看圖19）。

在牛村古城東南有冶銅、製陶、製骨作坊遺址。東南2.5公里處有盟誓遺址，正東3公里和向南半公里有獸坑羣，坑的分佈有一定次序，二坑或四坑為一組，所埋的牲畜，馬最多，羊較少，牛更少，它們還有玉璧、玉璜等玉器隨葬，當是晉國郊祀用的犧牲。在古城以南2公里，滄水以南，有集中的墓地。看來古城的東南2到3公里以內，是“郭”的區域，至今還沒有發現郭城的建築遺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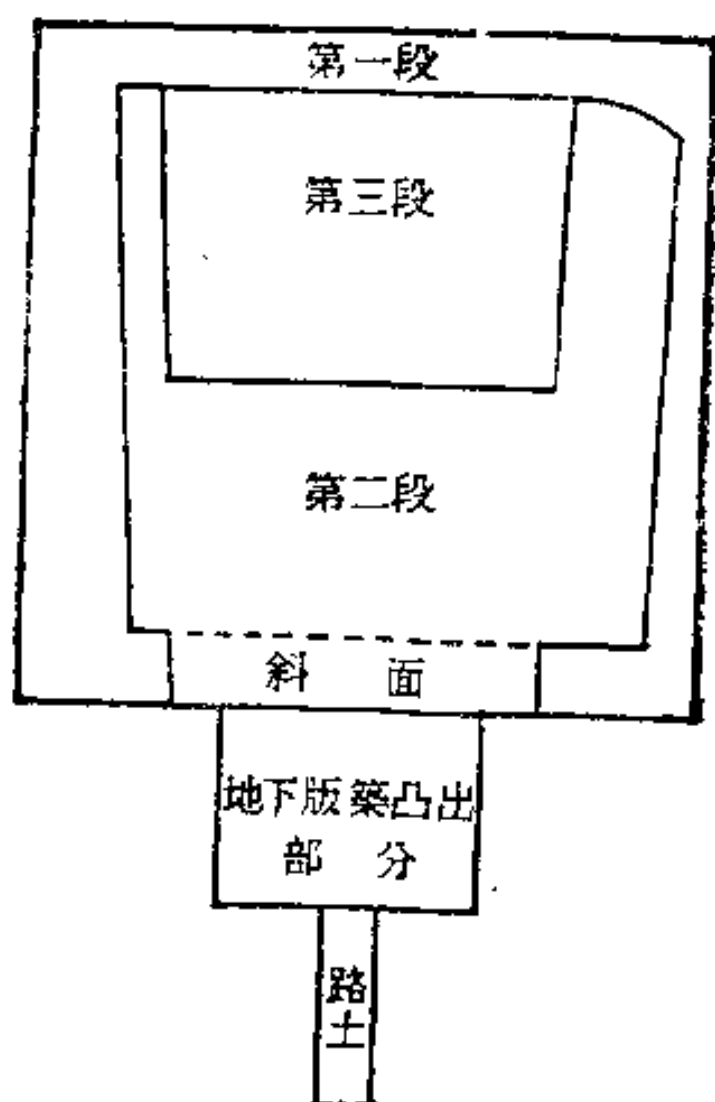


圖19 平望古城內宮殿遺址

(採自《侯馬地區古城址的新發現》，《文物參考資料》1958年第12期)

4 秦國都城雍

雍是春秋時期秦國的都城。秦德公元年（公元前677年）從平陽（今陝西寶雞縣東）徙都到雍，直到戰國初年，秦獻公二年（公元前383年）才從雍徙都櫟陽（今陝西富平縣東南）。秦國在雍建都有二百八十多年之久。此後秦國雖然建設新都，但仍然沒有廢棄這個曾經長期建設的舊都，宮殿和宗廟依然繼續使用，特別有些傳統的重要禮儀，還是要到雍的祖廟來舉行。直到秦始皇時還是如此。按照秦國禮制，秦王到二十二歲，必須要到雍

的祖廟舉行成年的“冠禮”，舉行“冠禮”以後才能親自處理政務。根據《史記·秦始皇本紀》，秦始皇九年（公元前238年），秦王政年二十二歲，四月住宿到雍的蕪年宮，在己酉這天“王冠、帶劍”。當時嫪毐作亂，“將欲攻蕪年宮”，《正義》引《括地志》云：“蕪年宮在岐州城西故城內”。秦王政所以必須到雍舉行“冠禮”，因為“冠禮”必須在祖廟舉行，而秦的祖廟在舊都雍。正因為這樣，這個舊都一直為秦的國君所重視，除了原有的宮殿和宗廟以外，還有新的行宮的建設。

雍原來只是個宮城，稱為大鄭宮。《史記·秦本紀》載：“德公元年初居雍城大鄭宮。”《正義》引《括地志》云：“岐州雍縣南七里，故雍城，秦德公大鄭宮城也。”此後秦君還建有不少的宮和寢。根據《秦紀》（附於《史記·秦始皇本紀》末段），德公居大鄭宮，宣公居陽宮，康公、共公居雍高寢，桓公居雍太寢，景公居雍高寢，悼公“城雍”，躁公居受寢。所說“悼公城雍”，可能是擴大建築雍的城垣。根據《漢書·地理志》，秦孝公曾在此建橐泉宮，秦昭王曾在此建械陽宮。

雍古城，在今陝西鳳翔縣城南，南靠雍水，整個城址呈不規則的方形，東西約寬3,300米，南北約長3,200米。地面上只見片斷的城牆殘迹。經鑽探，發現了西城牆的大部分和東、南、北城牆的一部分。西城牆從西北偏向東南，南城牆沿雍水修築，有些曲折。在西城牆發現一座城門，寬約10米^③（參看圖20）。

雍的主要宮殿和宗廟建築，都在城內偏西南的中部地區。在今馬家莊的3號建築遺址，規模巨大，共有五進院落，是目前所發現的最完整的先秦宮殿的佈局，包括外朝、內朝的朝廷以及寢宮在內。整個建築四周有圍牆，從南到北，分成五進院落。全長326.5米，北端寬86米，南端寬59.5米，面積21,849平方米。每一

落中没有建築，只有大庭，當是“外朝”所在。第二院落中部偏北兩側，分別有一座南北長16米、東西寬12.5米的建築，面積均為200平方米，當是東廂和西廂，是臣下等候處理政務或準備朝見的地方。第三院落南北長度增加到82.5米，面積約5,000平方米，中心有南北長17米、東西寬32到34米的建築，面積約580平方米，當即“內朝”的朝堂。第四院落東西寬度增加到70米，南北長51米，面積3,570平方米，院內只有大庭，沒有建築。第五院落東西寬度增到86米，南北長65米，面積5,590平方米，是五進院落中面積最大的。院內正中偏北及其前方兩側，各有一座建築，呈“品”字形排列，大小相等，均寬17米，長22米，面積374平方米。南邊中間大門兩側有狹長的長方形建築，均東西寬35.85米，南北長7.5米，面積269平方米。這個院落當即寢宮所在（參看圖21）。

在這座宮殿遺址以東約500米處，另有馬家莊1號建築遺址，這又是目前所發現的最完整的先秦宗廟的遺址。北部居中的祖廟，東部居中的昭廟和西部居中的穆廟，排列成“品”字形結構。祖廟坐北朝南，昭廟坐東朝西，穆廟坐西朝東，都面對中間的中庭。三廟的形制大體相同，平面呈“凹”字形，面闊20.8米，進深13.9米。“凹”字形的前部正中，即是“廟堂”所在，後部接連有“寢宮”。中庭東西寬30米，南北長34.5米。南邊中間大門兩旁有建築，南半都已殘缺，當即門塾。中庭是舉行祭祀的地方，共發現祭祀坑181個，其中牛坑86個，羊坑55個，牛羊同坑1個，人坑8個，人羊同坑1個，空坑28個，車坑2個。在祖廟以北，正中有小型的長方形建築，東西寬5.4米，南北長3.8米，作何用途有待研究^⑩（參看圖22）。

在上述馬家莊的宮殿遺址以西約600米處，另有姚家崗宮殿遺址，曾出土春秋早期的銅質建築構件，附近又發現大型的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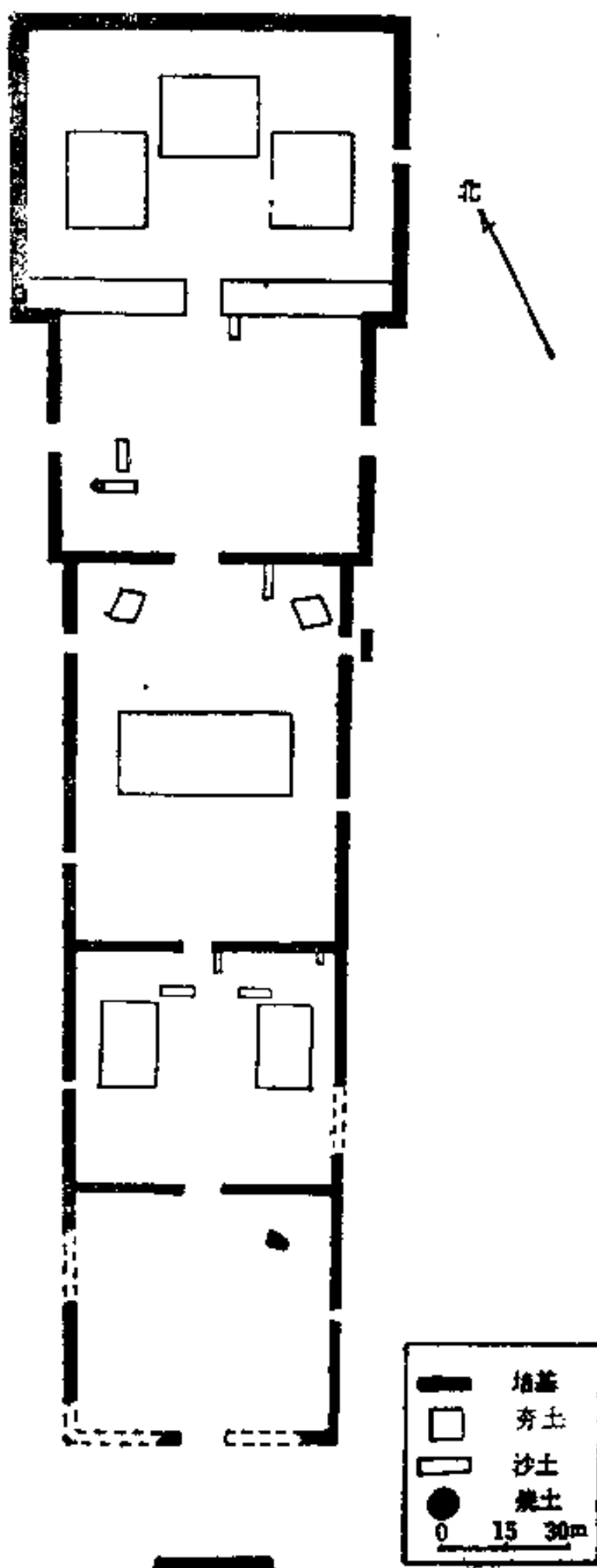


圖21 秦都雍城鑽探與試掘簡報，《考古與文物》1985年第2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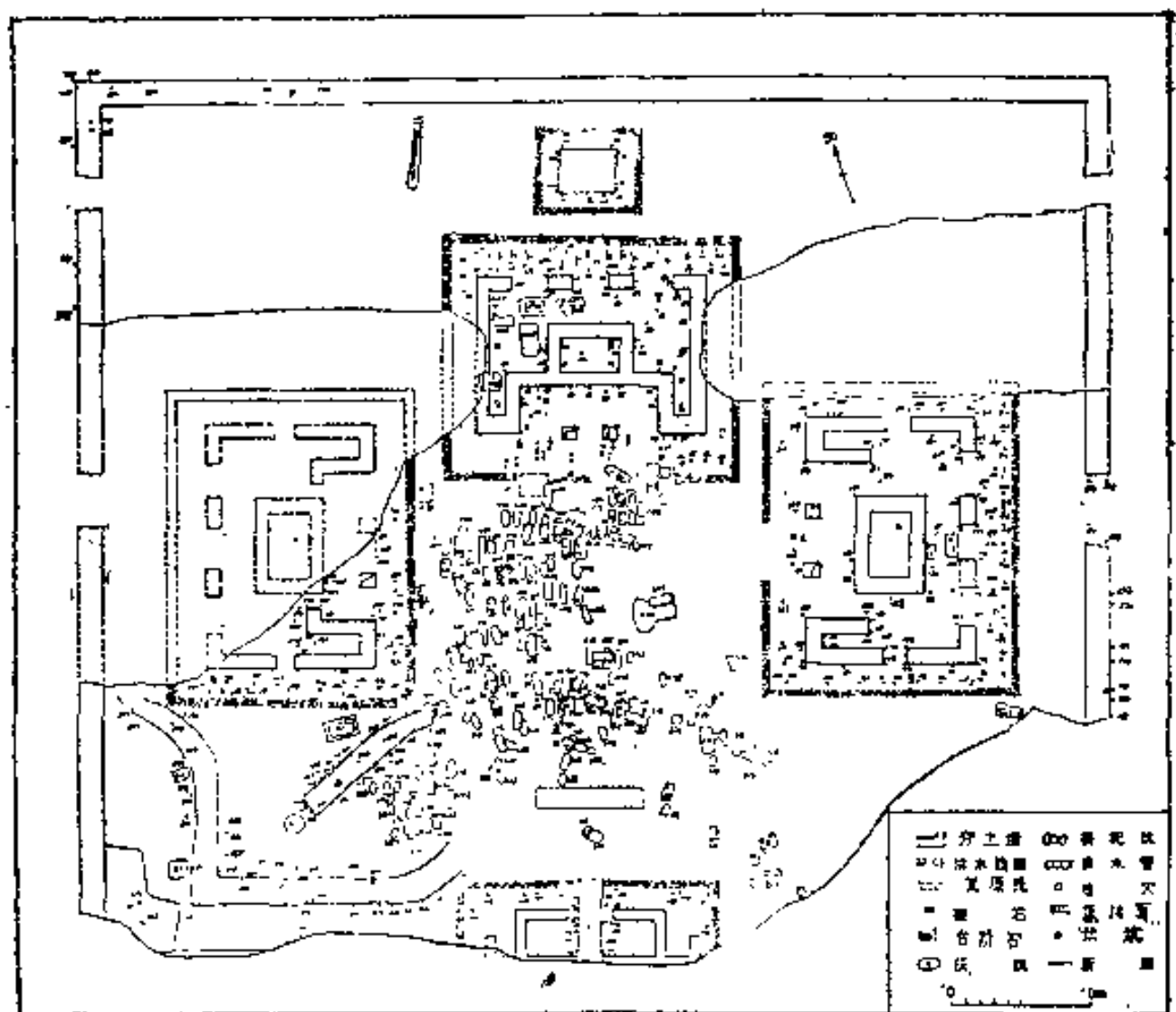


圖22 秦都雍城宗廟佈局遺跡

(採自《鳳翔馬家莊一號建築基址發掘簡報補正》，《文博》1986年第1期)

形窖穴，有東高西低的排水道，考古工作者推測是藏冰的設備，即《詩·豳風·七月》稱為“凌陰”的冰室。

秦都雍城以西南作為君主和貴族的居住區，是很明顯的。不僅宮殿和宗廟都造在城內偏西南地區，而且墓葬也都在城外的西南地區。在古城西南、雍水南岸的高莊、東村、八旗屯一帶，分佈有許多秦國小墓羣；在八旗屯西南的南指揮、西村以南，又是秦的國君的陵區，已發現“秦公陵園”十三座，陵園都坐西朝東，陵墓也都在陵園的西南部。就這點看來，雍的佈局是和中原各國

都城制度一致的。

【追記：雍城的城內，總面積約11平方公里，除了西南部（今馬家莊、姚家崗一帶）發現宮殿和宗廟遺址以外，還曾在東部和東北部（今高王寺、鳳尾村一帶）發現戰國時代建築遺址，又曾在東北部發現戰國時代“市”的遺址，在“市”以西的中部和西部發現八條“井”字形交錯的街道遺址。“市”的遺址，發現在北城牆南面偏東300米處，四周有長方形的圍牆，南北長160米，東西寬180米，牆基厚1.5到2米多。四面圍牆的中部各有一座“市門”，已發掘的西門，南北長21米，東西寬14米，建築平面呈“凹”字形，進門入口處有大型的空心磚作為踏步。從四周的柱洞及堆積的瓦片來看，門上有四坡式的大型屋頂，圍牆裏是一個市區，面積近30,000平方米，這又是目前所發現的先秦最完整的“市”的結構。在“市”的西邊30米處，發現了城內南北向的四條大街，和東西向的四條大街相互縱橫交錯成“井”字形。其中東西向的四條大街，通向東西兩面的城門，看來整個城的佈局是坐西朝東的。每條大街約長3,000米，街面寬達15到20米，路土厚度約1到1.5米。平行的兩街之間的距離，約為400米到800米。已發現的馬家莊、姚家崗宮殿和宗廟遺址，就在西部這些街道之間。雍城雖然沒有發現像中原地區諸侯國都那樣西邊宮城連結大郭的佈局，但是它以西南作為君主與貴族的居區，把市區和一般居民區設在東北，還是和中原各國的都城佈局相同的。以上根據1986年5月20日新華社西安電。】

5 趙國都城邯鄲

邯鄲，春秋時代原屬衛國，後屬晉國。趙敬侯元年（公元前386年）從中牟（今河南省鶴壁市）遷都到邯鄲，從此邯鄲長期成

爲趙國都城。

趙國邯鄲故城的宮城，如同晉國都城新田一樣，採用多城連結在一起的佈局方式。俗稱“趙王城”。由三個宮城連結組成，成爲不規則的“品”字形。西城近正方形，每邊長1,400米左右。城中部偏南有宮殿建築臺臺基，今稱“龍臺”，東西寬265米，南北長285米，東部最高點19米。東城與西城連接，東城的西牆即是西城的東牆，作長方形。南北長度與西城相等(1,400米左右)，東西只寬935米。西部靠近城牆，南北相對有兩座建築臺基。北城連結東城和西城，北城的南牆即是東城的北牆和西城北牆的東端。全城呈不規則長方形，東牆中部凹進。東西寬1,326米，南北長1,557米。偏西部有建築臺基(參看圖23)。

趙王城的西城和東城是早爲大家知道的，北城是1965年才發現的。1972—1973年間，在“品”字形趙王城的東北，發現了一座規模較大的“郭”，“郭”的平面呈不規則長方形，除少數小段露在地面以外，大部分城址都埋沒在地下。東西寬約3,000米，南北長約4,800米，戰國文化層一般都要在地下7—8米深處。大郭內普遍有戰國、漢代文化層，戰國文化層比較厚，最厚處可達2米。大郭的建築年代要比趙王城爲早^⑩。大郭內東北部有一座“叢臺”，高達26米，在今邯鄲市中華路西側人民公園內。這個叢臺原是戰國的建築，西漢初年成爲趙王宮內游樂用的臺。《漢書·高后紀》載：高后元年“夏五月丙申趙王宮叢臺災”。顏師古注：“連聚非一，故名叢臺，蓋本六國時趙王故臺也，在邯鄲城中。”《水經注·濁漳水》也說：“其水(牛首水)又東逕叢臺南，六國時趙王之臺也。……今遺基舊壙尚在。”叢臺是因許多高臺基組成而得名。1963年8月邯鄲大雨成災，叢臺東南面塌坍，從斷面可以看到，叢臺的土分內外兩層，內層是夯土，夯層8—12公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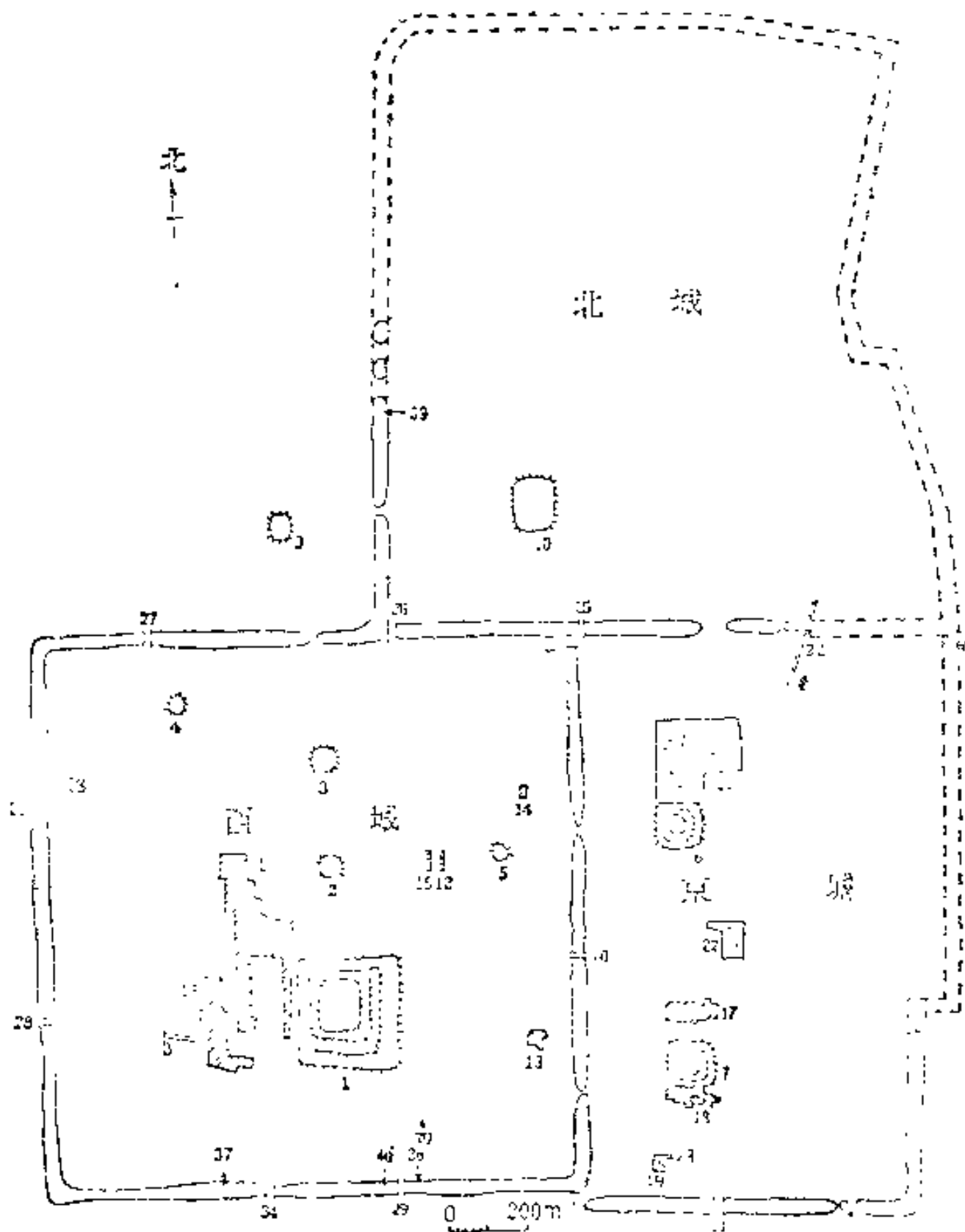


圖23 河北省邯鄲市趙國古城宮城遺址平面圖

(採自《趙郡邯鄲故城調查報告》，《考古學集刊》第四集，1984年出版)

1—10號原記錄號為夯土臺1—10；11—20號原記錄號為地夯1—10；21、22號原記錄號為地下遺迹1、2；23、24號原記錄號為道路1、2；25—35號原記錄號為門闕1—11；36—38號原記錄號為甬道1—3；39、40號原記錄號為排水槽道1、2。

小圓夯窩，與邯鄲戰國城牆築法相同。在夯土中夾雜有戰國陶片及瓦片，可知叢臺確為戰國時代趙國的建築，當為早期宮殿的所在。

趙國都城邯鄲的佈局，也和齊國都城臨淄基本相同，宮城在大郭西南，只是宮城由三個小城組成“品”字形，城牆不和大郭連結（參見圖24）。

【追記：根據《趙都邯鄲調查報告》（《考古學資料叢刊4》，1984年出版），可以更加看清邯鄲的宮城和大郭的佈局。連結成“品”字形的宮城，所謂“趙王城”，是以地處西南的西城作為主體的。西城中部有南北向並列的三個正方形建築臺基，最南的1號臺基（俗稱“龍臺”），規模最大，南北296米，東西264米，四面呈梯田形，由下而上，有五層到八層不等。頂部比較平整，南北132米，東西102米，高度東部為16.3米。在1號臺基以北的2號和3號臺基，面積僅及1號臺基的二十五分之一，高度僅及1號臺基的三分之一。1號臺基和2號臺基之間，2號臺基和3號臺基之間，距離都在220米左右。2號臺基東西兩側，過去曾發現南北向的兩排並列的石柱礎（參看圖25），當是整個建築東西兩側的南北向的長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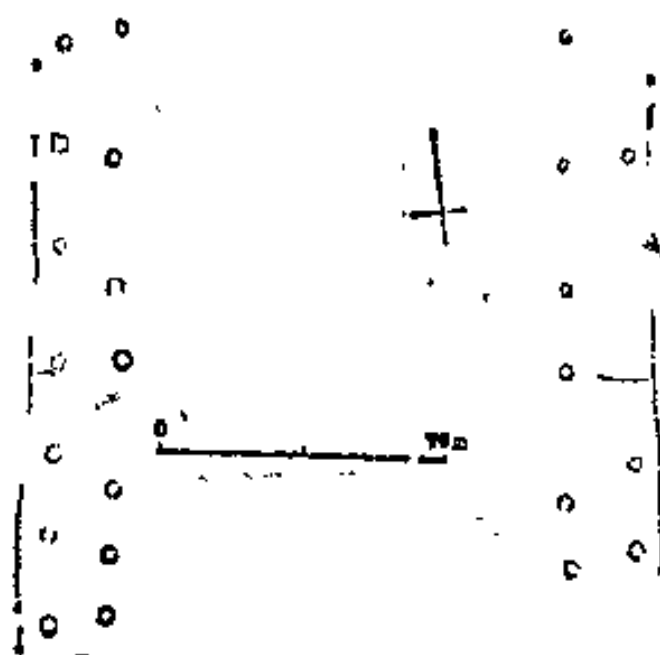


圖25 邯鄲趙國古城二號建築基址的兩排礎石
（採自日本駒井和愛等《邯鄲——戰國時代趙都城址的發掘》，1954年出版）

的遺跡。見於日本駒井和愛等《邯鄲：戰國時代趙都城址的發掘》（《東方考古學叢刊》乙種第七冊，1954年出版）。3號臺基也該有規模相近的建築，1號臺基當更有規模宏大的宮殿建築。說明西城中部原有三進的宮殿，形成一條南北向的中軸綫，應該包括外朝、內朝、寢宮在內。宮城由三個城組成“品”字形結構，它以西城為主體，是很明顯的。

東城西側，靠近通向西城的城門，有相對的兩座方形臺基，北面一座每邊約120米，南面一座每邊約110米。北城有一座較大的臺基，東西111米，南北135米，位於北城的西南角，也靠近西城。宮城確是建於戰國時代，在戰國文化層以下沒有更早的遺物。

大郭的建築時代較宮城為早，大郭東側中部的南段地下11米處，戰國文化層下部，出土有細把豆、細繩紋陶罐等，年代較宮城出土遺物為早。究竟大郭建於何時，尚待進一步調查。根據大郭許多動土地點進行調查，發現大郭東側中部，有戰國時代煉鐵、鑄銅、燒窯及骨器、石器作坊遺址。煉鐵遺址發現的煉鐵爐殘存底部燒土面，東西約3米，南北約2米，周圍有大量煉渣和燒土的堆積，高1到3米，說明這是一個規模較大的煉鐵作坊遺址。邯鄲本是戰國時代冶鐵業中心之一，邯鄲人郭縱就是以經營冶鐵業而成爲巨富的（《史記·貨殖列傳》）。鑄銅遺址出土有熔銅的坩堝。石器作坊遺址出土有石板、圓形柱礎石及石滾等，多數爲建築用的石材料。這一帶還有不少戰國時代陶井圈發現，說明大郭曾長期作爲手工業區和居民區。這和當時中原其他國家都城的大郭情況是相同的。】

6 魏國都城安邑

安邑原爲春秋晚期晉國卿大夫魏氏的封邑，魏絳（晉悼公的

輔佐之卿)開始徙治安邑。三家分晉(公元前453年)後，安邑成爲魏國國都，魏文侯(公元前445—前396年)、武侯(公元前395—前370年)都建都在這裏。武侯二年(公元前394年)築安邑城(《史記·魏世家》)。到魏惠王九年(公元前361年)才從安邑徙都大梁(今河南開封市)。

安邑故城在山西省夏縣西北約7公里，今稱禹王城。城址分大城、中城、小城及禹王廟四部分，中城在大城以內的西南部，小城在大城中部和中城東北角。禹王廟在小城外東南角，是利用古臺基而修建的近代建築②。

大城平面呈梯形，北牆長2,100米，南牆長3,565米，西牆有曲折，長4,980米，東牆殘存北段1,530米(參看卷首圖版十)。中城在大城以內西南部，平面呈方形，西牆、南牆就是大城西牆、南牆的一部分，北牆長1,522米，東北角有小城，東牆從小城南牆中部由北向南延伸。小城位於中城東北角，平面呈方形，而東南角缺一塊長方形。北牆長855米，西牆長930米(參看圖2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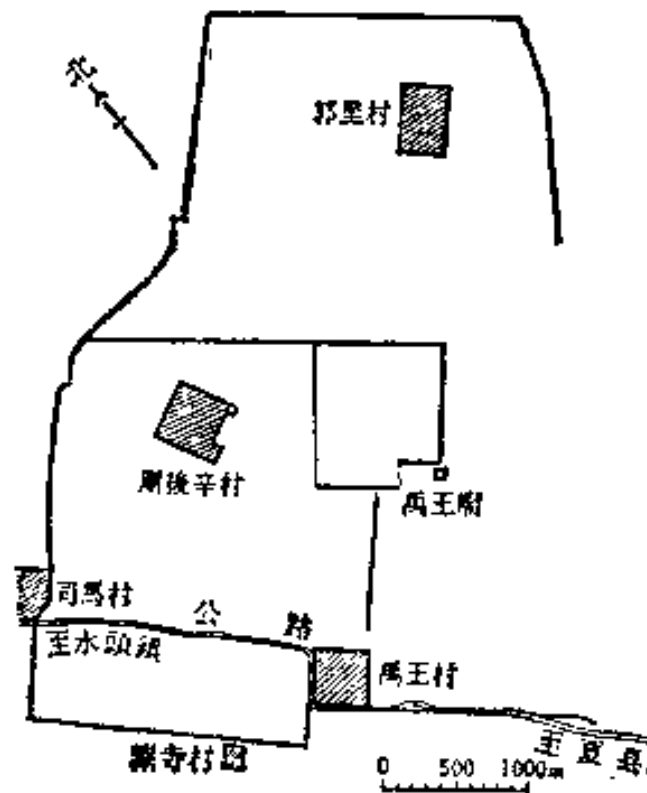


圖 26 山西省夏縣魏國都城安邑平面圖
(採自《山西夏縣禹王城調查》,《考古》
1963年第9期)

安邑故城，先後曾經山西省文物工作委員會、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派人調查，因為未作詳細鑽探或試掘，所以三個城的關係還不明確。山西省文物工作委員會的初步看法，認為大城是魏都安邑，中城可能是秦漢時代河東郡治，小城最早可能是安邑的宮城。他們所以判斷中城是秦漢河東郡治，是因為城內佈滿漢代文化層，戰國遺物遠不如漢代遺物豐富，但是我們認為，這個意見還可商討。中城北牆的夯土既然含有少量戰國瓦片，中城也該是戰國時代建築。城內所以滿佈漢代文化層，是因為戰國以後，漢代較長時期使用所造成的。中城相當於臨淄、新鄭的西“城”性質，大城相當於東“郭”的性質，西“城”也正位於東“郭”的西南角，佈局方式基本一致。小城只是宮牆性質，如同新鄭的西“城”中有方形宮牆一樣，它只是西“城”的一部分。當然，這只是個推斷，還有待於作進一步的考古調查來證明。但是，大城原是安邑的“郭”，是可以無疑的。現在大城以內東北部有個村莊叫郭里村，所謂“郭里”，就是大“郭”以內的意思，當是自古相傳下來一個地名，這是個有力的證據。

7 春秋戰國時代中原諸都城佈局的特點

根據上面的敘述，可知春秋戰國時代中原各諸侯國的國都，都推行着西“城”連結東“郭”的佈局。這種佈局是周公建設東都成周的時候開創的。周公之所以要創設這種佈局，主要是爲了安置“國人”、遷移殷民，駐屯軍隊，造成一個實力雄厚的東都，用來加強對中原地區以及四方的統治。因為當時的社會結構，實行“國”、“野”對立的鄉遂制度，只有充實“國”（國都）的實力，才能增強對外的防禦力量和對內的統治力量。到春秋時代，中原諸侯中的一些大國，在相互爭霸的過程中，爲了增強國都力

量，有採用這種佈局的。到戰國時代，由於社會經濟的發展，政治制度的變革，中央集權政體的確立，各大國的先後稱王，就更進一步的推行這種佈局了。

這種小“城”連結大“郭”佈局的推廣，首先由於政治上的原因。隨着中央集權政體的確立，宮殿附近需要建設一系列中央高級官署，必須在都城中建立一個集中辦公的區域，以便於國君及其輔佐大臣主持管理。與此同時，體現至高無上的君王權勢的禮制，也逐步推行了；與此相應，舉行盛大禮儀的宮殿也必須興建了。這樣，有一定規模的宮城就需要建設了。我們以戰國時代趙國為例，它建有信宮以便舉行“大朝”之用，既可以用來接受別國君臣的朝見，如武靈王元年“梁襄王與太子嗣、韓宣王與太子倉來朝信宮”，又是春正月舉行“大朝”的地方，如武靈王十九年“春正月，大朝信宮，召肥義與議天下，五日而畢”。又有東宮也是舉行“大朝”的地方，如武靈王二十七年“五月戊申，大朝於東宮，傳國，立王子何以為王。王廟見禮畢，出臨朝，大夫悉為臣”。說明當時國君傳位給太子，也有一套“大朝”的禮儀。“大朝”的場面很大，上朝的人要包括羣臣和宗室在內。如惠文王四年“朝羣臣，安陽君亦來朝，主父令王聽朝，而自從旁觀窺羣臣宗室之禮”（以上都見《史記·趙世家》）。

當時所以要擴建城郭，還由於軍事上的原因。春秋戰國時代戰爭十分頻繁，建築城郭的主要目的之一，就是為了加強軍事上的防守設施。利用城郭作防禦工事，是當時很重要的一種戰術。春秋時代各國紛紛修築城郭，都是為了防禦。顧棟高《春秋大事表》卷三十八《春秋築城表》，就可以充分證明這點。自從戰爭講究兵法以後，兵法家更注意講究守城戰術。《墨子》有《備城門》以下諸篇，就是專門講究守城戰術的。《墨子·七患篇》說：“城

郭不備全，不可以自守。”又說：“城者，所以自守也。”（《孫臏兵法》有《雄牝城篇》，是講難攻的“雄城”和易攻的“牝城”在地形上不同的特點的）。當時講究守城的兵法家已經注意到，城的大小和居民多少對戰爭勝敗的關係，糧食積儲的情況及城與市之間的遠近對勝敗的關係。《墨子·雜守篇》說：

凡不守者五：城大人少，一不守也。城小人衆，二不守也。人衆寡食，三不守也。市去城遠，四不守也。蓄積在外，富人在虛（墟），五不守也。率萬家而城方三里。

由此可見，戰國時代萬家之邑，採用“三里之城，七里之郭”的佈局，是總結戰爭經驗而制定的。《尉繚子·武議篇》還說：

夫出不足戰，入不足守者，治之以市。市者所以給戰守也。
萬乘無千乘之助，必有百乘之市。

夫市也者，百貨之官也。……夫提天下之節制而無百貨之官，無謂其能戰也。

春秋戰國時代都城中“市”的擴大，固然由於當時社會經濟的變革，手工業和商業發展的結果，同時也符合於戰守的需要。

春秋戰國之際，由於手工業和商業的發展，“郭”的用途發生很大變化。當周公建設東都成周的時候，設置“郭”區是為了安置“國人”、遷居殷民和駐屯軍隊。春秋戰國時鄉遂制度已經瓦解，“國人”已經分化，“郭”區已經不是“國人”居住區域，成為官僚、地主、商人、手工業者的居住區了，而且手工業作坊和商店集中的市區已有相當規模了。雖然宮城以內也設有“市”，也設有手工業作坊和商店，一般說來，規模是不大的，而且主要是為官府和貴族服務的。而“郭”里的市區以及手工業作坊，就大不相同，與人民的生產和生活，密切相關。市區裏商店林立，已有一定的規模，築有圍牆，設有市門，並設有市官管理。市門每天

早晚按時開關。熱鬧的市區，清早就有許多買客等候市門開放。等到市門開放，就“側肩爭門而入”，為的是爭取“所期物”（《史記·孟嘗君列傳》馮謹語）。事實上當時有些諸侯國的都城，一方面保持國都的性質，另一方面就具有都市性質，成為一個地區手工業、商業集中的地方。

到戰國時代，隨着文化學術的發展，同時由於有些國君招徠人才，提倡講學，都城附近就有特設的文化區。例如齊國臨淄的西“城”西面的稷下（稷門外），就設有學宮，招待學者，“為開第康莊之衢，高門大屋以尊寵之”（《史記·孟子荀卿列傳》）。文化區的設置，也是戰國時代都城的一個特點。

-
- ① 營丘，一說在昌樂的營陵故城。《漢書·地理志》齊郡臨淄，顏注：“應劭曰：齊獻公自營丘徙此。臣瓚曰：臨淄即營丘也。”可知應劭主營陵說，而臣瓚認為營丘與臨淄為一地。《水經注·淄水》主張營丘即臨淄而駁斥營陵說，根據《爾雅》“水出其前左為營丘”，認為“營陵城南無水，惟城北有一水，世謂之曰狼水，……由《爾雅》出前左之文，不得為營丘矣。”“今臨淄城中有丘，在小城內，周迴三百步，高九丈，北降丈五，淄水出其前，故有營丘之名。”
- ② 羣力：《臨淄齊國故城勘探紀要》，《文物》1972年5期。
- ③ 參看拙作《戰國史》第98頁注①。
- ④ 王恩田《關於齊國建國史的幾個問題》（《東岳論叢》1981年4期）說：“筆者于1964年曾前往營陵故城調查，此城城牆保存尚完好，惟文化遺物極為貧乏，急欲覓得一可資斷代的陶瓦殘片而終不可得。”又說：“酈道元所謂營丘在臨淄故城小城內的說法是錯誤的，酈氏所說的周三百步、高九丈的土丘，今名桓公臺，東漢時名瓌臺，桓瓌音近，桓公臺當為瓌臺之訛變。據鑽探，此臺系夯土建築臺基，非自然形成的土丘。考古工作證明，小城城牆及包括桓公臺在內的

文化遺存，多屬駘國以後之物，桓公亭不可能是營丘。”更說：“筆者認爲今大城東北角韓信嶺一帶，具有地勢高、遺物豐、時代早的特點。1971年秋在韓信嶺西南邊緣闕家寨的發掘中，出土的陶鬲，與陝西長安普陀村墓葬出土陶鬲形制相近，時代屬於穆王時期，臨淄征集品中見有西周早期陶簋，因此韓信嶺很可能即太公所封之營丘。”

- ⑤ 河南省博物館新鄭工作站、新鄭縣文化館：《河南新鄭鄭韓故城的鑽探和試掘》，《文物資料叢刊（3）》，1980年5月文物出版社出版。
- ⑥ 《左傳·莊公二十八年》載：“秋，子元以車六百乘伐鄭，入于桔柣之門。……衆車入自純門，及遠市。縣（懸）門不發，楚言而出。”杜預注：“桔柣，鄭遠郊之門也。”“純門，鄭外郭門也。遠市，郭內道上市。”桔柣之門和純門都該是外郭的南門。《左傳》有多處談到鄭的大逵，顧棟高《春秋大事表》卷七之二，認爲“城內城外俱有九軌之道曰大逵”。焦循《羣經宮室圖》“城圖六”說明：“然則入桔柣之門矣，又入純門何？二者皆郭門也。僖三十三年《傳》：楚伐鄭，門於桔柣之門，瑕覆於厲氏之汪。周氏之汪，祭仲殺雍糾之地，鄭突載其屍而出，蓋城內之地。由桔柣至此，不聞經純門。襄十八年《傳》：楚子庚伐鄭，門於純門，信於城下而還。又不聞其往來於桔柣。哀二十七年《傳》云：晉圍鄭，入南里，門於桔柣之門，則南里在桔柣外也。襄二十六年《傳》云：楚伐鄭，入南里，墮其城，涉于樂氏，門于師之梁，縣門發，獲九人焉，涉于汜而歸。師之梁者，鄭之城門，襄九年荀偃、韓起門于師之梁，三十年盟國人于師之梁之外，昭七年公如楚，鄭伯勞於師之梁是也。入南里，涉樂氏，即至城下，不由純門，並不由桔柣之門矣。蓋純門、桔柣之門皆鄭南郭門，于楚爲近，故楚之伐鄭，或入純門，或入桔柣之門。子元欲壘文夫人，以六百乘之盛伐鄭，已建旆于桔柣之門，衆車入純門，並入二門，以示師衆，傳文甚明，杜預自不審也。

鄭之郭，依水而城，故涉樂氏而至城下，郭非四面有垣如城然也。襄元年晉伐鄭入其郭，敗其徒兵于洧上，鄭城在洧之東，洧出陽城山，其西之郭，蓋依洧水爲之也。”按新鄭的東郭，南面利用洧水，東面利用黃水作屏障。

- ⑦ 1923年8月河南新鄭李銳家園中掘井得大鼎一件、中鼎二件，接着大規模發掘，出土一百多件銅器。這年冬蔣鴻元《新鄭出土古器圖志》出版，1929年關百益《新鄭古器圖錄》出版，後又編《鄭家古器圖錄》。1937年孫海波編《新鄭彝器》出版。銅器中有銘文者僅二件，一件爲王子嬰次盧，王國維謂爲楚公子嬰齊，即是令尹子重。郭沫若則以爲即鄭子儀之器，子儀名嬰齊。《漢書·古今人表》下中等有鄭子嬰齊，子齊弟。《史記·鄭世家》作公子嬰，《左傳·莊公十四年》作子儀，子儀在位十四年，子儀及其二子爲傅瑕所殺。見郭沫若《新鄭古器之一二考核》，收入《殷周青銅器銘文研究》，但是鄭子嬰齊何以稱爲王子，尚難作出合理的解釋。
- ⑧ 姚鑒、李遇春、暢文齋：《侯馬東周文化遺存新發現報導》，《文物參考資料》1957年第1期。楊富斗：《侯馬西新發現一座古城遺址》，《文物參考資料》1957年第10期。暢文齋：《侯馬地區古城址的新發現》，1958年第12期。山西省文管會：《山西省文管會侯馬工作站工作的總收穫（1956年冬至1959年初）》，《考古》1959年第5期。侯馬市考古發掘委員會：《侯馬牛村古城東周遺址發掘簡報》，《考古》1962年第2期。山西省文物工作委員會：《建國以來山西省考古和文物保護工作的成果》第二段，收入《文物考古工作三十年（1949—1979）》，1979年文物出版社出版。
- ⑨ 參見《秦都雍城鑽探試掘簡報》，《考古與文物》1985年第2期。
- ⑩ 參看《鳳翔馬家莊1號建築羣遺址發掘簡報》，《文物》1985年第2期。
- ⑪ 參見邯鄲市文物保管所《河北邯鄲市區古遺址調查報告》，《考古》1980年第2期。春秋晚期，邯鄲是晉大夫趙午（趙衰第六代孫）的

封邑，因稱邯鄲。趙鞅曾將“衛貢五百家”置之邯鄲，說明邯鄲已有一定的規模。很可能邯鄲的大郭，是在春秋晚期邯鄲城的基礎上擴展而成的，大郭東北部的“業臺”也是在春秋晚期趙午的宮殿基址上發展起來的。戰國初期趙敬侯剛遷都邯鄲時，不可能即建築宮城，可能就住在大郭東北部的“業臺”地方。原來邯鄲只有大城而以東北部為政治中心，沿襲商代以來的舊制。

- ⑫ 陶正剛、葉學明：《古魏城和禹王古城調查簡報》，《文物》1962年第4期。考古研究所山西工作隊：《山西夏縣禹王城調查》，《考古》1963年第9期。山西省文物工作委員會：《建國以來山西省考古和文物保護工作的成果》第三段，收入《文物考古工作三十年》，1979年文物出版社出版。

八 楚都郢、鄢和燕下都

1 楚都郢

春秋初期，楚國從丹陽（今湖北省秭歸縣東南）遷都到郢，郢即今湖北省江陵縣西北十多里的紀南城（因在紀山以南而得名）。或者說楚武王（公元前740—前690年）徙郢（見《左傳》桓公二年正義所引《世本》），武王元年是周平王三十一年（公元前740年）。或者說楚文王（公元前689—前677年）始都郢（見《史記·楚世家》），文王元年是周莊王八年（公元前689年）。楚剛徙都到郢，沒有築城，到楚康王時，令尹子囊（即公子貞）因被吳國打敗，建議築郢城^①。現存紀南城，是春秋晚期和戰國早期經過多次擴建加固而成的。

紀南城平面呈長方形，東西寬約4,450米，南北長約3,588米。南牆中部偏東有凸出部分作長方形。城內面積約16平方公里，城牆周圍長15,506米，城外四周有城壕，只有東牆南門、北牆西

門及南牆凸出部分沒有城壕。城內有四條古河道。共有七座城門，其中五座是陸路城門，即西牆的南北二門、南牆東門（在凸出部分）、東牆南門和北牆西門。二座是水路城門，即南牆西門和北牆東門②。

比較密集的居住區，主要在東半城。東南部有密集的夯土臺基，其中最大臺基為宮殿建築基址。東北部也有較多的夯土臺基。介於東北、東南二區之間，在今東西向的龍橋河兩岸，是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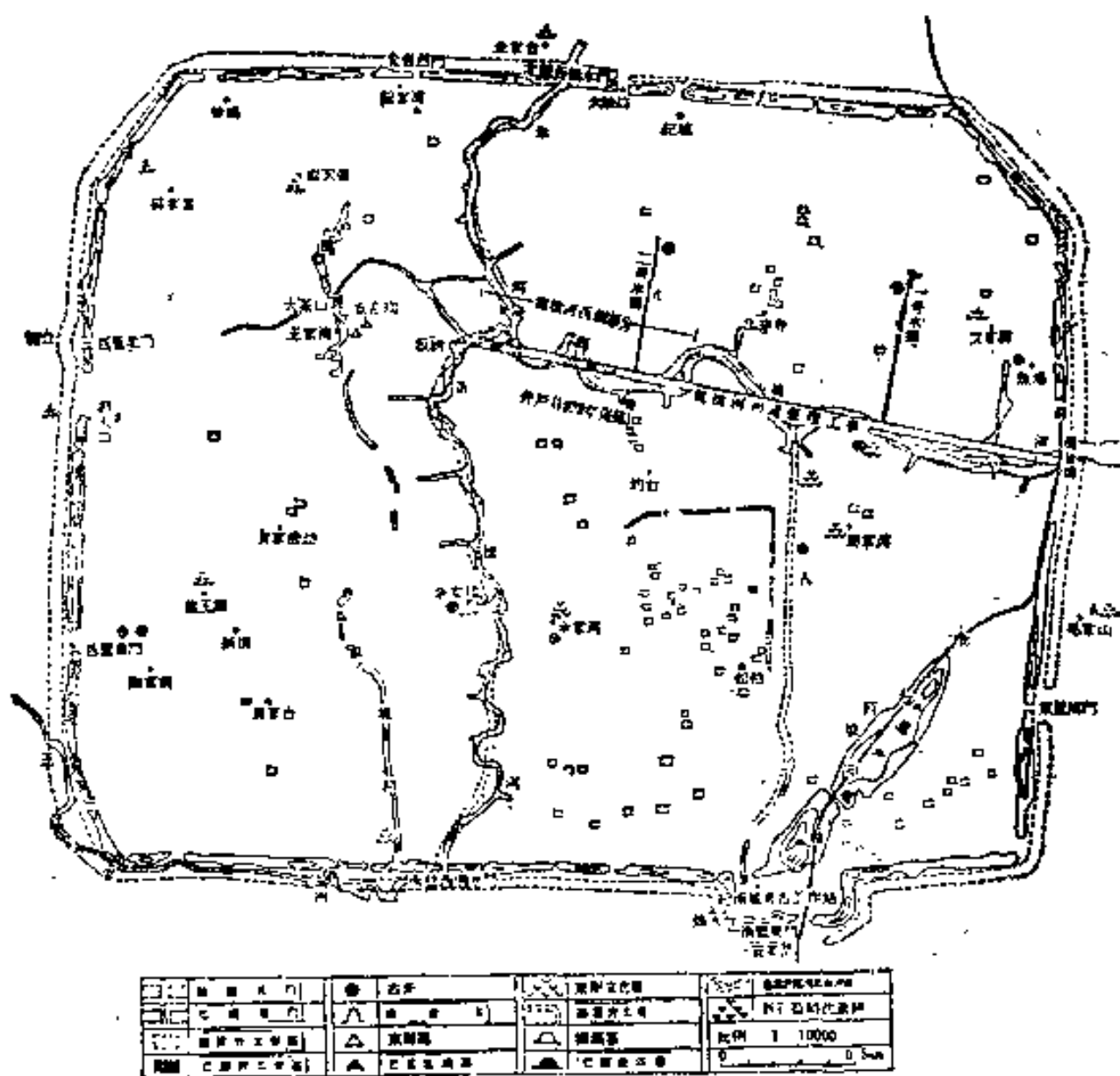


圖27 湖北省江陵縣楚國都城郢遺址平面圖

(採自《楚都紀南城》的調查和發掘，《考古學報》1982年第3期)

陶、制瓦手工業地帶。西南部夯土臺基較少，主要有冶鑄作坊。西北部夯土臺基更少，發現有早期墓葬。城外四周，城南有許多臺基可能用於祭祀或防衛，城西有密集居民區，城東有制陶作坊。城郊還有許多大小貴族墓地。離城稍遠的西方八嶺山和北方紀山，大型的冢墓林立，可能是王陵區（參看圖27）。

楚都郢的佈局，沒有採用“城”和“郭”連結的方式，只有一個大城，重心在東南部，與當時中原各國重心在西部的情況不同。

2 楚的別都鄢

在今湖北省宜城東南7.5公里有個楚皇城遺址，當是楚的別都鄢和漢代宜城縣所在。《左傳·昭公十三年》載：“王（楚靈王）沿夏（漢水）將欲入鄢。”《史記·楚世家》：“於是王乘將欲入鄢。”集解引服虔說：“鄢，楚別都也。”顧棟高也說：“本為楚別都，故靈王欲入。”（《春秋大事表》卷七之四《楚都邑表》）到戰國時，鄢仍為楚的別都。因為地處國都郢的北方，是進出郢的重要門戶，這裏駐屯有重兵，成為楚的軍事重鎮。戰國時人因此常常以鄢郢連稱。《戰國策·齊策三》記國子說：“安邑者，魏之柱國也。晉陽者，趙之柱國也。鄢、郢者，楚之柱國也。”柱國就是國都的意思。當時人把鄢和郢一起作為楚的國都，同時對楚國大臣也稱為“鄢、郢大夫”。《戰國策·齊策六》記即墨大夫人見齊王說：“鄢、郢大夫不欲為秦。”鄢、郢大夫就是指楚的朝廷大臣。正因為鄢是楚的別都，是軍事重鎮，秦昭王二十八年（公元前279年）派白起大舉攻楚，白起首先向鄢發動進攻，引導鄢水（即長谷水）作長渠，引水灌鄢，水從城西灌到城東，“死於城東者數十萬”（《水經注·沔水注》），城因而被攻下，楚的兵力大受損失，這

是具有決定性的一個戰役。白起隨即於次年攻下楚都 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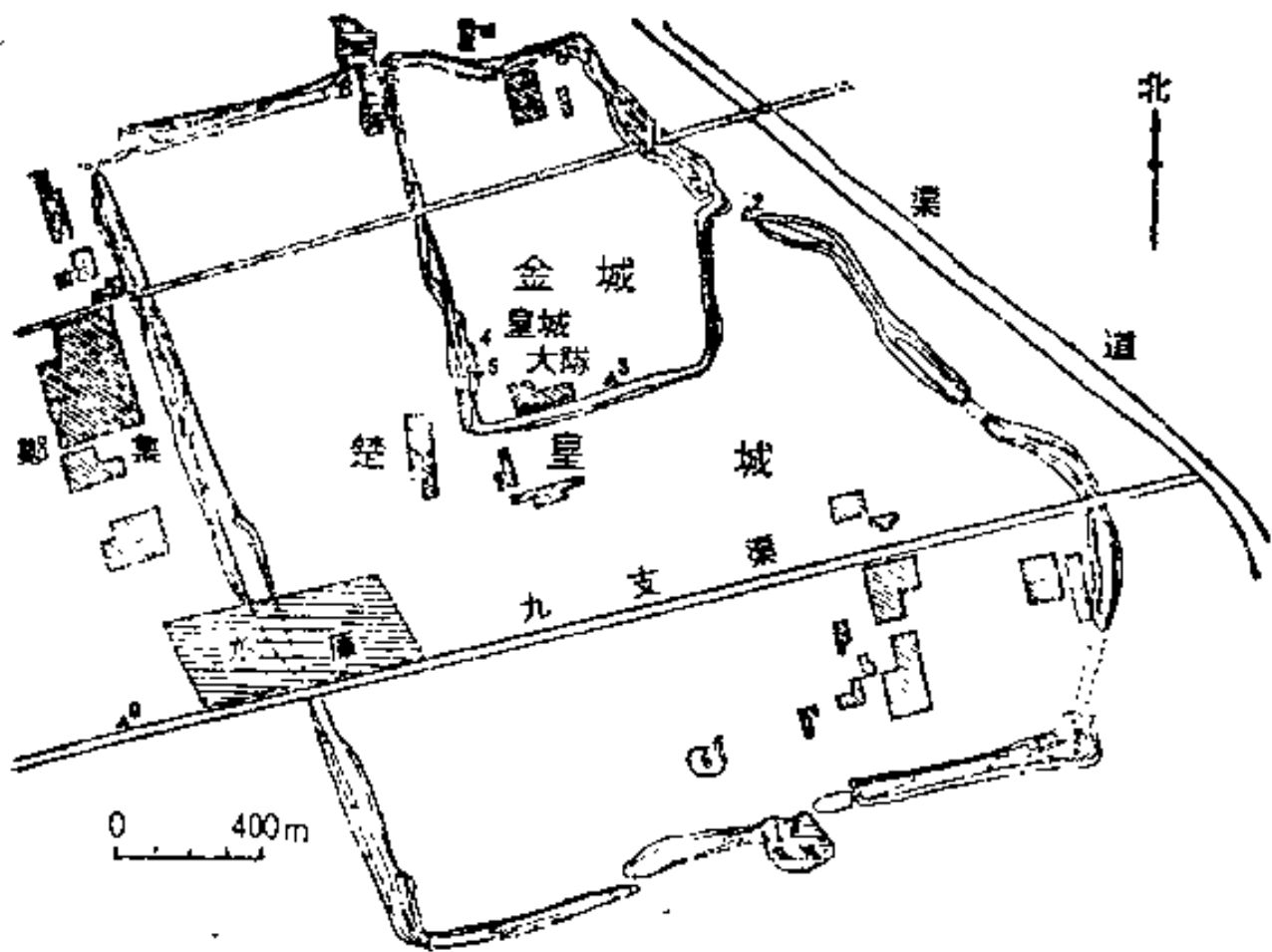
“楚皇城”遺址即是鄢故城。中部偏東北地勢較為高起，其餘為平地。城平面呈梯形，東牆曲折不很整齊，長2,000米；西牆長1,840米，北牆長1,080米，南牆長1,500米。每邊城牆有缺口兩處，可能是城門。城牆夯土中夾有新石器時代晚期及春秋戰國時期遺物（如蛋殼彩陶片、陶紡輪、陶鬲足以及筒瓦、板瓦等），沒有發現秦漢以後遺物，足以證明城牆至少是戰國時代所築。城內出土遺物，大量是漢代的，但也有春秋時代和春秋以前的，因此遺址年代可以上溯春秋戰國，下及秦漢。這和文獻上記載此地是楚的鄢和漢代 宜城縣是一致的。而且白起引水灌鄢的長渠仍然保存，一直通到城西，東牆南端有個寬60米的大缺口，相傳就是白起引水灌鄢的出水口^③。

值得注意的是，城牆四角都顯著高聳。除西北角已被破壞外，其餘三角保存尚好，西南角較低，東南角最高，是一個橢圓形土臺，高約5米，當地稱為“觀樓子”，當即城上的角闕。古時闕又稱為觀。《爾雅·釋宮》說：“觀謂之闕。”《說文》說：“闕，門觀也。”闕是“樓”一樣的高層建築，用來瞭望和防守。同時出土有數量可觀的箭鏃和其他兵器，在東城牆內一次出土銅鏃幾百枚。這是鄢為軍事重鎮性質的別都的重要證據（參看圖28）。

同時在這個故城東北部高地有個近長方形的小城，北邊依靠大城，東、南、西三面有城牆，城牆夯土層內有繩紋瓦片、幾何紋花磚，當為漢代作為宜城縣治所增築。小城内地面所見也多漢代遺物。可見這個小城與楚別都鄢無關。

3 燕下都

燕下都在今河北省 易縣東南，介於北易水和中易水之間。據



1. 解剖城墙处 2. 长梁水溃东城墙的缺口 3. 散金坡 4. 跑马堤
5. 桃林探方 6. 金鸡塚 7. 烽火台 8. 雷家坡墓地

圖28 湖北省宜城縣楚國別都鄢遺址平面圖

(採自《湖北楚皇城勘查簡報》，《考古》1980年第2期)

《水經注·易水》，這裏就是“武陽，蓋燕昭王（公元前311—前279年）之所城也”。這裏正處於燕長城的西北端，是燕國西南的重要門戶，具有軍事重鎮性質的別都（參看卷首圖版12）。

燕下都由東西兩個城連結組成，中間有一條縱貫南北的河道隔開。東城平面近正方形，東牆長3,980米，北牆拐彎較多，長4,594米，南牆和西牆已不完整。城內東北部有個高臺基，今稱武陽臺，高出地面11米，是宮殿建築基址，在其東南和西南都有建築羣基址。緊貼武陽臺北邊有一道橫貫東西的隔牆，該是用來防衛宮殿區的。在隔牆以外，離武陽臺以北200米處有臺

基高3.5米，今稱望景臺；再往北450米處有臺基高3米，今稱張公臺；更往北730米，在北城牆外有臺基高12米，今稱老姆臺。三個臺基前後排列，針對武陽臺宮殿建築。隔牆東段上有附屬的建築基址，殘高4米。東城牆北段靠城門也有附屬建築基址，殘高3米，北城牆東段也有附屬建築基址，高11米，今稱煉臺。這種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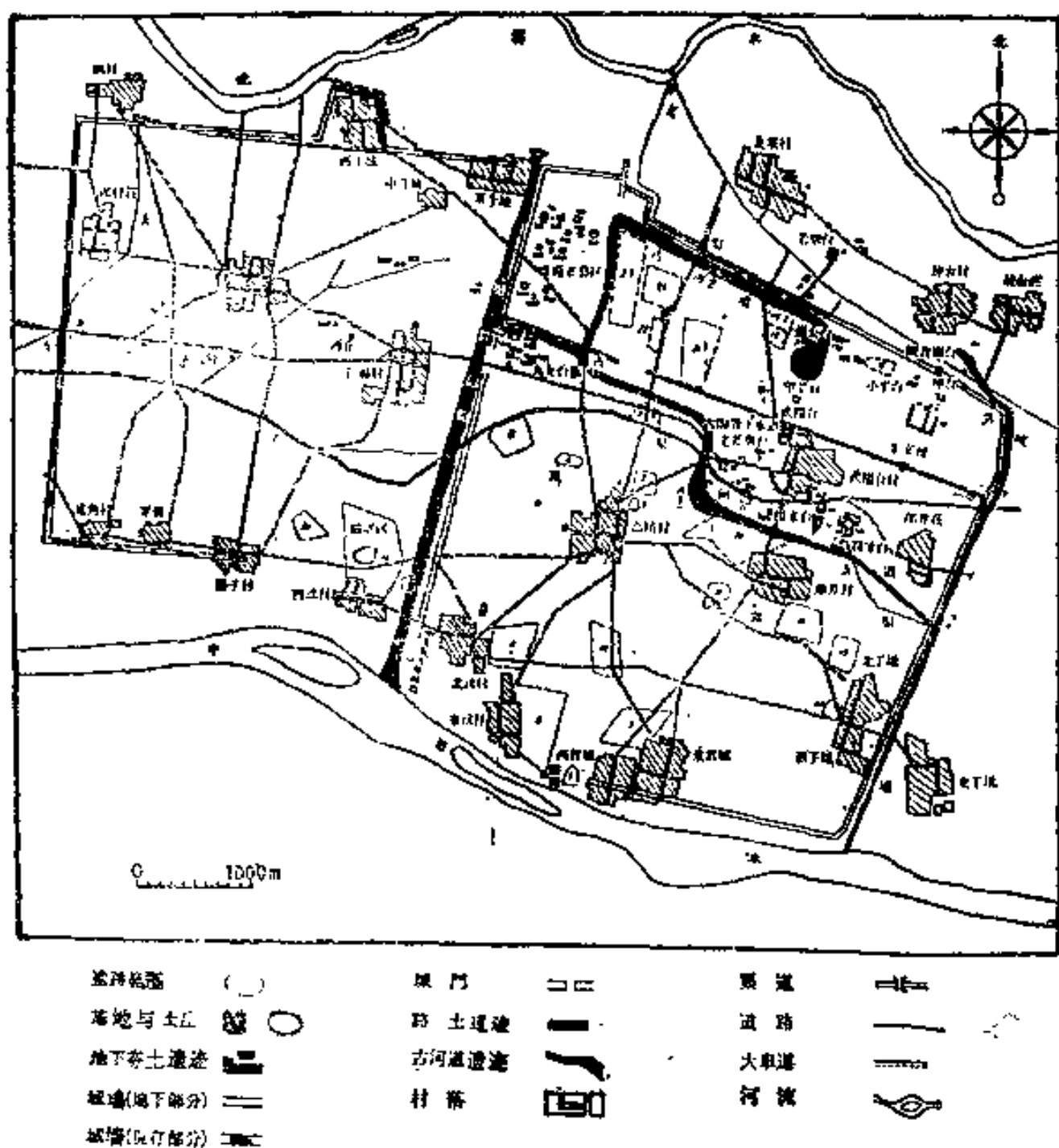


圖29 河北省易縣燕下都遺址平面圖

(採自《河北省出土文物選集》，文物出版社1980年出版)

隔牆，東城牆，北城牆上的附屬建築，很明顯是為駐屯軍隊防守用的。燕下都作為軍事重鎮性質的別都，從這些城牆上附設的防守建築上，就可以看得很清楚了（參看圖29）。

手工業作坊主要在東城的西部地區。在武陽臺西北，隔牆以外有規模較大的二處鑄鐵遺址，一處兵器作坊遺址，一處制骨遺址。東城西邊中部也有鑄鐵和鑄錢遺址。此外在武陽臺建築羣以南也有兵器作坊遺址。鑄鐵作坊和兵器作坊之多，也是作為軍事重鎮性質的別都的特點。至於居民區，分佈在東城的東、中、西南等部。墓葬區在東城的西北角。

西城近梯形，比東城略小，北牆長4,452米，西牆長3,717米，南牆殘存西段。城內沒有大型建築遺址，文化遺存也很少，當是為加強防禦而擴建的附郭^④。

① 《左傳·襄公十四年》：“楚子囊還自伐吳，將死，遺言謂子庚：必城郢。”《左傳·昭公二十三年》：“楚囊瓦為令尹，（杜注：子囊之孫子常也，代陽句。）城郢。（杜注：楚用子囊言，已築郢城矣，今畏吳，復增修以自固。）沈尹戌曰：“……無亦監乎若敖、蚡冒，至于武（武王）文（文王），土不過同，慎其四竟（境），猶不城郢。今土數圻，而郢是城，不亦難乎？”可見郢城是經子囊建議才建築的，以後不斷經過擴建。

② 湖北省博物館：《楚都紀南城的勘查和發掘》，《考古學報》1982年第3期第4期。

③ 湖北省文物管理委員會：《湖北宜城楚皇城遺址調查》，《考古》1965年第8期。楚皇城考古發掘隊：《湖北楚皇城勘探簡報》，《考古》1980年第2期。

④ 關於燕下都的考古調查，1929年北京大學研究所國學門作過調查，見傅振倫《燕下都發掘報告》，《國學季刊》3卷1號。六十年代，

中國歷史博物館考古組作過調查，見該組《燕下都城址調查報告》，《考古》1962年第1期。後來河北省文化局文物工作隊又作過勘察和試掘，見該隊《河北易縣燕下都故城勘察和試掘》，《考古學報》1965年第1期。這裏所依據的，就是最後一種勘察和試掘報告。

九 秦都咸陽西“城”東“郭”連結的佈局

1 從成都故城推測咸陽佈局

秦國由於秦孝公（公元前361—前338年）任用商鞅變法，於秦孝公十三年（公元前350年）遷都咸陽。《史記·秦本紀》載：秦孝公十二年“作為咸陽，築冀闕，秦徙都之”。咸陽故城遺址在今陝西省咸陽市東北灘毛村、窑店一帶^①。咸陽南靠渭水，因為渭水不斷北移，故城遺址受到沖決，目前已經看不到城址跡。咸陽不僅是戰國時代秦國的都城，而且是秦建立統一王朝以後的都城。後來西漢建都長安，長安城即造在咸陽故城之南，僅一水之隔（中隔渭水），因此對於西漢長安的建設有着直接影響。

秦都咸陽的佈局，既然由於遺址的被沖決，無法用考古方法來查明，那末，只有依據文獻及其他考古資料來探索了。根據文獻記載，秦惠王滅蜀以後，命令張儀等人修建的成都城，是按照咸陽國都的格局建築的，因此我們弄清楚成都故城的形制，就可以用來推斷咸陽的佈局了。

《華陽國志》卷三《蜀志》說：

惠王二十七年儀（張儀）與若（張若）城成都，周迴二十里，高七丈……成都縣本治赤里街，若（張若）徙置少城內城，營廣府舍，置鹽鐵市官並長丞，修整里闕，市張列肆，與咸陽同制。

《太平寰宇記》卷七十二引《蜀王本紀》也說：

秦惠王遣張儀、司馬錯定蜀，因築成都而縣之。都在赤里街，張若徙少城內，始造府縣寺舍，今與長安同制。（又見《全漢文》卷五十三）

兩條史料內容基本相同，只是《華陽國志》作“與咸陽同制”，而《蜀王本紀》作“今與長安同制”。原始史料當作“與咸陽同制”，因為當時咸陽是國都，理當用來作為模式。“今與長安同制”，當是出於《蜀王本紀》作者改寫。從《蜀王本紀》把“與咸陽同制”改為“今與長安同制”來看，長安都城制度就是效法咸陽的。關於這點，我們將在下一章說明。《太平御覽》卷一百九十三引《郡國誌》說：

成都郡，秦惠王二十七年張儀築，以象咸陽。沃野千里，號曰陸海。今萬歲池，即築城取土之處也。

《郡國誌》所說張儀築成都“以象咸陽”，就是《華陽國志》所說“與咸陽同制”。《水經注·江水》也說：“儀（張儀）築成都以象咸陽。”張儀等人設計建築成都，確是仿效咸陽的佈局的，所以成都都有“小咸陽”之稱。董說《七國考》卷十四有《小咸陽》條說：

揚雄云“秦使張儀作小咸陽于蜀。”按《郡國志》：秦惠王二十七年使張儀築城，以象咸陽，沃野千里，號曰陸海，所謂小咸陽也。②

成都既然有“小咸陽”之稱，可知成都佈局確是按照咸陽模式的。

《華陽國志》所說成都“與咸陽同制”，就是包括把縣治“徙置少城內城，營廣府舍，置鹽鐵市官并長丞，修整里閭，市張列肆”。所謂“少城”，就是小城。說明成都佈局的特點，是有小“城”和大“郭”相連結的。左思《蜀都賦》說：

于是乎金城石郭，兼匝中區，既麗且崇，號曰成都關。二九之通道，畫方軌之廣塗。……亞以少城，接乎其西；市廛所會，萬商之淵；列

隧百重，羅肆巨千；賄貨山積，纖麗星繁。

既然成都有“金城石郭”，說明這個故城確是採用小“城”和大“郭”相連的佈局。所謂“亞以少城，接乎其西”，就是說有較小的“少城”連接在大郭的西邊，這不是和我們前面所講春秋戰國時代中原大國都城的佈局一模一樣麼？所說“闢二九之通道”，就是說小城和大郭都有九個城門和九條大道。這也就是從戰國一直沿用到漢代、西晉的成都佈局。

《讀史方輿紀要》卷六十七“成都城”下，對成都故城佈局更有具體描寫：

成都府城，舊有大城，有少城。……大城，府南城也。秦張儀、司馬錯所築。……少城，府西城也。惟西、南、北三壁，東即大城之西墉。昔張儀既築大城，後一年又築小城。《蜀都賦》亞以少城，接于其西，即謂此也。晉時兩城猶存，益州刺史治大城，成都內史治小城。

按“惟西、南、北三壁，東即大城之西墉”，見於李膺《益州記》（此書今佚，有輯本）。這種小“城”東牆即是大“郭”西牆的建築方式，齊國都城臨淄和鄭、韓都城新鄭早就採用。看來商鞅主持營建咸陽的時候，是仿效東方大國的佈局，而成都又是採用咸陽的模式^③。

秦國都城咸陽的佈局，是模仿中原大國的。“築冀闕”也是模仿中原大國的規模。咸陽的佈局和當時中原大國一樣，採用西“城”和東“郭”相連結的方式，“城”和“郭”都是坐西朝東的，所以冀闕也該造在東門。

2 從秦始皇陵園推測咸陽佈局

古代禮制，對死人的安排要如同對待活人一樣，所謂“事死如事生，禮也”（《左傳·哀公十五年》）。帝王陵園的佈局，肯定

是模仿都城的制度的。《呂氏春秋·安死篇》開頭說：

世之爲丘壟也，其高大若山，其樹之若林，其設闕庭，爲宮室，造賓
阼也，若都邑。

高誘注：“賓階、阼階也。若爲都邑之制。”《呂氏春秋》是秦相
呂不韋（？—公元前235年）在秦都咸陽會集賓客寫作編輯而成，
在秦始皇八年（公元前239）定稿，公佈於咸陽的市門。秦始皇陵園
是秦始皇初即位的時候就開始建築的。《史記·秦始皇本紀》
說：“始皇初即位，穿治鄠山。”當呂不韋在秦始皇八年公佈《呂
氏春秋》時，該已初具規模。秦始皇陵確是造得“高大若山”，而
且借用了旁邊麗山的美名，稱陵墓爲“山”；出土有“麗山園”銘文
的銅壺和“麗山飼官”（供奉飲食的官）陶文的陶壺蓋，可以證明。
陵墓上確是“樹之若林”。《史記·秦始皇本紀》記載秦始皇
葬入陵墓後，還“樹草木以象山”（同上引）。《呂氏春秋·安死
篇》一段話，無異是對秦始皇陵園的寫照。因此，秦始皇陵園
的設計建築就是“若都邑”，即採用都城咸陽的制度是無疑的。

目前秦始皇陵園的整個佈局已調查清楚。西部有長方形的小城，城有內外兩層，作長方的“回”字形。外城東西寬974米，南北長2,173米。陵墓葬在長方形小城南半部的中心，正當整個陵園的西南部。小城北半部有寢殿及其附屬建築，還可能是管理陵園官吏的辦公處、宿舍以及侍奉陵寢的宮女的住處。整個長方形小城就是陵園的主體“陵寢”所在，相當於秦都咸陽西邊建有宮廷的小城結構。在長方形小城的東南面，有南北向的長條陪葬墓區。在小城以東1,000米處，正當陵園東部東門大道的北側，發現有三個兵馬俑坑，1號坑規模最大，作不規則的長方形，東西寬210米，南北長62米；2號坑和3號坑規模較小，並列在1號坑的上面。2號坑作不規則的矩尺形，東西最寬處有90米，

南北最長處有84米。3號坑作西向的“凹”字形，南北長16.85米。三個坑中的兵馬俑，組成了面向東方的龐大軍陣。整個陵園的佈局是坐西朝東，所有兵馬俑的軍陣都面對東方。此外，可能在兵馬俑坑以東的東門大道前，還有門闕的建築，作為整個陵園的正門，但目前基址尚未找到（參看圖30）。

秦始皇陵園西部的長方形小城，相當於咸陽建有宮廷的西部小城；陵園東部直到兵馬俑坑，相當於咸陽的東面大郭。三個兵馬俑坑，象徵着咸陽守衛東郭門一帶的屯衛軍。《史記·秦始皇本紀》載：秦二世元年“盡徵其材士五萬人，為屯衛咸陽”。這時由於特殊需要而大量徵發軍隊“屯衛咸陽”，而平時咸陽都城裏肯定也有一定數量的屯衛軍。秦始皇九年嫪毐作亂，秦始皇“令相國、昌平君、昌文君發卒攻毐，戰咸陽，斬首數百，皆拜爵”（《史記·秦始皇本紀》）。匆促間，秦始皇命令相國（呂不韋）、昌平君、昌文君所發的“卒”當即咸陽的屯衛部隊。1號兵馬俑坑有兵馬俑六千人左右，東端先是三路橫隊，都是弓弩手，作為先鋒部隊；接着是三十八路縱隊，有戰車和手執長兵器的步兵間隔排列，當是戰鬥主力部隊。同時在縱隊兩側及後部各有一列分別向南、北、西三面的弓弩手，這是兩翼和後衛部隊，防止敵人從兩側和後面襲擊。這裏充分表現了屯衛國都軍隊的特色。2號坑是步兵、弓弩手、車兵、騎兵的混合部隊，可能是屯衛軍官的侍從部隊。3號坑是由屯衛軍長官和侍衛隊組成的指揮所。這裏反映了當時國都咸陽屯衛軍的編制和佈防守衛的情況。

秦都咸陽的宮殿區（小城），設有司馬門，駐有司馬，設有兵闌，駐屯軍隊。《史記·項羽本紀》記載鉅鹿之戰以後，“章邯恐，使長史欣請事，至咸陽，留司馬門三日，趙高不見”。《集解》：“凡言司馬門者，宮垣之內，兵衛所在，四面皆有司馬主武事。總言之，外

門爲司馬門也。”《索隱》：“按天子門有兵闌，曰司馬門也。”從秦始皇陵園東郭門內有兵馬俑坑來推斷，秦都咸陽的東郭門內，便駐有中尉，設有大“兵闌”，屯有大隊屯衛軍。據《漢書·百官公卿表》，秦制，“中尉掌繳循京師”，漢武帝時改稱執金吾，所屬有屯衛軍。《漢舊儀》（《北堂書鈔》卷五十四引）說：“執金吾車駕出，從六百騎、走六千二百人也。”這個兵數正好和秦始皇陵園1號兵馬俑坑內兵馬俑數差不多。執金吾的侍從部隊排場很大，兵員衆多。《漢官儀》（《北堂書鈔》卷五十四引）說：“執金吾屬官有武庫令丞，從騎二百人，持戟五百二十人，輿服導從。”這些史書記載的屯衛軍編制，又和2號兵馬俑坑的內容相當。

3 秦始皇擴建咸陽都城的佈局

秦始皇在統一六國過程中，開始擴大咸陽都城的範圍，大量營建新宮殿。《史記·秦始皇本紀》說：“秦每破諸侯，寫放（仿）其宮室，作之咸陽北阪上，南臨渭，自雍門以東至涇渭，殿屋複道周閣相屬。”秦模仿六國的宮室，造在渭水以北，從咸陽以東，沿着渭水，一直造到了涇水、渭水匯合處。漢高祖長陵附近（今怡魏村），當爲六國宮室中齊國宮室所在地，出土有齊都臨淄風格的羊瓦當。秦始皇建立統一王朝，咸陽成爲統一王朝的首都以後，進一步在咸陽周圍營建宮殿。秦始皇三十五年（公元前212年）開始營建新的朝宮，準備作爲朝廷的中心。“營作朝宮渭南上林苑中，先作前殿阿房”，即是阿房宮。接着又“令咸陽之旁二百里內，宮觀二百七十，復道、甬道相連”（《史記·秦始皇本紀》）。阿房宮遺址在今陝西省西安市和咸陽之間的三橋鎮南，說明秦始皇擴建的都城咸陽，儘管宮觀造得很多，但是作爲朝廷中心的朝宮，還是築在擴建的咸陽的西南。整個佈局不變。

阿房宮是南向的。秦始皇建築閣道，“自殿下直抵南山（終南山），表南山之顛以爲闕”。在終南山頂上造闕，就是作爲朝宮的南門的門闕。與此同時，“立石東海上胸界中以爲秦東門”（《史記·秦始皇本紀》，“東門”下當脫“闕”字）。《漢書·地理志》在東海郡胸縣下也說：“秦始皇立石海上以爲東門闕。”這個石闕，漢代還存在。《隸釋》卷二記載漢“東海廟碑”的碑陰云：“闕者，始皇所立，名之秦東門闕，事在《史記》。”胸縣在今江蘇省連雲港市西南錦屏山，正當東海之濱。從地球經緯線來看，東門闕正好直對秦都咸陽的東門，說明秦始皇擴建的秦都咸陽，還是坐西朝東，以東門爲整個城的正門（參看圖30的下圖）。

原來秦都咸陽坐西朝東，秦始皇擴建的咸陽仍然坐西朝東，在東門造闕。這是沿襄中原地區都城建設的傳統設計方案的。後來西漢都城長安在東門造闕，該即沿襄咸陽的制度。

① 王丕忠：《秦咸陽宮位置的推測及其他問題》，《中國史研究》1982年第4期。按王丕忠認爲秦咸陽宮與漢長樂宮（即秦興樂宮）隔渭水南北相望，漢代渭水在長安城北三華里。今距漢長安城遺址十一華里，說明渭水向北移動八華里，因而咸陽宮以及城址都被衝毀。今咸陽市東北約二十華里長陵車站附近灘毛村一帶，發現有冶銅、制陶作坊遺址。六十年前有人在灘毛村東南看到故城牆的遺址，當即秦咸陽故城殘存的西北部分。至于咸陽市東北三十華里牛羊村發現的第一號宮殿遺址，是咸陽城旁的宮觀，并非咸陽宮。秦都咸陽考古工作站《秦都咸陽第一號宮殿建築遺址簡報》以及《秦都咸陽幾個問題的初探》（《文物》1976年第11期），依據第一號宮殿遺址，所推定的咸陽宮遺址範圍，根據不足，并不可信。這一論斷是正確的。

② 《七國考》所引揚雄所說“秦使張儀作小咸陽于蜀”這句話，不見于

前人所引《蜀王本紀》，不知他從何處轉引。

- ⑩ 商鞅在秦變法，有很多地方效法三晉的制度，法律基本上採用魏國李悝《法經》，田畝制度（以二百四十步爲畝）是採用春秋晚期趙氏的，建築咸陽都城，“築冀闕”也是仿效東方的，整個佈局亦嘗仿效東方。

十 西漢長安的西南“城”區和東北“郭”區

1 “坐西朝東”的長樂宮和未央宮

西漢都城長安是逐步建設完成的。漢高帝時，先把秦的離宮與樂宮改建爲長樂宮使用，接着又在長樂宮以西建築未央宮，在未央宮以北草創北宮，又在長樂、未央兩宮之間建武庫。直到漢惠帝（公元前194—前188年）時，才築周圍的城牆，建設西市。漢武帝時（公元前140—前87年），在西城外建築建章宮，在長樂宮以北建明光宮，未央宮以北建桂宮，增修北宮等等。

原來秦的興樂宮在渭水以南，和渭水以北的咸陽宮僅一水之隔，造有長三百八十步的橫橋以便來往。興樂宮周圍有二十多里^①，在秦末漢初的戰火中沒有被毀，漢高帝利用它作爲朝廷，宮內有前殿以及其他宮殿。惠帝以後改爲太后所居，朝廷移到未央宮。長樂宮四面有門，但是只有東門和西門有闕（參看圖31）^②，說明長樂宮的宮殿雖然都南向，而整個宮是坐西朝東的。該是秦代已經如此，西漢只是沿襲原有的體制而已。

未央宮在長樂宮以西，也是個大宮，周圍二十多里^③。它和長樂宮同樣坐西朝東，以東門、北門作爲正門，設有東闕和北闕。《史記·高祖本紀》載：“八年蕭丞相（蕭何）營作未央宮，立東闕、北闕、前殿、武庫、太倉，高祖還，見宮闕壯，甚怒。”《漢書·高帝紀》又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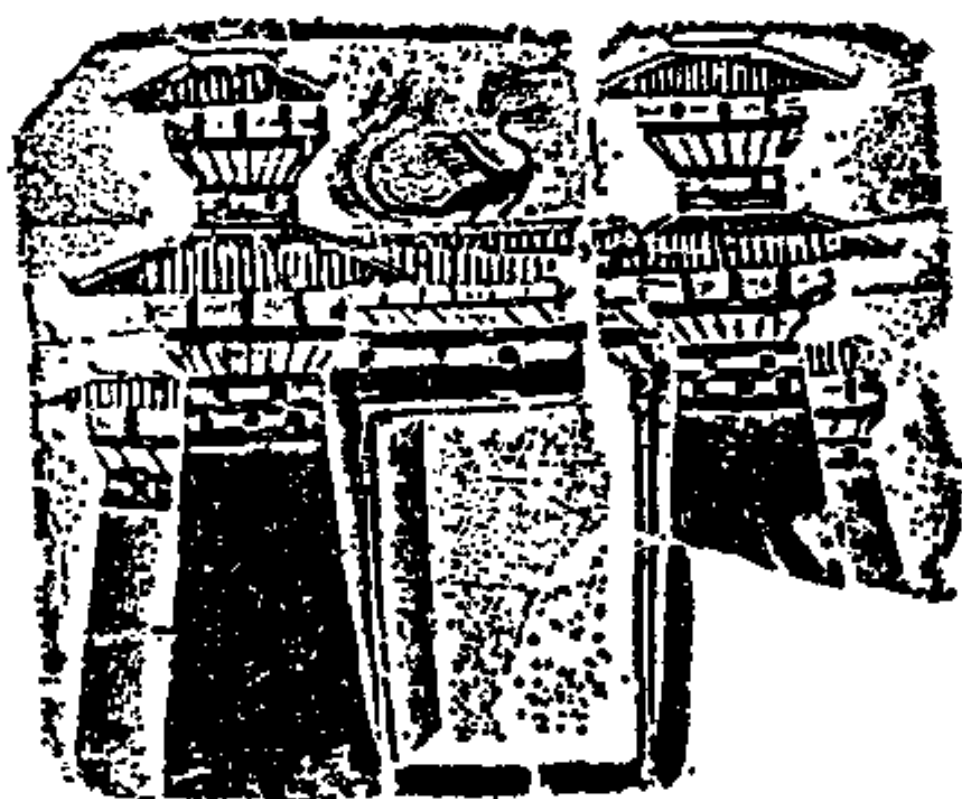


圖31 東漢畫像磚上所見“鳳闕”

(四川省成都市揚子山漢墓出土，採自《四川漢代畫像磚》，上海人民美術出版社1987年出版)

西漢宮殿的正門前，很講究造闕。漢武帝在長安城西所造建章宮，建有東闕和北闕，高二十多丈，闕上有銅鳳，稱爲“鳳闕”。這塊畫像磚所描寫的就是鳳闕，雙闕之間有屋頂相連，形成大門，屋頂之上立有巨大的銅鳳。班固《西都賦》所說“設璧門之鳳闕”，當即指此。建章宮的鳳闕，直到東漢繁欽《建章鳳闕賦序》說：“秦漢規模，廓然泯毀，惟建章鳳闕，聳然獨存。雖非象魏之制，亦一代之巨觀。”（見《藝文類聚》卷六十二）

“七年二月至長安，蕭何治未央宮，立東闕、北闕、前殿、武庫、太倉，上見其壯麗，甚怒。”東闕又稱蒼龍闕或青龍闕，北闕又稱玄武闕，見於《漢宮闕疏》（《三輔黃圖》引）、《三輔舊事》（《藝文類聚》卷六十二引）、《關中記》（《史記·高祖本紀》集解、《太平御覽》卷一百七十九引）。

爲什麼未央宮只立東闕、北闕呢？顏師古注說：

未央殿雖南嚮，而上書奏事謁見之徒，皆詣北闕，公車司馬亦在北

焉，是則以北闕爲正門，而又有東門、東闕。至于西南兩面無門闕矣。蓋蕭何初立未央宮，以厭勝之術，理宜然乎？

《三輔黃圖》有同樣的解釋。顏師古說西漢“上書奏事謁見之徒皆詣北闕”，確是事實。例如枚皋“上書北闕，自陳枚乘之子”（《漢書·枚乘傳》）。始元五年（公元前82年）有男子“詣北闕自謂衛太子（即因巫蠱事件而自盡的戾太子）”（《漢書·雋不疑傳》）。但是顏氏據此認爲只有北闕是正門，并不恰當，其實東門比北門更重要，東門是接受諸侯朝見的正門。《漢書·五行志》說：“文帝七年六月癸酉未央宮東闕罌鼠災，劉向（公元前77—前6年）以爲東闕所以朝諸侯之門也，罌鼠在外，諸侯之象也。”東門和北門同樣是正門，東門又是主要的正門。張衡《西京賦》描寫未央宮說：“朝堂承東，溫調延北，西有玉堂，聯以昆德。”朝堂是指未央宮前殿的朝堂，溫調是指前殿以北的溫調殿（當即《三輔黃圖》所說溫室殿），玉堂和昆德都是前殿以西的殿名。所謂“朝堂承東”，就是說未央宮的朝堂是用來接待東來朝見的諸侯的。所謂“溫調延北”，就是說溫調殿是用來接待北來謁見的臣下的。

蕭何在七年二月以前，主持建築好未央宮，立東闕、北闕，造前殿以及武庫、太倉，是爲高帝建都長安作好準備。就在這時，高帝從櫟陽遷都到長安。未央宮是新建的朝宮，東闕和北闕是未央宮正門的高闕，前殿是未央宮舉行朝儀的大殿，是利用龍首山作爲基地而建築的，地勢高，具有居高臨下的威勢。現存臺基遺址，南北長340米，東西寬150米，北端最高處達10多米，由南往北有三個大臺面，次遞增高。建築又很高大，《三輔黃圖》說：“前殿東西五十丈（合今117.5米），深十五丈（合今35.25米），高三十五丈（合今82.25米）。”高度當連臺基而言。前殿、東闕和北闕，都是未央宮的重要建築，所以要造得十分高大華麗，這是爲了壯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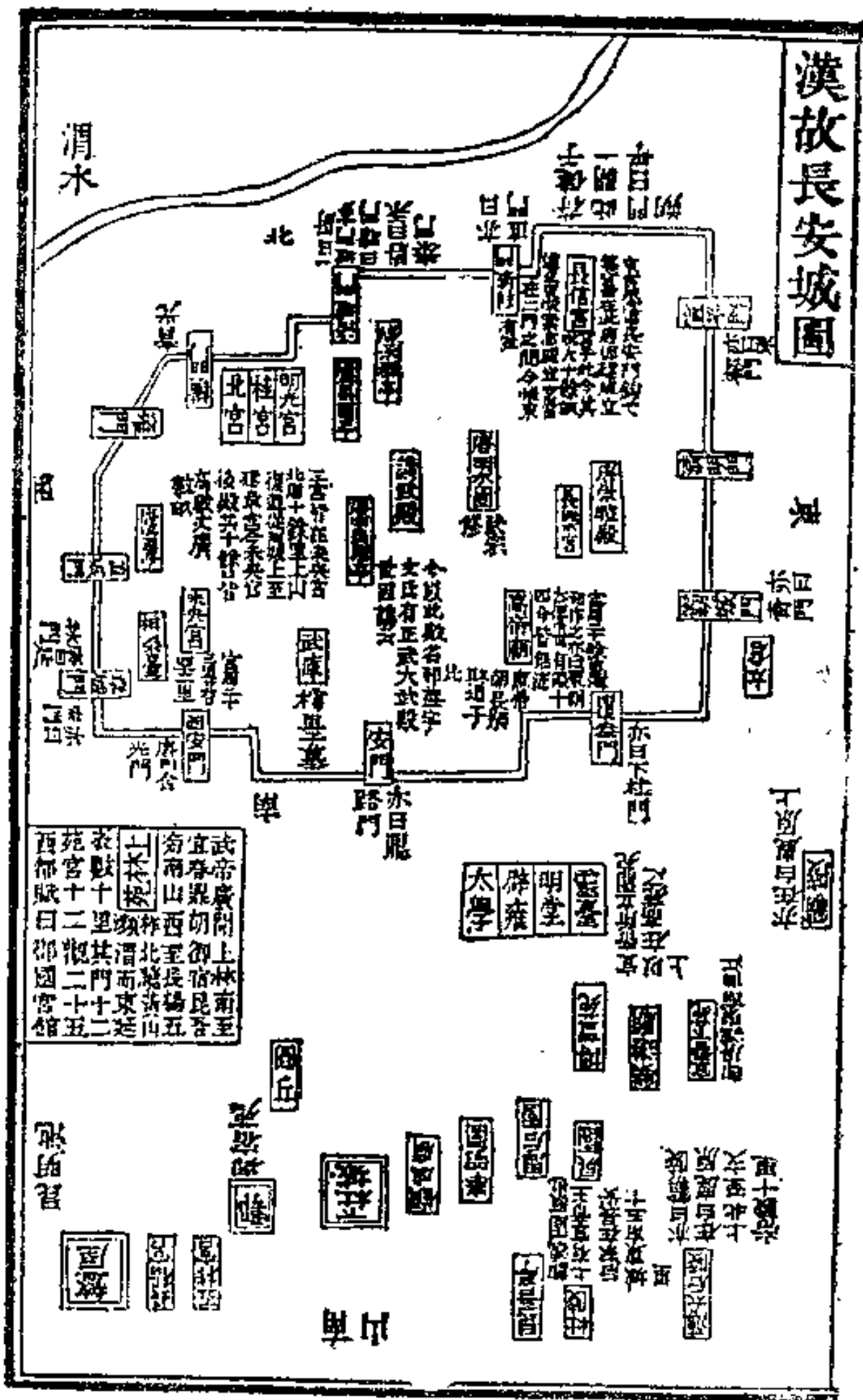


圖32 元李好文《長安志圖》所載《漢故長安城圖》

(採自《經訓堂叢書》本)

新王朝皇帝的威勢。正如蕭何對答漢高帝所說：“天子以四海爲家，非壯麗無以重威，且無令後世有以加也。”

蕭何在建築未央宮前殿、東闕、北闕的同時，建成武庫和太倉，也是建設都城的首要項目，因爲武器和糧食，是都城必須充分儲備的物資。

《三輔黃圖》說：“太倉，蕭何造，在長安城外東南。”《長安志圖》的《漢故長安城圖》，把太倉畫在霸城門東南（參看圖32），當在漕渠（昆明故渠）所能够通達到的地點，以便積儲糧食。

武庫造在長樂、未央兩宮之間，安門大街的西側，其遺址已經發掘出來，和文獻記載相合^④，其平面作東西長方形，東西寬800米，南北長320米，庫內分築七座兵器倉庫，分成兩組，東面一組四座兵器倉庫，西面一組三個兵器倉庫^⑤。武庫是精銳兵器的儲藏所，所謂“武庫精兵所聚”（《漢書·魏相傳》），設有武庫令、丞主管，屬於執金吾管轄。執金吾是京師裏守衛和巡查的長官，但是頒發武庫的兵器，必須經過皇帝的詔令^⑥。武庫之所以要造在長樂、未央兩宮之間，就爲了便于皇帝親自控制。

高帝時蕭何主持創設的國都長安，只利用秦的舊宮建成了長樂宮，在長樂宮東南造了太倉，在長樂宮以西造了未央宮，在長樂、未央兩宮之間造了武庫。這樣從東到西，太倉、長樂宮、武庫和未央宮，形成一橫排的大小建築羣。盡管每座主體建築的本身都是南向的，而整個一橫排的朝宮和倉庫的總體，都是坐西朝東的。當時雖然還沒有建設周圍的城牆，但後來惠帝時建築城牆，武帝時進一步擴建宮室，都是在這個基礎上擴展的。武帝在西邊城外建造的建章宮，和未央宮一樣設北闕和東闕^⑦。

2 內城性質的長安城

漢惠帝時建築長安城牆，是陸續築成的。城的平面近方形，北牆因河流的限制，西北角從東北向西南曲折傾斜。南牆和西牆因宮殿建築關係，中段有些曲折。現存遺址，東牆長5,940米，南牆長6,250米，西牆長4,550米，北牆長5,950米。《漢舊儀》（《續漢書·郡國志》劉昭注引）說：“長安城方六十三里，經緯各十五里，十二城門，九百七十三頃。”所謂“方六十三里”，是說周圍六十三里，大體上和現存遺址差不多^⑧，面積約36平方公里。

從整個長安城的結構來看，屬於內城性質，相當于秦都咸陽西部的“城”，也相當于戰國時代齊都臨淄、韓都新鄭、趙都邯鄲連結在大“郭”以西的小“城。”由于西漢繼承了秦代建造許多大宮殿的風氣，包容許多大宮殿的城牆就不能不擴大。因此長安這個城，面積不但遠遠超過戰國時代中原大國以及秦代的宮城，而且超過西周東都成周的王城。

西漢長安城內，宮室、宗廟和官署佔全城面積三分之二以上。南部并立的長樂、未央二宮，周圍都合漢代二十多里；中部的桂宮和北宮，周圍都合漢代十多里，此外還有明光宮。漢武帝因為“未央宮營造日廣，以城中為小，乃于宮西跨城池，作飛閣，通建章宮，構輦道以上下”（《三輔黃圖》）。建章宮周圍合漢代三十里，因為城內造不下，造到西邊城外去，用飛閣來和未央宮構通。秦始皇造了許多宮殿，為了避免與羣衆接觸，保持行踪秘密，宮殿之間用“復道”（或作複道）連通。漢代也還如此。長樂和未央兩宮之間，惠帝為了便于探望太后，造有連通兩宮的復道。未央宮不但西面有復道通到建章宮，北面也有復道通到桂宮。桂宮又有“復道從宮中西上城，至建章神明臺，蓬萊山”（《三輔黃圖》）

引《關輔記》)。同時明光宮也和長樂宮有復道相通。班固《西都賦》說：“輦道經營，脩除飛閣。自未央而連桂宮，北彌明光而亘長樂，凌墜道而超西墉，搃(混)建章而連外屬。”在長安城內的南部和中部佈滿了許多宮殿，而且這些宮殿之間都有復道作為架空的交通綫而把它們連結在一起。

當時長安城內，南部和中部除了充滿宮殿以外，還設有宗廟和不少中央官署、三輔官署以及倉庫夾在中間。《三輔故事》(《太平御覽》卷一百九十五引)說：“太上皇(廟)在長安香室(街)南，高廟在長安城門街東，太常街南。”(《三輔黃圖》)又說太上皇廟在“香室街南，馮翊府北。”別本《三輔黃圖》(《漢書·叔孫通傳》顏注引晉灼說)又說：“高廟在長安城門街東，寢在桂宮北。”《長安志圖》的《漢故長安城圖》(圖32)，將高帝廟畫在覆盎門(南牆東門)的西北。當時太上皇廟和高帝廟，都是佔地不小的。作為三輔之一的馮翊府，就建築在太上皇廟圍牆內的空地上。《漢書·龜錯傳》說：景帝時龜錯為內史，“內史府(即漢武帝以後的馮翊府)居太上廟堦中，門東出，不便，錯乃穿門南出，鑿廟堦垣”。因為宗廟是仿效宮殿式樣建築的，佔地很大，并有圍牆，正門也東向。三輔治所設在長安城內也要佔不少地方。據《三輔黃圖》，“京兆在故城南尚冠里，馮翊在故城內太上皇廟西南，扶風在夕陰街北。”清明門內設有籍田倉，因而又稱籍田門。

長安城內北部也還有不少中央官署和三輔官署的附屬機構。北城牆中門名廚城門，“長安廚在門內，因為門名”(《三輔黃圖》)。長安廚設令、丞，和長安市令、丞同為京兆尹屬官(《漢書·百官公卿表》)。長安廚“主為官食”(《漢書·王嘉傳》顏注)，也還供應大量祭品。城內西北角，今相家巷東，有鍾官官署所屬鑄錢的作坊，佔地一平方里以上；今相家巷西，又有某一官署

所屬製作陶俑的作坊^⑨。附近又有大官府第，今相家巷附近出土有“蕭將軍府”瓦片，當為蕭望之的府第（陳直《漢書新證》第406頁）。東北靠近宣平門一帶，又是達官貴人集中居住之區，有“貴里”之稱。庾信《哀江南賦》所謂“踐長樂之神皋，望宣平之貴里”（《周書·庾信傳》）。

當時達官貴人的府第，以建在未央宮北闕附近的最為豪華。張衡《西京賦》說：“北闕甲第，當道直啓，程巧致功，期不陲侈，木衣綈錦，土被朱紫。”當時一般住屋大多建造在里閭以內，只有貴人甲第，當路開門。漢魏制度，“出不由里門，面大道者，名曰第。爵雖列侯，食邑不滿萬戶，不得作第，其舍在里中，皆不稱第”（《初學記》卷二十四引《魏王奏事》）。漢哀帝寵臣董賢大第，就“開門鄉（向）北闕，引王渠灌園池”（《漢書·王嘉傳》）。諸侯王在京師都造有官邸，呂太后曾“置酒齊邸”，即齊悼惠王的官邸。（《史記·呂太后本紀》正義：“漢法，諸侯各起邸第于京師。”）漢文帝以代王而被迎入長安，將即帝位，先“馳人代邸”。（見《史記·孝文本紀》，《漢書·文帝紀》同，顏師古注：“郡國朝宿之舍在京師者率名邸。”）各郡設在京師的郡邸，常常被用作羣吏上計時食宿之處，見《漢書·朱買臣傳》。當時所封列侯都不到封邑，住在長安。西漢初年“諸侯邸第百餘，皆高帝一切功臣”（《漢書·燕王劉澤傳》）。文帝二年詔令說：“今列侯多居長安，邑遠，吏卒給輸費苦。”（《史記·孝文本紀》）

總之，規模巨大的皇宮、宗廟、官署、附屬機構以及達官貴人、諸侯王、列侯、郡主的邸第，佔據了長安城的絕大部分，因此長安城屬於內城性質是很明顯的。

從長安的城門和街道的佈局來看，整座內城是坐西朝東的。長安有十二座城門，每邊城牆有三座城門。根據考古發掘的結果，只有東門的兩側城牆設有門闕。已發掘的宣平門（東牆北門）

和霸城門，門口兩側的城牆都有向外凸出部份。如同齊都臨淄小城的東門一樣，原來應當建築有門闕^⑩。這說明長安城以東門為正門。

城內共有八條大街(以下參看圖33,東市與西市的位置,下節另有說明)。在十二門中,東牆南門(霸城門)、南牆東門(覆盎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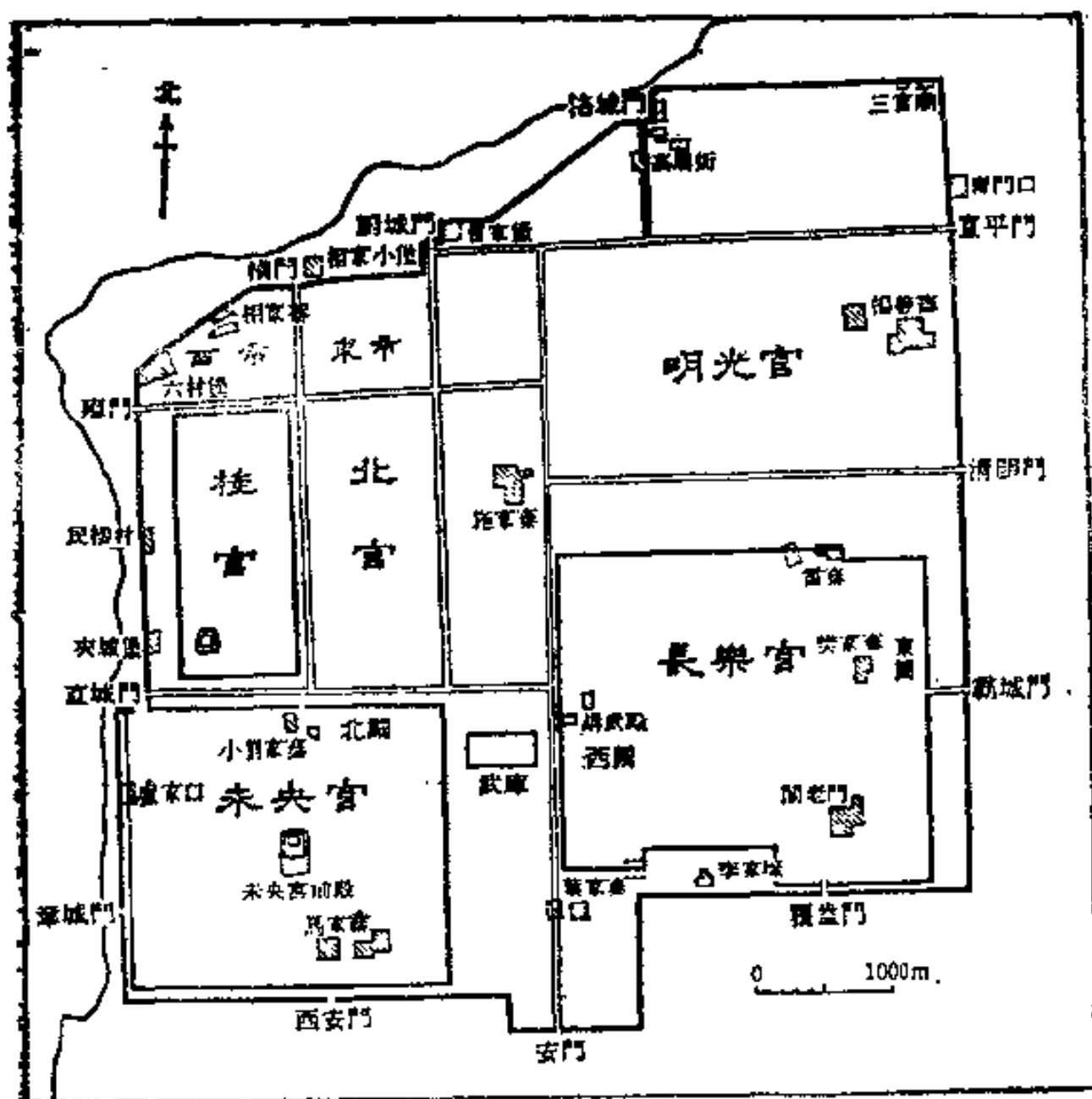


圖33 西漢長安城內宮室分佈圖

(採自王仲殊《漢代考古學概說》，中華書局1984年出版)

原圖未央宮脫去“東闕”，今已補上。

南牆西門(西安門)、西牆南門(章城門),因為入門不遠即是長樂宮或未央宮,所以沒有長的街道。其餘八門,都有通入城內的大街。南北向和東西向的大街,各有四條。南北向的大街中,以安門大街最長,計5,500米,從南牆中門(安門)向北,穿過大部份宮殿區,接連宣平門大街。東西向的大街中,以宣平門大街最長,計3,800米,從東牆北門(宣平門)向西,直通到北牆中門(廚城門),與南北向的洛城門(北牆東門)大街、安門大街、廚城門大街相交接,是城內東北部東出的交通要道。這是長安最主要的通道。長安城內八街中,洛城門大街最短,計長85米,其餘的大街長度多為3,300米左右。八條大街的長度雖有差別,但是它的寬度完全相同,都在45米左右。長安每個城門都有三個門道,每個門道寬8米,除去兩側立柱所佔2米,實寬6米。與此相應,每一大街中間有兩條寬約90釐米的排水溝,將大街分為三條并行的道路,中間一條寬約20米,是專供皇帝使用的“馳道”,兩側的兩條各寬12米左右,是官吏和平民交通的道路。這就是張衡《西京賦》所說:“旁開三門,參(三)塗夷庭,方軌十二,街衢相徑。”(李善注:“一面三門,門三道,故云參塗。塗容四軌,故方十二軌。”)以及《三輔決錄》所說:“衢路平正,可並列車軌十二;門三塗洞開,隨以金椎。”(張澍及茆泮林輯本)

在城外北部以及東北部的“區郭”。有通向外地的大道。從東牆北門(宣平門)向東,有越過漕渠和霸水的霸橋,可以到霸水以東廣大地區,這是城內東出的交通要道。從北牆西門(橫門)向北,經橫橋大道,越過渭水上的橫橋,可以到渭水以北廣大地區,這是城內北出的交通要道。除了宣平門和橫門是主要出入的門戶以外,還有洛城門(北牆東門)、廚城門(北牆中門)、雍門(西牆北門)也是出入門戶。其他的城門都是宮殿區的出入門戶,不是入

們經常進出的。安門大街雖是南北向的一條長街，但是因為大部份經過宮殿區，故不是人們出城進城的主要通道。人們從外地要進入未央宮，多數還是從宣平門或橫門入城，經橫門大街南下進未央宮北闕，或者再經安門大街南下進未央宮東闕。

3 長安城外北面和東北面的“郭”區

長安城屬於內城性質，原是為保衛宮室、官署、倉庫以及貴族官吏的住宅而建築的，城內只能容納小規模的市區。當時長安大規模的市區，大規模的居民住宅區，都分佈在城外北面和東北面的郭區。

《三輔黃圖》說：“長安閭里一百六十，室居櫛比，門巷修直。”“里”的面積是不小的，《漢書·平帝紀》載：“（元始二年）又起五里于長安城中，宅二百區，以居貧民。”據此每“里”有住宅四十“區”，每區可容多少戶不詳。根據《漢書·地理志》所載元始二年統計，“長安戶八萬八百，口二十四萬六千二百”。其中除少數住在“城”區或“郭”外的農村，大多數都該住在城外北面和東北面的“郭”區。

根據文獻和漢簡，可以考見的長安里名，不到二十個。大多數無法推定它的所在地。只有孝里在雍門以內，函里在雍門以外，是明確的。宋敏求《長安志》卷五說：“孝里市，在雍門之東。”雍門之東即是雍門以內。這個市規模較小，即設在孝里以內，因為名。《水經注·渭水》和《三輔黃圖》都說雍門，“其水北入有函里，民名曰函里門”。所說北入函里的水，是指經過雍門外而北上的泂水，可知函里即在雍門以外西北地方。

《三輔黃圖》記述長安市區的情況說：

《廟記》云：長安市有九，各方二百六十六步。六市在道西，三市在

道東。凡四里爲一市。致九州之人在突門。夾橫橋大道，市樓皆重屋。又曰：旗亭樓在杜門大道南。

《太平御覽》卷一百九十一引《宮闕記》，大部相同，不同的是說：“夾橫橋大道南又有當市觀”，“旗亭樓在杜門大道南，又有當市觀”。《文選·西都賦》“九市開場”下李善注引《漢宮闕疏》也說：“長安立九市，其六市在道西，三市在道東。”所說“凡四里爲一市”，就是每個“市”由四個“里”組成，這該是西漢長安的“市”的特點。據此推算，每個“市”的面積是266平方步，“市”內每個“里”的面積是133平方步。看來西漢長安作爲居住單位的“里”，面積大小不一。原來“里”的面積當有一平方里，“里”該由此得名，後來北魏都城洛陽還是“方三百步爲一里”（《洛陽伽藍記》卷五），唐代洛陽的里坊也還統稱“廣三百步”。但是這種“市”內的“里”，面積不到半平方里，該是比較小的“里”。

長安共有九個市，每個市266平方步，九個市共798平方步，以300步爲1里計算，九個市共有2.66平方里。這個2.66平方里的市區，當然不是充滿宮殿、官署官邸的長安城所能容納的。從上引《廟記》和《宮闕記》來看，長安的市，只有小部份在城內，在西牆北門（雍門）一帶。所說“致九州之人在突門”，突門即是雍門。《水經注·渭水》說雍門“亦曰突門。”這裏是客商會集居住的地點。橫橋大道當是從橫門（北牆西門）通到橫橋的一條大道，這是長安和渭水以北五個陵邑交通的要道，因而成爲商業發達之區，設有“西市”；夾着這條橫橋大道，“市樓皆重屋，”或者說：“夾橫橋大道南又有當市觀。”就是主管“西市”長官的官署所在。杜門就是北牆東門，又稱洛城門或利城門，“利”、“洛”是一聲之轉。《水經注·渭水》說北出第三門（即東門），“本名杜門，亦曰利城門，……其外有客舍，故民曰客舍門，又曰洛門也。”洛城門本

名杜門，與南牆覆盎門又稱下杜門是有區別的^①。所謂杜門大道，當是洛城門（即杜門）的城外大道，靠近洛城門的城外多客舍，有客舍門之稱，就是因為它靠近“東市。”杜門大道穿過洛城門，與城內的洛城門大街接連，南北嚮的洛城門大街又和東西嚮的宣平門大街交接，宣平門大街是通向東郭的交通要道。這一帶正是居民聚集之區，因而適應居民需要，在杜門大道旁設置“東市”。所謂“旗亭樓在杜門大道南，又有當市觀”，都是指主管“東市”長官的官署。所謂市樓、當市觀或旗亭樓，都是指主管市區長官的官署，是多層建築，屋頂上插旗，所以有這樣種種不同的名稱^②。

杜門大道，近人有不同解釋。或者認為在覆盎門（南牆東門）城外，因為覆盎門又稱下杜門（《三輔黃圖》），見日本古賀登《漢長安城與阡陌縣鄉亭里制度》（雄山閣1980年出版第91頁）。或者認為這是從洛城門（北牆東門）貫通到覆盎門的南北嚮大道，因為洛城門本名杜門（《水經注·渭水》），見馬光醒《漢代長安城之營建及其形制》（收入所著《漢簡與漢代城市》卷中）。我認為，這兩個解釋都有問題。覆盎門是長樂宮南出的城門，并非居民經常出入的交通大道，這一帶不可能成為商業區。洛城門和覆盎門的位置并非南北相對，洛城門偏西，覆盎門偏東。如果有從洛城門貫通到覆盎門的南北嚮的大道，要穿過明光宮和長樂宮，怕不可能。而且長安城中的街道，當時都稱為“街”，所謂“長安城中八街九陌”（《三輔黃圖》引《三輔舊事》）。稱“大道”的當指城外的大道，如橫門外有橫橋大道，章城門（西牆南門）外有便門橋大道，漢武帝建元三年“於此道作橋跨渡渭水以趨茂陵”（《漢書·武帝紀》建元三年“初作便門橋”下顏師古注）。我認為，洛城門本名杜門，杜門大道當是洛城門的城外大道。此地是商業發達之區，當

是“東市”所在。正與橫門城外橫橋大道兩旁的“西市”，東西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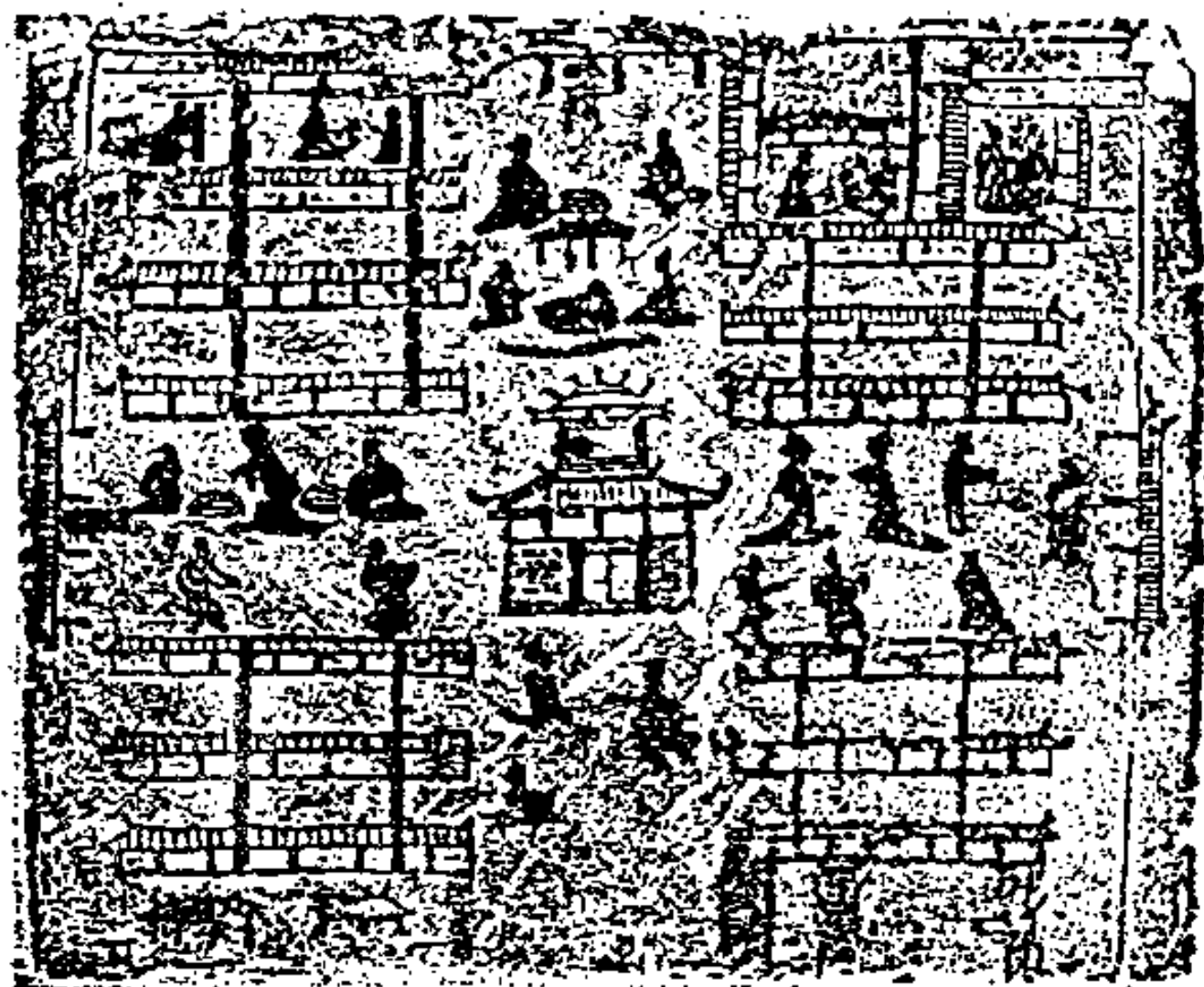


圖34 東漢畫像磚所見“市”的結構圖

(四川省成都市郊外出土，採自《四川漢代畫像磚》，上海人民美術出版社1987年出版)

近年四川省成都、新繁、廣漢、彭縣等地，都曾出土東漢“市”的畫像磚，佈局大體相同。東西南北四面都開有寬敞的門戶，中間有寬大的“十”字街，把整個“市”劃分成四個區。“十”字街的中心，有規模較大的二層樓亭子，當即“市”的官署所在地的旗亭，可以登樓向四區的商店瞭望。每個區有三橫排或四橫排商店，即所謂“列肆”。列肆的店面都是同一規格的向街開敞的廊房。每排商店之間有通道，即所謂“隧”。

張衡《西京賦》說：“旗亭五重，俯察百隧。”說明西漢長安的九市，規模要比這些畫像磚上所描寫的“市”要大好多倍，旗亭有五層樓高，列肆之間的通道，號稱有“百隧”之多。

遙相對。東西兩市這樣對稱地并列在郭區，對後世都城中“市”的建設有深遠的影響。

關於長安的市，張衡《西京賦》說：

爾乃廓開九市，通闕帶闔，旗亭五重，俯察百隧，周制大胥，今也惟尉。

“闔”是市區的圍牆，“闕”是市門。“廓開九市”，是說廣闊開辟九個市，“通闕帶闔”是說市區圍牆相互通連，同時圍牆上設有市門。“旗亭五重”，是說市區長官所居的旗亭是五層樓；“俯察百隧”，是說旗亭可以自上而下察看到所有市區的小路（參看圖34）。“周制大胥，今也惟尉”，是說周代設有大胥官管理市區^⑩，現在市區長官屬三輔都尉管轄。《三輔黃圖》說：“當市樓有令署，以察商賈貨財買賣貿易之事，三輔都尉掌之。”因市在郭區，屬三輔都尉管轄。《西京賦》所說的“尉”，即是三輔都尉。三輔都尉管轄的長安九市，當有分工。因此旗亭不止一個，杜門大道上既有旗亭，橫橋大道上也有旗亭，又稱當市樓。《廟記》和《官闕記》所說“六市在道西，三市在道東”，沒有明確指出是什麼大道，可能是指杜門大道，因為北牆以外，杜門大道以西的面積較大，可以容六個市，杜門大道以東面積較小，可以容三個市。橫橋大道的旗亭規模較大，跨大道兩旁，當是掌管西市長官的官舍，杜門大道南的旗亭當是掌管東市長官的官舍。西市的規模大，是惠帝在五年九月築成長安城牆以後，到六年，和敖倉一起建造的，《漢書·惠帝紀》說六年六月“起長安西市，修敖倉”。《史記·漢興以來將相名臣年表》也說孝惠六年七月“立太倉、西市。”說明起西市和修敖倉同樣是一項大工程，因為西市有六市，要建築通連的市區圍牆以及市門，即《西京賦》所說“通闕帶闔”等于修建一個小城。

當時不但市區的“市”有圍牆和市門，設官吏管理；而且居

民區的“里”也有圍牆和里門，設官吏管理。班固《西都賦》說：

內則街衢洞達，閭閻且千，九市開場，貨別隧分，人不得顧，車不得旋，闕城溢郭，旁流百廛，紅塵四合，煙雲相連。

“閭”是里門，“閻”是里中門^④。“閭閻且千”是說大小里門之多，也就是說居民的“里”分佈很廣。這時長安的居民區和市區，從城內北部擴展到城外的北“郭”和東北“郭”，所以《西都賦》說“闕城溢郭”。

現在渭水南距漢長安城遺址有5.5公里，這是由于渭水北移的結果。近年在高陵縣耿鎮南，即今渭水南約2.5公里處，出土唐代開元九年（公元721年）《重修東渭橋碑記》殘經幢，說明唐代渭水在今渭水南約2.5公里^⑤，估計西漢初年渭水在今渭水南約4公里，原來渭水南距漢長安城只1.5公里。《漢書·文帝紀》：“昌（宋昌）至渭橋，”顏注引蘇林曰：“在長安北三里。”《三輔黃圖》也說：“渭橋在長安北三里。”渭水實際上就具有北“郭”以外大城壕的作用。當時北“郭”的市區和居民區，就分佈在北城牆以外、渭水以南的1.5公里的範圍內，並有渭水作為防禦設施。整個北“郭”對外的交通要道，就是橫門和橫橋之間南北向的大道。

當時在橫門以北、渭水以南設有“都門”，渭水以北還設有“棘門。”^⑥《水經注·渭水》說：

北出西頭第一門，本名橫門，……如淳曰：音光，故曰光門，其外郭有都門、有棘門。徐廣曰：棘門在渭北，孟康曰：在長安北，秦時宮門也。如淳曰：《三輔黃圖》曰：棘門在橫門外。按《漢書》，徐厲軍于此備匈奴。

這裏所說橫門的“外郭有都門”，就是北郭的大門，因為整個都城長安，包括內城和外郭，內城的門稱為“城門”，凡是城門以一

個字為名的，就多加上城字，稱為“城門”如霸城門、章城門、洛城門、廚城門之類。外郭的門稱“都門”，如東都門之類。棘門是北郭門以北的又一大門，由于軍事上的需要，由秦代宮城門改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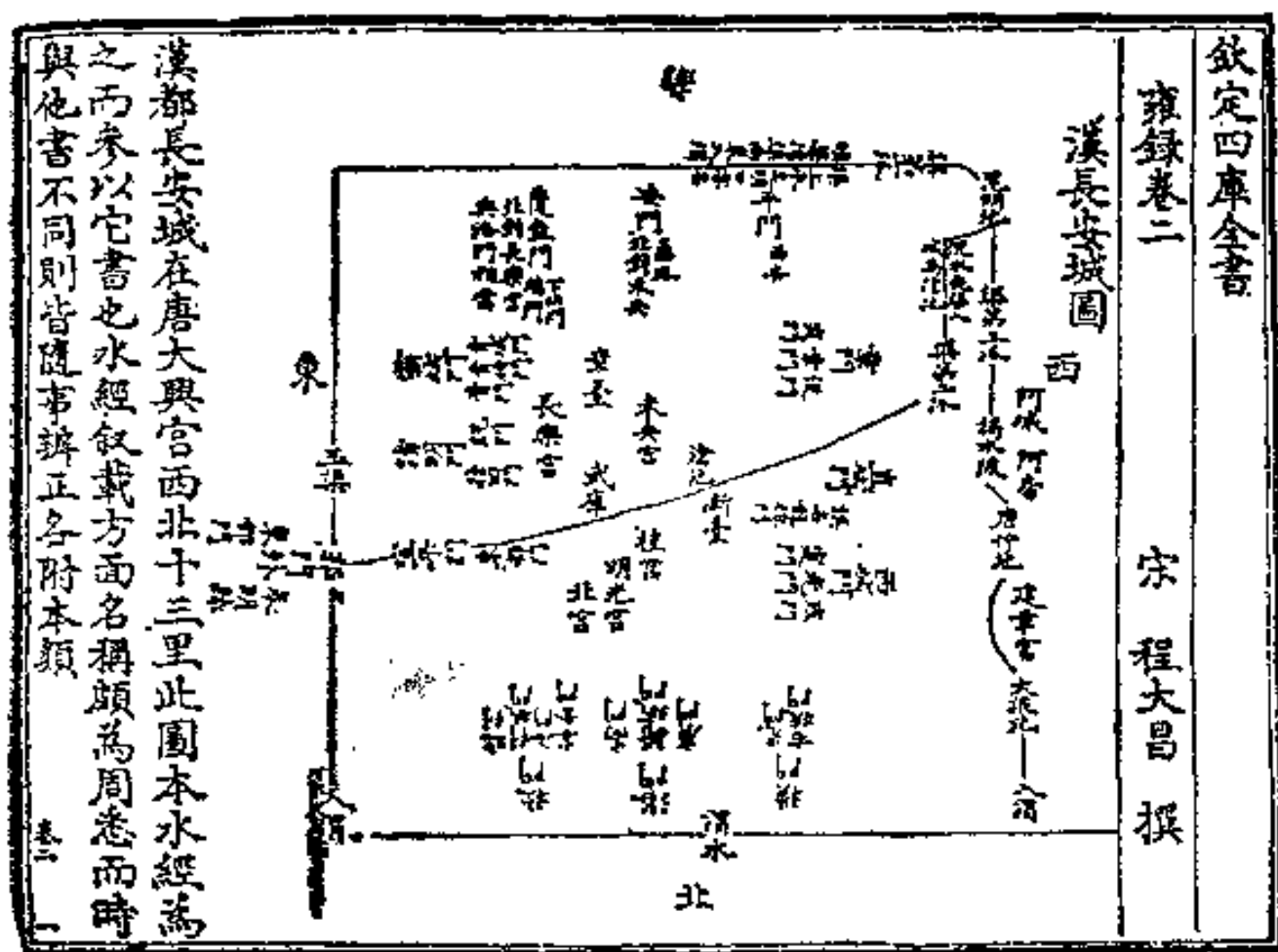


圖35 宋程大昌《雍錄》卷二所載《漢長安城圖》

(採自《四庫全書》本)

此圖不及元李好文《長安志圖》所載《漢故長安城圖》詳確，所畫東西南北方向顛倒，要倒過來看。但是此圖也有特點，所畫漕渠（亦稱玉渠）以昆明池為水源，從長安城西南的昆明池，經長安城的東南而折向東北，經東城牆的郊外而流入渭水。他把漕渠看作長安城外東部郭區的屏障，在宣平門外玉渠上寫明“郭門外”，在“郭門外”的旁邊標明“東都門”，說明他已認識到長安有以漕渠為屏障的東部郭區，設有郭門叫東都門。清代楊守敬《水經注圖》所畫《長安城圖》，同樣把“郭門亦曰東都門”，畫在宣平門外的漕渠之外。

楚地看到這點。漢昭帝(公元前86—前74年)去世,沒有繼嗣人,大將軍霍光征召劉賀赴長安主持喪禮,並準備承襲帝位,由郎中令龔遂陪同劉賀起程進京。《漢書·昌邑王傳》記載劉賀進京路程上龔遂怎樣指導“盡哀”而哭的經過:

賀(劉賀)到霸上,大鴻臚郊迎,……且至廣明(廣明苑)東都門,遂(龔遂)曰:“禮,奔喪望見國都哭,此長安東郭門也。”賀曰:“我嗟痛,不能哭。”至城門,遂復言,賀曰:“城門與郭門等耳。”且至未央宮東闕,遂曰:“昌邑帳在是闕外馳道北,未至帳,……大王宜下車,鄉(向)闕西面伏哭,盡哀止。”王曰:“諾。”到哭如儀。

從這裏,可知宣平門以外的東都門在廣明,東都門就是東郭門。這裏所說“至城門”,即是到宣平門,說明當時人從東方進入長安朝宮,必須先到霸上,經廣明的東都門,再入宣平門,經宣平門大街西行,到安門大街折而南行,然後至未央宮東闕。所謂廣明東都門就是東郭門。東郭利用漕渠作為防禦的城濠,漕渠即《水經注》所說昆明故渠,以昆明池為水源,經長安城東南。斜向東北,入渭水,正經過霸城門、清明門、宣平門外(參看圖28)。所謂霸上,就是霸橋一帶。霸水在長安城以東10多公里,是東郭門以外險要之地,如同北郭門以外渭水以北的棘門一樣。漢文帝六年(公元前158年)匈奴入侵,文帝派三位將軍分屯霸上、棘門和細柳(長安西南15公里)三處防守,就可見其軍事上的重要性。

宣平門和東都門是長安東出西入的主要門戶,人們常常在這裏迎送親友。漢宣帝時,蘭陵(今山東嶧縣東)疏廣及其兄之子受,託病辭去太子太傅、少傅官職回鄉,“公卿大夫故人邑子,設祖道(餞行)供張東都門外,送者車數百兩(輛)”(《漢書·疏廣傳》)。從東向長安進攻,或從長安向東撤退,也往往經過東都門。赤眉軍進攻更始政權,是“攻東都門,入長安城”的,後來赤眉軍退

到宜陽一帶，被圍困而向劉秀投降的時候，赤眉的丞相徐宣等叩頭說：“臣等出長安東都門，君臣計議，歸命聖德。”（《後漢書·劉盆子傳》）以上所說東都門，注釋者都認為是東郭門，這是正確的。宣平門也稱東都城門，王莽時，逢萌因其子被殺，“即解冠掛東都城門歸”（《後漢書·逸民列傳》）。杜篤（東漢初年文人）作《論都》說：“明年（建武十九年）有詔復函谷關，作大駕宮，六王邸、高車廡于長安，修理東都城門，橋涇渭”（《後漢書，文苑列傳》）。所說“東都城門”即指宣平門，以區別于東郭門稱“東都門”②。

爲了加強長安城的防衛，十二座城門外十里左右都設有“亭”（外郭亭）。《水經注》和《三輔黃圖》都記載了王莽對十二座門及外郭亭更改的名稱。他把宣平門及其外郭亭改稱爲春王門、正月亭。從這一改名，也可見當時宣平門在十二門中居于首要地位。他又把橫門及其外郭改稱爲朔都門、左幽亭③，朔都門就是北都門的意思。從這一改名，又可見橫門如同宣平門一樣重要，這兩個城門以外的郭門，都具有“都門”的性質。

張衡《西京賦》明確說：“于是量徑輪，考廣袤，經城洫，營郭郭。”說明西漢長安“城洫”以外確有“郭郭”存在。只是“郭郭”只存在于北部和東北部，因而只有北郭門和東郭門。這種“郭郭”該是利用河流連結“里”和“市”的圍牆而成，並不是高大方正的郭城。當時北面和東北面郭區是主要居民區和市區所在，成爲很重要的經濟中心，這和長安城內作爲全國的政治中心，正好相互配合。西漢這種“城”和“郭”連結的佈局，還是沿襲了先秦和秦代都城的制度而有所發展。長安的“城”位于整個都城的西南部，“郭”位于整個都城的東北部，依然是沿用春秋戰國中原地區各大國都城流行的格局，甚至可以說，依然是沿用西周初年東都成周的佈局。所以張衡《西京賦》說西漢長安的營建，“乃覽秦

制，跨周法。”李善注：“跨，超也。因秦制，故曰覽。比周勝，故曰跨之也。”

周公所以要在東都成周建設大“郭”，重要目的之一，是爲了強本弱末，爲了防止殷貴族叛亂，把殷貴族遷居到成周的東“郭。”秦始皇統一六國以後，爲了強本弱末，“徙天下豪富于咸陽十二萬戶”。這十二萬戶不是原有咸陽的東“郭”所能容納，肯定要擴充到咸陽周圍地區。漢高帝建都長安以後，同樣推行強本弱末政策，把關東六國貴族及豪富遷到關中，用來供奉陵園，建成陵邑。先後七個皇帝都遷移東方貴族豪富，設置陵邑。長安東南有霸陵和杜陵，長安東北到西北有長陵、安陵、陽陵、茂陵和平陵。這些陵邑，名義上是近“縣”，實際上具有遠“郭”的性質。班固《西都賦》說：

若乃觀其四郊，浮遊迂縣，則南望杜（杜陵）、霸（霸陵），北眺五陵（長陵、安陵、陽陵、茂陵、平陵），名都對郭，居邑相承。英俊之域，畿甸所興，冠蓋如雲，七相五公。與乎州郡之豪傑，五都之貨殖，三選七遷，充奉陵邑。蓋以強幹弱枝，隆上都而觀萬國也。

這些具有遠郭性質的陵縣，人口衆多，據《漢書·地理志》記載，元始二年（公元2年）茂陵有6萬1千多戶，27萬7千多人，人口數超過了長安；長陵也有5萬多戶，17萬9千多人。一時人才輩出，所謂“英俊之域”，七相五公”，如車千秋（武帝時丞相，長陵邑出身）、田延年（昭帝時大司農，陽陵邑出身）、田何（武帝時大中大夫，杜陵邑出身）等人，都是從齊國遷來的諸田後裔。同時商業發達，經濟繁榮，《史記·貨殖列傳》說：“孝（公）昭（王）治咸陽，因以漢都，長安諸陵，四方輻湊并至而會，地小人衆，故其民益玩巧而事末（末謂末業，即指商業）也。”“關中富商大賈，大抵盡諸田”。而且這些陵縣，在行政系統上有其特殊地位，不屬於三輔管轄，而

由掌管供奉宗廟、陵寢等禮儀的太常主管。其具有支援京都、特別是支援皇室的作用十分明顯。所以說：“蓋以強幹弱枝，隆上都而觀萬國也。”

- ① 《三輔黃圖》引《三輔舊事》、《宮殿疏》皆曰：“興樂宮，秦始皇造，漢修飾之，周迴二十里。”《長安志》卷三、宮室一、“長樂宮”條引《關中記》又說：“周迴二十餘里，有殿十四。”據勘探，周圍約長10,000米，全宮面積約6平方公里。
- ② 《漢書·宣帝紀》五鳳三年“三月辛丑鸞鳳又集長樂宮東闕中樹上。”《漢書·劉屈氂傳》：“太子（戾太子）引兵驅四市人，凡數萬衆，至長樂西闕下，逢丞相軍合戰五日。”
- ③ 《三輔黃圖》卷二說：“未央宮周圍二十八里。”《西京雜記》卷一說：“未央宮周匝二十二里九十五步五尺”，《長安志》卷三、宮室一、“未央宮”條引《關中記》說：“未央宮周旋三十一里。”據勘探，全宮平面方形，東西牆各長2,150米，南北牆各長2,250米，周圍長8,800米，約合漢代二十二里，與《西京雜記》相合。面積約5平方公里。
- ④ 《史記·樛里子傳》說：“昭王七年樛里子卒，葬于澗南章臺之東，（遺言）曰：後百歲是當有天子之宮夾我墓。至漢興，長樂宮在其東，未央宮在其西，武庫正直其墓。”《論衡》卷二十六《實知篇》有同樣記述。
- ⑤ 考古研究所漢城工作隊：《漢長安武庫遺址發掘的初步收穫》，《考古》1978年第4期。
- ⑥ 《漢書·劉屈氂傳》說：“太子（戾太子）亦遣使者橋（矯）制赦長安中都官囚徒，發武庫兵，命傅石德及賓客張光等分將。”太子赦囚徒和發武庫兵，必須“矯制”，可知發武庫兵必須皇帝詔令。
- ⑦ 《漢書·郊祀志下》說：“于是作建章宮，度爲千門萬戶，前殿度高未央，其東則鳳闕，高二十餘丈。”《三輔黃圖》卷二引《三輔舊事》：“建章宮周迴三十里，東起別鳳闕，高二十五丈，乘高以望遠。又

于宮門北起鳳闕，高二十五丈，上有銅鳳凰。”又引《廟記》云：“建章宮北門高二十五丈，建章北闕門也。又有鳳凰闕，漢武帝造，高七丈五尺。鳳凰闕一名別鳳闕。”

- ⑨ 孫星衍輯本《漢舊儀》作“方六十里”。《三輔黃圖》卷一說：“周園六十五里”。又引《漢舊儀》云：“經緯各長三十二里十八步。”但是各家所引《漢舊儀》都說“地九百七十三頃。”據實測，長安城周圍25,100米，合漢代近六十三里。
- ⑩ 今相家巷村東出土陶質、石質五銖錢範，散布範圍約1平方公里，並出土許多雲紋瓦當，當是鑄錢的鍾官官署所在。相家巷以西的六村堡，正當漢城的西北角，散佈有大量殘陶俑（男女俑、牛馬俑等），并有雲紋瓦當發現，當是某一官署所屬的制俑作坊。見俞偉超《漢長安城西北部勘查記》，《考古通訊》1956年第5期。
- ⑪ 王仲殊《漢長安城考古工作的初步收穫》（《考古通訊》1957年第5期）說：“霸城門兩側的牆各向外折出，略如後世甕城。”王仲殊《漢長安城考古工作收穫續記》（《考古通訊》1958年第4期）說：“在宣平門的南北兩側，城牆各向外突出，這和霸城門的情況是相同的。”
- ⑫ 南牆東門覆盎門，又稱杜門或下杜門，《三輔黃圖》說：“覆盎門一號杜門，……其南有下杜城，《漢書》集注云：故杜陵之下聚落也，故曰下杜門”，《水經注·渭水》只說覆盎門因其南有下杜城而稱爲下杜門，不說“一號杜門”。當以《水經注》爲是。《水經注》稱覆盎門一名下杜門，以與洛城門“本名杜門”相區別。
- ⑬ 《史記·三代世表》褚先生曰：“會旗亭下”，集解：“《西京賦》曰：旗亭五重，薛綜曰：旗亭，市樓也，立旗于上，故取名焉。”
- ⑭ 《周禮·地官·胥師》：“各掌其次之政令，而平其貨賄，憲刑禁焉。”
- ⑮ 見《說文》“閭”“閭”等字解說和《後漢書·班固傳》所載《西都賦》李賢注。
- ⑯ 王楓林《咸陽古迹略》十八“咸陽橋”下注（二）說：“據東渭橋出土

唐開元重修東渭橋碑推算，當時橋址距現在渭河南岸約5華里。由此推算，渭河平均每250年北移1里，中渭橋爲秦始皇時所建，具體年代史無記載，如以公元前230年估算，距今當在2000年左右，渭水北移里數約有8里之多”。（1980年咸陽文管會編印）這一估計是正確的。與《三輔黃圖》及蘇林所說“渭橋在長安北三里”相合。

- ⑩ 棘門，亦稱戟門，古時宮門立戟，稱爲戟門。這個門由秦代咸陽宮的宮門改建而成，因而有“棘門”之稱。
- ⑪ 《史記·文帝紀》：“後六年冬匈奴三萬人入上郡，三萬人入雲中。以……河內守周亞夫爲將軍居細柳，宗正劉禮爲將軍居霸上，祝茲侯軍棘門以備胡。”集解：“徐廣曰：在渭北，駟案孟康曰：在長安北，秦時宮門也。如淳曰：《三輔黃圖》棘門在橫門外。”《漢書·文帝紀》同，顏師古注引孟康、如淳之說亦同。
- ⑫ 《漢書·元帝紀》建昭元年條：“秋八月有白蛾羣飛蔽日，從東都門至枳道。”顏注引如淳曰：“《三輔黃圖》云：長安城東面北頭門號曰宣平城門，其外郭曰東都門也。”沒有“宣平門民間所謂東說門”之說，與今本《三輔黃圖》不同，可能古本沒有這句話。今本《三輔黃圖》說：“其郭門亦曰東都門，”陳直《三輔黃圖校正》第23頁（陝西人民出版社1980年出版），依據《玉海》改作“其郭門亦曰東郭門”，是錯誤的。《水經注·渭水》也說：宣平門“一曰東都門，其郭門亦曰東都門。”
- ⑬ 《漢書·疏廣傳》：“廣遂稱篤，上疏乞骸骨，……公卿大夫故人邑子設祖道，供張東都門外。”顏注引蘇林曰：“長安東郭門也。”按《漢書》三處提到東都門，除《疏廣傳》外，還有《元帝紀》和《昌邑王傳》，都是指東郭門。《後漢書·劉盆子傳》：“遂攻東都門，入長安城，更始來降。”李賢注：“《三輔黃圖》曰：宣平門，長安城東面北頭第一門也，其外郭名東都門。”
- ⑭ 《後漢書·逸民列傳》逢萌“即解冠掛東都城門歸”。李賢注：“《漢宮殿名》：東都門今名青門也。”前書《音義》曰：“長安東郭城北頭第一

門。”《太平御覽》卷一百八十三引《漢宮殿名》也說：“郭門，東都門，今名青門。”現今宣平門遺址附近有村名青門口、青門口東村和青門口西村等。宣平門在五胡十六國時代曾改名青門，詳見王仲殊《漢長安城考古工作續記》第五段“城門名稱的變更”（《考古通訊》1958年4期）。《漢宮殿名》誤以爲東都門（即東郭門）名青門。逢萌掛冠的東都城門當即宣平門，稱爲東都城門，以區別于東郭門稱“東都門”。

- ② 陳直《三輔黃圖校證》第26頁，于“橫門”下，依據畢本增補“王莽更名朔都門左幽亭”十字，按《水經注·渭水》：“橫門，王莽更名霸都門左幽亭。”“霸”乃“朔”字之誤。陳直說：“王莽所改十二城門名與亭名，或取四字聯文，如宣平門改爲春王門正月亭是也。或取義相對舉，如安門改爲光禮門顯樂亭是也。本文‘朔’‘幽’二字皆地名，義亦相聯。又余舊藏有‘朔’字瓦，正面繩文，背面用陶範打印朔字十方（按見陳直《摹廬叢著七種》第372頁，齊魯書社1981年出版），疑即王莽朔都門所用之瓦。”按陳氏校正《水經注》“霸”字爲“朔”字之誤，甚是。惟亭名仍當從《水經注》作“幽”爲是。《玉海》卷一百六十九引《三輔黃圖》正作“莽更曰朔都門左幽亭”。《尚書·堯典》：“申命和叔，宅朔方，曰幽都，平在朔易”。《史記·五帝本紀》引“朔方”作“北方”。《爾雅·釋訓》：“朔，北方也。”《五帝本紀》索隱：“《山海經》曰：北海之內有山名幽都，蓋是也。”王莽改名爲朔都門左幽亭，當即依據《堯典》。

十一 東漢、北魏洛陽“城”和“郭”的佈局

1 東漢洛陽城的內城性質及其“坐北朝南”佈局

東漢都城洛陽遺址，即所謂漢魏故城，在今河南省洛陽市以東15公里。傳統的說法，認爲漢魏故城原是西周的東都成周

舊址，是不正確的。這裏原是戰國時代東周（從周分裂出來的小國）的城市。蘇秦就是東周洛陽乘軒里人。洛陽原是新興的商業城市，人口衆多，戰國末年被秦攻佔後，河南（今洛陽市）和洛陽曾作爲呂不韋（？—前225年）的封邑，人口多到十萬戶。

洛陽故城呈不規則的長方形，南北長約當時9里多，東西寬約當時6里多，被稱爲“九六城”^①。遺址的南牆已被洛水沖毀，西牆殘存4,290米，北牆長3,700米，東牆殘長3,895米，連同南牆約長13,000米，約合漢代31里，基本與文獻相合。城內總面積約9.5平方公里（參看卷首圖版十六）。

秦及西漢時，洛陽已有南宮和北宮，漢高帝即帝位於汜水之陽以後，曾“置酒雒陽南宮”，見《史記·高祖本紀》。《正義》引《輿地志》說：“秦時已有南北宮”^②。東漢光武帝（公元25—57年）就是到南宮的却非殿以後，定都洛陽的。光武帝在建武十四年（公元38年）正月“起南宮前殿”（《後漢書·光武帝紀》）。這個南宮前殿當即崇德殿。後來魏明帝（公元227—239年）就在崇德殿的舊址上起建太極殿^③。據《元河南志》的《後漢京城圖》，却非殿即在南宮的端門以南，崇德殿即在却非殿之後，前有章臺門（參看圖37）。

北宮的重建，在漢明帝時。永平三年（公元60年）“起北宮及諸官府”，八年冬十月“北宮成”（《後漢書·明帝紀》）。北宮中的大殿是德陽殿。德陽殿東西寬37丈4尺，南北長7丈^④，與秦代阿房宮和西漢未央宮前殿相比，面積還不算太大，但是德陽殿的“庭”很大，和阿房宮一樣可以容納一萬人。它的陛（臺階）高2丈，殿前有朱雀五闕，高聳人雲，從四十里外便可望見^⑤，規模很是雄偉。

東漢洛陽的佈局，顯然和西漢長安不同。西漢長安主要宮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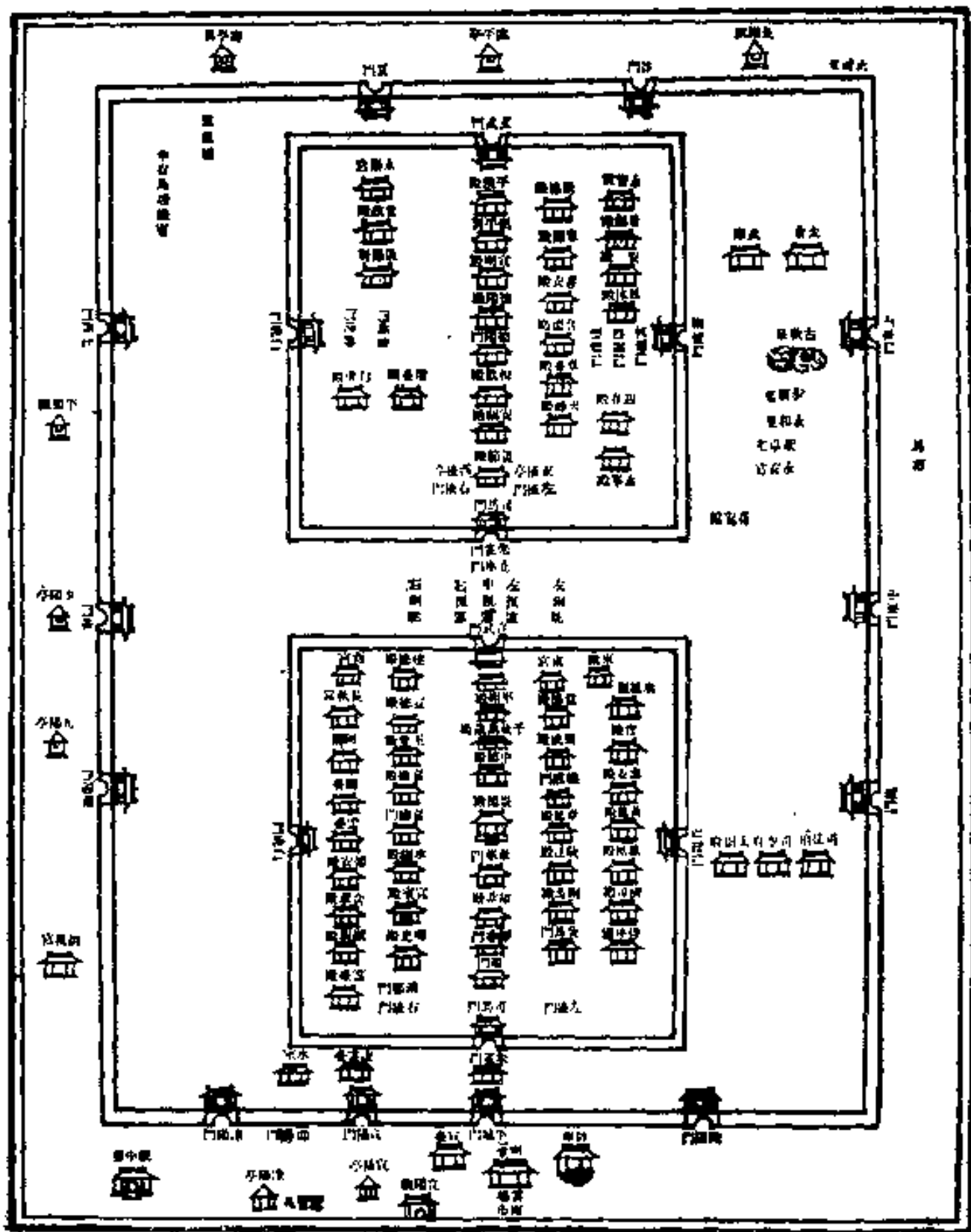


圖37 後漢宮城圖

(據《大業大典》卷9561引元人《元河南志》所載插圖重新繪制，原圖《考古學報》1959年第2期《古代洛陽圖十四幅》曾刊載)

此圖在上東門外東南有馬市，平城門外明堂、雲陽以南有南市，說明二市在漢已存在。此圖在不少城門以外郭區畫有一亭，如夏門西北有萬壽亭，穀門西北有臨平亭，說明東漢洛陽沿襲西漢長安制度，在每個城門外郭區邊境設有一亭，加強防衛。城外東北角有“止商里”，當作“上高里”，見於《後漢書·鮑永傳》李賢注所引《東觀漢記》與陸機《洛陽記》，說明城外郭區有居民的“里”。

是長樂宮和未央宮，東西橫列，以東門為正門。東漢洛陽主要宮室是南宮和北宮，南北縱列，以南門為正門。位于長安城東南部的長樂宮主要用作太后住處，位于長安城西南部的未央宮是朝廷中心，大朝會都要在未央宮前殿舉行。洛陽的北宮中有永樂宮和永安宮作為太后住處，但是北宮和南宮都用作朝廷，元旦的大朝會規定在北宮的德陽殿舉行(參看圖3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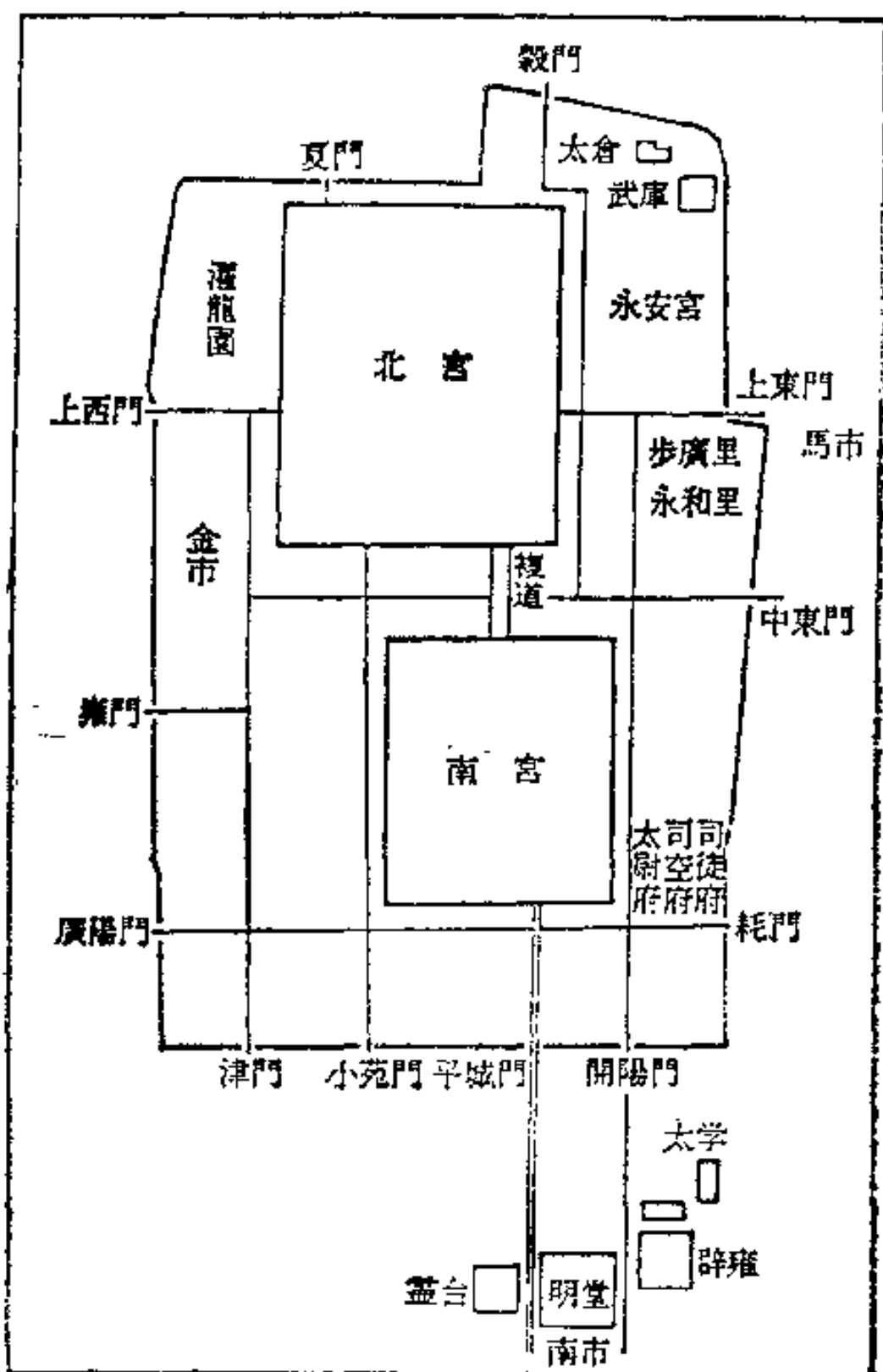


圖 38 東漢洛陽城內宮室分佈圖
 (採自日本尾形勇《東亞細亞的世界帝國》，日本講談社1985年出版)

長安的城門，四面各有三門，以東牆的城門作為正門，設有門闕。并以東牆北門（宣平門）為主要城門，有“東都城門”之稱，宣平門外的東郭門又稱“東都門”。洛陽的城門，東、西兩面各三門，北面只二門，南面有四門，以南面偏東的平城門為正門。蔡邕說：“平城門，正陽之門，與宮連，郊祀法駕所由從出，門之最尊者也。”（《續漢書·五行志（一）》）平城門從南向北，直對南宮的南門（朱雀門），主要供皇帝出南門外郊祀之用，所以是“門之最尊者。”在十二城門中，只有平城門作為宮門看待，屬衛尉管理，設有司馬主管，秩千石，其他十一門都屬城門校尉管理，設有候主管，秩六百石^①。值得注意的是，平城門原來是沒有的，是建武十四年南宮前殿建築以後開闢建設的。南宮前殿起建于這年正月，平城門開闢于這年九月。《古今注》（《續漢書·百官志（四）》劉昭注引）說：“建武十四年九月開平城門^②。”可知平城門不但供皇帝出南門郊祀使用，而且為了羣臣前往南宮前殿參加朝會。這是當時對朝會禮制的一次重大改革。

西漢的禮制規定，到未央宮參加朝會要從東闕進入，上書或要求謁見要到北闕。主管接受上書和謁見的“公車司馬”也在北闕。而東漢的禮制，參加朝會要從南門進入，上書或要求謁見也要到南闕。《續漢書·百官志》說，衛尉所屬公車司馬一人，“掌宮南闕門，凡吏門上章、四方貢獻及徵詣公車者”。這個禮制的改變，就使得整個都城佈局發生重大變化，從此宮室的南門成為主要門戶，南面的平城門也成為主要城門。而北面的兩座城門失去重要性，夏門（北牆西門）常被用作送喪的通道^③，穀門（北牆東門）還被用作送罪犯出城行刑的地方^④。

由于洛陽城坐北朝南，儲備糧食和兵器的太倉和武庫都造在城內東北角，位于北宮東北。《洛陽記》（《後漢書·張滂傳》注

引)說：“建始殿東有太倉，倉東有武庫。”武庫以東城牆為屏障，靈帝時武庫及東垣(東城牆)屋前後毀壞，蔡邕說：“東垣，庫之外障。”(《後漢書·五行志(一)》)《元河南志》的《後漢京城圖》，畫武庫在太倉之西，是錯誤的。太倉建于狄泉之北，狄泉與陽渠相通^⑩，以便漕運。作為朝廷大臣的“三公”的官府則設在南城牆東門(開陽門)內，《古今注》說：“永平十五年更作太尉、司徒、司空府開陽城門內”。靠近南宮的東門。司徒府和南宮的東闕相對。蔡質《漢儀》說：“司徒府與蒼龍闕對。”(以上都見《後漢書·百官志(一)》劉昭注引)

儘管東漢洛陽與西漢長安佈局不同，然而城的性質沒有改變，洛陽城依然屬於內城性質。南宮和北宮不僅面積很大，而且佔據城中主要部位，不僅北宮的北牆靠近北城牆，南宮的南牆也靠近南城牆，南門與平城門相連接。司徒、司空二府“光觀壯麗”(《太平御覽》卷二百〇七引《漢官儀》)。所有宮殿、倉庫、官署，和西漢長安一樣，佈滿整個都城之內。華延雋《洛陽記》說：“洛陽城內，宮殿、臺觀、府藏、寺舍，凡有一萬一千二百十九門。”(《玉海》卷一百七十三漢洛陽城所引)。《太平寰宇記》卷三洛陽縣下，引《洛陽記》說“洛陽城東西七里，南北九里，內宮殿、臺觀、府藏、寺舍，晉魏之代，凡有一萬一千二百一十九門。自永嘉之亂，劉曜入洛陽，元帝渡江，官署里閭，鞠為茂草”。班固《東都賦》說：“是以皇城之內，宮室光明，闕庭神麗，奢不可踰，儉不能侈”。的確，洛陽整個城屬於“皇城”(內城)性質。

2 北魏洛陽城的內城性質及其“南向”佈局

東漢以後，洛陽城曾多次在戰亂中被毀，多次重建。東漢末年洛陽被毀後，魏曹丕(公元220—226年)建都時，就在原有基礎

上加以修復，并有所擴建。魏明帝(公元227—239年)在東漢南宮崇德殿的基礎上建造太極殿，這是此後皇宮正殿稱太極殿的開始。還曾在北宮以北增闢芳林園，在城西北角建築金墉城。金墉城具有防守用的堡壘性質。西晉建都洛陽，雖然有所興建，大體上還是沿襲舊的佈局，沒有大的變化。

西晉末年洛陽被毀，等到北魏孝文帝(公元471—499年)從平城遷都到洛陽，就在廢墟上重新建設，對原有的都城佈局作了調整。省去了南宮，在原來北宮的基礎上建成一宮，位于城的中北部，略偏西。宮牆呈長方形，南北長約1,398米，東西寬約600米，面積約1平方公里，佔全城面積十分之一。從東城牆北門(建春門)到西牆北門(閶闔門)有一條橫貫全城的東西向大街，穿過宮牆東門和西門，將皇宮分成南北兩半。南半為朝會之處，北半為寢宮所在。在南半的中北部偏西處，建有正殿太極殿，這就是日常朝會的大殿。經實測，殿基作長方形，東西寬約100米，南北長約60米，基址高出地面4米。宮的南牆西段，向北對直太極殿處，設有正門閶闔門。經實測，門洞缺口寬達46米，是整個洛陽城中形制最大的一座城門建築。從閶闔門向南，直到南城牆的宣陽門，有一條貫通南北的大街，寬41—42米，稱為銅駝街，成為城內南北向的中軸綫。原來東漢北宮的南門外，大街兩側，安置一對銅駝，稱為銅駝街。華延儁《洛陽記》(《太平御覽》卷一百九十五引)說：“兩銅駝在宮之南街，東西相對，高九尺。漢時所謂銅駝街。”北魏的銅駝街，就是把東漢北宮南門外的正南大街延長，穿過原來南宮基地，直到宣陽門。

據《洛陽伽藍記》卷一，沿御道(即銅駝街)東西兩旁，在原來南宮的基址上，建設有一系列的中央官署。道東為左衛府(左衛將軍府)、司徒府、國子學、宗正寺、太廟、護軍府及衣冠里，道西為

右府(右衛將軍府)、太尉府、將作曹、九級府、太社、凌陰里。凌陰里“即四朝時(東漢、曹魏、西晉、北魏)藏冰處”，原是東漢南宮的謬臺舊址。《水經注·穀水》說：“《洛陽諸宮名》曰：南宮有謬臺、臨照臺；《東京賦》曰：其南則有謬門曲榭，邪阻城洫。注云：謬門，冰室門也。”說明北魏雖然廢去南宮，利用南宮舊址修築一系列中央官署，但是對於南宮中某些有特殊用處的建築，如藏冰處之類，還是仍舊利用的。

北魏這樣把中央官署集中建設于官南大街兩側的佈局，比東漢把中央官署造在南宮東南更為合理。東漢末年曹操為魏王，定都于鄴(今河北省臨漳縣西南鄴鎮東)，就曾把中央官署集中造在宮南大街的東西兩側。鄴城東西七里，南北五里，城中有一條東西向的大道，把全城分成南北兩半。北半部的正中為宮室，東為貴族所居的戚里，西為王室的銅雀苑，另有白藏庫、武庫、乘黃廄(養馬場)在銅雀苑以西靠西城牆下。宮室分東西二部，西部有文昌殿為朝會之所，東部有聽政殿為日常聽政之處，即內朝所在。文昌殿外的正門稱端門，聽政殿的正門稱司馬門。司馬門內有一系列內朝的官署如尚書臺、御史臺閣、郎中令府、內醫署等；司馬門外正南大道兩側又有一系列外朝的官署如相國府、御史大夫府、奉常寺、大農寺等。同時東掖門正東大道南側更有大僕卿寺、中尉寺等(詳見《文選》卷六《魏都賦》李善注)(參看圖39)。鄴都這種集中建設主要中央官署于司馬門外的設施，為北魏所效法。

北魏洛陽佈局之所以能夠整齊而有條理，是綜合採用中原幾個都城優點的結果。北魏貴族原是鮮卑族拓跋氏，原來經濟和文化都比較落後。當道武帝(拓跋珪公元386—409年)于天興元年(公元398年)遷都平城(今山西大同市東北)時，還沒有城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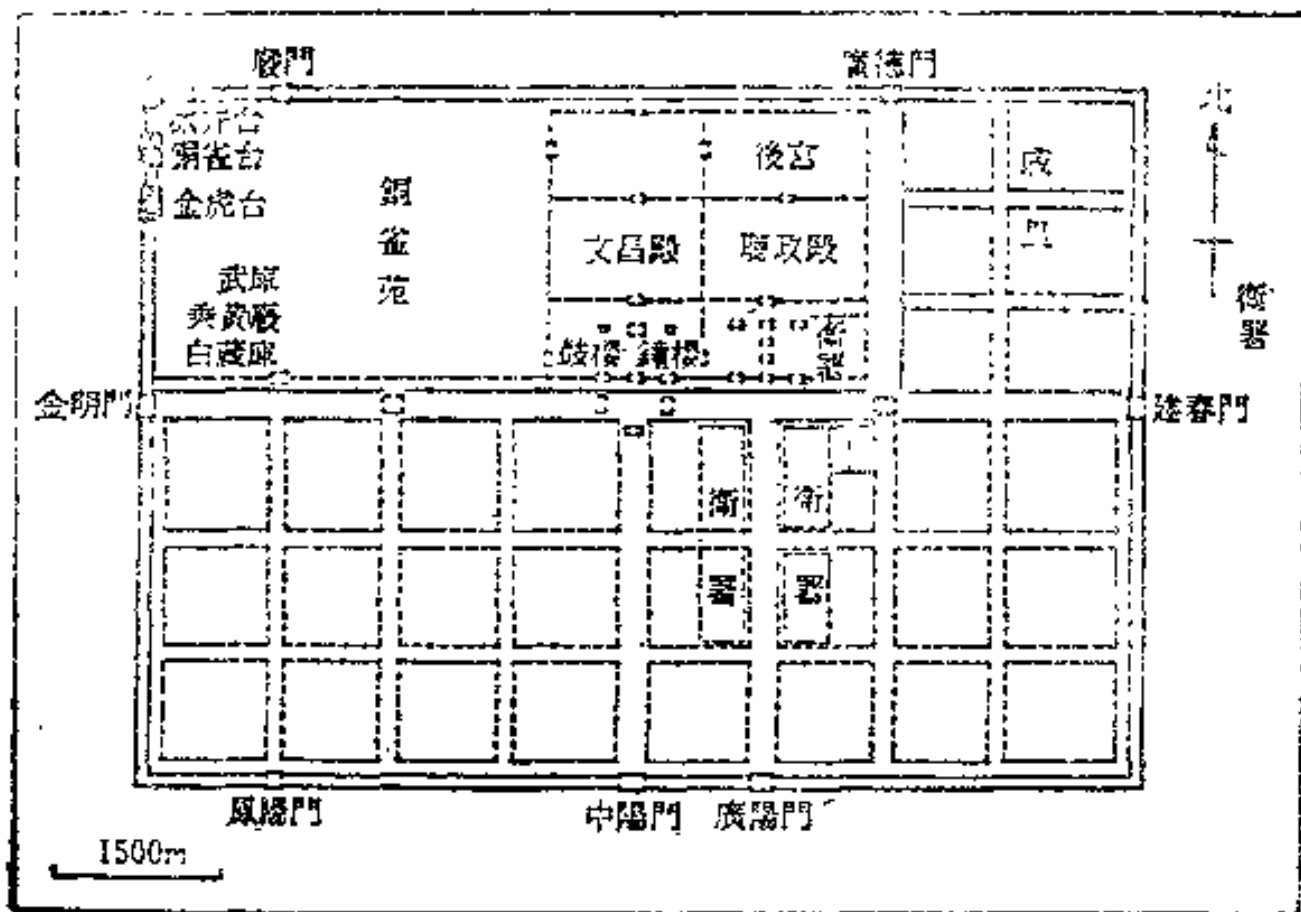


圖39 曹魏鄴城的佈局結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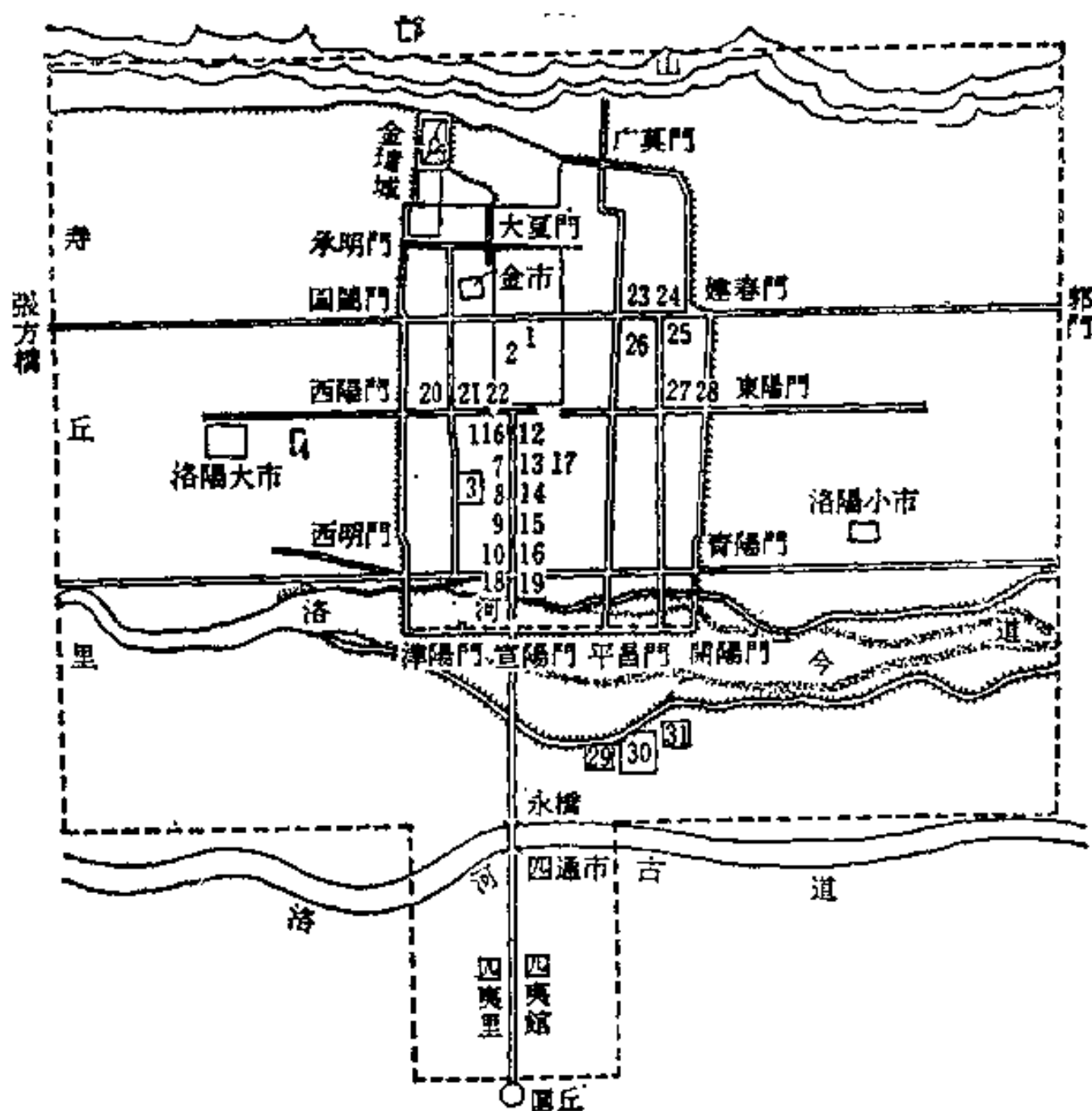
(採自劉敦楨主編《中國古代建築史》與日本尾形勇《東亞細亞的世界帝國》)

八年以後，才逐步興建，是模仿鄴、洛陽、長安的。《魏書·莫含傳》說：“太祖（道武帝）欲廣宮室，規度平城，四方數十里，將模鄴、洛陽、長安之制”。但是平城的建設還比較簡陋，還保持着拓跋氏的禮俗，除了正月祭祀五方帝于南郊以外，四月還要祭天于西郊的方壇，壇上豎立七個木人，由女巫登壇搖鼓祭祀。同時又設祖廟于白登山。到孝文帝（公元471—499年）進行改革，一方面採用中原禮制，廢除原有的禮俗，一方面又模仿中原都城，對平城進行改建。太和十年（公元486年）正月朔日“帝始服袞冕，朝饗萬國”；十二年築圜丘于南郊，十三年“初備大駕”，到圜丘祭天，並立孔子廟于京師；十五年建成明堂，并把太廟改建；十六年拆除大華殿，建成太極殿；十七年正月朔日“饗百寮于太極殿”（《魏書·高

祖紀》)。十八年“詔罷西郊祭天”(《魏書·禮志》)。每年南郊祭天典禮的舉行，太廟中祭祖儀式的舉行，元旦朝賀皇帝儀式的舉行，使得北魏都城的佈局和宮殿、宗廟等建築，不能不作相應的改造。

孝文帝在改建平城的過程中，十分注意吸取過去中原都城佈局及其建築的優點。將營建太廟和太極殿的時候，曾派蔣少游到洛陽，“量準魏晉基址”(《魏書·蔣少游傳》)；還曾派蔣少游作為李彪的副使，出使江南，“密令觀京師(南齊都城建康)宮殿楷式”(《南齊書·魏虜傳》)。後來孝文帝遷都洛陽，建設新都，就是在改建平城規劃的基礎上作了進一步的發展。這樣就可以擺脫舊禮俗的束縛，進一步綜合採用中原幾個都城的優點，作出更加整齊而有條理的佈局了。

北魏洛陽城有十三座城門，其中十二座門是東漢以來原有的，只有在西城牆北頭緊靠金墉城地方另開了一座門，稱承明門。原來西城牆中門(東漢稱雍門，北魏稱西陽門)從舊址向北移動約500米，使得與東城牆中門(東漢稱中東門，北魏改稱東陽門)對直。全城除了銅駝街以外，還有南北向的街三條，東西向的街四條，用來連通四面的城門。其中以東西向的中間二條大街較為重要，既用來連通城內宮殿和官署的東西兩側地區，又用來連通城外東西側的“郭”區。從東城牆北門(建春門)，穿過宮牆東門和西門，直到西牆北門(閭闔門)的大街，寬約35—51米。據《洛陽伽藍記》卷一“景林寺”條，建春門內大街南側設有勾盾署、典農署、籍田署⑩。從東城牆中門(東陽門)直通到西城牆中門(西陽門)的大街，寬約41米。據《洛陽伽藍記》卷一“昭儀尼寺”條，東陽門內大街北側有太倉署、導官署⑪。洛陽城內東部這些官署都是主管農業和糧食的。西陽門內大街北側有大僕寺、乘黃署、武庫署⑫。城內西部這些官署是主管車馬、養馬和兵器的(參看圖40)。



- 1—宮城 2—殿址 3—永寧寺 4—白馬寺 5—金墪城 6—右衛府 7—太尉府
 8—符作曹 9—九級府 10—太社 11—御史台 12—左衛府 13—司徒府 14—
 國子半堂 15—崇正寺 16—太廟 17—景樂寺 18—司州 19—護軍府 20—太
 僕寺 21—乘黃署 22—武庫署 23—籍田署 24—典農署 25—勾盾署 26—司
 農署 27—導官署 28—太倉署 29—臺台 30—明堂 31—太學

圖40 北魏洛陽城平面圖

(依據宿白《北魏洛陽城和北邙陵墓》，《文物》1978年第7期。採自賀業
 鈞《考工記營國制度研究》，中國建築出版社1985年出版)

北魏在都城中，對官署的佈局作了有系統的安排和調整，把主要的中央高級官署安置在宮的正門前的銅駝街兩側，并把主管糧食和軍需的官署分佈在城內東部和西部，都是為了加強中

中央集權的統治，充實都城的政治和軍事力量。原來在東城牆北門（建春門）以內大街北側的步廣里，這時改作河南尹的官署，以加強對城內居民的管理。顯然，北魏對洛陽城內官署的安排有了很大的改進。

北魏洛陽城內設有許多建築住家的“里”。從《洛陽伽藍記》記述寺院連帶談到的“里”來看，都是大小官吏住宅。例如西陽門以內大街北側的延年里，是宦官劉騰住宅；銅駝街西側永寧寺以西的永康里，原是東漢太尉荀彧住宅，這時是將軍元義住宅。銅駝街東側司徒府以東有大將軍高肇的住宅。東陽門以內昭儀寺南的宜壽里，原是晉侍中荀勗舊宅。這時成爲苞信縣令段暉住宅。清陽門以內修梵寺北的永和里，原是董卓住宅，這時成爲尚書右僕射郭祚等六人住宅。“皆高門華屋”，“當時名爲貴里”。在太倉、導官二署東南的治粟里，就是二署官員的住宅。

洛陽城西原有一“市”，爲晉代三市之一。《晉書·地理志》謂洛陽有“五部三市”。因爲西方，五行屬“金”稱爲“金市”。晉代在西城牆中門以內一里的大街北側，北魏移到靠近官牆西門（千秋門）以外的大道北側^④。

十分清楚，北魏洛陽儘管佈局作了調整，依然是內城的性質，它只是個政治和軍事的中心。

3 漢魏洛陽城外的西面“郭”區

漢魏洛陽城的內城性質，是和西漢長安城一樣的。但是它的佈局與長安城不同，從坐西朝東改爲坐北朝南，因此它的“郭”區，也從分佈在東、北兩面改爲分佈到東、西、南三面。因爲東漢、魏晉有關這方面的史料缺乏，我們只能先從北魏的情況談起。

北魏在建都平城的時候，就曾模仿鄴和洛陽，建設外郭城。

道武帝天賜三年(公元406年)“規立外城,方二十里,分置市里,經塗制達,三十日罷”(《魏書·太祖紀》)。這僅是規劃性質,準備建立外郭,分設作為商業區的“市”和作為居住區的“里”。外郭的實際建成,是在十六年後。明元帝(公元409—423年)泰常七年(公元422年)“築平城外郭,周迴三十二里”(《魏書·太宗紀》)。郭城的結構模仿中原都城,“其郭城繞宮城南,悉為坊,坊開巷,坊大者容四五百家,小者六七十家,每閉坊搜檢,以備奸巧”(《南齊書·魏虜傳》)。這樣郭城環繞于宮城以南,把郭城完全劃分為坊里的辦法,顯然是沿用洛陽和鄴的制度。所設坊里大小,也沿用中原都城的辦法,後來北魏洛陽外郭的建設,還是沿用這種佈局,只是坊里規劃得更為整齊劃一。

關於北魏洛陽整個佈局的情況《洛陽伽藍記》卷五卷末說:

京師,東西二十里,南北十五里,戶十萬九千餘。廟、社、宮室、府曹以外,方三百步為一里,里開四門,門置里正二人,吏四人,門士八人,合有二百二十里,寺有一千三百六十七所。

“合有二百二十里”,當為“合有三百二十里”之誤。三百二十個“里”,是景明二年(公元501年)興建的。《魏書·世宗紀》載:景明二年“九月丁酉發畿內夫五萬人,築京師三百二十坊,四旬而罷”。“坊”就是“里”,當時可以通稱,這個築坊的計劃,是廣陽王嘉擔任州牧時提出的建議。《魏書·廣陽王嘉傳》說:“遷司州牧嘉表請于京四面築坊三百二十,各周一千二百步,乞發三正復丁(畿內免除課役的丁男)以充茲役,雖有暫勞,奸盜永止。詔從之。”所說“各周一千二百步”,和《洛陽伽藍記》所說“方三百步為一里”正相符合。

既然“方三百步為一里”,三百二十個“里”的面積就該有320個平方里。漢魏洛陽城,東西寬6里多,南北長9里多,整個面積

約有54平方里，而且城內有廟、社、宮室、府曹的建築，佔很大面積。因此，北魏在洛陽所建築的320個“里”，大部份應該分佈在“郭”區。洛陽城北靠邙山，“郭”區主要分佈在東、西、南三面。宿白制作了一張《北魏洛陽郭城設計復原圖》，把洛陽城(內城)的面積劃成東西6個“里”、南北9個“里”，把整個洛陽(包括“城”區和四周“郭”區)劃成東西20個“里”、南北15個“里”，并在南邊中央畫成長方形的凸出部份，計東西4個“里”，南北5個“里”，這樣正好劃成320個“里”(參看圖41)，這樣復原設計是有一定依據的，因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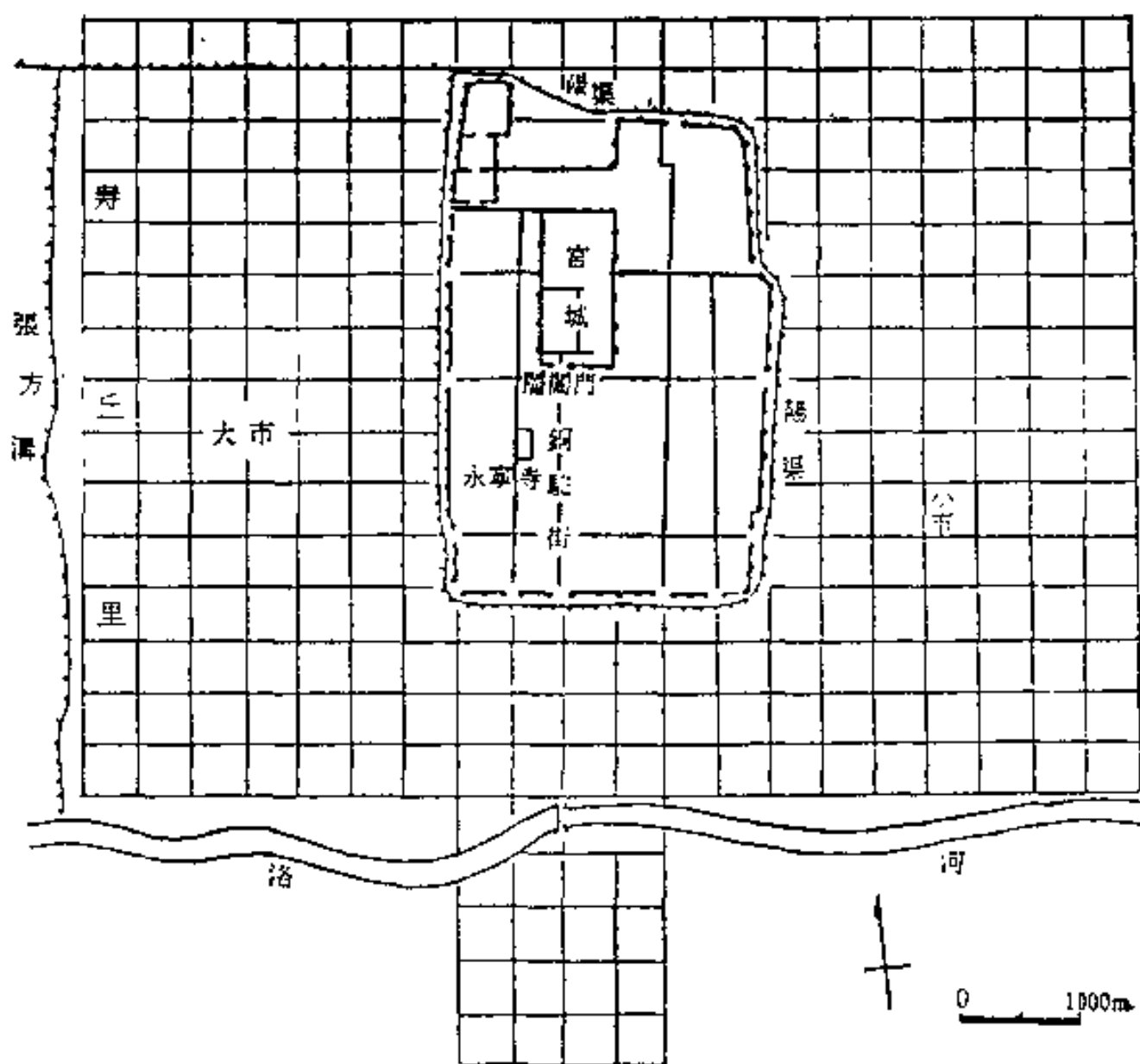


圖41 北魏洛陽郭區復原圖

(採自宿白《北魏洛陽城與北邙陵墓》，《文物》1978年第7期)

《洛陽伽藍記》對城東(卷二)、城南(卷三)、城西(卷四)、城北(卷五)有關寺院的記述，基本上就是以這樣的“郭”區為範圍的，所記城西的“郭”區尤其明顯。

《洛陽伽藍記》卷四記述城西“郭”區邊界的張方溝和張方橋說：

自退結(里)以西，張方溝以東，南臨洛水，北達芒山，其間東西二里，南北十五里，并名爲壽丘里，皇宗所居也，民間號爲王子坊。

出閶闔門城外七里長分橋。中朝時以穀水浚急，注于城下，多壞民家，立石橋以限之，長則分流入洛，故曰長分橋。或云：晉河間王在長安，遣張方征長沙王，營軍于此，因爲張方橋也。未知孰是。今民間訛語，號爲張夫人橋。軼士送迎，多在此處。

北魏(征西將軍)崔延伯出師于洛陽城西張方橋，即漢夕陽亭也。時公卿祖道(餞行)，車騎成列。

這條“南臨洛水、北達芒山”的張方溝及其堤岸，實際上就是城西“郭”區的邊界，也就是西“郭”的防禦設施，相當于郭城的作用。張方橋或長分橋就是張方溝上唯一的橋梁，它直對洛陽城西牆北門(閶闔門)大街，這是洛陽西“郭”主要出入通道，具有西郭門的性質，所以人們送迎或餞行，多在此處，如同西漢長安的東郭門(即東都門)一樣，因爲此處形勢險要，無論從洛陽出師或者進軍洛陽，必須在此處駐屯，在張方溝以東的壽丘里，東西二里，南北十五里，也是利用這條溝作爲屏障的。這條南北向的大溝，南通洛水，北接邙山，正好十五里，說明當時洛陽城西“郭”區，確是南北有15個“里”。由此可見按照南北15個“里”來設計復原是可行的。

既然《洛陽伽藍記》說張方橋即是漢夕陽亭，那末，這個洛陽西“郭”的關口，漢代早就建立了。《後漢書·楊震傳》載：漢安帝時

(公元106—125年),太尉楊震因進諫而受到宦官迫害,遣歸本郡,“震行至城西夕陽亭⑤,乃慷慨謂其諸子門人曰:死者士之常分。……因飲酖而卒。”《東觀漢紀》有相同的記載,惟作“震到洛陽都亭”。都亭原是指“郭下之亭”⑥。東漢所說“洛陽都亭”,就是指具有郭門性質的夕陽亭。相傳漢明帝時,仙人王喬做葉縣的縣令,每當上朝,門鼓不擊自鳴。死後百姓立為祠,“明帝迎取其鼓,置都亭下,略無音聲,太史候望在上西門上,遂以占星辰,省察氣祥”(《風俗通義》卷二“葉令祠”條)。從這個故事,說明東漢洛陽都亭,不是指一般的“郭下之亭”,而是專指上西門外的夕陽亭,這裏是洛陽西“郭”的重要門戶,是出入必經的要道。漢安元年(公元142年)順帝選派八個使者出去巡查,張綱是其中之一,他“獨埋車輪于洛陽都亭,曰:豺狼當路,安問狐狸?”(《後漢書·張綱傳》)東漢洛陽都亭也和北魏張方橋一樣,常常被用作出兵時駐屯之所。漢靈帝(公元168—189年)時,大將軍竇武計謀除去宦官,因計謀洩漏,宦官們就劫持太后,派人要捉他,他便“召會北軍五校士數千人屯都亭下”,後因軍隊歸向宦官,被圍而自殺,“梟首洛陽都亭”(《後漢書·竇武傳》)。中平元年(公元184年)黃巾起義,“以(何)進為大將軍,率左右羽林五營士屯都亭,修理器械,以鎮京師”(《後漢書·何進傳》)。所說“都亭”,都是具有郭門性質的夕陽亭。

東漢洛陽如同西漢長安一樣,每座城門外都有一個外郭亭,蔡質《漢儀》(《續漢書·百官志》劉注引)說:“洛陽二十四街,街一亭;十二城門,門一亭”⑦。但是,夕陽亭地位重要,不同于一般的外郭亭,具有郭門的作用。

西“郭”是北魏洛陽的主要市區。西陽門(西城牆中門)以外四里,即白馬寺以西一里,大道以南有洛陽大市。《洛陽伽

藍記·卷四說：

出西陽門外四里，御道南有洛陽大市，周迴八里。……市東有通商、達貨二里，里內之人，盡皆工巧，屠販爲生，資財巨萬。……市南有調音、樂律二里，里內之人，絲竹謳歌，天下妙伎出焉。……市西有退酤、治觴二里，里內之人，多醞酒爲業。……市北慈孝、奉終二里，里內之人，以賣棺槨爲業，賃輻車爲事。……別有準財、金肆二里，富人在焉。凡此十里，多諸工商貨殖之民，千金比屋，層樓對出，重門啓扇，閣道交接，迭相臨望。

從這段記載，可知北魏市區的建設，井井有條。洛陽大市“周圍有八里”，就是二平方里，四面周圍，每面又設兩個“里”，分別以屠販、音樂、釀酒、喪事爲業。值得注意的是，音樂已被作爲市區商業的一個重要組成部份，居住在這裏的“妙伎”，人數衆多，也佔有兩個“里”。

4 漢魏洛陽城外的東、南兩面“郭”區

漢魏洛陽城外的東面“郭”區也很重要，因爲它是水路交通樞紐所在。漢光武帝時，河南尹王梁設計開鑿渠水，引穀水注入洛陽城下，“及渠成而水不流”（《後漢書·王梁傳》）。後來大司空張純設計開鑿陽渠，引洛水到洛陽城下，以通漕運，取得成功。《後漢書·張純傳》載建武二十四年（公元48年）“上（指光武帝）穿陽渠，引洛水爲漕，百姓得其利。”《水經注·穀水》也說：“張純堰洛以通漕，洛中公私穰贍。”這條陽渠的開鑿，不但開通了漕運，而且便利了洛陽對外的水上交通。這條陽渠，從洛陽城外的東南角，引洛水北上，到距離上東門（東城牆北門）以東七里地方，折而向西，直到上東門（東牆北門）外，和環城的河流接通。這樣，陽渠就成爲上東門外的水上交通要道，并在這一帶形成繁榮的

市區和居住區，成爲洛陽東“郭”的一個主要地區。

上東門（北魏稱建春門）外，東漢建有跨過城河的石橋，橋頭建有兩石柱，右石柱銘云：“陽嘉四年（公元135年）乙酉壬申詔書，以城下漕渠，東通河濟，南引江淮，方貢（指諸國貢品）委輸，所由而至，使中謁者魏郡清淵馬憲監作石橋梁。”（《水經注·穀水》）說明當時漕渠確實成爲四方運輸貢賦到京師的交通要道。在石橋東南就有積穀的倉，稱爲“常滿倉”。《洛陽伽藍記》卷二說：建春門外石橋南有明懸寺，“寺東有中朝（指西晉）時常滿倉，高祖（北魏孝文帝）令爲租場，天下貢賦所聚蓄”。再向東，陽渠以北有建陽里，“里有土臺，高三丈，上作二精舍。趙逸云：此臺是中朝（指西晉）旗亭也。上有二層樓，懸鼓擊之以罷市。有鐘一口，撞之聞五十里”（《洛陽伽藍記》卷二龍華寺條）。旗亭是市區長官的官舍，用于管理市區商業。說明這一帶原是繁華的市區。據說建陽里“即中朝時白社地，董威輩所居處”，“里內士庶二千餘戶”。董威輩即是董京，“常宿白社中，時乞于市，得碎殘繒絮，結以自覆，全帛佳繇，則不肯受”（《晉書·隱逸列傳》）。說明這“里”居住的人，有貧窮而在市上行乞的。與“城”區“里”中所住大多是官吏的情況大不相同。

《洛陽伽藍記》卷二“崇真寺”條說：“出建春門外一里餘，至東石橋南，北而行，晉太康元年（公元280年）造。橋南有魏朝時馬市（一本作中朝時牛馬市），刑嵇康之所也。”同卷魏昌尼寺條又說：“在里東南角，即中朝牛馬市處也，刑嵇康之所，東臨石橋，此橋南北行，晉太康元年中朝時市南橋。澄之等（指劉澄之、戴延之等）蓋見此橋銘，因而以橋爲太康初造（實際上是先前東漢陽嘉四年所造）也”。這東石橋直跨明渠，橋南有馬市，《水經注·穀水》稱爲馬市石橋。《水經注》說：“（陽渠）水南有馬市，舊洛陽有三

市，斯其一也。”這個馬市，東漢已經存在。順帝永建年間定遠侯班始（班固弟班超之孫）因殺死陰城公主（章帝之孫女），被腰斬馬市（《續漢書·天文志（中）》永建二年條及劉昭注引《古今注》）。《洛陽記》（《太平御覽》卷一百九十一引）解釋“三市”說：“馬市在大城東”，又說：“馬市在東，舊置丞焉”。馬市只是市的名稱，并不全是做馬的交易的，原來一定很有規模，所以設有丞管理。這個馬市，東漢也早已存在，《元河南志》的《東漢京城圖》就畫在上東門東南（參看圖37）。

《洛陽伽藍記》卷二“景興尼寺”條說：“建陽里東有綏民里，……綏民里東有崇義里，……崇義里東有七里橋，以石爲之，中朝杜預之荊州出頓之所也。七里橋東一里，郭門開三道，時人號爲三門。離別者多云；相送三門外。京師士子，送去迎歸，常在此處。”這裏明確指出七里橋東一里有郭門，而且郭門很有規模，門開三道，這是西漢以來京都城門的統一規格，說明這是洛陽城正規的東郭門。七里橋當因離城七里而得名，那末，這座東郭門就在建春門外八里地方。這和相當於西郭門的長分橋在閭闔門外七里地方，位置也差不多。我們所作的北魏洛陽城郭復原圖，東西劃分爲20個“里”，南北劃分爲15個“里”。其中“城”區東西有6個“里”，東面和西面“郭”區都各有東西7個“里”，這樣，東郭門和長分橋的位置也基本上相合。也就是說，洛陽“城”區東西寬6里，東西兩面的“郭”區都是東西寬7里，整個洛陽，包括“城”區和“郭”區在內，總共東西寬20里，南北15里。

“門開三道”的東郭門不知造於何時，但是陽渠是東漢初年開鑿的，陽渠從城外東南角引洛水北上，成爲南北向的一條大溝，到距離上東門以東七里地方折而向西，這樣就把東西面“郭區”南部三分之二地方用大溝圍了起來，成爲東“郭”的防禦設

施，如同西“郭”的張方溝差不多，七里橋也就和西“郭”的張方橋差不多，成爲進出東“郭”的重要關口，在七里橋東一里加造一座東郭門，只是因爲北部三分之一地方沒有溝渠作屏障，需要修建一部份郭城來作防禦之用，於是開設郭門。

漢順帝(公元125—144年)時，洛陽人种嵩“爲縣門下史”。當時做河南尹的田歆，要外甥王譔幫他找一個“名士”。一天王譔送客到大陽郭，遠遠見到种嵩，就以爲是人才，回來對田歆說：“爲尹得孝廉矣，近洛陽門下史也。”(《後漢書·种嵩傳》)所謂“近洛陽門下史”，只是居于洛陽縣令門下的小吏^⑧。當時洛陽縣令的官署設在近郊，掌管部份“郭”區，如同北魏的洛陽縣設在東“郭”的綏民里(《洛陽伽藍記》卷二)，掌管東“郭”一樣。綏民里這個名稱，該是因爲設有“綏民”的洛陽縣署而來。北魏的許多里名，都是有它的意義的。這個東“郭”該即由洛陽縣管轄，如同隋唐長安的郭城內，東西兩面分設有大興縣(唐萬年縣)廨和長安縣廨，分屬兩縣管轄。這時王譔送客到大陽郭而見到种嵩，說是“近洛陽門下史，”特別指明“近洛陽”，說明在洛陽近郊，所謂“大陽郭”當是東漢對東郭的稱呼。

洛陽東郭，建春門外，沿陽渠兩岸是重要的市區、寺院區和居住區。此外在南部的陽渠包圍圈內，靠近城區的一些地方，也有居住區、寺院以及市區，只是市區較小，稱爲“小市”。《洛陽伽藍記》卷二“景寧寺”條說：青陽門(東城牆南門)外三里，大街以南有景寧里，大街以北有孝義里，孝義里東有“洛陽小市”，東北有殖貨里、這個小市以北的殖貨里，如同西郭洛陽大市以東通商里、達貨里一樣，以屠販爲業。這該是北魏的設施。

洛陽的南郭比較狹窄，因爲從洛陽南城牆向南到洛水只有四里地。東漢時代在開陽門外，南郭的東南角，設有太學和辟

際，在平城門（即北魏平昌門）外設有靈臺和明堂。東漢魏晉時代南郭有南市。《元河南志》的《東漢京城圖》，南市畫在明堂以南（參看圖37）。《洛陽記》（《太平御覽》卷一百九十一引）所說洛陽三市，“南市在大城南”^⑩。北魏時，宣陽門外洛水上有浮橋，洛水南有市，叫四通市。《洛陽伽藍記》卷三說：“宣陽門外四里，至洛水上作浮橋，所謂永橋也。”“別立市于洛水南，號曰四通市，民間謂永橋市，伊洛之魚，多于此賣。”永橋以南，大道兩旁還設有四夷館和四夷里，為接待四方少數民族的地方。從四夷館和四夷里有南北向的大道，越過浮橋，直通宣陽門，和城內南北向的銅鞮街連接，成馬城和郭的南北向中軸綫。

這裏洛水上的浮橋，以及越過浮橋直通城內的南北向大道，東漢早就存在，只是位置略為偏東，在平城門外。根據《後漢書·宦者列傳·張讓傳》，靈帝時，曾使掖庭令畢嵐“鑄天祿、蝦蟇，吐水于平門外橋東，轉水入宮。又作翻車、渴烏，施于橋西，用灑南北郊路，以省百姓灑道之費”。平門即是平城門，“平門外橋”即指平城門外洛水上的浮橋。所鑄天祿、蝦蟇，是兩具有動物裝飾的銅鑄水道口。翻車是用機械轉動的引水器。渴烏是從下而上的吸水器。李賢注：“翻車，設機車以引水。渴烏，為曲筒，以氣引水上也。”這時畢嵐利用引水和吸水器械，一方面在洛水上浮橋以西，用來灑“南北郊路”，“南北郊路”當即越過浮橋直通城內的南北向大道；另一方面在浮橋以東，引水向北流通，轉入南宮。既然這樣利用引水和吸水器械用來灑南北郊路，可以省去百姓灑道之費，說明這條“南北郊路”兩旁所居住的百姓是衆多的。東漢洛陽的南郭，已經是一個人口衆多、比較繁華的郭區。

還值得一提的是，東漢洛陽南郭洛水上的浮橋，不止一座，南面兩頭的津門（即津城門）外，也有一座洛水浮橋。《後漢書·

張奮傳》說：“子甫嗣，官至津城門候。”李賢注：“津城門，洛陽南面西門也，當洛水浮橋。”《元河南志》卷二也說：“津城門，洛陽南面西門，當洛水浮橋，又作津陽門。”津門當即因此處架有浮橋，成爲水上交通要道而得名。這時洛水浮橋的建設已很有規模，皇帝的車駕可以在浮橋上平安通過。班固《馬仲都哀辭》（《太平御覽》卷五百九十六引）說：“車騎將軍順文侯馬仲都，明帝舅也，從車駕于洛水浮橋，馬驚入水溺死。帝謂侍御史班固爲馬上三十步哀辭。”說明當時皇帝車駕通過洛水浮橋，隨從人員也都騎馬通過，只因馬仲都的“馬驚”，才發生“入水溺死”的事故。

-
- ① 《續漢書·郡國志》注引《帝王世紀》：“城東西六里一十步，南北九里一百步。”又引《晉元康地道記》：“城南北九里七十步，東西六里十步。”《元河南志》卷二“俗傳東西六里，南北九里，亦曰九六城。與《帝王世紀》、《元康地道記》不異。”
- ② 王應麟《玉海》卷一百五十五“宮一”說：“蓋秦雖都關中，猶放周東都之制，建宮闕于洛陽。”《後漢書·劉玄傳》：“二年二月更始自洛陽而西。初發，李松奉引人馬驚奔，觸北宮鐵柱門，三馬皆死。”《續漢書·五行志(五)》“馬禍”有相同的記載。足以說明西漢時洛陽早有北宮存在。
- ③ 《水經注·穀水》：“魏明帝上法太極，于洛陽南宮起太極殿于漢崇德殿之故處。”
- ④ 《洛陽宮閣簿》（《續漢書·禮儀志(中)》劉昭注引）：“德陽殿南北行七丈，東西行三十七丈四尺。”面積不及秦阿房宮和西漢未央宮前殿。阿房宮東西五百步（即三十丈），南北五十丈，見《史記·秦始皇本紀》。未央宮前殿東西五十丈，深十五丈。見《三輔黃圖》卷二。

- ⑤ 蔡質《漢儀》(《續漢書·禮儀志(中)》劉昭注引)說：“正月旦，天子幸德陽殿，臨軒。……德陽殿周旋容萬人。陛高二丈，皆文石作壇。激沼水于殿下。……天子正旦節會朝百僚于此。自到偃阨，去宮四十三里，望朱雀五闕，德陽，其上鬱律與天連。”
- ⑥ 《續漢書·百官志(二)》衛尉下：“宮掖門，每門司馬一人，比千石。”本注曰“南宮南屯司馬，主平城門；宮門新龍司馬，主東門；玄武司馬，主玄武門；北屯司馬，主北門。”《續漢書·百官志(四)》城門校尉下，“城門每門候一人，六百石。”本注曰：“洛陽城十二門，其正南一門曰平城門，北宮門，(北官常爲南宮之誤)，屬衛尉。”除平城門外，其餘十一門悉城門校尉管轄，每門設候一人，秩六百石。劉昭注引《漢官秩》曰：“平城門爲宮門，不置候，置屯〔南〕司馬，秩千石。”
- ⑦ 《續漢書·百官志(二)》宮掖門下，本注“南宮南屯司馬主平城門”，注引《古今注》曰“建武十三年九月初開此門”，“十三年”當爲“十四年”之誤。
- ⑧ 《後漢書·李固傳》：“固弟子汝南郭亮，……詣闕上書，乞收固屍，不許。因往臨哭，陳辭于前，遂送喪不去，夏門亭長呵之……。”《後漢書·杜喬傳》：“喬故掾陳留楊匡聞之，號泣星行到洛陽，乃著故赤幘，託爲夏門亭吏，守衛尸喪，驅護蠅蟲，積十二日。”可知夏門爲送喪之處。《東觀漢記》(《後漢書·鮑永傳》李賢注引)：“時良(趙王良)從送中郎將來歙喪還，入夏城門中，與五官將卓相逢。”
- ⑨ 《後漢書·張俊傳》：“廷尉將出穀門，臨行刑，鄧太后詔馳騎以減死論(減輕死罪的判決)。”
- ⑩ 《帝王世紀》(《太平寰宇記》卷三“洛陽縣”條引)：“景王葬翟泉。今東陽門內有大街，北有太倉，中有景王陵，西南望步虛甲，北眺翟泉，二處相距遠近，約略相同也。”《水經注·穀水》：“今案尉威烈王葬洛陽城內東北隅，景王冢在洛陽太倉中。翟泉在尚家

之間側，廣莫門道東，建春門路北，路即東宮街也。于洛陽爲東北。”“渠水歷司空府前，逕太倉南，出東陽門石橋下，注陽渠。”

- ⑩ 《洛陽伽藍記》卷一“景林寺”條：“建春門內御道南，有勾盾、典農、籍田三署，籍田南有司農寺。”勾盾令掌附近園苑，典農中郎將掌屯田，籍田令掌籍田。三國時魏典農治設在城外。《魏略·桓範傳》（《三國志·魏志·曹爽傳》裴松之注引）：“範又謂曹羲曰：卿別營近在闕南，洛陽典農治在城外，招呼如意。”
- ⑪ 《洛陽伽藍記》卷一“昭儀尼寺”條：“東陽門內道北太倉、導官二署，東南治粟里，倉司官屬住其內。”太倉令主管太倉，導官令掌擇米麥以供御食，“導”當作“導”。當時城東靠建春門、東陽門的官署，都是主管農業和糧食的，靠近太倉和漕渠，歸大司農管轄。
- ⑫ 《洛陽伽藍記》卷一“建中寺”條：“在西陽門內御道北，所謂延年里劉騰宅。東有太僕寺，寺東有乘黃署，署東有武庫署。”太僕掌車馬，乘黃署掌養馬（乘黃是神馬之名），武庫掌兵器。
- ⑬ 《洛陽伽藍記》卷一“長秋寺”條：“在西陽門內御道北一里，亦在延年里，即是晉中朝時金市場。”北魏時，金市遷移到靠近宮牆西門千秋門。《水經注·穀水》：“渠水又東歷故金市南，直千秋門右，宮門也。”“凌雲臺西有金市，金市北對洛陽學。”按千秋門是宮牆西門，《元河南志》云：“千秋門，宮西門，西對固闔門。”凌雲臺是宮內西遊園中的臺，《洛陽伽藍記》說：“千秋門內，道北有西遊園，中有凌雲臺，即魏文帝所築者。”據此可見金市在宮牆西門以外的大道北側。《太平御覽》卷一百九十一引《洛陽記》說：“三市，大市名也。金市，在大城西。”又說：“按金市在臨商觀西，兌爲金，故曰金市。”據此可知，因市在西方，于五行屬金，稱爲金市。“兌”是指西方，見《禮記·禮運》疏和《左傳·哀公十四年》疏引許慎《五經異義》。臨商觀是洛陽宮中西邊的觀。《太平御覽》卷一百七十九引《興

地志》說：“洛陽有廣望觀、闕風觀、萬世觀、脩靈觀、臨商觀。”所說金市在臨商觀西，也是說在宮的西邊。

- ⑮ 夕陽亭，宋紹興本誤作“几陽亭”，此從汲古閣本和殿本。《資治通鑑》胡克家翻刻元刊本（卷五〇《漢紀》四二“安帝延光三年”條）作“夕陽亭”，章鈺校宋本又誤作“几陽亭。”據《元河南志》的《東漢京城圖》，几陽亭在廣陽門外。
- ⑯ 《史記·司馬相如傳》：“素與臨邛令王吉相善，……于是相如往，舍都亭。”索隱：“案都亭，臨邛郭下之亭也。”
- ⑰ 《元河南志》卷二“後漢城闕宮殿古蹟”條引華延儔《洛陽記》曰：“城內都亭二十四：芳林亭、廣世亭、昌益亭、廣莫亭、定陽亭、遮婁亭、暴室亭、廣陽亭、西明亭、萬歲亭、夕陽亭、東明亭、視中亭、東因亭、建春亭、止奸亭、德宮亭、東陽亭、千秋亭、安衆亭、孝敬亭、清明亭。”列舉共二十三亭。這二十三亭，并非都是城內的，其中有不少顯然是城外的，屬於城門外的亭。萬歲亭可能是萬壽亭之誤，在夏門（北牆西門）外。《後漢書·靈帝紀》：“建寧元年春正月壬午，城門校尉竇武爲大將軍，己亥，帝到夏門亭，使竇武持節，以王青蓋車迎入殿中，庚子，即皇帝位。”夏門亭即是夏門外萬壽亭。《東觀漢紀》：“建寧元年帝到夏門外萬壽亭。羣臣謁見。”夕陽亭是上西門外的亭。其餘如廣莫、西明、建春、東陽是北魏的城門名，廣陽是東漢城門名，都該是城門外的亭名。華氏誤以爲城內亭名。
- ⑱ 翟兗之、蘇晉仁說：“曹掾之屬常居門下，故諸掾常以門下爲號，金石中時見門下功曹、門下跋曹之名。其門下掾（《後漢書》卷四十三《公孫述傳》注、卷五十九《鄧邯傳》）門下史（《後漢書》卷八十六《神禹傳》）即各曹掾史，非另有一職也。”見所著《兩漢縣政考》第77頁，中國聯合出版公司1944年出版。
- ⑲ 《太平寰宇記》卷三“洛陽縣”條引《洛陽記》又作“羊市在大城南”，《太平御覽》卷八百二十七引《洛陽記》又作“陽市在城南”。“羊”字

與“南”字形近，“陽”字又與“羊”字音近，當以“南”字爲是。

十二 東吳都城建業和東晉南朝都城建康

1 東吳都城建業的佈局

秦漢時代在今南京附近設有秣陵縣治（今江蘇江寧南秣陵），作爲長江下游的一個政治中心。三國時，孫權（公元182—252年）于黃龍元年（公元229年）在武昌（今湖北鄂城）稱帝，國號吳。建安十六年（公元211年）他把政治中心遷到秣陵，次年改名建業。同時在建業以西石頭山（今清涼山）把原有的金陵城改建成石頭城（今南京城西漢中門外清涼山西麓），周圍七里100步，西靠長江，東南兩面各開一門，北面開二門，作爲軍事重鎮。建業東南又有京口（今鎮江），是長江下游江防要地。黃武八年（公元229年）孫權從武昌遷都建業，并築建業新城在淮水以北（即今南京市區所在地），東北靠鍾山西麓，東憑前湖（即燕雀湖），北依雞籠山、覆舟山及後湖（即玄武湖），周圍20里19步。宮殿建築於城內中部偏西北處。赤烏十年（公元247年）遷拆武昌宮到此地，建成太初宮，周圍三百丈（一作五百丈），正殿稱神龜殿，南面開五門，正中公車門，東側升賢門、左掖門，西側明揚門、右掖門，東、西、北三面各開一門，按四神的方位命名，稱爲蒼龍門、白虎門和玄武門（《建康實錄》卷二）。寶鼎二年（公元267年）後主孫皓（公元242—283年）又在太初宮以東興建昭明宮，周圍五百丈，正殿稱赤烏殿，設有彎崎、臨劓等門^①。並擴建園囿，建築十分講究和華麗（同上書卷四）。此外，建業城內，還建有苑城、南宮（太子宮）和西池等。苑城在昭明宮西北。從吳宮南門經建業城南門（宣陽門），直到秦淮河北岸建有南北嚮的御道，作爲全城中軸綫。御

道南端是大航門，在大航門下的秦淮河上建有橋梁，稱為朱雀航，是都城南面的重要門戶。

建業城實際上具有內城性質。從建業城的東西兩面及南面直到朱雀航一帶具有外郭性質，御道從吳宮南門到大航門，共長七里，大航門立有一雙朱闕，御道兩側種有青槐，并開有溝渠；同時沿着御道兩側建有一系列中央官署。左思《吳都賦》對此有生動的描寫：

高闕有闕，洞門方軌，朱闕雙立，馳道如砥，樹以青槐，亘以綠水，玄蔭耽耽，清沍麤麤。列寺七里，俠棟陽路，屯營櫛比，解署棋布。
(李善注：“吳自宮門出苑路，府寺相屬，俠道七里也。解，猶署也，吳有司徒、大監諸署，非一也。”)

十分明顯，這個佈局和北魏洛陽一樣，是繼承東漢洛陽和漢末鄴城的規劃而有了進一步發展，後來唐代長安城規模巨大、以中央北部宮城為主體的、具有對稱的中軸綫的格局，就是在這樣的基礎上進一步形成的。上引《吳都賦》，“高闕有闕”以下三句是形容御道南端大航門的雄姿，“馳道如砥”以下五句是形容御道的結構，“列寺七里”以下四句，是描寫宮門以南七里長的御道上兩側中央官屬連屬排列的情景。

東吳建業宮殿的建築，不是很整齊的。太初宮造在城內中部偏西北處，昭明宮又造在太初宮之東，苑城更造在昭明宮之北，不像曹操所建的鄴城那樣，把大朝的文昌殿和內朝的聽政殿并列為東西兩部。鄴城由於內朝聽政殿造於東部，中央官署分別造於聽政殿前司馬門內外大道的兩側，因而它作為中軸綫的大道及其兩側官署就偏在城的東部。東吳建業則以整個宮殿區作為一個整體，作為中軸綫的御道設在城的南部正中，共計七里，大體上從宮門到建業城南面正中的宣陽門有二里，從宣陽門到

門鼎貴，魁岸豪傑。”

重要的“市”設在淮水（今秦淮河）北岸。《丹陽記》（《太平御覽》卷八二七引）說：“京師四市，建康大市，孫權所立；建康東市，同時立；建康北市，永安中立（永安是吳景帝年號，公元258—264年）。”大市設在長干里和橫塘之間的建初寺前，北寺設在歸善寺前，當即由廟市發展而形成。左思《吳都賦》有描寫“市”的一段：

開市朝而並納，橫闔闕而流溢，混品物而同塵，并都鄙而爲一。士女佇哈，商賈駢望，紵衣絺服，雜沓僭萃。輕輿按轡以經隧，樓船舉帆而過肆；果布輻湊而常然，致遠琉璃與河玦。繅胎紛紜，器用萬端，金鎰磊砢，珠琲闌干，桃笙象簟。……富中之毗，貨殖之選，乘時射利，財豐巨萬，競其區宇，則并疆兼巷；矜其宴居，則珠服玉饌。

建業的“市”都設在外郭地區水陸交通十分便利的地方。所謂“隧”，是指“市”中街道，所謂“肆”是指“市”中排列成行的商鋪。這種“市”四通八達，輕便的馬車可以通過“市”中街道，建有高樓的大船可以經過“市”中成排的商鋪，所以說：“輕輿按轡以經隧，樓船舉帆而過肆。”說明“市”內不但有通行馬車的大道，而且有橫穿過“市”區的大河。正因為水陸交通十分方便，成爲都城內外居民集中交易的市場，所以說：“并都鄙而爲一。”這裏不僅有本地土產和江南地區的物產，而且有來自交、廣和南洋諸國的商品，包括果、布、琉璃、珠玉及象牙製品。由于交易興隆，這裏住有“財豐巨萬”、“并疆兼巷”、“珠服玉饌”的富商。

2 東晉、南朝都城建康的佈局

東吳只存在五十年，爲西晉所滅。西晉滅吳後，將建業恢復舊名秣陵。太康元年（公元280年）從秣陵分立臨江縣，次年改

稱江寧縣。太康三年又將秣陵分爲二邑，淮水以北稱建鄴，淮水以南仍稱秣陵。太安二年(公元303年)石冰從張昌起義，進攻揚州諸郡，太初宮就毀於兵火中。後來晉廣陵度支陳敏進據揚州，在太初宮基礎上建築府舍。西晉末，爲了避愍帝諱，建業又改稱建康。西晉滅亡時，琅玕王司馬睿在江東重建東晉王朝，又以建康爲國都。此後南朝宋、齊、梁、陳相繼在此建都。

東晉初期沿用東吳舊城與陳敏所建府舍，到咸和五年(公元330年)晉成帝(公元325—342年)方“作新宮，修苑城”(《晉書·成帝紀》)。建康城仍是周圍20里19步，南面三門，正中仍稱宣陽門，東側爲開陽門，西側爲陵陽門，東面有清明、建春二門，西面爲西明門，從西明門到建春門之間建有東西向橫街，街北爲宮城，亦稱臺城或苑城；街南爲中央重要官署。宮城原爲土牆，咸康五年(公元339年)改用磚砌。周圍八里，每邊二里。宮城有內外兩重。內壁北面無門，南有端門，東有雲龍門，西有神虎門。外壁南有大司馬門和閭闔門，東西有東西掖門，北有平昌門(俗稱冠爵門)。太元三年(公元378年)尚書僕射謝安因原有宮殿不够宏麗，建議重作新宮，計建成內外殿宇大小三千五百間(《晉書·謝安傳》、《建康實錄》卷九)。

建康宮殿佈局沿用魏晉洛陽的舊制。正殿稱太極殿，共十二間，以像十二月，用作大朝。兩旁有東西二堂，作爲日常聽政與召見大臣之所。太極殿以北爲顯陽殿，是皇后正殿，東西兩旁是含章殿和徽音殿。宮城正門大司馬門，前臨東西向的橫街(《太平御覽》卷一七五引《丹陽記》)。從大司馬門經建康城宣陽門到秦淮河北的朱雀門(即大航門)有南北向的御道，沿用東吳建業城舊制，作爲全城中軸綫。朱雀門之南，秦淮河上原建有朱雀航，作爲都城南面的重要通道。晉明帝(公元322—325年)時，在平

定王敦之亂的戰爭中燒毀。晉成帝咸康二年(公元336年)重建為朱雀浮航，所謂浮航即是用船舶連結而成的浮橋(參看圖43)。

南朝沿用建康為都城，并沿用東晉宮殿(只是對宮城門名有所更改)。宋、齊二代只對居室、苑囿有所增建^②。梁武帝天監七年(公元508年)在宮城南面內壁端門和外壁大司馬門之前建築神龍仁虎二闕，天監十年又在宮城四周加築一道圍牆，使二重增加為三重。天監十二年重建太極殿及東西二堂。太極殿改為十三間，以像閏數(參看圖44)。

東晉、南朝這樣講究正殿間數的開闢，對後代宮殿制度有深遠影響，隋唐沿用其制。隋代東都的正殿乾陽殿也是十三間(《大業雜記》)，西京的正殿大興殿想必相同，唐代西京的太極殿即是隋的大興殿。後來北宋正殿以十一間開闢為最高等級，其次為九間開闢，金、元兩代都沿用其制。明代正殿以九間開闢為最高等級，清代又恢復以十一間開闢為最高等級。

東晉、南朝建康的佈局，對北魏重建洛陽是很有影響的。北魏孝文帝在改建平城過程中，除了派蔣少游到洛陽丈量魏晉宮室基址以外，還派蔣少游作為李彪副使一同出使南齊觀摹建康宮殿規模。後來孝文帝任命大臣設計重建洛陽宮殿和官署，就是綜合過去南北幾個都城佈局的優點，作了進一步的改進。

東晉、南朝的建康城如同東吳的建業城，依然是內城性質。建康城的南、東、西三面城郊，具有外郭性質。外圍的長江、石頭山，玄武湖、鍾山成為天然的防禦屏障；先後在外圍利用山頭丘陵等險要形勢建成的許多小城堡，又形成一個軍事防衛圈。城南石子崗(今雨花臺)西北原有越城，城西石頭山南有石頭城。石頭城原為土築，晉安帝義熙六年(公元410年)改為磚城，建有烽火臺和糧倉等，具有要塞性質。城東南秦淮河北岸有東府城，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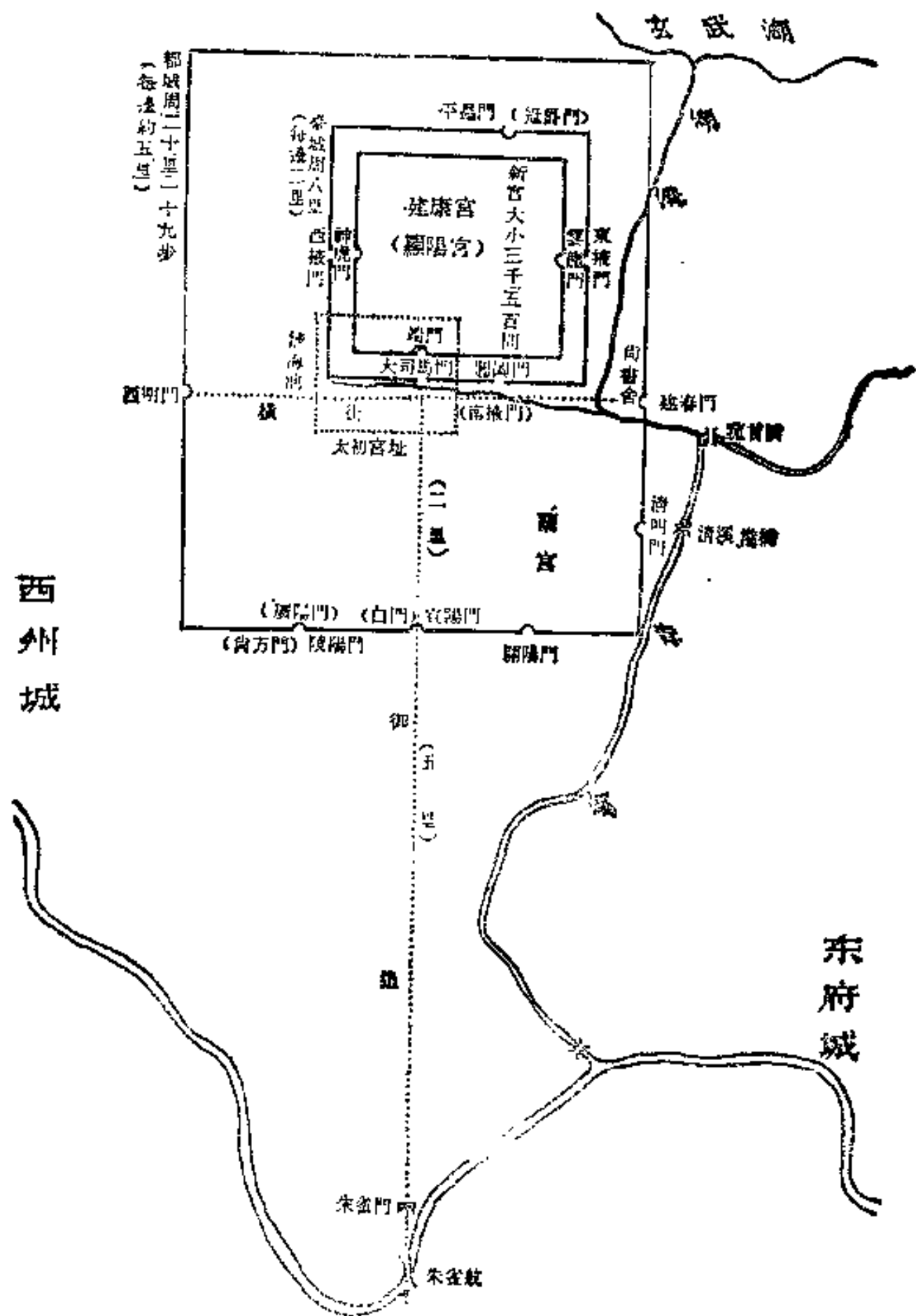


圖13 東晉都城建康平面圖

(採自朱僕《金陵古蹟圖考》，商務印書館1936年出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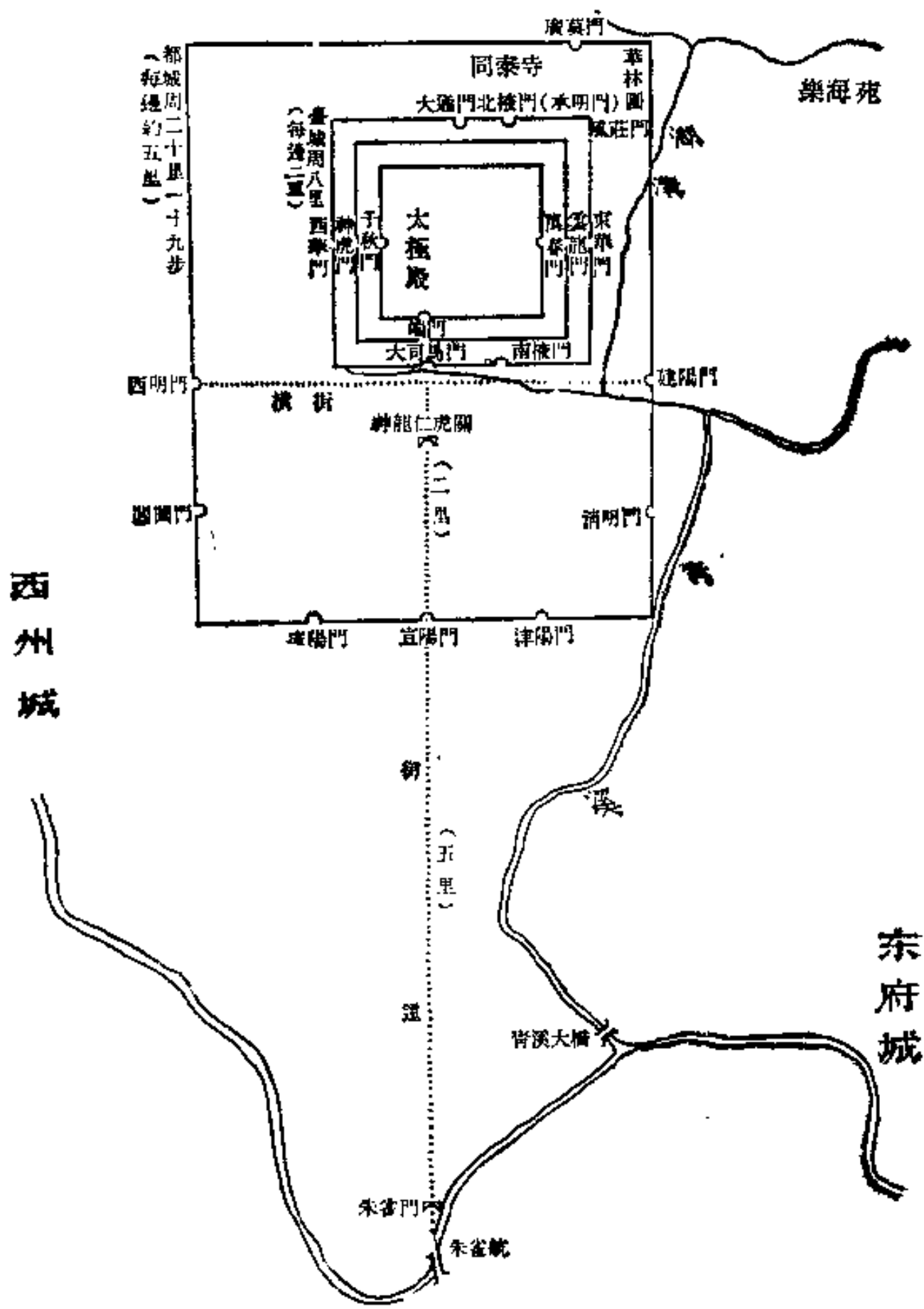


圖44 南朝梁都建康平面圖

(採自朱僕《金陵古蹟圖考》，商務印書館1936年出版)

安帝義熙十年所築，梁末侯景曾入據城中，改築磚城。城西南靠近長江冶城附近有西州城，原是王敦所立的揚州治所，後為丹陽尹治所，與東府城遙遙相對。南面沿着秦淮河有東吳興築的柵塘，既用以防洪，兼用作防禦工程。城北臨江的幕有白石壘（又稱白下壘），是陶侃爲了防禦蘇峻作亂而興築。

由於中原人民大量南遷，建康人口較建業大爲增加。梁時，城中居民有二十八萬多戶，西到石頭城，東到倪塘，南到石子崗，北過蔣山，東西南北的城郊範圍都有四十里地。城東青溪，城南朱雀橋、烏衣巷一帶都是貴族聚居區。青溪多南朝的高門甲族，烏衣巷中以王、謝二族爲最著。“市”在東吳原有的基礎上大有發展，除已有的大市、東市、北市以外，還有小市十多所。同時出現了以交易一種貨品爲主的市，如牛馬市、紗市、蜆市之類，說明當時有關人民日常生活需要商品的貿易正在進一步的發展，已經逐漸突破原有“市”區的範圍。《隋書·食貨志》載“淮水北有大市百餘（按百餘兩字當有誤），小市十餘所。大市備置官司，稅斂既重，時甚苦之。”苛重的稅收，限制了原有大市的發展；而分散的小市得到了成長的機會。

南朝對皇家園林曾不斷擴建，宋文帝時，曾在城外北面玄武湖中建設方丈、蓬萊、瀛州三神山，又在城內宮城東北華林園中興築景陽山，並將玄武湖水引入華林園內天淵池，通嚮宮中，經太極殿出東西掖門而注到宮城南面；更在城外東北郊，將北郊壇移出覆舟山外，築成北苑，又稱樂游苑。此後齊梁諸帝又在華林園中不斷增建殿臺樓堂。

東吳建業和東晉、南朝的建康，是南方佛教中心。赤烏十年（公元247年）孫權爲西域僧人康僧會創建建初寺，相傳是建業第一所佛寺。後來建康城內外寺院林立，所謂“南朝四百八十

寺”，著名的長干寺即在城南長干里。東吳時已建有阿育王塔，梁武帝時改稱阿育王寺，并大加修建。城南淮水以北有著名的瓦官寺，因原有東晉設陶官的製陶作坊而得名。城北雞籠山麓更有華麗的同泰寺，建於梁武帝大通元年（公元527年），寺內有浮圖九層，大殿六所，小殿及堂十多所。梁武帝信奉佛教，特為設置同泰寺於宮城正北，并開設大通門隔路相通。這是宮城正北設置寺院道觀的開端，對後代有深遠影響。唐代長安設佛光寺於宮城玄武門內神龍殿以西。後周汴京設太清觀於內城正北，北宋東京沿用其制，改稱建隆觀，宋真宗又擴建為玉清照應宮。金代中都把原有天王寺改稱大萬安寺（明代改稱天寧寺），設在皇城正北。元代大都設大天壽萬寧寺於大內正北。所有這些，都該受到梁武帝設同泰寺於宮城正北的影響。

① 左思《吳都賦》說：“起寢廟於武昌，作離宮於建業，……抗神龍之華殿，施榮楯而捷攬，崇臨海之崔巍，飾赤烏之驛擘。東西膠葛，南北崢嶸，房櫺對橫，連閣相經。闔闔譎詭，異出奇名，左稱鸞碕，右號臨硯。”（李善注：“神龍，建業正殿名。臨海、赤烏皆建業吳大帝所建太初宮殿名也。”“吳後主起昭明宮於太初之東，開鸞碕、臨硯二門”）李善注以赤烏為太初宮殿名，有誤。

② 宋文帝作東宮，宋武帝建正光、玉燭等殿，宋明帝造紫極殿。齊東昏侯因宮中大火，燒三千多間，於是大起諸殿，又別為潘妃起神仙、永壽、玉壽等殿。

十三 唐代長安、洛陽的“城”、“郭”佈局

1 唐代長安的内城及大明宮

唐代長安城的前身，就是隋代的大興城。隋文帝（公元581—604年）開皇二年（公元582年）命高穎、宇文愷等人在漢長安故城東南的龍首原建設新都，稱為大興城。大興城分郭城和內城，內城又分宮城和皇城，這是先制定好整個規劃，然後陸續建成的。先建宮城，再建皇城，最後建成郭城。

內城位於郭城的北部正中，近正方形，東西寬2,820米，南北長3,335米。後半部是宮城，南北長1,492米，面積4.2平方公里，前半部是皇城，南北長1,843米，面積5.2平方公里。整個內城，包括宮城和皇城，總面積和漢魏洛陽故城相當。宮城和皇城之間，并無隔牆，只有一條橫街間隔^①。

宮城的中部是太極宮，東西廣1,967米，南北長1,492米。東側是太子的東宮，西側是居住宮女的掖庭宮，掖庭宮南端有內侍省，掌管宮內事務。掖庭宮北端有太倉，儲藏糧食。太極宮的正殿名太極殿，殿前有東西兩廊，東廊有門下省，西廊有中書省，幫助皇帝處理日常政務。太極殿後面還有大殿名兩儀殿。宮城前面有五座城門，中央正門名承天門，北對太極殿，南通皇城的朱雀門和郭城的明德門。承天門有三個門道，現存門址東西殘長41.7米，進深19米，門基鋪石板或石條。門前的橫街寬三百步，合411米，這是長安城內最寬的大街，具有廣場（集會場所）性質。每逢元旦、冬至和千秋節（玄宗皇帝壽辰），規模很大的朝賀禮節，都要在承天門舉行，并在橫街上（按官品順序）集合排班。還有頒布大赦和迎接朝貢的儀式也要在承天門舉行。順天門以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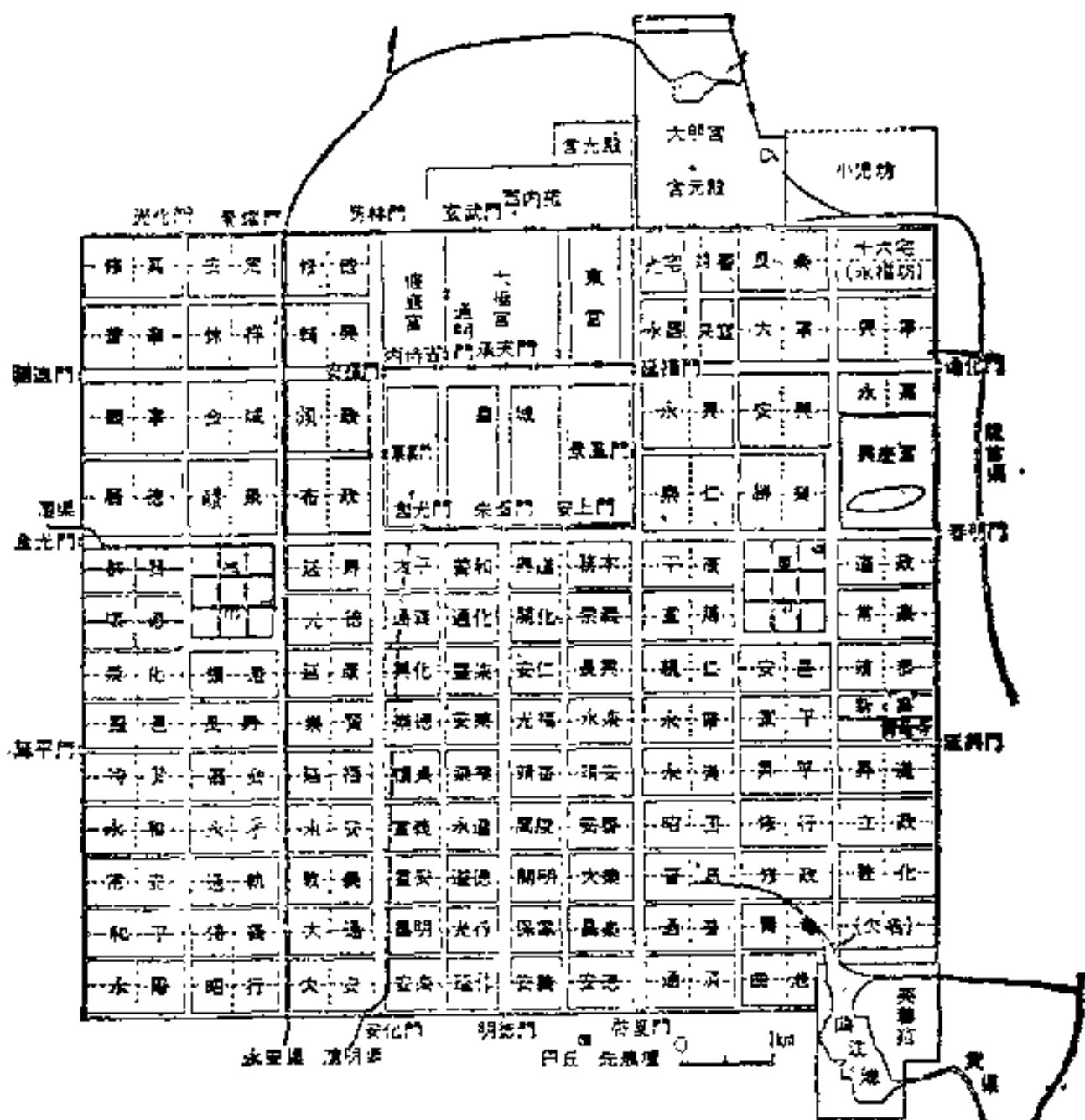


圖45 唐代長安城郭佈局結構圖

(依據徐松《唐兩京城坊考》所載《西京外郭城圖》，結合考古成績，並參照元駱天驥《類編長安志》補正)

圖中朱雀門街西第一街的第一、第二兩坊的坊名，今本宋敏求《長安志》原缺，徐松《唐兩京城坊考》在第一坊補作“光祿”，不確，今據元代駱天驥《類編長安志》補上“善和”與“運化”兩坊。

徐松《唐兩京城坊考》卷四，依據李濟翁《資暇集》“永樂坊古冢”下注“光祿坊內亦有古冢”，“時以之與永樂者對”，在第一坊注上“光祿”，說“以俟考”。他又據《張元忠夫人令狐氏墓誌》：“夫人卒於京兆府殖業里之私第”，並因第二坊以南“多以業為名”，認為“或此缺坊為殖業歟”？這兩個推斷都無確證。查永樂坊相對者為光福坊，可能光福坊又名光祿坊。駱天驥《類編長安志》有這兩缺坊之名善和與運化，當有依據。唐憲宗時高官裴度曾被刺客在運化坊打傷，見於《舊唐書·裴度傳》與《資治通鑑》卷二百三十九元和十年六月條。

就是所謂“外朝”。太極殿又是每月朔望舉行朝儀的地方，就是所謂“中朝”。兩儀殿是皇帝日常處理政務的處所，就是所謂“內朝^②”，慶祝勝利的宴會，招待貴賓的宴會，以及召集五品以上官的宴會，常在兩儀殿上舉行^③。

宮城後面(即北面)有三座城門。玄武、興安二門是太極宮的北門，至德門是東宮的北門。玄武門駐屯皇帝的禁衛軍。唐代通例，在宮城的北門駐屯禁軍。宮城後面還有西內苑。

緊靠宮城南面的橫街以南，就是皇城。皇城占有內城的南半部。皇城以內，有東西向的街七條，南北向的街五條，“各廣百步”(《雲龍漫鈔》卷八)。以南北向的承天門街為中心，設有左右對稱的中央官署，中央的主要行政機構尚書省即設在中心地點。太廟和太社則設在前排的左右兩側。南面有三門。正中的朱雀門，北通宮城正門承天門，南通郭城正門明德門(參看圖45)。

這個內城結構，值得我們重視的有下列四點：

第一，“三朝”(外朝、中朝、內朝)的朝廷制度的確立。西周、春秋間的禮制原有“三朝”的朝廷制度，根據禮書記載，天子和諸侯的宮室都有五重或三重的宮門，有所謂外朝、中朝和內朝。外朝設于第一道宮門外，宮門外有廣場，可以召集“國人”徵詢對國家大事的意見。《周禮·秋官·小司寇》說：“掌外朝之政，以致萬民而詢焉，一曰詢國危，二曰詢國遷，三曰詢立君。”春秋時代許多諸侯國確實還有召集“國人”來“詢國危”、“詢國遷”、“詢立君”的。這是早期統治階級內部實行民主制度的一種殘餘。唐代的“三朝”制度，性質上根本與古代的不同，所謂“內朝”只是日常處理政務的場合，“中朝”只是定期舉行朝儀的地方，“外朝”只是舉行大規模朝賀儀式的地點。這種大規模對君王朝賀的儀式，戰國時代已開端，秦始皇正式推行。先只是元旦舉行，到魏

晉時期擴展爲元旦和冬至兩次，到唐代，又加上千秋節（玄宗皇帝壽辰）一次，後來稱爲三大節，成爲定制，一直流行到清代。隋唐宮城建築的佈局，就是爲了適應“三朝”的需要。承天門及其門前橫街的建設，就是適應三大節大朝會的需要。

第二，集中中央官署的皇城制度的創設。秦漢以來，中央高級官署常常分佈于宮室的附近，用作皇帝處理政務的機構。北魏洛陽取消南北兩宮的制度，在原來北宮的基址上建設皇宮，把原來南宮的基址建設中央官署，使中央官署集中在皇宮南的大街（銅駝街）的兩側，并把太廟和太社分列在兩側前端，使符合《考工記》所說“左祖右社”的制度。隋唐長安則更進一步，把中央官署集中起來，創設皇城的制度，使皇城成爲內城的南半部，處於宮城南面的橫街以南，以便於皇帝及其大臣的集中管理和發號施令。

第三，把宮城劃分爲太極宮、東宮、掖庭宮三大部分。秦和西漢建設許多宮室，既有皇帝的宮，又有太后和太子的宮，更有后妃的宮。東漢洛陽有南北兩宮，北宮中也還有太后的宮。這和當時有些太后和宦官當權是分不開的。從《元河南志》所載《晉都城圖》和《後魏都城圖》來看，西晉和北魏都重視太子宮的建設，都在宮城的東北設有太子宮或東宮。唐代長安更進一步，不但把宮城的東側建成東宮，而且將東宮前的兩條橫街間，作爲東宮所屬官署的所在地。這一設施，無非爲了鞏固皇位的繼承制度。

第四，把宮城、皇城與居民區、市區隔離。自從西周東都成周開始建築“城”和“郭”兩部分以來，“城”和“郭”是有着不同用途的。“築城以衛君，造郭以居民”（《太平御覽》卷一百九十三引《吳越春秋》）。但是秦漢以後，皇帝作爲中央政權的首腦，必須有

一系列中央官署幫助處理全國政務，還必須有一批官吏作為隨從的親信以供調遣，因此在皇帝所住的“城”內，除了宮室以外，還有中央官署的建築，更有貴族和官吏的住宅。由于貴族和官吏生活上的需要，“城”內不能不設立市區，隨着社會經濟的發展，貴族官吏需要的增多，市區就有發展，居住在市區的人就多而雜，因而原有“城”和“郭”的區別，不免有些混淆，使得城區的保衛工作發生困難。《長安志》卷七“唐皇城”條原注說：“自兩漢以後，至于晉、齊、梁、陳，并有人家在宮闕之間，隋文帝以為不便于民，于是皇城之內，唯列府寺，不使雜人居止，公私有便，風俗齊肅，實隋文新意也。”所謂隋文新意，既要使一般居民與宮闕、官署隔離，又要使宮城與貴族官吏住宅嚴格分開，更要使宮城、皇城與市區隔絕，從而加強對宮城的衛護，并保持宮廷內部的機密。

唐太宗(公元626—649年)於貞觀八年(公元634年)，在太極宮東北禁苑內龍首原高地上創建永安宮，次年改名大明宮。大明宮的規模遠比太極宮為大，同樣有“三朝”的朝廷制度，形勢更為壯觀(參看圖46)。

大明宮南部呈長方形，北部呈梯形。西牆長2,256米，北牆長1,135米，東牆上部作梯形的偏斜，南牆即利用郭城的北牆(在大明宮範圍內部分長1,674米)。面積約3.2平方公里。南面五座門，居中的丹鳳門為正門。正殿名含元殿，唐高宗(公元650—683年)龍朔三年(公元663年)建成，位于丹鳳門正北610米處的龍首原南沿上。殿臺基東西寬75.9米，南北長42.3米。其地高出地面15.6米。《大唐六典》卷七“尚書工部、郎中員外郎”條原注說：“殿即龍首山之東趾(東麓)也。階上高于平地四十餘尺，南去丹鳳門四百余步，東西廣五百步，今元正、冬至于此聽朝也。”這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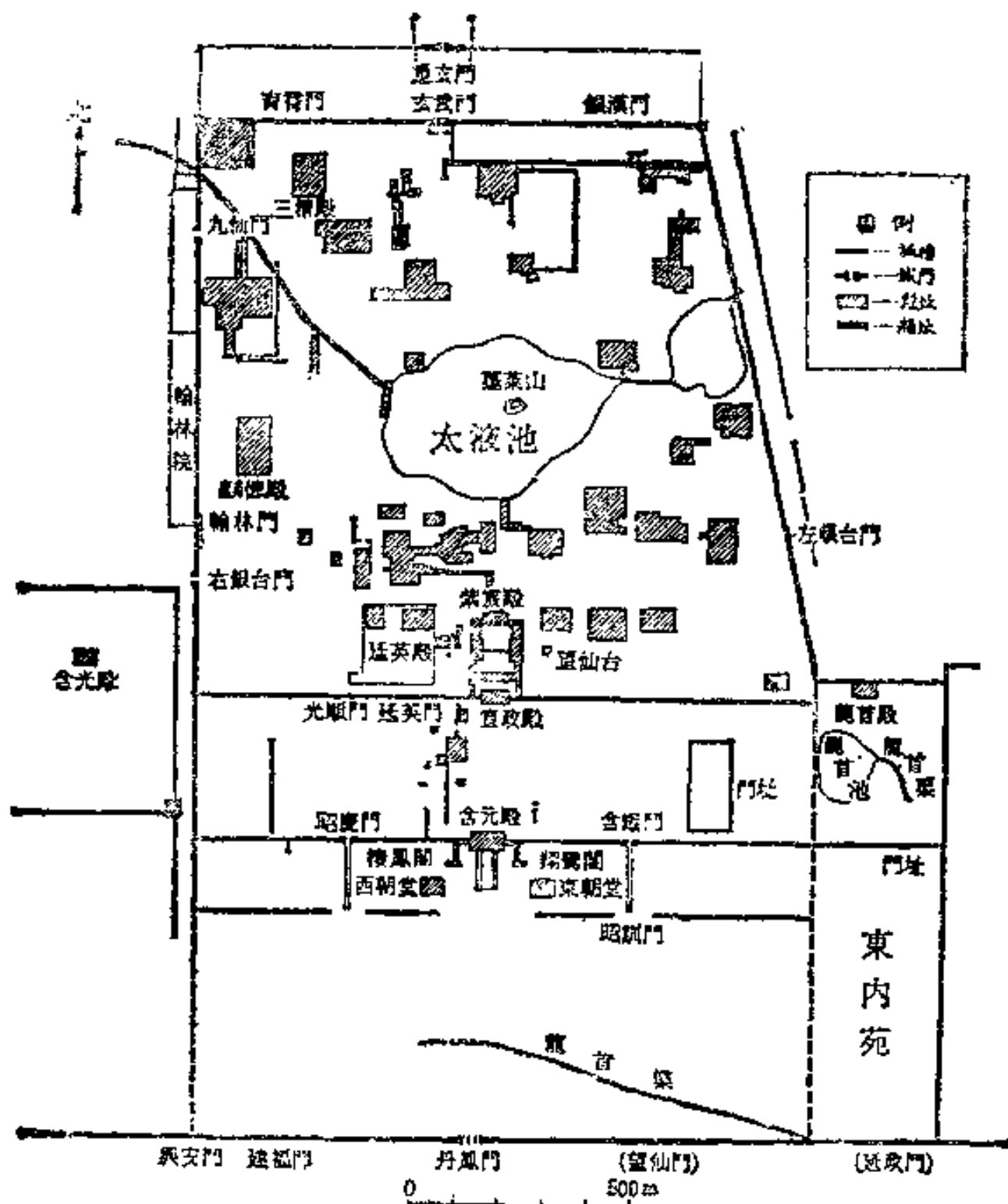


圖 16 唐代大明宮遺跡平面圖

(採自馬得志《唐代長安與洛陽》，《考古》1982年第6期)

是“外朝”的所在。不僅元日、冬至、千秋節的大朝會在此舉行，皇帝檢閱軍隊，上尊號，宣布大赦等等，都在此舉行。殿的東南和西南，分別建有用廊道連通的翔鸞閣和棲鳳閣，也都高出地面15米。兩閣具有雙闕性質，李華《含元殿賦》說：“左翔鸞而右棲鳳，

翹兩闕而爲翼”（《玉海》卷一百五十九引）。殿前有向南伸出的三條并行階道，有磚石砌成的階梯和斜坡，長78米，中間一道寬25.5米，兩側各寬4.5米，稱爲“龍尾道”（參看卷首圖版十八）。殿前到丹鳳門有場地，南北長610米，與《唐六典》所說“南去丹鳳門四百餘步”相合，具有外朝的廣場性質。巍然聳立的大殿居高臨下，皇帝在這裏舉行大朝會，朝見臣下，用來表示其崇高的威嚴。有人形容參加大朝會的情景說：“元會（指元旦朝會）來朝者，仰瞻王座，如在霄漢”（康駢《劇談錄》，收入《學津討原》等叢書）（參看圖4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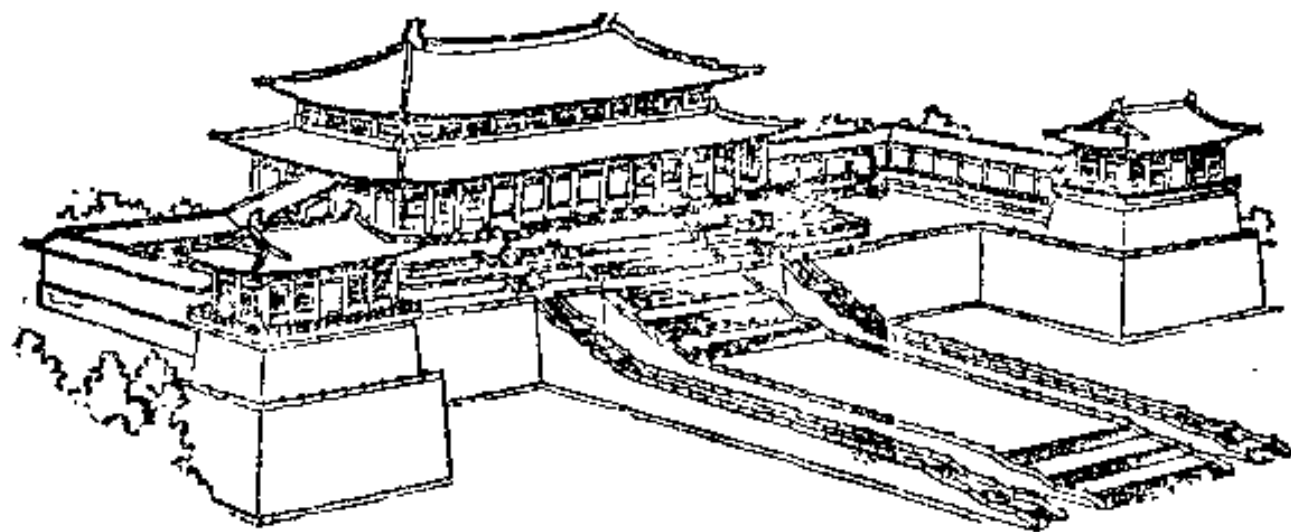


圖47 含元殿復原圖

（採自郭義孚《含元殿外觀復原》，《考古》1963年第10期）

含元殿以北有宣政殿，是日常舉行朝儀的地方，即“中朝”的所在。殿前東廊有門下省，西廊有中書省。宣政殿以北有紫宸殿，即“內朝”的所在，羣臣進入紫宸殿朝見，稱爲“入閣”。唐高宗于龍朔三年（公元663年）遷大明宮聽政以後，大明宮就代替宮城中太極宮的地位，大明宮的“三朝”就代替了太極宮的“三朝”。李華《含元殿賦》說：“古有六寢，御茲一人；今也三朝，繇（由）古是因。布大命于宣政，濟元心于紫宸”（《玉海》卷一百五十九引）。所說的就是大明宮的“三朝”。含元殿、宣政殿、紫宸殿三大殿排

列成一直線的方式，對此後宮殿佈局有深遠影響。

2 唐代長安的郭城

唐代長安的郭城呈長方形，東西寬（從春明門到金光門直徑）9,721米，南北長（從明德門到宮城玄武門偏東處）8,651米，周圍共長36.7公里，面積約84平方公里。因為內城（宮城與皇城）處于郭城的北部正中，郭城從東、南、西三面環抱內城。作為居民區的“坊”和作為商業區的“市”，都分佈在郭城的三面。這種佈局，實際上是沿用漢魏洛陽的體制，只是四面築了方正的郭城，“坊”和“市”的佈置更加整齊而有秩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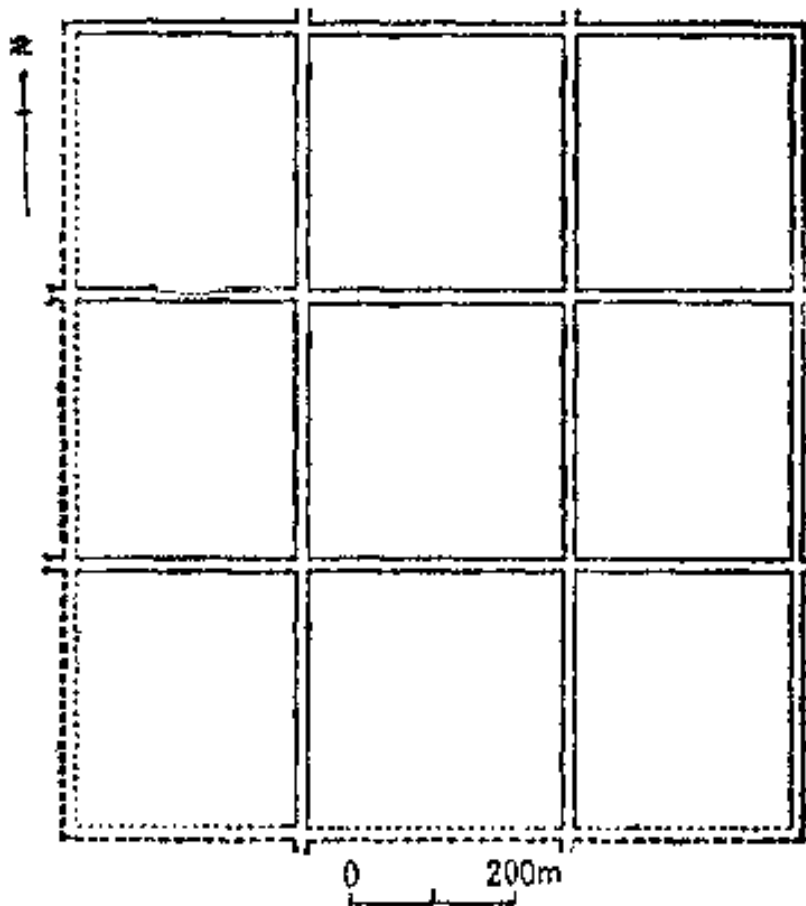
整個郭城有十三座城門。東、南、西三面各有三座城門，位置勻稱。南面正門明德門最大，有五個門道，兩端的門道是車道，正中門道只供皇帝通行。其他城門均為三個門道。城門的左右兩門道是車道，這與當時“凡宮殿門及城門，皆左入、右出”的制度有關（《大唐六典》卷二十五“左右監門衛中郎將”條）。北面有四座城門，三座在宮城以西，另有一座在宮城以東，只是通往禁苑的北門，後來成為大明宮的南面五門之一。街道有南北向的十一條，東西向的十四條。其中貫穿東、南、西三面城門的有六條主要大街，南北向的正中的朱雀大街最寬，達150—155米，兩側水溝寬3米，成為整個城郭的中軸綫。朱雀大街把郭區劃分為東西兩半，東半有五十四個“坊”和東市，屬萬年縣管轄；西半有五十五個“坊”和西市，屬長安縣管轄。這種佈局也是沿襲漢魏洛陽的體制，只是安排更加整齊。北魏洛陽東“郭”屬洛陽縣管轄，前一章已談到。

“坊”的制度也是沿襲漢魏以來的體制。“坊”在漢代叫做“里”。晉代以後“里”或稱為“坊”。《元河南志》卷二“晉城闕宮

殿古蹟”所引《晉宮閣名》，有“諸里”及“諸坊”的名稱。北魏洛陽有三百二十里，也稱三百二十坊，“坊”和“里”可以通稱。“坊”原為“防”字的別體。城內居住區的“里”，所以又稱為“坊”，當是由于這些“里”都築有圍牆的緣故。漢代“里”的形制不詳，北魏洛陽的“里”是方形的，“方三百步為一里，里開四門”（《洛陽伽藍記》卷五卷末）。唐代基本沿用這種“里”制。唐代長安的“坊”，可分正方形和長方形兩種。坊的面積，在宮城和皇城兩側的比較大，南北長600—838米，東西寬1,020—1,125米；在皇城以南、朱雀大街兩側的四列坊最小，南北長500—590米，東西寬550—700米；在四列小坊兩側的屬於中等，南北長度相同，東西寬1,020—1,125米。多數的“坊”，都是四面各開一門，坊內設有“十字街”，分成四個區，每區又有十字形小巷。全坊劃分為十六小區。只有朱雀大街兩側的四列小坊，因為隋文帝認為“在宮城直南，不欲開北街，泄氣以沖城闕”，“每坊但開東西二門”（《長安志》卷七“唐京城”條原注）。不是三品以上大官或特殊資格的人，不准鑿開坊牆，向大街開門。街上設有“街鼓”，天明和日落時，坊門隨街鼓聲開閉。

“市”的制度也是沿襲漢魏以來的體制，略有調整。“市”和“坊”一樣是方形的，四周有圍牆，并有市門。西漢長安的九市，“各方二百六十六步”，“凡四里為一市”（《三輔黃圖》）。北魏洛陽西郭的洛陽大市，周圍八里，即是四平方里，也相當于四個里的面積。唐代長安的東市和西市，分設在皇城的東南和西南，各占兩“坊”之地，平面近正方形，西市南北長1,031米，東西廣927米；東市南北長1,000多米，東西寬924米；面積都約1平方公里。方形圍牆內有沿牆平行的街道，西市街寬14米。四面圍牆各開兩門，內設東西嚮和南北嚮的大街各二條，西市的街寬16米，東

市的街寬近30米，交叉成“井”字形(參看圖48)，把全市劃分為



第二期

圖47 唐代長安西市遺跡平面圖

(採自《唐代長安城考古紀略》，《考古》1963年)

九區，每區四面臨街設置各種行業的店鋪。中心區設有市署和平準局。同時環繞着東市和西市的“里”，也居住着各種手工業工人和商人，從事貿易活動。東市南面的宣平坊有賣油者，昇平坊的里門旁有“胡人鬻餅之舍”，東市西面的平康坊有賣薑果(生姜?)的，宣陽坊有綵纈鋪，長興坊有畢羅(饅頭的一種)店^④，東市西北、靠近皇城景風門的崇仁坊有不少製造和修理樂器店鋪，“其中以南北二趙最妙”^⑤。這裏又與尚書省的選院相近，應選的人每多在此停憩，“因是一街(指春明門大街)輻湊，遂傾兩市，晝夜喧呼，燈火不絕，京中諸坊，莫之與比”(《長安志》卷八“崇仁坊”條原注)。西市東面的延壽坊，在皇城的西南角，有“鬻金銀珠玉者”^⑥，也被“推為繁華之最”(蘇翬《杜陽雜編》卷下)。這種環繞“市”的“里”居住工商業者而設立店鋪的設施，至少是沿襲北魏的“市”的制度。北魏洛陽大市周圍設有八個“里”，分別以

屠販、音樂、釀酒、喪事爲業，前二章已經談到，說明唐代長安東西兩市附近的“里”出現有經營手工業和商業的，並不是什麼新風氣，更不能認爲是“市”的制度瓦解的現象，原是一種傳統的市區設施。唐代長安西市西南的豐邑坊，“此坊多假賃方相送喪之具”（韋述《兩京新記》卷三），這和北魏洛陽大市以北的慈孝、奉終二里，“以賣棺槨爲業，賃輜車爲事”，沒有什麼不同。

3 唐代洛陽的“城”、“郭”佈局

唐代洛陽城，原來也是隋代創建的。隋統一以後，隋煬帝（公元604—616年）爲了進一步控制關東和江南，便于向四方徵收貢賦，徙居富商大賈及工藝戶，于洛陽營建東都。選擇地點在漢魏洛陽故城的西面，周代王城的東南，既橫跨瀨水兩岸，又直跨洛水兩岸。面積約47平方公里，比長安要小得多。內城（包括宮城和皇城）位于郭城的西北角。原來隋代所築的郭城是短垣（矮牆），到唐（武周）長壽二年（公元693年）才重建外郭城（參看圖49）。

洛陽宮城南面正門爲應天門，正殿爲乾元殿，武則天時改建爲明堂，唐玄宗（公元712—756年）時拆改明堂爲含元殿，這是舉行朝會的地方。皇帝處理日常政務的處所，和大明宮一樣稱爲宣政殿，偏處于含元殿之西，規模不及長安的太極宮和大明宮。皇城緊靠宮城之南，呈東西嚮長方形。另有東城緊附皇城之東，呈南北嚮的長方形。皇城與東城分佈有各種官署。在宮城之北有圓壁城。在東城之北有含嘉倉城，南北約長700多米，東西廣600多米，倉城內發現糧窖200多座，排列整齊。隋煬帝建造東都的目的之一，就是用來徵收和積儲大量粟帛。除了在東都的內城中造含嘉倉城以外，還在洛陽以東，鞏縣境內建築周圍二十里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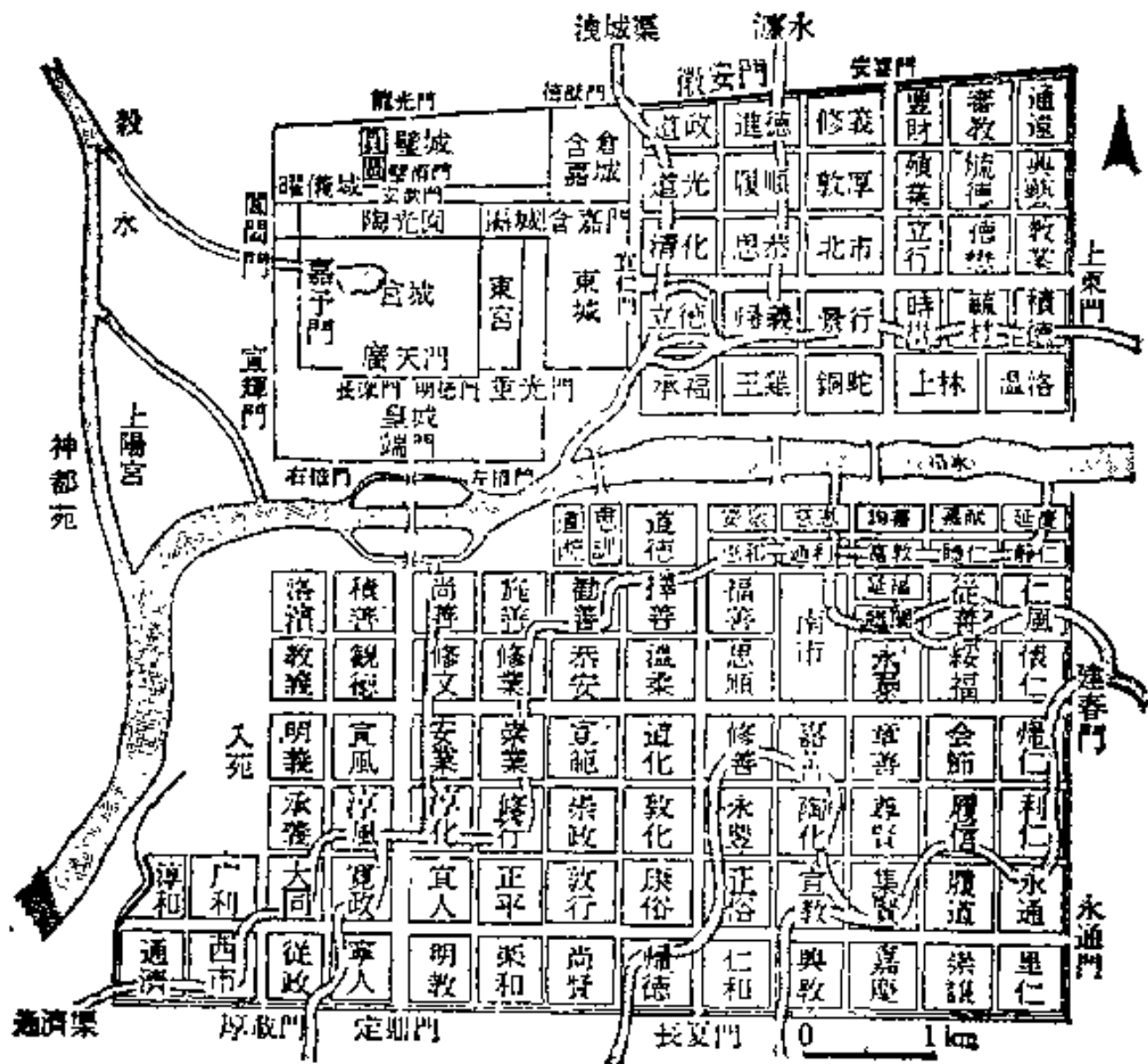


圖49 唐代洛陽城郭佈局結構圖

(依據徐松《唐兩京城坊考》所載《東都外郭城圖》與《隋唐東都城址的
 勘查和發掘續記》所載復原圖,《考古》1978年第6期,並加以修正)

《舊唐書·地理志》謂東都一百三坊,《唐兩京城坊考》考定隋代一百
 三里,唐代一百十三坊。但是正文列舉僅一百十二坊,其中時泰坊,據《元
 河南志》是元代新增,實有一百十一坊。《隋唐東都城址勘查和發掘續記》
 所作復原圖,減去敦和坊西的北里、西里,定為一百零九坊。但洛陽出土
 唐代墓志所見坊里之名,有不少超出這一百零九坊的。尚待作進一步的考
 訂和研究。《唐兩京城坊考》附圖所畫微安門及道術、惠訓二坊位置有誤,
 此後所作復原圖沿用其誤,今已改正。洛陽郭內分置洛陽、河南兩縣治
 理,東為洛陽縣,西為河南縣,洛河以北以瀉水為兩縣分界,洛河以南以
 長夏門東第三街為兩縣分界,參見趙超《唐代洛陽城坊補考》,《考古》1987
 年第9期。

洛口倉，穿有三千窖。

在皇城西南的禁苑東部，唐高宗在上元二年（公元675年）又起建規模很大的上陽宮，南臨洛水，西靠穀水，有觀風（正殿）、甘露、麟趾等殿。這和長安在東北禁苑造大明宮的情況相似，高宗晚年常居此宮聽政。

洛陽郭城由于洛水橫貫城中，分爲南北兩半。北半的西部是內城（包括宮城、皇城、東城等），東部是北郭，分佈有二十八個坊和一個“北市”。南半又可分爲東西兩部分，東部是與北郭相對的南郭，分佈有三十九個坊和一個“南市”；西部是西郭，分布有四十二個坊和一個“西市”。總共郭區有一百〇九個坊（一說一百〇三個坊），西郭的南牆有定鼎門，向北直通宮城的應天門，這條定鼎門大街是唐代洛陽的中軸綫。所有坊的平面大都呈方形，長寬分別在460—580米之間，面積較長安的坊要小。各坊形制與長安相同，坊內外的街道也比長安狹窄。

洛陽的三個市，北市、南市在北郭、南郭的中心，北市占一坊之地，南市占兩坊之地。西市在西郭的西南角，也占一坊之地。三市分別臨近漕渠、運渠和通濟渠，交通便利，商業比較發展。北市東南的時邕坊、東北的殖業坊，西面的清化坊，都有旅館或客舍，殖業坊西門并有酒家^①。這種在“市”周圍的“里”分設店鋪經商的設施，是沿襲北魏洛陽的體制。北魏“洛陽大市”東有通商、達貨二里以屠販爲業，另有準財，金肆二里居住富人；北魏“洛陽小市”東北又有殖貨里。里名的取義都與經商有關。看來唐代洛陽依然沿襲這種風俗，北市東北有殖業、豐財二坊，東南又有毓財坊，南市之北有通利坊，西市之北有廣利坊。所有這些坊名都與商人謀利有關，不是偶然的。

我們綜合唐代長安和洛陽兩個都城的市來看，當時各種行

業的種類已十分繁多，長安東市“市內貨財二百二十行”（《長安志》卷八“東市”條），洛陽南市“其內一百二十行，三千餘肆，四壁有四百餘店（指倉庫），貨賄山積”（《元河南志》卷一《京城門坊街隅古蹟》“唐南市”條）。或者說東都豐都市（即南市）“邸凡三百一十二區，資貨一百行”（《太平御覽》卷一九一引《西京記》）。所謂二百二十行、一百二十行或一百行，都是大概的數字，無非說明各種行業之多。說明這時都城的市上商品交易的種類確實極多，無疑的，對於全國經濟上的交流會起很大的作用。

從來都城的市，不僅起經濟上的交流作用，而且起着文化上的傳播作用。書店不知起于何時，至少東漢洛陽已有不少書肆，已經起着文化傳播作用。例如王充“家貧無書，常游洛陽市肆，閱所賣書，一見輒能誦憶，遂博通衆流百家之言”（《後漢書·王充傳》）。說明東漢洛陽書肆裏，已有“衆流百家”的著作，供人翻閱選購。到唐代，洛陽的書店當然更有發展，南市就有賣書肆^①。隨着雕版印刷術的發明，到唐代後期，長安東市已有好幾家做雕版印刷業，已知有大刁家和李家^②。這對於文化的傳播當然會起更大作用。

① 參看考古研究所西安唐城發掘隊：《唐代長安城考古紀略》，《考古》1963年第11期；考古研究所西安工作隊：《唐代長安城明德門遺址發掘簡報》，《考古》1974年第1期；陝西省文物管理委員會：《唐長安城地基初步探測》，《考古學報》1958年第3期。

② 《大唐六典》卷七“工部尚書郎中員外郎”條：“宮城在皇城之北，南面三門，中曰承天，……若元正（元旦）、冬至大陳設（大朝會）、燕會（賜宴）、赦過宥罪（大赦），除舊布新，受萬國之朝貢，四夷之賓客，則御承天門以聽政（蓋古之外朝也）。其北曰太極門，

其內曰太極殿，朔望則坐而視朝焉（蓋古之中朝也），……又北曰兩儀門，其內曰兩儀殿，常日聽政而視事焉（蓋古之內朝也）。”以上括號內字句，是原注。

- ③ 《玉海》卷一百五十九“唐兩儀殿”條：“《舊記》（《舊唐書·高祖本紀》）：貞觀八年三月甲戌高祖譙西突厥使者于兩儀殿。……十一年正月壬辰宴五品以上于兩儀殿。……《兩京記》（韋述《兩京新記》）貞觀五年太宗破突厥，于兩儀殿宴突利可汗。……《魏徵傳》：高昌平，帝宴兩儀殿。”
- ④ 《太平廣記》卷四百十七“宣平坊官人”條，引《酉陽雜俎》：“東宣平坊有官人，夜歸入曲（坊內小路），有資油者”。《太平廣記》卷四百五十二，引沈既醉《任氏傳》云：“天寶九年……鄭子乘驢而南入昇平之北門，……晨興將出，……既行及里門，門尚未發，門旁有胡人鬻餅之舍，方張燈熾爐”。孫榮《北里志》“張住住條”：“張住住者，南曲所居卑陋，有二女兒不振，是以門甚寂寞，為小鋪席，貨草剉薑果之類。”同上書“王國兒”條談到“宣場（坊）綵纈鋪”，《太平廣記》卷二百七十八“國子監明經”條，引《酉陽雜俎》談到“長興里華羅店。”
- ⑤ 段安節《樂府雜錄》“琵琶”條：“文宗朝有內人鄭中丞善胡琴。內庫有二琵琶，號大小忽雷。鄭嘗彈小忽雷，偶以匙頭脫，送崇仁坊南趙家修理，大約造樂器悉在此坊，其中南北二趙家最妙。”
- ⑥ 《太平廣記》卷八十四“王居士”條，引《關史》談到“延壽坊鬻金銀珠玉者。”
- ⑦ 時坊有旅館，見《文苑英華》卷九百三十張說《瀛州河間縣丞崔君（崔漪）神道碑》。殖業坊有客舍，見《陳伯玉文集》卷六《率府錄事孫君（孫虔）墓志銘》；殖業坊西門又有酒家，見張鷟《朝野僉載》卷五。清化坊有旅店，見《太平廣記》卷一百七十九“閻濟美”條引《乾闥子》。
- ⑧ 洛陽南市有賣書肆，見《文苑英華》卷三百四十三呂溫《上官昭容

書樓歌》。

- ⑨ 敦煌莫高窟藏經洞發現印有“上都東市大刁家大印”字樣的約屬九世紀的印本曆日殘片，現藏英國倫敦博物院圖書館。藏經洞又發現“京中李家于東市印”的《新集備急灸經》的咸通二年（公元861年）傳抄本，現藏巴黎國家圖書館，編號為P.2675。《敦煌遺書總目索引》（1962年商務印書館出版）所收《伯希和劫經錄》卷下，書題下有“京中李家于京市印”一行，“東市”誤作“京市”。

十四 都城佈局的變化和禮制的關係

1 都城佈局的三次重大發展變化

綜觀中國古代都城規劃的歷史，都城佈局有三次重大的發展變化。

（一）從西周到春秋戰國時期，都城由一個“城”發展為“城”和“郭”連結的結構。

商代都城，或者有方形城牆，或者只有濠溝作為防禦設施，作為政治中心的宮殿區都設在城內東北部，周圍分佈有居民點、手工業作坊以及墓地。

西周時代，周文王建都于豐，就開始有城牆和城濠的建築。周公營建東都成周，就開創了小“城”和大“郭”連結的佈局，小“城”主要用來建築王宮，作為政治中心，稱為“王城”；大“郭”主要用來安置“國人”、遷居殷民和駐屯軍隊；整個佈局坐西朝東，小“城”連結在大“郭”西邊。初期的“郭”只是利用山川加工連結而成。西周初期建築的魯國都城曲阜，還只有一個“城”，可能因為魯國是諸侯，不能採用成周王都的規格。從曲阜故城的城門和交通大道佈局來看，主要居住區原來在西部和中北部，整個佈局也是坐西朝東的，宮殿區在中部偏東北地方。到春秋初期為

了舉行求雨的“大雩”典禮，才開闢從宮殿通往南城牆東門的大道，并擴建這座城門。

春秋時代，隨着天子權力的衰落，諸侯中大國勢力逐漸強盛，中原的大國都城有採用“城”“郭”連結佈局的。到戰國時代大國先後稱王，就進一步推行這種佈局。鄭國都城新鄭，宮城東南有大郭，最初利用河流作屏障，戰國時韓國才建設郭城。齊國都城臨淄，原來只有一個大城，居住區設在城內東北部，到戰國時又在大城西南建築宮城，把大城作為郭城。戰國時代趙國都城邯鄲，原來也只有一個大城，宮殿造在城內東北部，後來又在大城西南建築由三個小城組成的宮城（今稱趙王城）。春秋後期晉國都城新田，宮城也是由幾個小城組成，郭區在宮城的東南。郭區沒有發現郭城的遺址，也該是利用河流作屏障的。春秋戰國時代中原大國都城，先後出現宮城連結大郭的佈局，但是形成的過程不一樣。

秦國在商鞅變法以後建都咸陽，一直沿用到秦代。咸陽故城由于渭水北移，城址已被沖毀，無從找尋，但是，秦惠王滅蜀以後，派張儀等人主持建築的成都城，“與咸陽同制”，有“小咸陽”之稱。成都故城是有“少城”（即小城）連結在大郭西邊的，可知秦都咸陽和中原大國國都一樣，採用西部小“城”連結東部大“郭”的佈局。秦始皇統一全國，建立統一的王朝以後，大規模擴建國都咸陽，在咸陽周圍造了許多宮殿羣，但是他維持原有的佈局，于渭南上林苑中興建朝宮前殿（即阿房宮），準備作為朝廷中心，這一中心依然在整個咸陽的西南部。整個咸陽佈局依然坐西朝東，仍以東門為正門，東門闕一直造到了東海邊上的胸縣（今江蘇連雲港市西南），直對咸陽都城的東門。

整個春秋戰國時代的諸侯大國中，只有楚都郢，始終保持一

個“城”的結構，宮殿區設在城內東南部，沒有受到中原大國推行小“城”連結大“郭”佈局的影響。

(二)從西漢到東漢，都城佈局從坐西朝東轉變為坐北朝南。

西漢的長安城，雖然規模很大，實際上還屬內城性質。關於這一點，過去許多學者是認識不足的。其實，只要對城內整個佈局了解一下，它的內城性質是很明顯的。城的南部是未央、長樂兩宮，中部有桂宮、北宮和明光宮，還有宗廟和官署夾在這些宮室中間。城的北部也分佈有中央官署和三輔官署的附屬機構。同時達宮貴人、諸侯王、列侯和郡的邸第，充滿了長安城內各個地區。長安的居民區有一百六十個“里”，市區有九個“市”，主要分佈在城外北面和東北面的郭區。當時渭水就在長安城以北三里地方，實際上成為北面“郭”區的屏障。漕渠從西南昆明池向東北流入渭水，成為東北面“郭”區的屏障。從北城牆西門（橫門）到渭水上的橫橋，有一條橫橋大道，兩旁就是商業發達之區，這一帶建有外郭，設有外郭門，稱為“都門”，是長安北上、南下的主要門戶。東城牆北門（宣平門）內外，是貴族和平民居住區，宣平門外沿漕渠也有外郭，其郭門稱為“東都門”，是長安東出、西入的主要門戶。所謂外郭，只是利用河流隄防和“里”、“市”的圍牆連結而成。直到隋代所建洛陽城的郭，還只是短垣，到唐代才改建為郭城。

從西漢長安整個佈局來看，還是沿襲先秦中原地區各大國都城的規格。外郭在北面和東北面，內城位於外郭的西南，整個城坐西朝東，以城內西南部的未央宮作為朝廷中心。未央宮以北門和東門為正門，設有門闕，尤以東門為主要。城門和外郭門，也以西北的橫門、都門和東北的宣平門、東都門為正門，尤以宣平門和東都門為主要。西城牆以外，南部建築有建章宮，號稱

“千門萬戶”，也只有高大的北闕和東闕作為正門。長安城的東郊，主要是漕運的河道和太倉所在，西郊主要是大規模的上林苑所在。就是班固《西都賦》所說：“東郊則有通溝大漕”，“西郊則有上囿禁苑”。

東漢的洛陽城，和西漢的長安城一樣，具有內城的性質。關於這一點，過去許多學者也是認識不足的，往往認識不到它還有廣大的外郭存在。東漢洛陽城中，宮殿所占的面積雖然要比西漢長安城小些，但是南北二宮還是占有城的中部主要地區，不僅北宮的北牆靠近北城牆，南宮的南牆同樣靠近南城牆。南城牆偏東的平城門，就因為與南宮的南門很接近，作為宮門看待。南宮和北宮之間有復道相通。在南北二宮周圍，還分佈有宗廟和中央的官署以及武庫、太倉等等。魏晉沿用這個佈局，宮殿官署多到“一萬一千二百十九門”。洛陽城屬於內城性質還是很明顯的。

然而東漢洛陽的佈局，顯然和西漢長安不同，就是從坐西朝東轉變為坐北朝南。洛陽城中南北二宮南北縱列，以南門為正門；這與長安城中長樂、未央二宮東西橫列，以東門為正門不同。長安以東城牆北門宣平門為正門，洛陽以南城牆偏東的平城門為正門；平城門是建武十四年（公元35年）和南宮前殿同時建設的，說明洛陽城這種坐北朝南的佈局是從東漢初期創始的。長安的武庫安置在城南的長樂、未央二宮之間，洛陽的武庫安置城內東北角，位於北宮的東北。由於長安城坐西朝東，它的外郭在北面和東北面；是利用渭水、漕渠作為屏障的。由於洛陽城坐北朝南，它的外郭在東、南、西三面，是利用邙山、洛水、溝渠作為屏障的。此後曹魏、西晉、北魏建都洛陽，還是在這個佈局的基礎上加以發展和調整。

(三)從魏晉南北朝到隋唐，從坐北朝南發展為東西對稱、南北向的中軸綫佈局。

隋唐以後的都城，都採用東西對稱、南北向的中軸綫的佈局，這是在東漢都城坐北朝南的基礎上發展起來的。北魏建都洛陽，在原來北宮的基礎上重建宮殿，省去了南宮，把原來北宮南門外的正南大街(銅駝街)延長，穿過原來南宮基址，直到南城牆的宣陽門，并把原來建築在南宮東南的中央重要官署，分別建到銅駝街的東西兩側，于是在洛陽城南部形成以銅駝街為中軸綫的佈局。同時把東西兩面的郭區的“里”和“市”，劃分得十分整齊。東西兩面郭區分設有小市和大市，把全部城區和郭區劃分為三百二十個“里”，每個“里”的面積是一平方里。因為洛陽的南面郭區，大體上以洛水為界限，面積狹小，郭區中央的南北向大街作為中軸綫的作用，就不顯著。

由于東漢洛陽城坐北朝南，外郭從東、南、西三面環抱着內城，居民區和市區主要分佈三面郭區。魏晉沿用這種佈局，有所謂洛陽三市，金市設在城內北宮西邊，馬市設在東面郭區，南市設在南面郭區。北魏對郭區佈局有了進一步發展，把“里”和“市”劃分得十分整齊，有小市、大市和四通市分設在東、西、南三面郭區。建春門(東城牆北門)外七里有橫跨陽渠的七里橋，橋東一里有東郭門，“門開三道”，稱為“三門”。閭闔門(西城牆北門)外七里有橫跨張方溝的張方橋，相當于西郭門。宣陽門(南城牆中門)外四里有直跨洛水的永橋，相當于南郭門。陽渠、張方溝和洛水是三面郭區的屏障。這種郭門的設置，是從東漢郭區邊緣防守用的“亭”發展形成的。例如張方橋便是東漢夕陽亭所在。

隋唐長安城的佈局，正是沿用北魏都城的規模作了更加整

齊的調整。長安的內城位于整個都城的北部正中，分成南北兩半；北半是宮城，是按照三朝（外朝、中朝、內朝）的朝廷制度建設的；南半是皇城，把重要中央官署全部集中建築于皇城，并把內城與居民區、市區完全隔離。郭城從東、南、西三面環抱內城，中央的南北向大街稱為朱雀大街，從宮城的承天門和皇城的朱雀門向南直通南城牆的明德門，成為貫通皇城和郭城的南北向中軸綫，使整個長安成為東西對稱的佈局。郭區採用嚴格的坊里制和集中的市制。以朱雀大街為中軸綫，東西兩面郭區的街道和“坊”、“市”相互對稱，大小距離完全相等，成為棋盤格式。

上述三次都城佈局的重大發展變化，是很清楚的。仿效都城的陵寢佈局同樣曾發生三次重大變化。陝西省鳳翔縣發現春秋戰國時代秦公陵園十三座，陵園都坐西朝東，微偏西北，有一定的佈局。已發掘了二座陵園的壕溝設施。主墓是“中”字形大墓，在主墓的東側或東南側有“甲”字形小墓，墓道都向東。圍繞主墓有長方形壕溝。包括主墓壕溝連同東側或東南側小墓，更圍繞有大的長方形壕溝。大的長方形壕溝以內的面積，正好是小的長方形壕溝以內面積的十倍。小的長方形壕溝正處于大的長方形壕溝的西南部，相當于都城的宮城，而大的長方形壕溝相當于都城的郭城（參看圖50、圖51）^①。河北省邯鄲市的趙王陵，只調查五個陵臺，在三號陵發現了圍繞陵墓的圍牆，陵東有東西向的斜坡道路，說明陵園也是坐西朝東的^②。秦始皇陵園同樣是坐西朝東的，西部有長方形的雙重圍牆，陵墓處于圍牆的南部，它相當于都城的宮城，東部包括兵馬俑坑在內，相當于都城的郭城。關於這方面，前面探討秦都咸陽佈局的時候已經談到。在今陝西省咸陽市附近的西漢諸帝陵園，佈局同樣是坐西朝東的。圍繞有方形圍牆的主墓在陵園西部，陪葬墓都在主墓的東北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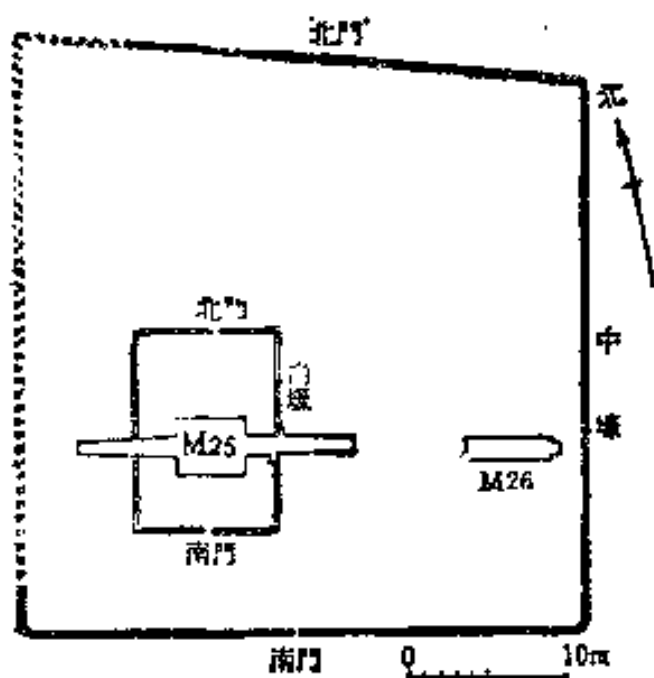


圖 50 鳳南5號秦公陵园平面圖
 (採自《鳳翔秦公陵园續探與試掘簡報》,《文物》1983年第7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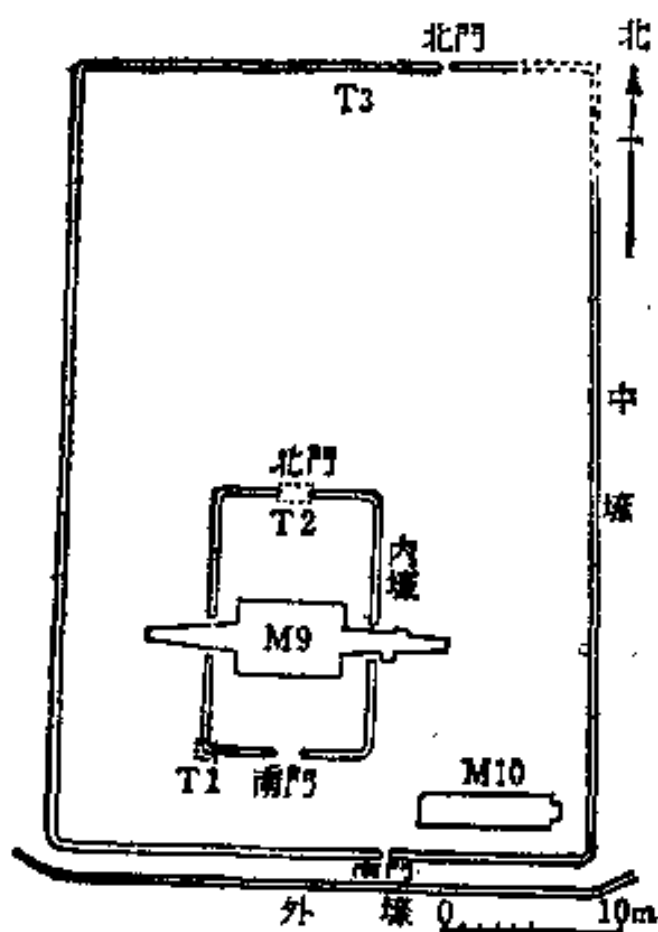


圖 51 鳳南3號秦公陵园平面圖
 (採自《鳳翔秦公陵园續探與試掘簡報》,《文物》1983年第7期)

或東方,陵寢都造在主墓的北方、南方或東南方,遷移豪富居住而用來供奉陵園的陵邑,也造在主墓的北方或東方。

在今河南省洛陽市東北東漢諸帝陵園,佈局顯然和西漢諸帝陵園不同了,由坐西朝東轉變為坐北朝南^③,開始建有舉行大規模朝拜獻祭典禮的殿堂。

唐代諸帝陵園就開始有東西對稱的中軸綫佈局。陵寢的主體建築，高據陵園北部，依山爲陵，或有高大陵墓。墓前有獻殿，周圍有方形圍牆，四面有門，相當于都城的宮城。從朱雀門（圍牆南門）向南，有很長的南北嚮大道，成爲整個陵園的中軸綫，前後共有三對土闕。唐高宗和武則天的乾陵，原來四周更有大的圍牆，相當于都城的郭城，見《長安圖志》所載《唐高宗乾陵圖》。乾陵中軸綫的兩側，從南往北，陳列有石柱（華表），飛馬、朱雀各一對，石馬五對，持劍石人十對，作爲侍衛。東南有大臣和親屬的陪葬墓。

我們以陵寢佈局的變化和都城佈局的變化作一比較，可以更加看清，前面所說都城佈局的三次重大發展變化，是不錯的。

2 都城佈局變化的原因及其與禮制的關係

從西周到春秋戰國時期，都城之所以由一個“城”發展爲“城”和“郭”連結的結構，首先是由于政治上和軍事上的需要。西周初期東都成周，在王城以東建設大郭，主要用來安置“國人”、遷居殷民和駐屯軍隊，就是爲了鞏固新建立的周朝對於四方的統治，加強政治上和軍事上的統治力量。春秋戰國時期中原許多諸侯中的大國，先后採用這種佈局，同樣具有加強統治力量的目的。建設大郭的另外一個原因，是爲了適應社會經濟發展的需要，特別是手工業和商業發展的需要。隨着社會經濟制度的發生變革，中央集權政治體制的確立，這種小“城”連結大“郭”的佈局越來越有發展，郭區成爲居民集中的居住區，手工業和商業發達之區。

有一點需要我們深入探討的，就是從西周一直到西漢的都城佈局，爲什麼都要採用坐西朝東的方式呢？《三輔黃圖》和

《漢書·高帝紀》顏師古注，都說西漢長安未央宮之所以要把北門、東門作為正門，是由于蕭何採用“厭勝之術”，爲了祈求吉利而避免不祥。《史記·高祖本紀》索隱又說：“東闕名蒼龍，北闕名玄武，無西南二闕者，蓋蕭何以厭勝之法，故不立。《說文》云：闕，門觀也，高三十丈。秦家舊處皆在渭北，而立東闕、北闕，蓋取其便也。”正義又說：“按北闕爲正者，蓋象秦作前殿，渡渭水屬之咸陽，以象天極闕道絕漢抵營室。”我們認爲後一解釋不確，當時秦代在渭北咸陽的舊宮都已被焚毀，漢新建皇宮不可能爲了便于與渭北咸陽秦宮聯繫而以北門、東門爲正門。

古人確實有西南吉利的迷信思想。西周以後，貴族們確實認爲居住西南方有利，東北方不祥。《周易》上有關於這方面的占筮之辭二條：(1)《易·坤卦》：“元亨。利牝馬之貞，君子有攸往，先迷，後得主。利西南，得朋；東北喪朋。安貞吉。”這是說，君子出門去，先是迷路，後來遇到接待的主人。利于到西南方去，可以得到朋友；到東北去，要喪失朋友。占問這樣是否安定，得到了吉兆。(2)《易·蹇卦》：“利西南，不利東北，利見大人，貞吉。”這是說，到西南方去得利，到東北方去不利，利于去見大人，占問得到吉兆。從這裏，可知周人確實有這樣的迷信，認識居住或者到西南方有利，相反，居住或到東北方就不利。《周易》大體上著作于西周時期，可知這種迷信思想，西周已經出現。

這種迷信的思想，後來又擴展爲“西益宅不祥”的習俗。《論衡·四諱篇》說：“俗有大諱四：一曰諱西益宅，西益宅謂之不祥，不祥必有死亡。相懼以此，故世莫敢西益宅，防禁所從來者遠矣。”爲什麼“西益宅不祥”呢？因爲西方是尊長居住的地方，在西方擴充住宅將要妨害尊長的地位。應劭《風俗通義》對此有解釋和評論：

宅不益西。俗說西者爲上，上益宅，妨家長也。原其所以西上者，《禮記》：“南向北向，西向爲上。”《爾雅》：“西南隅謂之隩，尊長之處也。”不西益者，難（一作恐）動搖之耳。審西益有害，皆寅三面，豈能獨言乎。（《藝文類聚》卷六十四、《太平御覽》卷一百八十、《天中記》卷十四引，王利器《風俗通義校注》第562頁）

從此可知，這種西南方有利和“西益宅不祥”的思想，是和“西者爲上”、“西南隅謂之隩”的禮俗密切有關的。王充對此評論說：

夫西方，長老之地，尊者之位也。尊長在西，卑幼在東。尊長，主也。卑幼，助也。主少而助多，尊無二上，卑有百下也。西益主益，主不增助，二上不百下也，于義不善，故謂不祥。不祥者，不宜也，于義不宜，未有凶也。（《論衡·四諱篇》）

王充雖然認爲“西益宅”，“未有凶也”，但是，還以爲西方是尊長之處，尊長應該是“尊無二上”的，如果“西益宅”，就使得有“二上”，這樣就“于義不善”，“于義不宜”。王充這樣的評論，是以禮制爲標準的，是依據禮制來反駁當時的迷信風尚。看來這種西南方有利和“西益宅不祥”的迷信，是不理解古代禮制而產生的，是把古代禮制看作神秘的規定而產生的。

我們認爲，西漢以前的都城採用坐西朝東的佈局，把宮城或者宮室造在西南部而以東方、北方爲正門，是依據古代禮制而設計的，并不出于什麼“厭勝之術”。

古代禮制確實以室中西南隅作爲尊長居住之處。《禮記·曲禮上》說：“爲人子者，居不主奧，”鄭玄注：“謂與父同宮者也，不敢當其尊處。室中西南隅謂之奧。”這是說，室中西南角，是尊長居住之處，小輩是不能居住的。古代禮制，還把室中西南隅作爲“神”和“尸”安坐之處。所謂“神”，是指祖先的神靈。所謂

“尸”，是指祭祀時作為祖先神靈的代表，往往是選用族中孫子一輩的人充當的。《儀禮》的《少牢饋食禮》，是卿大夫祭祀其祖廟的禮儀，當主人要祭祀祖先的時候，先要派司宮（官名）陳設“筵”在廟中室內西南隅，同時派祝（官名）陳設“几”在“筵”的東南，作為“神”的安坐之處。《少牢饋食禮》：“司宮筵于奧，祝設几于筵上，右之。”鄭玄注：“布陳神坐也。室中西南隅謂之奧。席東面，近南為右。”在西南角陳設好神坐，然後由祝把尸請進廟來，升登室中，“尸升筵，祝、主人西面立于戶內，祝在左。祝、主人皆拜。”因為代表神靈的“尸”安坐到西南隅的席位上，朝向東北，祝和主人就立于西面而拜。《儀禮》的《特牲饋食禮》，是士祭祀其祖廟的禮儀，先要由“祝筵几于室中東面”，鄭玄注：“為神敷席也。”就是由祝陳設筵和几于室中，坐西朝東，作為“神”的席位；然後由祝把“尸”請進來，“尸即席坐，主人拜”。由此可見，無論宗廟中的室，宮殿中的室，都是以西南角的“奧”作為尊長安居之處，都是坐西朝東，以東向為尊。古代都城的設計者，就是把整個都城看作一個“室”，因而把尊長所居的宮城或宮室造在西南隅，整個都城的佈局都是坐西朝東的。這是周人的傳統習俗，當周的祖先公劉建都于豳的時候，就是“度其夕陽，幽居允荒”（《詩·大雅·公劉》），“夕陽”就是指西部地區，把宮室造在西部。

凌廷堪《禮經釋例》概括《儀禮》的禮制，卷一《通例上》有一條說：

“凡室中，房中拜，以西面為敬；堂下拜，以北面為敬。”解釋說：“蓋堂上以南鄉（向）為尊，故拜以北面為敬。室中以東鄉（向）為尊，故拜以西面為敬。房中則統于室，亦以西面為敬歟？若堂下之拜，自臣與君行禮外，皆禮之殺者。”

當時只有臣下朝見君上用“堂下拜”的禮節，平時在室內舉

行的禮節都是以東向爲尊的。當時殿堂是南向的，但是室內的席次以東向爲尊。廟堂同樣是南向的，室內神主的席位也是以東向爲尊。直到秦漢之際，還是盛行這種禮制。例如鴻門宴，項王、項伯東向坐，亞父（范增）南向坐，沛公北向坐，張良西向侍，樊噲後來也西向立（《史記·項羽本記》）。韓信攻破趙的陳餘軍，生擒廣武君（李左車），“乃解其縛，東鄉（向）坐，西鄉（向）對，師事之”（《史記·淮陰侯列傳》）。當漢文帝（原爲代王）被迎入長安，羣臣勸請即帝位時，他“西鄉（向）讓者三，南鄉（向）讓者再”（《史記·孝文本紀》、《漢書·文帝紀》）^④。西向讓是表示不敢居尊長之位，南向讓是表示不敢居君上之位。所以要先西向讓，無非表示在皇族中不敢居尊長之位，因爲在宗法制度下，宗統（宗族長對成員的支配權）和君統（君主對臣下的支配權）是合一禮。

西漢以前都城佈局坐西朝東，是繼承過去維護宗法制度的禮制，以東向爲尊。東漢以後都城佈局改爲坐北朝南，是推行推崇皇權的禮制，以南向爲尊，當時在中央集權的政治體制下，爲了推崇皇權的需要，把皇帝祭天之禮作爲每年舉行的重大典禮，規定在國都南郊舉行，這是使都城佈局坐北朝南的一個原因。

西周有祭天于郊外之禮，叫做“郊”，周公營建東都成周，就曾“用牲于郊”（《尚書·召誥》）。古文獻都說郊祀在南郊舉行。《禮記·郊特牲》說：“兆于南郊，就陽地也。”但是我們從晉國都城新田的考古資料來看，早期郊祀不一定在南郊，東郊和南郊都可以舉行。新田古城（即牛村古城）正東約3公里和南面約半公里的郊區，都有郊祀用的獸坑羣。因爲東郊和南郊同樣是“陽地”，而且正東陽光更充足，太陽出于正東方。春秋時代魯國舉行郊祀，也未必都在南郊，只有求雨的“大雩”明確在南郊，南郊

就建有雩壇。魯僖公在曲阜擴建成高大的南門，就是爲了“大雩”，所以又稱雩門。戰國時代中原各大國沒有這種郊祀之禮。秦國另外有一套在特定地點祭祀黃帝、炎帝、白帝、青帝的禮制。西漢初年曾沿用這種禮制，漢文帝曾建築渭陽五帝廟，漢武帝又建立甘泉泰畤，汾陰后土祠，這種分散祭祀天神的禮制，已不符合“大一統”的政治體制的需要，于是到成帝時，就出現祭天地于長安南北郊的規定，但是不久又被廢止。直到平帝元始年間，王莽又規定合祭天地于南郊。這種在國都南郊每年舉行祭天的禮制，正符合當時“大一統”的政治體制下，高度推崇皇權的需要，所以到東漢就被光武帝所採用。光武帝于建武元年（公元25年）即位于鄴（今河北省柏鄉縣北），在南郊建壇，祭告天地，就是“用元始中郊祭故事”（《續漢書·祭祀志上》）。次年正月，“初制郊兆于洛陽城南七里”，仍然採用元始中故事。後來在洛陽城南面開關平城門，既是爲了便于羣臣到宮中朝會，更是爲了便于皇帝到南郊舉行郊祀。從此歷代皇帝就沿用這種禮制，成爲定制。這種開國皇帝祭告天地的即位禮，顯然比漢高帝在汜水之陽的即位禮隆重多了，所以爲後來許多開國君主所沿用。

東漢以後都城佈局從坐西朝東改爲坐北朝南，有個更重要的原因，就是爲了適應舉行盛大的元旦朝賀皇帝儀式的需要，其目的在于進一步推崇皇權和鞏固全國的統一。

春秋以前是沒有大朝賀的禮制的。當時天子、諸侯和卿大夫的朝廷，只作爲處理日常政務的地方。上朝的儀式比較簡便，每天清早臣下要去朝見君上，決定處理大事^⑤。由于掌權者都是貴族，重視宗法制度，不但宗族內的重要禮儀要在宗廟舉行，政治上的重大典禮也都必須在宗廟舉行。國君的“即位禮”，諸侯朝見天子的“覲禮”，卿大夫會見隣國國君的“聘禮”，對臣下任

命官職或賞賜的“策命禮”，都是在宗廟裏舉行的。所有國家大事，國君都要到宗廟向祖先請示報告。例如出兵前，先要到廟中接受祖先的命令，然后在廟中對臣下發布命令，又要在廟中舉行“授兵禮”，把兵器授予戰士。凱旋後，先要到廟中向祖先“告捷”，向祖先舉行“獻俘禮”^⑥。平時每月初一，國君要到宗廟舉行“告朔”和“聽朔”的儀式。按禮，周天子于秋冬之交，要把次年曆書頒發給諸侯，叫做“班朔”。諸侯于每月初一，必須用一隻活羊祭祀宗廟，叫做“告朔”。同時要在宗廟決定治理一月的大事，叫做“視朔”或“聽朔”。因為這是在宗廟舉行的，又稱為“朝廟”。每年元旦要特別鄭重舉行這種禮儀，就叫做“朝正”^⑦。這原是宗廟中一種重要禮儀，但是到春秋晚期就流于形式，國君不親臨宗廟，只是殺羊祭祀而已。所以“子貢欲去告朔之餼羊”，而孔子說：“爾愛其羊，我愛其禮。”（《論語·八佾》）

到戰國時代，由于社會經濟的變革，中央集權的政治體制的確立，朝廷的重要性開始超過宗廟，許多政治上的大典逐漸移到朝廷上舉行，并開始出現對國君“大朝”的禮制。例如趙武靈王十九年（公元前307年）“春正月，大朝于信宮”，趙惠文王四年（公元前295年）“朝羣臣”，羣臣宗室都來朝。到秦始皇統一六國，創建統一王朝，就擴大推行這種朝賀的禮儀。秦始皇二十六年（公元前221年）“改年始，朝賀皆自十月朔。”這是因為用顓頊曆，以十月朔為歲首。三十五年營作朝宮前殿（即阿房宮），庭上可以坐萬人，就是為擴大十月大朝賀作準備的。過去逢每年元旦、每月初一，是由國君到宗廟朝見祖先，舉行“告朔”和“聽朔”的儀式；這時每逢年初，是要羣臣到朝廷朝見國君，舉行大朝的儀式了。

秦蕙田說：“三代盛時無所謂朝賀也，每日則有視朝之儀，月朔則有聽朔之禮。……但古者于廟行告朔之禮，所以尊祖；後世

于朝舉賀歲之禮，乃以尊君。名同而實異。”又說：“古者有朝覲之禮，無朝賀之文，秦改封建為郡縣，始有朝十月之禮。”（《五禮通考》卷一百三十六）這個論斷基本上是正確的。

西漢初年沿用秦代十月朝儀。漢高祖七年（公元前200年）長樂宮建成，叔孫通制定十月朝儀，“引諸侯王以下至吏六百石以次奉賀，自諸侯王以下莫不振恐肅敬。”“竟朝置酒，無敢譴諱失禮者。于是高帝曰：吾迺今日知為皇帝之貴也。”（《史記·叔孫通傳》）高帝時，曾確定蕭何以下十八侯上朝位次，高后時（呂后二年春）又下詔，按列侯之功以定朝位。說明這樣的大朝會，不僅用來表示“皇帝之貴”，還用來表示大臣的等級地位。漢武帝改用夏正，逐漸改在元旦舉行大朝會。到東漢初年，這種元旦舉行的“元會儀”又有進一步的發展，參加朝賀的官員更加廣泛，朝賀的儀式更加鋪張，歡樂的氣氛更加濃厚，而且和郡國的“上計”結合了起來，上計吏被視為郡國的代表而參加朝賀。

東漢的元會儀，參加的官員，上至公侯，下至四百石以下，還包括少數民族使者、各郡國的上計吏、宗室親屬在內。先是“二千石以上，上殿稱萬歲，舉觴御坐前”，接着由百官朝賀，少數民族使者朝貢，然後由郡國上計吏在陛下朝見，再加上宗室親屬的會集，人數達一萬以上。最後向皇帝“上壽”，舉行酒會，還有種種雜技表演，音樂伴奏。北宮的正殿德陽殿“周旋容萬人，陛高一丈”，就是專為舉行元會儀而設計建築的（《續漢書·禮儀志（中）》及劉昭注引蔡質《漢儀》）。班固《東都賦》和張衡《東京賦》，都有大段描寫元會儀的，這和他們的《西都賦》和《西京賦》顯然不同。因為這正是洛陽開始出現的具有特色的儀式。

東漢明帝把這種元會儀搬到光武帝的原陵上舉行，“百官、四姓親家婦女、公主、諸王大夫、外國朝者侍子、郡國計吏會陵”，

公卿羣臣要登寢殿進謁“神坐”。等到“羣臣受賜食畢，郡國上計吏以次前，當神軒占其郡國穀價，民所疾苦，欲神知其動靜”（《續漢書·禮儀志(上)》）。上計不僅是對地方官考績的方式，而且是統計全國戶口、財政收入以及民政情況的重要方法。上計吏所上的計簿，就是全國各地統計戶口、賦稅、開墾土地數字的重要圖籍。班固《東都賦》描寫元會儀說：“是日也，天子受四海之圖籍，膺萬國之貢珍。”所謂“受四海之圖籍”，就是指接受上計而言。這時元會儀成爲皇帝接受上計的主要儀式。在元會儀上，按禮，皇帝不僅接受郡國上計的統計圖籍，而且還要傾聽上計吏的口頭報告，更可以提出許多問題讓上計吏對答。從此元旦大朝會，不僅是羣臣宗室對皇帝的朝賀和上壽，而且是對全國各地一年成績的總檢查、總考核，在政治上的意義十分重要。

元會儀原是統一王朝加強中央集權，鞏固統一的一種手段。自從秦始皇作爲重要禮制推行以後，不斷有所擴展。東漢時期是一次大擴展，它不僅召集中央一級重要官員和親屬參加，邀請少數民族使者參加，更吸收郡國的上計吏作爲郡國一級的代表參加，使得統治階級內部的代表性更加廣泛。從東漢開始，刺史于每年年底不再進京奏事，只依靠上計吏上京報告。《續漢書·百官志(五)》說：“初歲盡詣京都奏事，中興但因計吏。”元會儀既然成爲皇帝接受“上計”的主要儀式，它的重要性就大爲加強。這樣萬人以上的大會的舉行，是總結全國過去一年成績和推展未來一年政務的主要方式。爲了適應舉行這種萬人大會的需要，都城的佈局就必須坐北朝南，在北宮必須建設適合舉行元會儀的德陽殿，北宮的南門必須建設銅駝街作爲集合的廣場，南宮的南門以外必須開闢平城門作爲南北向的進城通道。

這種以郡國上計和元旦朝賀相結合的元會儀，魏晉南北朝

繼續推行。只是因爲這時尚書省、門下省掌權，元會儀改由尚書和侍中主持。例如北齊元會儀，“侍中依儀勞郡國計吏，問刺史太守安不？及穀價、麥苗善惡、人間疾苦”（《隋書·禮儀志》）。

隋唐以後，郡國上計與元旦朝賀分開，設有戶部（隋代稱爲民部）主管上計，各州郡每年遣使到京上報，稱爲朝集使，但是朝集使在元旦羣臣朝賀的儀式中仍居重要的地位。元會儀到唐代又有進一步的擴展，更加隆重而鋪張，成爲所謂“外朝”。唐代有所謂三朝（外朝、中朝、內朝）的朝廷，宮城的太極殿和承天門及其門前橫街的建設，大明宮的含元殿、翔鸞閣、棲鳳閣以及龍尾道的建設，都是爲了適應“外朝”的需要。關於這點，我們在前面已經談到。橫街和龍尾道前面場地具有廣場性質，用作大朝會集合排班的地方；太極殿和含元殿建築高大，用作居高臨下，南向朝見羣臣的地方，以表示其崇高的威嚴。同時全城採用南北向的中軸綫佈局，使朱雀大街從南城牆的明德門向北直通到宮城的承天門，既便于集合羣臣舉行大朝會，更可以因此增加君上“坐北朝南”的威勢。

以都城中北部的宮城爲主體的、對稱的中軸綫佈局，是適應規模越來越大的元旦大朝會的需要而設計的。元旦大朝會的規模越來越大，原是爲了加強中央集權和鞏固統一的需要。因此唐代長安這種棋盤格式的中軸綫佈局的出現，就是統一王朝的權力達到高度集中的一種標志。

以上論述了唐代以前都城佈局的三次重大變化和變化原因以及它與禮制的關係。我們最後必須指出，都城佈局還有第四次重大變化，就是唐以前封閉式的（築有圍牆的）市制和坊制的瓦解，代之以水上交通要道上新“行”、“市”和繁華的“街市”以及大街小巷的結構。

這一重大變化，從唐代晚期開始，經過五代，直到北宋中期才完成，因而到北宋末年的東京，就出現如孟元老《東京夢華錄》所記述和張擇端《清明上河圖》所描繪的那樣情景，酒樓、茶坊以及各種商店都沿街開設，并在巷中開設，甚至橋上都成爲市場。賣藝的游藝場也都沿街巷設立。居民衆多的小巷也不再相互隔離而直通大街，居民區與商業區往往連成一片，而不再有專設的封閉式的“市”了。“坊”也成爲行政上地區的名稱，不再是封閉式的居民住宅區域了。釀成這一重大變化的原因，主要是經濟上的原因。由於都城人口急劇增長，生活必需品的需要日益增加，原有封閉式的“市”已不可能供應。與此同時，由於社會經濟的發展，全國性市場的形成，各種行業的商人聯合組織“行”或“市”的成長，使得都城內外、水上交通要道上新的日用商品的“行”或“市”興起，在這個基礎上又逐漸發展成新的“街市”，於是“街市”就代替了過去封閉式的“市”。隨着“街市”的發展和坊巷中商業交易的開展，逐漸形成大街小巷的交通網，於是大街小巷的結構就代替過去“街坊”的結構。

在唐、宋之際都城制度發生重大變化過程中，五代的後周世宗曾作出重大的貢獻。五代時，除後唐以外，四代都建都大梁（今河南開封）。大梁的宮城原是唐代節度使的治所，宮城外圍的舊城（後來稱爲裏城）原是唐代汴州的州城，規模較小。後周世宗爲了適應當時政治和經濟上發展的需要，在原有州城外圍加築一圈外城，亦稱“新城”或“羅城”，面積比原來州城大四倍，并作出了新規劃和新設計，因而使大梁變成了新的都城。新的規劃是，由官府劃分好官署、軍營、倉場、街巷所占地段後，“即任百姓營造”；而且准許居民沿街道造屋，并占有街道十分之一的寬度面積，用來種樹、掘井和搭蓋涼棚等，這是適應城市經濟新發展

的新街道制度；同時為適應商業大發展的需要和增加都城的壯觀，還允許居民在汴河沿岸種榆柳，起建超過禮制規定的邸店和樓閣臺榭。北宋東京（即大梁）的建設，就是在後周這個新規劃的基礎上發展起來的。北宋允許居民沿大街建築超過禮制的規定的規格高級的邸店和樓閣；並從外城東、南、西、北四面城門開闢通向裏城、宮城的四條“御街”，其中南面一條“御街”就具有全城中軸綫的性質，於是北宋東京出現宮城、裏城和外城一共三重城圈的結構，並形成以宮城為中心的全城四通八達的交通網。後來南宋臨安（今浙江杭州）以及遼、金、元、明、清的都城，都沿用這種都城新制度而有所發展。

- ① 韓偉：《鳳翔秦公陵園鑽探與試掘簡報》，《文物》1983年第7期。
- ② 河北省文管處、邯鄲地區文保所、邯鄲市文保所：《河北邯鄲趙王陵》，《考古》1982年第6期。
- ③ 楊寬、劉根良、太田有子、高木智見：《秦漢陵墓考察》，《復旦學報》1982年第6期。
- ④ 《史記·孝文本紀》集解引如淳曰：“讓羣臣也。或曰賓主位東西面，君臣位南北面，故西向坐。三讓不受，羣臣猶稱宜，乃更迴示變，而君位之漸也。”按東西向是尊卑之位，南北向是君臣之位。文帝先“西向讓者三”，表示不敢居尊長之位，再“南向讓者再”，表示不敢居皇帝之位。
- ⑤ 《詩·齊風·鷄鳴》：“鷄已鳴矣，朝既盈矣。”“東方明矣，朝既昌矣。”說明鷄鳴就必須上朝。《左傳·襄公三十年》：“鄭伯有奢酒，爲窟室而夜飲酒，擊鐘焉。朝至，未已。朝者曰：‘公焉在？’其人曰：‘吾公在壑谷。’皆自朝布路而罷（杜注：布路，分散）。既而朝（謂伯有與羣臣共朝鄭君），則又將使子皙如楚，歸而飲酒。”說明當時卿有朝廷，先要上朝；國君上朝的時間稍遲。

- ⑥ 參看拙作《試論西周春秋間的宗法制度和貴族組織》第一節“宗廟制度”，收入拙著《古史新探》，1965年北京中華書局出版。
- ⑦ 《禮記·月令》季秋之月“合諸侯，制百縣，爲來歲受朔日”。《呂氏春秋·季秋紀》同。高誘注：“百縣，畿內之縣也。”“來歲，明年也。秦以十月爲正，故于是月受明年歷日也。”高誘據此謂《月令》爲秦制，恐不確。《呂氏春秋》畢沅校本引盧文弨云：“案若以十月爲來歲，而于九月始受朔日，則僅就百縣言爲可，若遠方諸侯則有不能逮者矣。注據此即爲秦制，吾未之信。”按盧說正確。《月令》孟冬之月“天子乃祈來年于天宗”，季冬之月“天子乃與公卿大夫共飭國典，論時令，以待來歲之宜”。可知《月令》并不以孟冬十月爲來歲。《春秋·文公十六年》：“夏五月公四不視朔”，杜預注：“諸侯每月必告朔聽政，因朝于廟，令公以疾闕，不得視二月、三月、四月、五月朔也。”《左傳·襄公二十九年》：“春王正月，公在楚，釋不朝于廟也。”杜預在《春秋》“公在楚”三字下注：“公在外，闕朝正之禮甚多”。

日文譯本尾形勇先生後記

將楊寬先生的手書原稿譯成日語，先在日本刊行，這種史無前例的嘗試，第一次是在1981年，即大著《中國皇帝陵的起源與演變》的出版。本書的出版已是第二次了。

如果說在這兩項工作中，有什麼比較大的差別的話，那就是翻譯擔任者的不同。前書是請很有才能的太田侑子參與的，而這次則有緣得到了高木智見的極大盡力。特別要提到的是，西嶋定生先生為此付出了很大的辛勞，對譯文作了整體的總檢閱，並承蒙他處處安排和時時關心，直到本書正式刊行。此外，儘管學生社料知出版這麼難深的學術專著會有種種難處，還是再一次給子我們慷慨的允諾。

第一次翻譯楊先生的大作時，我與太田侑子常常為將“設有”誤譯為“沒有”而大傷腦筋；這次，我們終於熟悉了楊寬先生的文筆。還有，中文的“佈局”、“規劃”、“城壕”諸詞，我們看上去似懂非懂，應該怎麼翻譯？有關問題是否確當，譯者間曾多次進行討論，因而容易下判斷了。另一方面，承蒙楊寬先生認可了前書日文版的範例，並提供給我們在章節構成及其它各方面考慮得很周到的手稿。先生還預先提出了“日文方面容易誤譯的地方”，敦促我們注意；又作了好些注釋，真令我們感激之至。

太田在譯完前書後不久，高木在翻譯此書稍前，兩人曾一起長期在上海復旦大學得到楊寬先生的直接指導。對於他們倆位的幸運，我們這些未曾得到留學機會的人是羨慕不已的。對於

俩人富於成果的留學來說，這兩次的翻譯，一個是契機，一個又是結果，使他們又有了一種聯繫。就這一點而言，我作為一個合譯者，也不免常常懷着一股自豪之情。現在，靠了這些年輕一代的英俊，日中學術交流有了踏實的進展。也許可以自大地說，我們的工作，在這個進展中至少也起了助一臂之力的效果。然而細細想來，即使這是學術交流上的一個貢獻，也完全是託楊先生的福才達成的。因此，我要在這裏向慷慨地賜予我們再次翻譯出版機會的楊先生，獻上我們的敬意和感激之情。

這次能在楊先生的首肯下，得與高木氏合作，實在是一大幸事。正如前載他〈解題〉中所自述的那樣，高木氏深受楊先生的薰陶，繼承了楊先生的學風，是憑藉文獻學和考古學這兩個手段馳騁于先秦史領域中的出色人才。在這次工作中，尤其是關於周代，我完全是靠高木氏的學識“背負”起來的。與楊先生交換意見，在先生的指示的基礎上對原稿進行校勘、追補、改訂等具體事務，也均由高木氏全力處理。我所做的，主要是日語修辭方面的工作，還加了一些注文。高木氏常常毫無怨言地接受我近乎無理的要求，有些部分改了又改，還加上稿件騰清的辛勞。本書若有錯誤或不周之處，責任全在於我，若在翻譯上有可取之處，則全當歸功于任勞任怨的高木氏。

本書的字數是前書的兩倍，觀點大膽而有氣魄，考證細致而又周到。這樣高度嚴密的論證，使我們譯者也隨之而不敢有片刻的鬆懈。鑑於本書的讀者只限於專家，故對於作者簡潔果斷的文字，我們的方針是，以準確為第一目標，在此前提下，儘可能地把它們轉換成易於理解的日語。舉一個例子，本書正文第一句是“都城是每個朝代的政治中心”，對“中心”一詞的翻譯，我們曾經歷了“中心→中央→中樞→要地→軸心→關鍵”等的轉變，

最後選用了“かなめ”一詞。我們如此拘泥於這一句的翻譯，是因為認識到這一句開門見山地提出了作者的基本觀點，同時它又預告了反映本書特徵的重要結論。關於“都城”一詞，我們徑用了原文，因為我們擔心換成概念與之相近的一些日語詞匯後，反而會損害本來的用意。也許是出于同樣的考慮吧，最近“中國的都城”這樣的句子已出現在一般讀物中，這也使我們比較大膽地直接使用“都城”一詞了。

這種翻譯的基本方針的確定，不知不覺地費去了我們許多時間，很遺憾，它的結果則辜負了作者早日出版的期望。這個拖延的責任應該由我來負擔，因為我在翻譯中過於看重“日語”、“日文”的語感。從這一點來講，我是沒有資格獲得在這裏作跋文的榮譽的，萬幸的是，作者給予了理解和寬恕，因此，我不謙虛地寫下了這麼一篇毫無價值的文章。另外，關於本書的內容（特別是作者的着眼點）以及作者之所以能成為大家的緣由，《序文》和《解題》都講到了，所以這裏我只敘述一下翻譯過程中所出現的瑣事。

本書的編集，得到了許多人的幫助，特別是編輯卷頭所需要的插圖，時間很倉促，幸虧得到了太田幸男（東京學藝大學教授）、金子修一（山梨大學副教授）、平勢隆郎（鳥取大學副教授）諸氏的大力協作。這裏發表的照片，是近期內實地拍攝的，而且幾乎都未曾發表過。與前書不得不採用部分戰前的圖片相比，不免有隔世之感。另外，學生社第二出版部的羽佐田真一氏在本書刊行之初，一直擔當着煩雜的具體事務，在完成階段中，又顯示了他出色的編輯才能，在此，我要對他致以特別的敬意。

尾形勇

1987年8月

下 編

宋代以後都城制度的 變革及其重要設施

一 封閉式的唐以前都城結構

我們在上編中，敘述了唐以前都城佈局的三次重大變化，說明了棋盤格式的對稱的中軸綫佈局的逐漸形成過程。它之所以會發生如此三次變化和形成這種中軸綫佈局，是和當時政府所用禮制發生變革有關，特別是和舉行萬人以上的大朝會的禮制有關。因為這種統一王朝每年元旦的大朝會，不僅是爲了對皇帝的朝賀和提高朝廷的威嚴，而且是對全國地方政權一年政績的總檢查和總考核，也還是團結全國上層統治者、鞏固全國統一、加強中央集權的一種重要手段。

同時我們還必須指出，唐以前的政治家和都城建築的設計者，爲了確保都城內部的安全，加強治安，都是主張採用封閉式的結構的。隨着中央集權的統一王朝的建立，王朝的統治權力逐步高度集中，都城設計者所要求的封閉式結構，就越來越嚴密。所以隨着都城三次重大變化和棋盤格式中軸綫的形成，整個都城的封閉結構就達到整齊嚴密的高峯。

唐以前的都城，由一道道、一重重牆垣組成骨架，不僅四周有“城”和“郭”的建設，具有封閉整個城郭和加強防衛警戒的作用，同時城郭以內，所有宮殿、官署、倉庫、貴族官僚的府第也都築有牆垣，連作爲居民聚居點的“里”或“坊”和作爲商業區的“市”，也建有防衛警戒用的圍牆。所有城門、郭門、官門、官署的門、坊里的門以及市門，都設有大小官吏掌管，駐有警衛人員，

早晚要按一定的時間開閉，夜間實行戒嚴，街上禁止通行，犯禁就要判罪。一般居民的住宅都必須造在坊里之內，一般貿易的商店也只能造在市以內，出入必須經過坊里的門或市門，接受守在門口的官吏的監督和檢查。只有高官和特權者所造府第，或者皇帝賞賜的府第，才能向街開門。因此當時都城的大街上，除了官署、府第的門以外，只有坊里或市的圍牆的門，不見有一般居民住宅和商店開設的門。只有進入坊里的門才能找到一般居民住宅，只有進入市門才能看到許多開設的商店。

但是到唐、宋之際，這種都城的封閉結構發生了大變化。到北宋末年，都城東京（今河南開封）就大量出現沿大街的各種商店，包括酒樓、茶肆和飲食店等等；有不少商業繁榮的街道分佈在東京的許多交通樞紐地區。這是都城制度的一次重大變革，居民生活方式也跟着發生重大變化。這與當時城市經濟的發展和城市居民階層的抬頭活躍有密切關係，也與手工業和商人地位的提高和行會組織的出現和發展有密切關係。

爲了進一步闡明這個都城制度的大變革，就有對唐以前都城的封閉式結構作系統探索的必要。

（一） 封閉式的里制和坊制

1 先秦都城的里制

從西周直到秦漢，城邑中居民聚居的基本單位，叫做“里”，顧名思義，“里”該有一平方公里的面積。直到北魏都城洛陽，還是“方三百步爲一里”，“方三百步”就是一平方公里。西周時代這種都城中貴族聚居的“里”，設有長官，叫做“里君”，這是西周王畿以內的官吏組織中最基層的官員。《書·酒誥》說：“越在內服，

百僚、庶尹、惟亞、惟服，宗工越百姓里居。”“里居”是“里君”之誤（從王國維說）。“內服”是說王朝內部官員，“百僚”是說百官，“庶尹”是說衆多的長官，“惟亞”是說次等的副官，“惟服”是說一般的官吏，“宗工”是說宗族的官員，“百姓里君”是指貴族的“里”的長官。《令彝》銘文說：“舍三事令：眾（逮）卿事寮，眾者（諸）尹，眾里君，眾百工。”這是說發佈三大政事的命令，到達卿事僚（官署）、諸尹、里君和百官。“百工”就是指百官。《逸周書·商誓篇》記周武王說：“告爾……及百官、里居，獻民”，又說：“命爾百姓里居、君子”，這裏的“里居”也是“里君”之誤。“獻民”和“君子”都是指一般貴族，“里君”也是指貴族的“里”的長官。因為他們是國都中貴族的“里”的長官，地位較高，成爲王朝內部的基層官員^①。春秋時，也還有稱里的長官爲里君的。如《管子·小匡篇》記管子對齊桓公說：“爲高子之里，爲國子之里，爲公里，三分爲齊國，以爲三軍，擇其賢民，使爲里君。”

春秋時代齊國都城臨淄的里制，《管子》中多次談到。《管子·立政篇》講到，分“國”爲五個“鄉”，分“鄉”爲五個“州”，分“州”爲十個“里”，整個國都共250個“里”。而《國語·齊語》和《管子·小匡篇》又談到，把國都分爲二十一個“鄉”，其中士鄉十五個，工商之鄉六個，每“鄉”分爲十個“連”，每“連”分爲四個“里”，這樣每“鄉”有四十個“里”，十五個士鄉共有600個“里”。每個“里”又分爲十“軌”，五家爲一“軌”，就是每里有五十戶。齊國都城的這兩個“里”數，很不相同，可能由于記述的時代不同。古代“里”或“閭”的戶數不一致，多的有八十戶，少的只有二十五戶。例如《公羊傳·宣公十五年》何休注講到井田制下的“里”，“一里八十戶”；又如《周禮·地官·大司徒》所說國都中“六鄉”組織，以五家爲比，五比爲閭；《周禮·地官·遂人》所說郊外的“六遂”

組織，以五家爲隣，五隣爲里，“里”和“閭”都是二十五戶。

《管子·八觀篇》指出了都城必須採用封閉結構的原因：

大城不可以不完，郭周不可以外通，里域不可以橫通，宮垣關閉不可以不修。故大城不完，則亂賊之人謀；郭周外通，則奸遁逾越者作；里域橫通，則攘奪竊盜者不止；閭開無闔，外內交通，則男女無別；宮垣不備，關閉不固，雖有良貨，不能守也。……明君者，閉其門，塞其途，弇其迹，使民毋由接於淫非之地，是以民之道正行善也，若性然，故罪罰寡而民以治矣。

這是我們見到的最早的必須採用封閉結構的理論。就是說，爲了防止“亂賊之人”、“奸遁逾越者”和“攘奪竊盜者”以及發生“男女無別”的事，必須防止“大城不完”、“郭周外通”、“里域橫通”，必須“閉其門，塞其途，弇其迹”（阻塞可以通行的地方），只有這樣才能減少居民犯罪的機會而維持治安。

根據上述理論，“里域不可以橫通”，“里”就只能有一條直通的道路了。在“里”的一頭或兩頭設有里門，中間有一條直通的道路。只有這樣，才便于控制整個“里”，便于從里門監視檢查出入的人。《管子·立政篇》對於這點說得很明確：

築障塞匿，一道路，搏（專）出入，審閭閉，慎筦（管）鍵，筦藏于里尉；置閭有司，以時開閉。閭有司覲出入者，以復于里尉。凡出入不時，衣服不中，闔（眷）屬羣徒不順于常者，閭有司見之，復無時。

“里尉”是一里之長，“閭有司”是看守里門的小官，“閭閉”是指里門，“管”是鎖鑰，“鍵”是關門的插關。這是說，必須建築圍牆和堵塞缺口，只有一條道路，專用于出入。要細心看管里門，注意鎖鑰和插關，鑰匙要由“里尉”掌管；要設置“閭有司”的官職，按時開閉里門；“閭有司”要察看出入的人，把情況報告里尉；凡是出入不遵守時間的，穿着衣服不合式的，家眷親屬以及所屬羣

徒的行動不合常規的，“閭有司”見到，都要隨時報告^②。當時居民所住的“里”，設有里門叫“閭”，“閭”旁建有門房叫“塾”，主管者常常坐在塾中，監視經過“閭”出入的人。《管子·八觀篇》也說：“州里不鬲（隔），閭閉不設，出入毋時，早晏（晚）不禁，則攘奪竊盜攻擊殘賊之民，毋自勝矣。”就是說，州里没有間隔，里門沒有設置，出入沒有定時，早晚不加禁止，對於搶奪、竊盜、攻擊、傷害人的份子，就無法管制了。

戰國時代中原各國大體上都沿用這種里制，所有行政系統仍然以“里”作為基層單位。《墨子·尚同上篇》和《尚同中篇》講到行政系統，都是“國”、“鄉”、“里”三級，鄉有鄉長，里有里長。《呂氏春秋·懷寵篇》講到行政系統是“國”、“邑”、“鄉”、“里”四級。《韓非子·八經篇》說：“伍、閭（原誤作‘官’，從陳奇猷《韓非子集釋》改正）、連、縣而隣，謁過賞，失過誅。”所說“伍、閭、連、縣而鄰”，是說伍、閭、連、縣等層組織的人要像鄰居一樣，說明當時的“縣”以下，有連、閭、伍三層組織，“伍”是指五戶相保的編制，“閭”即是“里”，是“伍”上一級的基層單位。《鶡冠子·王鈇篇》說：“其制邑，……五家為伍，伍為之長，十伍為里，里置有司。”一般的里有五十戶。《管子·度地篇》又說：“百家為里。”

戰國時代秦國的“里”的長官叫“里正”，據說秦昭王有病，康復後，百姓殺牛謝神，秦昭王因此“嘗其里正與伍老屯二甲”（《韓非子·外儲說右下篇》）。根據雲夢出土的《秦律》，“里”的長官稱為“里典”，里典的職司範圍很廣，如監督居民登記戶口，通知居民于何時服何役，居民財產被官府抄沒封存時要在場作證，居民有患“癘”（癩型麻風病）的，要帶同病人上報并請官方醫師診斷。因為按照《秦律》，麻風患者必須送到政府所設的“癘遷所”實行隔離。

戰國時各國的“縣”、“鄉”所屬的“里”，包括都城中的“里”，都設有看管里門的官，叫做“監門”。例如秦武王的丞相甘茂，原來從師于下蔡史舉，史舉原是下蔡里巷的監門^③。又如秦攻滅魏以後，魏的國都大梁（今河南開封）人張耳、陳餘“乃變名姓，俱之陳，為里監門以自食。”（《史記·張耳陳餘列傳》，《集解》引張晏曰：“監門，里正衛也。”）又如秦、漢之際陳留高陽鄉人酈食其，因“家貧落魄，無以為衣食業，為里監門吏”（《史記·酈生列傳》）。里間的監門是最低級的小吏，被看作一種低賤的職司。《戰國策·齊策四》記齊宣王的左右說：“監門閭里，士之賤也亦甚矣。”監門這個職司雖然很低賤，但是他們主管里門開閉并監視出入的人，對於維持治安是十分重要的。

2 秦漢都城的里制

秦代的里制，值得注意的是，“里”的居民有“閭左”與“閭右”之分。當時的“里”也該和先秦齊國的“里”一樣，只有一條通道和一個正門叫“閭”。即使里的一條通道兩頭有門，也該以一頭作為正門叫“閭”，否則的話，就不可能劃分“閭左”與“閭右”。《史記·陳涉世家》：“二世元年七月發閭左。”《漢書·食貨志》也說到“發閭左之戍”，顏師古注：“閭，里門也，言居閭門之左者一切發之。”漢代初年晁錯曾講到秦代謫發的情況：“先發吏有適（謫）及贅壻、買人，後以嘗有市籍者，又後以大父母、父母嘗有市籍者，復入閭取其左”（《漢書·晁錯傳》），可知秦代的謫發，和漢代初年“七科謫”相同。漢初七科謫是：“吏有罪一，亡命二，贅壻三，買人四，故有市籍五，父母有市籍六，大父母有市籍七”（《漢書·武帝紀》注引張晏說）。《漢書·食貨志》注引應劭的說法，根據晁錯之說，認為秦代謫發，一直謫發到大父母有市籍者，“戍

者賈輩盡，復入閭取其左者”，是正確的。秦所謫發的對象都是里閭中身份卑賤者，古時重右而輕左，右示尊貴，左示卑賤，豪富之家稱為“豪右”。“閭左”之“左”正與“豪右”之“右”相對待，當指里閭中身份卑賤者。秦代里閭中身份卑賤者居于“閭左”，所謂“發閭左之戍”，就是在實行“七科謫”之後，進一步把居于“閭左”的身份卑賤者一概加以謫發。

《三輔黃圖》卷二講到長安的閭里：“長安閭里一百六十，室居櫛比，門巷修直”。張衡《西京賦》也說：“街街相徑，廛里端直。”說明長安共有一百六十個里，佈局正直，住宅密集。但是我們必須指出，長安這個城是在秦代遺留的離宮的基礎上，從漢高祖，經惠帝，直到武帝，逐漸建成的。長安有東西兩市，東市大概先建成，西市是惠帝六年起建的。所有一百六十個里，也不是一次建成的，直到西漢晚期，長安還有新建的里。例如元始二年“起五里于長安城中，宅二百區，以居貧民”（《漢書·平帝紀》）。如果宅一區住一戶，每里住四十戶；也可能一區要住多戶。

漢代的里，可能大小不一。大的里的面積應該有一平方里，小的里不及半平方里。長安的東西兩市，是由九個市合組而成，每個市“方二百六十六步”，“凡四里為一市”（《三輔黃圖》卷二“長安九市”條引《廟記》）。所說“凡四里為一市”，可以有兩種解釋，一種是認為一個市有四里的面積，另一種是認為一個市由四個里組成。從上下文看，當以後一解釋為是。每個“市”是266平方步，如果由四個“里”組成的話，每個“里”的面積只有133平方步，不到半個平方里。“里”中居住的戶數，也可能多少不一，一般是一里五十戶左右，多的可能到一百戶左右^④。西漢長安的一百六十個里，只有少數在城內。因為長安的城是屬於內城性質，南部和中部都是宮殿區，只有北部和東北部有一些“市”和

“里”與官署及其附屬機構夾雜着，大部分的“里”和九個“市”應該分布城外的北郭區和東北郭區。

關於漢代“里”的形制，沒有可靠的資料可以依據，近人有種種不同的推測。或者以為“里”和“市”一樣四面有牆和出入的門，或者以為“里”是南北向的狹長形，有南門和北門叫做“閭”，中間通道上還有“里中門”叫“閭”。也有依據九市“各方二百六十六步”，“凡四里為一市”來推算，認為“里”是東西向的狹長形，東西寬226步，南北長66.5步^⑤。三說比較來看，以狹長形之說較為有依據。《春秋繁露·求雨篇》講到里的南門和北門，張衡《西京賦》以及不少漢代文獻講到“閭閭”，閭是里門而閭是里中門。我們還看到《漢書·石奮傳》說：“萬石君徙居陵里，內史(石)慶醉歸，入外門，不下車。”說明當時里門確有內外二重。又《漢書·張敞傳》講到：“偷長以赭汗其(小偷)衣服，吏坐里閭，閱出者，汗赭輒收縛之，一日捕得數百人。”說明當時長安一般居民的住宅都在“里”中，出入必須經過里閭。當時的“里”正和先秦的“里”一樣，設有唯一的“閭”，可以檢查出入的行人。這種“里”的結構可能和先秦的“里”一樣，是狹長形的，只有一個正門和一條通道專用於出入。

當時長安只有高官的住宅，不由里門出入，面臨街道開門。這種住宅就叫做“第”，“第”是指甲乙的次第，或者第一、第二之第。這種第常常出於皇帝的特賜，稱為“甲第”、“大第”或“第第一”。例如惠帝賜給大僕夏侯嬰“第第一”（《漢書·夏侯嬰傳》），董賢由于哀帝的寵幸，“詔將作大匠為賢起大第北闕下”（《漢書·董賢傳》），王莽為太傅，號曰安漢公，“以故蕭相國甲第為安漢公第”（《漢書·王莽傳》）。因為北闕是未央宮的正門之一，臣下要上書奏事、謁見皇帝，都必須從北闕進入，因而居住北闕之下甲

第的，是最高貴和最親近的大臣。這種第都是當大道開門的，張衡《西京賦》所謂“北闕甲第，當道直啓”。

3 北魏都城的坊制

東漢以後，宮中貴族的住處有稱爲“坊”的^⑥，“坊”與“防”通用，《禮記》有《坊記》一篇，“坊”讀作“防”。“防”原是指四周有圍牆的區域。到北魏時，開始對都城中居民的“里”稱“坊”，有時“里”與“坊”互用。

北魏建都平城的時候，建設郭城，就曾建成大小不同的坊。“其郭城繞宮城南，悉爲坊，坊開巷，坊大者容四五百家，小者六七十家”（《南齊書·魏虜傳》）。說明平城所建的坊有大小，中間都是“開巷”的，究竟每個坊是兩個門還是四個門，不清楚。北魏後來遷都到洛陽，對洛陽的建設進一步有了統一規劃。景明元年（公元502年）徵發了五萬人，一次築成三百二十個坊。根據《洛陽伽藍記》，“方三百步爲一里”，就是每一個坊正好一個平方里。整個洛陽，包括城區和東、南、西三面的郭區，東西寬二十個里，南北長十五個里，共三百個里。再加上南郭中央有凸出部分二十個里，正好總共三百二十里。這是中國古代都城建設史上第一次有計劃地把居民的“里”整個建成，作出了整齊的佈局，規定了統一的規格。

但是還必須指出，北魏洛陽的坊並沒有完全做到統一，由於特殊的原因還有大坊和特大的坊存在，也還有不少沿用東漢、西晉的舊里和舊宅的。北魏宣武帝時甄琛上奏，曾講到王公卿尹，貴勢姻戚的諸坊，“大者或千戶、五百戶”（《魏書·甄琛傳》）。洛陽這種千戶、五百戶的大坊，超過了平城容四五百家的大坊。東郭區建春門外御道以北的建陽里，即西晉的白社，里內有十寺，

“里內士庶二千餘戶，信從三寶，衆僧剃養，百姓所供也”（《洛陽伽藍記》卷二）。這是個特大的坊。西郭區靠西面邊界，在張方橋以東，“南臨洛水，北達芒山，其間東西二里，南北十五里，并名爲壽丘里”，是皇族的居住區，民間稱爲王子坊（《洛陽伽藍記》卷四）。這個壽丘里的南北長度正和洛陽整個郭區的長度相等，成爲一個廣二里、長十五里的狹長貴族住宅區，相當于一般“坊”的三十倍，更是個特大的坊。

當時一般居民的“里”，都是正方形的，四面各開一門，設有里正二人和里吏四人主管里中政務，并設有門士八人，監督觀察四門出入的人^①。

4 唐代都城的坊制

唐代都城長安，原爲隋代起建的新都大興城，先制定規劃，修築城牆，開辟街道，逐漸築成坊里，採用嚴格而整齊的坊制。坊分正方形與長方形兩種，大小分爲三等：

（一）皇城以南，朱雀大街兩側的四列坊（每側兩列）最小，南北長500—590米，東西寬558—700米。

（二）上述四列坊的兩側六列坊（每側三列）屬于中等，南北長500—590米，東西寬1,020—1,125米。

（三）宮城和皇城兩側的六列坊（每側三列）最大，南北長600—838米，東西寬1,020—1,125米。

各坊四周築有夯築坊牆，牆基寬2.5—3米。皇城以南朱雀大街兩側的四列小坊，設有東西兩門和東西向街一條；其餘的坊都設有東西南北四門和十字街貫通，坊內分成四個區，每區又有十字形小巷，小巷在當時稱爲“曲”。

唐代規定，無論都鄙，坊門早晚都要定時開閉。長安、洛陽

等都城，坊門開閉以擊鼓六百下爲號。最初在宮城的南門（承天門）擊鼓，使騎卒在各條大街上傳呼，然後坊門關閉。到貞觀十年（公元636年），根據馬周的建議，取消傳呼，在各條街上都設置鼓來敲擊，號“鼙鼙鼓”，通稱“街鼓”。天明承天門擊鼓，城門隨即開啓，街鼓跟着打六百下，坊門跟着開啓，准許街上通行。日落承天門擊鼓，城門隨即關閉，街鼓跟着打六百下，坊門跟着關閉，街上就斷絕行人，否則就是犯禁，或者叫做“犯夜”。犯夜要執縛，有時被通宵執縛^②，按律要笞二十下。只有持有縣的文牒的婚嫁者，持有坊的文牒的有病人、有喪事以及求醫藥者，才不算犯夜。這種制度是嚴格執行的，直到唐末還是這樣。晚唐小說如沈既濟《任氏傳》，白行簡《李娃傳》、皇甫枚《飛烟傳》和《溫京兆》等，都談到這點^③。

按唐律，越坊市垣籬，和越官府廡垣要同樣處罰，杖七十下，侵壞者也同樣處罰（《唐律疏議》卷八“衛禁”）。如果不按時開閉，與越垣之罪相同。坊市只有在朝廷特許的情況下，准許夜間開放。例如爲了慶祝上元節，唐玄宗下詔，每至正月十七、十八、十九三天夜開坊市門，此後永爲定制（《全唐文》卷三二，玄宗《令正月夜開坊市門詔》）。

按規定，非三品以上的高官以及“坊內三絕”的特權者，不得向街開門，必須由坊門出人。這種制度也是執行比較嚴格的。直到唐代后期，有些高官，身爲宰相，也還從坊門出入。唐憲宗元和十年（公元815年）京城發生了藩鎮用刺客刺殺宰相的事件。這年六月癸卯，天未明，宰相武元衡出所居靖安坊東門，準備入朝。有刺客放箭射他，把他的侍從嚇走，接着就捉住他殺死，割取頭顱而去。刺客就是等候他清早入朝的時機，埋伏在坊門把他刺殺的。唐文宗開成三年（公元838年）京城又發生宦官

用刺客謀刺宰相事件。這年正月甲子，宰相李石入朝，中途有人射他，微傷，左右奔散。李石因馬警，馳歸府第，又有人邀擊于坊門，“斷其馬尾，僅而得免”（以上根據《資治通鑑》）。這又是刺客等候他回歸府第的時機，埋伏在坊門行刺的。

西漢長安，高官的甲第都不造在里中而沿街開門，宗廟和官署也都沿街而不處里中。直到北魏洛陽也還沿用這種制度。同時宮殿區中不免有官署和高官府第夾雜，在內城之中不免有平民的“里”與官署及官吏府第夾雜。只有到隋唐的長安，不僅官城與中央官署所在的皇城分開，而且與居民的“坊”所在的郭城隔離，所有官吏私第與平民住宅一律都造在郭城的“坊”中。郭城以朱雀大街為中軸綫，把所有的“坊”分列在朱雀大街的左右兩方，通稱為“左街”或“右街”。這樣左右對稱的棋盤格式的中軸綫佈局，使得作為中軸綫的朱雀大街，可以直通到官城以前作為外朝廣場的橫街，適應了每年三次舉行盛大朝賀禮的需要，同時使得城郭的封閉式結構更加整齊而嚴密，便於維持治安和加強警衛。可以說，唐代長安的格局，達到了古代都城封閉式結構的頂峯。

郭城所有的坊，在行政管理上，朱雀街以東（即右街）屬萬年縣管轄，以西（即左街）屬長安縣管轄。從歷年出土的唐人墓志銘來看，官僚所居的坊，萬年縣所屬，以皇城東面的永興、崇仁，大明宮以南的翊善、永昌以及興慶宮以西的勝業為多；長安縣所屬，以皇城西面的輔興、頌政、金城等坊為多。宦官所住，以萬年縣的永興、永昌、來庭、大寧和長安縣的修德等坊為多，都靠近官城周圍。外國籍官吏多數住在西部長安縣所屬各坊。當武德到貞觀年間，以太極宮為中樞，宮城與皇城周圍各坊所住貴族和高官較多；當高宗龍朔到睿宗景雲年間，以大明宮為中樞，丹鳳門

以南各坊所住達官貴人較多。當開元、天寶年間，以興慶宮為中心。宮的周圍和東市附近各坊多為貴族和高官所住^⑩。總的說來，高官貴族住在東城的北部各坊為多，而人口密度，西部長安縣較東部萬年縣為多，同時北部人口遠較南部人口為多。大體上延平門和延興門大街以北各坊人口較眾，以南就逐漸減少，但南部各坊又多貴族的家廟和別墅。東南角的游樂園、曲江池、慈恩寺、青龍寺一帶，更是都城居民日常游覽的名勝之區。

唐代的行政系統，按一般規定，每一百戶為一里，設里正一人；每五里為一鄉，設耆老一人，亦稱父老。城邑之中設坊，設坊正一人。里正主管戶口、生產，治安與賦役，坊正主管坊門管鑰、治安與賦役^⑪。當時都城長安的坊，據估計，一般有一二千戶，多的到五千戶以上。因此長安的坊，除了總的設坊正一人以外，坊正之下還設有十多個或幾十個里正。也有些坊因建有大型廟宇、官署、林園、以及高官府第，人口不到百戶的，只設一里，甚至可能有屬於別的坊中的里所管轄的。唐代十分重視坊門和市門的管理，如果不按時開閉，要與逾越坊市牆垣同樣處罰；坊正與市令不按時開閉坊市的門也要處罰。坊門設有“守卒”防守^⑫。這種守卒屬於都城中掌管警衛治安的金吾衛調遣，是和金吾衛所屬駐防街道和城門的軍隊相配合的。當時郭城分設萬年、長安兩縣，都設有“縣尉”和“知捕賊盜”的官，主管所屬各坊的治安^⑬。居民如果有什麼有關治安的事要上告，要經過“里”的官吏，經過“坊”的官吏，報告到縣的“知捕賊盜”等官，再上告到京兆尹^⑭。

京兆尹是長安主管地方行政與治安的最高長官。如果長安發生重大的治安問題，常常由京兆尹親自處理。中唐以後，長安和洛陽都出現了不少“惡少年”，或稱為“閑子”、“俠少年”、“市肆

惡少”。他們往往身穿異樣服飾，皮膚上刺成各種式樣的青、黑色花紋，劫掠于坊市之中。新的京兆尹上任，常常要逮捕和殺死一批“惡少”，以建立威信，從而維持治安^⑧。到晚唐，這類“坊市惡少”常乘政局變亂的機會，在都城大肆劫掠。例如文宗太和九年（公元835年）十二月甘露之變，“坊市惡少年因之報私仇殺人，剽掠百貨，互相攻擊，塵埃蔽天”，直到右神策軍的兩個將領“各將五百人分屯通衢，擊鼓以警之，斬十餘人，然後定”（《資治通鑑》卷二四五）。僖宗中和元年（公元881年）黃巢率眾從長安向東退走，官軍王處存統率所部進駐，“處存令軍士繫白帟為號，坊市少年或竊其號以掠人”（《資治通鑑》卷二五四，胡注：“帟，詢趨翻，繒頭也，以約髮，謂之頭帟”）。當時東都洛陽同樣多“惡少”，曾被藩鎮召募去數百人，利用來擾亂治安，掠劫燒毀官府的錢帛糧食^⑨。

（二） 封閉式的集中的市制

1 春秋戰國都城的市制

春秋時代中原各諸侯國的都城中，已有特設的市區，很是熱鬧。例如齊景公要更換晏嬰的住宅，理由是：“宅近市，湫隘囂塵，不可以居”（《左傳·昭公三年》）。就是因為晏嬰的住宅近于市區，低下潮濕狹小，喧鬧而塵土飛揚；說明當時齊國都城臨淄的市區已經比較繁榮。當時鄭國地處中原的交通樞紐，商業比較發達，國都新鄭中特設的市區，已有專賣某種商品的列肆。據說鄭國大夫伯有在內亂中“死于羊肆”，子產把他“斂而殯諸伯有之臣在市側者”（《左傳·襄公三十年》）。“羊肆”就是專賣羊肉的市中列肆。

根據《國語·齊語》和《管子·小匡篇》，當齊桓公任用管仲進行改革的時候，把國都劃分為二十一個鄉，其中士農之鄉十五個，工商之鄉六鄉。“處工必就官府，處商必就市井”，“市立三鄉，工立三族”。所說“市立三鄉”，就是商人聚居的市，分設三鄉。按照當時鄉里的組織系統，五家為軌，十軌為里，四里為連，十連為鄉，每鄉有四十個里，每里有五十戶。可知當時臨淄的市區，分設有三個鄉，共一百二十個里，共六千戶，其中包括坐賈和行商兩種商人^①。看來當時臨淄的市的結構，是和士農之鄉的結構差不多，同樣以鄉和里為基層單位的。

根據現有文獻資料和考古資料，戰國時代開始出現有封閉結構的市區。市區作方形或長方形，四面有圍牆，每面中間設門，稱為“市門”，中間當有“十”字街連通四面“市門”。四個市門中以南門較為重要。據說宋國太宰派少庶子(家臣)到市上去，回來後太宰問他：“何見于市？”他答道：“市南門之外，甚衆牛車，僅可行耳。”太宰因而把市吏召來，譏誚說：“市門之外何多牛屎？”(《韓非子·內儲說上篇》)。從這一故事，可見當時宋都睢陽(今河南商丘市西南)的“市”，已有不少人駕駛牛車前去，南門外常有許多牛車停靠。當時“市”的南門外該有一片廣場，如同朝廷的外朝一樣，即所謂“市朝”作為前來的羣衆聚集或車輛停靠之處。《考工記·匠人》說“市朝一夫”，一夫即占地一百畝。孟嘗君的食客馮驩說：“平明側肩爭門而入，日暮之後過市朝者，掉臂而不顧。”(《史記·孟嘗君列傳》)因為日暮市門已閉，市朝就無用了。市朝也還常被用作陳列判處死刑的人的尸體的地方。

當時秦國都城雍，已設有熱鬧的“市”，市門是羣衆經常進出之處，因而成為公佈賞格的地方。當秦孝公任用商鞅變法之初，變法令未下之前，商鞅擔心人民不信任，“乃立三丈之木于國都

市南門，募民有能徙置北門者予千金”（《史記·商君列傳》）。秦國都城咸陽的市是更加熱鬧的。當呂不韋讓賓客著成了《呂氏春秋》一書，準備用作施政綱領的時候，也曾把國都咸陽的市門作為公佈賞格的地方，他把這部書“布咸陽市門，懸千金其上，延諸侯游士賓客能增損一字者予千金”（《史記·呂不韋列傳》）。

根據考古資料，秦國都城雍的遺址的東北部，發現了“市”的遺址，平面作長方形，東西寬180米，南北長160米，四面圍牆基址厚1.5到2米。四面圍牆都開有市門，已發掘的西門，南北長21米，東西寬14米，入口處有大型空心磚作為踏步。從殘存建築遺物來看，門上有四坡式的屋頂。時代屬於戰國。結合文獻來看，這個雍城的市的建築，可能就是秦獻公時期創設的。《秦紀》（《史記·秦始皇本紀》末段）說秦獻公“七年初為市”，當時秦的都城正在雍⑧。

秦國都城咸陽的市，看來規模比雍城的市大得多。根據《秦律·封診式》的“盜馬”條，“市南街亭求盜”在亭旁捉到盜馬者，說明當時咸陽的市的南街已設有亭，亭設有求盜等官吏，用來監視和逮捕盜賊。既然有南街，還該有北街，可能還有東街和西街，市中有“井”字形交叉的四條街。根據《秦律》的《金布律》，市上的列肆，和里中住戶一樣，按“伍”編組，設有“列伍長”，協助官吏監督商人的經商活動。所有商品按規定要標價出售，只有不值一錢的小商品，才允許不標價。市上流通的貨幣，主要是官鑄的銅錢，禁止民間私鑄，也還兼用黃金和布匹作為流通手段。每一匹布規定長八尺，闊二尺五寸，當銅錢十一枚使用。不准市上挑選銅錢和布匹使用，如果商店挑選使用，列伍長不上告的，官吏不追究的，都有罪。市上除一般商人和手工業者以外，還有“官府市”（官營商店）的存在。

戰國時代的市，已有早晚定時開閉市門的規定。當時已有人在平明等待市門開啓，爭着側肩而入，企圖買到期待的商品^⑩。

2 西漢長安對稱的東西兩市制度

西漢長安的北面郭區出現了對稱的東西兩市制度，這是市制的進一步發展，直到後來，唐代長安還沿用這種制度。《漢書·惠帝紀》謂六年六月“起長安西市”，這時起建西市，東市當早已建成。根據《三輔黃圖》所引《廟記》和《太平御覽》卷一九一所引《宮闕記》，長安主要有九個市，“六市在道東，三市在道西”，是東西對稱而在大道兩側。據說“夾橫橋大道南有當市觀”，“旗亭樓在杜門大道南，又有當市觀”，“當市樓有令署”，可知橫橋大道南和杜門大道南都設有高層建築而掛旗的市的令署。橫橋大道是從北城牆西邊橫門通到渭水上橫橋的大道，這是北郭通往以北五個商業繁榮的陵邑的大道，因而夾道成爲商業發達之區，當即西市所在；橫橋大道南的市令署，當即西市的令署。杜門大道當是從北城牆東邊洛城門（本名杜門）通向渭水旁的外郭亭（即王莽稱爲臨水亭）的大道，這一帶和東北郭區相連，進入洛城門又有通道可以通向宣平門和東面郭區，是長安居民比較集中的地方，因而也是商業發達之區，當即東市所在；杜門大道南的市令署，當即東市的令署。

據記載，長安的西市由六個市合組而成，東市由三個市合組而成，每個市“方二百六十六步”，“凡四里爲一市”，就是每個市又由四個里合組而成，九個市共有三十六個里。這種以里爲基本單位的市的設施，還是沿襲先秦以鄉里爲基層單位的市的制度（如前面講到春秋時代齊國臨淄的市制）。班固《西都賦》說“九市開場，貨別隧分”，就是說九個市是按商品的“貨”來區別，

按“里”中“隧”(小路)來分設的。大體上每個市有“十”字街，劃分成四個里，每個里中又有許多“隧”，沿“隧”分設各種同類貨品的列肆。張衡《西京賦》說“旗亭五重，俯察百隧”，就是說五層樓的市令署，可以據高臨下，俯察到“里”中“百隧”兩側所設商店的貿易情況。四川成都等地出土的東漢“市”的畫像磚，所描繪的是一般城邑中小“市”的情況，但是可以從中看到當時一般“市”的結構形制。

這種市上設有高層建築的官署的方式，為後代所沿用。據《洛陽伽藍記》，在洛陽東城牆的建春門(即東漢上東門)外，向東，在陽渠以北的建陽里，有土臺，原是西晉的旗亭，即是西晉的市令署所在，“上有二層樓，懸鼓擊之以罷市，有鐘一口，撞之聞五十里”；再向東，到東石橋以南，便是魏晉的馬市所在。這樣在管理市的官署上設有鐘鼓，作為市的開閉的信號，至少西晉已經創始，直到唐代也還沿用，而且也還把這種市上擊鼓鉦為開閉信號的樓，稱為旗亭。

3 北魏洛陽“市”與“里”相結合的“大市”制度

北魏洛陽有三市，西郭有大市，東郭有小市，南郭有四通市。小市規模不大，四通市主要是買賣洛水中捕到的魚的魚市，只有西郭的大市是洛陽主要的市。據《洛陽伽藍記》，這個大市由一個市和周圍十個里相結合而組成。市的周圍八里，每面二里，實際上包函有四個里的面積，基本上和西漢長安“凡四里為一市”相同。環繞這個市，每面設有兩個里，東面為通商、達貨二里，居住有手工業者、屠夫和販賣者，手工業者的產品，屠夫宰殺的家畜，販賣者的貨物該是配合市內商店需要的；南面是調音、樂律二里，是妙伎所居，以絲竹、謳歌為業，這是一批賣藝的藝人，因為

屬於貿易性質，也被劃入市的範圍以內。西面是退酤、冶觴二里，多釀酒爲業；這時釀酒爲業的手工業者居住的地方占有二里，說明當時飲酒的風氣很盛，所需要的酒的數量很大。北面是慈孝、奉終二里，以賣棺槨、出租喪事用車爲業，還有唱挽歌者，這是適應都城中舉辦規模較大的喪葬儀式的需要，作爲一種特殊的服務性行業而劃入市的範圍的。此外還有準財、金肆二里，是富人所居。這種“市”和周圍的“里”相結合的“大市”制度，是北魏的創舉。就是在市上出售各種門類商品的商店以外，把手工業者，販賣者、屠夫、賣藝者、釀酒者以及經營有關喪葬的服務業者，都分列在市的周圍，作爲市的一部分。看來這些手工業者和行商以及特殊的經營者，過去都是和商人一律居住市內的，這時把他們從市中區別開來，另外在市周圍建設這樣的十個里，是爲了使市的組織更加整齊而嚴密。

北魏洛陽東郭的小市，在青陽門以外孝義里之東。小市東北有殖貨里，居住有“以屠販爲業”的，和大市以東的通商、達貨二里差不多。這種在“市”的周圍分設有與市密切關係的“里”，并有特定里名的制度，對後來唐代都城的市制是有很大的影響的。

4 唐代長安的東西兩市制度

唐代長安與洛陽的市，都是在隋代已建立的基礎上發展起來的。長安的東西兩市是在隋代都會市、利人市的基礎上發展起來的，洛陽的南市是在隋代豐都市的基礎上發展起來的。隋代這些市，本來已很繁榮。《兩京新記》記載：“東都豐都市，東西南北居二坊之地，四面各開三門，邸凡三百一十二區。”《大業雜記》（唐杜寶著）大業元年條，講到豐都市“周八里，通門十

二，其內一百二十行，三千餘肆，四百餘店，重樓延閣，牙相臨映，招致商旅，珍奇山積”。《元河南志》卷一京城門坊街古跡“唐之南市”條，有相似的記載：“隋曰豐都市，東西南北居二坊之地，其內一百二十行，三千餘肆，四壁有四百餘店，貨賄山積。唐貞觀四年促半坊。”就是說到貞觀四年減少半坊，只占一坊半之地。隋代豐都市周圍八里，與北魏洛陽大市相同。市每面有三個門，共十二個門，十二個門內當有東西向和南北向的三條大街交叉着。市內已分爲一百二十行，共有三千多商店；市的周圍，靠牆壁設置有四百多區的邸或店，就是供客商堆貨、寓居并進行交易的行棧。這種市內分“行”設置商店，周圍設有邸店的制度，爲唐代都城的市所沿襲。

長安東西兩市的制度，基本上和隋代豐都市相同。市的面積有兩坊之地，四面各六百步，即二里長度，與豐都市周圍八里相同。市內也同樣分設一百二十行，四周靠牆壁建立有許多用作行棧的邸店，只是四面各開二門，比豐都市每面各開三門，少開一門。《長安志》卷八“東市”條：“南北居二坊之地”，原注：“東西南北各六百步，四面各開二門（原誤作“一門”，從徐松《唐兩京城坊考》卷三改正），……市內貨財二百二十行（“二百二十行”當是“一百二十行”之誤），四面立邸（即邸店），四方奇珍皆所積集。”《長安志》卷十“西市”條：“南北盡兩坊之地，市內有西市局。”原注：“隸太府寺。市內店肆如東市之制。”東西兩市商店的總數，當遠遠超過豐都市的三千之數。日本高僧圓仁《入唐求法巡禮行記》卷四，記會昌三年（公元843年）六月二十七日“東市失火，燒東市曹門以西十二行四千餘家”（“十二”兩字恐有脫誤）。四千餘家只是東市的一部分商店。

從一九五九年到一九六二年，曾反復多次勘探東西兩市，并

多次發掘西市遺址。兩市面積相近，比文獻所說每面長六百步略大，西市南北長1031米，東西寬927米；東市南北約長1000米，東西寬924米。兩市周圍築牆，沿牆有街，中間有“井”字形的街，通向四面的八個門，把全市劃分成九個長方形區域。“井”字形街的中心部位，東西寬295米，南北長330米，即市署和平準署所在。東市的東北角，發現有東西并列的兩個橢圓形水池遺址，該即放生池所在。西市經過發掘，得知“井”字形街以外還有小巷。“井”字形街兩側有排水的明溝，巷內道路兩側又有磚砌的排水暗溝。“井”字形街兩側，房基稠密地排列，大小不一，大者面闊10多米，小者面闊3米多，進深都是3米多，是各種店舖的基址。另外在南大街東端的路南，發現兩座圓形建築遺址，大部分在地下，底小而口大，一座口徑5.5米，底徑5.1米；另一座口徑4.48米，底徑4.08米，周壁全部夯築而成，表面抹草拌泥和白灰，當是儲藏商品的倉庫。

西市的發掘，證實了當時市內按“行”分列的佈局。西市南大街東端的路南遺址，出土陶盆、陶罐、三彩陶器殘片及大量瓷器碎片，以白釉低圈足碗盆為多。房址內還發現有石臼、石杵；南側臨街處有小圓坑多處，其中埋有壇罐，推測為飲食業的列肆所在，或即宋代所謂食飯行。西市南大街中部的街南遺址，出土大量骨製飾物如梳、釵、笄和刻有花紋的骨飾，又有料珠、珍珠、瑪瑙、水晶等裝飾品，還有少量黃金飾物，更有不少骰子、骨料出土。推測是珠寶業的列肆所在，或即宋代經營“七寶”的所謂骨董行。

根據文獻，東市有肉行（《劇談錄》卷上“玉舖活崔相公歌妓”條）、鐵行（《太平廣記》卷二六一“鄭羣玉”條，採自《乾闥子》）。西市的市署前有大衣行（《兩京新記》“長安西市”條），還有鞦韆

行(《太平廣記》卷一七五“李君”條,採自《逸史》)、秤行(《太平廣記》卷二四三“竇義”條,採自《乾闥子》)、絹行(《太平廣記》卷三六三“王愬”條,採自《乾闥子》)、麩行(《太平廣記》卷四三六“張高”條,採自《續玄怪錄》)、藥行(日本圓仁《入唐求法巡禮行記》卷四會昌五年正月三日條)。“行”也或稱為“肆”或“市”。唐人小說中講到的東西兩市這些“行”,都是比較著名的,比較規模大的。例如沈既濟《任氏傳》:“鄭子遊,入西市衣肆,瞥然見之(指任氏),羸女奴從,鄭子遽呼之,任氏側身周旋於稠人中以避焉。”說明當時西市衣肆規模不小,顧客擁擠,使得任氏可以側身周旋於稠人中躲避。《唐國史補》卷中:“宋清賣藥於長安西市,……貧士請藥,常多折券;人有急難,傾財救之,歲計所入,利亦百倍。”這個著名的救濟貧士和急難的賣藥者,即經營于西市的藥行。柳宗元《宋清傳》說:“清,長安西部藥市人也。”西部藥市即是西市藥行。

東市還有雕版印刷的出版行業,出版各種實用書籍,已知有大刁家和李家。李家曾印刷出版《新集備急灸經》一書,是編者根據流行於當時的諸家灸經選擇匯編而成,以供缺醫少藥的偏遠地方救急治病之用。書中畫有人體正面“明堂圖”上半身,標注穴位,并說明灸法及主治疾病,其中有當時新發見的穴位和治療方法,着重治療常見病和急重病。這是一部集大成的專講灸法治病的通俗讀物,當時由東市李家印刷出版發行,對於普及醫療知識,特別是對於缺醫少藥的地方是有很大好處的^②。

當時長安市上已有規模較大的書店。白行簡《李娃傳》述及:“娃命車出遊,生騎而從,至旗亭南偏窰墳典之肆,令生揀而市之,計費百金,盡載以歸。……二歲而業大成就,海內文籍,莫不流覽。”這裏所說的旗亭,是指市上擊鼓鉦作為市門啓閉信號的樓,上掛旗幟。窰墳典之肆即指書店。這樣“計費百金”可以

把需要的典籍“盡載以歸”，說明書肆的規模已很大，出售書籍的品種已比較齊全。

西市還設有一種代客寄存保管或收購、出售金銀財物和珍貴物品的商行，叫做櫃坊（《太平廣記》卷二四三“寶義”條，採自《撰乾子》），當時富戶把大量錢財寄存櫃坊，待有用途才提取。西市還有寄附鋪，可能兼營寄售和收購貴重財物。蔣防《霍小玉傳》談到：“資用屢空，往往私令侍婢潛賣篋中服玩之物，多於西市寄附鋪侯景先家貨賣。曾令侍婢浣沙將紫玉釵一只，詣景先家貨之。”長安也還有金市。薛用弱《集異記》“王四郎”條講到長安金市，該和當時蘇州金銀行（《太平廣記》卷二八〇“劉景復”條，採自《纂異記》）一樣，是專門買賣金銀的商店，也該設在東西兩市中。

長安的東西兩市，比較起來，西市要比東市繁榮。《長安志》在“東市”條說：“萬年縣戶口減于長安，又公卿以下居止多在朱雀街東，第宅所占勳貴，由是商賈所湊，多歸西市。”在“西市”條又說：“長安縣所領四萬餘戶，比萬年縣多，浮寄流寓不可勝計。”西部不僅人口多，商賈多，流寓的人多，而且外國籍官吏和外商大多住在西市周圍，因而商業特別繁榮。

由于東西兩市商業發達，市上流通的錢，數量十分巨大。唐玄宗天寶年間，江淮一帶多“惡錢”，京城中貴戚大商往往可以“良錢”一枚在那裏換得“惡錢”五枚，把它載入長安兩市使用，以致市井不勝其弊。於是宰相李林甫奏請禁止使用“惡錢”，由官府出粟帛及庫錢來換取“惡錢”，為期一年，不輸官的辦罪。這是天寶十一載（公元752年）二月庚午的事。二月庚午“命有司出粟帛及庫錢數十萬緡于兩市易惡錢”（《資治通鑑》卷二一六）。後因商賈羣起反對，認為不便，“乃更命非鉛錫所鑄及穿穴者，皆聽用

之如故。”從當時官府要用“粟帛及庫錢數十萬緡”于兩市調換“惡錢”來看，說明當時兩市的市上流通的“惡錢”已經相當多，當然整個市上流通的“良錢”比“惡錢”還要多很多，數量十分巨大。

唐代長安雖然沒有採用北魏洛陽那樣“市”和周圍的“里”相結合的“大市”制度，也還允許東西兩市周圍的“里”中有經營某種手工業和商業的人居住。例如東市西北崇仁坊多製造和修理樂器的商店，“大約造樂器悉在此坊，其中二趙家最妙”（《樂府雜錄》“琵琶”條）。東市之北的勝業坊中多倡妓。蔣防《霍小玉傳》講到隴西李益到長安“博求名妓”，因人介紹得見霍小玉于勝業坊古寺曲。霍小玉自稱：“妾本倡家”，“音樂詩書，無不通解。”東市西北的平康坊更是名妓聚居之處。孫棻《北里志》說：“平康里入北門東回三曲，即諸妓所居之聚也。妓中有錚錚者，多在南曲、中曲。”白行簡《李娃傳》所說倡女李娃就住在平康坊鳴珂曲。東市西北三個坊聚居製造樂器者和倡妓，這和北魏洛陽大市以南調音、樂律二里居住絲竹謳歌者和妙伎基本上相同。同時平康坊中還有“小鋪席”出賣“草剉薑果之類”（《北里志》“張住住”條），勝業坊中有人“以小車推蒸餅賣之”（《太平廣記》卷四〇〇“鄉駱駝”條，採自《朝野僉載》）。

東市西南的宣陽坊有綵纈鋪（《北里志》“王團兒”條），宣陽坊西南的長興坊又有畢羅店（《太平廣記》卷二七八“國子監明經”條，採自《酉陽雜俎》），畢羅即是餠羅，是胡人所食饅頭的一種。東市以南第二坊宣平坊有“賣油者張帽馱桶”（《太平廣記》卷四一七“宣平坊官人”條，採自《酉陽雜俎》）。在宣平坊以南的昇平坊，里門旁有胡人鬻餅之舍；宣平坊以東的新昌坊又有“會飲”的“飲所”（均見《任氏傳》）。說明東市以南的一些坊里中有

不少的零售小店、食品店以及流動的小販。

西市也有同樣的情況。西市東北的延壽坊有“鬻金銀珠玉者”(《唐闕史》卷下“王居士神丹”條)。西市東南的興化坊(在延康坊以東)有“以販繒爲業”的(《太平廣記》卷四八六《無雙傳》)。西市西南的懷德坊,住有富商鄒鳳熾，“四方物盡爲所收”(《太平御覽》卷四九五引《西京記》)。西市西南第二坊豐邑坊，“此坊多假貨方相送喪之具”(《兩京新記》卷三)。這和北魏洛陽“大市”周圍販賣者、富人、經營有關喪葬的服務業者居住之里，有相似之處。北魏洛陽有慈孝奉終二里，專門以出賣棺槨和出租輓車以及唱挽歌爲業，唐代長安這種喪事服務業更有擴展，稱爲“凶肆”。凶肆專門代人辦理喪事，備有各種“凶器”，包括棺槨和殯斂所用器物以及出殯所用車輦和威儀之具如翼（用孔雀、野鴨羽毛做成的大掌扇）之類。白行簡《李娃傳》描寫東西二凶肆，由二肆長爲首，訂立比賽的契約，各自在天門街上，陳列喪葬用具和出殯用的車輦、威儀之具，并雇人演唱祭奠、哀挽、送喪的歌曲，召集“士女大和會”，讓觀衆評比，互爭勝負。

長安東西兩市由市署和平準署主管。二署都屬於大府寺。市署設有市令，主管市肆，建立標記，校正度量衡器（每年八月校正），統制各種商品上、中、下三等價格，檢驗手工業品規格，管理買賣奴婢牛馬契約的訂立，早晚市門的開閉等。按規定，日午時擊鼓三百下，開啓市門，日入前七刻擊鉦三百下，關閉市門。平準署主要職掌官用必需品的購人，官司不用之物和沒入官府物品的賣出（見《大唐六典》卷二十）。按規定，“凡與官交易及懸平贖物并用中賈（中等價格）。”市上商品的質量和價格，官私間交易，貿易的秩序，都由二署以及市內治安機構維持。特別重要的事，還須京兆尹主持和顧問。例如柳仲郢會昌年間做京兆尹，“置權

量於東西市，使貿易用之，禁私製者，北司史入粟違約，仲郢殺而尸之，自是入無敢犯”（《新唐書·柳仲郢傳》）。

但是到晚唐，由于宦官專權，皇室腐敗，常發生巧立名目，奪取市上財寶的事。德宗貞元年間設立所謂“官市”，由宦官出使，抑低價格，買取商品。後來又派出數百人到“兩市及要鬧坊曲”，檢閱商人出賣的商品，左右望，白取其物，不還本價”，稱為“官市”。這數百人被稱為“白望”^②。僖宗廣明元年（公元880年）左拾遺侯昌業上疏進諫，諫辭中講到“強奪波斯之寶貝，抑取茶店之珠珍，渾取匱坊，全城般（搬）運”（《通鑑考異》引《續寶運錄》）。這就是指責皇室強奪了市上的珍寶，包括來自波斯的寶貝和茶店中陳設的珠珍，以及大規模的搜索寄存保藏在市上櫃坊中的金銀財物。

（三） 封閉結構的警衛、治安設施

1 秦漢都城的警衛、治安設施

先秦都城常駐屯重兵用作警衛。商代于國都附近設置別都，駐屯大軍。牧即是商代晚期的別都，牧野因而成爲周武王克商的主要進攻目標。西周王朝在京城有駐屯大軍的傳統辦法，周的祖先公劉遷居到豳（今陝西彬縣東北），作爲京師，駐屯“其軍三單”。西周建立統一中原的王朝後，駐屯“西六師”於西都鎬京，“成周八師”於東都成周，“殷八師”於殷的舊都牧。秦漢以後也還有常駐屯衛軍的制度。

戰國時代各國都重視都城的警衛，城門已有早晚定時開閉的規定，法律有嚴禁越城的條文。李悝在魏國制定的《法經》，後來商鞅拿到秦國去推廣，其中《雜律》就有嚴禁“越城”條目（《晉

書·刑法志》)。據說梁車剛做鄴的縣令，其姊前往探望，晚上遲到，郭門已關閉，因而越郭而入，梁車就“刖其足”（《韓非子·外儲說左下篇》）。就是因為犯了越城的罪，梁車為了表示執法嚴明，按法“刖其足”。從這點，可知戰國時代十分重視城郭的警衛。但是限于史料，我們對戰國以前都城的警衛、治安設施，還不瞭解。目前只能從秦漢說起。

秦漢設有衛尉，作為九卿之一，負責宮門和宮中的警衛工作，屬官有公車司馬令，衛士令和宮門司馬等。

秦設有中尉，作為九卿之一，負責宮殿以外、京城以內的警衛工作，漢武帝太初元年（公元前104年）以後改名執金吾。其職司是帶着騎兵和步兵在京師巡邏，搜捕盜賊，維持治安，也還有權逮捕罪犯。皇帝出行時，還充任儀仗隊而隨從衛護。東漢以後職權擴大，兼管警戒非常水火之事，因為在充滿各種建築和人口衆多的都城中，防備火災和水災的發生，是十分緊要的。所屬軍隊，有“六百騎，走六千二百人”（《北堂書鈔》卷五四引《漢舊儀》）。

執金吾主要負責巡查京城和警戒防衛，同時四周城門，每門設有城門校尉，掌管城門的屯兵，所屬有司馬，十二城門候等。門候主管城門按時啓閉。值得重視的是，城外郭區的邊境上，城內各條大街上，都設有警戒監察用的“亭”，設有亭長等官，監視來往出入的羣衆，搜捕盜賊，以維持城內外的治安。

“亭”原是戰時的偵察防守設施，戰國時代設在邊境關塞或長城上，也設在戰時防守的城牆上。《墨子·備城門篇》說：“百步一亭，高垣丈四尺，厚四尺，為閨門兩扇，令各可以自閉，亭一尉。”“尉”就是“亭”的長官。同時城外道路的要害地方也常築“亭”。《墨子·雜守篇》說：“諸外道，可要塞以難寇，其要害者，

爲築三亭。”這種亭是高層建築，可以登高望遠用來偵察，又可作爲堡壘用來進攻和防守。這種戰時偵察防守用的“亭”，秦漢時代已被用作都城內外平時警衛和治安的設施。不僅在城內各條大街上設亭，也還要在城外交通要道的要害處設亭，即所謂外郭亭。

秦都咸陽的市的街上就設有“亭”，“亭”設有“求盜”等官。《秦律·封診式》“盜馬”條，就講到“市南街亭”的求盜在亭旁捉到了盜馬者。同時咸陽城外十里設有郵亭，已具有外郭亭的性質。秦名將白起因不同意秦的攻趙策略而託病不出，被罷免官爵，并被迫自殺。他“出咸陽西門十里，至杜郵引劍自刎”（《史記·白起列傳》）。杜郵，《水經注·渭水》作杜郵亭。這種亭之所以稱爲郵亭，因爲它帶有郵傳性質，常是官吏及行旅中途留宿之處。《風俗通》（《續漢書·百官志五》劉昭注引）說：“漢家因秦，大率十里一亭。亭，留也，蓋行旅宿會之所館。”這種城門以外十里設一亭的制度，爲西漢長安所沿用，稱爲外郭亭，具有警戒防衛兼郵傳的性質。

西漢長安十二城門外都設有外郭亭，多數在城外十里左右，也有不到十里的，如洛城門外的臨渭水的亭，不過三里。王莽曾把十二城門改名，并把城門外的外郭亭，定出與城門名在字義上有聯繫的名稱。現列爲一表如下：

西漢長安十二城門及外郭亭表

位 置	城 門 名	郭門名	王莽所改門名及外郭亭名
東牆北門	宣平門	東都門	春王門,正月亭
東牆中門	清明門(凱門)		宣德門,布恩亭
東牆南門	霸城門(青綺門)		仁壽門,無疆亭
南牆東門	覆盎門(下杜門)		永清門,長茂亭
南牆中門	安門(鼎路門)		光禮門,顯樂亭
南牆西門	西安門		信平門,誠正亭
西牆南門	章城門(光華門,便門)		千秋門,億年亭
西牆中門	直城門		直道門,端路亭
西牆北門	雍門(函里門)		章義門,著義亭
北牆西門	橫門(光門,武朔門)	都門	朔都門,左幽亭
北牆中門	廚城門		建子門,廣世亭
北牆東門	洛城門(杜門,高門)		進和門,臨水亭

東漢都城洛陽，也是十二座城門，只是平城門作為宮門看待，屬衛尉掌管；十一城門歸城門校尉主管。它如西漢長安一樣，每一城門之外，一定距離設有外郭亭。《續漢書·百官志四》“城門校尉”條下，劉昭注引蔡質《漢儀》說：“雒陽二十四街，街一亭，十二城門，門一亭。”所謂“門一亭”是指城門以外一定距離所設的外郭亭。例如東漢上西門外的夕陽亭，也稱洛陽都亭，具有西邊郭門性質，便是外郭亭，即北魏張方橋所在。又如《後漢書·桓帝紀》載本初元年“梁太后徵帝到夏門亭”，李賢注：“洛陽城北西頭門也，門外有萬壽亭”。萬壽亭即是夏門的外郭亭^②。萬壽亭常為城中人送喪之處，亭長和亭吏也常管理送喪的事，故其

該在城外。

根據《漢儀》，東漢洛陽不但十二城門外設亭，城內二十四街上也都設亭。這是沿用秦都咸陽在市的街上設亭的制度。估計西漢長安街上以及市的街上也都設有亭。城門外交通要道上所設外郭亭，是爲了監視考察進出來往的行人，并加強外郭與城門的防衛，防止和追捕盜賊，從而維護都城的安全。城內大街上的亭，是爲了監視沿街來往的人，防止和追捕盜賊，以維持城內治安。這種亭，都具有警察的崗亭性質。亭設亭長，有固定治所，主要職司在其管轄區域內警察收捕奸盜，同時還設有遊徼，巡行流動搜索追捕盜賊。《急就篇》說：“變門殺傷捕伍鄰，游徼亭長共雜診。”

《漢官儀》（《續漢書·百官志五》“亭長”條劉昭注引）說：“尉、游徼、亭長，皆習備五兵。五兵：弓弩、戟、插、刀劍，甲鎧。……亭長持二尺板以劾賊，索繩以收執賊。”二尺板是指二尺長度、寫有法律條文的版牘，持二尺板就是說奉命按法懲辦和逮捕盜賊。《秦律·封診式》“盜馬”條，講到市南街の亭の求盜，就在亭旁捉到了盜馬者和一匹馬以及衣服等贓物。《漢書·王莽傳》講到“大司空夜過奉常亭，亭長呵之，告以官名，亭長醉曰：‘寧有符傳邪？’衛士以馬箠擊亭長，亭長斬士，亡。”說明亭長有禁止夜行之責，必須有符傳才准通過。《後漢書·周紆傳》又講到“皇后弟黃門郎竇篤從宮中歸，夜至止奸亭，亭長霍延遮止篤，篤蒼頭與爭，延遂拔劍擬篤，而肆晉恣口。”止奸亭是華延儻《洛陽記》所列洛陽城內二十四個街亭之一（見《元河南志》卷二）。當時亭長霍延同樣爲了禁止夜行，與外戚竇篤發生衝突。《後漢書·虞延傳》載：“少爲戶牖亭長，時王莽貴人魏氏賓客放縱，延率吏突入其家捕之。”可知亭長還可在管轄地區內依法進入住家

捉拿犯人。

亭長屬於武官系統，常由縣直接任命，與文官系統的鄉里的長官不同。《續漢書·百官志五》說：“亭有亭長，以禁盜賊。”本注：“亭長主求捕盜賊，承望都尉。”亭長雖然不直接隸屬於縣尉，在工作上應該有所“承望”。“承望”有承接和仰望的意思。

2 唐代都城的警衛、治安設施

唐代都城長安，分為官城、皇城與郭城三大部分。“唐北門禁衛之兵，皆屯於官苑；百司庶府及南衙諸衛，皆分居皇城之內；百官私第及坊市居人，皆分居朱雀街之左右街”（《資治通鑑》卷二六四昭宗天復三年二月乙未條胡注）。唐代設有官苑使掌管官城的警衛，設有皇城使主管皇城的治安，包括皇城的城門開閉以及早夜的巡警等。同時在郭城設有左右巡使、左右街使與京兆尹共同掌管郭城的警衛和治安。左右巡使屬於御史臺，主管巡視有關坊內居民的治安問題；左右街使屬於金吾衛，負責坊外街上的警衛和治安。

左右巡使又稱左右巡御史，原是一種糾察官，本是御史臺監察御史的屬官。左右巡使的官署稱左右巡使院，設在御史臺中，是御史北臺的一部分^②。左右巡使，分別主管巡察以朱雀街為界的左街、右街各坊居民以及東西兩市所有不法之事，包括“流降人”的停匿不去，妖訛（造謠生事）、蒲博（賭博）、盜竊、獄訟、冤濫、貿易和賦斂中的不法行為等等，都必須檢舉上奏，並負責巡查所有監獄，包括刑部、大理寺、東西徒坊、金吾衛以及縣的監獄^③。因為左右巡使的重要，開元初年改屬殿中侍御史。代宗廣德年間吐蕃入侵，劫掠焚燒，“長安中蕭然一空”。由於這個特殊原因，曾任命御史中丞兼充左右巡使，代宗大曆年間和憲宗

元和年間又曾作為殿中侍御史兼官^②。

從左右巡使具體糾察不法的事例來看，中唐以後，他們糾正了當時不按時開閉坊門、違法向街開門以及高官“侵街造舍”的事^③；這些正是都城中嚴重破壞封閉結構的事件。也還有左巡使因長安縣令擅自在坊中開渠，沒有覺察而被罰兩月俸料的^④，更有左巡使因有人“以麻弁髮，持竹筐及葺席，哭於東市”，沒有上報而被貶職的^⑤。

左右街使是金吾衛的屬官。金吾衛掌管宮中及京城的警衛工作，分為左右金吾衛，各設大將軍一人，將軍二人，其下分設左右翊府，各設中郎將一名。左右街使即歸左右翊中郎將府管轄，分掌京城左右街的巡查。所有城門和坊角，都設有武侯鋪。武侯原是金吾衛的舊名，武侯鋪就是警衛駐屯之所。沿着左右街、設在坊角的武侯鋪，又稱為街鋪，設在城門的武侯鋪，又稱為助鋪。大城門的鋪有警衛一百人，小城門有二十人，街鋪中大鋪三十人，小鋪五人。所有這些警衛，原由徵發來的府兵充任，《唐律疏議》卷二六《雜律》有“直宿坊街”的條文^⑥。玄宗開元十一年（公元723年）以後改用應募的驍騎擔任。左右街使有率領騎兵在街頭巡行的職責。每當日落，擊鼓八百下而城門緊閉，就由左右街使分率騎兵巡行街上並叫呼，到五更二點，街鼓敲動，坊市之門開啓，才停止巡邏^⑦。這樣沿着大街的坊角設有街鋪，平時諸街鋪由左右金吾中郎將等巡查^⑧，夜間由左右街使等負責巡夜，禁止夜間街上通行，實行戒嚴和宵禁，用以確保治安。宣宗大中三年（公元849年）六月右巡使奏稱：義成軍節度使 韋讓在前任官苑使日，“於懷真坊西南角亭子西，侵街造舍九間”（《唐會要》卷八六“街巷”條）。懷真坊當即懷貞坊，是朱雀街西第二街的第五坊，其西南角沿街當設有街鋪，這裏有亭子，看來當時沿

街的大鋪建有亭子，用來偵察和瞭望，從而加強警戒。

由於左右街使的重要，唐代晚期常常以左右金吾衛大將軍兼任^②。所屬有判官、街吏等。除了維持城中沿街治安之外，兼有維護沿街設施的職責，遇到“起造舍屋”侵佔禁街的事件，有責任奏請拆除^③。沿街的橋梁，有保護的責任；如要修理，要與京兆府“計會其事”^④。甚至沿街的綠化種樹，也要由左右街使具體辦理^⑤。

左右街使還有衛護高官出入安全的責任。憲宗元和十年（公元815年）京城發生藩鎮派遣刺客刺殺宰相武元衡和打傷裴度的重大案件，一時京城大駭，“於是詔宰相出入，加金吾騎士張弦露刃以衛之，所過坊門呵索甚嚴”（《資治通鑑》卷二三九元和十年六月條），就是由左右街使督率騎士張刀露刃加強衛護。當時曾特別從內庫中選出好的弓箭陌刀，“賜左右街使，俟宰相入朝，以爲翼從，及建福門退”（《舊唐書·文宗紀》太和九年十二月條追叙前事）。由於這一重大案件的發生，“於是京師大索，公卿家有複壁重櫺者皆索之”（《資治通鑑》卷二三九元和十年六月條）。同時下令“坊市居人團保”（《冊府元龜》卷六四帝王部、發號令元和十年六月辛丑條）。所說“團保”，就是要每五家相互連環保。元和十二年二月曾再次下令“京城居人，五家爲保，以搜姦慝”（《舊唐書·憲宗紀下》），並“命朝官及官中，條流家人部曲及在宅參散人數，送府縣；其寺觀，委兩街功德使團保”（《冊府元龜》卷六四帝王部發號令同年月條）。這種“團保”的工作是由京兆府及所屬萬年、長安二縣主管的。

唐代後期宦官專權，代宗廣德元年（公元763年）宦官魚朝恩總典禁兵，於是北衙的神策軍掌握京師的警衛和司法權力。當時“於北軍置獄，召坊市凶惡不逞之徒，役使之，捕坊城內富人，誣

以違法，掩置獄中，忍害拷訊，錄其家產盡沒之”（《冊府元龜》卷六二八環衛部虐害、劉希暹條）。文宗太和九年（公元835年）發生甘露之變，“自是天下事皆決於北司，宰相行文書而已。”過去因藩鎮刺殺宰相武元衡而從內庫發給左右街史的武器，“至是悉罷之”（《資治通鑑》卷二四五），全部歸還內庫^①。從此左右街使失去精良武器，長安城內警衛司法之權全由神策軍主管。文宗開成三年（公元838年）京師發生宦官仇士良謀刺宰相李石事件，李石受微傷，沒有被刺殺，於是“命神策軍遣兵防衛，敕中外捕盜甚急，竟無所獲”（《資治通鑑》卷二四六）。

唐代末年在左右街使失勢的情況下，開始設置左右軍巡使及其官署左右軍巡院，作為“捉獲劫賊”的衙門，實際掌管長安的治安和警衛。五代後梁在京師設置左右軍巡使主管警衛和治安，就是沿用唐末的這種制度。

① 史頌簪銘文：“王才（在）宗周，令史頌省蘇（蘇），法友里君、百姓（姓）。”所說“里君”也指貴族的“里”的長官，“百姓”也指貴族。《逸周書·嘗麥篇》說：“閭率、里君以為資野。”朱右曾《集訓校釋》：“率若連率之率，閭率里君，《周禮》謂閭胥里宰。”這樣以里君與閭率連稱，足以證明里君是一里之長。

② 《公羊傳·宣公十五年》何休注，講到井田制下農民所住的“里”的情況：“民春夏出田，秋冬入保城郭。田作之時，父老及里正旦開門，坐塾上，晏出後時者不得出，莫（暮）不持樵者不得入。”《漢書·食貨志》有類似的記載：“春將出民，里胥平旦坐於左塾，鄰長坐於右塾，畢出然後歸，夕亦如之。”從此也可以看到當時的“里”，早晚定時開閉，並由父老及里正掌管並監視出入的人。

③ 見《史記·甘茂列傳》。《韓非子·內儲說下篇》又說：“史舉，上蔡之監門也。”

- ④ 應劭《風俗通》：“里有司，司五十家，共居止。”（《續漢書·百官志》注引）《漢書·晁錯傳》載錯上疏：“又聞古之制邊縣以備敵也，使五家爲伍，伍有長，十長一里，里有假士。”據此可知秦漢的里，一般爲五十戶左右。《禮記·祭法》：“大夫以下成羣立社，曰置社。”鄭玄注：“大夫不得特立社，與民族居百家以上，則共立一社，今時里社是也。”可知“里社”有百家以上的。
- ⑤ 李劍農主張四面有牆和門，見其所著《先秦兩漢經濟史稿》第十五章“市制”條。宮崎市定主張南北向狹長形，見其所著《漢代的里制與唐代的坊制》，刊於《東洋史研究》第21卷第3號。佐藤武敏主張東西向狹長形，見其所著《漢代長安的市》，刊於《中國古代史研究第二》。
- ⑥ 《太平御覽》卷一五七引《漢宮闕名》曰：“洛陽城故北宮有太子坊”，又引《晉宮闕名》曰：“洛陽宮有顯昌坊、脩成坊、綏福坊、延福坊、休徵坊、承慶坊、桂芬坊、椒房坊、舒蘭坊、藝文坊。”
- ⑦ 《洛陽伽藍記》卷五：“里開四門，門置里正二人，吏四人，門士八人。”《元河南志》卷三“後魏城闕古蹟”、“洗煩池”條所引，“置”上無“門”字，當據以刪去“門”字。
- ⑧ 《太平廣記》卷二五四，謂劉行敏（採自《啓顏錄》）：“姓崔飲酒歸，犯夜，被武侯（金吾衛）執縛。五更初猶未解，長安令劉行敏，鼓聲動向朝，至街首逢之，始與解縛。”
- ⑨ 《任氏傳》：“及里門，門扃未發。……坐以候鼓。”《李娃傳》：“日暮，鼓聲四動，……姥曰：鼓已發矣，當速歸，無犯禁。”《飛烟傳》：“迨夜，如常人直，遂潛於里門，街鼓既作，匍伏而歸。”《溫京兆》：“街鼓既絕，溫（京兆府尹溫璋）微服，與吏同詣黃冠所居。”溫璋所以要在街鼓既絕之後，微服出訪，因爲此時街上斷絕行人，便於私行察訪。
- ⑩ 參看賀梓城《唐長安城歷史與唐人生活習俗》，《文博》1984年第2期。

- ⑪ 見《通典》職官的鄉官和食貨的鄉黨。
- ⑫ 《資治通鑑》卷二五四僖宗中和元年八月，記鎮海節度使周寶對高駢說：“彼此夾江爲節度使，汝爲大臣，我豈坊門卒邪？”胡注：“長安城中百坊，坊皆有垣有門，門皆有守卒。”坊門守卒是軍中地位最低等的。
- ⑬ 《唐會要》卷七五“雜處置”開成元年十月條，中書門下上奏講到“其兩府（指京兆府與河南府）司錄及尉、知捕盜賊，皆籍幹能，用差專任。”
- ⑭ 自行簡《任氏傳》描寫東西兩凶肆陳列凶器於天門街上比賽，“士女大和會，聚至數萬，於是里胥告於賊曹，賊曹聞於京尹，四方之士盡赴趨焉。”里胥即里中官吏，賊曹即“知捕賊盜”，京尹即京兆尹。
- ⑮ 《新唐書·高仁厚傳》：“先是，京師有不肖子，皆著臺帶冒持挺，剽閭里，稱閑子。京兆尹始視事，輒殺尤者，以怖其餘。竇誦治京兆，至殺數十百人，稍稍憚戢。”《新唐書·薛元賞傳》記會昌中“拜京兆尹。都市多俠少年，以黛黑纒膚，夸詭力，劫坊閭，元賞到府三日，取惡少，仗死三十餘輩，陳諸市，餘黨懼，爭以火滅其文。”《太平廣記》卷二六三“張幹”（採自《酉陽雜俎》），記有同樣的事：“上都市肆惡少，率髡而膚劓，備衆物形狀，恃諸軍，張舉強劫。……京兆尹薛元賞上三日，令里長潛捕，約三十餘人，悉杖殺，尸于市，市人有點青者，皆灸滅之。”
- ⑯ 《資治通鑑》卷二三九憲宗元和十年正月，（李）師道素養刺客奸人數十人，厚資給之，其人說師道曰：“……募東都惡少年數百，劫都市，焚宮闕，則朝廷未暇討蔡，先自救腹心，此亦救蔡一奇也。”師道從之，自是所在盜賊竊發。辛亥暮，盜數十人攻河陰轉運院，殺傷十餘人，燒錢帛三十餘萬緡匹，穀三萬餘斛，於是人情恆懼。”
- ⑰ 《國語·齊語》和《管子·小匡篇》記管仲說：“令夫商羣萃而州處，觀凶飢，審國變，察其四時而監其鄉之貨，以知其市之賈。負任擔

荷，服牛輅馬，以周四方，料多少，計貴賤，以其所有，易其所無，買賤鬻貴。”說明當時居於市的商人，已有坐買與行商兩種。

- ⑮ 《史記·秦本紀》載秦獻公“二年城櫟陽”，《集解》引徐廣曰：“徙都之”。此說不確。《史記·商君列傳》明確說：“作為築冀闕宮庭于咸陽，秦自雍徙都之。”秦孝公十二年商鞅在秦進一步變法，從雍徙都到咸陽。
- ⑯ 《史記·孟嘗君列傳》記馮驩對孟嘗君說：“君獨不見夫朝（早）趨（趨）市者乎？平明側肩爭門而入，日暮之後過市朝者，掉臂而不顧，非好朝（早）而惡暮，所期物亡在中。”
- ⑰ 敦煌寫本《新集備急灸經》殘卷，今藏法國巴黎國立圖書館，編號P.2675，存360多字，抄寫於《陰陽書》卷子背面。書末題：“咸通二年歲次辛巳十二月廿五日……二人寫記”。書題下有“京中李家于東市印”。說明此書先有長安東市李家印本，到咸通二年（公元861年）又抄寫的。前有小序：“四大成身，一脈不調，百病皆起。或居偏遠，州縣路遙；或隔山河，村坊草野。小小災疾，藥餌難求，性命之憂，如何所治。今略諸家，……神驗無比。”書中講到治眼赤兼瘡翳，用耳尖上的陰會穴，陰會穴是當時新發見穴位，即明楊繼州《針灸大成》所說耳尖穴。還講到治大風病用兩眉中的光明穴，光明穴即《針灸大成》所說印堂穴。參見趙健雄《敦煌寫本新集備急灸經初探》，《中國針灸》第6卷第1期。
- ⑱ 《資治通鑑》卷二三五德宗貞元十三年，“比歲以宦官為使，謂之宮市，抑買人物，稍不如本估。其後不復行文書，置白望數百人於兩市及要鬧坊曲，聞人所賣物，但稱宮市，則斂手付與。”胡注：“白望者，言使人於市中左右望，白取其物，不還本價也。”
- ⑲ 馬先醒《漢代洛陽之城池與城門》（收入所著《漢簡與漢代城市》）據此認為：“是知《漢儀》所謂之十二城門，門一亭，其亭均處于其門之外。”是不錯的。
- ⑳ 徐松《唐兩京城坊考》卷一西京、大明宮御史臺，注：“由東入院門，

首爲中丞院，次西雜事院，又西左右巡使院，皆北向，故曰御史北臺。”

- ① 《大唐六典》卷十三“御史臺、殿中侍御史”條：“凡兩京城內，則分知左右巡，各察其所巡之內有不法之事，謂左降流移停置不去，及妖訛宿宵、蒲博、盜竊、獄訟，冤濫，諸州綱典貿易、隱盜、賦斂不如法式，諸如之類，咸舉按而奏之。”《通典》卷二四職官“御史臺、監察御史”條下，“分左右巡使，糾察違失，以承天、朱雀街爲界，每月一代，將晦，即巡刑部、大理、東西徒坊、金吾及其縣獄。”
- ② 《資治通鑑》卷二三九憲宗元和十一年十一月庚午條胡注引宋白曰：“廣德二年（公元764年）九月命御史中丞兼戶部侍郎王延昌充左巡使，御史中丞源休充右巡使，辛亥，源休充都左、右巡使。”《舊唐書·元載傳》：“（大曆）八年七月晉州男子郇謨，以麻弁髮，持竹筐及蓆席，哭於東市，……殿中侍御史楊護，職居左巡使，郇謨哭市，護不聞奏，上以爲蔽匿，貶連州桂陽縣丞員外置。”《冊府元龜》卷一五三帝王部明罰，元和四年五月條：“長安縣令鄭易以擅於永平坊開渠，貶汴州刺史，……左巡使、殿中御史李建不覺察，罰兩月俸料。”
- ③ 《唐會要》卷八六街巷，大中三年六月條，右巡使因韋讓任宮苑使曰“侵街造舍九間”，奏請下令拆毀。
- ④ 見注②所引《冊府元龜》。
- ⑤ 見注②所引《舊唐書》。
- ⑥ 《唐律疏議》卷二六《雜律》“其直宿坊街”，《疏議》：“謂諸坊應閉之門，諸街守衛之所，有當直宿。”
- ⑦ 《新唐書·百官志》“左右金吾衛”條，“左右街使，掌分察第六街徼巡，凡城門、坊角皆有武侯鋪，衛士、驍騎分守，大城門百人，大鋪三十人，小城門二十人，小鋪五人。日暮鼓八百聲而門閉。乙夜，街使以騎卒巡行叫呼，武官暗探。五更二點，鼓自內發，諸街鼓承振，坊市門皆啓，鼓三千槓而止。”

- ⑳ 《唐會要》卷七一、十二衛，神龍三年八月二十六日敕：“諸街鋪並令左右金吾中郎將自巡，仍各加果毅兩人助巡隊。”
- ㉑ 《舊唐書·郭子儀傳》載：郭釗“元和初爲左金吾衛大將軍充左街使。”又載：“穆宗即位，郭縱爲叔舅，改右金吾大將軍兼御史大夫，充右街使。”
- ㉒ 《唐會要》卷八六街巷，太和五年七月左街使奏：“伏見諸街鋪，近日多被雜人及百姓、諸軍諸使官健起造舍屋，侵占禁街，……並令除拆。”
- ㉓ 《唐會要》卷八六橋梁，大曆五年五月敕文：“承前府縣，並差百姓修理橋梁，不逾旬日，即被毀拆，……宜委左右街使勾當捉搦，勿令違犯。如歲月深久，橋木爛壞，要修理，左右街使與京兆府計會其事。”
- ㉔ 《唐會要》卷八六街巷，太和九年八月敕文：“諸街添補樹，並委左右街使栽種，價折領於京兆府。”
- ㉕ 《冊府元龜》卷六五帝王部發號令，太和九年十二月庚寅條：“先是元和十年六月十三日敕，以內庫弓箭陌刀賜左右街使，充宰相入朝以爲翼羽，及建福門而退。至是，因(李)訓(鄭)注之亂（指甘露之變）悉罷之，其所賜兩街軍器，盡歸於弓箭庫。”

二 唐宋之際都城制度的重大變化

(一) 商人“行”“市”組織的發展和沿河近橋及城門口新“行”“市”的形成

唐宋之際都城制度發生了重大變化，一方面是唐以前封閉式的市制和坊制的瓦解，另一方面是沿河近橋和城門口的新的“行”、“市”的興起與繁華街市的逐漸形成，以及以勾欄為中心的瓦市的興起與活躍的都市生活方式的形成。釀成這一重大變化的主要原因，就是都城人口的急速增長，衆多居民生活必需品的需要日益增加。同時隨着城市經濟的大發展，商人各種行業的聯合組織“行”、“市”得到成長，從而使得適應時代需要的沿河近橋及城門口的新的各種“行”、“市”的勃興，在這個基礎上又發展成了繁華的街市。

1 唐代長安的商人“行”“市”組織

商人各種行業的聯合組織，在唐代長安東西兩市中已經形成。兩市共有一百二十行之多，已知東市有肉行、鐵行；西市有麩行、絹行、大衣行、鞍轡行、秤行、藥行等。這些“行”也可稱為“市”，如“藥行”或稱“藥市”（見柳宗元《宋清傳》）。這些行市，不僅是同業商店街區的名稱（按唐代規定各行的進口處要標明行名），也還是同行商人的聯合組織的稱謂。這時有些行已很具規模，還設有酒樓。例如唐人小說《李君》（《太平廣記》卷一五

七，採自《逸史》講到：“可西市鞦轡行頭坐，見訖復往，至即登樓飲酒。”說明西市的鞦轡行設有酒樓，是行頭所在的地方，一到便可登樓飲酒。唐人小說《虬髯客傳》（杜光庭作）又講到：虬髯客約定李靖於京中馬行東酒樓相會。李靖及期前往，攬衣登樓，果然見到虬髯客正與一道士對飲。看來鞦轡行的酒樓，不是別的，就是馬行的酒樓。“鞦”是馬的後部革帶，“轡”是繩繩，“鞦轡”就是駕馭馬的重要手段，當時不可能有專營鞦轡的行市而設有酒樓，鞦轡行當是馬行的別名，猶如米麥行常稱為斛斗行或斛斗行^①，因為當時常以“斛斗”作為大量米麥的代稱。馬是當時北方主要的交通工具，諺語所謂“南船北馬”，因而馬的交易興旺。東漢洛陽已設有馬市，西晉在洛陽東郊的馬市（或稱牛馬市）已成為三市之一（不專為馬的市場）。到唐代，西市的馬行很有發展。按唐代法律規定，奴婢、馬牛、駝驢的買賣，成交後都要訂立“市券”，三天內如果發現疾病，可以請求解約（《唐律疏議》卷二六《雜律》）。馬行所設酒樓，既為行頭駐在地，又是為了方便看驗牲畜質量、談定價格和簽訂契約而設置的，當然也可以用於約會與宴會。這種設施曾為北宋東京的馬行和牛行所沿襲。

唐代每一行市已設有頭腦，稱為“行頭”或“行首”，官府或者稱他們為“行人”，也或稱為“肆長”^②。行頭作為同業商人組織的首腦而總管本行的事。唐代賈公彥所作《周禮注疏》在《地官·肆長》下解釋說：“此肆長謂一肆立一長，使之檢校一肆之事，若今行頭者也。”具體說來，行頭有統一本行商品價格和監督管理本行商人買賣的權力，又有對官府提供本行物質、代官府出賣有關物資以及代官府看驗有關物資、估定價格的責任。唐代於東西兩市設立市署，掌管市內交易，如管理各行商人使用的度量衡，要每十天制定各種商品的上、中、下三等價格^③，統一市上物價；

管理奴婢、牛馬賣買公驗以立券的事，這一切都必須通過各行的行頭來管理和制定。這種制度曾為北宋政府所沿用，宋真宗大中祥符九年（公元1016年）條例規定：“時估（即時價）於旬假日，集行人定奪”（《宋會要輯稿》食貨五五、雜買務，天禧二年十二月條），就是每十天的物品價格，要在每十天的休假日召集行頭作出決定。這種每十日召集各行行頭決定時價的辦法，當即沿用唐代制度。唐德宗建中元年（公元780年）規定東西兩市所設常平倉，如遇災荒，應將官有米麥各十萬石交兩行“行人”（即米麥行行頭），按低價出賣（《舊唐書·食貨志下》）。唐德宗貞元九年（公元793年）規定，“有因交關舊欠陌錢者”（即所交每一百文錢有缺額的），要命令本行行頭及居停舍人（所住旅舍主人）、牙人等檢察送官（《舊唐書·食貨志上》），說明唐代中期所有兩市的各行行頭，都已發揮管理本行的作用。這種商人聯合組織“行”的產生，是由於城市中社會經濟的發展，商業資本的累積，商人社會地位的提高，各行商人謀求共同利益的需要，也適應城市中人口增長、日用必需品以及奢侈品的消費市場擴大的需要。

2 客商需要邸店日益增長

唐以前都城中封閉式的集中的“市”，貨源主要依靠同住在“市”中或住在“市”附近“里”中的“行商”。上一章已談到，春秋時代齊國都城臨淄的“市”中，既有開設商店的坐買，又有“負任擔荷，服牛輅馬，以周四方”的行商。西漢長安，行商集中住在城內西北角靠近“九市”的雍門一帶。《廟記》講長安九市，講到“九州之人在突門”（《三輔黃圖》卷二引）。“九州之人”就是指奔走全國各地的行商，突門即是雍門（《水經注·渭水》）。北魏洛陽的行商，主要住在西面郭區“大市”以東的通商、達貨二里，其

中如“最爲富室”的劉寶，“州郡都會之處皆立一宅，各養馬一匹”，“舟車所通，足迹所履，莫不商販焉，是以海內之貨，咸萃其處”（《洛陽伽藍記》卷四）。這二個里所以名爲通商、達貨，就是因爲多住行商的緣故。而洛陽東面郭區的“小市”，其東北也有相同性質的里叫殖貨里。唐代長安的情況有了發展，除了本地的行商之外，每多外來的客商，大多住在東西兩市以及附近的坊中，如西市東南興化坊住有“以販繒爲業”的“客戶”（《太平廣記》卷四八六《無雙傳》）。西市西南懷德坊，又住有富商鄒鳳熾，“邸店園宅，遍滿海內，四方物盡爲所收”（《太平廣記》卷四九五引《西京記》）。“邸店”就是供客商堆貨、寓居並進行交易的行棧^④。唐代東西兩市內，也在周圍設有這種行棧性質的邸店。

唐以前都城中封閉式的“市”，各行商店的貨源主要依靠住在“市”內和附近坊里中的行商和客商提供的。但是到五代和北宋都城東京（今河南開封），由於駐軍衆多，人口急劇增長，糧食及日常必需品的供應，除了靠漕運以外，還需要出產地的大商人經常地從水路運來。唐代後期和五代時，江淮一帶以及江南地區的經濟有重大發展，不但漕運依靠江淮地區供應，許多日常必需品也靠南方商人運來，因而客商所需要的邸店日益增長。

3 後周世宗擴建東京外城和獎勵增建邸店的新政策

東京原稱大梁，五代時，除後唐以外，四代在此建都，稱爲東京開封府。後周世宗（公元954—959在位），是一個有爲的君主，曾改革政治，獎勵生產，建設國都，疏導河流，先後取得後蜀的階、成、秦、鳳四州與南唐的江淮地區十四州，又北攻契丹，收復莫、瀛、易三州，爲北宋完成統一和建都東京奠定了基礎。

東京有三重城圈，中心皇城原是唐宣武軍節度使治所，第二

重是裏城，亦稱舊城，原為唐代汴州的州城，周圍有20里50步。因為這是州城，規模遠較都城為小，街道也很狹窄。再加上唐代後期和五代時，居民不斷“侵街衢為舍”，街道更加狹小。隨着人口的急劇增長，日用必需品的需要量日益擴大，這個州城的規模，遠遠不適應作為都城的需要。於是後周世宗於顯德二年（公元955年）四月下詔，在原有州城的外圍，別築外城，亦稱新城或羅城，周圍48里233步，比原有州城擴大了四倍。外城於次年正月開始興築，“逾年而成”（《宋東京考》卷一引宋敏求《東京記》）。北宋不過在這個基礎上進行了多次的修建和擴展（參看圖52）。

後周世宗這次擴建外城，適應新形勢的需要，作出了新的改革措施。世宗在顯德二年四月所下詔書中作了具體說明^⑤：

“惟王建國，實曰京師；度地居民，固有前則。東京華夷輻輳（“輻輳”《冊府元龜》作“臻湊”），水陸會通；時向隆平，日增繁盛；而都城因舊，制度未恢。諸衛軍營，或多窄狹；百司公署，無處興修；加以坊市之中，邸店有限；工商外至，絡繹無窮（“絡繹”《冊府元龜》作“億兆”）；餽賃之資，增添不定；貧乏之戶（“乏”《冊府元龜》作“闕”），供辦實難。而又屋宇交連，街衢湫隘，入夏有暑濕之苦，居常多煙火之憂。將便公私，須廣都邑，宜令所司，於京四面別築羅城，先立標識，候將來冬末春初，農務閒時，即量差近甸人夫，漸次修築；春作纔動，便令放散；或土功未畢，即次年修築（《冊府元龜》“次年”上有“迤邐”二字）。今後凡有營葬及興窰竈並草市（《冊府元龜》在此句上有“所冀寬容辦集”一句），並須去標識七里外。其標識內，候官中劈畫，定軍營、街巷、倉場、諸司公廡院務了（《冊府元龜》“街巷”兩字在“軍營”兩字之上），即任百姓營造（《五代會要》卷二六《城郭》，《冊府元龜》卷一四《帝王部·都邑》大體相同）。

這一詔書，非常重要，說明擴建外城的目的，不僅為了解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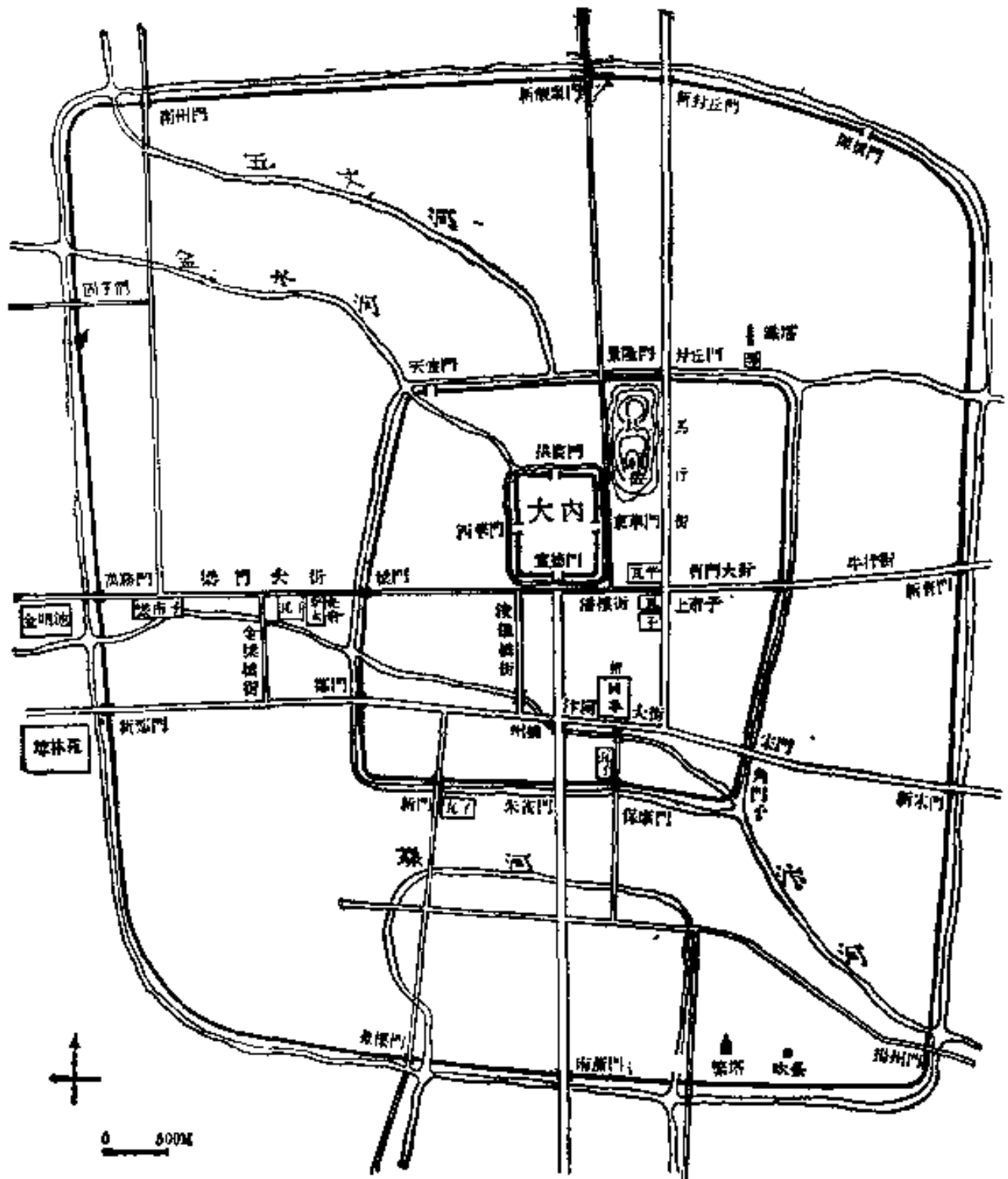


圖52 北宋東京(開封)結構圖

(採自同濟大學城市規劃教研室編《中國城市建設史》第43頁)

軍營和官署的用地不足，還在於解決原有“坊市”中“邸店有限”的問題，也就是解決外來工商所需邸店不足和租費增漲的問題；同時要解決屋宇交連、街道狹窄、夏天感到暑濕、居常多火災的

問題。具體的措施是，待官府按計劃分割街巷、軍營、倉場、官署所用的地段以後，“即任百姓營造”。《資治通鑑》卷二九二在敘述這一詔書時，也說：“其標內，俟縣官（指政府）分畫（劃）街衢、倉場、營廨之外，聽民隨便築室。”這裏並沒有像隋唐長安那樣先築好了“坊”和“市”的圍牆，規定住宅造於“坊”中和商店造於“市”中；只是分割好街巷範圍而聽任隨便營造，使適應當時居民生活上新的需要。

值得注意的是，後周世宗在擴建外城以後，立即疏通東京對外的水道交通。顯德四年四月乙酉，“詔疏汴水北入五丈河，由是齊、魯舟楫皆達於大梁”。次年三月“浚汴口，導河流達於淮，於是江淮舟楫始通”（《資治通鑑》卷二九三、卷二九四）。東京的糧食和日常必需品，主要靠汴水連通江淮而運來，這原是唐代漕運路綫，五代時因江淮割據，漕運不通，水道淤塞。到這時才重新加以疏通，同時又使汴水和五丈河相通，使東方的運輸也通暢了。這樣疏通與東南和東方的水上交通，就是為了便於接待大量客商運輸商品進入新擴建的外城，以適應京城衆多居民的新需要。後周世宗擴建外城和疏通河道的新設施，便利了客商把大量日用商品運入以及接待客商“邸店”的建設。

後周世宗還採取了獎勵居民沿汴建造邸店的政策。文瑩《玉壺清話》（或作《玉壺野史》）卷三載：

周世宗顯德中，遣周景大濬汴口，又自鄭州導郭西濠達中牟。景心知汴口既濬，舟楫無壅，將有淮浙巨商、貿糧斛買萬貨臨汴，無委泊之地。諷世宗乞令許京城民環汴栽榆柳，起台榭，以爲都會之壯。世宗許之。景率先應詔，踞汴流中要，起巨樓十二間。方運斤，世宗輦輅過，因問之，知景所造，頗喜賜酒，犒其工，不悟其規利也。景後邀鉅貨於樓，山積波委，歲入數萬計。今樓尚存。

這所“踞汴流中要”的“巨樓十二間”，就是外城舊宋門以內臨汴水的著名的十三間樓，直到北宋末年尚存（見《東京夢華錄》卷二《宣德樓前省府宮宇》）。這個主持濟汴口的周景，就是大將軍周景威，當時是調用軍隊來疏導河流的。王闢之《澠水燕談錄》卷九也說：“周顯德中，許京城民居起樓閣，大將軍周景威先於宋門內臨汴建樓十三間，世宗嘉之，手詔獎諭。景威雖奉詔，實所以規利也。今所謂十三間樓子者是也”。周景威所建臨汴的十三間樓，用來接待淮浙巨商運來萬貨，就是供客商堆貨、寓居並進行交易的“邸店”，因而“歲入數萬計”。他既先請求世宗准許京城居民臨汴造屋，首先起建十三間樓作為榜樣，當時臨汴所建接待外來客商的“邸店”必然還有許多所。這正是世宗擴建外城的主要目的之一，用來解決“工商外至，絡繹無窮”所需“邸店”不足的困難。所以世宗會准許周景威的請求，並嘉獎他首先起造巨樓的行動，並不是世宗受了騙，“不悟其規利也”^⑥。

北宋初期官府繼續推行這種“規利”的政策，汴河堤岸司與修完京城所在汴河一帶以及城內建造“房廊”租借給流寓的人，包括客商在內。宋神宗元豐八年（公元1085年）九月廢止徵收各行商人的“免行錢”（即免除行役的稅），並把汴河堤岸司和修完京城所的“房廊”及其“歲收課利”，撥給戶部左曹掌管徵收。中書省為此作出決定，這批歲收課利，“除代還免行錢外，餘充本曹年計”（《續資治通鑑長編》卷二五九“元豐八年九月乙未”條）^⑦。這年免除繳納“免行錢”的各行商人多到六千四百多行，免除的總額多到四萬三千三百多緡。這時上述兩所的“房廊”的歲收課利，“除代還免行錢外，餘充本曹生計”，可知這批“房廊”的歲收課利十分巨大，房廊的數量是很多的。與此同時，還有官僚、商人為了“規利”而建造邸店和房廊，用來租給客商，像後周周景

威所建的十三間樓那樣。也還有本地商人沿着交通便利地點，建設賣買交易的樓店的。據說“世人語虛僞者爲‘河樓’，似汎濫之名，其實不然。國初京師有何家樓，其下所賣物皆行濫者，故人以此目之。樓已廢，語尚在也”（阮閱《詩話總龜》卷二十九）。當時既有“所賣物皆行濫”的何家樓，必然同時還存在着不少所賣物不行濫的樓店。

4 北宋東京沿河近橋新“行”“市”的形成

後周世宗擴建東京外城的規劃和獎勵建設邸店的政策，適應了經濟發展新形勢和衆多居民生活上的需要，因而到北宋初期東京的建設進一步取得了成就，人口急劇地增長。與此相應的，商業的發展十分迅速，在沿汴河地帶不僅邸店大量增設，日用必需品的新行市也紛紛興起了。邸店的增設，是促成新行市興起的主要因素之一。

宋太宗晚年已說：“東京養甲兵數十萬，居人百萬，轉漕仰給在此一渠水（指汴水）”（《續資治通鑑長編》卷三十二“淳化二年六月乙酉”條及《宋史·河渠志》）。這樣衆多人口的日用必需品的“仰給”，必須依靠衆多客商從汴河源源不斷地運來，已不是原有交通不便的封閉式的“市”中“行市”所能調度。隨着商人組織“行”的成長，汴河一帶邸店的大量增設，沿汴河一帶的空地上日用必需品的新“行市”也產生了。起初這種新“行市”帶有臨時的或定期的集市性質，上市時集合，市罷即散去，並不長期占用土地。有的甚至在橋上作臨時交易，或成爲定期的集市，稱爲“市橋”。由於這種新“行市”的逐漸形成和固定，到北宋中期，官府便從中抽地稅，規定“須就官地爲市交易”，並准許租借官地造屋而設立永久性新“行市”。例如宋神宗元豐二年（公元

1079年)九月，由修完京城所申請批准，租官地與民“創屋”而“爲麵市”（《續資治通鑑長編》卷三〇〇“元豐二年九月丙子”條）。這時沿汴河新設行市經官府抽稅的，除麵市外，還有斛斛行、菜行、果子行、牛行、馬行、紙行等，都是主要日用必需品的新行市，用來接待客商從汴河運來的大量日用商品，以供應日益增長的都城居民的需要。元豐八年七月殿中侍御史黃濬，見到官府對這許多新興行市抽地稅爲害嚴重，上奏請求罷免。其中談到“沿汴河堤岸空地，先有朝旨許人斷賃”，可見這許多新行市原是從沿汴河堤岸空地上興起的。奏文還指出：“沿汴官司，拘攔牛馬、果子行，須就官地爲市交易，並其餘諸色行市不曾占地，亦納課錢，以至市橋亦有地稅，殘民損國，無甚於此。”爲此奏請朝廷，“詔沿汴官司，拘攔牛馬、果子行，並磨團戶、斛斛、菜、紙等諸色及市橋地課並罷”（《續資治通鑑長編》卷三五八“元豐八年七月庚戌”條）。所謂“拘攔牛馬、果子行”，該是牛行、馬行、果子行原設在沒有拘攔的空地上，官府強制他們加以拘攔，並按占地多少抽稅。“磨團戶”該是麵市的別名，因爲麵市必須設有磨粉作坊，“團”當是“行”的別名。斛斛行又是米麥行的別名。從此可知許多日用品的新行市，都是爲了便利客商運來而設在沿汴的空地上的，在沒有被官府拘攔或強制“就官地爲市交易”以前，應該已經經營很長一段時間了。

與此同時，官府爲了與商人爭利，還曾一度在這些沿河近橋地段設置官營的果子行、麵行、肉行。元豐八年五月乙未的詔中，講到修完京城所管屬的“萬木場、天漢橋及四壁果市、京城豬羊圈、東西麵市、牛圈、堞麻場、肉行、西塌場俱罷”（《續資治通鑑長編》卷三六八）。根據《東京夢華錄》，商人的果子行設在州橋之西，而官營的果子行同樣設在州橋，天漢橋就是州橋的正

名。官營果市設有多處，官營麵市又有東西兩處，在設官營肉市的同時還設有官營的豬羊圈和牛圈，另有官營的西場場具有倉庫性質。北宋官府不僅一度辦官營的日用品行市，而且嚴格地控制客商入京商品的運輸和堆積場所。原來由汴河的網船（賦稅運輸船）附帶載着商貨入京，從元豐二年起，規定入京商貨先運到泗州，“官置場堆垛”，再由官船運到京師（《續資治通鑑長編》卷三〇〇“元豐二年十月己亥”條）。運到京師以後，按規定也要用官船，私船不得入汴。看來官營的麵市、肉市，在元豐八年罷廢以後，到宋哲宗紹聖年間又曾一度恢復。紹聖四年（公元1097年）八月，大臣曾布曾與哲宗談論到官營的肉市、麵市：

布曰：“肉市、麵市，皆與細民爭利。……然商賈之物悉載以官舟，私船不得入汴，人實患之。”上曰：“內臣亦多云不便，云麵市雖泥雨，亦須船載來官場中。”布曰：“一日有一日課利，不可不來，宜其不能避風雨也。”（《續資治通鑑長編》卷四九〇“紹聖四年八月庚子”條）。

據此可知，麵市、肉市都設在沿河地段，所有商品都必須用船載來。所謂肉市，即是設有許多屠宰作坊的豬羊肉市場。

從《東京夢華錄》看來，北宋末年官營的行市已不存在，商人的行市還多設在沿河近橋地方。果子行設在朱雀門外以及州橋以西大街上。《東京夢華錄》說：“如果子亦集於朱雀門外及州橋之西，謂之菓子行”（卷三《天曉諸人入市》）；又說：“至州橋投西大街，乃果子行。街北都亭驛，相對梁家珠子鋪，餘皆賣時行紙畫、花果鋪席”（卷二《宣德樓前省府宮宇》）。說明當時的“行”，不僅設有便於客商運集商品而發售的“市”，同時設有同行的商鋪。果子行中，除花果鋪席以外，夾雜有珠子鋪和紙畫鋪等，當是街市進一步發展的結果。這時牛行和馬行都已發展成繁華街市，因而有馬行街和牛行街之稱。牛行與馬行依然沿用

唐代馬行設有酒樓的風習。在舊曹門朱家橋以東的牛行街，設有看牛樓酒店，原是看驗牛而談論交易以及訂約的場所。在土市子（潘樓以東的十字街）以北的馬行街，“街東曰莊樓，今改作和樂樓，樓下乃賣馬市也”（卷二《潘樓東街巷》）。莊樓之下就是賣馬市，可知莊樓原是看驗馬而談論交易以及訂約之處。因為宋代仍沿用唐代買賣牛馬要訂立契約，如三天內發現疾病可解約的法律規定^⑧。隨着街市的發展，這種酒樓也主要用於招待賓客的宴會，因而有的名稱也改了。和莊樓隔街相對的，還有楊樓，楊樓以北，有穿過南北向的馬行街的東西兩巷，叫做大小貨行，“皆工作技巧所居”（卷二《酒樓》）。這是手工業作坊組成的大貨行和小貨行所在。“馬行北去，及小貨行時樓”（卷三《馬行街北諸醫鋪》）。時樓就是小貨行所設酒樓。可知除牛馬行以外，當時別的行也設酒樓以便談論交易或簽訂契約。

《東京夢華錄》卷四《肉行》所說“坊巷橋市皆有肉案”，僅是零售的肉鋪，更有大規模作坊的肉市，在外城正門南薰門內，每天晚上所宰豬，“每羣萬數”，“須從此入京”，“止數十人驅逐，無有亂行者”^⑨。所說“每羣萬數”，形容數量很多，并非確數，但可見南薰門內“肉市”的屠宰作坊，規模十分巨大。因為人民生活上的需要，特別准許每天到晚上，待進出城門的人稀少時，大羣的所宰豬可以從南薰門驅趕進城。每日大量需要的所宰豬，當是從南面城外的水路（蔡河）運來，到晚上再驅趕從南薰門進城，送作坊屠宰分割。“直至天明，其殺豬羊作坊，每人擔豬羊及車子上市，動以百數”（同書卷三《天曉諸人人市》）。這就是所謂肉市。同時，“其賣麥麵，秤作一布袋，謂之一宛；或三五秤作一宛；用太平車或驢馬馱之，從城外守門入城貨賣，至天明不絕”（同書、同卷、同一節），可知城外還有麵市。

同書卷四〈魚行〉，談到“每日早惟新鄭門、西水門、萬勝門，如此生魚有數千擔入門；冬日即黃河諸遠處客魚來，謂之車魚”。東京每日所需鮮魚，當是從西面城外的水路（汴河）運來，因而魚行設在外城西邊三個城門口接待魚販，再分發給許多酒樓、食店以及零售商店和攤販。同書卷二〈宣德樓前省府官宇〉，還說：“州橋曲轉大街，河南曰左藏庫（按即國庫），近東鄭太宰宅、青魚市內行”。所說青魚市內行，當是設在城中的青魚行市所在。當時設在外城四周城門口內外的日用必需品的“行市”，除了肉市、麵市、魚行以外，還有其他許多種。楊侃〈皇畿賦〉說：“十二市之環城，囂然朝夕”（呂祖謙〈宋文鑑〉卷二）。環繞着外城四周共有十二個新“行市”，都是像肉市、魚行那樣趕早市或晚市，早晚忙碌的，其中應該有菜行。當時把魚、肉、菜三種行市看作同樣重要，因為都是日常生活所必需的。

同書卷三〈都市錢陌〉講到：“都市錢陌，官用七十七，街市通用七十五，魚肉菜七十二陌，金銀七十四，珠珍、雇婢媼、買蟲蟻六十八，文字五十六陌。行市各有長短使用”。“錢陌”是指使用的串起來的每一百文錢，當時官府只以七十七文為“陌”，街市上一般通用只七十五文，各種“行市”中使用的更加減少。據此可知當時重要的“行市”，除魚、肉、菜行以外，還有金銀行、珠珍行、雇婢媼行、買蟲蟻行和文字行等。同書卷二〈東角樓街巷〉，講到皇城東南角的東角樓附近“十字街以南有薑行，高頭街以北有紗行；東角樓以東的潘樓街，南通一巷，謂之界身，並是金銀采帛交易之所”。這個界身巷，當即金銀行之所在。文字行當即書籍行，宋代或稱書籍鋪為文字鋪^⑩。東京除國子監的官刻書以外，商人的雕版印刷業也很發達，書籍鋪往往刊行書籍發售，因而特別有“文字行”這個行市。這也是東京新興的行市之一。這種

行市到南宋臨安更爲發展，稱爲“書房”或“文籍書房”（參看圖5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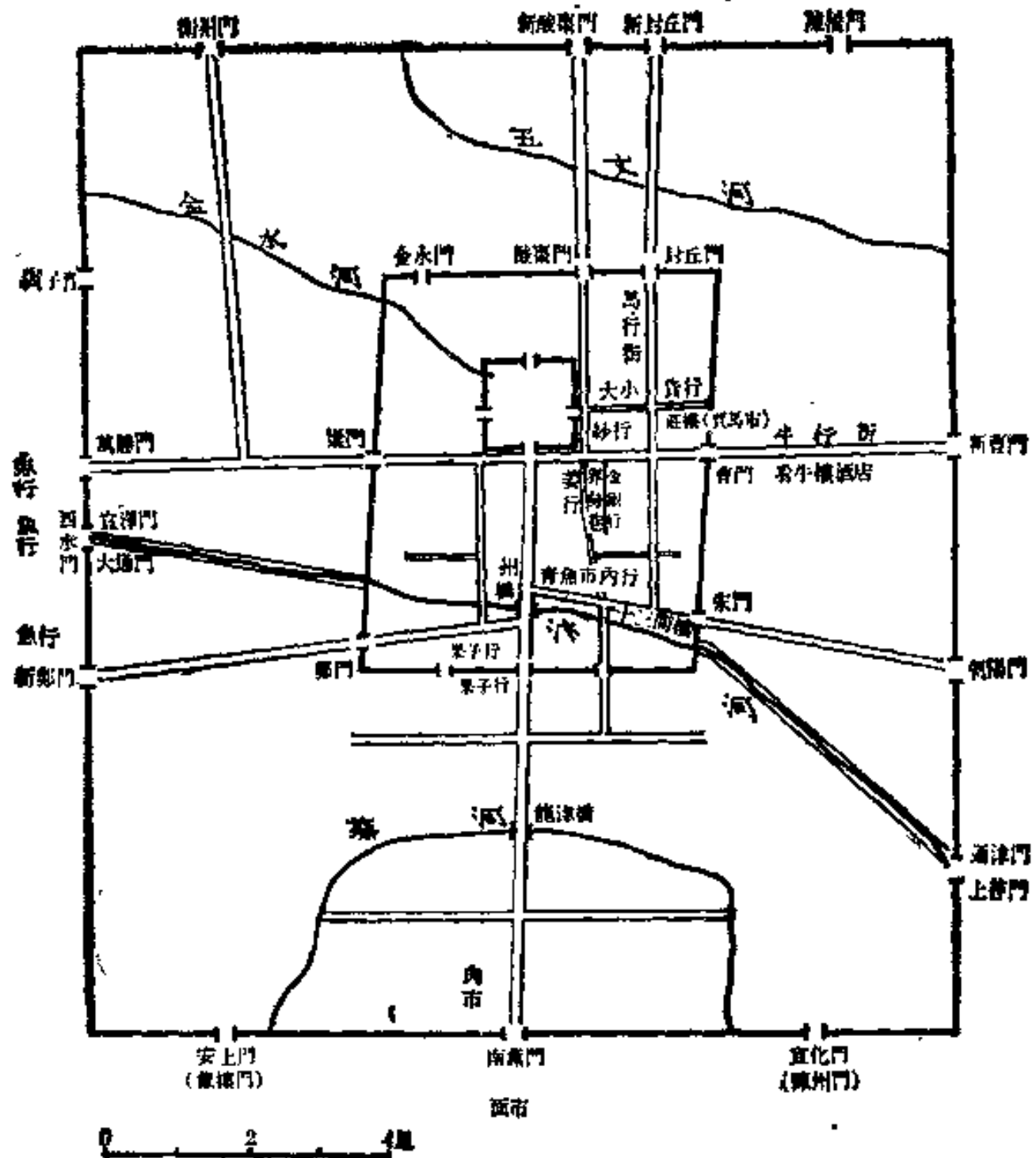


圖53 北宋末年東京(開封)主要行市分佈圖

(二)新“街市”的形成和舊的封閉式“市”的淘汰

新的“街市”的形成和舊的封閉式“市”的淘汰，這裏有個新陳代謝的轉變過程。

1 以新“行市”為中心的街市的形成

北宋中期正處於這個新陳代謝的轉變過程中。隨着上述許多新的行市的興起和發展，以這些新行市為中心的街市逐漸形成。有的街市是在一個新行市的基礎上發展形成的，如牛行街就是這樣。也有街市是連接幾個重要的新行市而形成的，如馬行街就是這樣。最初馬行只有酒樓莊樓作為“行頭”駐在地以及交易之所，稱為“馬行市”，也或成為人們“邀飲”和約會之處（洪邁《夷堅志》甲集卷十八“李舒長僕”條）。後來和不少行市在一條街上連結起來，就發展成為“人煙浩鬧”馬行街。上節已經談到，馬行街很長，往北穿過馬行街有作為大小貨行的東西兩巷，為許多手工業作坊所在地；再往北又有小貨行的時樓、藥鋪、香藥鋪，“兩行金紫醫官藥鋪”（《東京夢華錄》卷三《馬行街北諸醫鋪》），當即藥行、醫行所在。整條馬行街上酒樓、茶坊、飲食店很多，成為東京四條御街中最繁華的一條。據說整個東京城內，只有馬行街上沒有蚊子，因為這是“夜市酒樓極繁盛處”，“燈火照天”，“蚊蚋惡油”（蔡條《鐵圍山叢談》卷四）。新興行市是促成“街市”主要原因之一。

2 以酒樓、茶坊為中心的街市的形成

新的“街市”的形成和發展，有多種原因。除了由於新行市的興起外，還由於新的酒樓和茶坊的紛紛興建，以適應衆多居民社會交際和娛樂的需要。唐代晚期長安城內，不論“市”和“坊”中，都已有酒樓、茶肆的設置。前面已經談到馬行有酒樓，同時來往人多的坊巷亦已設有會飲的酒樓。例如唐人小說《任氏傳》（沈既濟作）敘述韋崧與其堂房的妹婿鄭六出游，“將會飲

於新昌里”，鄭六走到宣平坊南，請求暫時離開，等一會“繼至飲所”。這個會飲的“飲所”當即酒樓。新昌里即新昌坊，是東市東南的第二個坊。晚唐的酒樓不僅是約會和會宴的地方，而且是“合樂”的娛樂場所。例如唐人小說《柳氏傳》（許堯佐作）講到“會淄青諸將合樂酒樓，使人請翊（即韓翊），翊強應之，然意色皆喪，音韻悽咽”。酒樓亦稱旗亭，當是因掛彩旗而得名。唐人小說《王之渙》（薛用弱作）講到：“一日天寒微雪，三詩人共詣旗亭，黃酒小飲。忽有梨園伶官十數人登樓會譚，……俄而妙妓四輩尋續而出，……旋出奏樂，皆當時之名部也。”同時茶肆的設置亦已推廣。例如唐文宗太和九年（公元835年）十一月甘露之變，宦官命令禁兵追捕大臣，王涯徒步至永昌里茶肆，禁兵擒入左軍（《舊唐書·王涯傳》、《資治通鑑》卷二四五）。永昌里是宮城東邊第二個坊，離開東市很遠，這裏已設有茶肆。到北宋東京，酒樓茶坊有大發展，都設置在街市上。大酒樓稱為正店，“在京正店七十二戶，此外不能遍數，其餘皆謂之脚店”（《東京夢華錄》卷二《酒樓》）。有些大酒樓就成為重要街市的主要店鋪，有些街就以酒樓作為街名，如潘樓街就是這樣。所有這些大酒樓都是沿街開設的，有些街市上還有夾街相對的酒樓。“九橋門街市酒店，綵樓相對，繡旆相招，掩翳天日”（見同上書）。最繁華的馬行街北去，新封丘門大街，“各有茶坊酒店，勾肆飲食”（《東京夢華錄》卷三《馬行街鋪席》）。

3 因衆多居民日常生活需要而形成的街市

一般“街坊橋市”的形成，更由於衆多的街坊居民的日常生活的需要。唐代晚期長安由於人口增長，居民日常生活的需要，許多坊中已設有小規模的餅店、酒店和食店。如《任氏傳》講到

將天曉時鄭六走到昇平坊(東市以南第三個坊)的里門，門尚未開，“門旁有胡人鬻餅之舍，方張炭熾爐”，這是準備供應坊里居民的早點的。又如唐順宗永貞元年(公元805年)，王伾、王叔文等因皇帝寵幸而掌大權，“於是叔文及其黨十餘家之門，晝夜車馬如市，客候見叔文、伾者，至宿坊中餅肆、酒壚下，一人得千錢乃容之”(《資治通鑑》卷二三六“順宗永貞元年正月”條)。餅肆是賣餅的小店，酒壚是設有溫酒的壚的賣酒小店。由此可見當時長安的許多坊里中，都已有小的餅肆、酒店的開設，以供居民的日常生活的需要。當時皇家爲了娛樂，設有五坊(即鷓坊、鶻坊、鷓坊、鷹坊、狗坊)，服役於五坊的人呼爲“小兒”。“五坊小兒張捕鳥雀於閭里者，皆爲暴橫；以取人錢物，……或相聚飲食於酒食之肆，醉飽而去，賣者或不知，就索其直(值)，多被毆詈”(見同上書)。這也可見當時閭里中已多酒食之肆。又如唐德宗貞元二年(公元786年)因關中糧食缺乏，禁軍很有怨言，“時禁中不釀，命於坊市取酒爲樂”(《資治通鑑》卷二三二“德宗貞元二年三月”條)。這也說明當時長安的坊與市同樣有釀酒和賣酒的店鋪。到北宋東京，這種坊里居民需要的餅店、小酒店更到處開設，“餅店”自五更卓案之聲，遠近相聞”，以供應居民早點需要，同時“坊巷橋市，皆有肉案”(《東京夢華錄》卷四《肉行》和《餅店》)，供應生熟肉。此外也有因特殊需要而發展成街市的，例如沿着汴河的城內外交通要道上，設有許多處堆積米麥等貨的倉庫，“倉前成市”(同書卷一《外諸司》)。

4 新行市和新街市代替舊的封閉式“市”的過程

原有舊的封閉式的“市”的被淘汰，當在北宋中期。東京的裏城原有東西兩市，新建的外城未見有封閉式“市”的設置。東

京的東西兩市，在太祖的建隆、開寶年間，真宗的景德年間，還見於記載，用作行刑的場所^⑩。在古代偏重記載政治事件和政治歷史的史書中，很少講到“市”上交易情況；述及到“市”的往往用作刑場。這不僅是宋代，宋以前講政治歷史的史書中已多如此，因此我們不能依據這些記載來判斷封閉式“市”的消失時間。《東京夢華錄》記載，出裏城梁門，經梁門大街以西的西大街，“西去甕市子，乃開封府刑人之所也”（卷三《大內西右掖門外街巷》）。不知何時把“刑人之所”遷到外城西大街的甕市子的。東京裏城東西兩市的消失，當在北宋中期沿河近橋以及城門口的新“行市”興起和達到一定程度的發展之後，也就是在一定程度滿足都城中衆多居民日用商品的供應以後，這樣原有舊的封閉式“市”中的“行市”就根本不起作用，因而不得不自然淘汰。這中間應該有一個逐漸地新陳代謝的過程^⑪。

北宋東京所發生的這一重大變化，到南宋臨安繼續有進一步的發展。臨安原是北宋的杭州，杭州在北宋時早已發生了變化，沙河塘一帶已較繁華，但是人口密度還不高，“四隅皆空回，人迹不到”，西南多山的丘陵地帶也是“林木茂密，何嘗有人居”（周輝《清波雜志》卷三）。南宋定都臨安，人口急劇增長，新興的沿河近橋和城門外的“行”、“市”就有進一步擴展。臨安許多新興的“行”、“市”，依然是在沿河近橋的空地上興起的，如同東京從汴河堤岸空地上興起一樣。《都城紀勝》“市井”條，講到“路歧人”（街頭藝人）在街頭“作場”的情況，最後說到“其他街市如此空隙地段，多有作場之人，如大瓦肉市、炭橋藥市、橋園亭書房、城東菜市、城北米市。說明這些“市”的所在，正是街市的空隙地段，而且都在沿岸近橋、交通便利之處。肉市在大瓦子，靠近西河（清湖河）的三橋，藥市在炭橋，就是小河（市河）的芳潤橋，

書房在橋園亭，靠近大河（鹽橋運河）的油蠟橋，菜市在城東東青門外的菜市橋、壩子橋以及崇新門外南土門市，米市在西北餘杭門外黑橋頭以及市鎮湖州市等。

南宋臨安新興的行市，運輸量比較大的，大體上都設在城門外沿河近橋地段。除米市、菜市外，柴市設在東南候潮門外柴市橋，布市設在東南便門外橫河頭，鮮魚行設在東南候潮門外和城東東青門外壩子橋，魚行設在餘杭門外水冰橋，養圃設在便門外渾水關頭，蟹行設在崇新門外蔡湖橋。運輸量比較小或需要加工的市，大體上都設在城內沿河近橋地段，除肉市、藥市、書房外，花市及方梳行、銷金行、冠子行在御街中段官巷，珠子行在御街中段融和坊到市西坊，生帛市在大河北段鹽橋，柑子園在御街中段後市街，青果園在候潮門內大街。有些行市既有發售的許多商鋪，又有加工製作的作坊。如肉市的兩街都是“屠宰之家”，花市也有製作各色裝飾用花朵的“花作”，藥市也該有製作熟藥丸散和生藥飲片的作坊，書房更有雕版印刷的作坊。臨安城中原有的封閉式市區早已消失，御街中段有市南坊和市西坊，市西坊“今爲市曹”（《咸淳臨安志》卷十九）。此地可能原爲封閉式“市區”所在，雖已變成爲“坊”，仍保留有“市曹”。

這一重大變化，就是以沿河近橋以及城門外的新行市、新街市，代替原有封閉式的“市”，不僅發生於都城中，而且發生於所有的較大的城市中，具有普遍性。我們再以平江府（即今蘇州）爲例，根據范成大《吳郡志》和《平江圖碑》，位於子城西北、街市中心的樂橋，東南有繡錦坊（大市），東北有干將坊（東市門）、富仁坊（魚行橋東），西北有西市坊（鐵瓶巷）、穀市橋、絲行橋，西南有館娃坊（果子行）、和豐坊（米行）。以上除穀市橋、絲行橋見於《吳郡志》卷十七“橋梁”條以外，其餘都見於卷六“坊市”條。說

明南宋時期的平江府城，原有封閉式的東西兩市和大市早已改變為坊，沿河近橋的新“行”、“市”早已興起，因而有米行在和豐坊，果子行在館娃坊，並有魚行橋、穀市橋、絲行橋、果子行橋等名稱，這就是以新興的沿河近橋“行”、“市”代替了原來封閉式“市”的結果。這個變化的遺迹，雖然保留在南宋的著作和圖碑中，它的實際變化應該早在北宋已經完成。平江原有的東西兩市及大市由於失去作用而改變為坊，這也是當時變化中的一般規律。北宋洛陽的情況基本相同，所有的坊幾乎全部沿用唐代的坊名，只有南市改成樂成坊和通利坊，北市改為鄰德坊和北市坊，西市改為通濟坊（見《元河南志》）。北市的改稱為北市坊，猶如平江的西市坊以及臨安的市西坊、市南坊。南市的改為通利坊，西市的改為通濟坊，依然保留有通商得利的意思在內。

（三） 民間文娛活動的開展和以“勾欄”為中心的“瓦子”的形成

1 秦漢以前都城居民的文娛活動

古代民間羣衆性的娛樂活動，只有在春季社祭和冬季臘祭的時候舉行，社祭是祭祀社神（土地之神）而祈求豐年，臘祭是酬謝鬼神而慶祝豐收。舉行社臘祭祀時，男女齊集，舉行酒會，開展各種娛樂活動，常常“一國之人皆若狂”，孔子解釋說：臘祭是由於百日勤勞而給予“一日之澤”，“一張一弛，文（周文王）武（周武王）之道也”（《禮記·雜記下》）。戰國時代由於商業的發展，繁華的都城中，居民也紛紛開展文娛活動。最著名的，如齊國都城臨淄，“其民無不吹竽、鼓瑟、擊筑、彈琴、鬥雞、走犬、

六博、踰鞠者”(《戰國策·齊策一》)。“鬥雞”是誘使兩隻公雞相鬥的遊戲，“走犬”是驅使獵狗追逐脫兔的遊戲，“六博”是擲彩、下棋、互爭勝負的比賽，“踰鞠”一作“蹴鞠”、“蹋鞠”，是踢球比賽。此外還有弈(圍棋)、投壺、謳歌等娛樂以及弋射、擊劍、角力、舉鼎等鍛煉和比賽。弋射是用細綫繫在箭上，使射中的飛雁連着箭上的長綫從高空掉下。擊劍是在舞劍中講究擊劍的技法。角力一作角抵、角觝，就是後來的相撲或摔跤。舉鼎是舉起銅鼎的舉重比賽。這種文娛活動以及技藝比賽，秦漢以後長期在民間流行；社祭作為民間娛樂活動的節日，也曾長期流行^④。

“角力”很早被稱為“戲”，因為“角力”往往講究“角技”，從“角技”發展為競技表演，擴展成為“角抵奇戲”。後來就稱為“百戲”^④。西漢皇室很愛好“角抵奇戲”，在上林苑中築有平樂觀（一作平樂館）用來表演。漢武帝元封六年（公元前105年）夏，“京師民觀角抵於上林平樂館”（《漢書·武帝紀》）。張衡《西京賦》描寫有“大駕幸乎平樂”，“臨迴望之廣場，逞角觝之妙戲”的情況，既有扛鼎、尋橦（爬上旗竿）、衝狹（衝過插有矛頭的狹巷）、跳丸劍、走索上的競技表演，又有水人弄蛇、易貌分形、吞刀吐火等幻術表演，更有化裝音樂歌舞、馴獸表演等^⑤。其中許多幻術表演是從大秦（即羅馬）經西亞的安息和東南亞的罽國（今緬甸）傳入的，見於《史記·大宛傳》和《後漢書·西南夷傳》等^⑥。這種“角抵奇戲”，曾長期流行，被用於宮廷的慶祝典禮或節日活動中。

2 北魏洛陽居民的文娛活動

隨着佛教的逐漸推廣，許多寺院常常在迎佛賽會中用“角抵

奇戲”來吸引羣衆觀看。例如北魏洛陽的寺院，沿用西域的風氣^②，在每年四月八日釋伽生辰以前舉行“行像”（用車載着佛像出寺巡行）的賽會，他們都用“角抵奇戲”來吸引觀衆。長秋寺每年四月四日“行像”，“辟邪獅子，導引其前；吞刀吐火，騰驤一面；綵（踩）轆上索，詭譎不常；奇伎異服，冠於都市；像停之處，觀者如堵；迭相踐躍，常有死人”（《洛陽伽藍記》卷一）。導引其前的“辟邪獅子”，當是帶頭的化裝舞隊；“吞刀吐火”是幻術表演；“踩轆上索”就是《西京賦》所說的“尋橦”和“走索上”。又如洛陽的宗聖寺，“此像一出，市井皆空；……妙伎雜樂，亞於劉騰（指劉騰創立的長秋寺），城東士女多來此寺觀看也”（同上書卷二）。四月七日京師佛寺的佛像都要會集到景明寺，多到一千多軀，四月八日按次序進入宣陽門，“向閭闔宮前受皇帝散花”，散花是表示對佛致敬，這時“梵樂法音，聒動天地；百戲騰驤，所在駢比”（同上書卷三）。每逢佛教的“六齋”節日（即每月八日、十四日、十五日、二十三日、二十六日、三十日），佛寺又常有音樂歌舞的表演，如洛陽的景樂寺，“常設女樂，歌聲繞梁；舞袖徐轉，絲管寥亮，諧妙入神”。因為這是尼寺，最初禁止男子入內觀看，後來開放，更增加化裝舞蹈和幻術表演^③。這些有盛大的音樂歌舞演出以及“百戲”表演的佛教節日，因而逐漸成爲都城中羣衆性娛樂的節日。

原來都城中只有供皇室及貴族游樂的園林，自從佛教寺院大規模興建後，不少寺院建有園林，常常成爲都城中居民游樂之處。如北魏洛陽的寶光寺，“園中有一海，號咸池，葭菼（一作芙）被岸，菱荷覆水，青松翠竹，羅生其旁，京邑士子，至於良辰美日，休沐告歸，徵友命朋，來游此寺，雷（一作雲）車接軫，羽蓋成陰，或置酒林泉，題詩花圃，折藕浮瓜，以爲興適”（同上書卷四）。

3 唐代長安居民的文娛活動

到了隋唐時代，無論宮廷的“百戲”以及民間的娛樂都有進一步的擴展。隋煬帝大業二年（公元606年）爲了突厥來朝，召集四方“散樂”到東都洛陽。從此每年正月爲了朝見國賓，作大規模的歌舞表演。到十五日，在端門外、建國門內，“綿亘八里列爲戲場，百官起棚夾路，從昏至旦以縱觀，至晦而罷”，參加歌舞表演的近三萬人（《隋書·音樂志》）。表演的是“人戴獸面，男爲女服，倡優雜技，詭狀異形”（《隋書·柳彧傳》）。這樣以大街作爲“戲場”，百官夾路起棚觀看，表演歌舞者近三萬之多的盛會，其規模之大是空前的。這種以大街爲“戲場”的風氣，對唐代有很大的影響。

唐代長安常常在天門街（即朱雀大街）上出現“廣較勝負”的音樂曲藝的比賽。段安節《樂府雜錄》“琵琶”條載：

貞元中，有康崑崙第一手。始遇長安大旱，詔移兩市祈雨。及至天門街，市人廣較勝負，及鬥聲樂。即街東有康崑崙琵琶最上，必謂街西無以敵也，遂請崑崙登綵樓，彈一曲新翻羽調錄要，其街西亦建一樓，東市大誚之。及崑崙度曲，西市樓上出一女，即抱樂器，先云我亦彈此曲，兼移在楓音調中，及下撥，聲如雷，其妙入神。崑崙即驚駭，乃拜請爲師，女即遂更衣出見，乃僧也。蓋西市豪族厚賂莊嚴（寺名）僧善本，以定東市之勝。

這是東西兩市在天門街上琵琶演奏的比賽。比賽時，雙方都起建彩樓，由演奏者登樓彈曲，讓街上觀衆評比勝負。據此可知唐人小說《李娃傳》（白行簡作）所描寫的東西兩凶肆（當是東西兩市的凶肆），各自在肆長主持下，在天門街上陳列辦理喪事所

用器物，召集“士女大和會”，并各使歌者唱哀歌，互爭勝負的情況，是有依據的。

都城中賣藝者的活動，北魏洛陽已經出現，當時已有許多“妙伎”作為“市人”一部份，住在“大市”東南調音、樂律二里；如“善吹箏”的田僧超曾為征西將軍崔延伯所愛重（《洛陽伽藍記》卷四）。到唐代這種民間音樂家仍然作為“市人”一部份，上述的琵琶第一手康崑崙，就是屬於長安東市的。長安東西兩市都已有“雜戲”的表演，既可以把他們召來表演，又可以前往觀看。樂史《楊太真外傳》卷上就曾講到“召兩市雜戲以娛貴妃”。段成式《酉陽雜俎》續集卷四載：

予太和末，因弟生日，觀雜戲。有市人小說，呼扁鵲作“褊鵲”，字上聲。予令座客任道升是正之。市人言：二十年前，嘗於都會說此，有一秀才甚賞某呼扁字與褊同聲，云世人皆誤。

說明這個講“小說”的“市人”，曾到長安說扁鵲的故事；“小說”亦被視為“雜戲”的一種。“觀雜戲”而有“座客”，可知這種演出“雜戲”的戲場上已設有座位，當已有簡單的演戲用的建築物。劉賓客《嘉話錄》中又談到大司徒杜公召賓客閑談，說“致政”以後，必買一小駟，跨之“入市看盤鈴傀儡足矣”。可見當時“市”上表演的“雜戲”還有“盤鈴傀儡”。

唐代長安居民仍然以寺院道觀作為游覽場所。許多寺院道觀，既有名家書畫的布置，又多園林的勝景，更多栽名花，因而常是游人會集之處，也是詩人吟詠的地方。春游常以玩賞牡丹為一大樂趣。“長安貴游尚牡丹三十餘年，每春暮車馬若狂，以不就觀為恥”（《唐國史補》）。長安東南隅，慈恩寺、青龍寺、樂游園、曲江池一帶，是居民經常游覽的風景區。樂游園一作樂游苑，或稱樂游原，漢代已很著名，是京城中最高的地方，可以登高

俯視京城。每逢上巳(三月三日)、重陽(九月九日)游人很多,在此登高觀覽,宴會賦詩,舉行“祓除不祥”的禮俗。曲江池更是著名的勝地,西南的芙蓉園則具有皇家禁苑性質。每逢中和(二月初一)、上巳的節日,游人雲集於此。唐玄宗每逢上巳在此賜宴羣臣,每科新進士也於此宴集同年,稱為“曲江宴”。慈恩寺位於晉昌坊東部,其中大雁塔為游人登臨賦詩之處,每年新進士有“雁塔題名”的活動。青龍寺位於新昌坊南門之東,占有十字街東南一角,北門樓更是登高瞭望之所。該寺屬於佛教密宗流派,惠果和尚曾把這一宗派傳授給日本僧人空海。正因為慈恩、青龍兩寺游人最多,帶有集市性質,所以成為“戲場”集中之地。

北魏洛陽的寺院,只是在“行像”的節日表演音樂和百戲,或者在“六齋”的節日表演音樂和歌舞,以吸引觀眾。而唐代長安的著名寺院更進一步,經常設有表演歌舞和百戲的“戲場”。宋初錢易《南部新書》卷戊說:

長安戲場多集於慈恩,小者青龍,其次薦福、永壽。

當時慈恩寺的戲場對觀眾很有吸收力。唐宣宗大中二年(公元848年)十一月,萬壽公主嫁給起居郎鄭顥,顥的弟弟鄭顥得有危疾,宣宗派人去望病,問:“公主何在?”答:“在慈恩寺看戲場。”宣宗為此指責公主說:“豈有小郎病,不往省視,乃觀戲乎?”因而“遣歸鄭氏”(張固《幽閒鼓吹》、《資治通鑑》卷二四八)。據此可見,慈恩寺戲場的演出吸引的觀眾很多,連公主也被吸引住,不去探望病人了。

從《南部新書》所說“長安戲場多集於慈恩”看來,當時許多“戲場”是帶有流動性的,因為慈恩寺游人衆多,“戲場”都會集到那裏,這些“戲場”當設在寺院的空地上。前面已經談到,隋煬

帝大業年間爲了招待國賓，把宮城前大街八里列爲戲場，百官起棚夾路觀看；唐代長安又允許在朱雀大街上建造綵樓，登樓表演音樂曲藝，“廣較勝負”。“戲場”不限於“市”內的廣場上，還可以設到寺院的場地上，甚至街道的空地上。我們認爲，北宋以“勾欄”爲中心的“瓦子”，就是由於在街頭的空地上設置“戲場”而形成的。

4 宋代以“勾欄”爲中心的“瓦子”的形成

瓦子，或者稱爲瓦舍、瓦肆、瓦市。爲什麼稱爲“瓦”？《都城紀勝》“瓦舍衆伎”條說：“瓦者，野合易散之意也”。《夢梁錄》卷十九《瓦舍》也說：“瓦舍者，謂其來時瓦合，去時瓦解之義，易聚易散也。”瓦子或瓦市，原是臨時集市的意思。因爲這種集市常以演戲的“勾欄”爲中心，習慣上也就把以“勾欄”爲中心的集市稱爲瓦子或瓦市。不僅北宋東京最大的桑家瓦子是這樣，“瓦中多有貨藥、賣卦、喝故衣、探搏、飲食、剃剪、紙畫、令曲之類”，南宋臨安所有的瓦子都是如此，有的除飲食店等以外，還設有酒樓、茶坊。但是，也有些集市稱“瓦市”而沒有演戲的“勾欄”。例如說：“東京相國寺乃瓦市也”（王楙《燕翼詒謀錄》卷二“東京相國寺”條），相國寺的集市中并無“勾欄”在內。又如樓鑰《北行日錄》卷上，講到金代南京（即北宋東京舊址）原都亭驛“西偏已廢爲瓦市矣”（“乾道五年十二月九日”條）。這樣廢棄而成爲瓦市，亦是臨時集市性質，未必有演戲的“勾欄”。這樣用來泛指一般的臨時集市，是“瓦市”的原意。

“勾欄”原是欄柵或欄桿的意思。瓦子中演戲用的“勾欄”，原是指臨時集市上用欄柵和繩子圍起來的演出場地。如同我們前面講到的，牛行、馬行和果子行原設在沒有拘欄的空地上，官府強

制他們加以拘欄，并按占地多少抽稅，稱為“拘欄牛馬、果子行”。同樣地，街頭藝人原在街頭沒有拘欄的空地上演出，後來用作比較固定的演出場所，就需要用欄柵和繩子圈圍起來，因而稱為“勾欄”。至於演出用的建築也是用簡便材料很快地搭成的，所以又稱為“棚”。

唐代以大衆為對象的戲場，或者設在“市”內空地上，或者設在街頭的空地上，或者設在寺院的空地上，都是臨時的，沒有專門用來演出的建築。自從北宋出現以勾欄或棚為中心的瓦市，固定的專為羣衆演出的戲場才開始出現，使得城市中居民的娛樂生活大為活躍起來，也使得民間文藝的創作大為繁榮起來，大大促進了戲曲和各種技藝表演的發展。雖然如此，直到南宋臨安，稱為“路歧人”的街頭藝人還大量存在，他們的演出場所還是“路歧”，就是在街市的空隙地段。

-
- ① 《蘇東坡奏議集》卷十《元祐六年十一月奏淮南開糴狀》談到“見今在市絕少斛計，米價翔貴”，并講到潁州的斛斗行人。《東京夢華錄》卷三《般載雜貨》說：“斛計則用布袋駝之。”斛計即指米麥，斛斗行或斛計行當即指米麥行。《續資治通鑑長編》卷二四六“熙寧六年八月己丑”條，談到“據米麥等行狀，歲供稌蕎麥等萬石，皆有賠費。”
- ② 行頭，見賈公彥《周禮注疏》卷十五“地官、肆長”條，《太平廣記》卷一五七“李君”條（採自《逸史》）。行首，見《太平廣記》卷二八〇“劉景復”條（採自《纂異記》）。行人，見《舊唐書·食貨志下》載唐德宗建中元年七月敕。肆長，見《太平廣記》卷四八四“李娃傳”條（採自《異聞集》）。
- ③ 《唐六典》卷二十講到市署職掌，“以三賈均市”。《新唐書·百官志》談到每十日價格帳簿的製作。

- ④ 邸店或稱邸舍、邸閣，東晉南朝已有，隋唐漸有發展。既供堆積商品，又兼招待客商住宿，以及說合買賣，具有行棧性質。日本加藤繁《唐宋時代的倉庫》（收入《中國經濟史考證》）論及這點，有吳傑譯本，商務印書館1959年9月出版。
- ⑤ 梁思成《中國建築史》（高等學校交流講義）認為“顯德二年增修汴城兩詔，寓於市政設計觀念，極堪注重”（第71頁，1955年2月油印本）。又說：“城市設計，後周世宗之築大梁，實為帝王建都之具有遠大眼光者。其所注意之點，如泥濘之患、火燭之憂、易生疫疾、寒溫之苦，皆近代都市設計之主要問題，其街有定闊兩邊五步內種樹掘井，修蓋涼棚，皆為近代之方法。”（同上油印本第122頁）
- ⑥ 梁思成《中國建築史》已見到這點。他說：“顯德三年春，乃詔發民夫大舉築汴京外城。此後各地寺院亦有顯德重修之事，蓋已漸入建設時期。東京繁榮尤因疏濬汴河，再通淮南，經濟上發展之故。官方營建之外，又產生市坊商業建築，如邸店之屬，以廊屋或巨樓以儲貨物。……時人稱此為十三間樓子，其雄大之姿，當非尋常市樓所可及。迄宣和之世，此樓猶見於《東京夢華錄》記載。周景既為應詔者之一，沿汴兩岸當尚有商賈屋樓之產生。至趙宋定基之時，東京都會規模固已壯盛，交通漕運尤便，不再遷洛之故，或亦在此。”
- ⑦ 日本加藤繁《唐宋時代的市》的《宋代的市(上)》，曾引用這條史料，他認為“這裏所謂汴河堤岸司及京城所（修完京城所之路）的房廊，就是上引麵市房屋和《長編》卷三五八元豐八年七月庚戌條所載沿汴官司的牛馬、果子行等諸行市的建築物而言”。我們認為宋代所說“房廊”，指租給流寓之人的房屋，包括租給客商的房屋在內。當時官僚、商人亦有建築“房廊”出租的。《宋會要輯稿》刑法二、禁約上，“大觀元年八月十二日條”載：“詔在京有房廊屋業之家，近來多以翻修為名，增添房錢，往往過倍，日來尤盛，使編戶細民難以出辦。”宋的外諸司有樓店務，掌州縣房廊課利。房廊

包括租給客商的房屋在內。

- ⑧ 李元弼《作邑自箴》卷三《處事》：“買賣牛馬之類，所在鄉儀，過却定錢，便付買主牛畜口，約試水草三兩日，方立契券。若有疾病，已過所約日限，賣主不服，却煩官方與奪。今有已交價錢，未立契券，已立契券，未還價錢，蓋不知律有正條（條在雜律內）。須錄全條，曉示牛馬牙人並諸鄉村，知委免興詞訟。”宋代《雜律》的規定，當是沿襲唐律的《雜律》。
- ⑨ 《東京夢華錄》卷三《朱雀門外街巷》談到南薰門說：“其門尋常士庶殯葬車輿皆不得經由此門而出，謂正與大內相對。唯民間所宰豬，須從此入京，每日至晚，每羣萬數，止數十人驅逐，無有亂行者。”據此可知大規模的宰豬的肉市必在南薰門內。同條又講到：“其御街東，朱雀門外，西通新門瓦子，以南殺豬巷，亦妓館。”這個殺豬巷當是原來的肉市所在，後來遷走而成爲妓館會集之地。
- ⑩ 《夢梁錄》卷十三《鋪席》，講到“太廟前尹家文字鋪”，所說尹家文字鋪即是尹家書籍鋪或經籍鋪尹家。這家書鋪曾刊行《北戶錄》（三卷）、《釣磯立談》（一卷）、《灑水燕談錄》（十卷）、《曲洧舊聞》（十卷）、《續幽怪錄》（四卷）、《茅亭客話》（十卷），題記都稱“臨安府太廟前尹家書籍鋪刊行”。《篋中集》（一卷）題記作“臨安府太廟前大街尹家書籍鋪刊行”，《卻掃編》（三卷）題記作“臨安府尹家書籍鋪刊行”，《述異記》（二卷）題記作“臨安府太廟前經籍鋪尹家刊行”。見王國維《兩浙古刊本考》卷上。東京所以有“文字行”，因爲這是宋代四大雕版印刷業的中心之一。南宋臨安也有這種行市，稱爲書房或文籍書房，因爲杭州的印刷業同樣發達。
- ⑪ 見《續資治通鑑長編》卷二“建隆二年四月壬寅”條，卷三“建隆三年秋七月乙亥”條，卷十四“開寶六年二月丙戌”條、卷五十九“景德二年四月丙戌”條，卷六十“景德二年六月己丑”條。
- ⑫ 日本加藤繁《宋代都市的發展》、《唐宋時代的市》、《論唐宋時代商業組織“行”並及清代的會館》等論文（收入《中國經濟史考

證》，對於封閉式的“市”制的崩潰和同行業的組織“行”、“市”的興起，作了詳細的考證和探討，對這方面的研究有開創之功，成績是巨大的。但是他的結論還可商討。他認為，“街市”的出現，交通便利地點“行市”的興起，都在封閉式的坊制和市制崩潰以後。我的看法正好相反，認為這中間應該有一個逐漸地新陳代謝的過程。同業商人組織“行”在唐代東西兩市中已經存在，交通便利地點興起日用品的新“行市”，是適應衆多居民生活上的需要，“街市”和“坊巷橋市”也是在這個基礎上發展起來的。如果沒有交通便利地點新行市的興起以及“街市”的形成，是不可能代替封閉式的“市”而使它淘汰的。

- ⑬ 參看拙作《戰國史》第十二章第四節《娛樂活動和武藝、體育鍛煉的開展》。
- ⑭ 春秋末年已稱“角力”為“戲”。《國語·晉語九》載：“少室周為趙簡子右，聞牛談有力，請與之戲，弗勝，致右焉。”韋昭注：“戲，角力也。”《莊子·人間世篇》說：“且以巧鬥力者，始於陽，常卒於陰，泰至則多奇巧。”“角力”進而為“角技”，再進一步就成為競技表演，并擴展成為“角抵奇戲”，後來就稱為“百戲”。王國維《宋元戲曲考》說：“按角抵者，應劭曰：‘角者，角技也。抵者，相抵觸也。’文穎曰：‘名此樂為角抵者，兩兩相當，角力、角技藝射御，故名角抵，蓋雜技樂也。’是角抵以角技為義，故所包頗廣，後世所謂百戲者也。”
- ⑮ 張衡《西京賦》載：“烏獲扛鼎，都盧尋橦，衝狹燕濯，胸突銛鋒，跳丸劍之揮霍，走索上而相逢。”關於“尋橦”，李善注引《漢書音義》以“體輕善緣”解釋“巴俞都盧”，可見“尋橦”是爬上長旗竿。關於“衝狹燕濯”，李善注：“卷簾席，以矛插其中，伎兒以身投，從中過。燕濯，以盤水置前，坐其後，踴身張手跳前，以足偶節，踰水復却坐，如燕之浴也。”“胸突銛鋒”是說以胸衝突鋒利的鋒刃。“走索上而相逢”，李善注：“索上，長繩繫兩頭於梁，舉其中央，兩人各

從一頭上，交相度，所謂儼絕者也。”烏獲是戰國時秦的大力士，此處借作大力士的通稱，都盧是南洋地名，即《漢書·地理志》夫甘都盧國，以“身輕善緣”著稱。以上都是競技表演節目，長期流行到後世。《西京賦》說：“海鱗變而成龍，狀婉婉以蜃蜃；含利颯颯，化爲仙車；驪駕四鹿，芝蓋九葩；蟾蜍與龜，水人弄蛇；奇幻儼忽，易貌分形；吞刀吐火，雲霧杳冥。”李善注：“海鱗，大魚也。”“含利，獸名。”“驪，猶羅列駢駕之也。以芝爲蓋，蓋有九葩之采。”“作千歲蟾蜍及千歲龜，行舞於前也。”所謂“易貌分形”，即《後漢書·西南夷傳》所說“自支解、易牛馬頭”之類。以上是幻術表演節目。《西京賦》說：“總會仙唱，戲豹舞羆，白虎鼓瑟，蒼龍吹簫，女娥坐而長歌，聲清暢而姦蛇；洪涯立而指麾，被毛羽之襪襪。”李善注：“仙倡，僞作假形，謂如神也。羆豹熊虎，皆爲假頭也。洪涯，三皇時伎人。”以上是化裝戴獸頭的音樂歌舞。《西京賦》說：“巨獸百尋，是爲曼延；神山崔巍，欻從背見；熊虎升而挈攬，獫狁超而高援；怪獸陸梁，大雀凌跖；白象行孕，垂鼻憐困。”李善注：“作大獸，長八十丈，所謂蛇龍曼延也。”以上是馴獸表演。《漢書·西域傳贊》謂漢武帝時“作巴、俞、都盧、海中、碣極、漫衍、魚龍、角抵之戲”。

- ⑩ 《史記·大宛列傳》載武帝時安息“以大鳥卵及黎軒眩人獻於漢（“眩人”上原衍“善”字，從王念孫校刪），……於是大殼（角）抵，出奇戲諸怪物，……及加其眩者之工，而殼（角）抵奇戲歲增變，其盛益興自此始。”又見於《漢書·西域傳》及《張騫傳》等。黎軒或作犁斬，《史記索隱》：“韋昭云：（眩人），變化惑人也。按《魏略》云：犁斬多奇幻、口中吐火，自縛自解，小顏亦以爲植瓜等也。”《史記正義》：“加其眩者之工，言漢人幻人工妙，更加於犁軒。”《漢書·張騫傳》顏注：“眩，讀與幻同。即今吞刀吐火、植瓜種樹、屠人截馬之類皆是也。本從西域來。”《後漢書·西域傳》亦載：“（安帝）永寧元年罽賓王雍由調，復遣使者詣闕朝貢，獻樂及幻人，能變化

吐火，自支解，易牛馬頭；又善跳丸，數乃至千。自言我海西人也，海西即大秦也。”

- ⑰ 例如于闐國從四月一日開始，用四輪像車“行像”，到十四日才完畢。“行像”時，國王要迎接，并散花燒香表示敬意。見《法顯傳》。
- ⑱ 《洛陽伽藍記》卷一“景樂寺”條說：“後汝南王悅復修之，悅是文獻（王）之弟，召諸音樂，逞伎寺內。奇禽怪獸，舞抃殿庭；飛空幻惑，世所未覩；總萃其中，剝驢投井，植棗種瓜，須臾之間皆得食。士女觀者，回亂睛迷。”《太平御覽》第七三七引孔偉《七引》：“弄幻之時，因時而作，殖瓜種菜，立起尋尺，投芳送臭，賣黃售白。”所說的都是幻術表演。直到北魏時，這種“百戲”依然沿襲漢、晉之舊。《魏書·樂志》記天興六年冬，“詔太樂總章鼓吹，增修雜伎，造五兵、角觥、麒麟、鳳凰、仙人、長蛇、白象、白虎及諸異獸，魚龍、辟邪、鹿馬、仙車、高鉦、百尺、長繩、緣橦、跳丸、五案，以備百戲，大饗設之於殿庭，如漢、晉之舊也。”

三 北宋東京的新結構和新街市

(一) 後周擴建東京外城的新規劃和 北宋的繼續發展

北宋定都東京(今河南開封)，繼續沿用五代末年後周重新擴建的這個都城，是由於新的政治和經濟發展形勢所造成的。隋唐建都長安，政治軍事中心在關中地區，而生活資源却依賴南方江淮地區供應。雖然修通了大運河，但漕運要經過三門峽，困難很多，為此常在汴、洛之間設倉貯存糧食，並以洛陽為東都，皇帝也常住到東都。唐高宗和武則天住在洛陽的時間就很長。中唐以後，中原因連年戰亂而殘破，江南經濟却繼續得到增長，以致中原的生活資源更加仰給於南方。同時北宋加強中央集權，京師駐屯重兵多達數十萬，每年需要漕運江淮米從三百萬石增漲到七百萬石^①；加上京城人口日益增加，多達百萬，所有生活資源也都必須從南方經汴水運來。因此只有這個處於中原水道運輸中心的東京，才適合作為這種新形勢下的都城。

前面講新的行市形成過程時已經談到，後周世宗在東京擴建的外城，比原來的裏城擴大了四倍，並且適應新形勢的需要，作出了新的設計和規劃。這對以後東京的發展是有重大貢獻的。

1 後周在東京開創的新街道制度

後周世宗在擴建外城的同時，還曾擴展和拉直裏城原有的

街道。“先是大梁城中（按指裏城）民侵街衢爲舍，通大車者蓋寡。上命直而廣之，廣者至三十步，又遷墳墓於標外。上曰：‘近唐京城，於存歿擾動誠多，怨謗之語，朕自當之，他日終爲人利。’”（《資治通鑑》卷二九二“後周顯德二年十一月”條）說明當時裏城居民侵街爲舍，已很嚴重，街道很狹，連大車都通不過，這時由政府強制拆遷，才把街道拉直開闊。所謂“廣者至三十步”，是說其中開得寬闊的到三十步，說明還有許多街道寬度在三十步以下。因爲這是個舊城，居民侵街爲舍的時間已較長，街道兩邊都有居民侵佔街道所建住宅，不可能全部拆除，只能部分的拆遷，略爲把街道拉直開闊。既然街道兩邊多有居民住戶，說明封閉式的坊制已經破壞，就是說在原有的封閉式的“坊”以外，沿着街道兩旁都已住滿居民了。

至於後周世宗所擴建的大於裏城四倍的外城，完全是個新城，是按新的規劃而設計建築的。新計劃規定“今後凡有營葬及興窰竈并草市，并須去標幟七里外。其標幟內，候官中擘畫，定街巷、軍營、倉場、諸司公廡院務了，即任百姓營造”（《冊府元龜》卷一四《帝王部·都邑》，《五代會要》卷二六《城郭》大體相同）。就是說，在標幟以外，七里之內，不準埋葬和設置窰竈，並不準設“草市”。這是爲了保持新建城市外圍地面的整潔，并留有發展餘地。至於標幟以內，即外城以內，由官府作出規劃，分割好街巷、軍營、倉場和官署所佔地段，“即任百姓營造。”值得注意的是，沒有像唐代長安造外郭城那樣修建整齊排列的“坊”，只分割好街巷就“即任百姓營造”。顯德三年六月癸亥詔，又講到“近者開廣都邑，展引街坊，雖然暫勞，終獲大利。……其京城內，街道闊五十步者，許兩邊人戶，各於五步內，取便種樹掘井，修蓋涼棚；其三十步以下至二十五步者，各與三步，其次有差”（《冊府元

龍》卷一四《帝王部·都邑》，《五代會要》卷二六《街巷》）。這是一個很好的街道的設計規劃。

這裏明確規定，允許街道兩邊各住人戶，而且允許兩邊人戶各自佔有街道寬度十分之一的面積，用來種樹、掘井和修蓋涼棚。這種沿街的居民，當然是當街開門的，就是在門前種樹、掘井和修蓋涼棚。這顯然是一種新創的街道制度。原來唐以前封閉式的坊制和市制，坊中居民和市中商店都不準向街開門，只有高官府第或特賜的府第才能當街開門，因此街道兩邊全是坊牆或市牆，只有坊門和市門直通街道。這時不但街道兩旁允許建築住戶，並且都當街開門，門前還可佔有街道寬度十分之一，用來種樹、掘井、修蓋涼棚，這種新創的街道制度，該是適應裏城街道上已經出現的具體情況，而防止居民將來再發生“侵街”的行為；同時可以調動街道兩旁居民的積極性，種樹和掘井，使街道綠化而便於用水，並用作街道旁邊的標記。估計在推行這新的街道制度的同時，已經出現了新的“街坊”體制，大量居民住的“坊”應該即設置在這種兩旁有住戶的街道的內側，街道兩旁有“巷”作為坊的通道，以便坊內居民進出街道。因此規劃擴建的這個全新的外城，既可以說劃定“街巷”，又可以說“展引街坊”。當時已經流行“街巷”這個名詞，曾任後周右僕射的王溥，寫成於北宋初年的《五代會要》，卷二六就有“街巷”條目。這種“街巷”的佈局，對此後城市制度的發生有重大影響^②。

2 後周和北宋特許的臨街市建邸店樓閣的規定

前面我們已經談到，後周世宗擴建外城的目的之一，就是解決“坊市之中、邸店有限”的困難，以適應“工商外至、絡繹無窮”的需要。因此他在大瀋汴口之後，准許“京城民環汴栽榆柳、起

臺榭，以爲都會之壯”，或者說“許京城民居起樓閣。”大將軍周景威首先沿汴建造十三間樓作爲接待客商邸店，得到了世宗的嘉獎。這種准許居民沿汴造樓閣臺榭的辦法，就是他在顯德二年擴建外城的詔書中所說“候官中擘畫，定街巷……”之後“即任百姓營造”的進一步的措施。他這樣獎勵在沿汴興建樓閣臺榭，一方面是增加接待客商的“邸店”，以便於客商大量運進日用物資，適應衆多居民的日常生活需要；另一方面又是爲了增加都城的壯觀。沿汴河既然可以如此，沿街道當然也可以照此辦理。看來北宋東京就沿用這種制度，准許居民沿汴河和沿街道建造邸店和樓閣。按照當時法定的禮制，士庶之家建築房屋，所用的結構規格是有一定的等級的限制的，不是隨便可以建築樓閣臺榭的。但是爲了都城的壯觀，在特許的情況下，就可以超過禮制的規定。宋仁宗景祐三年（公元1036年）八月三日下詔：“天下士庶之家，凡屋宇非邸店樓閣臨街市之處，毋得爲四鋪作、闌闌八；非官品，毋得起門屋；非官室寺觀，毋得綵繪棟宇及間朱黑漆梁柱窗牖，雕鏤柱礎”（《宋會要輯稿》輿服，臣庶服）。這裏規定，士庶之家所造屋宇，如果不是邸店和樓閣而臨街市的，就不准用“四鋪作”和“闌闌八”的結構和裝飾。“鋪作”是指支撐屋頂的木結構的斗拱，“闌八”又稱“藻井”，是指一種格子天花板^③。也就是說，如果是臨街市的邸店和樓閣就沒有這種限制。這就是爲了都城的壯觀，鼓勵建築臨街市的邸店和樓閣而採取的寬容政策。

北宋東京沿街設立有許多酒樓，酒樓門首皆有“綵樓歡門”，同時掛有梘子燈，排設有紅綠杈子。直到南宋臨安還沿用這種風俗。原來杈子是官衙前用來限制行人的設施，紅綠杈子是設在宮城的正門前以限制行人的，爲什麼能夠使用於酒樓門口呢？據說也還是沿用五代後周的風習。《都城紀勝》“酒肆”條說：“酒

家事物，門設紅杈子、緋綠簾、貼金紅紗梘子燈之類，舊傳因五代郭高祖游幸汴京潘樓，至今成俗。”《夢梁錄》卷十六《酒肆》也說：“如酒肆門首，排設杈子及梘子燈等，蓋因五代時郭高祖游幸汴京，茶樓酒肆俱如此裝飾，故至今店家仿效成俗也。”如此看來，東京宮城東南角的潘樓街上的潘樓酒店，後周時已經存在，因郭高祖往游，門口排設杈子，此後相沿成爲所有酒樓的習俗，一直沿用到南宋臨安。這一南宋人相傳的說法，當有事實根據，否則對這一特殊風俗就難以理解。

我們應該肯定後周世宗爲適應新的發展形勢，所制定的建東京外城的新規劃，對革新都城制度作出了重大貢獻。因爲這一新規劃，突破了原來封閉式市制的限制，擺脫了封閉式坊制的束縛，創立了沿街兩邊居民當街開門并種樹掘井的新的街道制度，同時又疏通汴河，使南方運來的日用物資通暢，并獎勵居民沿汴河興建邸店、樓閣以接待客商的措施；更爲了都城的壯觀，允許超越傳統禮制的規定，準許居民修建樓閣臺榭。這個新規劃的東京外城，使都城制度發生了重大的變革，對東京此後的發展十分有利。正如世宗自己所說的：“雖然暫勞，久成大利。”可惜這個新的外城建成不久，他即因病去世了。但是由於新形勢的需要，北宋初期依然沿用這種新政策，由汴河堤岸司和修完京城司建造“房廊”租給客商，這種“房廊”同樣具有“邸店”性質，用作客商堆貨、寓居并進行交易的行棧。隨着經營各種日用物資的商人“行”的組織的發展成長，沿汴河堤岸的空地出現了各種日用商品的新“行”、“市”。到北宋中期這些新“行”、“市”，由臨時的或定期的集市性質，發展爲經常接待客商運來商品并批發給城內外另售商鋪的“行市”，如斛斛行（即米麥行）、麵行、肉行、菜行、魚行、果子行、大貨行、小貨行、馬行、牛行、金銀行、藥行、

醫行以及文字行(即書籍行)等。由於日用商品的新行市紛紛興起,還由於衆多居民社會交際和娛樂的需要,街道上酒樓、茶坊的紛紛開設,更由於住於街坊衆多居民日常生活的需要,街坊橋頭的飲食店、日用品商店的紛紛設置,逐漸形成以一種或多種新行市爲中心的街市,或者逐漸形成以酒樓、茶坊、飲食店爲中心的街市,或者形成小規模的“街坊橋市”,甚至出現以橋爲基地的“市橋”。關於這些方面,我們已在前一章詳細討論到。

3 北宋東京一度恢復街鼓制度和對“侵街”的處理

自從後周在東京推行新的街道制度以後,街道和“坊”都發生了變化。街道兩邊有向街開門的居民,在街道住戶的內側又有“坊”,住有大量的居民。街道兩旁有“巷”作爲“坊”的通道,因而“坊”又常被通稱爲“巷”。宋太宗至道元年(公元995年)十一月,因爲城內外一百二十一個坊名,“多涉俚俗之言”,命令張洎改換美名(《宋會要輯稿》方域一,東京雜錄);也就是“命張公洎制坊名,列牌於樓上”。所謂“列牌於樓上”,就是把坊名的牌掛到坊門的樓上;同時“按唐馬周始建議,置冬冬鼓”(宋敏求《春明退朝錄》卷上),也就是按唐代長安的街鼓制度,早晚擊鼓把坊門按時啓閉。這種街鼓制度,後來一度不執行,到宋真宗咸平五年(公元1002年)又恢復。這年二月因爲街巷狹隘,命右侍禁閣門祇候(官名)謝德權開廣。謝德權受命後,先拆毀貴要的邸舍(即邸店),一時議論紛紛,真宗下詔制止,謝德權因此當面請求說:“今沮事者皆權豪耳,吝屋室僦資耳,非有它也,臣死不敢奉詔。”說明這時侵街建屋的,主要是權豪,爲了造“邸店”收取租費。真宗不得已而許允請求,“德權因條上衢巷廣袤及禁鼓昏曉之制,皆復長安舊制,乃詔開封府街司,約遠近,置籍立表,令民自

今無得侵佔”（《續資治通鑑長編》卷五一“咸平五年二月戊辰”條、《宋史·謝德權傳》）。這次謝德權直接受命於真宗，并得到真宗許允先從權豪下手，因而做得特別認真周到，規定了街和巷的寬度，登記簿籍，樹立表柱，作為定制，不准侵佔街巷，並且恢復了長安街鼓制度。這裏所以要規定街和巷的寬度，就是不准街上的居民侵街，坊內的居民侵巷。但是我們必須指出，這時的街鼓制度，所起的作用已不大，因為街道的制度已發生變化。原來長安的街鼓制度，在日落街鼓打動以後，坊門關閉，街上就斷絕行人，實行戒嚴。而這時街道兩旁住有衆多的居民，擊鼓後坊巷之門關閉，只能限制坊內居民的行動，不能禁止向街開門的衆多居民的自由活動。因此名為街鼓，實際上已經不能用來指揮管理街道，就不免流於形式。儘管用政府法令來定為制度，也不可能維持很久。所以宋敏求在熙寧三年到七年間（公元1070—1074年）所著《春明退朝錄》中說：“二紀（即二十四年）以來不聞街鼓之聲，金吾之職廢矣。”可知宋仁宗中期以後，慶曆、皇祐年間已聽不到街鼓聲了。而且，只管理限制坊內居民的行動，而放任街道居民的行動，既不合理，也作用不大。封閉式的坊制也就不能不廢掉了。看來後周世宗推行這種新的街道制度時，早已不用街鼓制度。北宋初年東京夜市已很興盛，宋太祖乾德三年（公元965年）已下令開封府：“京城夜市至三鼓以來，不得禁止”（《宋會要輯稿》食貨六七之一），既然不禁夜市，街鼓早已無用。宋太宗的重新採用長安舊制，宋真宗的再度恢復長安舊制，都不過是這種制度的回光返照而已④。

從後周到北宋，東京推行這種新的街道制度，允許兩邊居民向街開門，并規定門前可以用一定面積的街道種樹、掘井和修蓋涼棚，樹和井可以用作街道的標記，用來防止住戶侵佔街

道。但是隨着街市的興起，商人沿街開設商店，權豪沿街建造“邸店”出租，侵街的不法行爲還是會不斷擴展。但是這時的侵街，已和五代以前、中唐以後的侵街不同。中唐以後的侵街，是“坊”中居民突破坊牆，侵佔街道造屋；這時的侵街，是沿街所住居民或店主侵佔街道，擴大建築面積。唐代官府對於侵街而修建房屋，很容易分辨而拆除，因爲有明確的防牆爲界綫。宋時官府對待侵街的事件就比較難辦，就必須規定好街道的寬度，樹立表柱，如果發現超出表柱者，即作爲侵街而拆除。上述宋真宗咸平五年謝德權提出的辦法就是這樣。宋仁宗天聖二年（公元1024年）六月“限一歲，依原立表木毀拆”（《續資治通鑑長編》卷一〇二“天聖二年六月己未”條）；宋仁宗景祐元年（公元1034年）由開封知府王博文“制表木按籍，命左右判官分撤之，月餘畢”（《宋史·王博文傳》），都是採用同樣的辦法。這時拆除侵街房屋的目的，已與維持封閉式的坊制無關，只是爲了維持街道一定寬度而已^⑤。

（二） 北宋東京的新結構和新佈局

北宋建都的東京，雖然原是唐代的州城，經過後周制定擴建外城的新規劃，整個都城的結構和佈局發生了新變化，成爲一種新的都城體制，對此後都城的建設產生了重大影響。

1 三重方城的新結構

自從後周在原有州城外圍擴建了四倍大的外城，東京就有三重城圈的結構，即宮城、裏城和外城。裏城在外城的中央，宮城又在裏城的中央而略偏西北，這與唐代長安宮城設在外郭城

的北部正中，是不同的。

宮城亦稱皇城，即是大內，周門五里，原爲唐代節度使治所。五代時後梁建都於此，稱爲建昌宮；後唐建都洛陽，又恢復爲節度使治所；後晉又建都，改稱大寧宮。宋太祖曾開拓皇城東北隅，命有司按洛陽宮殿圖樣增修，以南面正中的宣德門爲正門，亦稱宣德樓，共有五個門道。門都金釘朱漆，壁上磚石都雕刻龍鳳飛雲之狀，門頂雕畫棟，覆蓋琉璃瓦，門前有相對的闕亭。正因爲宮城在整個城的中心，四面有城門。除南面宣德門外，東面東華門，西面西華門，北面拱宸門。宮城四角都建有高數十丈的角樓。宮城建有角樓，是從北宋東京開創的。

裏城亦稱闕城，又稱舊城，即唐代汴州城，周圍20里155步，南面和北面都是三座城門。南面正中朱雀門是正門，直對皇城的宣德門；東爲保康門，西爲崇明門（即新門）。北面正中爲景龍門（即舊酸棗門），東爲安遠門（即舊封丘門，西爲天波門（即金水門）。東面二門，北是望春門（即舊曹門），南是麗景門（即舊宋門）。西面二門，北是固德門（即梁門），南是宣秋門（即舊鄭門）。此外還有二個角門，東角子門在東面麗景門南的汴河南岸，西角子門在西面宣秋門南的汴河北岸。

外城亦稱羅城，又稱新城，爲後周世宗所擴建，周圍48里230步（一作223步），宋神宗時擴展到50里165步，并在外城的城牆上建設敵樓，城門加築上圓下削的壁壘，即所謂甕城。外城有十六座城門。南面三門，正中南薰門是正門，直對裏城的朱雀門，東爲宣化門（即蔡州門），西爲安上門（即戴樓門），東面四門，北爲含輝門（即新曹門），中爲朝陽門（即新宋門），南爲通津門和上善門（在東水門的北岸和南岸）。西面五門，北爲金耀門（即固子門），中爲開遠門（即萬勝門），其次爲宣澤門和大通門（在西水

門的北岸和南岸)，南為順天門(即新鄭門)。北面四門，東為景陽門(即陳橋門)，次東是永泰門(即新封丘門)，中為通天門(即新酸棗門)^⑥，西為安肅門(即衛州門)。這些外城城門，除正名外，大都有俗稱，都是以附近交通聯繫的地點為名，如陳州門、曹門、宋門、鄭門、封丘門、酸棗門、衛州門，就是指通往陳州(今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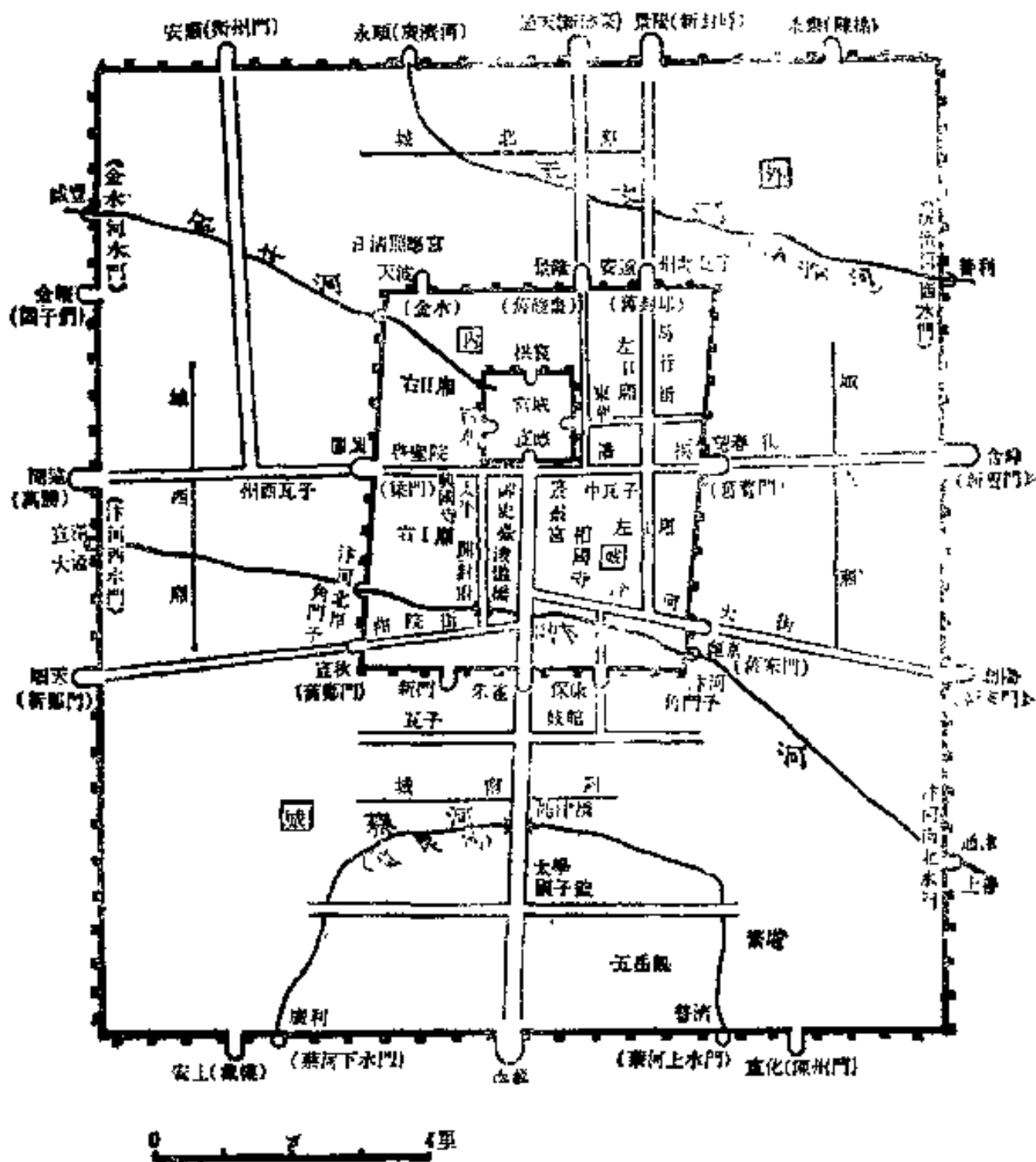


圖54 北宋東京(開封)復原示意圖

(採自日本梅原郁《宋代開封與都市制度》，《鷹陵史學》3、4期合刊，1977

年7月出版)

南淮陽)、曹州(今山東荷澤南)、宋州(今河南商丘)、鄭州(今河南鄭州)、封丘(今河南封丘)、酸棗(今河南延津)、衛州(今河南汲縣)、萬勝門指通往萬勝鎮(今河南中牟東北)、陳橋門指通往陳橋鎮(今河南封丘縣陳橋)(參見圖54)。

2 四條河流的對外疏通

東京有四條河流經城內，城南有蔡河，東北有五丈河，西北有金水河，汴河則由東向西而橫穿城中。它們都是東京日用物資來源的生命綫，其中汴河尤為重要。

汴河從外城東南角東水門進城，向西北行，經相國寺橋、州橋一直西行，經外城西面西水門出城。這是東南地區漕運和日用物資運輸進京的主要交通綫。蔡河和五丈河的漕運年額，都不過汴河的十分之一。北宋初期每年疏通汴河，并常在河口調節水位高低，“止深六尺，以通行載重為準”(《汴京遺跡志》卷六)。河上建橋十三座，以東水門外七里的虹橋、裏城南部中心的州橋最為著名。

蔡河又稱惠民河，從陳州、蔡州經尉氏北流到汴京，從南面戴樓門東的廣利水門進城，向東北行，環繞外城南部中央，經龍津橋向東南行，由陳州門西的普濟水門出城，可通陳、蔡、汝、潁諸州的漕運。河上建橋十三座。

汴河、蔡河都是黃河下游的分流，水源來自黃河，黃河水量常因季節變化，因而水源常感不足。北宋初年曾多次治理蔡河。宋太祖建隆二年(公元961年)引溱水、洧水上游的閔水，經尉氏、中牟接通蔡河。宋太宗淳化二年(公元991年)又引溱水入洧水接通蔡河，并將京師西南塘陂引入蔡河。宋真宗大中祥符九年(公元1016年)又疏通蔡河經長葛，由洧水、溱水通到沙河。這

樣不但疏通京師西南的水源，而且解決了蔡河的水源問題，使得汴蔡二河的水源分開，保證了漕運的暢通。

建隆二年又疏導開鑿金水河，引鄭州西北的京河、索河諸水，築堤經過中牟通達京師，并在京師西面的汴水之上架跨河渡槽，從西北水門入京城，注入大內，灌後苑池浦，以供大內的用水。同時又引金水河注入五丈河，使兩河溝通，并補充五丈河的水源。金水河上建有橋三座。

北宋初年對京師西南蔡河和西北金水河的疏通，把許多附近的河流加以連結和疏導，改變了原有河流單純依賴黃河作為補充水源的局面，在一定程度上解決了水源不足的困難，并進一步開通了京師與西南地區的水運，擴大了京師與全國各地的水路交通。

五丈河又名廣濟河，從外城東面新曹門北東北水門入城。後周世宗曾疏通汴河入五丈河，使京師東北曹、兗一帶漕運和京東諸州物資，能由五丈河而輸送京師。五丈河因寬五丈而得名，河上有橋五座。

環繞裏城四周，依然保留有護城的河道，使得五丈河、金水河和汴河都相溝通。

3 宮殿和中央官署的佈局

宮城正南門(宣德門)內作為外朝的大殿，叫大慶殿，原為後梁的崇元殿，宋初重修，後因火災重建，是舉行大朝會及重大典禮的地方。後來金的汴京，“大概依宋之舊”，“大慶殿屋十一間，龍墀三級，傍堦殿各三間。”（《大金國志》卷三十三“汴京制度”）。大慶殿西北有文德、垂拱、紫宸、集英四殿，文德用於“常朝”，紫宸用於“正朔受朝”，“集英”用於“御宴及試舉人”（《東京夢華

錄》卷一《大內》)。北宋的主要殿堂有些是“工”字形的。往北又有崇政、延和等殿，崇政用爲“閱事之所”(《楓窗小牘》卷上)，也作宴會、作樂和試進士之處。

北宋末年宋徽宗大興土木。政和三年(公元1113年)在宮城北門拱宸門外修建延福宮，共建七殿及東西兩邊各十五閣，又築假山與池海，造鶴莊、鹿砦、孔翠諸榭，養禽獸以數千計。又信道士勘輿(看風水)之說，謂於東北隅增高有多男之祥，於政和七年在裏城景龍門內，仿杭州鳳凰山形勢，建築所謂萬歲山，後來改稱艮嶽，因爲“東北之卦”是“艮”。艮岳周圍十多里，最高峯達九十步，有兩峯並峙，瀑布下入雁池，山上滿佈亭榭樓觀和四方搜集來的奇石花竹以及珍禽異獸。并派人到蘇、杭一帶搜求珍奇花木竹石，號稱“花石綱”。詳見宣和壬寅御製之記(見王明清《揮麈後錄》卷二)以及《楓窗小牘》卷上、《容齋三筆》卷十三等。

中央官署的機要部門，如樞密院、中書省、都堂(宰相朝退治事之所)、門下省，都設在宮城內右掖門內“東去街北廊”^①。“內諸司”如學士院、皇城司、四方館、內侍省、奉宸庫、醫官局等，也都設在宮城內，以便於爲皇室服役。

從宮城南門宣德門，經州橋，又經裏城南面正門朱雀門，直到外城南面正門南薰門，築有御街，寬約二百多步，是四面御街中最正中的一條，作爲全城的中軸綫。從宣德門南到州橋北一段御街，具有宮廷的廣場性質，元旦、冬至的大朝會以及上壽的慶賀，百官都要在此排班等候。這條南北向的御街，兩旁向北直對宣德門左右掖門，建有兩列千步廊，稱爲御廊，分別設有黑漆杈子和朱漆杈子兩列，禁止人馬在中心御道通行，行人只准在朱漆杈子以外經過。在這一段御街兩側，是中央主要的行政官署所在，左廊有明堂、秘書省，右廊的東側有東西兩府，是宋神宗元

豐初年所建，用作宰相執政的辦公之所，在景靈西宮以南有掌樂的大晟府和掌禮的太常寺；右廊的西側有尚書省，在尚書省前的橫街以南有御史臺，正對尚書省南門有開封府。在州橋向西大街的街北，有接待外來使者的都亭驛。在州橋的曲轉大街，有作為國庫的左藏庫（《東京夢華錄》卷二《宣德樓前省府宮宇》、卷三《大內西右掖門外街巷》）。

此外有中央官署分設在裏城、外城坊巷中的，如審計院在景靈宮東門大街第二甜水巷以東（同書卷三《寺東門街巷》）。太學、國子監在龍津橋東南，軍器所在龍津橋西南老鴉巷口（同書卷二《朱雀門外街巷》），殿前司在西角樓西去踴路街以西，都亭西驛和京城守具所在西大街西端（同書卷三《大內西右掖門外街巷》）。同文館在梁門外西北安州巷（同書卷六《元旦朝會》及周城《宋東京考》卷十一）。權貨務、都商稅院在左一廂的太平坊和義和坊。此外提點食場所在汴陽坊，抽稅箔場在崇善坊，提舉修造所在顯仁坊，八作司在安仁坊（以上四坊在城東），磁器庫在建隆坊，都茶場在順成坊，牛羊司在普寧坊（以上三坊在城西，見於《宋會要輯稿》職官部分）。

4 社、郊壇、太廟和原廟的建置

曹魏建築鄴城為都城，開始在宮殿左右建置宗廟和社稷，即左思《魏都賦》所說“建社稷，作清廟”。北魏洛陽沿襲這種制度，在銅駝街東西兩側的一系列中央官署前，左設太廟，右設太社。唐代設置中央官署的皇城，也採取同樣的佈局。這都是按照《考工記·匠人》“左祖右社”與《周禮·小宗伯》“左宗廟、右社稷”的禮制而設計的。北宋東京的體制略有不同，“郊社”設在尚書省以南的橫街西端，“太廟”設在景靈東宮東門大街的東端。《東京夢華

錄》卷三《大內西右掖門外街巷》，“大內西去，右掖門祆廟直南浚儀橋，街西尚書省東門，至省前橫街，南即御史臺，西即郊社。”說明“郊社”在浚儀橋大街以西尚書省以南的橫街以西。同書卷三《寺東門街巷》講到景靈東宮東門大街一直向東，街南經過第三條甜水巷和第二條甜水巷，“以東審計院，以東桐樹子韓家，直抵太廟前門。”可知太廟前門在這條大街的東端，距離郊社很遠。這條大街因此又稱太廟街。看來這條太廟街和“郊社”所處的橫街，都是和宣德門前大街平行的，並且都和宣德門前大街的距離相等。太廟處於太廟街的東端，郊社處於橫街的西端，距離雖遠，還是相互對稱的。楊奐《汴故宮記》說：“遵御路而北，橫街也，東曰太廟，西曰郊社。”（《元文類》卷二十七）太廟規模很大，其南門近於舊宋門後的觀音院。同書卷三《上清宮》：“觀音院在舊宋門後，太廟南門。”

北宋沿用古來禮制，祭天用的郊壇設在南薰門外南郊；在郊壇東北一里許，還築有青城和齋宮，作為皇帝行禮時用的行宮。

北宋另有朝獻祖宗於原廟的禮制。宋真宗大中祥符五年（公元1012年）“詔以聖祖臨降，令擇地建宮，遂以錫慶院建，約唐太清宮制度，仍上新宮名曰景靈。神宗元豐中又廣其制，盡奉諸帝后御容也”（高承《事物紀原》卷七）。邵伯溫《聞見前錄》卷三又說：“元豐中神宗做漢原廟之制，增築景靈宮，先於寺觀迎諸帝后御容奉安禁中，涓日以次備法駕羽衛前導赴宮。”所謂漢原廟之制，就是漢惠帝在渭水以北重建“原廟”祭記高祖的制度，“原”就是“重”的意思，從此西漢一代都在各個皇帝的陵園旁邊建廟祭祀。實際上所謂“做漢原廟之制”，只借用這個典故。宋代盛行在寺院道觀中供奉已故皇帝皇后的塑像而朝拜獻祭的禮俗，不但在京城中這樣，在陵園旁邊也是如此，如真宗永定陵東南有羅

漢寺，仁宗永昭陵和英宗永厚陵西北有昭孝寺，在神宗永裕陵和哲宗永泰陵東北有寧神寺。宋神宗擴大建設景靈宮，把原來供奉在各個寺院道觀中的皇帝皇后塑像集中到這裏奉供，并規定每逢四孟（孟春、孟夏、孟秋、孟冬）由皇帝親自率領親屬和大臣前往朝拜獻祭，這是寺院道觀中供奉皇帝皇后禮俗的進一步擴展。當時太廟供奉木製的神主牌，每年五次祭享，由宗室諸王行禮，而景靈宮供奉祖先塑像，每年四次朝拜，由皇帝親自獻祭，儀式的隆重，遠遠超過太廟。景靈宮分東西兩宮，分別建築在宣德門前御街兩側十分衝要的地點。這種禮制不僅為南宋臨安所沿用，成為宋代特有的朝拜祖宗的隆重禮制，而且後來為金、元等朝代所做法，影響十分深遠。

還需要補充說明的，就是北宋在建置景靈宮作為宗廟的同時，還在萬壽觀中保留供奉祖先的塑像。北宋向來重視道觀的建設。太祖改建後周的太清觀為建隆觀，在裏城北牆中門舊酸棗門（即景龍門）外西北地方。真宗崇尚道教，於大中祥符元年把建隆觀擴建成玉清照應宮，規模巨大，營建七年才完成。其中除供奉道教神像外，兼供奉已故皇帝的塑像，塑造都極精美。仁宗天聖七年（公元1029年）宮中大火，大部燒毀，只保住了偏東的長生、崇壽二殿及章獻太后本命殿。其中供奉的聖祖像和真宗像“各用金五千餘兩”，昊天玉皇上帝像“用銀五千餘兩”（王林《燕翼詒謀錄》卷二）。後來改崇壽殿為太宵殿，徙奉玉皇銅像，又增修寶慶、延聖二殿及章懿太后御容殿，整個改名為萬壽觀（李澣《汴京遺蹟志》卷十）。南宋臨安沿用這種禮制，在杭城西北新莊橋建設景靈宮的同時，起建萬壽觀，包括太宵、寶慶、長生三殿，分別供奉昊天、聖祖、長生帝，并於後殿供奉太祖以下塑像，“以存東都遺制。”每當皇帝於“四孟”朝獻景靈宮時，兼到此

地行燒香禮(《夢梁錄》卷八《萬壽觀》)。

5 “廂”和“坊”的行政組織系統

北宋東京在行政系統上設有兩個赤縣(京城所屬的縣稱爲赤縣),是沿用唐代汴州的舊制。大內南面正中御街(俗稱天街)以東和大內以東屬開封縣管轄,縣署在仁和門內;御街以西和大內以西屬浚儀縣(後來改稱祥符縣)管轄,縣署在安遠門外旌孝坊西。外城東部南部以及附郭屬開封縣,外城西部北部以及附郭屬浚儀縣。兩縣都隸屬開封府,府署在州橋以西的浚儀橋西。兩縣都設有縣尉,主管所轄地區的治安。宋真宗大中祥符元年(公元1008年),京城內外開始設“廂”,“廂”成爲“坊”上級的行政組織,城內廂的長官,品秩比縣令要高,或者品秩平行,於是縣官的職權逐漸縮小。

東京裏城設有左一、左二(屬開封縣)、右一、右二(屬浚儀縣)等四廂,所屬共46坊;外城設有城東左、城南左、城南右(屬開封縣)、城西右、城北左、城北右(屬浚儀縣)等六廂,所屬共75坊;附郭有京東第一、第二、第三、京南(屬開封縣)、京西第一、第二、第三、京北第一、第二(屬浚儀縣)等九廂,共15坊。總共十九廂,136坊。裏城四廂長官稱爲都指揮使,主管烟火盜賊及諸公事(《事物紀原》卷六“都廂”條)。廂所設官吏有廂典、書手、都所由、所由、街子、行官等。

現將天禧五年(公元1021年)裏城、外城十廂所屬坊數與戶數列表如下:

部 位	廂名	坊數	戶數	一坊平均戶數
裏城東南部	左第一廂	20	8,950	447.5
裏城東北部	左第二廂	16	15,900	993.7
裏城西南部	右第一廂	8	7,000	875
裏城西北部	右第二廂	2	700	350
外城東南部	城南左廂	7	8,200	1,171.4
外城西南部	城南右廂	13	9,800	753.8
外城東北部	城北左廂	9	4,000	444.4
外城西北部	城北右廂	11	7,900	718.1
外城東部	城東左廂	9	26,800	2,977.7
外城西部	城西右廂	26	8,500	326.9
全城合計		121	97,750	807

(附注:根據《宋會要輯稿》兵三、廂巡“天禧五年正月”條,所列一坊的平均戶數,只算到小數點一位)。

上表因附郭十五坊的戶數缺乏統計,沒有列入,總戶數當在十萬戶以上,每戶以五人計,當時居民人口有五十多萬,連同駐軍及家屬當有七十萬。從以上所列的表看來,外城東部的城東廂的九坊中,人口密度最高,平均一坊2,977戶,近三千戶。外城東南部的城南左廂次之,平均一坊1,171戶。裏城東北部再次之,平均一坊993戶。全城的東部正是熱鬧的繁華地區。裏城的東北部左二廂,共有十六坊,平均一坊993戶,共15,900戶,這裏正是裏城最繁華之區,包括“人煙浩闊”的馬行街在內。外城東部的城東廂,共九坊,26,800戶,這一帶正是對外交易的樞紐地區,東北有五丈河進入東北水門,東南有汴河進入東水門,陸路有御

街從州橋往東，經裏城舊宋門，通到外城的新宋門。又有大街從宮城東南的潘樓街，經土市子往東，經裏城舊曹門，通到外城的新曹門，包括牛行街在內。但是還應該看到，外城的面積要比裏城大四倍，外城有些地區的坊的面積比較大，實際上人口密度最高的地方，還是裏城東北部的左二廂。

從上列的表中又可看到，居民最少的是裏城西北部的右二廂，只有二坊，共七百戶，因為這一帶是軍營所在地。

6 街巷的新佈局

東京街巷的排列，最初當出於後周世宗擴建外城時所作的規劃，即世宗詔書所說：“定街巷、軍營、倉場、諸司公廨院務了，即任百姓營造。”後周擴建外城時，曾以街道為主要界限劃定街巷的位置，也就是街坊的位置，北宋在這個基礎上作了進一步的規劃。

北宋曾經指定了四條大街作為御街，以宮城為中心，經過裏城四面城門，通向外城的四面城門，就是南面的南薰門，西面的新鄭門（即順天門）、東面的新宋門（即朝陽門）、北面的新封丘門（即永泰門）。“外城……城門皆甕城三層，屈曲開門，唯南薰門、新鄭門、新宋門、封丘門，皆直門兩重。蓋此係四正門，皆留御路故也”（《東京夢華錄》卷一《東都外城》）。所謂直門兩重，就是門外所築甕城的門，和原有城門成為一直綫，不像三層甕城那樣各門彼此齟齬，所謂“屈曲開門”。這樣南、西、東、北四面設有御街，是東京新創的格局，前此不曾見過。

南面的御街，前面已談到，具有中軸綫性質，從宮城南門宣德門向南，經州橋，出裏城的朱雀門，再經龍津橋而直達外城的南薰門（以下參看圖5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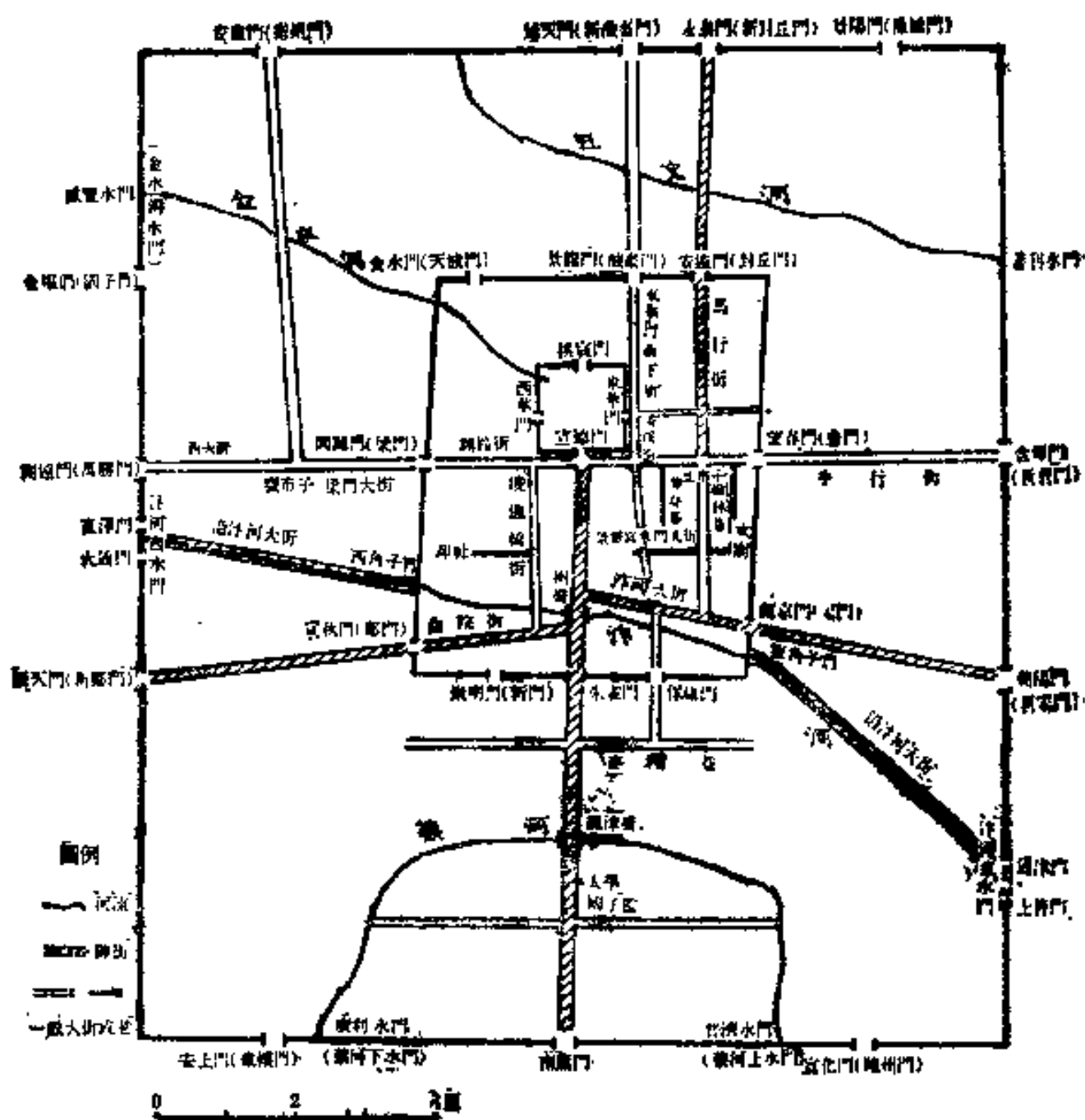


圖55 北宋東京(開封)河流和主要街巷分佈圖

東面的御街，是從州橋向東，經臨汴河的大街，出裏城的舊宋門，直達外城的新宋門。“州橋之東，臨汴河大街，曰相國寺，有橋平正如州橋”（《東京夢華錄》卷三《大內前州橋東街巷》）。汴河上的橋梁，只有州橋和相國寺橋“皆低平不通舟船，惟西河平船可過”，而且柱都用青石，近橋兩岸都用石壁雕刻海馬水獸飛雲之狀，橋下密排石柱，“蓋車駕御路也”（同上書卷一《河道》）。

西面的御街，是從州橋向西，經裏城的舊鄭門，一直達外城的新鄭門。《東京夢華錄》卷二《宣德樓前省府宮宇》說：“至州橋投西大街，乃臬子行。”又說：“至朱雀門街西，過橋即投西大街，謂之麩院街。”“過橋”即指過州橋。這條俗稱為麩院街的投西大街，即是西面的御街。南、東、西三條御街的交會點，即是州橋，正名天漢橋，是汴河橫貫全城中心的橋梁，成為全城水陸交通的中心點。

北面的御街，為了避免貫穿宮城的中心，設在宮城的東側，以外城北面靠東的第二門新封丘門作為出口。《東京夢華錄》卷一《東都外城》，講到北城四門，“從東曰陳橋門，次曰封丘門，北郊御路”。這條御路，從宮城南門宣德門出來，沿門前大街向東，經東角樓，沿東西向的潘樓街，到稱為土市子的十字街口，折而向北，沿南北向的馬行街北去，經裏城的舊封丘門，直達外城的新封丘門。《東京夢華錄》說：“土市北去乃馬行街也。”（卷二《潘樓東街巷》）又說：“馬行北去，乃小貨行時樓、大骨傳藥鋪，直抵正係舊封丘門，兩行金紫醫官藥鋪。”（卷三《馬行街北諸醫鋪》）更說：“馬行北去，舊封丘門外祆廟斜街、州北瓦子，新封丘門大街兩邊民戶鋪席。”（卷三《馬行街鋪席》）可知從馬行街北去，經舊封丘門到新封丘門，是一條南北向的垂直的熱鬧大街，即是北面的御街。

除了上述四條御街以外，東西向橫街中重要的，還有宮城宣德門前的大街。大街向東接連潘樓街、經舊曹門街，出裏城舊曹門，接連牛行街，直到外城新曹門；向西經過踴路街到舊梁門，沿着梁門大街向西，直到外城舊勝門。這樣就成為經過宮城宣德門前、從東到西、貫通全城中心的大道。《東京夢華錄》說，從潘樓東去經土市子，又東經十字大街，又向東則舊曹門街北山

子茶坊，出舊曹門朱家橋瓦子，以東即牛行街“一直抵新城”（卷二《潘樓東街巷》）。所說新城即是外城的新曹門。同書又說，從宮城西南角西角樓，沿大街西去，即躡路街，直到梁門。出梁門西去，即梁門大街。經街南的州西瓦子和街北舊宣城樓，即是西大街。西去即作為開封府刑人之所的甕市子，再去即都亭西驛與京城守具所（卷三《大內西右掖門外街巷》）。雖然沒有講明西大街的終點，必然是外城萬勝門，作為接待外賓的都亭西驛必然在西邊外城的城門內。

此外南北向的直街，還有宮城東門東華門前的大街、宮城西南的與南面御街并行的浚儀橋街和相國寺東門大街等。

大體上東西向的大街有若干南北向的巷，南北向的大街有若干東西向的巷。如潘樓街是東西向的，“南通一巷，謂之界身，并是金銀綵帛交易之所”（同書卷二《東角樓街巷》）。界身巷是南北向的。從潘樓街東去的舊曹門街是東西向的，街南有東榆林巷和西榆林巷，都是南北向的。與潘樓街、舊曹門街並行的景靈宮東門大街也是東西向的，南北向的榆林巷正通到這條大街上，因而大街東端的太廟可以“北入榆林巷，通曹門大街”。這條大街以南，就排列有三條南北向的巷，稱為第一條、第二條、第三條甜水巷（同書卷三《寺東門街巷》）。街巷的排列是比較有規則的。

出裏城朱雀門通向外城南薰門的御街是南北向的直街，御街旁側的東西向橫街，或稱為巷。例如“出朱雀門東壁亦人家，東去大街麥稍巷（鄧之誠校；稍應作稽。）、狀元樓，餘皆妓館，至保康門街”（《東京夢華錄》卷二《朱雀門外街巷》）。保康門是裏城朱雀門以東的城門，保康門街當與朱雀門的御街并行，都是南北向的，從朱雀門外向東通到保康門街的大街麥稽巷，必然是

東西向的橫街。果然同書又說：“出保康門外，南至橫街，西去通御街，曰麥稍巷（鄧之誠校：稍應作稽）。”（同上書卷三〈大內前州橋東街巷〉）。

“人煙浩鬧”的馬行街是南北向的直街，因此所有的巷都是東西向的橫巷。“先至十字街，曰鷓兒市（〈說郛〉“鷓”作“鷓”），向東曰東雞兒巷，向西曰西雞兒巷。”（同上書卷同條）東西兩條雞兒巷，都是東西向的橫巷。“北去楊樓以北，穿馬行街東西兩巷，謂之大小貨行。”（同上書卷〈酒樓〉）大小貨行橫穿馬行街，分爲東西兩巷，當然又是東西向的。

〈東京夢華錄〉中敘述街市的分佈情況，常詳述各種商店所在的“街”或“巷”，而沒有一處談到“坊”的，但是在一般敘述中，常以“坊巷”連稱。如說“每坊巷三百步許，有軍巡鋪屋一所。”（卷三〈防火〉）“坊巷橋市皆有肉案。”（卷四〈肉行〉）“其餘坊巷院落，縱橫萬數”（卷三〈馬行街鋪席〉）等等。當是北宋末年民間習慣上已不用坊名而多用巷的俗稱了。所謂“巷”，原是“坊”的通道，例如榆林巷原是宣平坊的巷（金劉祁〈舊唐志〉卷一載王飛伯〈贈密國公完顏璠〉：“宣平坊裏榆林巷”）因而作一般敘述時，常以“坊巷”連稱。

在唐代長安外郭城中，“街”原是整齊排列的許多“坊”之間的通道，而“坊”中通道多稱爲“曲”。到北宋東京，坊中通道多數稱“巷”，也還有少數稱“曲”的，如景靈西宮有南曲，尚書省西門有西車子曲等。在“街市”逐漸形成和衆多居民需要大量日用必需品的情况下，人們就重視“街”和“巷”的交通及其合理安排，所以當初後周世宗擴建東京外城，所下詔書就以“定街巷”作爲首要的規劃，并且說“定街巷”等擘劃完成後，“即任百姓營造”。隨着“街市”的形成和發展，“巷”中日常必需品供應商店的設置，“街”

就不再是“坊”之間的通道，而成爲街道兩側商店和住宅的通道；“巷”也不僅是“坊”內的通道，而成爲小巷兩側商店和住宅的通道，從此大街和小巷連結的交通網逐漸形成。東西向的大街，兩側有若干南北向的小巷；南北向的大街，兩側有若干東西向的小巷。居民衆多的小巷不再是局限於“坊”內的通道，而都直通大街，於是原來作爲封閉式的許多“坊”中間的“街”，成爲通向許多小巷的大道，從此“街巷”的結構就代替了原來的“街坊”結構。

（三） 北宋末年東京的新“街市”

北宋末年東京的街巷，已經把商業區和居民區打成一片，在許多重要的交通便利的街巷中，都出現了繁華的新“街市”，其中尤以南、東、西、北四條御街最爲繁華。所有這些繁華“街市”，主要是由新興的行市、酒樓、茶坊、食店、瓦子以及其他日用品商店組成的，適應了都市經濟發展的新形勢和衆多居民生活上的需要。

1 南面御街

南面御街以宮城南門宣德門爲起點，經汴河的州橋，穿過裏城朱雀門，經蔡河的龍津橋，直達外城南薰門。在宣德門的左右兩掖門以南，建有左右千步廊，左右廊下各設有朱漆和黑漆杈子兩行，行人限在朱杈子之外，但是“舊許市人買賣於其間”，原來這裏的交易是很興盛的，直到北宋晚期政和年間才禁止買賣。在左右廊的兩側，雖然建有景靈東宮、景靈西宮和中央官署，但是景靈東宮的東面、東南而和尚書省西門以外就是商業區。景靈東宮的東牆下，就設有大酒樓叫長慶樓，政和年間以後更爲興

隆(《東京夢華錄》卷二《酒樓》)。“景靈東宮南門大街以東，南則唐家金銀鋪、温州漆器什物鋪、大相國寺”。景靈西宮南曲，相對有報慈寺街、都進奏院、百鍾圓(丸)藥鋪(同書卷二《宣德樓前省府官宇》)。尚書省西門的西車子曲，有史家瓠羹、萬家饅頭，號稱在京第一(同書卷三《大內西右掖門外街巷》)。

大相國寺是京中最大寺院，在州橋東北，南臨汴河的大街，東有寺東門大街。原為北齊大建國寺，後廢，唐中宗時僧惠雲再建；睿宗以舊封相國即位，因賜額為相國寺。前有三門，宋太宗時重建；三門左右有東西兩塔各高三丈餘，在第二座三門之後，有彌勒殿，殿內有唐鑄銅彌勒，高一丈八尺。後闍，宋真宗時題名資聖，并從潁川郡取來銅羅漢五百尊，分列三門闍上及資聖闍。宋神宗元豐年間又增建東西兩廊，併諸院為八院。宋徽宗政和年間一度改為宮，御書題額，後又復改為寺(高承《事物紀原》卷七、李濂《汴京遺蹟志》卷十、吳曾《能改齋漫錄》卷十三)。中庭和西廊可容萬人，“舊有六十餘院，或止有屋數間，簷廡相接，各具庖爨”(周輝《清波別志》卷中)。每月朔望與三個逢八的日子(初八、十八、廿八)，有盛大的廟市^⑧，是京城中心惟一的定期的百貨大集市。

南面御街，“過州橋，兩邊皆居民，街東車家、炭張家酒店^⑨，次則王樓山洞梅花包子、李家香鋪、曹婆婆肉餅、李四分茶”(《東京夢華錄》卷二《宣德樓前省府官宇》)。“分茶”是大的食店的稱呼。其中除一家香鋪外，其餘都是著名的飲食店。州橋的炭張家酒店和曹門的乳酪張家，都是以“賣一色好酒”和“好淹藏菜蔬”著名。“自州橋南去，當街水飯、爇(即今熬字)肉、乾脯，王樓(原誤作“玉樓”，從《說郛》改正)前糴兒野狐肉、脯雞，梅家、鹿家 鵝鴨、雞兔、肚肺、鱗魚包子、雞皮、腰腎、雞碎(鄧之誠校；雞應作

雜)，每個十五文。曹家從食。至朱雀門，旋煎羊白腸、炸脯、……猪臟之類。直至龍津橋須腦子肉止，謂之雜嚼，直至三更”（同書卷二〈州橋夜市〉）。玉樓即是上述以梅花包子著名的店鋪。“從食”是指各色的蒸作糕點。從州橋到朱雀門的御街上，有上述許多著名的酒店和飲食店。從朱雀門到龍津橋的御街上，雖然沒有著名的飲食店，却全是供“雜嚼”的店鋪，賣各種零星葷素食品、菜蔬、糖果，原書列舉名件多到四十多種。這一帶夜市極盛，是供應來往京師的旅客需要的。

沿御街從朱雀門南下，向東有東西向大街叫麥稽巷，設有酒店狀元樓，向西可通新門瓦子，向南又有茶坊。過龍津橋南去，路心又設朱漆杈子如同大內以前，因為向南即是太學和國子監。過太學有橫街，街南有熟藥惠民南局，這是官營的熟藥店。龍津橋以南，向西有武學巷和武成王廟（祭祀齊太公呂尚），廟以南有張家油餅。再西去有大街叫大巷口，有清風樓酒店，“都人夏月多乘涼於此”（同書卷二〈朱雀門外街巷〉）。此地的張家油餅和皇建院前的鄭家油餅是京師最著名的餅店。同書卷四〈餅店〉說：“唯武成王廟前海州張家、皇建院前鄭家最盛，每家有五十餘爐。”這個武成王廟前的海州張家，當即張家油餅。

2 東面御街

東面御街從州橋向東，臨汴河的大街，有相國寺。寺南有相國寺橋，直對裏城保康門。橋西有賈家瓠羹、孫好手饅頭。橋南到保康門，有李慶家酒店、潘家黃耆圓（丸），街西又有保康門瓦子。由相國寺橋東去，出裏城舊宋門，到外城新宋門，沿城都是客店。這是適應從汴河來的南方客商和旅客需要。裏城舊宋門外有酒樓仁和店、姜店，都是正店（〈東京夢華錄〉卷三〈大內前州

橋東街巷》及卷二《酒樓》)⑩。

3 西面御街

西面御街，從州橋向西行，即俗稱麴院街。靠近州橋有果子行，街北即都亭驛，街南有梁家珠子鋪，餘皆花果鋪席以及賣“時行紙畫”。這樣在城中心設有果子行和許多花果鋪席，是適應衆多居民對於時鮮花果的需要。再往西，“街南遇仙正店，前有樓子，後有臺，都人謂之臺上。此一店最是酒店上戶，銀餅酒七十二文一角，羊羔酒八十一文一角。街北薛家分茶羊飯熟羊肉鋪，向西去皆妓館舍，都人謂之院街。”（《東京夢華錄》卷二《宣德樓前省府宮宇》）這個“最是酒店上戶”的遇仙正店，當即會仙樓正店。同書卷四《會仙酒樓》說：“如州東仁和店、新門裏會仙樓正店，常有百十分廳館動使，各各足備，不尚少闕一件。”據此可知，麴院街南的會仙樓靠近裏城的新門，因而亦可稱爲新門裏會仙樓。這是西面御街上的大酒樓。以適應城西居民社會交際上的需要。麴院街往西到裏城舊鄭門，又有河王家、李七家正店（同書卷二《酒樓》）。

4 北面御街

北面御街的街市是最繁華的。從宮城南門宣德門東去，有東西向的潘樓街，從宮城東南角的東角樓向東，直到十字街頭，叫土市子。街南有鷹店，有販鷹鷂的客商，鷹是獵人用來追捕禽獸的。還有真珠、匹帛、香藥鋪席。南有界身巷，并是金銀綵帛交易之所，“屋宇雄壯，門面廣闊，望之森然。每一交易，動即千萬，駭人聞見”。這是適應商業新發展而在城中設立的貨幣金融交易中心，當即金銀行所在。往東，街北即是潘樓，這是五代已

存在的著名老酒樓，樓下有從早到晚，分批集合的百貨集市。再往東，有著名的徐家瓠羹，街南有最大的瓦子桑家瓦子，大小勾欄多到五十多座（《東京夢華錄》卷二《東角樓街巷》），以供城中心衆多人口的文化娛樂的需要。

北面御街，經上述東西向的潘樓街，到土市子，折而北行，便是南北向的馬行街。從馬行街北上，有十字街，東西兩巷是東西雞兒巷，多妓館；東雞兒巷又有郭廚酒店。馬行街再往北有楊樓酒店，街東有馬行的酒樓莊樓，後改稱和樂樓，樓下即賣馬市。馬是北方重要交通工具，因而馬行很是興旺。略往北，又有酒樓叫任店，後改稱欣樂樓，對門有馬鑑家藥店（同書卷二《潘樓東街巷》）。任店規模很大，門前綵樓歡門，“入其門，一直主廊約百餘步，南北天井兩廊皆小間子。向晚燈燭熒煌，上下相照”，並有妓女數百聚集於主廊上。從楊樓北去，沿馬行街兩旁，又有東西兩巷，即大小貨行所在，“皆工作伎巧所居”，就是大小手工業作坊所在，製作都城居民生活需要的各種日用貨品。大貨行通牋紙店，牋紙用舊布、亂麻等製成，有玉版牋等品種（《蜀牋譜》），是蜀中特產，文人愛用的珍品（同書卷二《酒樓》）。再沿馬行街北去，有小貨行的時樓，從此直到裏城舊封丘門，“兩行金紫醫官、藥鋪，如杜金鈎家、曹家獨勝元（按“元”即“丸”字）、山水李家口齒咽喉藥、石魚兒班防禦、銀孩兒柏郎中家醫小兒、大鞋任家產科”等（同書卷三《馬行街北諸醫鋪》）。這就是醫行、藥行的所在。“馬行南北幾十里，夾道藥肆，蓋多國醫，咸巨富”（蔡條《鐵圍山叢談》卷四）。這些“國醫”開設醫鋪，或者附設於藥鋪，收入很多，因而都成巨富。這裏已有著名的小兒科和產科的醫鋪，是適應都城居民的需要。北宋時小兒科這門醫學很有發展。例如錢乙（字仲陽），鄆州（今山東鄆城縣）人，卒於政和七年（公元

1117年)，就以小兒科著名，著有《小兒藥證直訣》（三卷），晚年到京師，曾為長公主看病。這一帶還有香藥鋪席，還多官員宅舍。“夜市比州橋又盛百倍，車馬闐擁，不可駐足，都人謂之裏頭”（同書卷三《馬行街北諸醫鋪》）。

從馬行街北去，出裏城舊封丘門，有祆廟斜街，這裏有州北瓦子。向北直往外城新封丘門，約十多里，即新封丘門大街，兩邊有居民與鋪席，多茶坊與酒店以及飲食店（同書卷三《馬行街鋪席》）。

從馬行街經土市子南去，有鐵屑樓酒店，即皇建院街，得勝橋有鄭家油餅店，與龍津橋西南武成王廟前張家油餅齊名。直南到太廟街（即景靈宮東門大街），有酒樓高陽正店，夜市尤盛（同書卷二《潘樓東街巷》）。

5 宮城宣德門前大街

這是條橫貫全城中心的大街。宮城東南角東角樓向東的潘樓街，即是大街向東的一段。由潘樓街經土市子一直向東，又有十字大街，有從行裏角茶坊，從五更到天明，“博易買賣”，叫做鬼市子。街南有酒店中山正店，街北有鄭皇后宅（同書卷二《潘樓東街巷》），鄭皇后宅後有宋廚酒店（同書卷二《酒樓》，“宋”原作“宗”，今從《說郛》作“宋”）。再向東即舊曹門街，有北山子茶坊，“內有仙洞、仙橋，仕女往往夜遊吃茶於彼”。又有李生菜小兒藥鋪、仇防禦藥鋪。曹門還有蠻王家、乳酪張家，都是正店（即大酒樓），其次有樽筒張家（同書卷二《酒樓》）。出裏城舊曹門，有朱家橋瓦子，“橋頭人煙市井，不下州南”。往東即牛行街，有著名的劉家藥鋪、看牛樓酒店（同書卷二《潘樓東街巷》）。劉家藥鋪規模很大，“高門赫然，正面大屋七間”（洪邁《夷堅志》丙集卷十四

“蔡叔厚”條)。看牛樓當是牛行的酒樓。牛行街直到外城新曹門。

宮城西南角西角樓，沿大街西去，即是鬮路街，一路有許多客店和許多藥鋪，如張戴花洗面藥鋪、國太丞藥鋪、張老兒藥鋪、金龜兒藥鋪、醜婆婆藥鋪，還有唐家酒店。梁門裏有水果店李和家，以燭栗“名聞四方”(陸游《老學菴筆記》卷二)，立秋棗和雞頭(即芡實)上市。”李和家最盛”(《東京夢華錄》卷八《立秋》)。出裏城梁門西去，即梁門大街，街北建隆觀內東廊有于道士賣齒藥。再西去街南有州西瓦子，街北即酒樓宜城樓。略西去，與金梁橋街交接，金梁橋下有酒樓劉樓。往西西大街有荆筐兒藥鋪、棗王家金銀鋪，近北巷口有熟藥惠民西局，再西去是甕市子，是開封府刑人之所。從甕市子北去有南北向大街，直到外城西北面的衛州門，街上有班樓酒店(《東京夢華錄》卷三《大內西右掖門外街巷》)。這條大街上的著名店鋪，除個別的水果店和金銀鋪以外，都是藥鋪和酒店⑩。

6 宮城東華門前大街

宮城東門東華門外也是個市場。“東華門外市井最盛，蓋禁中買賣在此。凡飲食時新花果、魚蝦蟹(鄧之誠校蟹應作鼈)蟹、鵝兔脯臘、金玉玩好衣着，無非天下之奇。其品味若數十分，客要一二十味下酒，隨索目下便有之。其歲時果瓜蔬茹新上，市並茄瓠之類新出，每對可直(值)三五十千，諸閭分爭以貴價取之。”(《東京夢華錄》卷一《大內》) 東華門外景明坊有酒樓叫鬮樓，本名白鬮樓，據說因“商賈鬮鬮於此”而得名(吳曾《能改齋漫錄》卷八)。很可能原是鬮行的酒樓，因為緊靠宮城，特別翻造裝修。“白鬮樓後改為豐樂樓，宣和間更修，三層相高，五樓

相向，各用飛橋欄檻，明暗相通，珠簾繡額，燈燭晃耀。初開數日，每先到者賞金旗，過一兩夜則已。元夜則每一瓦隴中，皆置蓮燈一盞。內西樓，後來禁人登眺，以第一層下視禁中。”（《東京夢華錄》卷二《酒樓》）這是東京最高大的酒樓。一般酒樓都只二層，它是三層。《事林廣記》乙集卷一“東京城圖”中，也只有它畫作三層樓。據說“乃京師酒肆之甲，飲徒常千餘人”（周密《齊東野語》卷十一）。

從宮城東南角東角樓旁的十字街，南去有薑行，北去稱為高頭街，從紗行到東華門，直到裏城舊酸棗門，“最是鋪席要鬧，宣和間展夾城牙道矣”（同書卷二《東角樓街巷》）。

7 景靈宮東門大街和相國寺東門大街

景靈宮東門大街，是景靈宮東門外的東西向大街，和以北的潘樓街和曹門大街并行。街南有三條甜水巷，從東而西，分為第一、二、三條甜水巷。在第三條甜水巷東有熙熙樓客店，往東，街南有酒樓高陽正店，由此向北直通馬行街。第二條甜水巷東有審計院，直到太廟前門，太廟北入榆林巷，直通曹門大街。

相國寺東門大街，是相國寺東門外的南北向大街。街上都是幞頭、腰帶、書籍、冠朵鋪席。寺南即錄事巷，多妓館；繡巷都是師姑“繡作”住所。寺北即小甜水巷，多南食店和妓館。向北有李慶精薑鋪，直北出景靈宮東門前，再向北通高頭街和薑行後巷（《東京夢華錄》卷三《寺東門街巷》），當與宮城東華門前大街接連。這條南北向的相國寺東門大街，在景靈宮東門前，正與東西向的景靈宮東門大街作“丁”字形的交接，成為北自東華門前大街和南自臨汴河大街（即東面御街）通向太廟的通道。

以上八條大街的“街市”，以北面御街即潘樓街、馬行街和新

封丘門大街最爲繁華。潘樓街既有集市性質的潘樓酒店，又有金銀行所在的界身巷和瓦子中最大的桑家瓦子。馬行街既有馬市和莊樓、楊樓、任店等酒樓，又有大小貨行所在的東西兩巷，往北又是醫行和藥行所在。新封丘門大街又有州北瓦子和茶坊、酒肆以及飲食店。其次是橫貫全城中心的宣德門前大街。從宣德門往東，經潘樓街到舊曹門街，有北山子等大茶坊及藥鋪，舊曹門又有蠻王家等酒樓。出舊曹門更有朱家橋瓦子，再往東牛行街，又有牛行和看牛樓酒店以及劉家大藥鋪。從宣德門往西，到踴路街，有許多藥鋪和酒店；出裏城梁門到梁門大街，又有州西瓦子及宜城樓等酒樓，往西西大街又有金銀鋪和藥鋪。再其次是以州橋爲中心的南、東、西三條御街。南面御街，靠近景靈東宮有長慶樓酒店以及金銀鋪、漆器鋪，從州橋往南到裏城朱雀門全是酒店和飲食店，再往南到龍津橋，一路都是供“雜嚼”的飲食店。東面御街，從州橋東行，即臨汴河的大街，街北相國寺有定期集市，到裏城舊宋門外有仁和店、姜店等酒樓。這一帶多邸店和客店。西面御街，從州橋西行，即麵院街，有果子行、會仙酒樓、薛家分茶、羊飯熟羊肉鋪等。此外，相國寺東門大街都是幪頭、腰帶、書籍、冠朵鋪席。除相國寺的定期集市有書籍以外，書籍鋪主要設在這條大街上。

《東京夢華錄》卷六《正月》，講到元旦節日，“如馬行、潘樓街、州東宋（當作曹）門外、州西梁門外踴路（按即踴路街）、州北封丘門外、及州南一帶，皆結綵棚，鋪陳冠梳、珠翠、頭面、衣着、花朵、領抹（抹原誤作抹，從鄧之誠改正）、靴鞋、玩好之類，間列舞場歌館。”馬行、潘樓街即是北面御街，“州東曹門外”和“州西梁門外踴路”即是橫貫全城的宣德門前大街，“州北封丘門外”又是北面御街的北段，“州南”指以州橋爲中心的南、東、西三

條御街。所指的正是全城繁華的“街市”地段。同書卷七《清明節》，講到這天都中人出郊拜掃新墳，“諸門紙馬鋪，皆於當街用紙裱疊成樓閣之狀”。紙馬鋪是出售紙冥器的店鋪，這是配合清明節日人們出城掃墓而當街佈置的。北宋開始流行焚燒紙冥器，用紙製成樓閣、人馬以及各種用具形式作為冥器，因而許多城門口常設有這種紙馬鋪。南宋臨安有紙紮鋪，如市西坊南有舒家紙紮鋪、獅子巷口有徐家紙紮鋪（《夢梁錄》卷十三《鋪席》），就是沿用這種風俗（以上參看圖56）。

（四）《清明上河圖》所描繪沿汴河到東水門的街市和虹橋的橋市

除了上節所說八條大街的“街市”以外，從州橋沿汴河到東水門水陸兩路并行的交通綫及其“街市”，更是非常重要。

1 沿汴河的大街和出東水門旁的大街

《東京夢華錄》卷一《東都外城》：“東城一邊，其門有四，東南曰東水門，乃汴河下流水門也。其門跨河，有鐵裹窗門，遇夜如閘垂下水面。兩岸各有門，通人行路，出拐子城，夾岸百餘丈。次則曰新宋門，次則曰新曹門。”這是說，東水門的南北兩岸各有城門通人行路，這兩座城門即是通津門和上善門，再加上新宋門和新曹門，東城一邊共有四門。《宋會要輯稿》方域一之一又說：“東五門，南曰上善，汴河東水門，……次北曰通津，汴河東水門，……次北曰朝陽（按即新宋門），……次北曰含輝（按即新曹門），……次北曰善利，廣濟河水門。”這樣連同廣濟河水門計算在內，東邊共五門。上善和通津是東水門南北兩岸的城門，《宋會要》這樣混通地稱為“東水門”，並不確切，實際上是夾着水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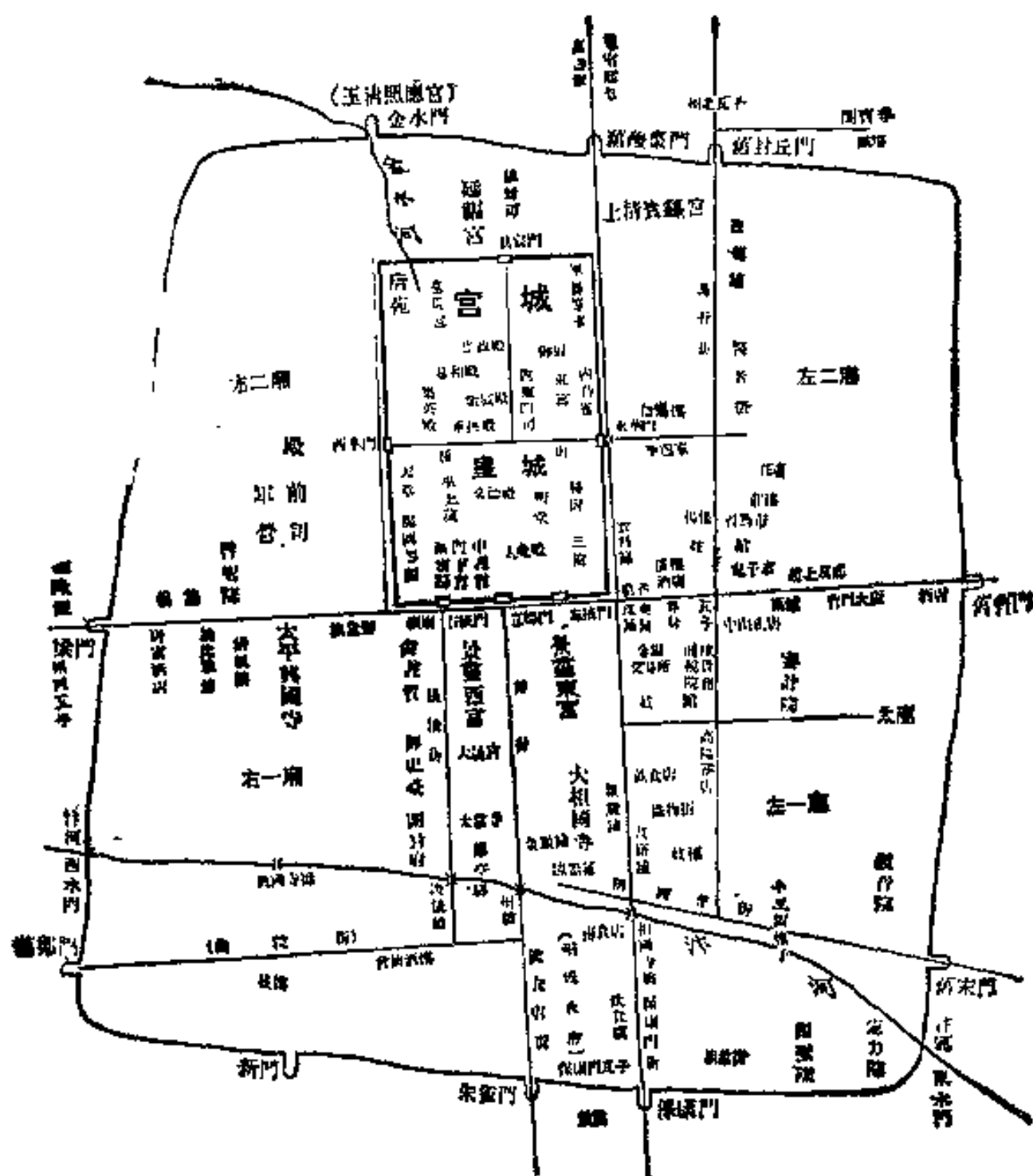


圖56 北宋末年東京(開封)內城復原示意圖

(採自日本梅原都所作《北宋末期開封內城概念圖》，日本村田治郎《中國帝都》第124頁，綜藝舍1981年出版)

而“通人行路”的旱門。因為汴河以及汴河兩岸是京城水陸交通的主要通道，是日常生活所需物資從四方運入的命脈，因而除了在汴河上設有水門以外，同時在水門兩岸還設有旱門。不但東

水門這樣，西水門也是同樣格局。西水門北岸設有宣澤門，南岸設有大通門。同上書講到“西六門”中，“次北曰大通，汴河南水門”，“次北曰宣澤，汴河北水門。”不僅是北宋東京的水門旁有早門，南宋臨安也是一樣。臨安城西北有餘杭水門和餘杭門并列，城東南有保安水門和保安門并列，餘杭門和保安門都是水門旁的早門，成爲水陸交通并行的要道②。

《東京夢華錄》卷一《舊京城》：“東壁其門有三，從南汴河南岸角門子，河北岸曰舊宋門，次曰舊曹門。西壁其門有三，從南曰舊鄭門，次汴河北岸角門子，次曰梁門。”所說角門子，即東西角子門。裏城的東西角子門，不僅是通人行路的早門，同時并列有水門，成爲汴河貫穿裏城的通道。這裏當是唐代貞元十四年（公元798年）所建成的東西水門（韓愈《汴州東西水門記》）。《東京夢華錄》卷一《河道》講汴河，“從東水門外七里曰虹橋，……次曰順成倉橋，入水門裏曰便橋，次曰下土橋，次曰上土橋，投西角子門（按西字當爲東字之誤），曰相國寺橋，次曰州橋。”說明汴河入東水門進外城，入東角子門進裏城；接着向西，又出西角子門出裏城，更出西水門出外城。

東京外城的佈局，凡是四面設有城門的地方，都有大街通向城中。東水門兩岸的通津門和上善門，西水門兩岸的宣澤門和大通門也不例外，都有沿汴河的大街通到裏城中心的州橋，作爲交會點。其中從州橋向東，經相國寺橋，穿過東角子門，經上土橋、下土橋、便橋而到達通津門和上善門的沿汴河大街，特別重要。《東京夢華錄》卷三《大內前州橋東街巷》：“大內前，州橋之東，臨汴河大街，曰相國寺，有橋平正如州橋，……東去沿城皆客店，南方官員商賈兵級皆於此安泊。”州橋向東的沿汴河大街，到相國寺橋以後，分成兩條，一條一直向東，不再沿河，出裏城舊

宋門（即麗京門）到外城新宋門（即朝陽門），就是上節所說的東面御街；另一條沿汴河東南行，出裏城東角子門，經上土橋等，到達通津門和上善門。這是水陸兩路運輸重要物資進入城中的主要交通綫，因而沿汴河向東的街市，繁榮程度大大超過東面御街。

在這條水陸兩路主要交通綫上，分佈有許多官府的倉庫，接待客商堆貨、寓居并進行交易的邸店和客店。官府的米麥倉庫不少，“諸米麥，自州東虹橋元豐倉、順成倉、東水門裏廣濟、裏河折中、外河折中、富國、廣盈、萬盈、永豐、濟遠等倉”（《東京夢華錄》卷一〈外諸司〉）。邸店也很多，其中著名的如十三間樓，從五代後周一直經營到北宋末年。同時這一帶又是重要的新行市所在地點，我們在前面講新行市形成的章節中，已經詳細談到斛斛行（米麥行）、麵行、菜行、牛馬行、紙行、果子行等等在沿汴河兩岸興起的情況。這兒是大量日用商品輸入的樞紐，又是大量貨物堆積和大宗交易的中心，更是許多新興重要行市所在，因而客商雲集，特別是南方前來的巨商很多。這一帶街市也很興盛，而且自有其特點。可惜孟元老《東京夢華錄》中缺乏這方面的記載，可能正如他在序文中所說的“未嘗經從處”。因為他沒有經商，更沒有從事大宗的買賣，也不常到這一帶游覽。幸而《清明上河圖》所描繪的，正是通津門內外沿汴河街市的情景，可以彌補這一缺陷^③。

2 《清明上河圖》的主題

《清明上河圖》現藏北京故宮博物院，長525釐米，寬25.5釐米，是北宋晚期張擇端所畫。張擇端，字正道，東武（今山東諸城）人，游學於京師，“本工其界畫，尤嗜於舟車、市橋、郭徑（郭徑

指城郭和街市)，別成家數也。”（卷末金大定丙午年燕山張著跋文）全卷描繪清明節日前往汴河一帶游覽所見到的情景，十分細緻而生動。所謂“上河”，就是前往汴河游覽的意思。當時東京風俗，清明節日要出城上墳祭掃，同時也是羣衆性的郊游的日子。這天“四野如市，往往就芳樹之下，或園圃之間，羅列杯盤，互相勸酬。都城之歌兒舞女，遍滿園亭，抵暮而歸。”（《東京夢華錄》卷七《清明節》）這時四郊景色正好，東郊沿汴河一帶游人尤其多，“上河”成爲一時風尚。“上河云者，蓋其時俗所尚，若今之上冢然，故其盛如此也。”（李東陽《清明上河圖後記》，李詡《戒庵老人漫筆》卷一）作者曾任職於畫院，卷首有宋徽宗瘦金體的五字籤及雙龍小印，因此明代這一畫卷的收藏者李東陽斷言“此畫當作於宣（宣和）、政（政和）以前豐亨豫大之世。”

畫卷先描繪東水門外虹橋以東的田園景色，有些是牆身很矮的草屋，有些是以草屋和瓦屋相結合而構成的一組房屋。接着描繪的是汴河上的“市橋”及其周圍的街市。再進一步又描繪到城門口街市以及十字街頭街市的情景。其中選用三分之一篇幅描繪了這一段汴河的航運。畫有各色人物七百七十多人，各種牧畜九十多頭，房屋樓閣一百多間，大小船舶二十多艘。“舟車、市橋、郭徑”正是這位畫家特別擅長描繪的。明代收藏者李東陽在所作《後記》中對此有概括的敘述：

圖高不滿尺，長二丈有奇，人形不能寸，小者纔一二分，他物稱是。自遠而近，自略而詳，自郊野以及城市。……人物則官、士、農、賈、醫、卜、僧道、胥隸、篙師、纜夫、婦女、臧獲之行者、坐者、問者、答者、授者、受者、呼者、應者、騎而馳者、負者、戴者、抱而攜者、道而前呵者、執斧鋸者、操畚鍤者、持杯罌者、袒而風者、困而睡者、倦而欠伸者、乘輜褰簾以窺者，又有以板爲輿、無輪箱而陸曳者，有牽重舟泝急流極力寸

進，圍橋匝岸駐足而旁觀，皆若交歡助叫、百口而同聲者。驢馱、馬、牛、橐駝之屬，則或馱、或載、或卧、或息、或飲、或秣，或就囊乾草、首入囊半者。屋宇則官府之衙、市廛之居、村野之莊、寺觀之廬，門窗屏障籬壁之制，間見而層出。店肆所鬻，則若酒、若饌、若香、若藥、若雜貨百物，皆題扁名氏，字畫纖細，幾至不可辨識。

3 《清明上河圖》中虹橋的橋市

畫中的“市橋”，是一座沒有柱腳，以巨木架空而狀如飛虹的橋梁。當時東京汴河上只有虹橋、下土橋、上土橋是這樣結構，多數研究者認為這是東水門外七里的虹橋，這是可信的，因為只有這裏是郊外，可以看到田園景色，靠近裏城的下土橋、上土橋一帶，沿着汴河這條交通要道上，當時已不可能有田園存在。同時這是清明出城到郊外遊覽的節日，描繪的是“上河”所見景象，如李東陽所說“自郊野以及城市”，是合情合理的^⑩。橋南的兩側，樹立有很高的木製華表，近頂部有短橫木貫穿成“十”字交叉，頂端立有木製金雞。這是交通大道上橋頭的重要標記，建立在東水門外汴河上第一座大橋的橋頭，使得前來的航船從遠處就能看到，作好進橋洞的準備。橋的兩側河旁，停靠大型貨船多艘，有一艘正在轉彎進入橋洞下。橋上兩側都蓋搭有臨時性的店鋪，頂蓋作方形或圓形不一。這就是所謂“市橋”。宋仁宗天聖三年（公元1025年）正月，因巡護惠民河田承說的奏請，曾下詔規定：“在京諸河橋上，不得百姓搭蓋鋪占欄，有妨車馬過往”（《宋會要輯稿》方域十三之二十一）。事實上這種禁令沒有能夠貫徹，到北宋晚年這種“市橋”還很流行。橋堍下既有驅使馬拉着車輛而行者，又有牽着馱有貨物的牲畜而走的，更有挑着重擔而小跑的。橋的沿河兩岸都設有商店，即所謂“橋市”。南岸有一家“十

千脚店。”這家酒樓自稱“脚店”，規模當然要比“正店”小，但門前也有“綵樓歡門”，在四周平房中間起建了二層樓，臨街的門面上已是酒客滿座，門前停歇有馬驢等，幌子上有“天之美祿”、“新酒”等字。

4 《清明上河圖》中通津門內的街市

所畫“十字街頭”的“街市”，正當一座華麗而高大的城門以內，有一隊滿載商貨的駱駝隊正從此門向東出城。城門是唐宋以來流行的“過梁式”木結構門洞，城門上有高大木結構的華麗樓閣，樓閣南面向下有梯級，可以由此上下。無疑這是一座重要的城門。多數研究者認為這是東水門，實際上應該是東水門北岸的通津門^⑤。在城門以內，越過幾家商店，西邊不遠處，有一座富麗堂皇的三層高大建築，門口掛着“孫家正店”的大字招牌，門前設有彩樓歡門，西側用長桿子掛有旗子，這正是東京七十二戶“正店”之一。東京大酒樓往往設在城門口，孫家正店正在通津門口。文獻上只說東華門外的白礬樓是三層樓，據此可知，到北宋晚年，三層樓酒店已不止白礬樓一家了。文獻上所說大酒樓的三層樓以及“綵樓”，“繡飾”，都可以從這裏看到描繪的形象。這裏有如同白礬樓一樣的三層樓大酒店，說明這一帶街市的興隆。從店鋪的幌子中，還可以看到“王家羅綿匹帛鋪”、“劉家上色沉檀棟香”、“劉三叔精裝字畫”、“孫羊店”，這是絲綢店、香藥店、裱畫店以及食店。另有“久住王員外家”，既自稱為“員外”，又說是“久住”，當是一家豪富開設的接待客商的邸店。在十字街頭的西南角上有一個棚子，坐着一羣人正聽人說唱。也還有掛着“神課”、“看命”、“決疑”幌子的占卜者。

在十字街的橫街的西邊，有一家橫排掛着“趙太丞家”四個

大字的醫藥鋪，幌子上還寫着：“七勞五傷……”、“治酒所傷真方集香丸”、“大理中丸……”等。店堂內東西兩側有長凳作座位，正中并且有座椅，正在熱忱地招待顧客。這是以出售專治某些“勞”“傷”的丸藥來號召的，可能這一帶來往的貨船和車輛、轎子很多，撐篙、推車、抬轎以及搬運貨物的工人來往不少，比較容易發生“七勞五傷”的疾病，因而這家醫藥鋪以專治“勞”“傷”來作廣告。

（五）北宋末年東京酒樓、茶坊和飲食店的特色

北宋東京的街市上，酒樓、茶坊和飲食店佔很大比重，有它的許多特點，與繁華街市的形成和發展有密切關係。

1 東京酒樓的特色

酒樓有正店和脚店之分，大酒樓稱為正店，共有七十二戶，其餘小酒店稱為脚店，後來南宋臨安沿用這種稱呼。正店都設在熱鬧街市以及重要城門口的街市中。如潘樓在潘樓街，莊樓、楊樓、任店和小貨行時樓在馬行街，白礬樓在宮城東華門外，孫家正店在外城通津門內（見《清明上河圖》），長慶樓在景靈東宮東牆下，會仙樓在西面御街靠近裏城南面新門裏，河王家和李七家正店在裏城西面舊鄭門外，中山正店在潘樓街以東的十字大街街南，高陽正店在土市子以南，直到太廟街（即景靈東宮東門大街）的街上，蠻王家和乳酪張家在裏城東面舊曹門，看牛樓酒店在牛行街，宜城樓、藥張四店和班樓在裏城西面梁門以西大街上，劉樓在金梁橋下，張八家園宅正店在外城戴樓門，還有八仙樓在州北，地點不詳。

正店中有些是新行市設置的，如馬行的莊樓、牛行的看牛樓、小貨行的時樓以及可能是礬行的白礬樓。這是沿用唐代馬行設酒樓的風氣，作為行頭所在地，並用作看驗商品質量、論談價格、商定賣買以及簽訂契約的場所，實際上具有行市的會館以及交易所的性質。大小貨行“皆工作伎巧所居”，具有手工業作坊的性質。當時“凡雇覓人力、幹當人、酒食作匠之類，各有行老供雇”（《東京夢華錄》卷三《雇覓人力》）。小貨行的時樓，既是小貨行的交易所，也該是小貨行的行老所在地。因此這種酒樓除了作為一般社會交際場所以外，更有其特殊作用，對於新行市以及商品交易的發展有其促進作用。

2 東京酒樓、茶坊和集市

有些酒樓和茶坊成了一個地區集市的中心，例如潘樓門前是個每天自早到晚川流不息的集市。也有茶坊的夜間集市實質上成為賭場的，如稱為“鬼市子”的從行裏角茶坊，從五更到天明的集市就是這樣。也有些酒樓和茶坊成為居民夜游之處，如舊曹門街的北山子茶坊，“仕女往往夜游吃茶於彼”，“高陽正店夜市尤盛”（《東京夢華錄》卷二《潘樓東街巷》）。有不少酒樓和瓦子是通宵經營的，“大抵諸酒肆瓦市，不以風雨寒暑，白晝通夜，駢闐如此”（同書卷二《酒樓》）。東京夜市的興旺，與這些酒樓茶坊和瓦子的通宵經營有關。

酒樓是人來往最雜的地方。有些酒樓有妓女，如任店一到晚上，就有“濃粧妓女數百，聚於主廊檐（原誤作楹，從鄧之誠改正）面上，以待酒客呼喚”（同書卷二《酒樓》）。也還有婦女進去，“為酒客換湯斟酒”的，叫做“煖糟”；又更有人進去代酒客“買物命妓，取送錢物之類”的，叫做“閑漢”；又有人“向前換湯斟酒，歌

唱，或獻菓子、香藥之類”的，叫做“廝波”；又有下等妓女自來歌唱的，叫做“割客”或“打酒坐”；“又有賣藥或果實、蘿蔔之類，不問酒客買與不買，散與坐客，然後得錢，謂之撒哲”（同書卷二《飲食果子》）。這種風氣一直流行到南宋臨安。東京只有州橋的炭張家和舊曹門的乳酪張家不准前項人入店，以出賣一色好酒和好菜蔬著名。

3 東京飲食店的特色

東京飲食店已分門別類地開設於街市，而且花色品種很多。大的食店叫“分茶”，也叫“茶飯”；又有北食店和南食店、川飯店之分，又有稱為羊飯的，更有從食店、羹店、瓠羹店、餛飩店、餅店、素分茶以及菜麵、肥臛、寶隨飯的店。著名的分茶店如州橋以南的李四分茶，“北食則礬樓前李四家、段家燒（熬）物、石逢巴子，南食則寺橋金家（按寺橋當為相國寺橋）、九曲子周家，最為屈指。夜市直至三更盡，纔五更又復開張”（同書卷三《馬行街鋪席》）。羊飯以麵院街的薛家分茶、羊飯、熟羊肉鋪最為著名。從食以州橋的曹家從食最有名。瓠羹店以潘樓街的徐家瓠羹和尚書省西門西東子曲的史家瓠羹最出名。餅店有油餅店和胡餅店之分，以州橋以南的曹婆婆肉餅和土市子以南皇建院街的鄭家油餅以及龍津橋西南武或廟前的張家油餅最是興盛。袁褰《楓窗小牘》卷上說：“舊京工伎固多奇妙，即烹煮盤案亦復擅名。如王樓梅花包子、曹婆肉餅、薛家羊飯、梅花鵝鴨、曹家從食、徐家瓠羹、鄭家油餅、王家乳酪、段家燒物、石逢巴子南食之類，皆聲稱於時。”其中王樓梅花包子即王樓山洞梅花包子，它和梅家鵝鴨，都在州橋以南。

東京飲食店的花色品種很多。其中出名而受羣衆愛好的，

羹的品種較多，腰子的花色也不少，還有一種稱爲“簽”的燒法的菜也很時興，又多各色羊肉的品味。這種風味到南宋臨安都繼續有所發展。“犯鮓”是東京特有的一種被稱爲“珍味”的食肉，“犯”是經過加工調味的乾肉，“鮓”是經過加工調味的魚、蝦、蟹、雀等肉。加工製作“犯鮓”的著名食店，集中在宮城東華門外，以何、吳、魏三家最著（何吳二家見周輝《清波別志》卷下，魏氏見於洪邁《夷堅志補》卷九）。太平老人《袖中錦》中所談“天下第一”的物品中，就有“東華門犯鮓”。這一被稱爲“天下第一”的食品加工技術，到南宋臨安有了進一步的發展，設有專門的犯鮓店，名件增多到四十種。州橋以南夜市出售的“雜嚼”的食品，花色品種也很多，其中有夏天吃的涼水，如沙糖菘豆甘草冰雪涼水和荔枝膏，有稱爲“從食”的蒸作糕點，如沙糖冰雪冷元（圓）子等，到南宋臨安還是倍受歡迎。

（六） 北宋末年東京各種集市的分析

我們前面已經講到，從北宋初期到中期，東京興起了一系列的新行市，如斛斛行（即米麥行）、麵市、肉市、魚行、菜行、果子行、牛行、馬行、紗行、紙行、大貨行、小貨行、金銀行、珍珠行、文字行（即書籍行）等等，代替了舊的封閉式“市”，而在經濟生活中發揮了重大作用，就在這個基礎上發展成了繁華的街市。這許多新行市都是從交通便利的要道上的集市逐漸發展形成的。有些靠近城門口的新行市如麵市、肉市、果子行等，始終具有早晚集市的性質和特點。儘管到北宋末年，東京已經形成繁華面密集的街市，也還保留有不少的集市。就集市所在的地點來說，有定期的廟市，酒樓、茶坊的集市，瓦子的集市，城門口的集市和街

頭的集市。就集市的時間來說，有定期的集市，有定時的集市如早市、夜市以及白天的市，還有節日的集市。集市在北宋末年東京的市場貿易中還有一定的作用，這是東京新興街市的一個特點。

東京有些交通大道的交叉點，包括十字街頭或“丁”字形街頭，有稱爲“市”或“市子”的。如潘樓街東端的十字街頭，稱爲土市子，又稱爲竹竿市；土市子北去馬行街上的十字街頭，叫鷓兒市（《說郭》“鷓”作“鷓”，《東京夢華錄》卷二《潘樓東街巷》）；西大街西去的“丁”字形街頭，叫甕市子，是開封府刑人之所（同書卷三《大內西右掖門外街巷》）。所謂土市子、鷓兒市、甕市子，原先該是街頭的集市所在，後來這種街頭集市由於街市的興盛而消失了。但是還應該看到，當時東京的街頭集市還有存在，許多城門口和沿河近橋的地方以及橋頭上，往往還存在着集市。

1 天曉的早市

城門口街頭和橋頭集市的特點，往往是趕早市。每天交五更時刻，諸寺院打鐵牌子或敲木魚報曉，“諸趨朝入市之人，聞此而起，諸門橋市井已開”。瓠羹店間或有出售灌肺及炒肺的，灌肺是把一些食品灌進豬肺而烹煮，是宋代很流行的一種食品。酒店中多點燈燭而零售酒，每分不過二十文，并有粥飯點心出售。也有賣洗面水、煎湯茶藥的。到天明，殺豬羊作坊就用車子或挑擔送肉上市；麥麵也用布袋裝好，裝上太平車或馱着驢馬，守在城門外，等門開入城買賣。果木會集後送到裏城朱雀門外以及州橋以西的果子行，同時“紙畫兒亦在彼處行販不絕”；更“有御街州橋至南內前，趁朝賣藥及飲食者，吟叫百端”（同書卷

三《天曉諸人入市》)。“南內前”，是指南部的大內前面；所謂“御街州橋至南內前”，就是指州橋以北，直到宮城宣德門的一段御街。所說“趁朝”，就是說趁這個百官上朝的時刻，叫賣藥材和飲食品。在宋徽宗政和年間以前，宣德門前兩邊御廊中，“舊許市人買賣於其間”，因而清早百官上朝經過這條御街時，商人會在沿街擺成集市，從州橋直到宣德門口，一路上“吟叫百端”。自從政和年間禁止在這一帶買賣後，宮城東面“東華門外市井最盛”，因為宮中的官僚和宮女早上派人在此採辦所需食品及其他物品，包括時鮮花果、魚蝦蟹、鶉兔脯臘等食品以及金玉珍玩衣著。這種風氣一直流傳到南宋臨安，臨安宮城和寧門外紅杈子內“早市買賣市井最盛”(《夢梁錄》卷八《大內》)。

2 酒樓、茶坊、集市的特點

酒樓和茶坊的集市另有其特點。當時人們常常在夜間於酒樓、茶坊約會親友，或在夜間舉行宴會，夜遊吃茶，常常尋歡作樂到深夜，因而許多大的酒樓和茶坊夜市很盛，夜間的集市也就跟着興起。土市子以東十字大街上的從行裏角茶坊，每五更，便點燈“博易”，買賣衣物、圖畫、花環、領抹之類，到天明便散，有“鬼市子”之稱(《東京夢華錄》卷二《潘樓東街巷》)。這個“鬼市子”，實際上是一個天亮前的賭場。它所以要天明散去，因為這種買賣具有賭博性質，即所謂“博易”，也叫做“撲賣”或“關撲”，這是以銅錢為賭具，按錢上的字幕定輸贏的。北宋政府平時禁止“關撲”，只有元旦、冬至、寒食三節，由開封府出榜，各開禁三天。這裏所以要弄成天明前的“鬼市子”，是爲了給官府面子，免得白天公開犯禁。

酒樓的集市，以潘樓規模最大，這是一個經常性的貿易集

市。每天的集市要分成五批：第一批從五更開始，買賣衣物、書畫、珍玩、犀玉，這是高檔貨品的集市。第二批從天明開始，買賣羊頭、肚肺、腰子，鶉兔鳩鴿等野味，螃蟹、蛤蜊等水產品，這是零星的食物集市。第三批接着來的，是“諸手作人”上市，買賣零碎“作料”，這又是零碎的手工業材料的集市。第四批是在飯後，上市的是團子、糖果、蜜煎品之類，又是零星的糕點糖果的集市。第五批在入晚以後，買賣頭面、冠梳、領抹、珍玩、動使之類，動使是指日常使用的各種家具用品。這又是個服飾、家常用具以及珍玩的集市。這樣從早到晚，分批地舉行定時的集市，以適應居民各方面的需要。

3 瓦子的集市

瓦子的集市又有不同的特點。桑家瓦子的集市，主要是“貨藥、賣卦、喝故衣、探搏、飲食、剃剪、紙畫、令曲之類”（《東京夢華錄》卷三《東角樓街巷》）。“探搏”二字意義不明。“喝故衣”當是叫喊拍賣舊衣的攤子，“剃剪”當是理髮的攤子，“紙畫”是賣當時流行的紙畫的攤子，“令曲”是出售一般曲譜唱詞的攤子。“令”原是唐宋雜曲的一種，“令曲”連稱，有泛稱和專稱兩種意義，專稱只是指每片四拍的“小令”而言，這裏用的是泛稱，指一般曲譜唱詞而言。例如《都城紀勝》“瓦舍衆伎”條說：“嘌唱，謂上鼓面唱令曲小調”。嘌唱的令曲小調，在當時十分流行。瓦子是以演藝的勾欄為中心的集市，因而很需要有令曲的印本出售，以便喜愛的觀眾學習演唱。

4 相國寺的廟市

宋代廟市是很流行的，不少寺院常常在四月八日（佛生日）

舉行盛大的廟會和集市。例如福州的報國寺從元豐年間開始，每年四月八日有“慶讚大會”，分施衣巾扇藥之屬（《淳熙三山志》卷四十“土俗”）。東京相國寺的廟市，每月在朔望和三個逢八的日子舉行，該即由廟會進一步的發展而形成。它採用分門別類的佈置方式，成爲一個定期的百貨市場，既便於都城居民到此選購，又便於客商前來銷售。“中庭兩廡可容萬人，凡商旅交易皆萃其中。四方趨京師以貨物求售，轉售他物者，必由於此。”（王楙《燕翼詒謀錄》卷二）例如杭州人楊靖因以花石供獻童貫，做到州都監，爲了謀求連任，造精巧的螺鈿火鑲三盒，託當地人陳六舟之子十一郎帶進京城，一供禁中，一獻蔡京，一與童貫。十一郎“但以一進御，而貨其二於相國寺，得錢數百千，爲游冶費”（《夷堅志》甲集卷十八）。這種精工的螺鈿製品在當時是十分名貴的。

相國寺的廟市，大三門上賣飛禽貓狗以及珍禽奇獸，第二座三門上賣“動用、雜物”，廣大庭中所設綵幕、露屋、義鋪內，既有家用器物如蒲盒、簞席、屏幃以及洗漱用的器皿，又有馬具如鞍轡，兵器如弓劍，更有時菓（時鮮菓子）、臘脯等食品。近大殿（即彌勒殿）有孟家道院王道人蜜煎、趙文秀筆、潘谷墨，都是名家的製作。兩廊有諸寺師姑的繡作、領抹、花朵、珠翠頭面、生色銷金花樣幘頭帽子、特髻冠子、條線之類。“繡作”是指刺繡工藝品，相國寺南有繡巷，“皆師姑繡作居住”（《東京夢華錄》卷三《寺東門街巷》）。“花朵”是指製作的衣飾上用的花朵，“銷金”是指用金箔或金綫製成的圖案花樣。“銷金”是當時的奢侈裝飾，從宋太宗以後曾不斷下令禁止民間使用“銷金”以及其他耗費黃金的裝飾，但實際上還是很風行的。大殿後和資聖閣前，賣書籍、玩好、圖畫以及諸路散任官員的土物（即土產）、香藥之類；後廊都是占

卜者(同書卷三《相國寺萬姓交易》)(參看圖5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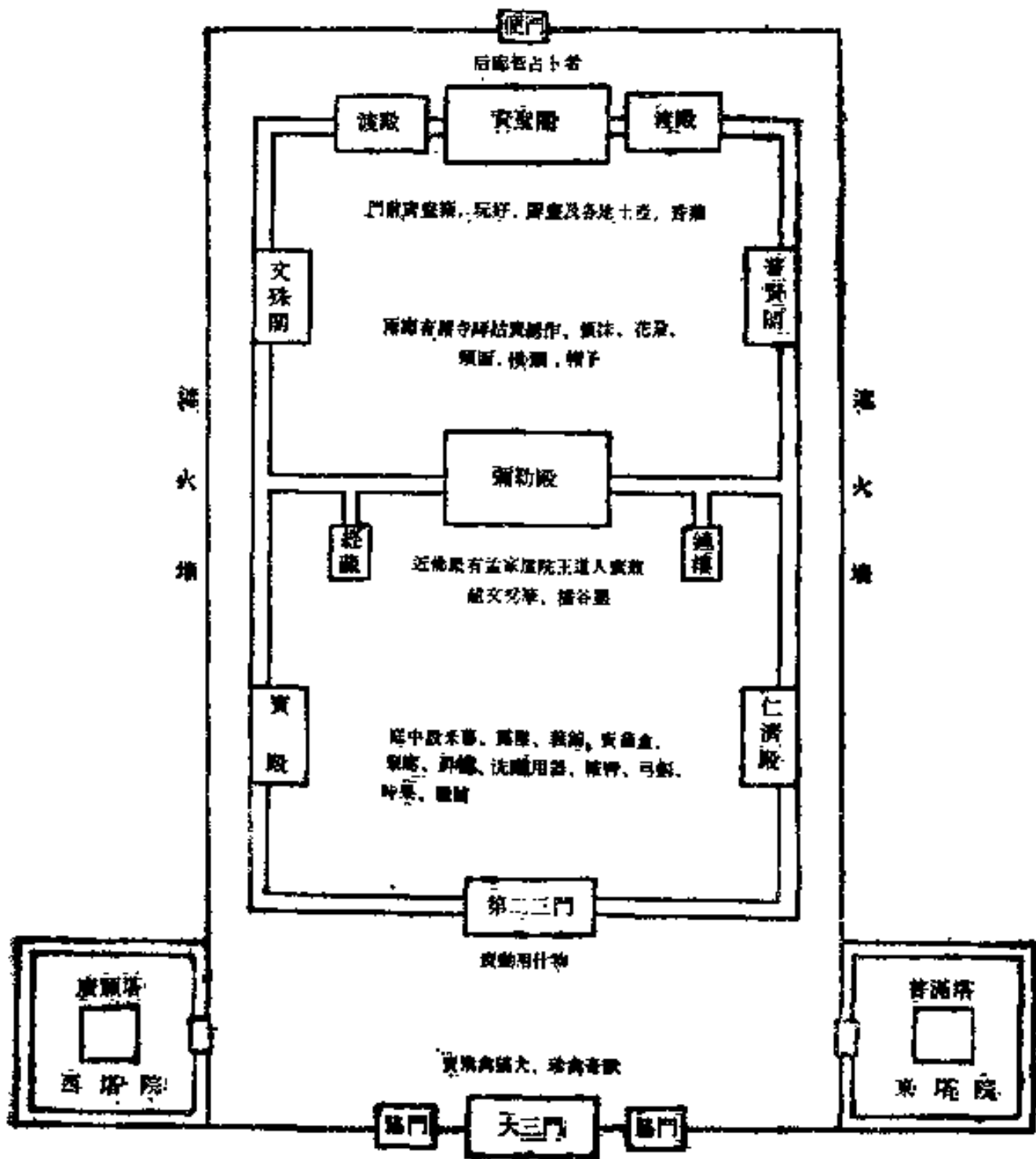


圖57 北宋東京(開封)大相國寺主院“廟市”示意圖

(此圖平面結構採自徐萃芳《北宋開封大相國寺平面復原圖說》，《文物與考古論集》文物出版社1986年出版，“廟市”部分乃作者所加)

5 集市上的書畫玩好

從這些“萬姓交易”的集市上，可以看到當時都城居民的文

化生活已有很大的提高。不但筆墨有名家趙文秀和潘谷的製作，書籍、玩好和圖畫也都已成為重要的商品。除了寺東門大街上有書籍鋪以外，潘樓和相國寺的集市上都有書籍，人們常常從這些集市上得到名貴的書籍。如“黃魯直於相國寺得宋子京《唐史稿》一冊，歸而熟觀之，自是文章日進”（朱弁《曲洧舊聞》卷四）。潘樓和相國寺以及鬼市子的集市也都有圖畫。當時紙畫十分流行，有稱為“時行紙畫”的，當是裝飾用的，或者作為手工藝的圖樣。不但州橋以西的果子行一帶，和花果鋪一起，有不少賣“時行紙畫”的鋪席，而且早市上，當果木會集到朱雀門外和州橋以西的果子行時，“紙畫兒亦在彼處行販不絕”。桑家瓦子的集市上亦以“紙畫”和“令曲”并列。“玩好”和書畫作為一類，該包括古代文物和當代工藝品在內，所以有時稱為“珍玩”，與“犀玉”并稱。如潘樓的五更集市上就是這樣。有時以“金玉玩好”并提，如東華門外集市上就是這樣。

6 節日的集市

節日的集市，主要供應節日的特殊需要。如端午節有“鼓扇百索市”，潘樓下、麗景門外、閭闔門、朱雀門內外、相國寺東廊、陸親廣親宅前，皆賣此等物。七夕有“乞巧市”，潘樓前賣乞巧物，至七夕前三日，車馬不通行（金盈之《醉翁談錄》卷四），同時街市和瓦子都賣“磨喝樂”，是泥塑小孩（《東京夢華錄》卷八《七夕》）。中元節（七月十五），“先數日市井賣冥器靴鞋、幘頭、帽子、金犀假帶、五綵衣服，以紙糊架子盤游出賣”（同書卷八《中元節》）。所說冥器靴鞋等，全是紙做的。九月“下旬即賣冥衣、靴鞋、席帽、衣段，以十月朔燒獻故也”（同書卷九《重陽》）。宋代開始流行以紙冥器燒獻。“近歲節，市井皆印賣門神、鍾馗、桃板、

桃符及財門純驢、回頭鹿馬、天行帖子。賣乾茄瓠、馬牙菜、膠牙糖之類，以備除夜之用”(同書卷十〈十二月〉)。“東京潘樓下，從歲前賣此等物(指膠牙糖)至除夜，殆不通車馬。”(陳元靚〈歲時廣記〉卷四)說明潘樓的集市到節日賣客更加擁擠。

(七) 北宋末年東京瓦子的勾欄及其演藝

1 東京瓦子的勾欄

前面已談到，以勾欄為中心的瓦子，是一種以戲場為中心的集市，是由於街頭藝人在交通要道旁的空地上表演而發展形成的。這是北宋開始出現的，到北宋末年，東京共有六處瓦子。最大的桑家瓦子在最熱鬧的潘樓街，其餘五處瓦子都在裏城四周的城門口外的交通要道旁，州西瓦子在西面梁門外，朱家橋瓦子(即州東瓦子)在東面舊曹門外，州北瓦子在北面舊封丘門外，新門瓦子和保康門瓦子在南面新門外和保康門外(參看圖58)。

桑家瓦子規模最大，“近北則中瓦，次裏瓦，其中大小勾欄五十餘座。內中瓦子蓮花棚、牡丹棚，裏瓦子夜叉棚、象棚最大，可容數千人。自丁先現、王團子、張七聖輩，後來可有人於此作場”(《東京夢華錄》卷二〈東角樓街巷〉)。演出的戲場叫勾欄，又稱為棚，中瓦子的棚以花命名，裏瓦子的棚又以夜叉(佛經所說吃人的惡鬼)和象命名。丁先現即丁仙現，是宋神宗、哲宗時的著名伶人，可知桑家瓦子至少宋哲宗時已經很著名。州西瓦子規模也不小，“南自汴河岸，北抵梁門大街，亞其裏瓦，約一里有餘”(同書卷三〈大內西右掖門外街巷〉)。“亞”通“淹”，深藏之意，這是說州西瓦子所佔地位，南自汴河堤岸，北到梁門大街，把“裏瓦”深藏在後面，有一里多長。說明這個瓦子也有中瓦子和

裏瓦子兩部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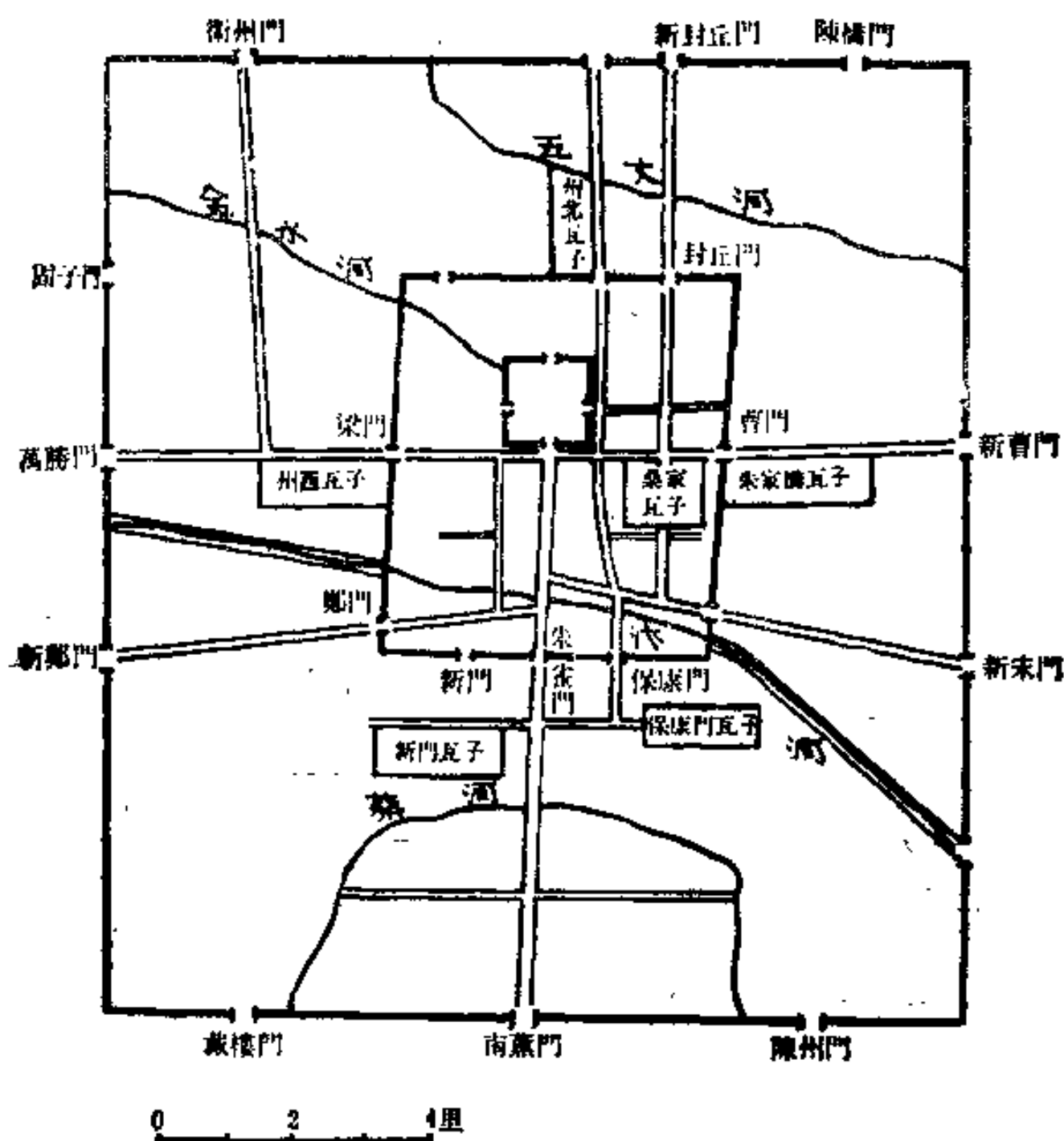


圖58 北宋末年東京(開封)瓦子分佈圖

2 勾欄表演的技藝

《東京夢華錄》卷五《京瓦伎藝》，介紹了“崇觀以來(即宋徽宗崇寧大觀年間以來)在京瓦肆伎藝”的情況，所列舉的表演技藝有下列許多種：

一、小說 唐代小說的創作大盛，被收輯到《太平廣記》中的很多。唐代也已有“市人”演說“小說”的。有人認為“小說起宋仁宗，蓋時太平盛久，國家閑暇，日欲進一奇怪之事以誤之，故小說得勝”（郎瑛《七修類稿》卷二十二）。其實所謂“小說起宋仁宗”，只是指“市人”演說“小說”從仁宗時開始盛行。到北宋末年演說“小說”更爲風行，至今流傳的宋人《宣和遺事》，就是“小說”一類的作品。

二、講史 講史是小說的分支，同唐代寺院的“俗講”也有關係，因爲“俗講”不但講佛經中的故事，也還講歷史故事如伍子胥，王昭君等。三國的故事是北宋講史的主要題材，高承《事物紀原》卷九載：“仁宗時市人有能談三國事者，或採其說，加緣飾，作影人（按即皮影戲），始爲魏、吳、蜀三分戰爭之象。”東京瓦子中就有“霍四究說三分”，與“尹常寶五代史”齊名（《東京夢華錄》卷五《京瓦伎藝》）。五代史，在當時是時代較近的歷史，人們比較熟悉，因而演說一番很能吸引聽衆。至今流傳的宋人《五代史平話》，就是“講史”一類的話本。

三、嘌唱和小唱 《都城紀勝》“瓦舍衆伎”條：“嘌唱，謂上鼓面，唱令曲小調，驅駕虛音，纒弄宮調。”“若以嘌唱，爲引子次用四句就人者，謂之下影帶。無影帶者名爲散叫。若不上鼓面，只敲盞者，謂之打拍。”“嘌唱”是打鼓或敲盞作節奏的清唱，唱令曲、小調的，有的開頭有四句引子。《都城紀勝》同條：“唱叫、小唱，謂執板唱慢曲、曲破，大率重起輕殺，故曰淺斟低唱，與四十大曲、舞旋爲一體。”小唱是執板而打擊作節奏的清唱，唱慢曲、曲破。“慢曲”是指拍子緩慢的曲調，每片八拍，“曲破”是只唱大曲中間稱爲“破”或“入破”的一段。也有打鼓擊板而清唱的，稱爲“鼓板小唱”（《東京夢華錄》卷八，《六月六日崔府君生日、二十四。

日神保觀神生日》)。

四、諸宮調 這是集合許多“宮調”組成的許多“短套”，說唱長篇的傳奇、靈怪故事，可以說是由“小說”和“樂曲”的結合發展而形成的。原是宋神宗熙寧元豐年間澤州孔三傳創始的（王灼《碧雞漫志》卷二）。《都城紀勝》“瓦舍衆伎”條：“諸宮調本京師孔三傳編撰，傳奇、靈怪入曲說唱。”東京瓦子上演的，就是“孔三傳耍秀才諸宮調”（《東京夢華錄》卷五《京瓦伎藝》）。這種諸宮調到南宋，多由女藝人說唱，很有發展。

五、雜劇和雜班 雜劇是以唱、念、應對的方式表演故事情節，引人發笑而兼以勸戒爲目的。唐代已有參軍、蒼鶻等脚色，到北宋發展爲副淨、副末等脚色，副淨是劇中主角，副末是配角。北宋宮廷的教坊常於上壽大宴禮節中演出雜劇，都是“一場兩段”（《東京夢華錄》卷九《宰執親王宗室百官入內上壽》）。“每遇內宴前一月，教坊內勾集弟子小兒，習隊舞作樂、雜劇節次”（同書卷五《京瓦伎藝》），因而有“弟子雜劇”之稱。當三月一日皇帝到寶津樓看諸軍百戲時，“諸軍繳隊雜劇一段，繼而露臺弟子雜劇一段。是時弟子蕭住兒、丁都賽、薛子大、薛子小、楊總惜、崔上壽之輩”（同書卷七《駕登寶津樓諸軍呈百戲》）。東京瓦子上演的，就是教坊所訓練的這種“弟子雜劇”。同書卷五《京瓦伎藝》：“弟子薛子大、薛子小、俏枝兒、楊總惜、周壽、奴稱心等般雜劇。”另有“每日五更頭回小雜劇”，“李敦等雜噉”。雜噉或作雜班、雜扮。又名紐元子，“即雜劇之後散段也”（《夢梁錄》卷二十《妓樂》）。也還有稱爲“浪子雜劇”的（《東京夢華錄》卷八《六月六日崔府君生日、二十四日神保觀神生日》）。雜劇原是教坊的“正色”，“教坊大使在京師時，有孟角球曾撰雜劇本子，又有葛守成撰四十大曲詞，又有丁仙現捷才知音”（《都城紀勝》“瓦舍衆伎”條）。《武林舊

事》卷十載有南宋《官本雜劇段數》二百八十本，其中如《王子高六么》一本就是宋神宗時的作品（王國維《宋元戲曲考》五《宋官本雜劇段數》）。

六、傀儡戲 起源很早，從漢一直流行到唐。北宋東京瓦子已有仗頭傀儡、懸絲傀儡、藥發傀儡（《東京夢華錄》卷五《京瓦伎藝》），也還有水傀儡（同書卷七《池苑內縱人關撲遊戲》講到“李外寧水傀儡”）。

七、影戲和喬影戲 宋仁宗時創始，用來演三國事（《事物紀原》卷九）。“京師人初以素紙雕鏤，後用彩色裝皮爲之，其話本與講史者頗同。”（《都城紀勝》“瓦舍衆伎”條）這種影戲不僅東京瓦子中流行，每逢大的節日還有在坊巷口，“多設小影戲棚子，以防本坊游人小兒相失，以引聚之”（《東京夢華錄》卷六《十六日》）。

八、商謎和合生 “商謎”是猜詩謎、字謎等等謎語。“合生”一作“合笙”，是“指物題詠，應命輒成者”，“其滑稽含玩諷者，謂之喬合生”（洪邁《夷堅志》乙集卷六）。

九、說諢話和叫果子 “說諢話”是說滑稽有趣的話。“叫果子”是把市上各色叫賣聲，加工成唱腔，亦稱“叫聲”、“吟叫”。

十、雜技 東京瓦子中表演的，有小掉刀、筋骨、上索雜手伎渾身眼、李宗正、張哥；毬杖踢弄孫寬、孫十五、曾無黨、高恕、李孝祥；小兒相撲、雜劇、掉刀蠻牌董十五、趙七、曹保義、朱婆兒、沒困駝、風僧哥、俎六姐；弄蟲蟻劉百禽等（《東京夢華錄》卷五《京瓦伎藝》）。元宵在御街兩廊下表演的，“有擊丸、蹴球、踏索、上竿，趙野人倒吃冷淘（冷淘即今涼粉），張九哥吞鐵劍，李外寧藥發傀儡，小健兒吐五色水、旋燒泥丸子，大特落灰藥槽柚兒雜劇，溫大頭、小曹嵇琴，黨千簫管，孫四燒煉藥方，王十二作劇術，鄒

遇、田地廣雜扮，蘇十、孟宣築毬，尹常賣五代史，劉百禽蟲蟻，櫻文秀鼓笛，更有猴呈百戲，魚跳刀門，使喚蜂蝶、追呼螻蛄”（同書卷六〈元宵〉）。這中間夾雜有一些不是雜技的表演。擊丸、蹴球、踏索、上竿是傳統的雜技。六月二十四日神保觀神生日，表演的百戲有上竿、趨弄、跳索、相撲、鼓板小唱、鬥雞、說評話、雜扮、商謎、合笙、喬筋骨、喬相撲、浪子雜劇、叫果子、學像生、倬（掉刀）裝鬼、研鼓牌棒、道術之類（同書卷八〈六月六日崔府君生日〉、〈二十四日神保觀神生日〉）。

值得注意的是，由於瓦子的發展，民間藝人大為活躍，技藝也有很大的提高，出現了許多著名藝人。他們不僅在瓦子的勾欄表演，也還要在一些羣衆性的節日以及官府的游樂節日演出。如三月一日開金明池、瓊林苑，“隨駕藝人池上作場者，宣政間，張藝多、渾身眼、宋壽香、尹士安小樂器、李外寧水傀儡”（同書卷七〈池苑內縱人關撲遊戲〉）。渾身眼本是瓦子中演雜技的，李外寧本是瓦子中演傀儡的。

（八） 北宋末年東京街市的治安 設施和服務性行業

1 行政系統和治安管理

北宋東京在行政上屬開封府管轄，城內外分屬開封、祥符兩縣統治。從秦漢直到唐代，縣的治安設有縣尉主管，五代時軍人掌權，改設鎮將主管，北宋初年又恢復設置縣尉，所屬有弓手幾十人。這是屬於行政系統的。另外屬於軍事系統的，州縣都設有巡檢，掌管訓練士兵、巡邏和追捕盜賊，巡檢所屬有各種士兵。北宋東京也採用與州縣相同的制度，設有縣尉。但是因為“坊”之上有“廂”的設置，京城中除設有總巡檢以外，每廂在設有廂

使、廂典等官的同時，還設有廂巡檢。廂內有廂典、書手、都所由、所由、街子、行官等，主管行政事務，包括估計家業、取問病人口詞及檢驗、救火等事，也負責督察盜賊。廂巡檢所屬有禁軍，主管巡邏、救火與捕盜^⑧。廂巡檢挑選馬步軍司所屬軍官充任。原來規定京城住戶失火，須等候都巡檢到場方始救潑。宋真宗大中祥符二年（公元1009年）六月下詔：“今後如有遺火，仰探火軍人走報巡檢，晝時赴救。都巡檢未到，即本廂巡檢先救；如去巡檢地分遙遠，左右軍巡使或本地分廂界巡檢員指揮使先到，即指揮兵士、水行人等，與本主同共救潑，不得枉拆遠火屋舍。”（《宋會要輯稿》兵三、廂巡）這裏把救火作為巡檢的專職，為了分清責任還作了種種規定。

2 軍巡鋪屋和防火措施

由於街市的興起，街巷的建築很密集，失火很容易延燒。因而“京師火禁甚嚴，將夜分即滅燭，故士庶家凡有醮祭者，必先關白廂使，以其焚楮幣在中夕之後也”。宋仁宗至和、嘉祐年間，樞密使狄武襄一夕醮祭，偶而忘記報告，中夜就有探子馳白廂主，又報開封知府。等到廂主、判官到宅，火已熄滅很久，但事後官場中很多議論，迫使狄武襄自請調離京城（魏泰《東軒筆記》卷十）。據此可知，京城夜間有探子探查觸犯“火禁”的事，上報到廂主和知府，廂主和判官就要親往調查處理。

北宋京師還有設望火樓以及每坊巷三百步設軍巡鋪屋一所的制度。《東京夢華錄》卷三《防火》：

每坊巷三百步許，有軍巡鋪屋一所，鋪兵五人，夜間巡警，收領公事。又於高處磚砌望火樓，樓上有人卓望。下有官屋數間，屯駐兵百餘人，及有救火家事，謂如大小桶、洒子、麻搭、斧鋸、梯子、火叉、大索、

鐵貓兒之類。每遇有遺火去處，則有馬軍奔報軍、廂主，馬步軍、殿前三衛、開封府，各領軍級撲滅，不勞百姓。

這裏所說“軍巡鋪屋”，設有鋪兵五人，於夜間巡警，并收領公事，這是坊巷間所設的警察派出所，相當於秦漢都城中街上設的“亭”和唐代長安坊角設的武侯鋪（即街鋪）。南宋紹興二年正月二十一日，臣僚言：“乞下樞密院，委馬步軍司措置，略倣京城內外徼巡之法，就錢塘城內分爲四廂，……每廂量地步遠近置鋪若干，每一鋪差禁軍長行六名，夜擊鼓以應更漏，使聲相聞，仍略備防火器物。每兩鋪差節級一名，每十名差軍員一名，皆總之於巡檢。遇有收領公事，解送臨安府，仍日具平安，申馬步軍司。本地分有盜賊，則巡檢而下，皆坐罪如在京法”（《宋會要輯稿》兵三、廂巡）。南宋臣僚請求在臨安仿效東京內外徼巡之法，每廂按一定地段設鋪，這種鋪就是軍巡鋪屋。軍巡鋪屋的責任不僅在於防火，更重要的是巡警和收領公事以及防捕盜賊。軍巡鋪屋所駐的是軍隊，屬於軍事系統，和唐代長安的武侯鋪同樣性質。

望火樓的設置，是北宋東京的創舉，這是繁華的街市興起以後防火的必要措施。同時把撲滅火災作爲駐軍的重要責職，而且規定：“在法放火者不獲，其主吏皆坐罪”，後來又改爲“非延及旁家者，雖失捕勿坐”（《說郭》卷八十二引《道山清話》）。當時京城駐軍很多，軍官很方便迅速地調集大量人力用於撲滅火災。

3 官營藥局與服務性行業

官營的出售成藥的局——惠民局在東京街上開設，這又是北宋政府的創舉。在人口密集的東京，如何設法方便病人醫治，這是個必須解決的社會問題。北宋政府十分重視醫學事業和醫療設施，曾經校正唐代以前的許多醫書加以出版，連續五次修訂

《本草》，多次彙編醫方總集如《太平聖惠方》和《聖濟總錄》等。到宋神宗時，又創設了出售成藥的官營惠民局，並且頒布了作為處方標準的“方書”，大觀年間編成《校正太平惠民和劑局方》五卷。惠民局按方劑製成丸、散、膏、丹等成藥出售。後來惠民局逐漸增加到五局、七局，分佈城內。如惠民南局在龍津橋以南太學南的橫街上，惠民西局在西大街的街北巷口。這些官藥局便於居民按病求藥治療和對症發售有效的成藥，因而很受居民歡迎，得到了發展。蔡條《鐵圍山叢談》卷六說：“都邑惠民多增五局，貨藥濟四方，甚盛舉也。歲出入得息錢四十萬緡，入戶部助經費。然往時議者甚大不然矣。”官府口稱“惠民”，實際上還是要從中謀利，當然要引起人們的不滿。

正因為官府對醫藥的提倡和都城中衆多居民的需要，街市上醫藥業很是興旺，不僅繁華的馬行街北段兩行都是醫鋪和藥鋪，其中有口齒咽喉的專門藥店，也有小兒科和產科的專門醫鋪；景靈西官南面也有丸藥鋪，舊曹門街又有專門的小兒藥鋪，牛行街更有七開間門面的劉家藥鋪，此外踴路街上和西大街上還有許多著名的藥鋪。

隨着衆多居民的需要，服務性行業也開始興起。“其供人家打水者，各有地分坊巷”，還有使漆、打釵鑲、荷大斧斫柴、換扇子柄、供香、餅子、炭團的，夏月洗氈、淘井者；又有錮路、釘鉸、箍桶、修整動使、掌鞋、刷腰帶、修幞頭帽子、補角冠、日供打香印者（《東京夢華錄》卷三《諸色雜賣》）。更有租借的行業，如婚嫁所乘的擔子，以至隨從人的衣服用具，都有假賃之處；一般乘坐的牛車，可容六人，也可租借（同書卷四《皇后出乘輿》）。如“路遠倦行”，“自有假賃鞍馬者，不過百錢”。如有喪事出殯，“凶肆”自有“方相車輿”和“結絡綵帛”出借，“皆有定價”（同書卷四《雜貨》）。

這種“凶肆”唐代長安已很興盛，這時不過沿襲這種風氣而已。民間吉凶筵會的桌椅、陳設、器物自有“茶酒司”管理和租借；吃食下酒自有“廚司”管理烹飪；另有白席人（相禮者）“托盤下請書，安排坐次，尊前執事，歌說勸酒”，總稱為“四司”。如果要到園林寺院去游覽而請客的，“四司人”也是“各有地分，承攬排備，自有則例，亦不敢過越取錢”（同書卷四《筵會假貨》）。這種“各有地分”的“四司”服務性行業，到南宋臨安更有發展，成為所謂“四司六局”。

自從東京廢除街鼓制度以後，寺院就擔當起天明的“報曉”工作。除每天定時敲鐘“報曉”外，還有行者沿街打鐵牌子或木魚“報曉”。“每日交五更，諸寺院行者打鐵牌子或木魚循門報曉，亦各分地分，日間求化。諸趨朝、入市之人聞此而起。”（同書卷三《天曉諸人入市》）就是說，這些白天敲木魚或打鐵牌子沿街求化（即募集為佛教事業的捐款）的行者，各有地分，擔當着天明的“報曉”工作，“趨朝”的官吏和“入市”的人們就是“聞此而起”。

① 《東都事略》卷二十八《李懷忠傳》載：“太祖幸西京，有遷都意，懷忠乘間言：‘汴都歲漕江淮米四五百萬斛，贖軍數十萬計，帑藏重兵在焉，陛下遽欲都洛，巨費未見其利’”秦觀《淮海集》卷十三《安都》：“今梁居天下之中，歲漕東南六百萬斛，以給軍食，猶恐不贖，矧欲襲漢唐之迹，而都周、雍之墟，何異操大賈之術而欲托大農之地也。”太平興國六年（公元981年）汴河漕運江淮米三百萬石，十多年後，至道初年增至五百八十萬石，又十多年後，大中祥符初年增至七百萬石。見《文獻通考》卷二十五。

② 日本加藤繁《宋代都市的發展》根據《東京夢華錄》，認為“坊的制度——就是用牆把坊圍起來，除了特定的高官等以外，不許向街路

開門的制度——到了北宋末年已經完全崩潰，庶人也可以任意面街造屋開門了。”（吳傑中譯本《中國經濟史考證》第一卷254頁）我們認為五代末年後周擴建東京外城的新規劃，已經承認沿街居民可以任意當街開門，如同坊中沿巷居民可以任意向巷開門一樣。

- ③ 參見李誠《營造法式》卷四《大木作制度》“總鋪作”條和卷八《小木作制度三》“門八藻井”條。《夢溪筆談》卷十九《器用》：“屋上覆椽，古人謂之綺井，亦曰藻井，又謂之覆海，今令文中謂之門八，吳人謂之懸頂，唯宮室祠觀爲之。”按斗拱由若干料與拱壘疊而成，總稱鋪作。使用“四鋪作”結構的，是較大規模的建築。
- ④ 日本加藤繁《宋代都市的發展》說：“街鼓制度，也就是隨着街鼓而開閉坊門的制度。坊制既經破壞，在坊周圍的住家的已經誰都可以朝街開門，那末，坊門的開閉已經沒有以前那樣的重要意義，因此，開閉也沒有一定的規則，這樣，街鼓的制度也自然只有廢弛下去了。我們應該這樣看：坊制的崩潰和街鼓的弛廢是同時發生的。所以，不妨說：仁宗中期以後不聞街鼓之聲的時期，同時就是坊制崩潰的時期。”（中譯本《中國經濟史考證》第1卷258頁）。我們認為，五代末年後周擴建東京外城的新規劃已經使“街坊”體制發生重大變化，沿街都有居民向街開門，“坊巷”應該設在沿街居民住宅的內側，街道居民已與坊巷居民分開。隨着街鼓而開閉坊巷之門的制度只能限制坊巷居民的行動，而不能限制街道居民，這樣街鼓制度也就失去它原有的作用。因此宋太宗時和宋真宗時，兩度恢復街鼓制度，都不可能維持很久。
- ⑤ 日本梅原都《宋代的開封和城市制度》（《鷹陵史學》三、四號合刊，1977年七月出版）曾指出：“侵街與坊制崩潰的關係在宋代是否像唐代那樣密切，還是個疑問。”日本木田知生《關於宋代城市研究的諸問題——以國都開封爲中心》（《東洋史研究》第37卷第2號。馮佐哲譯成中文，刊《河南師大學報》1980年第2期），認為開封城市面貌上的改觀和變化最大的特徵是“侵街”現象，咸平五年“謝德權

條上街衢廣表計劃與禁鼓昏曉之制，全部大體上恢復到唐代長安的舊制（即坊制）了”。後來天聖二年、景祐二年官府撤去侵街房屋的命令，都是“立表柱木，只拆除規定的界綫以外的侵街房屋，也就是說把規定的界綫以內的房屋，從拆除對象中避開”。“後周顯德三年詔書中承認了在街路兩旁種植樹木等事，至於默認在其位置上建造店肆、邸店或酒樓，這大概是必然的推移吧。”我們認為，顯德三年詔書，不僅准許街路兩旁種樹、掘井、搭涼棚等事，實際上已規定一種新的街道制度，准許街路兩邊建有人戶并向街開門，從此街道已與封閉式的坊制無關。這時拆除侵街房屋的目的，只是爲了維持街道一定的寬度而已。這時使城市面貌改變的，主要是爲適應衆多居民生活上的需要，交通便利地點新行市的興起和發展，同時在這個基礎上促進了“街市”的形成和發展。

- ⑥ 周城《宋東京考》卷一，講到新城“北四門”，“中曰通天，即封邱；……東曰長景，即陳橋；次東曰永泰，即新酸棗，西曰安肅，即衛州門”。按《宋會要輯稿》方域一之一，“東曰景陽，周曰長景”。北宋時這個門當稱景楊，長景是後周的舊名，俗名爲陳橋門。次東永泰正對舊城安遠門，即俗稱舊封丘門，那末永泰的俗稱應爲新封丘門。中爲通天正對舊城景龍門，即俗稱舊酸棗門，那末通天的俗稱應爲新酸棗門。《宋東京考》謂通天即封邱，永泰即新酸棗，不確。
- ⑦ 《東京夢華錄》卷一《大內》：“右掖門裏西去乃天章、寶文等閣，……入門東去街北廊乃樞密院，次中書省，次都堂，宰相朝退治事於此，次門下省。”
- ⑧ 《東京夢華錄》卷三《相國寺內萬姓交易》：“每月五次開放。”樓鑰《北行日錄》卷上“乾道五年十二月九日”條：“相國寺如故，每月亦以三、八日開寺。”王得臣《麴史》卷下：“都城相國寺最據衝會，每月朔、望、三、八日即開。”“三、八日”或者解釋爲三日和八日，但與“五次開放”不合。“三、八日”當是三個逢八的日子，即初八、十八、廿八，再加上朔望，正合五次。王楙《燕翼詒謀錄》卷三：“北俗遇月三七

日，不食酒肉，蓋重道教之故。“三七日”亦指三個逢七的日子
佛教重視逢八的日子，當因四月八日是釋伽生辰之故。

- ⑨ 鄧之誠《東京夢華錄注》讀作“街東車家炭、張家酒店”。恐不確。同書卷二《飲食果子》：“唯州橋炭張家、乳酪張家，不放前項人入店（按前項人指做買賣、賣唱、借故討乞的人），亦不賣下酒，惟以好淹藏菜蔬，賣一色好酒。”可見炭張家應為酒店名，車家亦應為酒店名。北宋有不少店名，於姓氏上另加形容字，當因同姓者多而加以區別。如同書卷二《酒樓》有“曹門樓王家、乳酪張家”等。
- ⑩ 《東京夢華錄》卷八《七夕》：“潘樓街、東宋門外瓦子、州西梁門外瓦子、北門外、南朱雀門外街及馬行街內，皆賣磨喝樂。”按“東宋門”上、“南朱雀門”上都脫“州”字，“宋門”當為“曹門”之誤。同書卷八《中元節》：“潘樓并州東西瓦子，亦如七夕。”州東瓦子亦當指舊曹門外朱家橋瓦子。
- ⑪ 《東京夢華錄》卷二《酒樓》：“州西宣城樓、藥張四店、班樓。”可知這一帶還有酒店叫藥張四店，“藥張”就是於姓氏上另加區別的形容字。確切地點不詳。
- ⑫ 許多研究者沒有注意到這點，因而誤認為東水門一帶只有水路的交通。其實當時人是常乘車或騎馬從城中由此外出的。張知甫《張氏可書》載：“道君既遜位，乘輕輿出東水門，自稅舟，得一草籠回脚糧船，與舟人約價登舟。見賣蒸餅者，於籠中取金錢十文市一枚以食。少頃，童貫蔡攸者數人，單騎俱至。”說明這條交通線上既可以乘輕輿，又可以單騎，更可以乘船。
- ⑬ 近年從事研究《清明上河圖》的主要作品，有臧華雲《談清明上河圖》（《文物參考資料》1954年第1期）、徐邦達《清明上河圖的初步研究》（《故宮博物院院刊》第1期，1958年出版）、張安治《張擇端清明上河圖研究》（朝花美術出版社1962年出版）、馬玉《清明上河圖畫的是哪座橋》（《藝林叢錄》第4篇，1964年出版）、姜慶湘、蕭國亮《從清明上河圖和東京夢華錄看北宋汴京的城市經濟》（《中國社會科

學》1981年第4期)、日本木田知生《宋代開封與張擇端清明上河圖》(《史林》61卷5期)。禹玉一文未見原作，僅見木田知生的引文。

- ⑭ 臧華雲、徐邦達、張安治等，都認為圖中的橋是虹橋，圖中的城門是東水門。而禹玉認為橋是下土橋，城門是東角門子。木田知生認為卷首的田園風景，在北宋末年“京師戶口日滋，棟宇密接、略無容隙”(《宋會要輯稿》方域四第宅所載宣和二年十月二十八日翁彥國奏議)的情況下，不可能在外城內部存在，但他又不斷定橋是虹橋還是下土橋或上土橋，因而又認為這個圖卷不是寫實的，而是一種“胸中丘壑”，並因城門不見連有城牆，推定只是安放街鼓的樓門。我們認為這幅圖卷是完全寫實的。卷首的田園景色描寫的是郊外，即虹橋以東的情景。圖中的橋確是虹橋，只有著名的虹橋才够得上這樣的規模，並與其周圍的情況相合。城門應是通津門，通津門南面緊靠汴水東水門，因而圖上不連有城牆。從其規模和門上樓閣來看，必是重要的城門，決非街坊放置街鼓的小樓。宋敏求《春明退朝錄》卷上說：“京師街衢，置鼓於小樓之上，以警昏曉。太宗時，命張公洎製坊名，列牌於樓上。”這種放置街鼓、掛列坊名的小樓，要比城門的樓閣規模小得多。圖上規模巨大的樓門決不可能是放置街鼓的小樓，也不可能是裏城的角子門。

- ⑮ 東水門與通津門、上善門并列，西水門與宣澤門、大通門并列，宋人常常不免混稱。《續資治通鑑長編》卷三〇三“元豐三年三月丁亥”條，“都大提舉導洛通汴司宋用臣言：近泗州置場，堆垛商貨，本司承攬船載，將欲至京，乞以通津水門外順成倉為堆垛場。”所謂通津水門即指東水門。《通鑑長編紀事本末》卷一四七“靖康元年正月癸酉”條，“是夕金人攻宣澤門，以火船數十順流而下。”《續資治通鑑長編拾補》卷五二、《靖康傳信錄》、《靖康要錄》述及此事，“宣澤門”都作“西水門”。

- ⑤ 畢仲游《西台集》卷一有宋哲宗時所作《乞置京城廂巡檢劄子》，講到“今京城外巡檢、縣尉，與外州軍路同，而京城內巡檢之職，寓於馬步軍帥臣與四廂主者，雖主繳巡於國中，而尋常盜賊皆不干預。自來開封舊例，令使臣人員等密行緝捕，獲賊有賞，而不獲無甚譴罰，人微責輕，往往反與盜賊爲市。而諸廂小使臣，雖帶督察盜賊，其實分管估計家業、取問病人口詞、并檢驗救火等雜務，不類捕盜之官，理殊未盡。臣愚欲乞於馬步軍帥及四廂主巡檢之下，別增置廂巡檢六員，其二在舊城內，其四在新城內；四壁使、諸司使副或大使臣爲之，隸於開封府，……使專治巡檢職事。”按南宋高宗紹興二年正月二十一日臣僚言：“雖有左右廂巡檢二人，法制闕略，名存而已。乞下樞密院，委馬步軍司措置，略倣京城內外繳巡之法，就錢塘城內分爲四廂，每廂各置巡檢一人，權差以次軍都指揮使有材能者充。”（《宋會要輯稿》兵篇第三廂巡）可知廂巡檢常是從馬步軍司所屬軍官中挑選充任的。

四 南宋臨安(杭州)結構和街市的分析

(一) “坐南朝北”的特殊佈局

1 “坐南朝北”特殊佈局的形成

杭州古稱錢塘，秦代已設縣治在西湖以西的武林山(今靈隱山後山)脚下。隋代建置杭州，治所從餘杭遷到錢塘。同時修建大運河通達此地。并擴大城區，包括西湖以東地區，城周圍36里90步。到唐代，城區更擴大，人口增多，開始成爲全國著名城市。五代時，吳越建都於此，又在隋唐舊城以南的鳳凰山下建築“子城”，作爲治所，并先後兩次擴建外城，稱爲“夾城”和“羅城”。“夾城”擴展了舊城西北和西南地區，“羅城”又擴展了舊城以東地區，使得杭城西邊環抱西湖，東面把鹽橋運河包容到城內，北邊直靠大運河，東面靠近錢塘江。同時興建海塘，疏通錢塘江，使可通航海船。於是杭州成爲東南沿海商業大城市與對外貿易港口。

北宋時杭州經濟迅速成長，爲江南絲織業的中心，釀酒業和雕版印刷業也很發達。宋太宗端拱二年(公元989年)在此設立市舶司。北宋末年金兵不斷南侵，宋朝節節敗退，行都也不斷南遷。南宋高宗建炎三年(公元1129年)升杭州爲臨安府，并以府治作爲行宮，稱爲“行在所”。紹興八年(公元1138年)定都臨安，仍稱“行在”。紹興十二年在鳳凰山麓的行宮中增建大殿，皇宮初具規模，二十八年又增築內城，并增築舊城東南的外城，擴展了東南地區。所謂增築內城，只是在吳越“子城”的基礎上略爲擴建而成皇城。皇城築在鳳凰山東麓的案山(即今吳衙山)，號稱周

闔九里^①。皇城的南門叫麗正門，作為“大內”的正門，有三個門道，佈置得富麗堂皇，“皆金釘朱戶，畫棟雕甍，覆以銅瓦，鏤鏤龍鳳飛翾之狀，巍峨壯麗，光耀溢目”，左右有闕和百官待班闕子（《夢梁錄》卷八《大內》）。皇城的北門叫和寧門，作為“大內”的後門，正夾在大城南邊的孝仁坊和登平坊之中，也是三個門道，和麗正門同樣的建築和佈置，“把守衛士嚴謹，如人出入，守闕人高唱頭帽號，門外列百僚待班闕子，左右排紅杈子”（見同上書）。其實，南門麗正門作為正門，只是就皇帝到南郊祭天而言，皇帝只有到南郊的郊壇祭祀才經此門。此外在和寧門東南設有東華門和東便門（或稱便門），都不重要。

作為“大內”北門的和寧門，名義上是後門，實際上却是主要的正門，因為臨安整個都城的佈局是坐南向北的，它和北宋都城東京的佈局方向正好相反。臨安皇城坐落於整個杭州城的南端，作為全城中軸綫的御街也是由南向北的。

2 御街的由南向北并通向西北

御街以大內北門和寧門為起點，一直向北，經過朝天門略向西折，接着又一直向北，經衆安橋、觀橋，到萬歲橋，又折而向西，一直到達新莊橋和中正橋（斜橋），全長一萬三千五百尺，鋪石板三萬五千三百多方。這條御街不僅是臨安的中軸綫，從和寧門到朝天門這一段，還具有外朝的廣場性質，作為元旦和冬至舉行大朝會時會集排班之用。在和寧門前御街的西側設有三省、六部，這是中央官署的核心。這和北宋東京宣德門前一段御街的性質相同。所不同的是，北宋東京的中央官署分列于官城內和御街東西兩側；而南宋臨安的主要中央官署只列于御街西側，同時兩側都有居民的坊巷夾雜着。北宋東京宣德門前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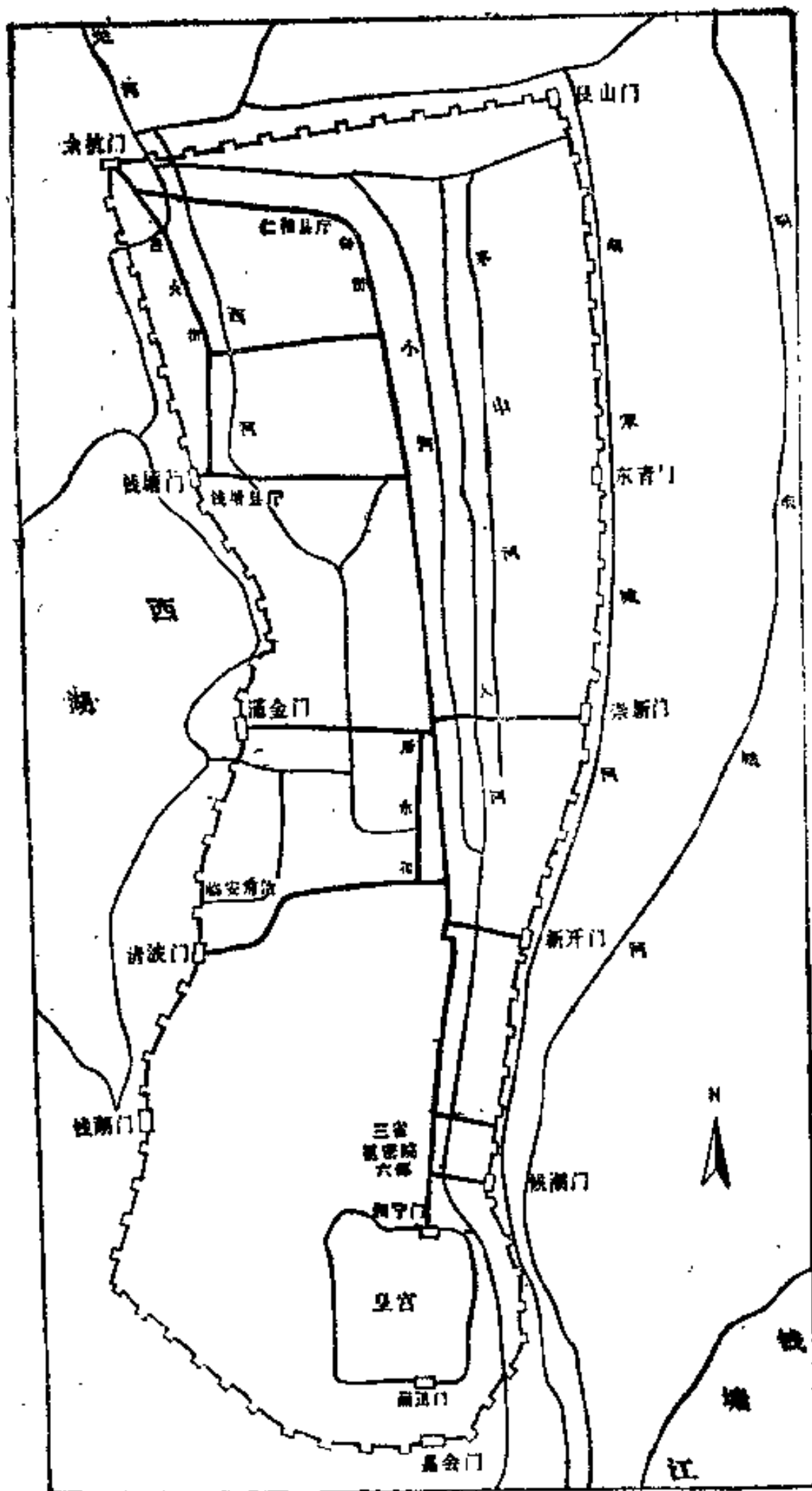


圖 59 南宋臨安(杭州)佈局結構及主要街道圖
 (採自林正秋《南宋都城臨安》，西泠印社1986年出版)

街兩旁建有東西兩列“千步廊”，稱為“御廊”，廊內各設有黑漆杈子和紅漆杈子兩行以限止行人，用作百官集合排班之所；南宋臨安和寧門前御街兩側建有百僚待班閣子，左右排列有紅杈子以限止行人，也是用作百官集合待班之用（參看圖59）。《西湖老人繁勝錄》具體敘述了當時元旦大朝會待班的情景：“歲節四更，諸廳人從，各往本廳，諸官糾內前（內前指大內以前），待班閣內坐。待大內開門，文武百官入至殿階到班，法物儀仗羅列。禁衛待班齊，遣聖駕登寶殿。大臣并金國奏使，奏賀玉殿金階。時有南番諸國貢寶進象到京。”這是元旦大朝會的待班情況。日常上朝也差不多，只是禮儀比較簡單。

爲什麼這條御街從和寧門一直向北，到萬歲橋又要折而向西，到達新莊橋和中正橋呢？這是爲了皇帝於“四孟”（孟春、孟夏、孟秋、孟冬）到景靈宮（今省體育場一帶）朝拜祖宗而特別設計的。景靈宮是北宋真宗大中祥符五年（公元1012年）開始在東京設置的，建築於皇城以南的御街東西兩側，供奉有已故皇帝和皇后的御容，規定“以四孟月朝”。南宋建都臨安，沿用這個禮制。紹興年間把新莊橋的劉光世、韓世忠舊宅改建爲景靈宮，設有各個已故皇帝和皇后的殿，供奉有塑像，由皇帝親自於“四孟”前往舉行朝饗禮。值得注意的是，這個景靈宮的位置不在皇城以南，而在整個都城的西北，而且這座建築的位置又是“投北坐西”的（《夢梁錄》卷八《景靈宮》）。同時在景靈宮的附近，還建有供奉昊天上帝和聖祖、太祖以下皇帝的道觀萬壽觀和奉祠五福太乙神的東太乙宮。萬壽觀建在新莊橋西，東太乙宮在新莊橋南。按禮規定，皇帝在每次朝獻景靈宮後，要到萬壽觀諸殿行燒香禮（《夢梁錄》卷八《萬壽觀》），也還要到東太乙宮行款謁禮（同上書卷一《車駕詣景靈宮孟饗》）。

原來北宋東京的東太乙宮建在東京城東南的蘇村。臨安的東太乙宮是高宗“駐蹕於此，以北隅擇地建宮”，選定這個新莊橋南的地點而興建的。爲什麼原來造在東南方的東太乙宮，要“以北隅擇地建宮”呢？而且在這座東太乙宮後面小園中有個小土山，“建亭在其上，匾曰武林，即杭之主山也”（《夢梁錄》卷十一《諸山巖》）^③。原來武林山在杭州西面靈隱山後山，爲什麼又要把這兒一個小土丘稱爲武林而作爲“杭之主山”呢？看來都是爲了適應這個坐南向北的特殊佈局而作出的特殊設施。

3 “坐南向北”的佈局和禮制的關係

杭州西靠西湖，東南臨錢塘江，北靠大運河，南部多山。由於地勢關係，整個城垣像腰鼓形，五代時已有“腰鼓城”之稱^④。南部和西南部是丘陵地帶，北部和東南部是水網地帶，政治上統治的中心宜於據高臨下，建設在南部的丘陵地帶，所以不僅五代時吳越的“子城”建在鳳凰山麓，南宋臨安的皇城依然建設在這裏，從而形成坐南向北的特殊佈局。南北兩面城牆較短，東西兩面城牆長而鼓出曲折。既是坐南向北的佈局，可是在北城牆只開一座城門，而且開在北城牆的西邊，即餘杭門（又稱北關門）。全城十三座城門，除了餘杭門在西北外，還有嘉會門在南城牆東邊，其餘十一門都在東西兩面。西而有錢塘門、豐豫門（即涌金門）、清波門（又稱涵水門、暗門）、錢湖門（又稱青平門）；東北有艮山門（俗稱壩子門）；東面有東青門（俗稱菜市門）、崇新門（又稱薦橋門）、新開門（又稱新門）、保安門（俗呼小堰門）、候潮門、便門。還有五處水門、城北有餘杭水門、天宗水門，城東有保安水門，城東南有北水門、南水門。各門中艮山門、東青門、便門的外邊，都造有弧形壁壘，上圓下削，即所謂“甕城”，其餘早門都造

有城樓，水門都是平屋。其中嘉會門的城樓最爲華麗，因爲此門是御道，皇帝到南郊祭祀必由此門出入。嘉會門外西南三里，設有郊壇，作爲祭天的場所，郊壇以北淨明寺建有所謂青城行宮，以青布爲幕，畫有磚砌的紋樣，作爲城闕，內建有端誠行殿，作爲皇帝舉行祭禮前齋戒之處。這都是沿用北宋的制度。

南宋的重大典禮共有三種：一是元旦和冬至的大朝會，這是沿用唐以前的禮制。百官從和寧門入大內，對皇帝進行大朝賀，“備法駕，設黃麾仗三千三百五十人，視東京已減三之一”（《武林舊事》卷二〈元正〉）。二是“四孟”駕出和寧門沿着御街到景靈宮朝獻，這是宋代特有的朝獻祖宗於原廟的禮制。禮節很是隆重。先期出告示約束居民，不許登高觀看。先一日封閉城樓，殿步二司分派統制帶領官兵六千二百人巡查街巷。當日皇帝駕出，有不少高官從駕。三是南郊行郊祀禮，每三年舉行一次，於元旦進行，稱爲“大禮”。前三日致齋於大慶殿，次日出和寧門到景靈宮向祖先奏告，再回到太廟，再次日從太廟出發，到嘉會門外的郊壇行禮。太廟在和寧門外的御街西側瑞石山下，必須經御街南行，經候潮門大街東行，到候潮門口，在城內沿城牆折而南行，經便門口再沿城牆西南行，才能到嘉會門。出嘉會門再西南行三里才到郊壇。當日皇帝御“玉輅”前往，并有“回輅”隨從，儀仗隊伍很長，用六千八百八十九人，并有象院的象插朱旗帶頭前導，又有“二金三鼓”的樂隊，因而候潮門大街都用潮沙填築，平坦如席，特有“泥路”之稱。待行禮完畢，再由嘉會門進入大內南門麗正門。這樣繞一圈的路程共九里三百二十步^④。

4 先兆的傳說和方位的選定

儘管南郊行郊祀禮由東南嘉會門出入，但是整個城的佈

局是由南向北的，作為中軸線的御街是由南向北的。關於這個由南向北的特殊佈局，當時有一個“先兆”的傳說。趙彥衡《雲麓漫鈔》卷三記述：

政和五年(公元1115年)，東都(指東京)築土山於景龍門之側，以像餘杭之鳳凰山，……以為在都城之艮方，故曰艮嶽。南山成，易名壽嶽，都人且曰萬壽山。所謂餘杭鳳凰山，即今臨安府麗正門之正面案山，山之盡處即嘉會門。山勢自西北來，如龍翔鳳舞，掀騰而下，至鳳凰山上，分左右翼。大內在山之左掖，後有山包之，第二包即相府，第三包即太廟，第四包即執政府，包盡處即朝天門，端誠殿在山之右掖，後有山包之，第二包即郊壇，第三包即易安齋，第四包即馬院，東南即大江，西為西湖，北為平湖，地險且壯，實一都會。其先兆於東都為山之時。

這個“先兆”的傳說，就是用來解釋臨安由南向北特殊佈局之形成的。他們認為臨安的山勢，象徵着“龍飛鳳舞”，大內和中央官署及太廟正是它的左翼，郊壇一帶正是它的右翼，而“山勢自西北來”，西北角正是它的龍首所在。看來景靈宮、萬壽觀、東太乙宮造在城內西北角，景靈宮的“投北坐西”，東太乙宮的“以北隅擇地”，東太乙宮後小圃內的土丘定名武林而作為“杭之主山”，都與這個“先兆”的傳說有關。這個“先兆”傳說，解釋臨安之成為“都會”，出現由南向北的特殊佈局，都是出於自西北來的“龍飛鳳舞”的山勢所決定的。他們認為，從山勢看來，龍首在西北角，東太乙宮小圃的小山就是一顆龍珠，因而景靈宮和東太乙宮都必須造在那裏。南宋初期官至參知政事的政論家和文學家樓鑰，曾特別為此賦長詩說明：

易君求賦武林山，身因塵勞無暫閑。我求掛冠欲歸去，念此詩債須當還。武林山出武林水，靈隱後山無乃是。此山亦復用此名，細考其來具有以。天目兩乳到錢塘，一山環湖萬龍翔，扶輿磅礴擁王氣，皇

居壯麗環宮牆。湖陰一峯如怒貌，勢臨城北尤瑰奇。吳越大作緇黃廬，爲穿百井以厭之。從來有龍必有珠，此雖培塿千山餘，中興南渡爲行都，崇列原廟太乙廬。曾因祠事來登眺，闐闐塵中有員嶠，熏風時來洗溽暑，綠樹陰陰隱殘照。我得暫來猶醒心，羨君清福住年深。長安信美非我土，倦翼惟思歸故林（《夢梁錄》卷十九《園囿》）。

樓鑰寫這篇長詩來解釋東太乙宮的小山爲何復用武林之名。他認爲杭州的山勢如“龍翔”而“擁王氣”，“勢臨城北尤瑰奇”，西北正是龍首所在。東太乙宮的小山雖是“培塿”，却是一顆龍珠，因而在那裏“崇列原廟太乙廬”。“崇列”就是說崇高地并列安置在龍珠那裏，原廟即指景靈宮，借用漢惠帝爲漢高祖造“原廟”的古典；太乙廬即指東太乙宮。

宋朝皇室很相信陰陽堪輿（看風水），當時流行的“擇地”方術，把姓氏分歸五音，再按音擇定吉利方位。宋朝皇帝姓趙，屬於“角”音，利于“壬”的方位，即北方偏西處。宋代皇帝建築陵寢，都依據這種方術“擇地”。乾興元年（公元1022年）舉行真宗葬禮，八月六日司天監上言：“按經書（指講堪輿擇地的經書），壬、丙二方皆爲吉地，今請靈駕（指運棺槨的車駕）先於上官神牆外壬地新建下宮奉安”（《宋會要輯稿》禮二九之二七）。根據考古調查，在今河南鞏縣的八座宋陵，所有寢宮（即下宮）都造在陵墓的北方偏西處，即所謂壬方。東太乙宮的“以北隅擇地”，景靈宮的“投北坐西”，也該與選定壬方有關。

（二） 宮殿、官署、學校和官僚住宅的分佈

1 大內所在和宮殿的分佈

臨安的大內，在鳳凰山東麓的案山，地位很局促，主要宮殿，

就是紹興十二年(公元1142年)所建的兩殿，一即正衙，是舉行重大典禮的大殿，一即垂拱殿，是日常上朝的大殿。據陳隨應《南渡行宮記》(顧炎武《歷代宅京記》卷十七引，《輿地記勝》卷一記載相同)，垂拱殿正面有五間寬闊，進深有虹梁十二架，南北長六丈，東西廣八丈四尺。王應麟《玉海》有相同記載，並且指出，“其修廣僅如大郡之設廳”。原來北宋東京大內，有大慶、文德、紫宸、集英等大殿，按照禮制，各種禮節需要分別在各個殿上舉行。這時臨安大內只有一個正衙，各種禮節只能在同一殿上舉行，隨着舉行禮節的不同，在殿門改換牌名。舉行元旦大朝會，或駕出前致齋，稱為大慶殿；百官朝見聽政，改殿牌為文德殿；聖節上壽，改名紫宸殿；拆號唱進士名和賜宴，易牌為集英殿；舉行宗祀，改稱明堂殿。其後小殿，都屬於御寢性質，或是供遊樂休息之處(參看圖6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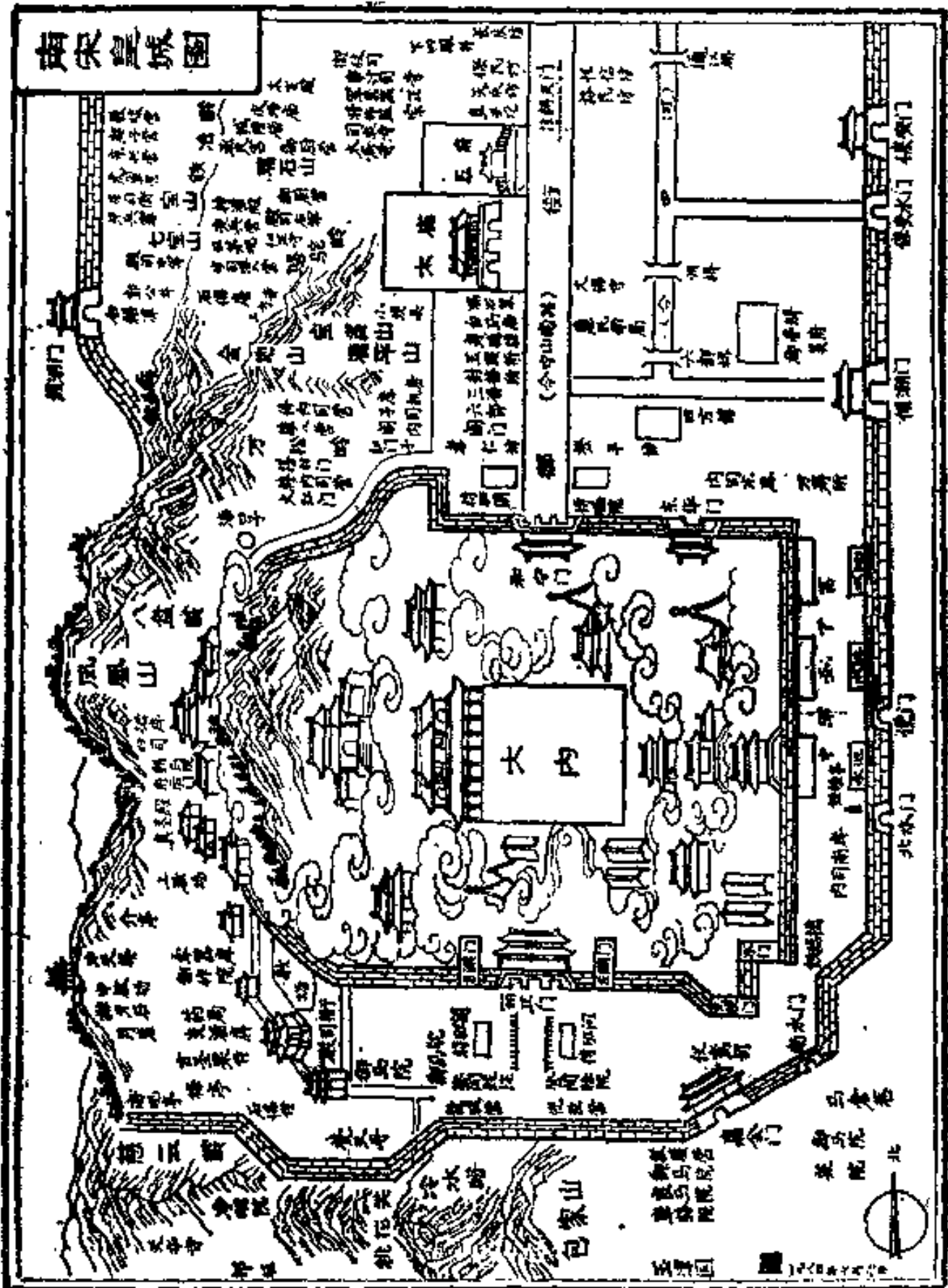
正因為大內狹小，高宗另外在城東新開門內，望仙橋東，沿鹽橋運河東岸，建有德壽宮，屬於別墅性質。原來本是賜給秦檜的府第，紹興三十二年高宗把皇位傳給孝宗，就遷居此地，作為退休以後的游樂場所，建有大殿德壽殿及十多座殿閣。後苑開鑿池沼，引水注入，疊石為山，以像飛來峯。又把全園劃分四區，佈置四時景色。當時都人稱為“北大內”。高宗以後，曾改名為重華、慈福、壽慈，在較長時期內，繼續作為上皇或皇太后的寢宮及游樂之所。

2 中央官署的分佈

因為皇城狹小，主要中央官署就集中在大內以北和寧門外御街西側地區。三省、六部、樞密院和諫院在和寧門西北顯寧寺舊址，孝仁坊以北地區。茶鹽所、會子所、公田所、封樁安邊所在

圖 60 南宋臨安(杭州)皇城圖

(咸淳臨安志)所載《皇城圖》摹本，採自《南宋京城(杭州)》



三省大門內。宗正寺玉牒所在太廟南，大宗正司在天慶坊內，司農寺、太府寺、將作監、軍器監在保民坊內，交引庫、惠民利濟局

在太府寺門內。都進奏院、糧料院和審計院分設在吳山北端，朝天門以西地區。再往北，御史臺在清河坊西，都酒務在清河坊南首大隱坊。往西，秘書省在天井坊東，太常寺在羅漢洞，敕令所在侍郎橋西南。更往西，靠近西城牆豐豫門東南有臨安府署和兩浙轉運司衙。

城內西北西河（清湖河）經流地區，也有官署和國庫夾在居民住宅區中。西河中心點清湖橋附近有作為國庫的左藏庫的東西兩庫。錢塘縣署在錢塘門內的東南地方，仁和縣署在御街北端萬歲橋西南。大理寺在仁和縣署之西。製造御前軍器所在御街北段以西貢院橋以北的禮部貢院之西。

城內東南大河（鹽橋運河）流經地區，多官府有關經濟活動的單位。南段通江橋東有權貨務、都茶場、雜買場、雜賣務、會子庫，北段薦橋西南有都稅務，西北有回易庫，仙林寺橋東有平糶倉，梅家橋北有市舶務的新務和法物庫。

3 學府的所在

臨安高等學府都設在西河經流的西北地區。太學設在紀家橋（今風波橋）東的前洋街北，武學設在太學東側，主管學校的國子監設在太學西側。宗學設在御街北段衆安橋西南的陸親坊（今彌教坊）。具有“醫學”性質的太醫局設在大河通江橋北，分方脈科、針科、瘍科，“以醫官充教授四員，領齋生二百五十人”（《夢梁錄》卷十五《學校》）。另有杭州府學在臨安府署東北凌家橋西；錢塘縣學和仁和縣學都在縣署東側。禮部貢院在御街北段觀橋以西貢院橋以北，中門內兩廊共有千餘間廊屋為士子考試之處。

4 官僚住宅和家廟的分佈

官僚住宅和家廟，都挑選在居住條件比較好的地段。城內西南的丘陵地帶官僚住宅較少。鐵冶嶺北的郭婆井有七官宅，西北的漾沙坑有楊太后宅，清波門內的仁美坊有五官宅。城內西北西河經流地區，王府和官僚住宅較多。衆安橋西側純禮坊（原名後洋街巷）有吳王府，秀安僖王府，石炭橋東舊陸親坊有十官宅，在清湖橋北有沂靖惠王府，清湖橋北左藏庫西有周漢國瑞孝長公主府，左藏庫北前洋街有韓獻王府，附近潘閩巷有三官宅，祥符橋西南明慶寺南有劉鄴王府，在西河分支的洪福橋西清和坊有楊和王府，揚和王府西有五房院，即樞密院諸承旨所居處。在井亭橋西有莊文太子府，井亭橋西甘泉坊西有九官宅，在九官宅西北俞家園有卿監郎官宅，在軍將橋有韓皇后宅，在三橋以東、后市街以西有孟太后宅，謝太后宅和李皇盾宅。在清河坊西有張循王府^⑤，在施家橋南泰和坊內秘書省後的開元宮對牆有省府官屬宅。

城內東部沿大河（鹽橋運河）兩岸多后戚府和官僚住宅。大河南段東岸都亭驛東有侍從宅^⑥，州橋東有吳太后宅（或稱吳府）。大河中段望仙橋東有稱爲“北大內”的德壽宮，佑聖觀橋東 佑聖觀後有郭皇后宅，榮王府橋東有榮文恭王府。薦橋東有韋太后宅，橋南有邢皇后宅，橋東側豐禾坊南有謝皇后宅和全皇后宅（或稱全府）（參看圖61）。

（三） 居民的廂和坊的分佈排列

據《咸淳臨安志》和《夢梁錄》，臨安城內外分爲十三廂，城內

九廂，城外三廂。城內除宮城廂以外，分爲左一南廂、左一北廂、左二廂、左三廂，右一廂，右二廂、右三廂、右四廂^⑦。城外分爲城南左廂、城北右廂、城東廂、城西廂。現按由南向北的佈局，分別說明城內各廂所屬各坊的位置和分佈排列，以便下文敘明杭城街市的繁華情況以及瓦子分佈情況等等（以下參看圖62）。

1 右一廂十坊所在

右一廂共十坊，其中八坊在和寧門以北，沿御街南段的東西兩側。在御街南段的西側，從南而北有五坊：

(1)孝仁坊，在和寧門以北的御街西側，清平山以東，又稱清平山巷。今高土坊巷、嚴官巷一帶。

(2)壽域坊，在太廟南，西通七寶山。坊內有諸軍糧料院、白馬廟等，又稱糧料院巷、白馬廟巷，今民間仍稱白馬廟巷。

(3)天慶坊，又名保寧坊，坊內有天慶觀，後建太廟，又稱太廟巷，在今寶蓮山麓。

(4)保民坊，在天慶坊北。坊內有昭節廟，又稱吳山廟巷或廟巷。

(5)長慶坊，在朝天門裏，西通忠清廟到石佛山。又稱竹竿巷，在今十五奎巷。

在御街南段的東側，從南而北有三坊：

(6)登平坊，在和寧門以北御街東側，因登平橋得名。南宋初年曾設宰相府，又名相府巷。在今大學士牌樓一帶。

(7)懷信坊，與保民坊相對，俗呼糴圍巷，在今鼓樓灣東南。

(8)新開坊，在朝天門外御街東側，南宋中期新開闢，又名布市巷。在今布市港、清遠橋一帶。

以上八坊都在朝天門以南御街東西兩側，是御街南段的主

要坊巷，與三省六部等中央官署及太廟夾雜在一起。另在城內東部大河中段有二坊屬右一廂：

(9)常慶坊，在大河中段太和橋(俗稱柴塚橋)西南，俗稱柴塚橋巷，橋畔有太和酒樓。在今西寶善巷。

(10)富樂坊，在太和橋西南，薦橋西北，靠近蒲橋，又稱蒲橋巷。

2 左一北廂十九坊和左一南廂四坊所在

左一北廂十九坊，所屬範圍，從御街西側中段的南半段(從朝天門到市西坊)，一直向西，直到靠近西城牆的臨安府署周圍，一個長方形的地區。沿御街西側由南而北有七坊：

(1)吳山坊，在吳山東麓。坊內有大井，又稱吳山井巷。今名大井巷。

(2)清河坊，在今河坊街西段一帶。與左三廂的清和坊不同。

(3)融和坊，坊內原有小丘稱灌肺嶺，俗稱灌肺嶺巷。在今高銀巷。

(4)新街坊，南宋中期從融和坊與太平坊之間新開的街坊，坊內有中瓦子，明代稱為中瓦巷，今名木瓜弄。

(5)太平坊，坊內有太平酒樓，今仍稱太平坊巷。

(6)市南坊，杭州舊有一“市”約在平津橋附近，坊因在市南而得名。坊內有著名幪頭舖，因而俗呼巾子巷。在今惠民巷。

(7)市西坊，因在舊市之西而得名，原有洋壩頭之稱，或稱壩頭。坊西有西河流過，有橋三座，俗呼三橋街。今名三橋址。

在御街西側上列七坊以西又有二處街坊屬左一北廂：

(8)南新街，在新街坊西南，向南與御史臺相對，是南宋後期

新開闢的街坊，在今祠堂巷。

(9) 後市街，因在舊市之後而得名。在御街西側而與御街平行，南起清河坊，北到富樂坊。

在御史臺以西有(10)康裕坊，坊內有泥作、石作等八作司，俗呼八作司巷。今呼為蚩螭司巷。又有(11)吳山北坊，在吳山北麓，與後市街相對。

後市街以西有(12)泰和坊，俗稱糯米倉巷，南宋中期新增。坊中有寶山院，又名華光廟，今稱華光巷。

泰和坊以西有(13)天井坊，原名通浙坊，天井是指坊內寶月寺西的黑龍潭。在今清河坊附近。

天井坊以西有(14)中和坊，原名淨因坊，因淨因寺得名。南宋擴建淨因寺為臨安府署，署內有中和堂，因而改稱中和坊。坊內設有樓店務，又稱樓店務巷。在今螺螄山麓塔兒頭及慈幼路一帶。

在中和坊西南、通判北廳以東有(15)仁美坊，又名石板巷，北向與臨安府署相對，在今水溝巷一帶。

臨安府署東南又有(16)近民坊，坊內設左司理院，又名左院前巷。臨安府署之前，靠西有(17)流福坊，因流福溝得名，今稱荷花池頭。府署以東，凌家橋西有(18)豐豫坊，一作豐裕坊，坊內設有臨安府學，又稱府學巷，在今孔廟、勞動新村一帶。府署以西，又有(19)美化坊，坊內近城牆有土丘稱竹園山，又稱竹園山巷。

左一南廂，在左一北廂之南，當清河坊南首以西，從東而西有四坊：

(1)大隱坊，因宋徽宗時，徐爽隱居於此而定名。約在今環翠路一帶。

(2)安榮坊，在大隱坊以西，從經山坊分出，國史館設此。今

安榮巷、管米山巷一帶。

(3)懷慶坊，在安榮坊以西，北與秘書省相對，西南通寶月山，又稱寶月山巷。今峨眉山、裏龍舌嘴一帶。

(4)和豐坊，北與天井巷相對，在今外龍舌嘴、清波門沿城牆到錢湖門舊址。

3 左二廂十八坊所在

左二廂所屬範圍，沿御街西側中段的北半段以及御街北段，直到萬歲橋西南仁和縣署周圍地區，從南而北，沿御街西側有十八坊：

(1)修義坊，在市西坊以北，西通軍將橋，俗呼菱椒巷，一作靈椒巷，又作菱椒薑巷，即肉市所在。在今三元坊巷。

(2)富樂坊，在修義坊以北，與右一廂的一坊同名。又名保康巷，俗呼賣馬巷。乾道以後從修義坊分出。

(3)衆樂坊，在富樂坊以北，又稱南棚巷，一作南棚巷，俗稱虎跑泉巷，在今東羊血弄（舊名玄壇弄）。

(4)教睦坊，坊北有中和酒樓，稱為銀甕中酒座，因有銀甕後巷之稱。坊西有小土丘名狗兒嶺，又稱狗兒山巷，明代已夷為平地。在今東羊血弄、積善坊巷之間。

(5)積善坊，俗稱上百戲巷，在大瓦子東首，今仍稱積善坊巷。

(6)秀義坊，積善坊以北，亦在大瓦子東首，俗呼下百戲巷。在今東平巷。

(7)壽安坊，秀義坊以北，與義和坊相對。俗名冠巷，又稱官巷，即今官巷口一帶。

(8)修文坊，在壽安坊以北，西至洪福橋。坊中一度曾設將：

作監，又名將作監巷。

(9)里仁坊，在修文坊以北，西至鞦韆橋，俗呼陶家巷。今沿用里仁坊巷。

(10)保信坊，在里仁坊以北，俗呼剪刀股巷，今沿用這個俗稱。

(11)定民坊，在保信坊以北，中棚橋以西，又名中棚巷。坊內有棚心寺與百福院，又稱百福巷，後訛作蝙蝠弄，沿用至今。

(12)睦親坊，在定民坊以北。坊內設有睦親宅與宗學，又名宗學巷。明代以來稱弼教坊。

(13)純禮坊，俗稱後洋街巷，又名竹竿巷，沿用至今。

(14)保和坊，俗稱磚街巷，坊內多售泥孩兒鋪，又稱孩兒巷，沿用至今。

(15)報恩坊，在保和坊以北，俗呼觀巷，巷內有報恩光孝觀，觀前建有石橋，稱爲觀橋。

(16)福德坊，咸淳年間從保和坊分出，今龍興路一帶。

(17)招賢坊，仁和縣署舊在梅家橋，紹興年間移此，又名仁和縣巷。坊內祥符寺有九十九眼古井，又稱百井巷。今沿用百井坊巷之名。

(18)登省坊，咸淳年間仁和知縣買民地開創，設有縣學，因稱登省坊。在今胭脂弄以西一帶。

4 右二廂十八坊所在

右二廂十八坊。其中十三坊，西端沿着御街中段和北段的東側，東端又靠小河（即市河）。小河從大河（鹽橋運河）的宗陽宮橋分出向西流，經鍾公橋、清冷橋、熙春橋、灌肺嶺橋，轉折而

北上，成爲御街和大河之間一條平行的小河。小河上，由南而北，建有一系列橋梁，這十三坊正當這一系列橋梁之西，相互關係密切，因而這十三坊，既有自己的坊名，又常以橋名作爲坊名。這十三坊，從南而北，排列如下：(1)清平坊，即舊沙皮巷，在朝天門以北御街東側。(2)通和坊又稱金波橋路，金波橋在坊東。(3)寶佑坊，與寶佑橋同名。(4)賢福坊，即壩東巷，貓兒橋巷，貓兒橋即平津橋，橋在坊東。(5)蘭陵坊即水巷橋巷，或簡稱水巷。(6)義和坊，俗名炭橋巷，炭橋即芳潤橋。(7)武志坊，原名李博士橋巷，橋在坊東。(8)戒民坊，俗呼棚橋巷，爲市曹行刑之地，“戒民”的名稱即因此而來。(9)新安坊，與橋同名，又名新橋樓巷，又作小新橋巷。(10)延定坊，又稱鵝鴨橋巷。(11)安國坊，與橋同名，又稱北橋巷、仁和倉巷。(12)懷遠坊，舊呼軍頭司營巷，在軍頭司橋附近。(13)普寧坊，即清遠橋巷。以上十三坊介於御街中段、北段與小河之間，沿御街東側，既有熱鬧的街市，沿河近橋西側，又有繁華街市。另外有(14)同德坊，舊呼燈心巷，在御街北，新莊橋、祥符寺西^⑩。(15)嘉新坊，俗呼七郎堂巷，在北酒庫東南，北酒庫指鵝鴨橋東的春風樓，大河北段的新橋東北。(16)教欽坊，俗呼竹竿巷，在北酒庫之東，嘉新坊之北，靠近大河北段的鹽橋。(17)新開南巷，在大河北段薦橋西岸，嘉新坊之南。(18)新開北巷，又名日新橋巷，在小河日新橋東，新開南巷之北。以上四坊在大河北段鹽橋、新橋、薦橋的西側，沿河近橋有街市。

5 右三廂六坊所在

右三廂，共六坊，在大河北段薦橋到鹽橋的東西兩岸。(1)東巷坊，亦稱東巷，即上中沙巷，又稱中沙後巷，在薦橋東南。(2)

西巷坊，亦稱西巷，即下中沙巷，又稱中沙前巷，在薦橋東南。
(3)豐禾坊，又稱豐禾倉巷，在薦橋東北，全皇后府與謝皇后宅之北^①。(4)善履坊又稱豐樂橋巷，介於小河的芳潤橋與大河的豐樂橋、新橋之間^②。(5)興德坊，又稱鹽橋巷，在鹽橋下西北^③。
(6)昌樂坊，在蒲橋東，蒲橋是鹽橋以東的早橋、原為古茅山河的橋。

6 右四廂二坊所在

右四廂，共二坊，即興禮坊與寧海坊，在大河中段的東岸，從宗陽宮橋往北直到薦橋東北。

7 左三廂八坊所在

左三廂，共八坊，在城內西北西河流經地區。西河從御街北段的衆安橋西行，經結縛橋、石炭橋、八字橋（原呼洗麩橋）折而南下，經馬家橋、晚鼓橋、洪福橋（又稱洪橋）、井亭橋、施水坊橋、軍將橋、三橋、侍郎橋、施家橋到斷河頭。左三廂的(1)欽善坊（又稱聞扇子巷）在井亭橋南。(2)甘泉坊，在相國井巷口，正當井亭橋西。(3)清風坊在甘泉坊以北，莊文太子府以南。(4)清和坊（即活水巷）在洪福橋西，楊和王府前。又有羅漢洞巷在侍郎橋之西，羅漢洞舊有坊名美俗。這一帶原來設置有不少的坊，後來廢除。除羅漢洞原名美俗坊以外，洗麩橋（即八字橋）南北兩岸稱為通寶坊和豐財坊，馬家橋西曾立孝慈坊，洪橋（即洪福橋）楊府（即楊和王府）巷原作紫雲坊，三橋涌金路舊名會昌坊（《夢梁錄》卷七《禁城九廂坊巷》）。同時西河分支從結縛橋、石灰橋、清湖橋轉向西作半圓形的彎曲，經黑橋、左藏庫橋、安濟橋、安福橋、丁家橋、紀家橋一直往北，經東橋、長壽橋（舊名楊姑橋、

新莊橋等，出餘杭水門而通大運河。在結縛橋相對的前洋街，國子監、太學、韓蘄王府之東，有(5)興慶坊。在安福橋東北有潘閭巷，巷口有(6)德化坊(舊名木子巷)。在長壽橋東又有茶湯巷^④，是茶坊集中之地。在紀家橋西南的錢塘縣署前，又有(7)字民坊和(8)平易坊。

(四) 熱鬧繁華的御街景象

臨安城內的主要街市，最繁華的要推御街。御街的興建，雖是爲了政治上需要，特別是爲了適應元旦和冬至大朝會以及“四孟”駕出朝獻景靈宮的需要，但是隨着商品經濟的發展，御街成爲都城中最熱鬧繁華的街市，成爲經濟上交流的中心。它在經濟上所起的作用，遠遠超出它在政治上的作用。

整條御街，從大內的和寧門開始，由南往北，直到北段的觀橋一帶，御街兩側的所有門面，全都開設商店，還組織成各種不同的“行”和“市”。“自大街及諸坊巷，大小鋪席，連門俱是，即無虛空之屋。每日清晨，兩街巷門，浮鋪上行，百市買賣，熱鬧至飯前，市罷而收。”(《夢梁錄》卷十三《鋪席》)“大抵杭城是行都之處，萬物所聚，諸行百市，自和寧門杈子至觀橋下，無一家不買賣者，行分最多。”(同上書同卷《團行》)所有這些描寫一點也沒有誇張。整條御街可以分爲三段，從和寧門到朝天門是南段，從朝天門到壽安坊(官巷)是中段，從壽安坊到觀橋是北段。官營的出售熟藥的三個惠民藥局，正分設三段中。南局在三省前，在南段；北局在市西坊南，中瓦子北，正好中段的中心；西局在衆安橋北，在北段。御街有不少鋪席，是從東京遷來的，“如廂王家絨綫鋪，自東京流寓，今於御街開張”(《都城紀勝》“鋪席”條)。

1 御街南段的街市

御街南段的街市，主要爲了供給宮內和主要中央官署日常生活的需要。御街的起點是大內的和寧門口，雖說門口警衛森嚴，左右排列有紅杈子警戒行人，但是紅杈子內外，正是早市最熱鬧的地方，因爲這裏是宮中官僚和宮女派人爭購進餐用的蔬菜、時鮮食品和新上市水果的場所。《夢梁錄》卷八《大內》，對於這點有很生動的描寫：“和寧門外紅杈子，早市買賣，市井最盛。蓋禁中諸閣分等位，宮娥早晚令黃院子收買食品下飯於此，凡飯食珍味，時新下飯，奇細蔬菜，品件不缺；遇有宣喚收買，即時供進。如府宅貴家，欲會賓朋數十位，品件不下一二十件，隨索隨應，指揮辦集，片時俱備，不缺一味。夏初茄瓠新出，每對可值十餘貫，諸閣分貴官爭進，增價酬之，不較其值，惟得享時新耳。”同書卷十三《天曉諸人出市》更描寫說：“和寧門紅杈子前，買賣細色異品蔬菜，諸般嘔飯，及酒醋、時新果子，進納海鮮品件等物，填塞街市，吟叫百端，如汴京氣象，殊可人意。”“嘔飯”即是“下飯”，這是當地的方言，指進餐時伴着米飯一起吃的小菜。紅杈子不僅是早市爭買時新食品之處，而且也是夜市十分熱鬧的地方，市上還有不少出名的食物品種，例如“孝仁坊紅杈子賣皂兒膏、澄沙團子、乳糖澆”，“內前杈子裏，賣五色法豆，使五色紙袋兒盛之”（同上書卷十三《夜市》）。

御街南段商店，主要是飲食店，供應大內和三省六部官僚以及往來官府的人們，因而這裏有不少著名的鋪席和出名的飲食品。例如“孝仁坊口，水晶紅白燒酒，曾經宣喚，其味香軟，人口便消。六部前丁香餛飩，此味精細尤佳”（同上書卷十三《天曉諸人出市》）。“廟巷（按即保民坊）口，賣楊梅糖、杏仁膏、薄荷膏、十

般膏子糖”（同卷〈夜市〉）。這些御街上屬於右一廂的坊巷口的飲食店和糖果店，也就成爲買客爭趨的名家。《都城紀勝》“食店”條說：“大抵都下買物，多趨有名之家，如昔時之內前（指大內以前）下家從食”，“從食”即是各種蒸作的糕點。朝天門還有戴家麩肉鋪“麩”即“饅”字，即今“熬”字，專賣“熬”的熟肉。朝天門裏大石板又有朱家元子糖蜜糕鋪，元子即團子。此外還有書籍鋪，裱褙鋪和藥鋪，如東側大佛寺前有疔藥鋪、保和大師烏梅藥鋪以及官營的惠民藥局南局，西側太廟前有尹家文字鋪、陳媽媽泥面具風藥鋪，朝天門大石板有朱家裱褙鋪（《夢梁錄》卷十三〈鋪席〉）。太廟前尹家文字鋪，亦稱尹家書籍鋪或經籍鋪，曾刊行不少筆記小說，如《北戶錄》、《卻掃編》、《釣磯立談》、《澗水燕談錄》、《曲洧舊聞》、《述異記》、《續幽怪錄》、《茅亭客話》、《篋中集》等書（王國維《兩浙古刊本考》卷上）。

2 御街中段的街市

御街中段從朝天門到壽安坊（俗稱冠巷或官巷），是街市最繁華的地方。特別是中瓦子前一段，尤其熱鬧，當時有“五花兒中心”的稱謂。《都城紀勝》“市井”條描寫道：

自大內和寧門內外，新路（指御街）南北，早間珠玉珍異及花果、時新、海鮮、野味、奇器，天下所無者，悉集於此。以至朝天門、清河坊、中瓦前、灤頭、官巷口、棚心、衆安橋，食物店鋪，人煙浩穰。其夜市，除大內前外，諸處亦然，惟中瓦前最勝，撲賣奇巧器皿、百色物件，與日間無異。其餘坊巷市井，買賣關撲，酒樓歌館，直至四鼓方靜。而五鼓朝馬將動，其有趁賣早市者，復起開張。無論四時皆然。如遇元宵尤盛，寧門和買民居作觀玩幕次，不可勝紀云。

上文所說朝天門到衆安橋，指御街的中段和北段。朝天門

原爲五代時吳越所築，南宋時僅存兩城壁，明清時用作鼓樓。朝天門往北，御街中段西側有屬於左一廂的清河坊、融和坊、新街、太平坊、市南坊、市西坊，屬於左二廂的修義坊、富樂坊、教睦坊、積善坊、秀義坊、壽安坊。其中清河坊、太平坊、積善坊、壽安坊等坊名，至今還沿用。上文所說孺頭，即市西坊；所說官巷，即壽安坊；所說棚心，即定民坊（又稱中棚巷）。御街北段西側還有左二廂的修文坊、里仁坊、保信坊、定民坊、睦親坊、純禮坊、保和坊、報恩坊等。所說中瓦前“撲賣奇巧器皿、百色物件”，“撲賣”是當時具有賭博性質的買賣行爲，以錢爲博具，以字幕定輸贏，常用於街頭小賣。

稱爲“瓦子”的游藝場，臨安城內共有五處，最熱鬧的是中瓦子，還有大瓦子又稱上瓦子，都在御街中段西側。中瓦子在市南坊北，大瓦子在市西坊以內北首的三橋巷中。

御街中段又是大酒樓集中之處。清河坊南有官營南酒庫的和樂樓，衆樂坊北有官營中酒庫的中和樓。中瓦子有武林園（向是三元樓康沈家在此開沽），是酒樓中規模最大的。融和坊有嘉慶樓和聚景樓，都是康沈腳店。新街巷口又有花月樓（施廚開沽），市西坊更有雙鳳樓（施廚開沽）。靈椒巷即菱椒巷，亦即修義坊又有賞心樓（一作賞新樓，沈廚開沽）（以上見《夢粱錄》卷十《點檢所酒庫》、卷十六《酒肆》、《武林舊事》卷六《酒樓》、《都城紀勝·酒肆》）。太平坊大街東南角有蝦蟆眼酒店（《夢粱錄》卷十三《鋪席》）。御街東側寶佑坊北有五間樓（《武林舊事》卷六《酒樓》）。

御街中段也是茶坊集中之地。太平坊有郭四郎茶坊，太平坊北首有張七相幹茶坊，市西坊南有潘節幹茶坊、俞七郎茶坊，以上四家茶坊都在御街西側。東側寶佑坊（一作保佑坊）北有朱醜醜茶坊。這五個茶坊，“樓上專安著妓女，名曰花茶坊”。

《夢梁錄》卷十六《茶肆》講到大街有三五家茶肆是花茶坊，列舉的就是上述五個茶坊，并稱：“蓋此五處多有吵鬧，非君子駐足之地也”。中瓦子南北有不少茶坊。《西湖老人繁勝錄》講“預賞元宵”，談到“中瓦南北茶坊內掛諸般琉璃子燈、諸般巧作燈、福州燈、平江玉棚燈、珠子燈、羅帛萬眼燈”。《夢梁錄》的《茶肆》又說：“更有張賣麵店隔壁黃尖嘴蹴球茶坊，又中瓦內王媽媽家茶肆，名一窟鬼茶坊，大街車兒茶肆、蔣檢閱茶肆，皆士大夫期朋約友會聚之處。”蔣檢閱茶肆即是蔣檢閱茶湯鋪，在清河坊（《夢梁錄》卷十三《鋪席》）。張賣麵店在寶佑坊，黃尖嘴茶坊也在寶佑坊。

御街中段還是歌館集中的地方，所謂歌館即是妓院。《武林舊事》卷六《歌館》說：“平康諸坊，如上下抱劍營、漆器牆、皮沙巷、清河坊、融和坊、新街、太平坊、巾子巷、獅子巷、後市街、薦橋，皆羣花所聚之地也。”抱劍營在御街東側新開坊和清平坊之間，皮沙巷即清平坊，巾子巷即市南坊。上列地名中，只有漆器牆、獅子巷和薦橋在大河（即鹽橋運河）沿岸，其餘都在御街中段的東西兩側。

御街中段更是當時重要的商業組織“市”、“行”、“團”的所在。如五間樓到官巷之間御街兩側的金銀鹽鈔引交易鋪、融和坊到市南坊之間的珠子市，官巷的花市、方梳行、銷金行和冠子行，後市街的柑子團等。

金銀鹽鈔引交易鋪是南宋新設的鋪席，北宋東京只有金銀鋪和金銀綵帛交易所。鹽鈔引是當時政府發給特許商人支領和運銷鹽茶等類管制產品的證券。這時商人在御街中段五間樓和官巷間，兩側開設有一百多家金銀鹽鈔引交易鋪，並在門口陳列有金銀器皿和現錢，叫做“看垛錢”，以便交易後，到權貨務入納清算鈔引之用。其中著名的，如市南坊南、惠民藥局北局前，有沈

家、張家金銀交引鋪。

珠子市在融和坊以北，市南坊以南，據說交易數量很大，“如遇買賣，動以萬數”（《夢梁錄》卷十三《鋪席》；《都城紀勝·鋪席》同）。

花市在官巷，即壽安坊，亦稱冠巷，可能原作冠巷，以出產冠子著稱。所謂“花”，是指服飾上裝飾用的各色花朵、鳥獸和用這種花朵、鳥獸裝飾的各種服飾，包括首飾、帽飾、領飾、衣飾以及配有這種裝飾的帽子服裝。花市既設有作坊製作，即所謂“花作”，更設有推銷的鋪席。據說“最是官巷花作，所聚奇異飛鸞走鳳、七寶珠翠、首飾花朵、冠梳及銷金衣裙、描畫領抹，極其工巧，前所罕有者，悉皆有之”（《夢梁錄》卷十三《團行》）。元宵節有許多民間舞隊，其中以官巷口蘇家巷的“二十四家傀儡”，最是出色，衣裝鮮麗，細旦戴着花朵和珠翠冠兒。所說“二十四家傀儡”，當是蘇家巷二十四家“花作”的製作（見《夢梁錄》卷一《元宵》）。官巷內花市的著名店鋪，有飛家牙梳鋪、齊家、歸家花朵鋪、盛家珠子鋪、劉家翠鋪、馬家、宋家領抹銷金鋪、沈家枕冠鋪（《夢梁錄》卷十三《鋪席》）。官巷還有方梳行、銷金行，冠子行，當是由於花市的興旺，花作和鋪席的增多，從中又細分出這種行來。銷金是當時流行的一種服飾上的美術工藝，它用金箔或金色綫條製成花朵、花邊或裝飾用的圖案。銷金行就是專門製作這種銷金工藝以及有銷金裝飾的頭巾和服裝的，看來當時城中居民很講究華麗的服飾，因而珠子市和花市十分興盛。

肉市在修義坊，實際上是屠宰作坊。當時杭城內外街坊到處開設有肉鋪，往往“各自作坊，屠宰貨賣”，用來供應街坊居民需要。修義坊的肉市，“巷內兩街，皆是屠宰之家，每日不下宰數百口，皆成邊及頭、蹄等肉”，用來分批賣給城內外的麵食店、分茶

店、酒店、犯鮮店以及盤街賣熬肉等人，從三更開行上市，到天曉才罷市（《夢梁錄》卷十六《肉鋪》）。所謂盤街，就是在街上流動叫賣。

也有因時節而臨時形成行市的，例如官巷秋天的蟋蟀市。《西湖老人繁勝錄》載：當促織（即蟋蟀）多的時候，“每日早晨，多於官巷南北作市，常有三五十火（伙）鬥者，鄉民爭捉入城貨賣，鬥贏三兩個，便望賣一兩貫錢。若生得大，更會鬥，便有一兩銀賣。每日如此。九月盡，天寒方休。”

除了上述集中的“市”、“行”、“團”以外，御街中段還多有供應居民日常需要的商店。如食店，太平坊南有倪設門麵食店，中瓦子前有耿家羊飯⑤，中瓦子武林園前有煎白腸，金子巷（即市南坊，又稱巾子巷）口有陳花脚麵食店，市西坊有姚家海鮮鋪及通宵的麵食店，後市街有施家肥羊酒店，又有賀家酪麵（《都城紀勝》“食店”條），寶佑坊有張賣食麵店。又如糖果店，融和坊有輕錫，太平坊有麝香糖、蜜糕、金錠裏蒸兒，北瓦子有皂兒水、張家豆兒水、十色糖、錢家乾果鋪，市西坊有炮螺滴酥，夜市有焦酸餡、千層兒，官巷口有光家羹、十色沙團，五間樓有泉福糖蜜、荔枝圓眼湯、周五郎蜜煎鋪，夜市有餘甘子、新荔枝，寶佑坊有張家元子鋪，蘭陵坊有阮家京果鋪。

再如衣料服裝店，清和坊有顧家彩帛鋪，市西坊有紐家、劉家、呂家、陳家彩帛鋪、柴家絨綫鋪，中瓦子有彭家油鞋鋪，抱劍營有李家絲鞋鋪，市南坊有沈家白衣鋪、徐官人幘頭鋪、紐家腰帶鋪，沙皮巷（清平坊）有孔八郎頭巾鋪、陳家繅結鋪，寶佑坊有孔家頭巾鋪，水巷（蘭陵坊）有徐家絨綫鋪、俞家冠子鋪。這一帶藥鋪也不少，中瓦子有陳直翁藥鋪、梁道實藥鋪，市西坊有毛家生藥鋪、楊三郎生藥鋪，市西坊南有官營惠民藥局北局，金子巷

(即市南坊)有楊將領藥鋪，修義坊有三不欺藥鋪，賞心樓前又有仙姑賣食藥，官巷有仁愛堂熟藥鋪、金白樓太丞藥鋪，外皮沙巷（清平坊）有雙葫蘆眼藥鋪，五間樓前有張家生藥鋪。寶佑坊有訥庵丹砂熟藥鋪。還有化妝品店，如修義坊的張古老胭脂鋪，官巷的染紅王家胭脂鋪，蘭陵坊的戚百乙郎顏色鋪。飾物店如寶佑坊的俞家七寶鋪。又有日用器物商店如市西坊的張家鐵器鋪，官巷的淮嶺傾錫鋪，中瓦子前的徐茂之家扇鋪，金子巷（市南坊）的傅官人刷牙鋪，五間樓前童家柏燭鋪，抱劍營街的吳家、夏家香燭裹頭鋪、許家槐簡鋪。又有著名樂器店如大瓦子的丘家篳篥。篳篥即箏篥，是西域傳入的一種管樂器，當時是很風行的，《武林舊事》卷四《乾淳教坊樂部》，就有“箏篥色”，列在“笛色”之前。大瓦子的丘家篳篥是和候潮門的顧家笛齊名的。

這一帶還多書籍鋪。寶佑坊前有張官人經史子文籍鋪。元刊本《大唐三藏取經詩話》三卷，卷末題“中瓦子張家印”，王國維認為“此張家殆即張官人經史子文籍鋪”。但是寶佑坊在御街東側，而中瓦子在御街西側，不能認為一地。中瓦子內當另有專印小說的張家書鋪，以配合瓦子中愛聽小說的游客的需要。中瓦子南街之東又有榮六郎開設的經史書籍鋪，是從東京大相國寺東邊遷來的，曾將原在東京刊行的舊本《抱朴子內篇》重新刊行（王國維《兩浙古刊本考》卷上）。

3 御街北段的街市

御街北段，從街西修文坊、街東羲和坊、直到觀橋，仍有密集的街市，但比中段和南段，著名的店鋪較少。衆安橋西南有下瓦子，俗呼北瓦子，這是臨安最大的瓦子，有勾欄十三座，是著名民間藝人會集之地，常有兩座勾欄專說史書，一座勾欄演出御前

雜劇，還有其他多種的技藝。酒樓有陸親坊北的官營南上酒庫的和豐樓，下瓦子的日新樓（鄭廚開酌）。著名店鋪，里仁坊有游家漆鋪（《夢梁錄》卷十三《鋪席》），衆安橋有澄沙膏、十色花花糖，觀橋大街有豆兒糕、輕錫。

值得注意的是陸親坊（即今弼教坊地點），這裏有培養宗室子弟的“宗學”，分大學和小學，同時又有陳起父子所開設的著名書籍鋪。陳起，字宗之，自稱陳道人，寧宗時因鄉貢第一，又稱陳解元，著有《藝居乙稿》。所設書鋪稱陳道人書籍鋪或陳宅經籍鋪、陳宅書籍鋪，亦稱陳解元宅。所刊書本的題記，多數加上地址“臨安府棚北（或作棚前，或作棚北大街）陸親坊南（或作陸親坊口）”。有一種地址作“臨安府洪橋子南河西岸”，又有一種地址作“臨安府鞦鼓橋南河西岸”，洪橋和鞦鼓橋都是西河上的橋，該是書鋪後來遷移到那裏。所刊唐人詩集很多，王國維推定“明刊十行十八字本唐人專集、總集，皆出陳宅書籍鋪本”，認為“唐人詩集得以流傳至今，陳氏刊刻之功爲多”（《兩浙古刊本考》卷上）。陳氏還編刊《江湖集》，是從當時數十家詩集選編而成，原刊已佚，《四庫全書》曾從《永樂大典》中輯出九十五卷，對於保存南宋人的詩，也有貢獻。

（五）沿河近橋的街市特色

臨安城中的街市，除了最繁華的御街以外，就是沿小河（市河）、大河（鹽橋運河）、西河（清湖河）的近橋街市。小河、大河、西河是當時城內主要的水上交通綫，這三條河上許多橋梁又是陸上交通的樞紐所在。當時城內廣大居民日常必需品，都要依靠水陸兩路運來，水路用船，陸路要用人力搬運，因而利用水路較多。“蓋杭城皆石板街道，黏泥沙比，車輪難行，所以用舟隻

及人力耳。”（《夢梁錄》卷十二《河舟》）許多日用品商店適宜於開設在沿河近橋的地方，從而形成沿河近橋的街市。這種沿河近橋的街市，北宋已經形成，到南宋有了進一步發展。蘇軾在北宋熙寧四年到六年（公元1071—1073年）任杭州副知事，元祐四年到五年（公元1089—1090年）任杭州知事，從蘇軾所作的詩來看，當時沙河塘一帶已經居民不少，夜間燈火繁多^①。

1 沿小河近橋的街市

小河從大河中段宗陽宮橋分出西行，經南瓦子前的熙春橋折而北上，經通和坊東的金波橋，寶佑坊東的寶佑橋，寶福坊東的平津橋（貓兒橋），鐵綫巷西、蘭陵坊東的水巷橋，義和坊東的芳潤橋（炭橋），武志坊東的李博士橋，到延定坊東的鵝鴨橋，一路上都有近橋的街市。除供應日常用品的商店外，還有其他各種著名的店鋪。南瓦子前熙春橋畔有酒樓叫熙春樓（王廚開沽），南瓦子有宣家臺衣、張家元子（即團子），南瓦子北有卓道王賣麵店，熙春樓下又有雙條割子店。雙條割子是一種肉食，《西湖老人繁勝錄》的“肉食”中有“雙條割子”一種，《武林舊事》卷六的“市食”中也有“割子”一種。金波橋又有酒樓叫風月樓（嚴廚開沽）。也還有不少歌館（即妓院）。《武林舊事》卷六《歌館》說：“及金波橋等兩河以至瓦市各有等差。”平津橋沿河有布鋪、扇鋪、温州漆器鋪、青白碗器鋪等，貓兒橋（即平津橋）又有魏大刀熟肉、潘節幹熟藥鋪。水巷橋東的鐵綫巷有籠子鋪、生絹一紅鋪，水巷橋沿河也還有針鋪、彭家温州漆器鋪。炭橋（即芳潤橋）沿河有青篋扇子鋪，炭橋又是藥市所在，該有不少製藥的作坊和藥店。李博士橋又有鄧家金銀鋪、汪家金紙鋪。鵝鴨橋東更有官營北酒庫的春風樓（以上除酒樓依據《夢梁錄》卷十《點檢所

酒庫》、卷十六《酒肆》外，其餘都見卷十三《鋪席》。

2 沿大河近橋的街市

沿大河南段的通江橋、望仙橋一帶，沿大河中段的薦橋和北段的鹽橋一帶，都有繁華街市。

鹽橋以南，油蠟橋以西的橋圓亭有“書房”，或稱“文籍書房”，是書市的集中地。鹽橋又是生帛的行市所在。鹽橋下蒲橋以東原有瓦子，稱為蒲橋瓦子，後來廢棄為民居，該是這一帶繁榮市面，後來逐漸衰落了。薦橋以南的太和橋，原有官營東酒庫的太和樓，後因燒毀而廢棄。薦橋以東豐禾坊有王家酒店，附近新開巷有元子（即團子）鋪。薦橋和薦橋西南都稅務以南的漆器牆以及望仙橋東南的獅子巷，都是歌館（妓院）集中的地方（《武林舊事》卷六《歌館》）。獅子巷口有徐家紙札鋪、凌家刷牙鋪、觀復丹室。添器牆下有李官人雙行解毒丸。壽慈宮（即德壽宮，在望仙橋東北）前有著名的熟肉，望仙橋還有名家的糕糜（《都城紀勝》“食店”條）。夜市，通江橋有雪泡豆兒水、荔枝膏，通江橋東雜賣場前有甘豆湯、戈家蜜棗兒，獅子巷口有煎耍魚、罐裏燻雞絲粉等，都很著名。

3 沿西河近橋的街市

城內西北區沿西河近橋也有些街市。三橋附近有楊三郎頭巾鋪、清湖橋附近有戚家犀皮鋪（《夢梁錄》卷十三《鋪席》）。同時“三橋等處客邸最盛”（《武林舊事》卷二《元夕》），是旅客集居的地方。西河分支長壽橋東有茶湯巷，又是茶坊集中之地；同時車橋南大街有郭宅經鋪，曾刊行《寒山詩》等書（《兩浙古刊本考》卷上）。這裏靠近國子監和太學。

4 一般街市和城門口的街市

所有坊巷附近都有一般街市，有賣柴米油鹽醬醋茶的商店。府縣官署周圍也有街市。“府治前市井亦盈，鋪席亦多，蓋經訟之人往來駢集，買賣要鬧處也。”（《夢梁錄》卷十《府治》）

四周城門口內外都有街市，除了“行”與“市”以外（見下節），著名鋪席如清波門（即暗門）外的鄭廚分茶酒肆（《夢梁錄》卷十六《酒肆》）、錢塘門外的宋五嫂魚羹、候潮門的顧四笛、豐豫門（即涌金門）的灌肺（《都城紀勝》“諸行”條、《夢梁錄》卷十三《鋪席》）。

（六）“市”、“行”、“團”、“作”的組織和作用

1 “市”、“行”、“團”的分佈

南宋臨安“行”、“市”組織，比北宋東京種類更多，在城內外分佈更廣，而且在社會經濟上所起作用也更大。其中稱為“行”、“市”、“團”的，主要如下（參看圖63）：

一、米市，集中在西北餘杭門外崇果院黑橋頭以及市鎮湖州市，新開門外草橋下南街和米市橋。

二、菜市，集中在城東崇新門外南土門市、青東門外菜市橋、壩子橋。“蓋西門絕無民居，彌望皆菜園。”（《二老堂雜志》卷四）

三、鮮魚行，在東南候潮門外和城東東青門外壩子橋①。

四、魚行，在西北餘杭門外水冰橋。

五、鯊團，亦名南海行，在東南便門外渾水閘頭。

六、蟹行，在城東崇新門外螺螄橋北蔡湖橋②。

七、柴市，在東南候潮門外下教場門東柴市橋③。

八、南猪行，在候潮門外。

九、北猪行，在州北打猪巷。

十、布市，亦稱布行，在東南便門外橫河頭。

十一、花園，在城南，後來官巷（即壽安坊）口與錢塘門內亦有^②。

十二、花市，在御街中段官巷內。

十三、方梳行、銷金行及冠子行，都在官巷。

十四、肉市，原在大瓦子，後在修義坊內（《咸淳臨安志》卷十九“市”條）。

十五、珠子市，在御街中段融和坊到市西坊，後又擴到官巷（《咸淳臨安志》卷十九“市”條）。

十六、生帛市，在大河北段鹽橋（《夢梁錄》卷十三《團行》）。

十七、藥市，在小河中段炭橋（即芳潤橋）和義和坊內。

十八、書房，又稱文籍書房，在大河北段油蠟橋（新橋）西側橋園亭（一作桔園亭），西通小河的棚橋。

十九、柑子團，在御街中段以後的後市街。

二十、青果團，亦稱青果行，在候潮門內大街上（即泥路）。

此外《夢梁錄》還講到麵行、薑行、菱行、雞鴨行、骨董行（買賣七寶）以及酒行、食飯行、散兒行（鑽珠子）、雙綫行（做靴鞋）、香水行（浴堂）等。《西湖老人繁勝錄》“諸行市”條，談到的川廣生藥市，當即藥市，可知藥材主要從川廣運來；還談到金銀市，可能即指御街中段的兩行金銀鹽鈔引交易鋪。此外還有象牙玳瑁市，絲錦市，枕冠市，故衣市，衣絹市，卦市，銀朱彩色行，金漆卓（桌）凳行，青器行，處布行，麻布行，海鮮行，紙扇行，麻綫行，木行，竹行，果行，筍行，具體所在地點不詳。

《咸淳臨安志》卷十九“市”條，在列舉十七個主要“市”、“行”

後說：“以上團市，皆四方物資所聚，姑載其大略，餘不悉書。”《都城紀勝》“鋪席”條也說：“至於故楮、羽毛、扇牌，皆有行鋪，其餘可知矣。”《西湖老人繁勝錄》又說：“京都有四百十四行”，並列舉了一百四十多行，都是供應零星日用品、修補家用品以及多種服務行業，這和《武林舊事》卷六《小經紀》，所列舉的代人採辦各種日用品、修補各種家用品、提供住家的種種服務項目，基本上相同^②。

2 米市、肉市、鰲團以及其他日用物資行市的作用

“市”和“行”、“團”所以會分得如此多而細，是爲了便於官府管理，從中抽稅，以及提供官府所需物品和差役，或買賣官府多餘的物品。《都城紀勝》“諸行”條說：“因官府科索而得此名。”《夢粱錄》說：“蓋因官府回買而立此名。”又說：“雖醫卜工役，亦有差使，則與當行同也。”每行各設有行頭，有對官府代表同行承應各種負擔的責任，並分攤給所屬同行。

但是我們應該看到，這種“市”、“行”原是同業商店集中地段的稱謂。從唐代開始，所以會出現同業商人的組織，“市”、“行”成爲這種組織的名稱，這是在都市商品經濟發展的情況下，爲了謀求同業的共同利益，減少彼此之間的競爭，加強共同的協作，促使本行手工業和商業的發展。每個行在行頭的領導下，可以統一採購外來的原料和商品，可以統一規定時價分發給同行的店鋪，或者由有關店鋪各自前來按定價購取，也還可以用統一運載工具運送到銷售的店鋪。以餘杭門外和新開門外的米市爲例：每一米市集中地點，至少有三四十家米店，“接客打發，分表鋪家”。“每戶專憑行頭於米市做價，徑發米到各鋪出糶；鋪家約定日子，支打米錢，其米市小牙子，親到各鋪支打發客。”行頭在“米

市做價”，這個行頭當然是米市的行頭，一經“做價”，便可以按統一的時價，按手續分發給出糶的米鋪。這樣既便利了“客米到來”，又方便了“各鋪出糶”，更統一了時價，免除了彼此競爭，加強了相互協作，當然可以使同行得到共同的利益，並有助於商品的推銷和同行的發展。因而“杭城常顯米船紛紛而來，早晚不絕可也。且又袋自有貨戶，肩駝脚夫亦有甲頭管領，船只各有受載舟戶，雖米市搬運混雜，皆無爭差，故鋪家不勞餘力而米徑自到鋪矣”（《夢梁錄》卷十六《米鋪》）。這樣米市，就成爲早晚不絕的市，每一米市上所設三四十家米店，就成爲收進客商運來客米分發杭城內外米鋪出糶的樞紐。因爲每種商品的時價必須由“行”統一規定，市價就有“行市”之稱。南宋已有此成語。例如董煟《救荒活民書》卷三所載紹興年間馮轍《勸賑濟詩》，有“減價平行市”之句，這一成語一直沿用到今天。

修義坊內的肉市，同樣是分發杭城內外衆多的需要各色猪肉的食店的樞紐。修義坊內兩街都是屠宰之家，每天宰豬不下幾百頭，都要切割成邊豬、頭、蹄等等，以便城內外各種麵店，分茶店、酒店、犯鮓店以及沿街流動賣熬肉的人每天清早前來選購。

鯿團設在東南便門外渾水閘頭，集中接待外來鯿商，以便城內外鯿鋪採購。鯿是經過腌臘的乾魚，“城南渾水閘，有團招客旅，鯿魚聚集於此，城內外鯿鋪不下一二百餘家，皆就此上行合揸”（《夢梁錄》卷十六《鯿鋪》）。此外設在城外的猪行、蟹行、柴行和布市，同樣是爲了便於接納外來客商，並便於統一時價而分發給城內外的同行店鋪。生帛市所以設在大河北段鹽橋，川廣生藥市所以設在小河中段的炭橋，書房所以設在大河北段新橋附近，青果團所以設在候潮門內大街，也是爲了便於接納客商而

分發給同行店鋪。所以《咸淳臨安志》說這些團市“皆四方物資所聚”。

官巷（亦稱冠巷，即壽安坊）的花市及方梳行、銷金行、冠子行的情況，不同於上述的市、行、團，它具有作坊兼行市的性質，所製作的工巧的花朵、衣飾和服裝，是適應貴族官僚的需要的。設在城南和城西錢塘門內的花團，和官巷的花市該有密切的關係。《咸淳臨安志》和《武林舊事》既說花市在官巷，又說花團在官巷口和錢塘門內，可能花團着重於製作，花市着重於推銷。當時這種製作的花朵，需要量很大，不但大量用於衣飾，而且皇帝有對臣下賞花的禮節。每逢三年舉行一次郊祀“大禮”的年頭，在從太廟到郊壇舉行大禮之前，要先到景靈官朝獻和到東太乙官燒香，燒香禮畢，“自執政以下，依官品賜花”。所有禁衛官兵全都帶花，“朝天門道中，直南一望，便是鋪錦乾坤；吳山坊口北望，全如花花世界”（《西湖老人繁勝錄》“大禮年”條）。

這種同行組織的“行”和“市”，每日收進客商大量的日用物資，分批發給全城零售商鋪，是適應都城中高度密集的居民日常需要的。“諺云：東菜西水南柴北米，杭之日用是也。”（《夢梁錄》卷十八《物產》）當時對杭城食米的需要量有種種不同估計，或者說：“細民所食每日城內外不下一、二千餘石”（《夢梁錄》卷十六《米鋪》），或者說：“非三、四千石不可支一日之用”（周密《癸辛雜識續集》卷上《杭城食米》），或者說：“京師（指臨安）月須米十四萬五千石”（朱熹《朱文公文集》卷九四《敷文閣直學士李公墓志銘》）。總之每日食米需要量很大。柴的需要量也大，除了“柴市”以外，還有城內外官設的柴場共二十一場出售木柴（《夢梁錄》卷十八《恩霑軍民》）。每日需要的蔬菜、鮮魚、豬肉也是大量的。北宋東京的魚行每日早上“生魚有數千擔入門”，臨安魚行

每天早上進入的數量當然更多。特別值得重視的是，書籍業的同行有“書房”(或稱“文籍書房”)的組織。當時臨安官私的雕版印刷業十分發達，居於全國的首位，這個“書房”無疑對於書籍流通和文化交流起着很大的作用。

3 “作”的組織及其作用

當時手工業作坊也已有組織，叫做“作”或“作分”。如碾玉作、鑽卷作、篋刀作、腰帶作、金銀打鍛作、裊貼作、鋪翠作、裱褙作、裝鑲作、油作、木作、磚瓦作、泥水作、石作、竹作、漆作、釘鉸作、箍桶作、裁縫作，修香澆燭作、打紙作、冥器作等。也有稱行的，如鑽珠子稱散兒行，做靴鞋叫雙綫行(《夢梁錄》卷十三《團行》)。《武林舊事》卷六《作坊》說：“都民驕惰，凡買賣之物，多與(宋刻作于)作坊行販已成之物，轉求什一之利。或有貧而願者，凡貨物盤架之類，一切取辦於作坊，至晚始以所直(值)償之。雖無分文之儲，亦可糊口，此亦風俗之美也。”說明當時作坊和相關的店鋪之間已協作得很好，店鋪的商品大多來自作坊“已成之物”，而且用賒賬辦法向作坊進貨，然後再定期按值償還，這是商品經濟發展條件下一種進步的經營方式。

《武林舊事》列舉的作坊，有熟藥圓(丸)散和生藥飲片，這是供應藥店需要的。其餘大多是麵、點心、食品的作坊，如麩麵、團子、饅頭、爐炕鵝鴨、爐炕豬羊、糖蜜棗兒、諸般糖、金橘團、灌肺、餛飩子、苡豆等，餛飩子是一種油煎的麵和糯米製成的食品。這樣多品種的食品、點心、糖果的專門作坊，以供食店、從食店、果子店的需要，說明這些品種的銷售量是較多的，因而可以採用作坊成批生產的方式。這該是一種新興的食品作坊，既便利有關店鋪的大量發售，又適應了衆多的街坊居民生活上的需要。

4 雇傭勞動者的“行”的組織

北宋東京的雇傭勞動者已分別有“行”的組織，並設有“行老”引領提供雇主。南宋臨安有進一步的擴展，所有各級官府、官僚住宅、作坊、店鋪所需各種雇工，包括具有技藝專長的各色手工業工人，“俱各有行老引領”（《夢梁錄》卷十九《顧覓人力》）。各行的“賣伎人”會聚“行老”常在一定的茶坊中，叫做“市頭”（《都城紀勝》“茶坊”條、《夢梁錄》卷十六《茶肆》）。所以叫做“市頭”，就是商談有關雇傭的問題，因為雇主雇用各種人才，都必須通過各行的“行老”來引領提供。

（七） 花色品種衆多的食店

臨安食店的種類不少，每種食店的花色品種很多，大體上是沿襲北宋東京的風氣而更有發展，因為這兒有不少店主原是從東京遷來的，如著名的魚羹宋五嫂（在錢塘門外）、羊肉李七兒、奶房王家、血肚羹宋小巴之類（袁褰《楓窗小牘》卷上）。羹和羊肉，原是東京最風行的食品。同時當地的店主爲了爭取北方遷來的貴族和官僚，投其所好，也往往仿效東京的飲食口味，甚至“效御廚體式，貴官家品件”（《夢梁錄》卷十六《分茶酒店》）。原來北宋東京全是“北食”的口味，爲了方便南方去的士大夫，在“北食”之外，另設南食店（或稱南食麵店）、川飯店（或稱川飯分茶），但是在臨安已大多不分南北，合二爲一了。

北宋東京食店，大的有分茶店，其次有瓠羹店、羹店、餛飩店、素分茶店以及賣菜麵、胛臠的店。臨安沿襲這種風氣，分茶店亦稱分茶酒店、茶飯店，其次是麵食店、肥羊酒店（又稱羊飯

店)、犯鮓店、菜麵店、餛飩店、素食店、羹店、菜羹飯店。分茶店往往和麵食店混稱，因此《夢梁錄》列舉的著名食店中，只見麵食店，如張寶食麵店（保佑坊前）、陳花脚麵食店（金子巷即市南坊前）、倪設門麵食店（太平坊南）、卓道王賣麵店（南瓦子北）。著名的羊飯店和肥羊酒店，有耿家（中瓦子前）、施家（後市街口）、歸家（豐豫門）、莫家（錢湖門外南首省馬院前）以及雙羊店（馬婆巷）。著名犯鮓店有倪家（石榴園），著名羹店有光家（官巷口）、宋五嫂魚羹（錢塘門外）。原來東京風行瓠羹，潘樓街有徐家瓠羹店很出名，但是到臨安已“名存而實亡”（《都城紀勝》“食店”條）。

1 分茶店和麵食店

烹調作為一種技藝，作為一種改善生活的文化，這時有着高度的發展。臨安分茶酒店和麵食店出售的下飯名件，第一類是羹，如百味羹、頭羹、三脆羹、石髓羹、右肚羹之類都是東京早有的名菜，臨安只是在花色品種上增多。如頭羹一味，臨安有錦絲頭羹、十色頭羹、間細頭羹、杓葉頭羹、象眼頭羹、蓮子頭羹、海鮮頭羹、三軟頭羹④等等，花色品種十分繁多。腰子一味原是東京拿手的名件，如二色腰子（即赤白腰子）、角禽（炙）腰子、荔枝腰子、還元腰子等。臨安也把腰子作名菜，菜牌上的名次，僅次於羹，如焙腰子、鹽酒腰子、脂蒸腰子、釀腰子、荔枝焙腰子、腰子假炒肺、大片腰子、松花腰子⑤等。東京叫做“簽”的一種菜也很出名，如入爐細項蓮花鴨簽、羊頭簽、鵝鴨簽、雞簽、細粉紫簽等。臨安也多“簽”的花色品種，如雞絲簽、鵝粉簽、肚絲簽、雙絲簽、葷素簽、抹肉筍簽、錦雞簽、蝟蟬簽⑥等。東京愛好各色羊肉的品味，如批切羊頭、虛汁垂絲羊頭、入爐羊、點羊

頭、湯骨頭乳炊羊、臠(炖)羊、開廳羊、軟羊、插肉撥刀炒羊等。臨安沿襲這種風氣，羊肉的品種很多，如蒸軟羊、鼎煮羊、羊四軟、酒蒸羊、繡吹羊、五味杏酪羊、千里羊、羊雜燴、羊頭元魚、羊蹄筍、細抹羊生膾、改汁羊撒粉、細點羊頭、煎(疑當作“煎”)羊事件、盞蒸羊、羊炙焦、羊血粉^⑦。臨安多有叫做“膾”的菜，如香螺膾、海鮮膾、羣鮮膾、鯽魚膾(《夢梁錄》卷十六《分茶酒店》)、肚脰膾、沙魚膾、五珍膾、水母膾(《武林舊事》卷九《高宗幸張府節次略》)等，這是東京所沒有的，該是“南食”。

麵的品種，東京分茶店有罨生軟羊麵、桐皮麵、冷淘碁子、寄爐麵飯，川飯店則有插肉麵、大煨麵，南食店有桐皮熟膾麵。臨安麵食店的麵食名件是：猪羊庵生麵、絲雞麵、三鮮麵、魚桐皮麵、鹽煎麵、筍潑肉麵、炒雞麵、大熬麵、子料澆蝦燥麵，還有三鮮棋子、蝦燥棋子、蝦魚棋子、絲雞棋子、七寶棋子。“庵生”當即“罨生”，罨生軟羊麵該與猪羊庵生麵屬於同一品種，桐皮麵與魚桐皮麵也該同一品種，冷淘碁子與三鮮棋子等等也該同一品種。臨安還有許多品種的素麵，其中也有“七寶棋子、百花棋子”等麵(《夢梁錄》卷十六《麵食店》)。臨安的餛飩店“專賣大煨、燥子餛飩並餛飩”，菜麵店“專賣菜麵、盞淘血臟麵、素棋子、經帶，或有潑刀、冷淘”(《都城紀勝》“食店”條)。“大煨”即是東京川飯店的大煨麵。《東京夢華錄》卷四《食店》說：“又有菜麵、胡蝶、盞脰臠，及賣隨飯、荷包白飯……。”“脰臠”該即餛飩，即是餛飩麵，或稱麵餛飩。《夢梁錄》卷十六《麵食店》說：“有店專賣餛飩麵，如大熬餛飩、大燥子、料澆蝦、燥絲雞、三鮮等餛飩，並賣餛飩”，指的就是餛飩店。同書接着又說：“亦有專賣菜麵、熟盞筍肉淘麵，此不堪尊重，非君子待客之處也”，指的就是菜麵店。還有許多專賣家常飯食的店，如賣菜羹飯店兼賣煎豆腐、煎魚、燒菜、煎茄子等，

是一般居民的食店。

2 犯鮓店

臨安特有的犯鮓店，也還是從東京特有的食品犯鮓發展出來的。“犯”是經過加工調味的乾肉，“鮓”是經過加工調味的魚、蝦、蟹、雀等肉。東京東華門外魏氏所造犯鮓很有名（洪邁《夷堅志》補九，“徐汪二僕”條），東華門外何、吳二家所造魚鮓也著聞天下，被稱為珍味。周煇說：“輝出疆日，虹縣及汴京頓，皆供犯鮓甚美，一路俱無之，豈皆出於此耶？”（《清波別志》卷下）《東京夢華錄》曾提到“玉版鮓”（卷四《會仙酒樓》）和“玉版鮓犯”（卷二《飲食果子》），只有這樣一個品種。臨安由於特設犯鮓店，所製作的犯鮓，名件已多到四十種，除玉版鮓以外，稱為鮓的就有十七種之多^②。犯鮓店兼營生熟肉，但是主要供應的食品還是犯鮓。

3 涼水

東京的州橋夜市，夏天有涼水出售，著名品種有沙糖菜豆甘草冰雪涼水和荔枝膏。這種涼水到臨安又得到了重大發展。《武林舊事》卷六把“涼水”和“犯鮓”同樣作為一項重要的食品，是有道理的。它列舉了犯鮓三十種和涼水十八種（其中“五苓、大順散”應是二種）。《西湖老人繁勝錄》的“諸般水名”也列舉了十七種，除去重複的，共有二十三種之多^③。著名的如中瓦子前的皂兒水和張家豆兒水，雜賣場前的甘豆湯，通江橋的雪泡豆兒水和荔枝膏（《夢粱錄》卷十三《鋪席》、《夜市》）。

4 從食店

從食店，東京著名的有州橋以南的曹家從食，臨安著名的有

大內前的下家從食（《都城紀勝》“食店”條）。從食是指各色品種的蒸作糕點，包括多種饅頭、包子（包兒）、糕、餅、餡、酥、夾子（夾兒）、元子（即團子）、粽子、豆團、麻團、糍團、油炸、千層兒。《夢粱錄》卷十六《葷素從食店》，列舉蒸作麵行出賣的從食五十一種，素點心從食店出賣的素從食二十六種，粉食店出賣的各色元子、水團、糕、粽子等十五種。《武林舊事》卷六《糕》，列舉各種糕十九種，《蒸作從食》列舉從食五十二種以及諸色夾子、諸色包子、諸色角兒、諸色果食、諸色從食。著名的如市西坊有螻蛄滴酥、焦酸餡、千層兒，和朱家饅頭鋪⑩。觀橋大街有豆兒糕（《夢粱錄》卷十三《夜市》），望仙橋有糕糜（《都城紀勝》“食店”條）。南瓦子前有張家元子，朝天門裏大石板有朱家元子糖糕鋪。

5 果子店

果子店，即糖果店，在臨安也很多。著名的如大瓦子的水果子、五間樓前周五郎蜜煎鋪、中瓦子前錢家乾果鋪、水巷（蘭陵坊）口阮家乾果鋪、雜賣場前戈家蜜棗兒。《西湖老人繁勝錄》列舉“時果”（即時新果子）十五種、“茶果仁兒”七種、“蜜煎”十二種、“糖煎”三十九種、比較詳細。《武林舊事》卷六《果子》，列舉糖煎和蜜煎以及其他製法的點心四十多種，其中還有不少品種是西湖老人沒有記錄的。例如酪麵是一種北食，當時臨安還有著名的鋪席。“如酪麵，亦只後市街賣酥賀家一分（份），每個五百貫（“五百”兩字疑有錯誤），以新鮮油餅兩枚夾而食之，此北食也”（《都城紀勝》“食店”條）。酪麵該是一種用牛羊乳炒熬而成的麵食品。

(八) 分佈各處街市的酒樓、茶坊和歌館

酒樓、茶坊以及上節談到的分茶酒店、高級麵食店，都是都城中居民進行廣泛交際的地方，是約會親友、請客招待、舉行宴會的場所。

1 酒樓

臨安酒樓有官營和私營兩種。私營的酒樓或稱“市樓”。

臨安共有十三所官營酒庫，七所設有酒樓。南庫(原名升陽官)的和樂樓在清河坊南，中庫的中和樓在衆樂坊北，南上庫(又名銀甕子庫)的和豐樓在陸親坊，都在御街的中段和北段；北庫的春風樓在鵝鴨橋東，處於小河(市河)街市的中段；東庫的太和樓在太和橋東，處於大河(鹽橋運河)街市的中段，因火災而廢棄；西庫(又稱金文庫)的西樓在豐豫門(即涌金門)外。西庫分出有子庫，西子庫的太平樓已燒毀，西子庫另有豐樂樓也在豐豫門外^⑧。此地以出甜酒著名，又而臨西湖，風景絕佳，游人衆多，因而西庫和西子庫都要在此設酒樓^⑨。北外庫的春融樓在餘杭門外左家橋北，接近米市。更有碧香諸庫，如錢塘門外上船亭南的錢塘正庫，有先得樓，就是以前的望湖樓。

市樓中最著名的是中瓦子武林園，咸淳六年(公元1270年)，更創建三元樓，由康、沈家開酌，處於御街熱鬧的中心。處於御街的，還有融和坊的嘉慶樓和聚景樓(康、沈脚店)、新街巷口的花月樓(施廚開酌)、市西坊的雙鳳樓(施廚開酌)、修義坊的賞心樓(一作賞新樓，沈廚開酌)、寶佑坊北的五間樓、北瓦子前的日新樓(鄭廚開酌)。處於小河(市河)街市的，有南瓦子的熙春樓(王

廚開酌)、金波橋的風月樓(嚴廚開酌)。處於大河(鹽橋運河)街市的,有薦橋以東豐禾坊的王家酒店。此外,清波門(暗門)外有鄭廚分茶酒肆(《夢梁錄》卷十六《酒肆》),“鄭廚只賣好食,雖海鮮頭羹皆有之”(《武林舊事》卷六《酒樓》)。御街中段太平坊大街東南角有蝦蟆眼酒店,《武林舊事》說:“蛇麻眼只賣好酒”。蛇麻眼當即蝦蟆眼酒店。據《武林舊事》,著名的市樓,還有銀馬杓、翁廚、任廚、陳廚、周廚、巧張、張花,都是以著名廚師來號召的。銀馬杓是門口掛有銀馬杓作為記號。

大酒樓沿襲東京酒樓的格局,門前彩畫歡門,設紅綠杈子,門口緋綠簾幕和貼金紅紗梔子燈。入門有主廊,再分列兩廊,兩旁排列有大小閣兒,稱為廳院。弔窗之外竹花掩映,垂簾下幕,入晚燈燭熒煌,上下相照,夜市尤為熱鬧。一般在樓下設有散坐,小吃或飲酒不多,只就樓下散坐,不可輕易登樓上閣。樓上酒閣又或以“山”為名,稱為“一山”、“二山”、“三山”,若飲酒量大的,牌額寫作“過山”。酒器悉用銀製。官營酒樓設有官妓數十人,私營酒樓亦有私妓數十人。初坐定,酒家人先給看菜幾碟,問酒多少,然後分別點喚好菜,店中有菜的單子、牌面以供點喚。如煮酒,或可先索到十瓶,逐瓶開飲,多餘可退回。如下酒品件,其錢數不多,謂之“分茶”、“小分下酒”;如或招喚妓女,就得索喚高價細食,使其高擡價錢^③。酒店是臨安最賺錢的的地方。當時流行的諺語:“欲得官,殺人放火受招安;欲得富,趕着行在賣酒醋。”(《莊季裕《雞肋篇》卷中)或者說:“若要富,守定行在賣酒醋,若要官,殺人放火受招安。”(《張知甫《張氏可書》,見《宋稗類鈔》卷八轉載。)行在即是臨安。

正因為賣酒容易賺錢,臨安賣酒這一行業很是興旺,除了大酒樓以外,小酒店也很多。除了上節所舉的“肥羊酒店”以外,

還有稱爲“包子酒店”，兼賣包子、腸血粉羹等下酒小菜；又有所謂“宅子酒店”，門面裝飾如仕宦宅舍；又有“花園酒店”，佈置如花園一般，多數設在城外；還有直賣店，專賣酒而不賣下酒食品，叫做“角球店”；更有散酒店，零沽散賣；有的門口掛有草葫蘆、銀馬杓、銀大碗作爲記號，多是竹柵布幕，謂之“打碗頭”，每次只打三二碗酒。正因爲街市上賣酒和賣飯食的很多，臨安就設有“酒行”和“食飯行”這兩個“不當行”而稱“行”的。

另有所謂“庵酒店”，“謂有娼妓在內，可以就歡，而於酒閣內暗藏卧床也。門首紅梘子燈上，不以晴雨，必用箬簷蓋之，以爲記認。其他大酒店，娼妓只伴坐而已”（《都城紀勝》“酒肆”條）。“箬簷”是用箬葉製成的防雨的燈罩。這種“庵酒店”，實質上是妓院性質。

2 茶坊

茶坊也是唐代開始設置的，北宋東京街市上已有不少，到南宋臨安就有較大的發展。原來東京熟食店張掛名畫以招徠顧客。臨安茶坊也採用這種佈置方式，四壁張掛名人繪畫，並設花架，安頓松檜等物，插四時花朵。除了賣一般茶湯之外，冬天加賣七寶擂茶、餛飩、蔥茶或鹽豉湯，夏天加賣雪泡梅花酒或縮脾飲、暑藥之屬。這是三種涼水，暑藥或稱富家散暑藥冰水（見《西湖老人繁勝錄》）。紹興年間賣梅花酒的茶肆，用鼓樂吹奏《梅花引》一曲號召，用銀盃、銀杓、銀盞子盛來出賣。

後來就只敲打響盞唱歌叫賣，只用瓷盞、漆托供賣。

茶坊名爲賣茶，實際上是都市中社會交際最活躍的場所。或者作爲士大夫約會朋友高談闊論的地方，如御街中段清河坊的蔣檢閱茶湯鋪、中瓦子內的王媽媽家茶肆、寶佑坊前的黃尖嘴

蹴球茶坊等，都是如此。或看作爲“富室子弟、諸司下直等人會聚、習學樂器、上教曲賺之類，謂之掛牌兒”，作爲學習樂器、教練唱曲的場所。或者成爲各種行業出賣技藝的雇傭勞動者會聚“行老”的地點，叫做“市頭”。

也還有不少茶坊，樓上專安着妓女，被稱爲“花茶坊”。我們在前面敘述御街中段的街市，已講到五家著名的“花茶坊”。《武林舊事》卷六《歌館》，就把不少茶肆歸入歌館一類，在講述許多“羣花所聚之地”之後，接着說：“外此諸處茶肆，清樂茶坊、八仙茶坊、珠子茶坊、潘家茶坊、連三茶坊、連二茶坊，及金波橋等兩河以至瓦市，各有等差，莫不靚妝迎門，爭妍賣笑，朝歌暮弦，搖蕩心目。”所有這些茶肆，也具“花茶坊”的性質。

3 歌館

歌館即是妓館，凡是比較熱鬧的街市上都有，御街中段的街市和大河（鹽橋運河）沿岸近橋的街市最多，其次是小河（市河）沿河近橋的街市。我們在前段敘述街市時已經談到。有些名妓的住處佈置得十分豪華，所有酒器、冰盆、火箱、妝合（盒）之類，全是金銀製成，帳幔茵褥多用錦綺製成，還陳設有奇珍器玩。次等的，所有酒器、首飾、被褥、衣服之屬，都是從各處租借來的。當時臨安有專營租借各種器物的行業。（以上依據《武林舊事》卷六《歌館》）

（九）以勾欄爲中心的瓦子大發展

1 瓦子的創設和發展

瓦子或稱瓦市、瓦肆、瓦舍，原是臨時集合，以演藝的勾欄爲

中心的集市。北宋開始在各大都市中流行，到南宋有更大的發展。南宋定都臨安，有大量駐軍。殿巖楊和王因軍士多西北人，是以城內外“創立瓦舍，招集妓樂，以爲軍卒暇日娛樂之地”（《夢梁錄》卷一九《瓦舍》）。這些瓦舍原來出於官府創設，因而隸屬官府主管，城內瓦舍隸屬修內司，城外瓦舍隸屬殿前司（《武林舊事》卷六《瓦子勾欄》）。修內司設有教樂所，專管官府所屬樂人。殿前司主管禁軍，城外瓦舍所以要隸屬於殿前司，就是由於駐軍都在城外和城內靠近城牆地區，瓦舍多爲士兵娛樂場所的緣故。當時駐軍及其家屬估計有二十萬人以上。但是必須指出，當時城內瓦舍主要是居民的娛樂場所。所以《夢梁錄》卷十九《瓦舍》說：“頃者京師甚爲士庶放蕩不羈之所，亦爲子弟流連破壞之門”，“今貴家子弟郎君因此蕩遊，破壞尤甚於汴都也”。這是一種守舊的觀點。

瓦子中演藝用的建築物，叫做勾欄，也叫做棚。北宋東京最大的桑家瓦子，分爲中瓦子和裏瓦子，其中大小勾欄五十多座，中瓦子有蓮花棚、牡丹棚，裏瓦子有夜叉棚，而象棚最大，可容數千人。臨安也還沿用這種設施和名稱。桑家瓦子中選“多有貨藥、賣卦、喝故衣、探博、飲食、剃剪、紙畫、令曲之類”，成爲一個以勾欄爲中心的集市。臨安也還沿襲這種設施，只是集市的規模更大，處於熱鬧街市的瓦子，不僅有一般飲食店，還設有大酒樓和茶坊。

2 臨安城內的瓦子

臨安城內有五處瓦子（參看圖64）：

一、南瓦子，在小河（市河）清冷橋西，熙春橋附近。《咸淳臨安志》卷十九《瓦子》說：“有熙春樓”，熙春樓即是南瓦的酒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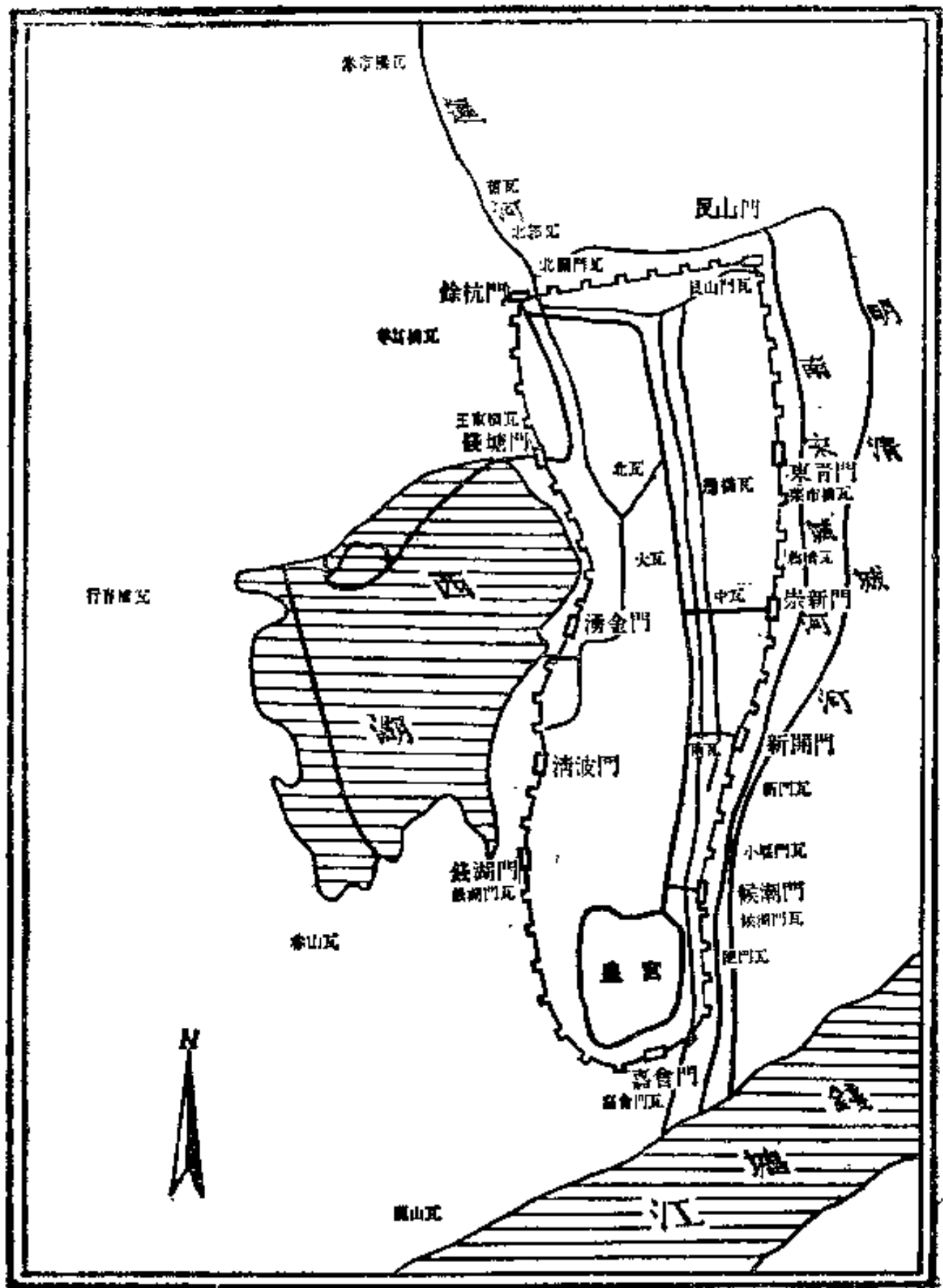


圖64 南宋臨安(今杭州)瓦子分佈圖
 (採自林正秋《南宋都城臨安》)

二、中瓦子，在御街中段市南坊北。《咸淳臨安志》說：“咸淳六年更創三元樓。”中瓦子當原有酒樓，咸淳六年（公元1270年）又新創設三元樓。《夢梁錄》卷十六《茶肆》說：“中瓦內玉媽媽茶肆”，這又是中瓦內的著名茶坊。中瓦還有刊印小說的張家書鋪。

三、大瓦子，舊稱上瓦，亦稱西瓦，在御街中段市西坊內、北首的三橋巷中。在大瓦子東首的積善坊和秀義坊，俗名上百戲巷和下百戲巷，因百戲會集而得名，實際上是大瓦子的擴展。

四、北瓦子，又名下瓦，在御街北段衆安橋西南。《夢梁錄》說在“衆安橋南羊棚樓前”，而《咸淳臨安志》說：“有羊棚樓”。當以後說爲是。羊棚樓即屬北瓦所有。《武林舊事》卷六《瓦子勾欄》說：“如北瓦羊棚樓，謂之游棚（宋刻作邀棚），外又有勾欄甚多，北瓦內勾欄十三座最盛。”這個羊棚樓，同東京桑家瓦子的象棚一樣，以動物命名，就是用來演藝的建築物。原來瓦子內演藝用的建築，是臨時用較差材料，較快地搭成的，因而稱爲“棚”。這時已很講究地建築成樓，也還沿用舊稱，稱爲“棚樓”。這個棚樓是在十三座勾欄之外的。《西湖老人繁勝錄》講北瓦十三座勾欄的表演節目，說“背做蓮花棚，常是御前雜劇”。說明十三座勾欄也多稱作棚，蓮花棚的名稱和東京桑家瓦子的蓮花棚一樣以花命名。《西湖老人繁勝錄》還講到北瓦“內有起店數家，大店每日使豬十口，只不用頭、蹄、血、臟。遇晚燒晃燈，撥刀饒皮骨。壯漢只吃得三十八錢，起吃不了皮骨，饒荷葉裹歸，緣物賤之故”。可知北瓦雖然沒有像南瓦、中瓦那樣建有大酒樓，但是幾家食店的規模很大，每天要使用十隻豬。

五、蒲橋瓦，亦名東瓦，在大河北段鹽橋下蒲橋以東，咸淳年間已廢爲民居。看來這一帶原先是繁華之區，後來因繁華街市

集中到御街，這一帶逐漸衰落，因而瓦子的生意不佳，不得不廢棄。

3 臨安城外的瓦子

至於城外的瓦子，《咸淳臨安志》和《夢梁錄》記載有十二處，即插圖中：

六、便門瓦，在城東南便門以外北首。

七、候潮門瓦，在城東南候潮門以外北首。

八、小堰門瓦，在城東保安門（俗名小堰門）以外東首。

九、新門瓦，又稱四通館瓦，在城東新開門以外南首。

十、薦橋門瓦，在城東崇新門（俗稱薦橋門）以外直東的章家橋南。

十一、菜市瓦，在城東東青門以外直東的菜市橋南。今菜市橋下有瓦子巷。

十二、錢湖門瓦，在城西錢湖門外南首省馬院前。《咸淳臨安志》：“僅存勾欄一所。”

十三、赤山瓦，在步司後軍寨前。《咸淳臨安志》：“今惟存勾欄。”

十四、行春橋瓦，在城西靈隱天竺路東行春橋側。

十五、北郭瓦，在城西北餘杭門外北郭稅務以北，又名大通店。《咸淳臨安志》：“今惟存勾欄。”

十六、米市橋瓦，在城西北餘杭門外米市橋下。

十七、舊瓦子，在城西北餘杭門外石牌頭以北麻綾巷，當在鄧家橋前的採蓮橋附近^④。

據《武林舊事》卷六《瓦子勾欄》和《西湖老人繁勝錄》“瓦市”條，城外瓦子還有下列六處：

十八、嘉會門瓦，又稱嘉會門外瓦，在嘉會門外。

十九、北關門瓦，又稱北關門新瓦，在餘杭門外。

二十、艮山門瓦，在艮山門外。

二十一、羊坊橋瓦，在錢塘門外⑤。

二十二、王家橋瓦，北郊王家橋⑥。

二十三、龍山瓦，南郊龍山之麓。《西湖老人繁勝錄》說：“城外有二十座瓦子。”⑦如此說屬實，還有城外二處瓦子不知在何處。《咸淳臨安志》在赤山瓦和北郭瓦下都說：“今惟存勾欄”，當是勾欄以外的集市已散去不存。同時於錢湖門瓦下說：“僅存勾欄一所”，當是這一所以外的勾欄已廢棄。說明當時每座城門外都設瓦子，不免過多，有些地方由於游客不多而集市衰落，有些地方勾欄只存一所。

還有所謂“路歧”和“路歧人”，“路歧”是指被用作演藝場所的街頭空隙地段；“路歧人”是指演出於街頭的民間藝人。《武林舊事》卷六《瓦子勾欄》說：“或有路歧，不入勾欄，只在耍鬧寬闊之處做場者（宋刻耍作耍，按當以宋刻為是），謂之打野呵，此又藝之次者。”其實街頭表演的藝人並不都是次者。

（十） 民間“社會”的組織和活動

1 講究詩文、武藝和技藝的社會團體

隨着臨安商業和手工業的繁榮，社會交際的廣泛開展，民間文藝活動的活躍，出現了不少旨趣相同的社會團體，特別是講究詩文、武藝及技藝的團體。

文士有西湖詩社，參加者包括本地以及流寓的文士詩人，旨在交流詩的創作。也有猜謎的組織稱為“齋”，“隱語則有南北屋

齋、西齋，皆依江右。謎法、習詩之流，萃而爲齋”（《都城紀勝》“社會”條）。武士有躬弓踏弩社、蹴鞠打球社和川弩射弓社（一作射水弩社），着重攀弓射弩等武藝的練習和蹴鞠、打球的遊戲。

技藝方面也還有分門別類的組織。雜劇有緋綠社，小說有雄辯社，唱賺有遏雲社，耍詞有同文社，清樂有清音社，吟叫有律華社，影戲有繪革社，相撲有角抵社，花繡有錦體社，射弩有錦標社，使棒有英略社，撮弄有雲機社，蹴球有齊雲社（《武林舊事》卷三《社會》）。《都城紀勝》“社會”條所說的小女童像生叫聲社，豪貴緋綠清樂社，《夢梁錄》卷十九《社會》所說的女童清音社，豪富子弟緋綠清音社，該是同一性質的組織。《都城紀勝》說：“豪貴緋綠清樂社，此社風流最勝。”看來這些由豪富子弟組織的講究音樂戲劇的社，在當時是影響比較大的。

這些羣衆性的技藝組織，往往有自己的演唱規例，也還有自己創作的曲調歌詞，並參加各種吉慶宴會的演出。《事林廣記》戊集卷二所載圓裏圓賺，前有“遏雲要訣”和“遏雲致語”，其次有“圓社市語”。“遏雲要訣”開首便說：“夫唱賺一家，古謂之道賺”；還說：“如對聖案，但唱樂道山居、水居清雅之詞，切不可風情花柳豔冶之曲，如此則爲瀆聖。社條不賽，筵會吉席，上壽慶賀，不在此限”。同時詞中又有稱爲“賺”的詞，王國維推定這是遏雲社所唱賺詞，是正確的。“遏雲致語”，下注：“筵會用，鷓鴣天”。“鷓鴣天”是曲牌，“筵會用”是說這段唱詞用於筵會，說明遏雲社是經常參與筵會的演出的。“遏雲致語”一首說：“遇酒當歌酒滿斟，一觴一詠樂天真，三盃五盃陶情性，對月臨風自賞心，環列處總佳賓（按缺一字），歌聲嘹亮遏行雲，春風滿座知音者，一曲教君側耳聽。”可知遏雲社的名稱，就是取義於“歌聲嘹亮遏行雲”。

所唱的曲，題爲“圓社市語”，圓社即是齊雲社。《事林廣記》戊集卷二《圓社摸場》，起首四句說：“四海齊雲社，當場蹴氣球，作家偏著所，圓社最風流。”可知齊雲社又名圓社。遏雲、齊雲兩社該有密切的關係，曲中敘述的全是圓社蹴球比賽的事。例如《越恁好》一曲說：“我與你場場有踢，沒些拗背，兩個對壘，天生不枉作一對，腳頭果然廝稠密密。”這是唱蹴球的事以供知音者的欣賞（王國維《宋元戲曲考》四《宋之樂曲》）。

2 各種行市的“社”

商人的各種行市也都有社，如飲食業有奇巧飲食社，專門講究製作飲食品的奇巧，果子行有花果社，七寶行有七寶考古社。七寶社有“珊瑚樹數十株，內有三尺者，玉帶、玉碗、玉花瓶、玉束帶、玉勸盤、玉軫芝（原有校語：二字可疑，未敢校改）、玉繡環、玻璃盤、玻璃碗、菜玉、水晶、貓睛、馬價珠，奇寶甚多”（《西湖老人繁勝錄》）。花市的蘇家巷有傀儡社，酒行、魚行等也都有社。此外諸王府第還有長生馬社的組織，各種駐軍也都有社，共有一百多社。

3 “社”的主要活動及其作用

社的主要活動之一，就是參與各種特定的迎神賽會，這也是都城居民熱烈參與並游覽的節日。如正月初九玉皇上帝生辰，二月初八霍山張真君生辰，三月初三佑聖真君生辰，三月二十八東嶽生辰，四月初六城隍生辰，四月初八諸社朝五顯王慶佛會，九月二十八五王生辰，以及川蜀仕宦之人崇拜的二月初三梓潼帝君生辰。其中以二月初八朝拜霍山行宮的集會最盛，各種技藝的社都參與表演。七寶社和馬社也參加，七寶社獻寶，馬社獻“嬌

馬”，“或用金鞍、銀鞍、繡鞍、養鞍、金勒、玉勒、烏銀勒、玉作子、瑪瑙作子、箱(鑲)嵌作子、透犀作子、七寶作子、玉作子、玳瑁作子”(《西湖老人繁勝錄》)。諸行的社都獻供本行的特別產品，如錢塘門外東西馬勝出賣花木的園圃有“獻異松怪檜奇花社”，魚行以異樣活龜魚呈獻，內官府第有以精巧雕鏤筠籠，養畜奇異飛禽供獻者。甚至有以通草羅帛，雕飾為樓臺故事之類，飾以珠翠，極其精緻，一盤至值數萬的。東嶽生辰，錢齋社獻錢齋三五十首，高者有二丈長。

所有這些技藝的社，除了自己創作和練習以及參與各種宴會、集會和迎神賽會以外，也還參與官府的慶賞大典以及官府組織領導的節日活動。例如元宵節前後，有許多慶祝的舞隊參與，沿街遊行表演。舞隊自去年冬至節開始，就已在街上放行。元宵前後“終夕天街鼓吹不絕”。到十五夜間，常有“帥臣出街彈壓”(《夢梁錄》)，“京尹乘小提轎，諸舞隊次第簇擁前後，連亘十餘里”(《武林舊事》)。《武林舊事》所載參加慶典的舞隊，就有大小全棚傀儡、大小斫刀鮑老、交袞鮑老、子弟清音、女童清音、遏雲社、緋綠社等。《夢梁錄》也說：“如清音、遏雲、掉刀鮑老、……十齋郎各社，不下數十。更有……踢燈鮑老、馳象社、官巷口蘇家巷二十四家傀儡。”說明大多數舞隊，都是由各種技藝的社派出的。禁中大宴，同樣有這麼多社的舞隊參加。《西湖老人繁勝錄》所說參與禁中大宴和慶賞元宵的舞隊有清樂社、門鼓社、福建鮑老社三百餘人、川鮑老一百餘人。“鮑老”是歌舞劇和傀儡戲中一種引人發笑的角色。這些游行的舞隊，實際上就是沿着街市作巡迴演出。

所有這些講究技藝的社會，對於民間技藝的創作和表演，無疑有着很大的推動作用。《武林舊事》卷六《諸色伎藝人》在“御前應制”、“御前畫院”、“棋待詔”之後，“演史”、“說經譚經”、“小

說”之前，有“書會”一類，列舉李霜涯、李大官人、葉庚、周竹窗、平江周二郎、賈甘二郎六人，在李霜涯下注：“作賺絕倫”，在李大官人下注：“譚詞”，可知這兩人是技藝的創作家。所謂“作賺絕倫”，是說創作的“唱賺”極好。周竹窗還見於《夢梁錄》卷二十《妓樂》所列舉的“今杭城老成能唱賺者”的十個名家中，可知周竹窗也是個創作而兼能表演“唱賺”的名家。

（十一） 民間技藝的創作和演出的發展

隨着北宋瓦子的創設，東京民間技藝有了重大發展；隨着臨安瓦子的大發展，加上民間講究技藝的社會的成立，民間技藝的創作和演出更加活躍興旺。東京瓦子的勾欄，演出的技藝已有小說、講史、雜劇、雜班、散樂、舞旋、嘌唱，諸宮調、說譚話、商謎、合生、相撲、毬杖踢弄、傀儡、影戲、喬影戲、叫果子、弄蟲蟻、鬼神（即裝鬼神）等。臨安的瓦子，所有上述技藝都有進一步的發展，其中小說、講史、雜劇、傀儡、影戲、雜技發展更大，“唱賺”也有新的創造。

1 小說

宋代“說話”的技藝，分爲“小說”、“講史”、“說經”、“說參請”、“說譚經”等種。“說經”是演說佛經上故事，“說譚經”是演說佛經中有趣的故事，“說參請”是講賓主參禪悟道的故事，它們該是從唐代寺院中的“俗講”發展而來。其中以講故事的“小說”和講歷史的“講史”比較重要。

“小說”是“說話”中最賣座的。《都城紀勝》“瓦舍衆技”條說：“最畏小說人，蓋小說者能以一朝一代故事，頃刻間提破。”臨安北瓦子中著名“小說”藝人，就有蔡和、李公佐、史惠英（女

流)、小張四郎等四人。“小張四郎一世只在北瓦，占一座勾欄說話，不曾去別瓦作場，人叫做小張四郎勾欄。”（《西湖老人繁勝錄》“瓦市”條）說明小張四郎所說“小說”，長期有號召力，因而能够一世在臨安最大瓦子中獨占一座勾欄說話。《武林舊事》卷六《諸色伎藝人》中，“小說”一類著名藝人多到五十二人，是各色藝人中名演員最多的。上述四人亦包括在內，三人排名在最先，史惠英因是女流，被列名最後。

南宋“小說”話本都已不存，我們所知的篇目有一百幾十種，從內容可以分成許多門類。《都城紀勝》說：“小說，謂之銀字兒，如烟粉、靈怪、傳奇。說公案，皆是朴刀、桿棒、發跡、變泰之事；說鐵騎兒，謂士馬金鼓之事。”就是把“小說”分成烟粉、靈怪、傳奇、公案、鐵騎兒五門。《夢梁錄》又把朴刀、桿棒等從公案中分出，各為一類。宋末羅燁《醉翁談錄》甲集《小說開闢》，也說“有靈怪、烟粉、傳奇、公案、兼朴刀、桿棒、妖術、神仙”，並且在每類之下列舉了小說篇目，總共有一百多種。“烟粉”是講烟花粉黛、男女愛情的故事，如《錢塘佳夢》、《錦莊春遊》之類。“靈怪”是講神怪故事，如《八怪國》、《無鬼論》之類。“傳奇”講情節離奇的故事，如《惠娘拍偶》、《王魁負心》之類。“公案”講著名的案件，如《姜女尋夫》、《大朝國寺》之類。“朴刀”講武功和戰鬥，如《楊令公》、《青面獸》之類。桿棒講武打，如《花和尚》、《武行者》之類。所說“發跡變泰”，當是講寒門發跡和轉危為安的掌故。羅燁分析說：“噫發迹話使寒門發憤，講負心底令奸漢包差；講論處不滯搭、不絮煩，敷演處有規模、有收拾，冷淡處提綴得有家數，熱鬧處敷衍得越長久。”這幾個“處”的描寫，就是對當時小說技藝的一種概括的分析。至今流傳的古小說，其中有些就是南宋話本，而且講到有關臨安的故事，如《西湖三塔》、《西山一窟鬼》等。

2 講史

“講史”一類技藝，臨安瓦子中也是人才濟濟。北瓦十三座勾欄中，常有兩座勾欄專說史書：“喬萬卷、許貢士、張解元”（《西湖老人繁勝錄》）。《夢梁錄》說：“講史書者，謂講說《通鑑》、漢唐歷代史文傳興廢爭戰之事，有戴書生、周進士、張小娘子、宋小娘子、丘機山、徐宣教。”《武林舊事》“講史”一類列舉著名藝人二十三人，包括上述八人在內，北瓦的三人排名最先。這些藝人講述歷代興亡和戰爭故事，都是依據史書加以敷張演說的，因而他們的藝名，往往是貢士、進士、解元、書生、宣教之類，而女的藝名都稱小娘子。

羅燁《醉翁談錄》分析“小說”，曾分析到“講史”的情況：“說征戰有劉、項（劉邦、項羽）爭雄，論機謀有孫、龐（孫臏、龐涓）鬥智；新話說張、韓、劉、岳（張俊、韓世忠、劉錡、岳飛），史書講晉、宋、齊、梁，《三國志》諸葛亮雄材，收西夏說狄青大略。說國賊懷姦從佞，遣愚夫等輩生噴；說忠臣負屈啣冤，鐵心腸也須下淚。”講《三國志》和《五代史》，北宋東京瓦子中已有名藝人，如“霍四究說三分，尹常賣五代史”。至於講狄青大略和張、韓、劉、岳的“新話”，是南宋的新創作。“又有王六大夫，元係御前供話，為幕士請給，講諸史俱通，於咸淳年間，敷演《復華篇》及《中興名將傳》，聽者紛紛，蓋講得字真不俗，記問（聞）淵博甚廣耳。”（《夢梁錄》卷二十《小說講經史》）《復華篇》和《中興名將傳》就是“新話說張、韓、劉、岳”，講的是南宋初期抗金的英雄事迹。這種“新話說”在南宋晚期具有重大的政治現實意義，因而“聽者紛紛”，十分賣座。

3 嘌唱、諸宮調和唱賺

嘌唱和諸宮調，北宋東京已很流行，臨安有進一步發展。嘌唱是清唱小詞曲，打鼓作節奏，或只敲響盞，因歌聲飄飄然而得名。北瓦有著名藝人樊華（〈西湖老人繁勝錄〉）。當時臨安流行很廣，“本只街市，今宅院往往有之”（〈都城紀勝〉）。諸宮調是說唱長篇的傳奇、靈怪的故事，是集合多種“宮調”的許多“短套”組成的，以琵琶等樂器伴奏，並夾有說白。北瓦有著名藝人高郎婦、黃淑卿。〈武林舊事〉列舉四人，除上述二人外，還有王雙蓮、袁太道。高郎婦和王雙蓮都是女藝人。南宋唱諸宮調的名家，多數是女藝人。〈夢梁錄〉說：“今杭城有女流熊保保及後輩女童皆效此。”

“唱賺”是紹興年間新創的曲藝。〈都城紀勝〉說：“中興後，張五牛大夫因聽動鼓板中，又有四片〈太平令〉或賺鼓板，即今拍板大節抑揚處是也，遂撰爲‘賺’。賺者，誤賺之義也，令人正堪美聽，不覺已至尾聲，是不宜爲片序也。”〈夢梁錄〉也有相同的叙說。“賺”字，是引誘的意思，是說這種曲調很有吸引力。北瓦著名藝人有濮三郎、扇李二郎、郭四郎。〈武林舊事〉列舉有二十二人，以上述三人排名最先。〈夢梁錄〉列舉“今杭城老成能唱賺者”十人，全不見於〈武林舊事〉所列舉的二十二人中，而其中周竹窗見於〈武林舊事〉的“書會”中，可能這十人都是屬於遏雲社而不是賣藝人。當時有個著名“唱賺”的社，叫做遏雲社，已見上節叙述。從遏雲社所創作的〈圓裏圓賺〉看來，其結構是集合一宮調的若干曲調爲一套曲，前有引子，後有尾聲，在中間靠近尾聲的二曲以前，插入有以〈賺〉爲名的曲調，唱詞比前後七個曲調要長，作爲拍板唱曲的重點。〈遏雲要訣〉說：“入賺，頭一字當一

拍，第一片三拍，後做此；出賺三拍。”這種名爲“賺”的曲調，可以說集各種唱腔的大成，節拍抑揚而歌聲嘹亮。遏雲社就是取義於“歌聲嘹亮遏行雲”。《都城紀勝》說：“凡賺最難（《夢梁錄》凡下有唱字），以其兼慢曲、曲破、大曲、嘌唱、耍令、番曲、叫聲諸家腔譜也。”“大曲”是唐宋時由同一宮調的若干“遍”組成的舞曲，“曲破”是單獨演出大曲中間稱爲“破”或“入破”的一段，節奏急促，“叫聲”是把市上各色叫賣聲，加工成唱腔。

當時御街中段融和坊、新街及下瓦子等處，住有“散樂家”，“女童裝末，弦索賺曲”，以供筵會或集會的招請演唱（《夢梁錄》）。所謂“女童裝末”，是說把女童作爲“裝末”的角色，表演故事的劇情。《都城紀勝》說：“今又有覆賺，又且變花前月下之情及鐵騎之類。”這又具有戲曲的性質。

4 雜劇

北宋東京瓦子已演雜劇，到南宋更有發展。南宋管理宮廷音樂的教坊，“唯以雜劇爲正色”。北瓦的蓮花棚常演“御前雜劇”，著名藝人有趙泰、王侯喜、宋邦寧、何宴清、鋤頭段子貴。《武林舊事》列舉著名藝人多達四十一人，包括上述五人在內。民間還有表演雜劇的社，叫做緋綠社，已見上節，當因所穿服裝爲緋、綠二色而得名。

這種戲曲，到南宋時已有一定的格局，“大抵全以故事，務在滑稽，唱念應對通遍。此本是鑒戒，又隱於諷諍”（《夢梁錄》）。通篇以唱、念、應對的方式，表演故事的內容，力求使人發笑，並以勸諫爲目的。演出時，一場分兩段，前一段叫“豔段”，又稱“餞段”，後一段是“正雜劇”。《武林舊事》卷一《聖節》所載“天基聖節排當樂次”，所有“雜劇”都是先“做”一段，後“斷送”一段。如

“吳師賢以下，做《君聖臣賢齣》，斷送《萬歲聲》。”每一場以“末泥”（或稱戲頭）為首長，共有四或五個脚色。除“末泥”以外，還有“引戲”、“副淨”（或稱“次淨”）、“副末”及“裝旦”或“裝孤”。《都城紀勝》說：“末泥色主張，引戲色分付，副淨色發喬，副末色打諢。”就是說，末泥管“主張”，管劇中主旨，引戲管“分（吩）付（咐）”，管脚色排練；副淨是劇中主角，發喬是要按劇情裝模作樣；副末是配角，打諢是要按主角的演出而說笑逗趣。“裝旦”是裝扮劇中的女角色，因為當時御前雜劇的演員全是男性。“裝孤”是裝扮劇中的官員。《武林舊事》卷四《乾淳教坊樂部》的雜劇，一甲有八人，戲頭、引戲、副末、裝旦各一人，次淨有三人。其餘三甲都只有戲頭、引戲、次淨、副末各一人（包括祇應的一甲）。《武林舊事》卷六《諸色伎藝人》所列舉的雜劇名藝人中，就有慢星子和王雙蓮兩人注明是“女流”，可知民間的雜劇，女藝人已有參與演出的。

所有南宋雜劇的劇本都已失傳。《武林舊事》卷十載有《官本雜劇段數》，共二百八十本，只存目錄。王國維依據這個目錄分析，其中用大曲的一百零三本，用法曲的四本，用諸宮調的二本，用普通詞調的三十五本，認為南宋雜劇多用歌曲演出，並夾雜一些滑稽的雜戲，並保存有一部分北宋的戲曲在內（《宋元戲曲考》五《宋官本雜劇段數》）。據近人考證，已知其內容情節的，有五十多種。

5 傀儡戲

北宋東京的傀儡戲，已有仗頭傀儡、懸絲傀儡、藥發傀儡、水傀儡，臨安又增加了肉傀儡。水傀儡在水中表演，有兼弄“水百戲”的，使得“魚龍變化奪真”（《夢梁錄》）。北瓦有水傀儡藝人劉

小僕射（《西湖老人繁勝錄》），《武林舊事》也說他弄水傀儡。《夢梁錄》又另外列舉四人，而說：“更有杖頭傀儡，最是劉小僕射家數果奇”。肉傀儡，“以小兒後生輩爲之”（《都城紀勝》），當是以小孩裝扮傀儡。傀儡戲依據小說、講史的話本或雜劇演出，也有相同的脚色，而且角又有細旦、粗旦之分。

6 影戲

南宋影戲也比北宋興旺。北瓦有尚保義、賈雄，《武林舊事》列舉名藝人多到二十二人，包括上二人在內，其中尚有女藝人三人。採用講史的話本編劇，着重刻劃歷史人物忠奸不同的形象。

7 角抵

角抵，又稱相撲，亦稱爭交。朝廷大朝會、聖節、御宴，按例由左右軍的選手相撲。護國寺還有定期的南高峯露臺爭交，由諸道州郡選拔膂力高强者參與比賽，得頭賞的授給旗帳、銀杯、彩緞、綿襖、馬匹等物，甚至補軍佐之職。諸瓦子或路歧人也常表演相撲，往往先由女藝人表演以吸引觀眾，然後以膂力者爭交。

8 雜技

雜技表演，沿襲北宋風氣，精彩的有上竿搶金雞、打筋斗、踢拳、踏蹺、上索、打交棍、脫索等，還有索上走、索上擔水以及索上裝鬼神、舞斫刀、舞蠻牌、舞劍、過刀門、過圈子等。所謂上竿搶金雞，金雞竿長五丈五尺，人緣索而上，叫做搶金雞，先到者得利物，呼萬歲。常於郊祀年分，麗正門上宣布赦令時，承應表演；

也常於朝廷大朝會和聖節承應表演。雜技表演比較多的有種種踢弄，如踢瓶、弄碗、踢磬、踢缸、踢鐘、弄頭錢（一作弄花錢）、弄花鼓槌、踢筆墨、弄花球等；又有各種遊戲，如使棒、打硬、舉重、蹴球、射弩，打彈、泥丸、放風箏、烟火、攢壺瓶（即古之投壺）等；還有各套魔術，如藏人、藏劍、燒火、弄水、壁上睡、虛空掛香爐、吃針等。更有教走獸、教飛禽、教蟲蟻、弄熊、捕蛇等。也還有表演口技的。《武林舊事》卷一《聖節》，所列祇應人，最後有“百戲沈慶等六十四人、百禽鳴胡福等二人”。“百禽鳴”就是模仿百鳥叫聲的口技。

9 街頭藝人的表演

特別值得注意的是街頭藝人的表演。在許多街市的空隙地方，“路歧人在內作場，行七聖法，切人頭下，賣符，少間依元接上，畚饑子、吞劍、取眼睛……”（《西湖老人繁勝錄》）。還有“街市有樂人三五為隊，擊一二女童舞旋，唱小詞，專沿街趕趁”（《夢梁錄》）。這些街頭藝人的表演，觀眾是最多的，影響是很大的。有不少著名藝人就是從街頭演出中逐漸成長的。“若唱嘌耍令，今者如路歧人王雙蓮、呂大夫唱得音律端正耳。”（同上書）這個王雙蓮是女藝人，本是“路歧人”，以嘌唱和唱耍令著名，後來成為唱諸宮調的名家，同時又兼雜劇的名家。《武林舊事》所列舉的著名藝人中，諸宮調中有她，雜劇中又有她，並注明“女流”，是雜劇名藝人四十一人中兩個女流之一。

（十二） 西湖及城內外風景的游覽

“地有湖山美，東南第一州。”^⑧ 所謂湖山美，就是指西湖及其

周圍的湖光山色的優美。唐宋時有幾個著名的文學家來此出任地方長官，很注意治理西湖，更增添了湖山之美。唐代長慶年間白居易任杭州刺史，曾築堤蓄湖水，以便灌溉農田。北宋元祐年間蘇軾任杭州知事，因湖旁水田侵占，種植菱芡，湖面縮小淤塞，乃開湖疏通，並築湖堤從棲霞嶺南直達南屏山西麓，即所謂蘇堤。堤上有九亭六橋，即蘇軾所謂“六橋橫截天漢上，北山始與南屏通。”從南數湖中，對蘇堤的第三、四、五橋之左，各為一瓶形小塔，即所謂三潭所在。另有從北山到南山的小新堤，是南宋知府趙與簾於淳祐二年（公元1242年）主持興建，稱為趙公堤。南宋曾多次疏浚西湖，禁止種菱荷侵占湖面。因為湖水既用以灌溉農田，又用以供城中居民用水，更用以釀酒，同時西湖又是游覽的名勝風景區。

南宋已有西湖十景，這是當時畫家和詩人極力描繪和歌詠的。十景的名稱是：柳浪聞鶯、蘇堤春曉、曲院風荷、平湖秋月、三潭映月、斷橋殘雪、雷峯夕照、南屏晚鐘、兩峯插雲、花港觀魚。這十景一直流傳到今天，只是有些地點略有不同，出于清代康熙年間重新佈置。如柳浪聞鶯一景，宋時原在清波門外聚景園中。宋亡，園廢棄。又如曲院風荷一景，宋時九里松的行春橋旁原有麴院（釀官酒之所），靠湖旁種荷，元明時院漸廢棄。花港觀魚一景，宋時內侍盧允升在大麥嶺築園，稱為盧園，引花港之水為池養魚。宋亡園亦廢。

湖中游船很多，大的可容百人，其次可容三五十人或二三十人，都雕欄畫楹，並有種種船名。更有賈似道的車船，用車輪腳踏而行。“南山、北山有龍船數隻，自二月初八日下水，至四月初八日方罷。節日大船，多是王侯節相府第及朝士賃了，餘船方賃市戶。岸上游人，店舍盈滿，路邊搭蓋浮棚，賣酒食也無坐處，又於

賞茶處借坐飲酒。南北高峯諸山寺院僧堂佛殿，游人俱滿。”（《西湖老人繁勝錄》）

西湖及其周圍的勝景，《武林舊事》卷五《湖山勝概》有詳細的敘述，包括許多的園囿和寺院。寺院中以靈隱山麓的靈隱禪寺和南屏山麓的淨慈報恩光孝禪寺規模最大，也最著名，所謂“二寺號南北之最”。當時靈隱寺有百尺彌勒閣、蓮峯堂、千佛殿、延賓水閣、望海閣等，山後絕頂有北高峯塔，比南高峯尤高。淨慈寺紹興年間重建，歷時五年，有千佛閣、五百羅漢堂等，畫壁很是精美。還有玉泉淨空院，泉水清澈，蓄大金魚，有“龍王祠”。三天竺的寺院也很有規模，尤以下天竺寺的山景尤其美妙。“大抵靈竺之勝，周回數十里，巖壑尤美，實聚於下天竺寺。自飛來峯轉至寺後，諸巖洞皆嵌空玲瓏，瑩滑清潤，如虬龍瑞鳳，如層華吐萼，如皺縠疊浪，穿幽透深，不可名貌。林木皆自巖骨拔起，不土而生。”正因為此處景色絕妙，“其間唐宋游人題名，不可殫記，覽者顧景興懷云”（《武林舊事》）。當時杭州城內有寺院五十七所，城外多達三百八十五所。

豐豫門外的豐樂樓，面臨西湖，是游人最多地方。此地原為衆樂亭，一度被楊和王占有，改為聳翠樓，後又作為西子庫的酒樓，稱為豐樂樓。淳祐年間又重建新樓，“宏麗為湖山冠”，多用作官僚士紳設同年宴或鄉會之處。此地“據西湖之會，千峯連環，一碧萬頃，柳汀花塢，歷歷欄檻間，而游櫓畫舫，棹謳堤唱，往往會於樓下，為游覽最。顧以官酷喧雜，樓亦臨水，弗與景稱。淳祐年，帥臣趙節齋再撤新創，瑰麗宏特，高接雲霄，為湖山壯觀。花木亭榭，映帶參錯，氣象尤奇。縉紳士人，鄉飲團拜，多集於此”（《夢梁錄》卷十二《西湖》）。

當時皇帝的御園和官僚的園囿，少數設在城內，多數築在

城外，環繞於西湖的最多。官僚的園圃，有在春天開放讓人游覽和做買賣的。例如城內大河的望仙橋下牛羊司側，內侍蔣苑使住宅，側築一圃，春月放人游玩，堂廳內頓放“買賣關撲”，陳設有官窰碟碗和古玩，還有龍舟、鬧竿之類，更設有杏館、酒肆，“數畝之地，觀者如市”（《夢梁錄》卷十九《園圃》）。嘉會門外包家山上有桃花關，有人“作園以植桃花，都人春時最爲勝賞，惟內貴張侯壯觀園爲最”（《都城紀勝》“園苑”條）。

錢塘門外溜水橋的東馬塍和西馬塍，有幾個種植和出賣花木的園圃，每天送花進城中出售，以供應欣賞者和家庭佈置的需要。

“西湖春中，浙江（錢塘江）秋中，皆有龍舟爭標，輕捷可觀，有金明池之遺風，而東浦河亦然。”（《都城紀勝》“舟船”條）西湖中龍舟競渡爭標的地點，在豐豫門外的一清堂。《武林舊事》卷五《湖山勝概》說：“一清堂，後改玉蓮，競渡爭標在此。”

（十三） 臨安的治安設施

1 臨安的密集人口

臨安不僅是南宋的政治中心、經濟中心和最大的商業城市，也是人口最密集的地方。南宋末年咸淳年間，臨安府所屬九縣，按戶籍，主客戶共三十九萬一千多戶，一百二十四萬多口；附郭的錢塘、仁和兩縣主客戶共十八萬六千多戶，四十三萬二千多口，占全府人口的三分之一。宋朝的“口”是男丁數，每戶平均以五人計，約九十多萬人。所駐屯的軍隊及其家屬，估計有二十萬人以上，總人口當在一百二十萬人左右，包括城外郊區十萬人和鄉村十萬人。

城內人口密度最高的地方，是沿御街兩側地區，特別西側靠近皇城的地方，包括西南多山的丘陵地帶。城外人口密度較高的地方，就是沿西湖東岸靠近城門一帶。北宋時，城內“四隅皆空回，人迹不到。寶蓮山、吳山、萬松嶺林木茂密，何嘗有人居。城中僧寺甚多，樓殿相望。出涌金門（即豐豫門），望九里松（按指到靈隱、天竺一條九里長的大道上夾道所栽松樹）極巨，更無障礙”（周輝《清波雜志》卷三）。說明北宋時西南多山的丘陵地帶和城外沿西湖一帶居民不多。但是到南宋時，情況完全不同了。萬松嶺和孝仁坊西嶺上，“今第宅內官民居，高高下下，鱗次櫛比，多居於上”（《夢梁錄》卷十二《嶺》）。同時“湖上屋宇連接，不減城中，有爲詩云：一色樓臺三十里，不知何處覓孤山，其盛可想矣”（《清波雜志》卷三）。

臨安和北宋東京一樣，人口中軍隊及其家屬所占比例很大。禁軍的戰鬥部隊，東南第三將統屬八指揮軍，共四千零八十人；京畿第二將統屬十七指揮軍，共七千六百六十人，駐紮營都在城東東青門內。皇帝直衛禁軍有殿前司和侍衛步軍司，殿前司衙在皇城西南的鳳凰山八盤嶺，步軍司衙在皇城西北的鐵冶嶺西。殿前司有軍隊七萬三千人，步軍司有軍隊三萬三千人，除駐屯於錢湖門內萬松嶺及皇城周圍以外，大部分散在崇新門外、候潮門外以及西湖西岸的教場和營寨。駐屯的廂軍又有一萬多人，還有內諸司所屬的士兵，如皇城司所屬有三千五百人。

臨安人口中，官吏及其家屬所占的比例也較大，外地官吏往來的也多。如果遇到考試進士的年分，各路士人前來趕考的約有十萬人，平均每人帶一個僕人，總共就有二十萬人。三橋等處的客邸住不下，只能權借城內寺院道觀住宿，如仙林寺、明慶寺、千頃寺、淨住寺、昭慶寺、報恩觀、元真觀等。他們來京時往往連

帶運來大批各地的土產，回去時又要買進各種用品。（以上依據《西湖老人繁勝錄》“遇補年”條。所說二十萬人，可能不準確。）

其次，外地客商來往也很多，流寓的客商多住在鳳凰山、吳山一帶。特別是浙江（錢塘江）“乃通江渡海之津道”，常有“海商之艦”進出，海商之艦大者可載五六百人，中等可載二三百人，小的可載一百多人。浙江也還是沿海來往客商的出入口，運載柴炭、竹木、水果的嚴、婺、衢、徽等州的船隻，運載魚蟹水產品的明、越、溫、台等州的船隻，都集中到候潮門外浙江沿岸，或靠近江邊的徐村。至於來自蘇、湖、常、秀等州以及淮南、江西、湖南、兩廣的船隻，都集中到餘杭門外。米市也集中在這裏。杭州城內有大河（鹽橋運河、小河（市河）及西河（清湖河），作為水上交通綫，而這三條河流都集中到城的西北角，從餘杭水門和天宗水門出城，和大運河連通。在餘杭門外北新橋北，有新開運河，所有內地運輸物資以及販米客船，都由此進出杭州，因而北新橋成為通向內地的總樞紐。殿前司所屬紅座船就駐紮在北新橋外趙十四相公府側，“於水次管船”。這是杭城的交通命脈，不僅“大小船往來河中，搬運齋糧柴薪；更有載垃圾糞土之船，成羣搬運而去”（《夢梁錄》卷十二《河舟》）。

2 防火和治安設施

掌管好水上交通和防備好火災，是臨安當政者的兩項大事。當時杭州人口密集，居民的住宅連接，多竹木結構，又多草屋，容易着火，而街道不闊，坊巷狹小，一處着火，很容易延燒，因此杭城常常發生延燒幾百家、幾千家甚至幾萬家的大火。火災成為當時杭州居民最嚴重的災難。清代汪師韓《杭城火災考》

(收入《韓門綴學》)和楊文傑《火災補考》(收入《問心齋雜著》)對此有詳細考證。

南宋定都此地以前，杭城已多火災。定都以後，有大量官吏和居民從北方遷來，新遷來居民往往建茅屋居住，因而火災更加嚴重。定都之後二年，即紹興十年(公元1140年)七月，就發生一場大火，燒毀域內外數萬家；九月又失火，三省六部的倉庫全燒毀。後十年(即紹興二十年)一月吏部文書又全燒毀。此後不斷發生火災。嘉泰元年(公元1201年)三月四日發生大火，住在寶蓮山的御史臺一個胥吏於夜間宴會中失火，延燒十多里，燒毀五萬八千多家，包括御史臺、將作監、軍器監、進奏院、太史局、法物庫等官署。嘉定十三年(公元1220年)十一月大火又燒毀域內外數萬家。紹定四年(公元1231年)正月六日夜望仙橋東牛羊司前民家失火，分數路延燒，到次日中午方息。災區南到太廟，北到太平坊南街，東到新門秘書省前，東南到小堰門吳家府，西南到宗正司及吳山上，東北到通和坊，西北到十三灣，所燒一萬多家。嘉熙元年(公元1237年)六月又燒三萬家。此外燒毀三千家的一次，燒毀幾百家的多次^⑧。

臨安沿用北宋制度，治安機構有屬於縣的縣尉以及縣以下分設的巡檢。早在紹興二年(公元1132年)正月，因“數有盜賊”，加之流寓士民多居茅屋，“火政尤當加嚴”，從臣僚建議，委馬步軍司“略效京城內外微巡之法”，在城內分設四廂，每廂設巡檢一人，派遣有材能的都指揮使充任，並量地步遠近，設置若干鋪，每鋪派遣禁軍六人負責追捕盜賊，並兼管防火(《宋會要輯稿》兵志三之八)。紹興二年從兩廂增為四廂。乾道七年(公元1171年)又增為八廂，分設二百三十二鋪，每鋪有兵卒四人，押鋪一名，共計一千一百五十五人。淳熙十年(公元1183年)又增為九廂。

原來北宋東京於每坊巷三百步設軍巡鋪，並於高處建望樓以防火。臨安在很長一段時期內，沒有推行這一辦法，“臨安撲救視汴都爲疎”（《楓窗小牘》下）。直到嘉定四年（公元1211年）才分設東、西、南、北與上、中、下七個防隅，建設望樓（《咸淳臨安志》卷五七《防虞》）。後來又增設十六個防隅，並建設望樓。同時每坊巷近二百多步，設置一軍巡鋪，每鋪有兵卒三五人於夜間巡警和防烟火。同時又於城內四壁和城外四壁設防隅，分別派遣禁軍以備調遣。《咸淳臨安志》的《皇城圖》與《臨安城圖》，鐵冶嶺南有南山望樓，山下有步司潛火營，鐵冶嶺北有東山望樓。

咸淳年間錢塘縣尉所屬弓手有五十三人，仁和縣尉所屬弓手有一百人（《咸淳臨安志》卷五十七《弓手》）。臨安內外設有巡檢司十四處：城東、城西、外沙、海內、管界、茶槽、南蕩、東梓、上管、赭山、黃灣、硤石、許村、奉口，每巡檢司所屬士兵有九十六人到一百二十人不等。（《咸淳臨安志》卷五十七《兵制土軍》）。城東、城西的巡檢司比較重要，稱爲都巡檢使。所有這些巡檢司，大多設在城外交通要道，如城東巡檢司設在新開門外，外沙巡檢司設在候潮門外，茶槽巡檢司設在東青門外，許村巡檢司設在候潮門外靠近江邊的許村。所有巡檢司所屬士兵共約一千五百人左右，加上坊巷所設兼管治安和火警的軍巡鋪，再加上各防隅所屬的消防火災的士兵，總數有幾千人，用於維持城內外治安和消防火災。

3 街市的治安問題

當時臨安街市上，已出現有所謂“閑人”、“驕民”、“游手”等。“閑人”中有一等是失業的子弟，有能知書、寫字、撫琴、下棋

的，技藝不精，專陪富貴子弟游宴，或伴同外地官員到都城幹事；也有臨時參與各種服務性行業的。更有所謂“棚頭”或“習閑”，專幹游玩的事，如擎鷹、駕鷗、調鶉、養鶴、鬥雞以及賭博之類（《都城紀勝》“閑人”條）。所謂“驕民”，經常住公私房屋欠房租不付，欠稅不付。所謂“游手”，就是流氓。“有所謂美人局，以倡優為姬妾，誘引少年為事；櫃坊賭局，以博戲、關撲、結黨手法騙錢；水功德局，以求官、覓舉、恩澤、遷轉、訟事、交易為名，假借聲勢，脫漏財物，不一而足。又有賣買物貨，以偽易真，至以紙為衣，銅鉛為金銀，土木為香藥，變換如神，謂之‘白日賊’。若闐闐之地（按指市場上），則有翦脫衣囊環佩者，謂之‘覓貼兒’。其他穿窬、胙篋，各有稱首；以至頑徒如攔路虎、九條龍之徒，尤為市井之害。”（《武林舊事》卷六《游手》）

“櫃坊”在唐代原是代人寄放保管錢財的店鋪，到宋代已變成了賭場，是京城中不肖子弟和無賴之輩開設的，用來做種種壞事。當時臨安的“宗室及有蔭不肖子弟，多是酤私酒、開櫃坊，遇夜將帶不逞，毆打平人，奪取沿身財物。”（《宋會要輯稿》刑法二下禁約，紹興三年七月二十二日條）所謂美人局，就是以“美人”設圈套引誘少年上鉤，然後敲詐錢財。所謂水功德局，就是自稱有聲勢門路代人謀求官職或高陞，或代人訴訟以及交易，從中騙取錢財。所謂白日賊，就是賣假貨的騙子。所謂覓貼兒，就是扒手。所謂稱首，就是流氓頭子。所謂頑徒，就是橫行不法的惡霸。

所有嚴重的治安問題，總的應由臨安府的長官主管，具體應由負責治安的使臣統率縣尉以至巡檢、軍巡鋪所屬兵卒處理。《武林舊事》卷六《游手》：“都轄一房，有都轄使臣總轄供申院長，以至廂巡地分頭項火下凡數千人，專以緝捕為職。其間雄駟有聲

者，往往皆出羣盜。而內司又有海巡八廂以察之。”所謂“其間雄駟有聲者往往皆出羣盜”，這是說此中緝捕盜賊得力而有聲望的官員，往往是招安來的強盜。因為南宋長期推行招安政策，採用招安盜賊以“併滅別火(伙)或本火(伙)盜賊”的手段。(見高宗建炎元年十月七日詔)，因而當時流行有諺云：“若要官，殺人放火受招安”。

(十四) 服務性行業和管理措施

這樣人口衆多、商業繁盛的都市，人民生活所以能够正常地維持，主要由於重要的“行”和“市”發揮着運轉調度日常生活必需品的作用。臨安城內外“處處各有茶坊、酒肆、麵店、果子、彩帛、絨綫、香燭、油醬、食米、下飯、魚、肉、羹、臘等鋪。蓋經紀市井之家，往往多於店舍，旋買見(現)成飲食，此爲快便耳”(《夢梁錄》卷十三《鋪席》)。與此同時，各種服務性行業很是發達，這對於手工業、商業的發展和衆多居民的日常生活的維持，都是起很大作用的。

1 寄藏財物的塌房

前面講到，杭州的火災極爲頻繁而厲害，這對於居民和商人都是個嚴重的威脅，因此防火防盜的寄存財物的倉庫的建設，成爲營務之急。“塌房”(或稱塌坊)的創設適應了這一需要。在城內東北部，從大河(鹽橋運河)通濟橋(俗名梅家橋)到白洋池、方家橋以及法物庫、市舶新務(都在梅家橋北)，有慈元殿及富豪、內侍諸司等人家，於水上起造塌房數十所，大的有屋一千多間，小的有屋數百間，專以租借給鋪席、宅舍以及客商寄

藏財物貨品。因爲四面環水，既可防火，又可防盜。塌房每月收租費，雇人防守，並於夜間巡警。這一措施當然十分有利於富貴人家和富商，對於維護杭城工商業的發展起很大作用（《夢梁錄》卷十九〈塌房〉、《都城紀勝》“坊院”條）。

2 水井的建設和供水、清潔等服務行業

臨安居民食用水，主要依靠水井。水井有兩種，一種是引西湖水而成的水井，都在城內西北一帶；另一種是就地鑿成的一般水井。

唐德宗時，地方官李泌所開六井，就是引西湖水，經錢塘門，設置水閘，引進城內的。所謂“井”就是出水口。六井是：（1）相國井，在西河井亭橋西。（2）西井，又名化成井，在相國井西。（3）金牛池，在西井西北。（4）方井，俗呼四眼井。（5）白龜井，在金牛池西北。（6）小方井，俗呼六眼井，在白龜池北，錢塘門內。宋仁宗時地方官沈文通又在六井之南，引湖水到美俗坊（即羅漢洞附近），稱爲南井，一名沈公井。蘇軾兩次出任地方官，都曾對六井維修，並將已經廢棄的沈公井修復，改稱惠遷井。

就地鑿成的公用大井，著名的有（1）吳山井，在吳山北麓，始建於五代，南宋紹興年間加大石板蓋，開爲六眼。（2）天井，在寶月山下天井坊，初建於五代，南宋初年廢棄，南宋嘉泰二年（公元1202年）經清理修復，深五十多尺。（3）郭婆井，在冶鐵嶺北。（4）沈婆井，在萬松嶺上。（5）郭公井，在萬松嶺下。南宋時杭城公用大井有六十多口，如壽域坊內有上四眼井，長慶坊內有下四眼井，寶月山麓有上八眼井，相對秘書省有下八眼井。（以上二井今存，其名沿用。）後市街有六眼井，棚橋前有雙井，薦橋北有義井，俗呼四眼井（今存井圈。）至於私人所開的井，數量更多。

北宋東京“其供人家打水者，各有地分坊巷”。南宋臨安供食用水，也是“各有主顧供之”。“西門則引湖水注入城中，以小舟散給坊市。”（《二老堂雜志》卷四）“亦有每日掃街盤垃圾者，各支錢犒之。”同時“街巷小民之家，多無坑廁，只用馬桶，每日自有出糞人澆去，謂之傾脚頭。各有主顧，不敢侵奪。或有侵奪，糞主必與之爭，甚至經府大訟，勝而後已”（《夢梁錄》卷十三《諸色雜貨》）。糞主各有地分坊巷，出糞人是糞主雇用來的，運到農村用作肥料。遇到新春，官府經常差遣人淘通溝渠，清除道路污泥。平時則由居民自己雇人疏淘水井或河渠。《武林舊事》卷六《小經紀》所列項目中，就有淘井、淘河的。

3 報曉和報天氣

自從東京廢除街鼓制度以後，衆多的寺院除敲鐘報曉以外，還有“行者”在分地段沿街“求化”的同時，擔當着每天天明的“報曉”工作。臨安沿襲這種風俗，“行者”在每天報曉的同時，還要報天氣的晴、陰、雨以及官員上朝的格局。“每日交四更，諸山寺觀已鳴鐘，庵舍行者頭陀，打鐵板兒或木魚兒沿街報曉，各分地分。若晴則曰天色清明，或報‘大參’，或報‘四參’，或報‘常朝’，或言‘後殿坐’。陰則曰天色陰晦，雨則言雨。蓋報令諸百官聽公上番虞候上名衙兵等人，及諸司上番人知之，趕趁往諸處服役耳。雖風雨霜雪，不敢缺此。每月朔望及遇節序，則沿門乞求齋糧。”（《夢梁錄》卷十三《天曉諸人入市》）當時“報曉”有兩種方式：行者沿街敲打鐵板或木魚，並口頭執訊，主要是為上朝和上番的官吏士兵服務的；寺觀的鳴鐘主要為商人和居民服務。“五鼓鐘鳴，賣早市者又開店矣。”（同書同卷《夜市》）

4 修補家常用品的小行業

北宋東京小的服務性行業比較發達，臨安這種小行業更多而更有發展。“若欲喚錮路、釘鉸、修補鍋鏟、箍桶、修鞋、修幞頭帽子、修補鮎冠、接梳兒、染紅綠牙梳、穿結珠子、修洗鹿胎冠子、修磨刀剪、磨鏡，時時有盤街者，便可喚之。且如供香印盤者，各管鋪席人家，每日印香而去，遇月支清香錢而已。”（《夢梁錄》卷十三《諸色雜貨》）而且這種小行業中，也已有組織成“行市”的。《西湖老人繁勝錄》“諸行市”條所列舉的小行市中，修補家常用品的，有修飛禽籠、修罌骨、染紅牙梳、接象牙梳、紮熨斗、修砧頭、修破扇、丁鞋絡等；幫助家務勞動的，還有起魚鱗、洗衣服、劈柴、捉漏等。這些小行業為居民提供了許多方便。

5 為筵會服務的“四司六局”

北宋東京為民間吉凶筵會服務的，已有包括茶酒司和廚司的四司，臨安也有所謂四司六局：

一、帳設司：專管筵會的陳設佈置，包括桌幃、簾幕、屏風、畫帳、書畫、繡額之類。

二、茶酒司：官府所用名“賓客司”，民間所用則稱為“茶酒司”，掌管筵席，包括陳設飲食器皿、送茶、燙酒、請坐、迎送等。如果是吉凶筵席，還兼管禮儀。

三、廚司：專管烹調食物，以供筵席需要。

四、臺盤司：掌管託盤打送勸酒的食物。

五、果子局：掌管裝簇時新水果、南北京果、象生花果（製作的假花果）以及勸酒品件。

六、蜜煎局：掌管糖蜜花果以及鹹酸的勸酒品件。

七、菜蔬局：掌管裝簇看盤的菜蔬以及時新菜蔬。

八、油燭局：專管各種燈火的照耀。

九、香藥局：專管各種香料和香球、香餅以及醒酒湯藥，聽候索喚提供或調換。

十、排辦局：掌管桌椅及掛畫、插花、打掃、拭抹等。

所謂四司六局，實際上是官府支持的一種服務性行業，專為官府和富貴人家舉辦筵席提供方便。不僅幫辦春宴或鄉會，還幫辦祝壽公宴、鹿鳴宴（宴請得中舉子的宴會）、同年宴（同科中舉者的宴會）以及婚喪筵席。春宴如果要在風景區的樓閣亭臺以及西湖畫舫中舉行，“但指揮局分，立可辦集，皆能如儀”（《夢梁錄》卷十九《四司六局筵會假貨》）。他們的服務對象也是有地分而承攬的。

6 租借器物的行業

與此相應的，還有各種租借器物的行業，包括花轎、酒擔、首飾、衣服、被卧、轎子、布囊、酒器、幃設、動用（指各種家具）、盤合（盒）、喪具等。《武林舊事》卷六《貨物》說：“凡吉凶之事，自有所謂‘茶酒廚子’專任飲食請客宴席之事。凡合用之物，一切賃至，不勞餘力。雖廣席盛設，亦可咄嗟辦也。”所謂“茶酒廚子”，就是以茶酒司、廚司為主的四司六局。貨物的行業，不僅為了配合四司六局的需要，也還供應所有居民和商人的需要。

7 帶有服務性質的藥材業

臨安的藥材業是興旺的，既有炭橋（芳潤橋）的藥市，收購客商運來的川廣生藥和分發給製藥作坊和藥店，又有熟藥丸散和生藥飲片的作坊。街市的藥店，既有生藥店和熟藥店，又有專門藥

店如眼藥店、疳藥店以及賣解毒丸的藥店。疳是中醫學的病名，或稱疳積，多由於飲食失調、脾胃損傷或蟲積所致。宋朝政府向來重視醫療、製藥、配方的設施。北宋熙寧年間太醫局設置蒸藥，陸續編訂賣藥的處方。南宋繼續設立太平惠民和劑局，分設五局，出賣熟藥。南局在御街南段三省前，西局在御街北段衆安橋北，北局在御街中段市西坊南，南外局在嘉會門外浙江亭，北外二局以餘杭門外北郭稅務兼領藥局的事。這些官藥局，都按方配藥和對症發售成藥。按規定，遇急病要及時配藥，遇貧困之家及水旱疫癘要免費施藥，陳舊失效藥品要及時棄毀。嘉定元年（公元1208年）許洪又對《校正太平惠民和劑局方》加以校釋和補充，後又經別人繼續增補，最後定稿成爲十四門，共七百八十八方的大藥典。此書宋元間流傳很廣，影響很大，造成以成藥治病的風氣。這樣以成藥治病，對於病家很方便，但不免發生流弊，甚至發生錯誤。但是其中許多配方都從長期治療經驗中得來，當有顯著療效。直到今天還有不少成藥的配方來源於此書。當時人們很重視這些官藥局，《咸淳臨安志》的《臨安城圖》中，御街上的三個官藥局，都特別標明所在地點。

同時州府在小西河的戒子橋西設有施藥局和慈幼局，《咸淳臨安志》的圖上亦標有地點。按規定，施藥局要按方修製丸散等成藥，“來者診視，詳其病源，給藥醫治”。慈幼局按規定要雇用乳婦，收養被拋棄街坊、幼而失母或無力撫養的嬰孩。錢塘、仁和兩縣還設有養濟院以錢米發給老病孤寡而無法生活的人。兩縣還設有漏澤園十二所以埋葬被遺棄或無地埋葬的屍體（《夢梁錄》卷十八《恩霈軍民》）。所有這些官設的有限的社會救濟事業，都是爲了維持都市的正常生活秩序而採取的一些管理措施。

- ① 顧炎武《歷代宅京記》卷十七引陳隨應《南渡行宮記》說宮城“周回九里”，所說九里，是誇大的說法。
- ② 《夢梁錄》卷七《東太乙宮》說：“館有小圃，亭區武林，山在宮後小坡，山乃杭之主山也。”同書卷十九《園圃》又提到這點。
- ③ 《吳越備史》載：“乾寧二年，淮帥楊行密攜一僧私來瞰城，僧曰：“此腰鼓城也，擊之終不可得。”行密乃歸。”
- ④ 《武林舊事》卷一《大禮》說：“並差官兵修築泥路，自太廟至泰湮門，又自嘉會門至麗正門，計九里三百二十步，皆以潮沙填築，其平如席。”這是說從太廟經候潮門泥路，先東行，經候潮門口，再南行，出嘉會門外，到郊壇的泰湮門。待大禮完畢，再回到嘉會門，從嘉會門進入，到大內的麗正門。這是指從太廟去郊壇和從郊壇再回到麗正門，一去一回，共九里三百二十步。鍾毓龍《說杭州》第五章《說城邑》第六節《南宋城垣》，對《武林舊事》這段話有誤解，認為“皇帝親郊，徑出嘉會門可矣，何必由麗正門東出候潮門再西至嘉會門外乎？所以然者，皇帝之出，千乘萬騎，儀仗可綿延數里，……故必如此轉折，而九里三百二十步之長始有矣。”其實所謂九里三百二十步，是指從太廟去郊壇與從郊壇回麗正門的來回路程，因為按禮，皇帝親郊之前，必先到景靈宮與太廟奏告，然後再從太廟出發，經嘉會門到郊壇。從太廟到嘉會門必須經候潮門大街，先向東行，再經候潮門口，在城內折而沿城牆而行，再從嘉會門出去。並不是由麗正門東出候潮門再西至嘉會門，更不是因為儀仗綿延數里而故意走如此轉折的路程。
- ⑤ 《夢梁錄》卷十《家廟》：“忠烈張循王府在清河坊。”按清河為張姓郡名，張俊封清河郡王，其地因稱清河坊。《咸淳臨安志》所載《臨安城圖》畫在天井坊西，不確。
- ⑥ 按《咸淳臨安志》的《臨安城圖》，都亭驛東有都官宅。《夢梁錄》卷十《諸官舍》云：“侍從宅在都亭驛東。”侍從宅當即都官宅。

- ⑦ 《乾道臨安志》以左一南廂和左一北廂合稱左一廂。
- ⑧ 《夢梁錄》卷七《禁城九廂坊巷》：“新開坊，清平巷轉東上搶劍營路。”按《咸淳臨安志》的《臨安城圖》，朝天門東北，御街東側有新開路，其地在清平坊東南，當即新開坊所在。
- ⑨ 《夢梁錄》卷七《禁城九廂坊巷》：“常慶坊，都稅務南柴塚橋巷。富樂坊，薦橋西。”同上書同卷《大河橋道》：“常慶坊東北曰太和樓橋，俗名柴塚。富樂坊東曰薦橋。”按太和樓是東酒庫的酒樓，在崇新門內。太和樓橋是薦橋以南的大河上的橋。都稅務在薦橋西南大河西岸。見《咸淳臨安志》的《京城圖》。據此可知常慶坊應在薦橋西南大河西岸的都稅務以南，富樂坊應在薦橋西北的大河西岸。據《乾道臨安志》和《淳祐臨安志》，富樂坊又稱蒲橋巷，列在右三廂，蒲橋是鹽橋附近的旱橋，可知富樂坊當介於薦橋與鹽橋之間的西岸。
- ⑩ 《咸淳臨安志》的《京城圖》，把同德坊畫在城內西北角新莊橋東北，與右二廂的諸坊距離太遠，恐有錯誤。
- ⑪ 《夢梁錄》卷七《禁城九廂坊巷》：“豐禾坊，全皇后府東。”同上書卷十《后戚府》：“成肅謝皇后宅在豐禾坊南”，“全皇后宅在豐禾坊南。”豐禾坊當在薦橋東北的大河東岸。
- ⑫ 《夢梁錄》卷七《禁城九廂坊巷》：“善履坊，即芳潤橋東。”同上書同卷《大河橋道》：“善履坊東曰油蠟局橋，舊呼新橋。”《乾道臨安志》講到善履坊又稱豐樂橋巷。據此可知善履坊在小河芳潤橋與大河豐樂橋、新橋之間，與《咸淳臨安志》的《京城圖》所畫善履坊的位置相合。
- ⑬ 《夢梁錄》卷七《禁城九廂坊巷》：“興德坊在鹽橋下西北。”同卷《大河橋道》：“興福坊東曰鹽橋。”“興福”當為“興德”之誤。
- ⑭ 《夢梁錄》卷七《西河橋道》：“茶湯巷西曰長壽橋，舊名楊姑橋。”
- ⑮ 《夢梁錄》卷十三《鋪席》作“職家羊飯”，《都城紀勝》的“諸行”條作“耿家羊飯”，“職”字當為“耿”字之誤。

- ⑩ 清代顧修編輯南宋羣賢小集，即依據四庫全書輯存的江湖集與殘本羣賢小集合編而成，共七十四家，一百三十卷。
- ⑪ 蘇軾《望海樓晚景》：“沙河燈火照山紅，歌鼓喧呼笑語中，爲問少年心事在，角巾欹側鬢如蓬。”望海樓在鳳凰山上，沙河當指鹽橋運河。蘇軾《湖上夜歸》：“入城定何時，賓客半在亡，睡眼忽驚發，繁燈鬧河塘，市人拍手笑，狀如失林獐。”羅良注：“河塘，沙河塘也。”此言從西湖夜歸州治（即鳳凰山），望見沙河塘兩岸的繁燈很是熱鬧。
- ⑫ 《夢梁錄》卷七《倚郭城北橋道》，餘杭門外“下開西北曰米市橋，米市裏曰黑橋”。同卷《倚郭城南橋道》新門口外，“景隆觀後曰通利橋，次曰米市橋”。
- ⑬ 《武林舊事》卷六《諸市》，“鮮魚行，候潮門外。”《夢梁錄》卷十三《諸行》：“塌子橋鮮魚行。”
- ⑭ 《夢梁錄》卷七《倚郭城南橋道》，崇新門外，“螺獅橋北蟹行，曰蔡湖橋”。
- ⑮ 周必大《二老堂雜志》卷四《臨安四門所出》，當時臨安諺語：“東門菜，西門水，南門柴，北門米。”《夢梁錄》卷七《倚郭城南橋道》，候潮門外，“下教場東曰柴市橋。”
- ⑯ 《夢梁錄》卷十三《諸行》：“城西花園。”而《都城紀勝》“諸行”條：“城南之花園。”《武林舊事》卷六《諸市》：“花區，官巷口，錢塘門內。”《咸淳臨安志》卷十九“市”條：“在城南，今冠巷口與錢塘門裏亦有之。”
- ⑰ 《西湖老人繁勝錄》載一百四十多行的名稱，關於文牘方面的有：履歷班朝、銀朱印色、讀書燈、筆硯匣、剔圖書、字牌兒、賣朝報、選官圖、寫文字、紙畫兒、賣字本、試卷、試卓（桌）、交床、試籃等。《武林舊事》卷六《小經紀》有關文牘方面的有：班朝錄、供朝報、選官圖、諸色科名、寫牌額、交床、試籃、賣字本、掌記冊兒、諸般簿子、諸色經文、紙畫兒、印色盞等。

- ⑭ 海鮮頭羹、三軟頭羹見《西湖老人繁勝錄》，其餘都見於《夢梁錄》卷十六《分茶酒店》。
- ⑮ 六片腰子、松花腰子見《西湖老人繁勝錄》，其餘都見於《夢梁錄》卷十六《分茶酒店》。
- ⑯ 錦雞筵、蝸蚌筵見《西湖老人繁勝錄》，其餘都見於《夢梁錄》卷十六《分茶酒店》。《武林舊事》卷九《高宗幸張府節次略》的“下酒十五盞”中有爛房筵、羊舌筵、盹掌筵。
- ⑰ 剪羊事件、蒸羔羊、羊炙焦、羊血粉見《西湖老人繁勝錄》，其餘都見於《夢梁錄》卷十六《分茶酒店》。
- ⑱ 《夢梁錄》卷十六《肉鋪》：“其犯鮓者：算條（《西湖老人繁勝錄》作“算條犯”）、影戲（《武林舊事》作“魚肉影戲”）、鹽豉（《武林舊事》作“乾鹹豉”）、皂角錠、松脯、界方條、綫條、槽豬頭肉、瑪瑙肉、鵝鮓、旋鮓（《武林舊事》作“荷包旋鮓”）、寸金鮓、魚頭醬、三和鮓、切鮓、桃花鮓、骨鮓、飯鮓、槓脯、紅羊犯（《武林舊事》作“胡羊犯”）、大魚鮓、鱖魚鮓等類。”同書卷十六《分茶酒店》另有海蜆鮓、臘皮炸子、獐犯、鹿鋪、三和花桃骨、筋子鮓等。《武林舊事》曾列舉三十種，除去與《夢梁錄》相同的，還有削脯、兔犯、臘肉、炙骨頭、旋炙荷包、荔枝皮、春子鮓、雪盃鮓、玉版鮓、黃雀鮓、銀魚鮓、鹹鮓。《西湖老人繁勝錄》另有苔脯。
- ⑲ 《武林舊事》卷六《涼水》與《西湖老人繁勝錄》“諸般水名”相同的有十二種：甘豆湯（《西湖老人繁勝錄》“湯”誤作“糖”）、椰子酒、鹿梨漿（西湖老人“鹿”作“瀟”）、鹵梅水、木瓜汁、茶水（西湖老人作“江茶水”）、荔枝膏、雪泡縮皮飲（宋刻作“縮脾”、西湖老人作“縮脾飲”）、梅花酒、五苓散、大順散、紫蘇飲（西湖老人“紫”誤作“變”）。西湖老人獨有的有五種：皂兒水、綠豆水、白水、亂糖真雪、富家散暑藥冰水。《武林舊事》獨有的六種：豆兒水、蓂蜜水、沈香水、苦水、金橘團（“團”疑“水”之誤）、香齋飲。
- ⑳ 《夢梁錄》卷十三《鋪席》：“灞橋榜亭側朱家饅頭鋪”，“橋”字當屬

“頭”字之誤。上文有“壩頭榜亭安撫司惠民熟藥局”，可證。壩頭即市西坊。

- ⑳ 《都城紀勝》“酒肆”條：“西子庫曰豐樂樓，在今涌金門外，乃舊楊和王之聳翠樓，後張定叟兼領庫事，取爲官庫，正跨西湖，對兩山之勝。西子庫曰太平樓……其太平、太和，因回祿後其樓悉廢。”《武林舊事》卷六《酒樓》亦有太平樓和豐樂樓。
- ㉑ 朱彭《南宋古跡考》的《城郭考》“豐豫門”下，“俞德鄰《次韻趙提舉》詩云：涌金門酒甜如蜜。知當日涌金門酒亦甚著名。”
- ㉒ 《夢梁錄》卷十六《酒肆》：“或命妓者，被此輩索喚珍品，下細食次，使其高擡價數，惟經慣者不墮其計。”《都城紀勝》“酒肆”條：“若命妓，則此輩多是虛駕驕貴，索喚高價細食，全要出着經慣，不被所侮也。”
- ㉓ 《夢梁錄》卷七《倚郭城北橋道》：“麻綾巷曰采蓮橋”，“舊瓦子後曰鄧家橋”。
- ㉔ 《夢梁錄》卷七《倚郭城北橋道》：“霍山大路口曰羊坊橋。”《西湖老人繁勝錄》作“錢塘門外羊坊橋瓦”。
- ㉕ 《夢梁錄》卷七《倚郭城北橋道》：“本州試院前曰大通橋、王家橋。”
- ㉖ 《西湖老人繁勝錄》所列舉的城外瓦子，一處有脫誤，同時又將四通館瓦、新門瓦誤作二處。
- ㉗ 宋仁宗賜太守梅摯詩，見田汝成《西湖遊覽志餘》卷十《才情雅致》。
- ㉘ 嘉泰四年(公元1204年)三省六部太廟附近燒三千家。淳熙十四年(公元1187年)六月燒寶蓮山七百餘家。紹熙三年(公元1192年)十一月燒五百家。開禧二年(公元1206年)四月和嘉定十一年(公元1218年)二月都燒數百家，同年九月又燒萬松嶺四百八十家。紹定元年(公元1228年)燒六百餘家。

五 遼金都城結構的變遷

(一) 遼五京結構的變遷

遼是東北部落契丹所建立的王朝。遼太祖耶律阿保機於神冊三年(公元918年)在臨潢開始築城，稱為皇都。天顯元年(公元926年)擴展郭城，起建開皇、安德、五鑾三大殿。天顯三年又升東平郡為南京。天顯十三年(公元938年)十一月，遼太宗耶律德光因為石敬瑭獻燕雲十六州給契丹，並遣使奉表上尊號，於是依照漢制，登開皇殿，關承天門受禮，改元會同，改皇都為上京；同時升幽州為南京幽都府(遼聖宗開泰元年即公元1012年又改名析津府)，改南京(東平郡)為東京遼陽府。遼聖宗又於統和二十五年(公元1007年)增建中京大定府。遼興宗更於重熙十三年(公元1044年)升雲州為西京大同府，合稱五京。五京的建設，時期有先後，曾受到唐、五代、北宋中原都城格局的影響，所以我們從中也可以看到唐宋之際都城制度的變化。

1 遼上京臨潢府

遼上京是契丹最早創建的都城，始終作為政治上的中心。上京大體上採用了唐代長安的體制，同時又保留了契丹舊有的禮俗。

據《遼史·地理志》，上京城高二丈，幅員二十七里，共有南北兩城。北城為皇城，高三丈，四面有門，東為安東門，南為大順門，

西爲乾德門，北爲拱宸門。中有大內，即宮城。大內南門曰承天，有樓閣，東門爲東華，西門爲西華。承天門前有正南街，具有中軸綫性質，街兩側爲各司衙、寺觀、孔廟等，並有天雄寺與八作司相對。天雄寺在皇城東南隅，奉安烈考宣簡皇帝遺像，具有原廟性質。正南街將皇城分爲東西兩區，東屬臨潢縣，西屬長泰縣，這種體制是沿用唐代長安的佈局。承天也是長安宮城的門名。皇城實際上是契丹城性質，既爲中央官署所在，又爲契丹貴族集居之地。據宋使者薛映出使遼的記錄，“承天門內有昭德、宣政二殿與氈廬，皆東向。”（據《遼史·地理志》所引，《契丹國志》卷二十四引《富鄭公行程錄》相同。）說明當時遼的宮城內，除建二大殿外，還保留契丹所居氈廬的舊俗。宮殿和氈廬所以皆東向，是原來契丹禮俗，以東向爲尊。

據《遼史·地理志》，南城爲漢城，“南當橫街，各有樓對峙，下列井肆”。南門之東有回鶻營，是回鶻商販居留之處。西南有同文驛招待諸國使者，又有臨潢驛招待夏國使者。漢城是特設的漢族及其他少數族所居之處。橫街有樓對峙而下設市肆，這種市樓是用以監督管理市上貿易的，也還仿照中原設“市樓”管理“市”的制度。上京的市上貿易還比較原始。後周廣順年間胡燄記：“上京西樓有邑屋市肆，交易無錢而用布”（《遼史·地理志》所引）。西樓當對峙的市樓之一。在皇城之南特設漢城，是遼的都城所特有的體制，漢城具有外郭城的性質。

遼上京遺址在今內蒙古巴林左旗林東鎮南，周圍約14公里，與文獻所說幅員二十七里大體相合。分爲南北兩城，北即皇城，南爲漢城，漢城北牆即是皇城南牆。皇城略作長方形，南北長2,000米，東西寬2,200米，南牆被水衝毀。東、西、北三面各有一門，門外有簡單的甕城，城外每隔九十步築有馬面。中部小山崗

上為大內所在，有圍牆，大內中部有東西向橫貫小路，通向皇城東西兩門。小路以北，正中為一處臺地，前為矩形，後為圓形，即主要宮殿所在。這條橫貫在宮殿以南的小路，其作用當與唐代長安宮城南的橫街相同，只是規模較小。大內以北，為禁苑所在。大內正南200米處，有一矩形臺地，尚留有石獅一對，當即承天門遺址。這樣成對的石獅設置於大門之前兩旁，也該是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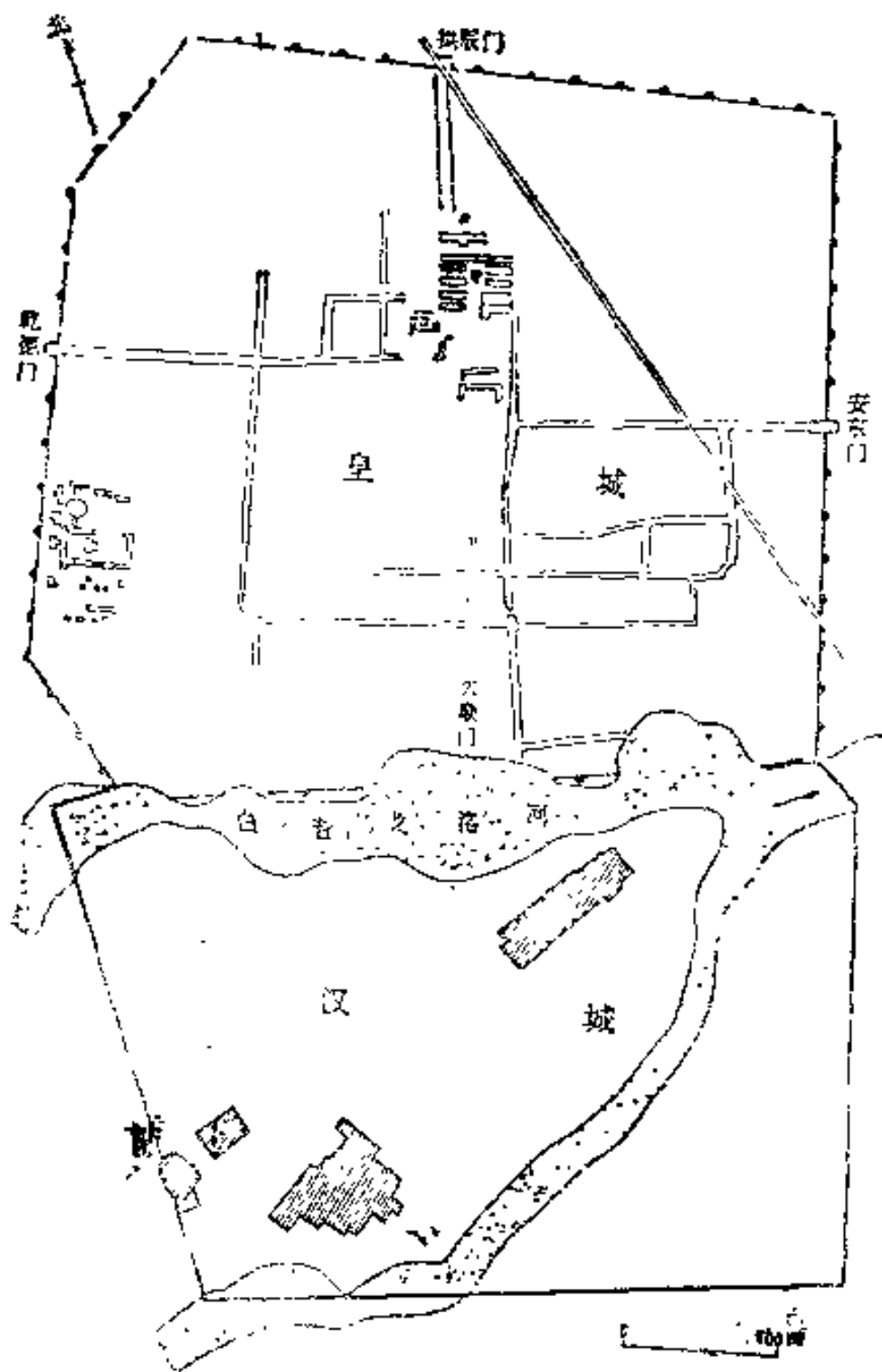


圖 65 遼上京臨潢府城址圖
 (採自《中國大百科全書》考古學卷第 278 頁)

仿當時中原的禮俗。承天門南有大道直通漢城，當即正南街。漢城相當於中原都城的外城或郭城，但規模較小，因河水冲刷，遺址多被破壞。東西橫街尚留有殘迹，兩側有狹小的建築遺址，橫街西端有方形高臺，可能即是“看樓”的基址。大內西北多空曠之地，除西部山崗有佛寺遺址與窑址外，其餘可能用作契丹貴族安扎篷帳之處^①（參看圖65）。

2 遼東京遼陽府

遼的東京遼陽府，在今遼寧省遼陽市附近，五代時原為渤海國地。遼太祖天顯元年（公元926年）滅渤海國後，曾在此新建東丹國，以皇太子圖欲為東丹國人皇王。這年太祖去世，次子耶律德光即位（即遼太宗），皇太子圖欲從海路出奔後唐。天顯三年以舊渤海國上京龍泉府居民移住東平郡，並升東平郡為南京。天顯十三年（即會同元年）改南京為東京遼陽府。

據《遼史·地理志》，城名天福，城高三丈，有樓、櫓，幅員三十里。共八門，東面有迎陽，東南有韶陽；南面為龍原，西南為顯德；西北為大遼，西為大順；東北為安遠，北為懷遠。宮城在東北隅，高三丈，有敵樓；南為三門，壯大有樓觀。四隅有角樓，相距各二里，可知宮城周圍共八里。宮牆以北設有讓國皇帝（即曾做東丹國人皇王的遼太子圖欲）的御容殿，具有“原廟”性質。大內建有二殿。外城謂之漢城，分南北二市，“中為看樓，晨集南市，夕集北市”。街西有金德寺、大悲寺、駙馬寺、趙頭陀寺等。漢城的周圍里數不明。綜上可知遼東京的結構，大體上與上京相同，都以契丹城與漢城並立，而在漢城中設市，並設有“看樓”作為管理機構。只是上京的“市”是永久性的“井肆”，東京的南北二市是早夕的集市性質。

3 遼南京幽都府(後改析津府)

遼的南京幽都府，遼聖宗時改爲析津府，原爲唐代幽州治所薊城。薊城最初是戰國時代燕國建都的地方，在今北京西南宣武區西部。唐代薊城分爲外城與子城兩重，唐太宗曾在此修建佛寺，武則天時始建成，賜名憫忠寺。唐玄宗時安祿山、史思明一度在此稱帝，此後長期爲藩鎮所割據。五代初期，幽州屬後唐。遼太宗幫助後唐的河東節度使石敬瑭反叛，石敬瑭以燕(即幽州)、雲(治所在大同)十六州獻契丹，遼升幽州爲南京幽都府。

據《遼史·地理志》，南京亦稱燕京，城周圍三十六里，高三丈，寬一丈五尺，有敵樓、戰櫓。共有八門，東爲安東、迎春，南爲開陽、丹鳳，西爲顯西、清晉，北爲通天、拱宸。大內在全城西南隅。皇城内設有安置景宗、聖宗御容的二殿。皇城南有三門，即南端和左右掖門。南有毬場，東設永平館。皇城西門曰顯西，設而不開，北曰子北。西城巔有涼殿，東北隅有燕角樓。《遼史·地理志》所說“城方三十六里”，“三”字當是“二”字之誤。宋使許亢宗於宣和七年即金天會二年(公元1124年)出使金國，當時金尚未在此擴建中都城，許亢宗在《奉使行程錄》中所說“燕山府城周圍二十七里”，依然是遼南京的規模，可知遼南京城周圍當在二十六七里左右，後來經金擴建才到達三十五六里之數。

據宋使王曾《行程錄》(《契丹國志》卷二十四引，《遼史·地理志》引作《上契丹事》)，遼南京的皇城，確是偏處在外郭城的西南隅，所謂“子城就羅郭西南爲之”。皇城的西牆即是外郭城的西牆，皇城的西門即是外郭城的西門，所以外郭城的西門之一叫顯西，皇城西門亦是顯西(參看圖66)。這該是沿用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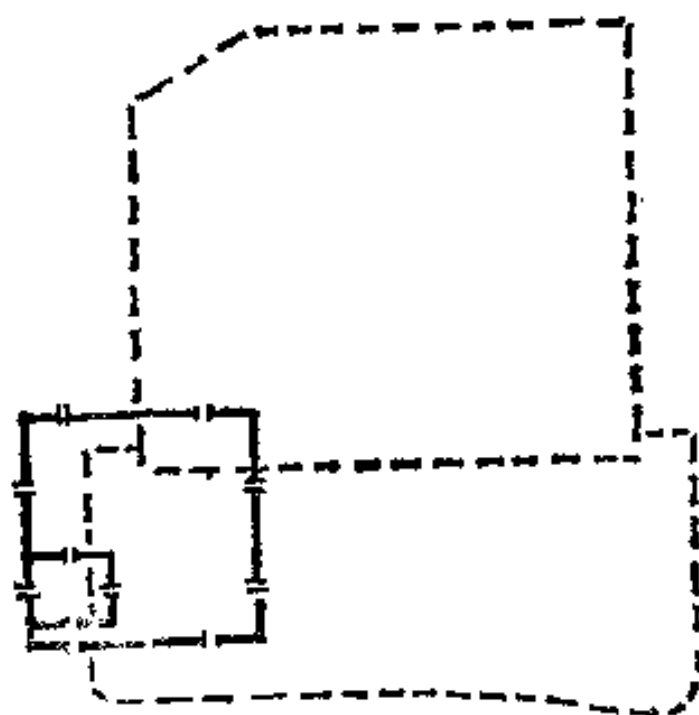


圖 66 遼南京析津府位置圖
 例
 一 遼南京城位置
 - - - 明清北京城位置

代幽州治所的格局。這種子城設於外郭城西南隅的格局，也還是沿用戰國時代燕國建都於薊的傳統的制度。據王曾《行程錄》，皇城正南門叫啓夏，內有元和殿、洪政殿。元和、洪政二殿是遼南京早期的主要大殿，遼太宗和遼興宗到南京，都曾“御元和殿”。據王士點《禁廟》，遼南京“殿之扇曰清涼，曰元和，曰嘉寧”。清涼殿當即涼殿，遼太宗於會同三年（公元940年）到南京時，下詔建於皇城西南堞。嘉寧殿，遼道宗於清寧五年（公元1059年）曾祭興宗於此。又有延壽寺（在今琉璃廠東北）供有遼景宗石像，具有原廟性質。遼聖宗於統和十二年曾因景宗石像建成，“幸延壽寺飯僧”（《遼史·聖宗紀》）。

遼興宗重熙五年（公元1036年）下詔修南京宮闕府署，有些重要的大殿當建於興宗時，建造得很樸實堅固。其中如仁政殿，經歷一百五十年，到金世宗大定二十八年（公元1188年），世宗對其宰臣說：“宮殿制度苟務華飾，必不堅固，今仁政殿遼時所建，全無華飾，但見他處歲歲修完，惟此殿如舊，以此見虛華無實者

不能經久也”(《金史·世宗本紀》)。正因為遼所建重要大殿很堅固耐用，金擴建中都時依然以遼的建築作為其基礎，整個宮城結構沒有大的變動，只着重於擴建外郭城。今北京廣安門外的天寧寺磚塔，原是遼代天王寺的建築，雖經明代大修，依然保有遼代風格。

遼南京城內分設二十六坊，每坊建有門樓，標有坊名，大多沿用唐代舊稱。“市”在城內北部。《遼史·食貨志》載：“太宗以燕城北有市，百物山積，命有司治其征。”城內有“六街”，特別繁榮。《遼史·聖宗紀》載：太平五年(公元1025年)因燕民豐收而“車駕臨幸”，“至夕，六街燈火如晝，士庶嬉遊，上亦微行觀之”。

4 遼中京大定府

遼的中京大定府，在今內蒙古昭烏達盟寧城縣大明城(又稱大名城)，東距今葉(葉伯壽)赤(赤峯)鐵路的天義車站約15公里，位於老哈河上游北岸，始建於遼聖宗統和二十五年，相當於宋真宗景德四年(公元1007年)。據《遼史·地理志》，“聖宗嘗過七金山土河之濱，南望雲氣有郭郭樓闕之狀，因議建都。”七金山即今之九頭山，在中京城址以北約7公里，土河即今之老哈河。遼聖宗是因為望見所謂“郭郭樓闕之狀”的“雲氣”而要在這裏建都的，因此他從燕薊(即燕京一帶)謀求良工，要建成一個有郭郭、宮掖、樓閣、府庫、市肆廊廡的“神都”。同上書還講到，所建皇城中設有祖廟和景宗、承天皇后御容殿，具有“原廟”的性質，並設有大同驛接待宋使，設有朝天館接待新羅使者，設有來賓館接待西夏使者。整個格局是以北宋東京為模式的，有三重方城，即外城、皇城和宮城。

統和二十五年，宋使者路振出使到遼中京，在他所著《乘輅

錄》(《皇朝事實類苑》卷七七宋晁載《續談助》所引)中，對這個城的佈局有具體的描寫：

契丹國(指遼中京)外城高丈餘，步東西有廊(按此五字涉下文而衍)，幅員三十里。南門曰朱夏門，凡三門，門有樓閣。自朱夏門入，街道闊百餘步，東西有廊舍約三百間，居民列廬肆廡下。街東西各三坊，坊門相對。……三里第二重城，城南門曰陽德門，凡三門，有樓閣。城高三丈，有睥睨，幅員約七里。自陽德門入，一里至內門，內(曰)閭闔門，凡三門，街道東西並無居民，但有短牆以障空地耳。閭闔門樓有五鳳，狀如京師，大約製(制)度卑陋。東西掖門去閭闔門各三百餘步。東西角樓相去約二里。是夕宿大同驛，驛在陽德門外。

宋王曾《行程錄》也有記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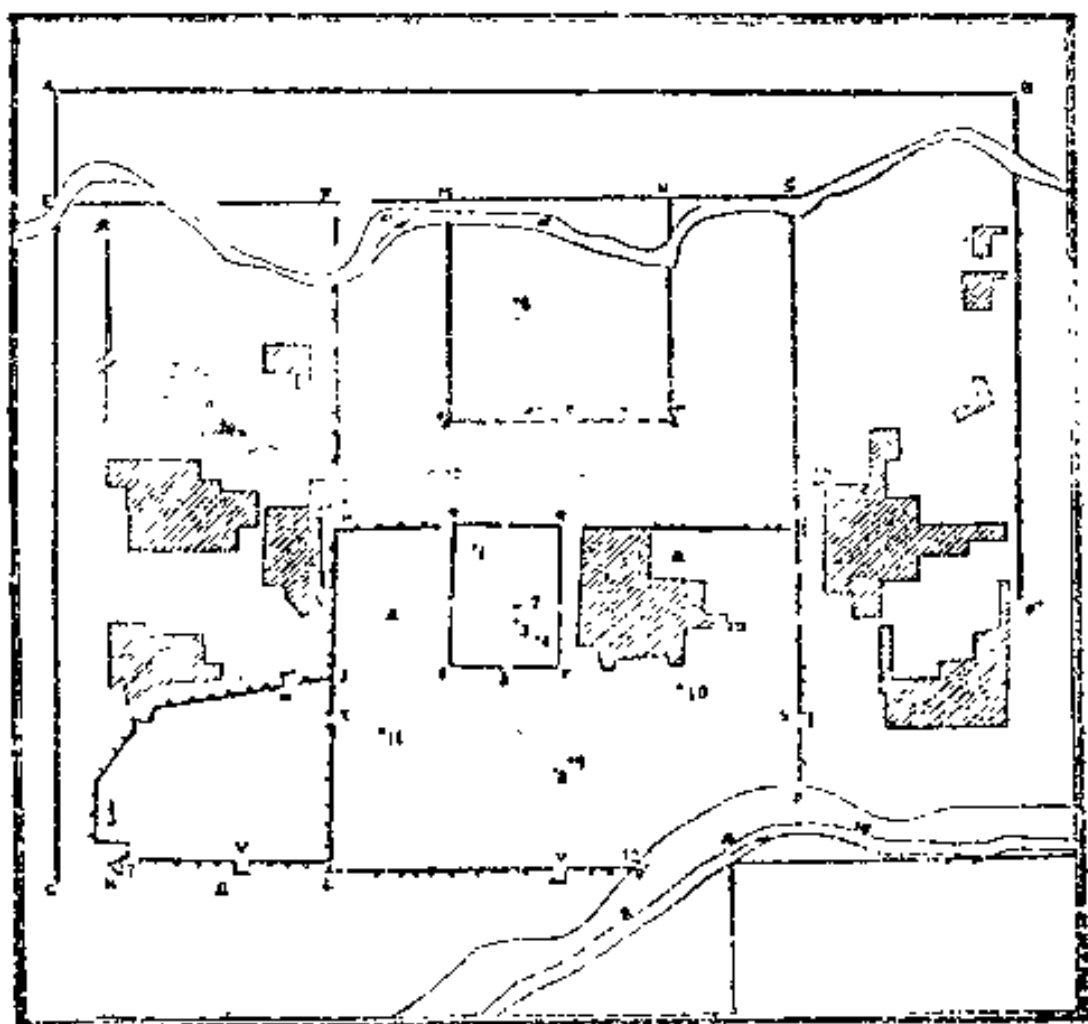
南門曰朱夏，門內夾道步廊，多坊門。又有市樓四，曰天才、大衛、通闕、望闕(《契丹國志》卷二十四引)。

所謂朱夏門，相當於北宋東京的南薰門；“自朱夏門入”的街道，相當於東京的南面御街；所謂第二重城，相當於東京的裏城，陽德門相當於東京的朱雀門；所謂內門指大內之門，閭闔門相當於東京的宮城南門宣德門。當時宣德門的門樓上裝飾有五鳳，所以路振說：“閭闔門樓有五鳳，狀如京師”。所說京師即指東京。閭闔門兩旁設東西掖門，猶如東京宣德門設東西掖門。大內的東西設有角樓，也是仿照東京的模式。大同驛設在陽德門外，猶如東京的都亭驛設在宣德門外中央官署以外。所說閭闔門外“街道東西並無居民，但有短牆以障空地”，正相當於東京宮城宣德門前御街兩側排列有黑漆和朱漆杈子的地段，具有宮廷廣場性質，是舉行大朝賀典禮時羣臣排班之處。所說從朱夏門入，經三里到第二重城陽德門，再經一里到大內的閭闔門，即是遼中京的中軸綫，市肆的廊舍和居民的坊里都整齊地排列在這條大街

的東西兩側。遼中京設大同驛接待宋使、設朝天館接待新羅使者和設來賓館接待西夏使者，也是做效北宋東京設都亭驛接待遼使，設都亭西驛接待西夏使者，設同文館接待高麗使者，設禮賓院接待回紇、于闐使者和設瞻雲館或懷遠驛接待諸番國。

考古工作者經過鑽探和重點發掘，證實了路振的記述大體可信。外城東西寬約4,200米，南北長約3,500米，周圍共約15,400米，合於“幅員三十里”之數。從外城南牆正中(即朱夏門)到皇城(即第二重城)南門(即陽德門)，有筆直大道，路長1,400多米，約近三里之數；路面略呈弧形，寬64米，約合40步之數，不到路振所說的“街道闊百餘步”。可能“闊百餘步”的只是其中一段(參看圖67)。路的兩側有石板砌成及木板鋪蓋的排水溝，這和北宋東京御街西側有“磚石甃砌御溝水兩道”(《東京夢華錄》卷二《御街》)基本相同。大道兩側各有南北向的經路三條，東西向的緯路五條，最寬的15米，最窄的4米，成為中央有中軸綫而東西兩側對稱的佈局。在大道兩側的排水溝旁，還發現有石頭牆基與大道平行，可能是坊里的外牆。路振所說“街東西各三坊，坊門相對”，只是指有廊舍的一段街的東西兩側，各有三坊。從整條大道兩側的經路三條和緯路五條相互作“井”字形的交叉情況來看，大道東西兩側，當各有三列直排的坊，每列應有四坊，共十二坊，東西兩側共二十四坊。

皇城在外城的正中偏北地方，東西兩面各距外城約1,000米，南面距外城約1,400米，北面距外城約500米。皇城作橫潤的長方形，東西寬約2,000米，南北長約1,500米，幅員約合十四里。宮城又在皇城正中偏北，僅築有東、南、西三面的牆，其北牆即是皇城的北牆，每面長約1,000米，四角有角樓基址，與路振所說“相去約二里”相合。從皇城南門陽德門向北到宮城南門閭闔門，有



- 圖例：
- | | |
|--------------|------|
| 1—12 發掘區 | ⊏ 古塔 |
| —— 城牆 | ≈ 河流 |
| A—Z 城牆及城門示意線 | ☞ 村莊 |

圖67 遼中京大定府城址圖

(採自《遼中京城址發掘的重要收穫》，《文物》1961年第9期)

寬約40米的大道，長約500米，約近一里之數，與路振所說符合。從闔闔門向東西兩側，沿牆各180米處，都探出寬約15米的豁口，當即東西掖門所在，與路振所說“東西掖門去闔闔門各三百餘步”不合，“三”字當是“一”字之誤。既然“東西角樓相去約二里”，整個宮城南牆僅二里寬，在東西角樓與闔闔門中間的東西掖門，當然不可能“去闔闔門各三百餘步”。路振《乘輅錄》又講到，從東掖門到第三門，即武功門，門裏有契丹君主（聖宗）的武功殿；從西掖門到第三門，即文華門，門裏有國母（承天皇太后）的文華殿。

根據實測，從東西掖門基址北去80米處，各有高出地下路面的建築遺址，考古工作者推定是武功門和文華門所在。又從東西掖門基址向北各有一條大道，通向北部，長約400多米處，在大道北側各有一處大型建築遺址，考古工作者推定是武功殿和文華殿所在。文華殿和武功殿之間，有一條寬約8米的通道。這種武功殿和文華殿的建設，仍然保持有契丹風俗的特點（參看圖6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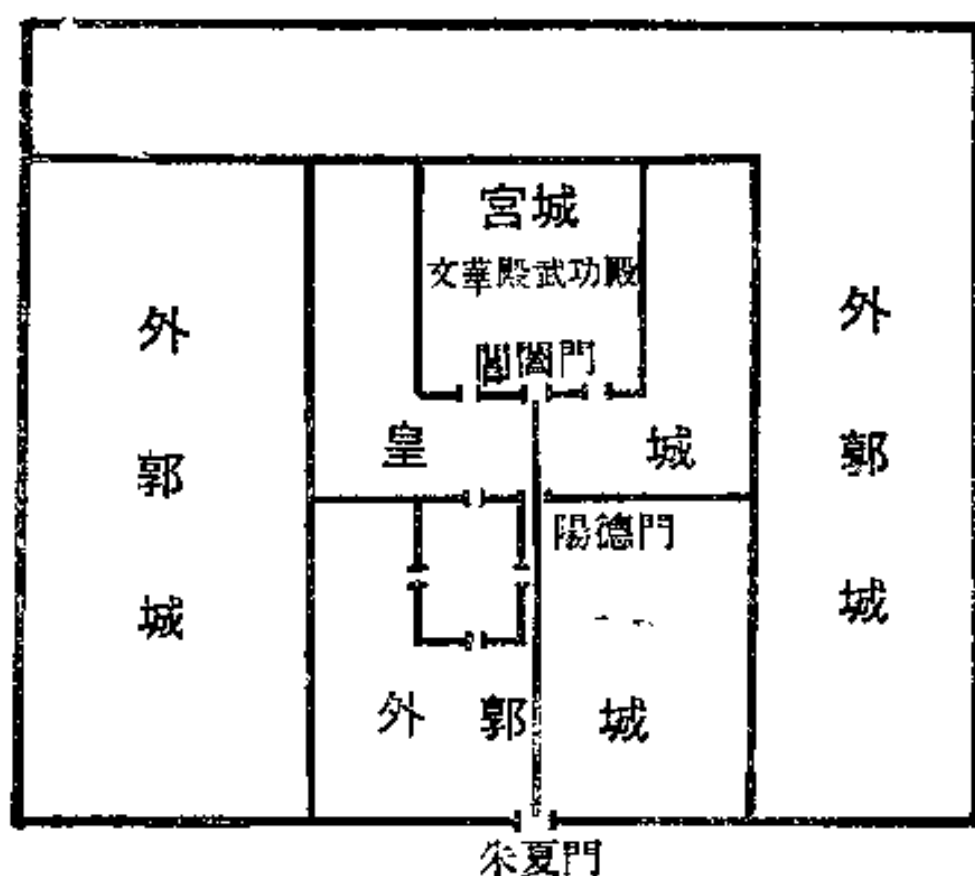


圖68 遼中京大定府結構圖

特別值得注意的是，在中京城址中發現了外城大街兩側的南北向的廊舍建築遺址，它位於皇城陽德門南約500米處，在外郭城南門朱夏門到陽德門間大道的兩側約20米。在發掘區內共發現東西向的十三排夯土臺基，每排有四個楔形夯土臺，每個夯土臺平面作正方形，剖面呈楔形，上端長寬各約1米，深0.7米，下端長寬各約0.7米。每排四個楔形夯土臺的距離，當中兩

個相距3.8米，東西兩側的兩個各相距1.6米。附近還發現有移動過位置的石柱礎五個，長寬各約40釐米，厚約25釐米。整個建築遺址內地面全部夯實。在發掘區外還有與這十三排夯土臺基相連的許多排夯土臺基，未能全部發掘，可知它原是一處南北向的長廊式的建築，考古工作者認為這就是路振所說街“東西有廊舍約三百間”的一部分，這是正確的②。王曾《行程錄》所說朱夏門內的夾道步廊，亦當指東西兩面的三百門廊舍。王曾還說有“市樓”四所，當是管理市上貿易的“看樓”(參看圖6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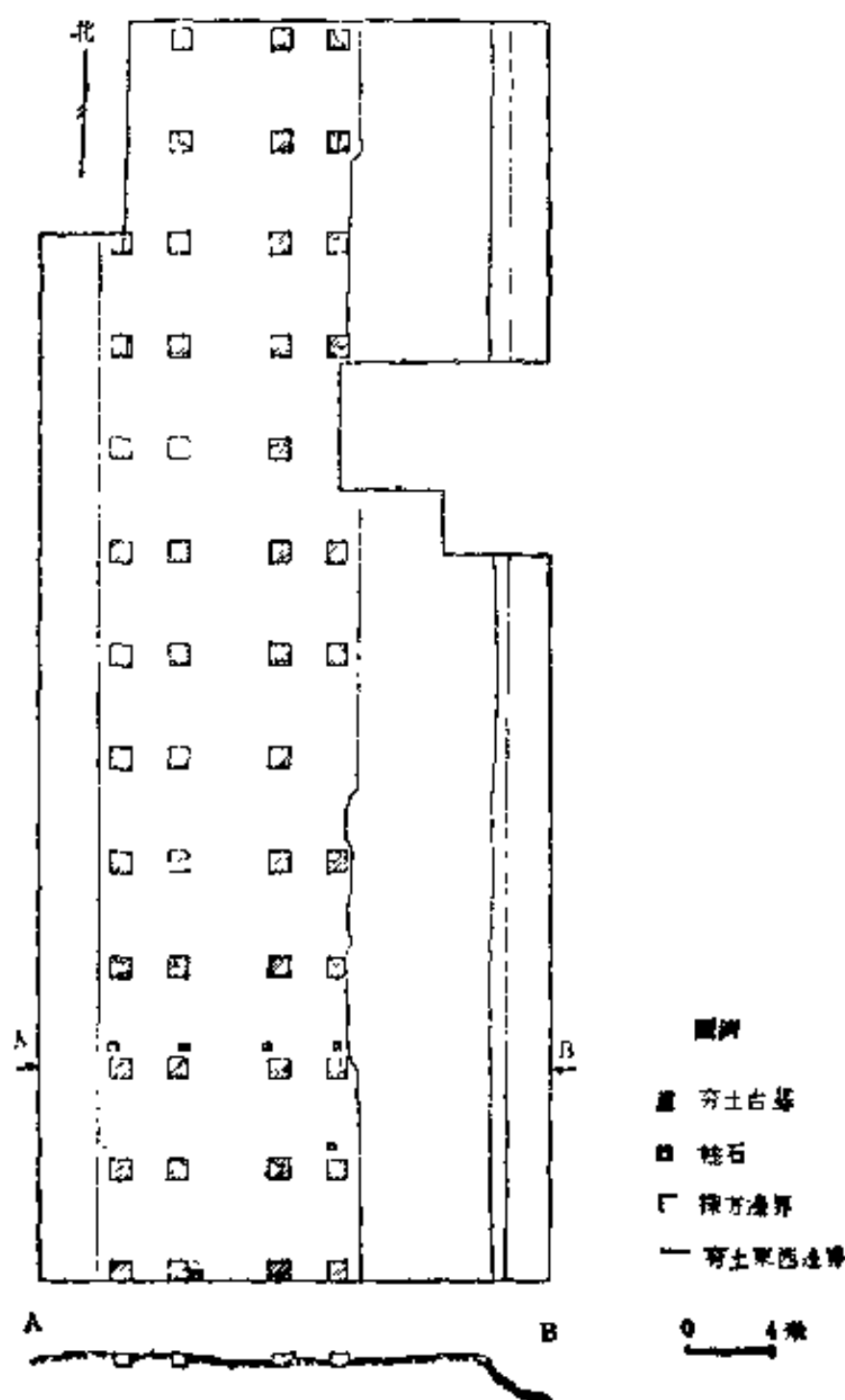


圖69 遼中京外郭城廊舍遺跡平面圖
(採自《遼中京城址發掘的重要收穫》,《文物》1961年第9期)

這樣在大街東西兩側建築“廊舍”而使“居民列廛肆廡下”，成爲“市肆廊廡”，應該又是模倣當時北宋城市中流行的“市廊”的形式的。宋真宗大中祥符元年（公元1008年），相當於遼聖宗統和二十六年，宋真宗到鄆州（州治須城，今山東東平），“上覩城中巷陌迫隘，詢之，云：徙城之始，衢路顯敞，其後守吏增市廊以收課。即詔毀之”（《續資治通鑑長編》卷七十）。所說“徙城”是指把鄆州的州治從須昌（今山東東平西北）遷移到須城。剛遷到須城時街道寬敞，後來因爲地方官沿着街道兩側增建“市廊”租給商人營業而收稅，街道就窄狹了。當時北宋境內城市中，正流行“增市廊以收課”的辦法。這種廊廡式的長屋，可以分隔成許多間，分別按商人的需要租借給他們用作邸店，或開設商店。沿大街建築的這種廊屋當然是爲了便於商人開店營業，因而有“市廊”之稱。北宋東京的汴河堤岸司和修完京城所都建有“房廊”租借給商人作爲“歲收課利”，還設有樓店務“掌州縣房廊課利”，所謂“房廊”和“樓店”同樣意思。借給茶商、鹽商臨時堆積商品的地方也或稱爲“寄廊”或“廊屋”。看來遼中京這種用作“居民列廛肆廡下”的“廊舍”，不僅名稱是沿用中原的，整個長廊式的建築形式也還是模倣中原的。這正是繁榮的“街市”出現以前的一種過渡形式。

5 遼西京大同府

遼的西京大同府，在今山西省大同市。遼興宗重熙十年（公元1044年）升雲州爲西京大同府。據《遼史·地理志》，城周圍二十里，共四門，東爲迎春，南爲朝陽，西爲定西，北爲拱極。今西門內華嚴寺的藏經殿薄伽教藏是重熙七年建築，南門內善化寺的大雄寶殿亦遼中葉所建。遼道宗清寧八年（公元1062年）

曾造諸帝石像、銅像供奉於華嚴寺，具有“原廟”性質。

(二) 金上京和中都結構的變遷

金是東北部落女真完顏部所建立的王朝，金太祖在攻取遼的境地後，繼承了遼的五京之制。金熙宗天眷元年(公元1138年)把原來金的國都稱爲上京會寧府，改遼的上京爲北京。海陵王殺金熙宗而取得帝位，於貞元元年(公元1152年)遷都燕京，稱爲中都大興府，並改汴京爲南京開封府，改中京大定府爲北京大定府，於是連同原有的東京遼陽府、西京大同府，合稱五京。同時廢除上京會寧府，並於正隆二年(公元1157年)下令把原來上京的宮殿、宗廟、諸大族第宅及儲慶寺，削平基址而加以耕種。後來金世宗於大定十三年(公元1173年)又恢復上京。

在金的五京中，重要的就是上京和中都，其餘都沿用遼的舊城，有的只是增建宮殿和宗廟而已。如東京遼陽府，金熙宗皇統四年(公元1144年)在那裏建嘉惠宮、寢殿保寧殿和宗廟孝寧宮，皇統七年又建御容殿。又如西京大同府，金太宗天會三年(公元1125年)在那裏建太祖的原廟，金世宗大定五年(公元1165年)建保安殿。又如南京開封府，海陵王正隆四年(公元1159年)下詔營建已毀的宮殿，耗費很大，但是城內依然荒廢殘破。又如北京大定府，經過發掘勘測，知道金代只是皇城內築一小城堡，疊壓在遼的宮殿基址上，四周每邊長約180米，東向開門，可能爲金之重要官署所在。

1 金上京會寧府

女真完顏部從今黑龍江省阿什河、拉林河流域興起，金的

前期都城上京會寧府故址在今哈爾濱市東南三十公里的阿城縣城以南約四里，俗稱白城（一作敗城）。“國初無城郭，散呼曰皇帝寨、國相寨、太子莊”（《大金國志》卷三十三《燕京制度》），還是沿用部落建置帳幕的方式。金太宗天會二年（公元1124年）築上京新城，名會平州（《金史·太宗本紀》）；天會三年建乾元殿，後十年又建慶元宮（《金史·地理志》）。北宋宣和七年（公元1125年），相當金天會三年，宋徽宗因賀金太宗即位，遣使許亢宗到上京，許亢宗著有《宣和乙巳奉使行程錄》（《三朝北盟會編》卷二十所收），記述了當時所見上京宮城的情況：

第三十九程，……至館。館惟第舍三十餘間，牆壁全密，堂室如窰幕，寢榻皆土床，鋪厚毳褥及錦繡、貂鼠被、大枕頭等。……次日賜酒果，至晚闔門。……次日館伴同行，可五七里，一望平原曠野，間有居民數十家，……又二里，命撤傘，云近闕。復北行百餘步，有阜圍繞三四頃，北高丈餘，云皇城也。至於宿門，就龍臺下馬，行入宿闕，西設毡帳四座，……即捧國書，自山棚東入，陳禮物於庭下，傳進如儀。……其山棚，左曰桃源洞，右曰紫極洞，中作大牌，題曰翠微宮，高五七丈，以五色彩間結山石及仙佛龍象之形，雜以松柏枝，以數人能為禽鳴者，吟叫山內。木建殿七間甚壯，未結蓋，以瓦仰鋪及泥補之，以木為鸛吻及屋脊用墨，下鋪帷幕，榜額曰乾元殿。階高四尺許，階前土壇方闊數丈，名曰龍墀。兩廂旋結架小葦屋，幕以青幕，以坐三節，……興築已架屋數千百間未就，規模亦甚侈也。

這時乾元殿剛建設，尚未完工，其餘興築的房屋也尚未就。乾元殿開闢七間，並有龍墀，當是做照北宋宮殿建築，但兩廂有幕以青幕的小葦屋，仍保留有舊俗。所設“山棚”，並有善於口技的藝人吟叫，也是模倣北宋東京元旦大朝會接待諸國使人時，在宮城宣德門前“縛山棚”、“橫列三門”、“金書大牌”的設施（《東

京夢華錄》卷六《元宵》)。說明當時上京宮城的建設已開始在模倣中原的體制。

金熙宗進一步採用中原的禮制，曾親祭孔子廟，封衍聖公等。天眷元年(公元1138年)，熙宗把乾元殿改名皇極殿，又建朝殿叫敷德，寢殿叫宵衣，書殿叫稽古。同年以春亭改名天元殿，安置太祖、太宗、徽宗及諸后御容，作為原廟。接着在皇統二年(公元1141年)建涼殿，包括五雲樓，重明殿以及東西兩廡的殿、後東殿、後西殿等(《金史·地理志》)。次年又建太廟、社稷。皇統六年又認為“舊內(即大內)太狹，纔如郡治，遂役五路工匠，撤而新之，規模雖倣汴京，然僅得十之二三而已”(《大金國志》卷十二)。金的上京限於原來所建城郭的規模格局，儘管想做汴京改建，是不可能改建得像樣的^③(參看圖7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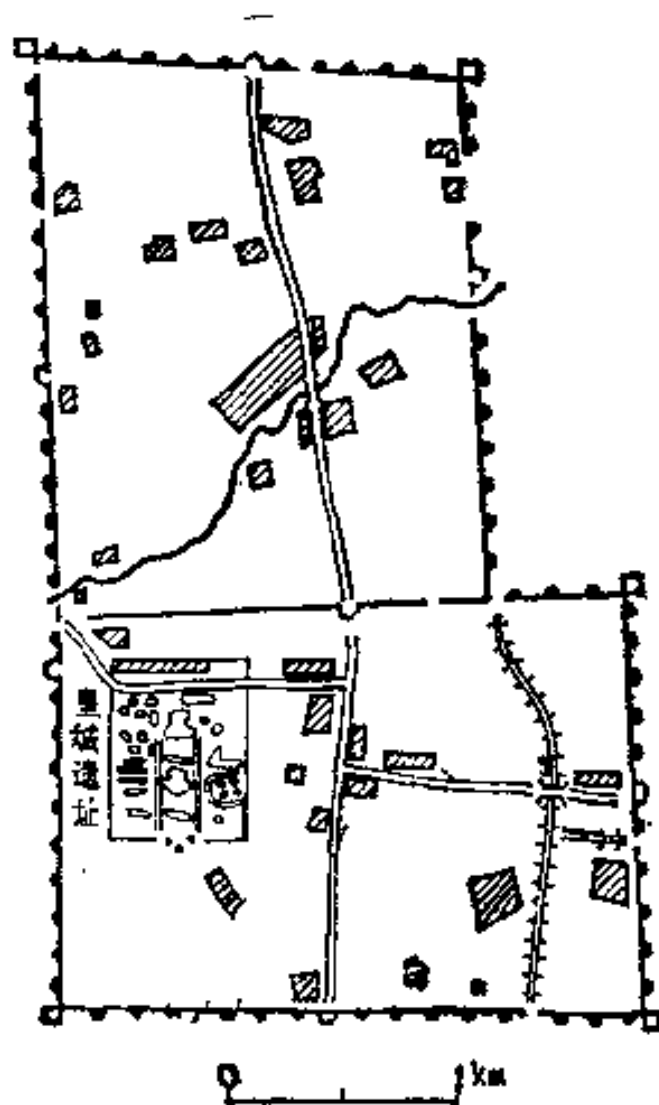


圖70 金上京會寧府城址圖
(採自《中國大百科全書·考古學卷》第235頁)

現在阿城縣城以南的白城，所保存的金上京城址還比較完整。整個城西靠山地，東有阿什河。由南北兩城相連合組而成，北城的南北略長，南城的東西略寬，因而相連成曲尺形。北城南北長1,828米，東西寬1,553米；南城南北長1,528米，東西寬2,148米，南北兩城連接合長3,356米。城牆現存，厚約3米，高4—5米，城牆外建圓形馬面，角隅有方形角樓址。全城現有九個豁口可能是門，不相對稱，門外設甕城。南北兩城相連的橫牆，偏東有門。南城西北角地勢高而平，上建有宮城，南北長645米，東西寬500米。宮城正門向南，與城南門相對。正門前左右有高丘，當即闕亭的基址。許亢宗所說的“皇城”即是宮城，所謂“近闕”即指宮城正門前的闕亭，正如北宋東京大內宣德門前有兩闕亭相對一樣。正門三個門洞，入正門，左右有寬大廊址，兩廊之間正中一綫有南北列的基址多處，其中較大的有三座。北面一座大基址成“工”字形，當是最主要的宮殿所在（參看圖71）。主要宮殿作“工”字形，當是模倣北宋東京的宮殿。“工”字形基址以北正中一綫，尚有南北列的基址三處，兩側也還有南北列的小基址多處。整個佈局是整齊的，宮殿區遍佈黃綠色琉璃瓦碎片。整個南城實際上具有皇城性質，尚有其他宮殿、佛寺及孔廟等分佈其間。

北城當是郭城性質，有阿什河由西南流向東北，成爲上京的水路運輸綫。沿河兩岸是商業區和手工業區，有冶鐵遺址和陶窑等遺址。阿城縣先後出土五枚金代銀錠，都是東腰形，每錠重合市秤三斤八兩，上面常鑿印金銀作坊、工匠、檢驗宮的戳記，其中一件印有“翟家記”、“真花銀”字款，與阿城楊樹出土的帶有“上京翟家記”戳記的銀鐲合看，可知“翟家記”是上京城內一家翟姓的金銀鋪，既鑄造銀錠，又製作金銀首飾^④。這和北宋東京和南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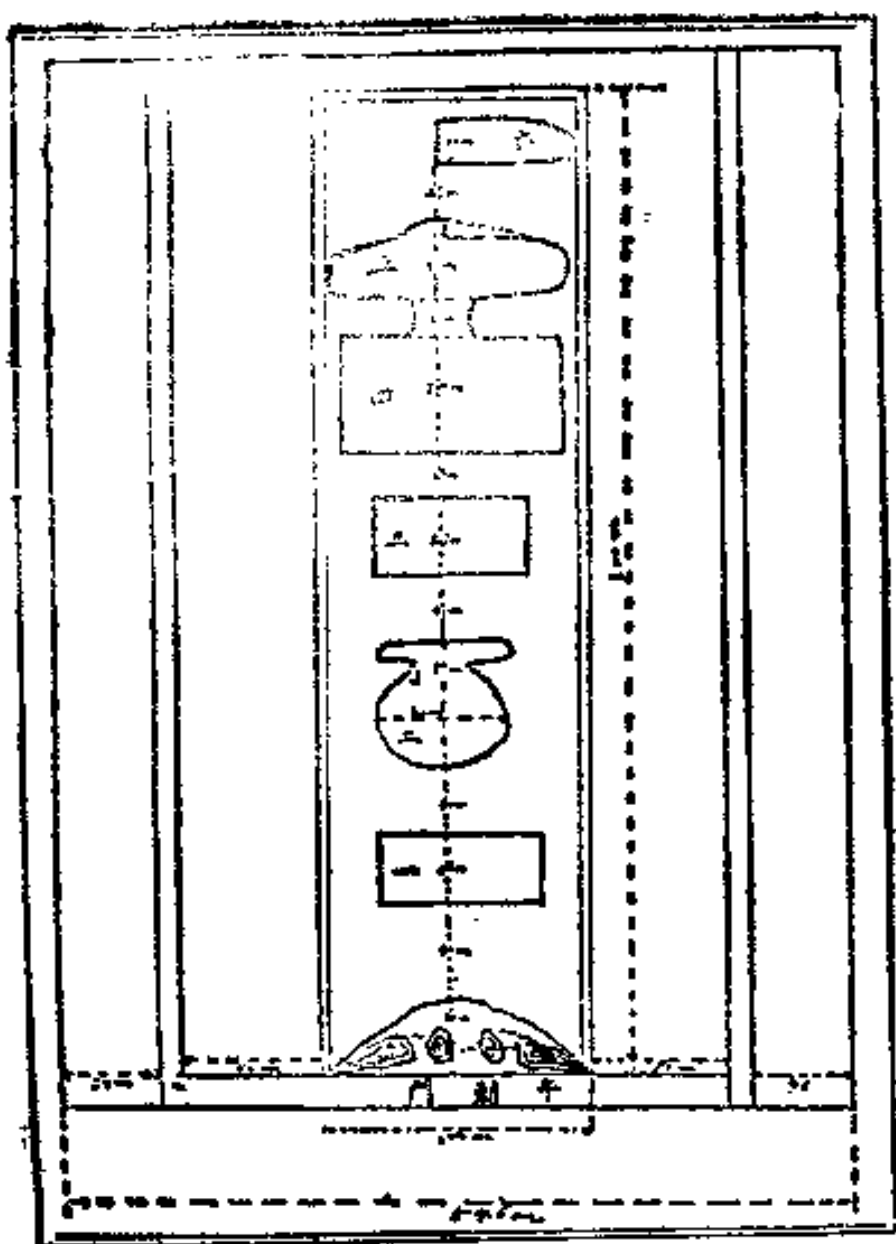


圖 71 金上京宮城遺址平面圖

（採自日本園田一龜所作略測圖，見日本村田治郎《中國帝都》第287頁）

臨安“前列金銀器皿及現錢”的金銀鋪（《夢梁錄》卷十三《鋪席》）該是差不多的。此外，還曾出土鑿有“上京警巡院”等驗記的銅鏡。

2 金中都大興府

海陵王完顏亮爲了進一步謀求向中原擴展，遷都燕京，要在遼南京的基礎上，按照北宋汴京制度加以改建。天德元年（公元1148年）“適命左右丞相張浩、張通，左丞蔡松年，調諸路民夫築燕京，制度如汴”（《日下舊聞考》卷三十七引《元一統志》）。同時“遣畫工寫京師（指汴京）宮室制度，闊狹修短，盡以授之左相

張浩輩，按圖修之”（《日下舊聞考》卷二十九引《金圖經》）。天德四年建成，貞元元年（公元1153年）以遷都詔中外，改元貞元，稱為中都大興府。

金中都是在原有遼南京的基礎上，按照汴京制度擴建的。中都的皇城大體上沿用遼南京的皇城，其中主要宮殿如仁政殿依然是遼的舊殿。但是，遼南京的結構，“子城就羅郭城西南爲之”，皇城偏在外郭城的西南隅，要改成如同汴京三套方城那樣的格局，需要把外郭的西城牆向西遷移。金中都的皇城已在外郭城的中部而微偏西南，說明沿皇城的西牆直到外郭城的西城牆之間的地段，都是金所擴展，同時外郭城的東面和南面，在擴建時也有所拓寬。原來法源寺的前身憫忠寺，據正殿後臺上所嵌唐景福元年《重藏舍利記》，是在“大燕城內地東南隅”，如今法源寺南距金中都南城牆約2.4公里，東距東城牆約1.2公里，說明東南兩面城牆也有一到二公里的擴展。只有北城牆仍依遼南京之舊。正因為有這樣的擴展，遼南京城周圍不過二十六、七里，金中都周圍擴展爲三十五、六里（參看圖7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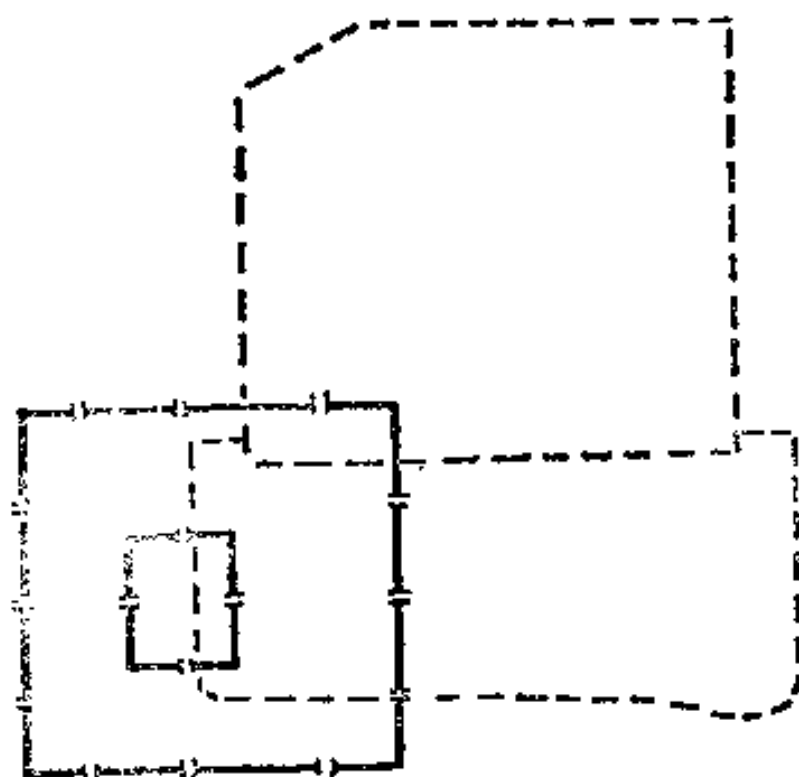


圖72 金中都大興府位置圖
圖例
—— 金中都城位置
- - - 明清北京城位置

根據考古調查，金中都近似正方形，東西較南北稍長。目前外部城東、南、西三面城牆斷斷續續的遺迹還存在，東南城角在今永定門火車站西南的四通路，東北城角在今宣武門內翠花街，西北城角在今軍事博物館南皇亭子，西南城角在今豐臺區鳳凰嘴村。經實測，西城牆長4,530米，南城牆長4,750米，東城牆長4,510米。北面有一個會城門村應是北面西邊城門會城門所在，以此為據點推算，北城牆約長4,900米。四面城牆合計18,690米，約合宋尺35里^⑤。明代洪武初年金中都舊城還存在，稱為南城，洪武元年八月壬辰，大將軍徐達曾“令指揮葉國珍計度南城，周圍凡五千三百二十八丈，南城故金時舊基也”《明太祖實錄》卷三十四）。5,328丈也正合宋尺35里之數。《大金國志》卷三十三《燕京制度》所說“都城四圍凡七十五里，城門十二”，“七”字當是“三”字之誤（參看圖7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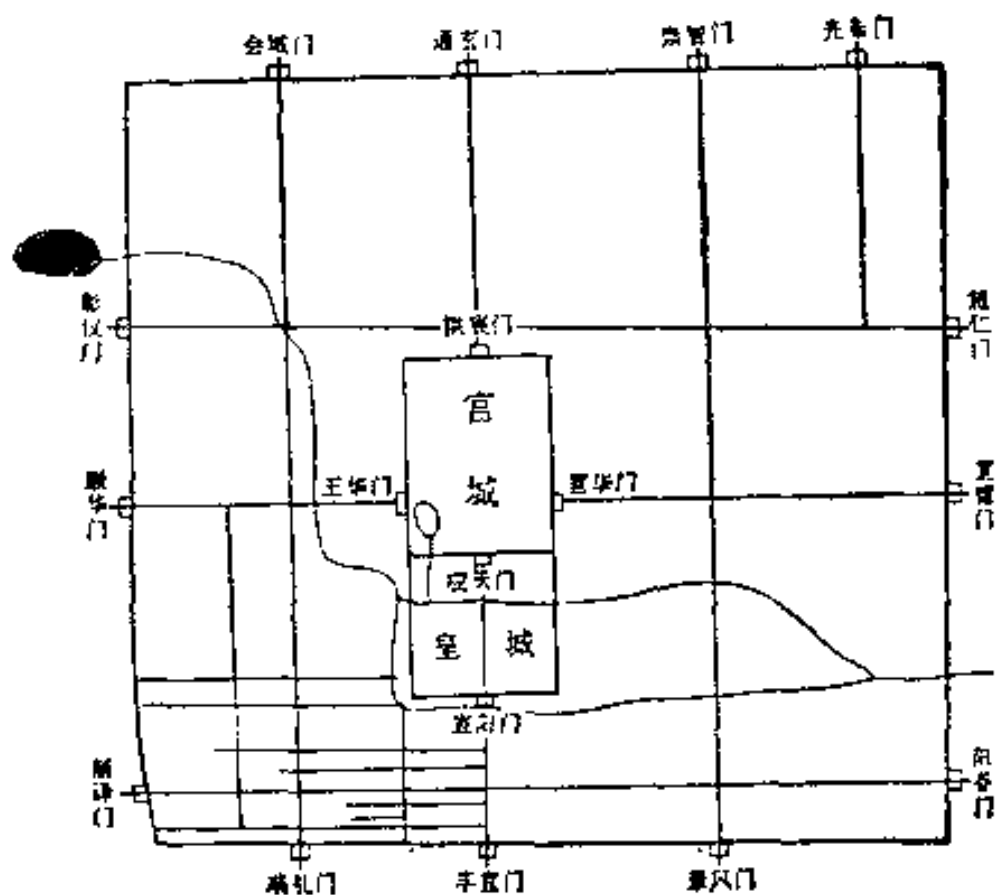


圖73 金中都佈局結構圖
（採自《中國大百科全書》考古學卷第238頁）

金中都的外郭城東西南各開三門，北面開四門。東城牆門，北爲施仁、中爲宣耀，南爲陽春；西城牆門，北爲彰義，中爲灝華，南爲麗澤；南城牆門，東爲景風，中爲豐宜，西爲端禮；北城牆門，東爲光泰與崇智，中爲通玄，西爲會城。皇城在外郭城中部微偏西南處，遺址在今廣安門外濱河南路西側，根據實測，周圍約5,000米，與《金圖經》（《日下舊聞考》卷二十九引）、《大金國志》卷三十三《燕京制度》所說“城之四圍凡九里三十步”之數相符。皇城正南門叫宣陽門，皇城内第二重門就是宮城正南門叫應天門（原稱通天門）。宮城實際上要佔皇城的三分之二地方。宮城正東爲宣華門，正西爲玉華門，正北爲拱宸門。從外郭城正南的豐宜門，經皇城正南的宣陽門、宮城正南的應天門，出宮城正北的拱宸門，直到外郭城正北的通玄門，是全城縱貫南北的正中的馳道，也就是金中都南北向的中軸綫。所有都城中的重要建築物，都安排在這條中軸綫的兩側和正中。宋使者范成大的《攬轡錄》、樓鑰的《北行日錄》中，對這條中軸綫上所見的事物有具體的描寫；《事林廣記》卷二《燕京圖志》的《帝京宮闕圖》，對這條中軸綫及其兩側的重要建築物更作了形象的描繪。

這張《帝京宮闕圖》的底層（參看圖74），就是外郭城正南豐宜門外的城壕（即護城河）和石橋，也就是范成大所說的新石橋和樓鑰所說的大石橋。從石橋沿着大道進入豐宜門。豐宜門有門樓，九間開闢，分爲三個門道。再進，圖上有奪玉橋，就是范成大所說石玉橋，正名叫龍津橋，這個橋名是襲用汴京城內御路上第一座橋的。兩橋都用石欄劃分爲三道，中道是御路，也用杈子攔住。龍津橋用燕石製作，石色如玉，石欄四行和華表柱都雕刻極工。橋北兩旁有小亭，東亭有橋名碑。再進即皇城正南的宣陽門，門樓也有九間開闢，樓下分爲三個門道，中門爲御路，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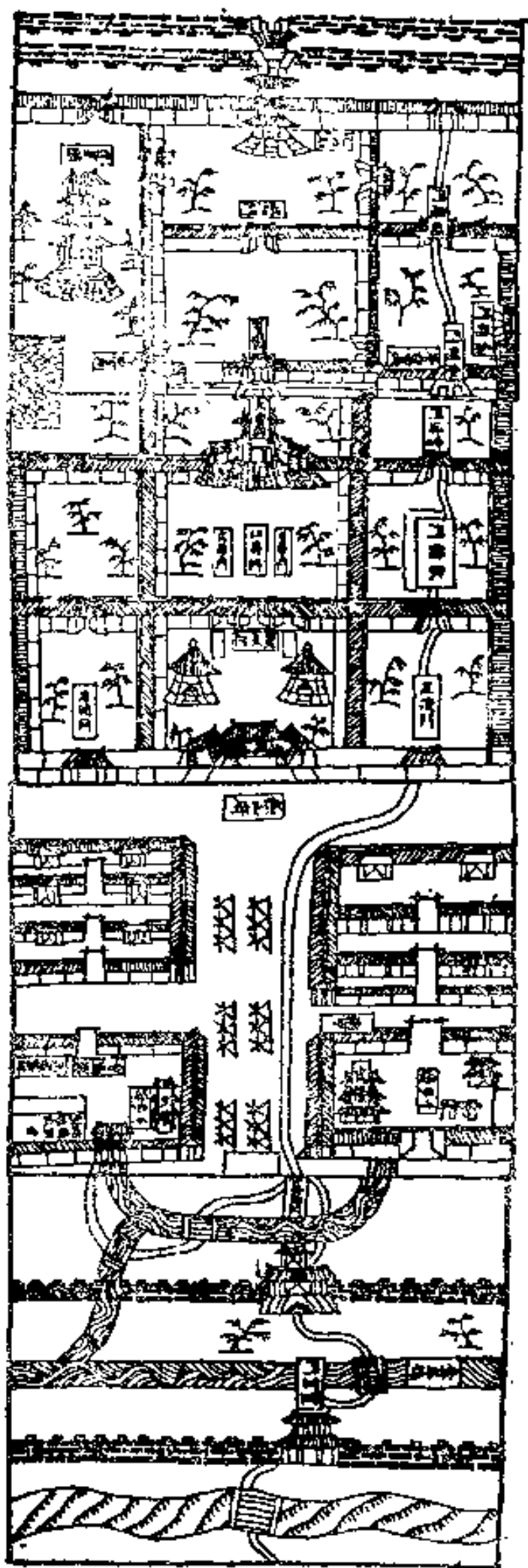


圖 74 《事林廣記》卷二《燕京圖志》所載《帝京宮闈圖》

（摹本，採自賀業鉅《考工記營國制度研究》，中國建築工業出版社1985年出版）

上畫龍，常關閉；兩旁的門，門上畫鳳，可通行。從圖上看來，三個門道之前都有臺階，而中間的臺階寬敞。再往前，又要經過門前弧形的河上的橋，才能進入皇城正中的馳道。從城外城壕上石橋一路到宣陽門，圖上所畫的全是彎曲的道路，實際上道路并不曲折，只是用來表示這一段路程是比較遠的。在宣陽門內，馳道很闊，分爲三道，中道是御路，有朱欄二行，跨大溝爲限，欄外種植柳樹。圖上所畫的兩行杈子，就是朱欄。這和汴京大內以前的御路上，路心有杈子兩行是相同的。

在皇城正中馳道兩旁有南北向的長廊。圖上兩旁長廊畫成兩段，兩段的兩頭和中間都有東西向的橫街，共有三條橫街，就是宮城正南應天門和左右掖門前有一條闊的橫街，兩段長廊之間也有一條闊的橫街，宣陽門內側沿城牆則有一條狹的橫街。在中間一條橫街的東側有“街市”兩字，當是皇城以內的街市所在。在東西長廊的兩側，有南北兩組官舍，正中都開有一門，正面對宮城的左右掖門。同時東西兩條長廊，到應天門前的橫街，分別轉向東西兩面成爲曲尺形，經過東西掖門的對面，一直通到皇城的東西兩邊，使得宮城前的廣場成爲“丁”字形的新格局。這種“丁”字形廣場的新格局，可以說，就是以唐代長安宮城前用橫街作廣場的方式和北宋汴京宮城前用縱街作廣場的方式結合了起來。

金中都皇城馳道兩旁的長廊結構，和汴京宮城前的千步廊不同，它是以數以百計的一間間廊屋接連而成。就是范成大所說：東御廊“幾二百間，分三節，每節一門”，“將至宮城，廊即東轉又百餘間”。《金史·地理志》所說相同，實際上二百多間廊屋，分成兩節，中間和兩頭都有東西向的橫街。樓鑰又概括地說：“長廊東西曲尺，各二百五十間”。從圖上看，東西長廊南端的東西兩側，畫有相對的兩座三層樓，東爲“武樓”，西爲“文樓”，就是

《大金國志》卷三十三《燕京制度》所說：“過門（指宣陽門）有兩樓，曰文曰武”。也就是樓鑰所說：“廊頭各有三層樓亭，護以綠欄桿”。文樓即鐘樓，武樓即鼓樓。後來元朝宮城中所建鐘鼓樓也稱文武樓。這是沿用唐代長安宮城南門建有鼓樓的制度而有所發展。唐代長安宮城南門每天於天明和日落時擊鼓，作為早晚報時的信號，隨着各條街上的街鼓敲動，城門和坊門隨即關閉。金中都在皇城南門左右設有鐘鼓二樓作為早晚報時的信號，同時金於汴京中心州橋少北也設有文武樓，成為後來元代在大都城中建設鐘鼓二樓的先聲。

皇城東西長廊兩側的東西向的四排房舍，就是重要中央官署和太廟等建築所在。畫在西面長廊西側南面的一組房舍是會同館，即接待宋使之處，圖上有“南使客位”字樣，在會同館之南的小方塊中還有“副位次”字樣。這就是《大金國志》所說：“文（樓）之轉東曰來寧館，武（樓）轉西曰會同館”，也就是樓鑰所說：“高麗、西夏二館在東，與會同館相對”。《大金國志》所說文樓在東而武樓在西，當有錯誤，圖上所畫，是武樓在東而文樓在西。楊奐《汴故宮記》所記金的隆德殿，也是鼓樓在東，鐘樓在西。可知金代制度應如圖上所畫為是。高麗、西夏二館當即在東面長廊東側南面的一組房舍，圖上未標出。在橫街以北，東西長廊兩側的北面一組房舍，東為太廟，西為三省，就是《大金國志》所說：“廊之半，各有偏門，向東曰太廟，向西曰尚書省”。樓鑰說：“廊有三路貫其中。南路兩門外皆民居。中路無門而路甚闊，左為太廟，右為三省。北路左門外有屏牆，夾道中有官府南向，右門又有六部，蓋在三省之後也。”所說“中路無門而路甚闊”，即是圖上橫斷長廊中間的橫街。所說“北路”即指宮城應天門前的橫街。據此可知應天門前橫街東端有門，門外有屏牆，夾道中設有官府，兩端亦有門，

門外設有六部，正當三省的後側^⑤。

《帝京宮闕圖》上，宮城正南的應天門畫得特別開闊，左右並有附加建築，因為應天門高八丈，有十一間開闔，下列五個門道，左右并有行棋。圖上在應天門前標有“燕山府”三字，而把“應天門”三字標在後面，因為宋人原稱此地為燕山府。應天門以後有仁壽門，左右為日華門和月華門，門裏即大安殿，這是舉行大朝會的正殿。據樓鑰記述，殿門九間開闔，大殿十一間開闔，朶殿各五間，行廊各四間，東西廊各六十間，中起二樓各五間，左曰廣祐，後對東宮，右曰弘福，後有數殿。經鑽探得知大殿確為十一間面闔，與文獻相合。圖上大安殿以後為宣明門，再後為政和門（文獻上都作仁政門），門裏為仁政殿，這是日常上朝之殿，原是遼的建築。大殿九楹，前設露臺，殿兩旁有朶殿，朶殿上兩高樓稱東西上閣門，中有鐘鼓樓。圖上所畫仁政殿，規模要比大安殿小得多。

圖上應天門東為左掖門，後為敷德門，再後為會通門和承明門，東通城外有集禧門，西通中路有左嘉會門（到宣明門以內），直北有昭慶門，再北為宮城北牆。應天門西為右掖門，隔一間院子，東通中路有右嘉會門（到宣明門以內），靠西有長方形水池，西北有蓬萊閣，再北到宮城北牆。會通門以東還有太后所居的壽康宮及太子所居東宮，圖中未畫出。

特別需要指出的是，金本無宗廟，到建設中都時，才在千步廊之東建設太廟，標名為衍慶宮（《日下舊聞考》卷二十九引《金圖經》）。這個衍慶宮實際上類似原廟。《金史·禮志》載：天德四年於燕京建原廟，名其宮曰衍慶，殿曰聖武，閣曰崇聖。大定十七年在聖武殿以西起建世祖神御殿，聖武殿以東起建太宗、睿宗神御殿。大定二十一年又將許多祖先御容奉安到崇聖閣和燕昌

閣。另外建有大聖安寺，寺中有金世宗、章宗二像，亦有原廟性質，明中統以後改名普濟，地點在今右安門內南橫街西口（《日下舊聞考》卷六十）。金從天德以後，有南北郊和祭日月的禮制，設南郊壇於豐宜門外，北郊方丘於通玄門外，朝日壇（壇名大明）於施仁門外，夕月壇（壇名夜明）於彰義門外。大定七年又建社稷二壇。

金中都外郭城，西南和西北二隅有四十二坊，東南和東北二隅有二十坊。《元一統志》（《日下舊聞考》卷三十七引）僅留有六十二坊的坊名，方位和界至大多不可考。以寺院所在的坊和現存寺院推考，大萬安寺原為唐天王寺，即今天寧寺，在廣安門外，當為延慶坊；都土地廟在今土地廟斜街，當為奉先坊，歸義廢寺在今彰義門大街北，當為時和坊（《日下舊聞考》卷三十七）。大萬安寺正當皇城正北。根據考古調查，金中都中原屬遼南京城範圍內的街道，仍保存唐代街坊形式，金代新擴展部分，已改變為沿大街兩側平行排列坊巷的形式。

據宋使許亢宗《使金行程錄》（《日下舊聞考》卷一四六引），“城北有市，陸海百貨萃於其中”。據《析津志》，大悲閣即聖恩寺（遼聖宗改名為聖恩寺），“在南城舊市中”（北京圖書館善本組輯《析津志輯佚·寺觀》第68頁），南城即指金中都。大悲閣一帶原是熱鬧的街市，在今宣武門外下斜街南口，直到元代這一帶仍有南城市、蒸餅市等（《析津志輯佚·城池街市》第6頁）。說明金中都中部偏東南地方也有街市。而且當時在大悲閣附近已有密集的住戶。據《金史·五行志》記載，大安三年（公元1211年）“三月戊午大悲閣災，延燒萬餘家，火五日不絕”。

金中都也有如北宋汴京那樣大的行市如馬市之類。《析津志》記載有馬市的三靈侯廟，“在南城天寶宮近西”，“南舊市之

南”，其中有金大定廿七年劉文中所撰碑記：

……而今馬市之平，皆人人善相善馭，豈非如良（王良）、采（伯樂）耶？總成人之交易，莫不以平爲心，而雖有賣欲貴、買欲賤者，皆取於一二言之定矣。不如是，以二百廿餘人，家計口算不爲少矣，皆不耕不蠶，而取給乎衣食於是；非神默祐，焉能得搖唇鼓舌各取給歟？或者曰：“我曹實賴神佑，舊市之南有神宇焉，乃三靈侯之別廟，實我曹從來祭祀之所也（之字原缺，今以意補），奈何歲月綿邈，風雨侵頹，土木壞裂，神將不堪居之。……”衆聞而忻躍，同一心力，度費出，合謀而新之，規革仍舊之制，不日告成。……故以二百廿餘人，結爲香紙之邑，欲以附之於石，傳聞於後。以武功將軍房興，爲邑老提點，一日來予，懇懇求文，願記其事。予嘉其用心，遂撫其實，以奮其筆而勒諸石。……（《析津志輯佚·祠廟》第57—58頁）

北宋汴京和南宋臨安的各種行市，都有他們的宗教信仰，參與各種迎神賽會和舉行奉獻的祭祀活動。金中都有些行市還有他們特定奉供的神廟。這所三靈侯廟，就是馬市供奉的特定的神廟。所謂“結爲香紙之邑”，就是結合爲神社。地點在舊市之南，也該在大悲閣附近。由此可知，此地馬市的規模要比汴京還大，工作人員多到二百二十多人，二百二十多家的生活都取給於此。他們的工作，不是別的，只是在馬市“賣欲貴、買欲賤”的交易談判中，“搖唇鼓舌”地加以說合，使得雙方“皆取於一二言之定矣”。他們認爲，他們之所以能做好這點，求得“馬市之平”，是由於“神佑”。北宋汴京的馬市設有酒樓，作爲行頭的駐在地，並用作看驗商品、交易談判、簽訂契約的地方。估計金中的馬市，除設有三靈侯廟以外，還有大建築作爲二百二十多人接待買賣雙方談判訂約之處。碑文中提到的“以武功將軍房興爲邑老提點”，這個擔任“邑老提點”的房興當即行老，亦即行頭。他們所以要請

這樣一位武功將軍作為行頭，可能因為此處馬市的交易十分興旺，非有權威人士不足以控制。當年金中都的市上，酒樓是不少的。《析津志》說：“崇義樓、縣角樓、攬霧樓、遇仙樓，以上俱在南城，酒樓也，今多廢。”（《析津志輯佚·古蹟》第107頁）

金中都的水源，主要依靠城西北小湖流出的小河，即《水經注》所說的西湖和洗馬溝，今稱蓮花池。小河從西北入城，流經皇城西邊而向東南出城，城內西北和東南所以有繁榮的街市，當因這條小河流經該地區。金的漕糧主要來自華北平原，要先匯集到直沽（今天津）一帶，經潞水（今白河）逆流運到通州，再由通州轉運到中都。當時曾從東北郊外的高粱河中游，引水東到通州，沿渠築閘積水以濟漕運，稱為閘河，但因水量不足，常依靠陸運，耗費很大。

金世宗於大定十九年在東北郊外高粱河水系的湖泊地帶，以瓊華島為中心，興建離宮，稱為大寧宮，後改稱壽安宮、萬寧宮。金章宗又曾有所增建。金這樣對高粱河水系的利用，對元代有深遠影響。後來元大都的設計和建設，就選定此地為宮城中心，從而作出整個大都的設計規劃。

① 參見《內蒙古文物考古工作三十年》（《文物參古工作三十年》78頁）與同濟大學城市規劃教研室編《中國城市建設史》第58頁（中國建築工業出版社1982年出版）。

② 參見遼中京發掘委員會《遼中京城址發掘的重要收獲》，《文物》1961年第9期。

③ 參見日本村田治郎《金上京會寧府城的遺跡》，收入村田治郎《中國帝都》，日本綜藝舍1981年出版。

- ④ 黑龍江省文物考古工作隊：《從出土文物看黑龍江地區的金代社會》，《文物》1977年第4期。
- ⑤ 閻文儒《金中都》，《文物》1959年第9期。
- ⑥ 范成大《攬轡錄》說：“至東御廊首，轉北循簷行，幾二百間，分三節，每節一門。東出第一門通街，第二門通毬場，第三門太廟，中有樓。”這段記載與《大金國志》所說“廊之半，各有偏門”不同，與樓鑰所說“廊有三路貫其中”也不合，當有錯誤。太廟在中路，所說“第三門太廟”，也有誤。所說“中有樓”，可能是誤認文武樓是太廟的樓。

六 元大都和明清北京佈局結構的變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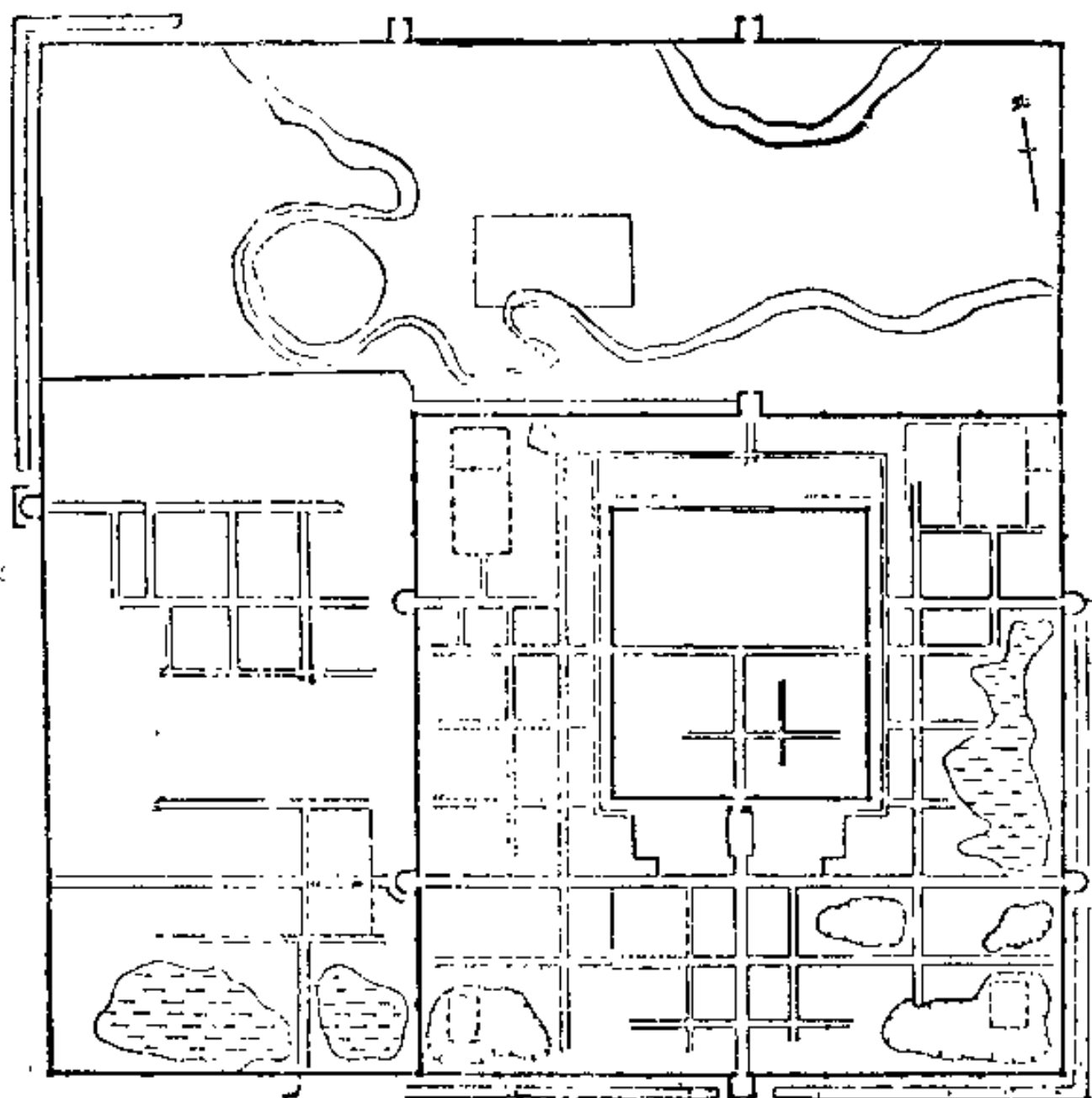
(一) 元上都的特殊結構

元上都是元代第一個有計劃建設的都城，對此後元大都的規劃有一定的影響。元上都遺址在今內蒙古自治區多倫以北八十里，灤河上游閃電河的北岸，至今遺址保存得比較完好，當地居民用蒙古語稱爲“兆乃曼蘇默”，意即“一百零八廟”。此處元代初年是蒙古札刺兒部兀魯郡王的營幕地，元憲宗（蒙哥汗）五年（公元1255年）命忽必烈（憲宗之弟）居其地，成爲巨鎮。次年忽必烈命漢人劉秉忠設計築城。憲宗于九年去世，次年忽必烈在此地即大汗位，建元中統，即元世祖，稱此地爲開平府。後來元大都建成，中統四年改開平府爲上都，亦稱上京、灤京，元世祖遷大都後，每年四、五月到八、九月間來此居住，此後元代皇帝相沿成爲定制，因而上都具有避暑的離宮性質。劉秉忠原爲僧，名子聰，很得世祖的重用，除主持建設上都和大都以外，所有章服、朝儀、俸祿、官制，“皆自秉忠發之，爲一代成憲”（《元史·劉秉忠傳》）。

1 元上都的外城

元上都是一個特殊的都城結構，分爲外城、內城、宮城三部分，整個結構以包有宮城的內城爲主體。內城佔有全城的東南大部分，建築要比外城堅固。外城僅僅附加於內城的西北兩面，

而且外城的北部是御園所在，也還是內城的附屬部分（參看圖75）。



- | | | |
|--|--|---|
| <p>圖例</p> <u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 城牆 — 街道 — 宮城外牆 — 上牆 — 大院牆 | <u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 建築群院牆 — 小房屋遺跡 — 建築遺跡 — 低地 — 池塘 — 城濠 | <u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 平時積水點 — 廣場 — 石礎 — 土山 — 石牆基 <p>比例：1：5000</p> |
|--|--|---|

圖75 元上都結構圖

（採自賈洲傑《元上都調查報告》，《文物》1977年第5期）

外城的四面城牆，全用黃土板築而成，西北兩面各長2,200米，東南兩面只長800米，和內城各長1,400米的東南兩牆接連，便合成四面各2,200米的正方形。城牆現高約5米，下寬10米，上寬2米。南牆和西牆各開一門，門前築有馬蹄形甕城。北牆開有二門，門前有方形甕城。原來都有城門樓，現在部分城門樓還保留有石柱礎。四面原來築有城壕，現在外城西北角和內城的南面及東南角還保留有護城河，寬約25米。外城從西門北側城牆起，築有一條東西向的隔牆，寬約2米，直到內城北牆中間的北門甕城，將外城隔成不能相通的南北兩部分。外城北部，主要是個東西向的山崗，沒有街道，僅東南角平坡上有一個東向的院落遺址，北門以內和東北角靠北牆有少數小型建築遺址。山崗中部南邊有一座長方形的石砌大圍牆，東西寬350米，南北長200米，南牆正中有院門。這一帶當即文獻上所說御園所在。馬可波羅及元代文人所說的棕毛殿（即竹宮）也該造在這一帶。棕毛殿高達百尺，廣可容數千人，有金漆纏龍的竹柱，並以劈竹塗金的竹瓦蓋頂。很明顯，這是個特別設計佈置的皇室避暑勝地。

外城南部有街道和居民遺址。西門內有三條東西向的大街，中間一條通向北門；南門以東約20米有一條南北向的大街，和三條東西向的大街交叉，中間一條東西向大街通向南門。這裏當即街市所在。外城的南門兩側有兩個大池塘，用途不明。

2 元上都的內城和宮城

內城處於全城的東南隅，正方形，每邊1,400米。南北兩牆中開一門，門前有方形甕城；東西兩牆各開二門，門前有馬蹄形甕城。城牆用黃土板築，外包石塊砌一層，厚約70釐米。牆身下

寬12米，上寬2.5米，殘高6米。牆外每隔約150米築有馬面，四角有高大角樓，今存臺基。宮城在內城的北部中間。內城以內，以宮城為中心，東、西、南三面有對稱的縱橫街道。從宮城南門到內城南門，有南北向的街寬25米，是內城的中軸綫。宮城南門以南有較寬闊的廣場，廣場以南有寬15米的東西向大街，通向內城東西兩牆的南門。宮城東西兩側也還有大街通向內城東西兩牆的北門。內城有許多官署和寺院，大的寺廟設在城的四角。東南角有孔子廟，現有前後兩殿遺址，外有圍牆，西北又連一個小院落。西南角有華嚴寺。西北角又有乾元寺，遺址分前後兩院，南北長240米，東西寬120米。東北角有大龍光華嚴寺，遺址南北長200米，東西寬400米，以中院為主體，以大殿為中心，分為東、中、西三院，中院寬148米，東院寬60米，西院寬120米^①。上都的寺院中每多供奉已故元代皇帝的遺像，每年六月大都要遣翰林院官一員，“赴上都注香”（《析津志輯佚·歲紀》第220頁）。

宮城在內城北部正中，東西寬約570米，南北長約620米。城牆用黃土板築，外包磚砌一層。外層從地基起，先鋪一層0.5米厚的石條，然後以青磚橫豎交替砌起，在青磚層與土牆之間夾有一層厚1.4米的殘磚。牆高約5米，下寬10米，上寬2.5米。宮城四角建有角樓。宮城僅有三門，南為陽德門，東西為東、西華門，北面無門。宮城南門原來有雙重，現南門前面還留有建築臺基。宮城外24米，圍有寬約1.5米的石砌夾城，現存牆基。沿夾城外圍有環城的街道。宮城以內有通向東、西、南三門的“丁”字形大街，另外在東南部有十字形交叉的街。宮城靠北牆正中有矩形宮殿基址，東西寬150米，南北長45.5米，基址南面兩側各有向前突出的方形部分，當是宮殿羣中的主體建築（參考圖76）。在這座宮殿以南，散佈有許多組建築，每組建築都有圍牆，多數為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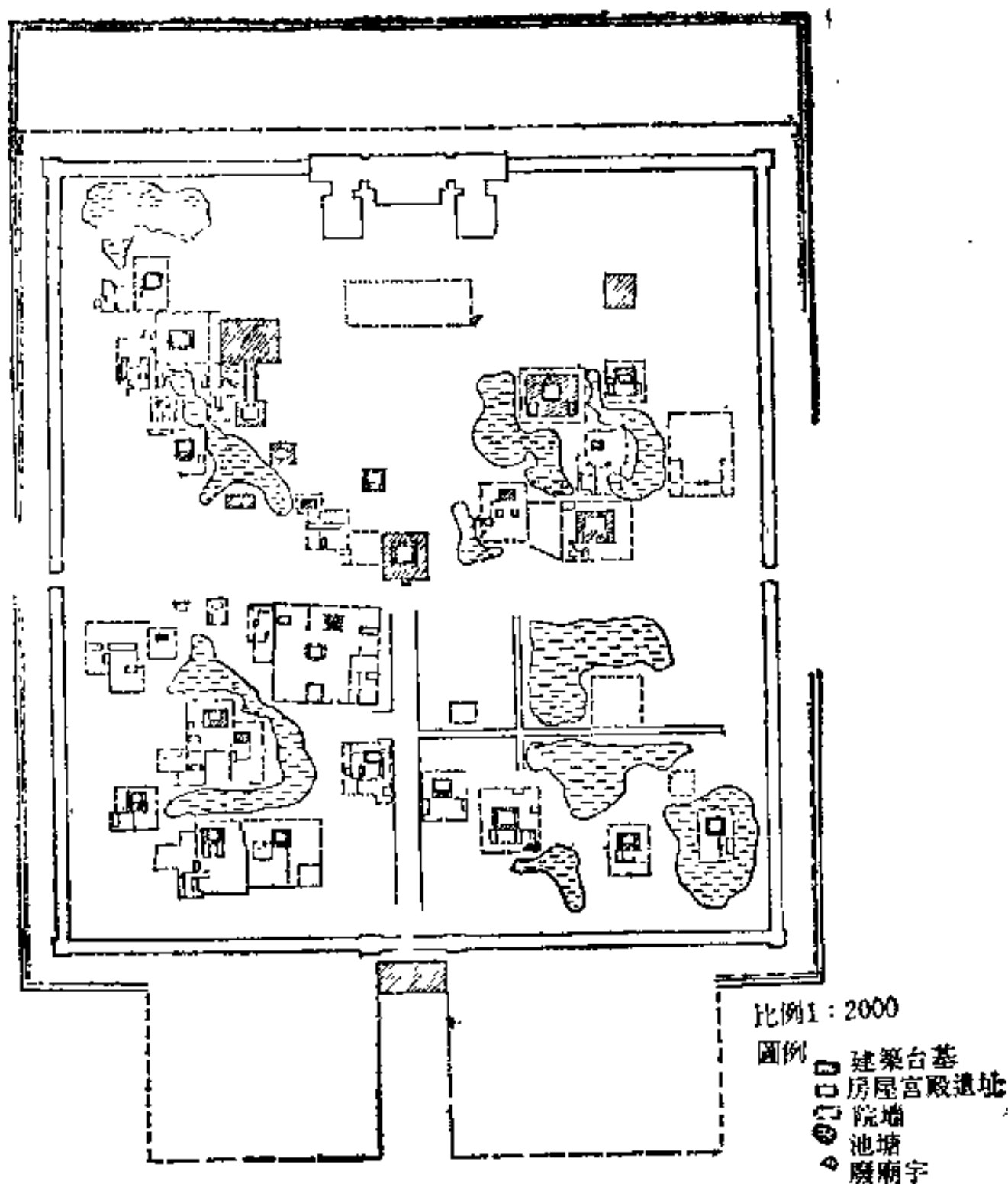


圖76 元上都宮城宮殿平面圖

(採自《元上都調查報告》，《文物》1977年第5期)

中有一殿和兩廂的“品”字形結構。僅見西北角一組，前後兩殿，中有廊道，成爲“工”字形結構。其中有些建築是從汴京拆遷來的，最著的如皇帝經常登臨問政的大安閣，便是至元三年（公元1266年）拆遷汴京的熙春閣改建而成。虞集《跋大安閣圖》（收入所著

《道園學古錄》)曾談到這點。《析津志》說：“上都大安閣及宋汴京熙春閣，我元置於灤(按即指上都)之湫潭之上。至正年間今上(即元順帝)新蓋穆清閣，與大安相對，閣之西陞俱有殿，特出層霄，冠於前古。下亦三面別有殿。北有山子殿，上位每於中秋於此閣燕賞樂，如環珮隱隱然在九霄之上，着意聽之，杳不可得，是為天下第一勝景。蓋其地勢抱皇城，締構非凡故耳。”據此可知元上都宮殿樓閣的建築，主要是供皇帝遊覽之用，此地屬於避暑的離宮性質，十分明顯。《析津志》又說：“八月，灤京太史涓日吉，於中秋前後灑馬奶子，此節宮庭勝賞，有國制。是時紫菊金蓮盛開，則內家行在，俱有思歸之意。”(《析津志輯佚·風俗》第205頁)就是說，經過中秋節以後，避暑到上都的皇室貴族就準備回大都了。元朝皇帝從上都回到大都，進西北健德門，經中心臺前經馳道(即中軸綫)南下，經萬寧橋(即海子橋)入蕭牆厚載紅門，穿御苑入厚載門入宮，有迎駕的儀式。“是日都城(即大都)添大小衙門、官人、娘子以至於隨從、諸色人等，數十萬衆。”(《析津志輯佚·歲紀》第222頁)此亦說明元上都有避暑離宮的性質。

(二) 元大都的設計規劃和 “坐南朝北”的佈局

元大都就是明清北京城的前身，在我國都城建築史上具有重要的地位。當成吉思汗十年(公元1215年)，即金遷都汴京的第二年，蒙古軍隊攻佔金中都的時候，蒙古統治者還無意在此建都，金中都的宮室全被焚毀。元世祖忽必烈在至元元年(公元1264年)，從劉秉忠等人建議，決定建都燕京，仍稱此地為中都大興府。到至元四年，進一步決定放棄金中都舊城，以舊城東北

郊外原來金建有離宮(大寧宮)的湖泊地帶為中心,重新設計建設新都,受命主持規劃的就是主持建設上都的劉秉忠。到至元八年改稱中都為大都,並正式以元為國號,而將金中都舊城稱為南城(參看圖77)。元大都從至元四年正月開始興建宮城,八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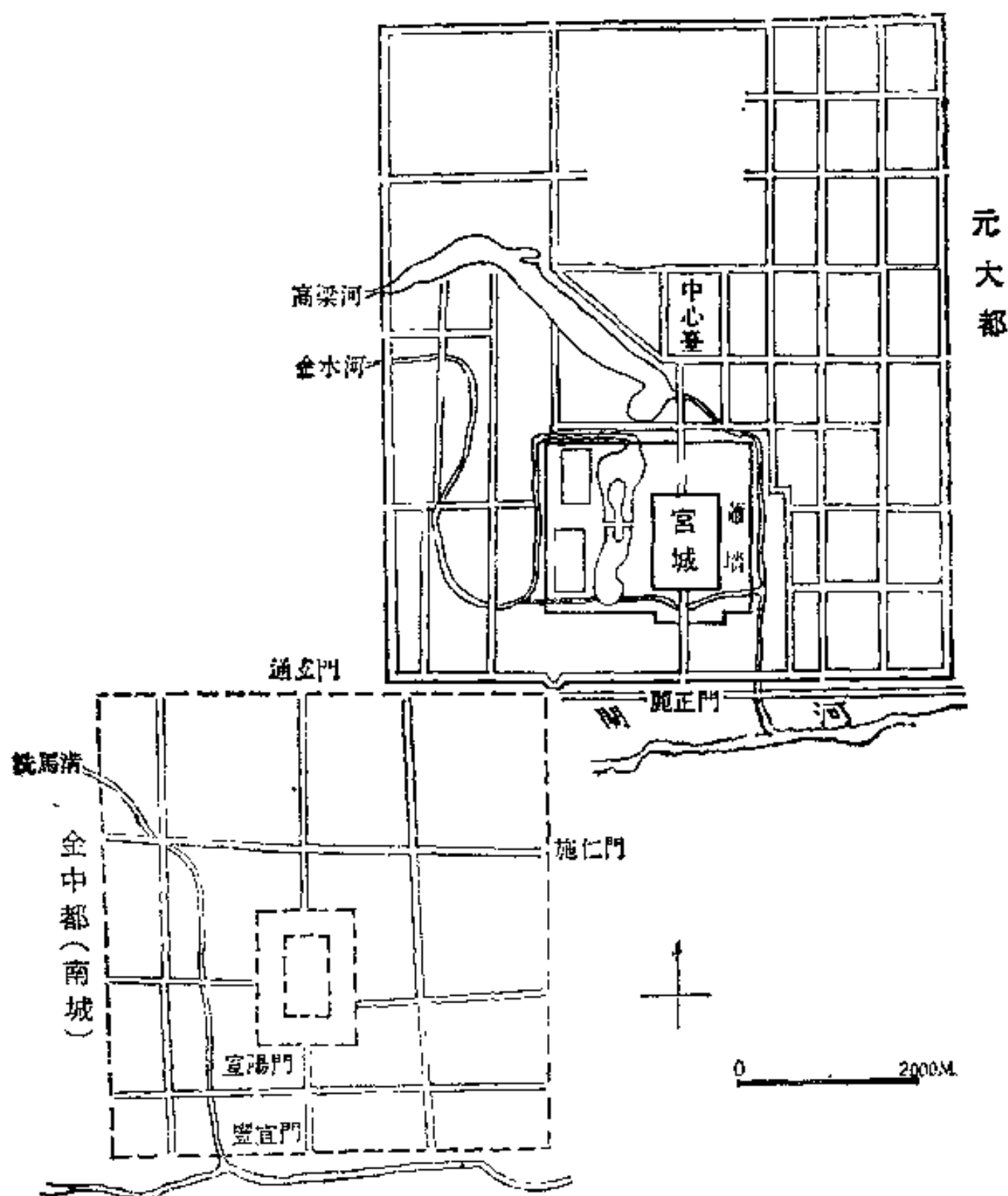


圖77 元大都與金中都(元代稱為南城)位置圖

始建大內，十年建成正殿和寢殿，十一年正月宮闈全部築成，到二十七年六月發侍衛兵萬人才修完大都城，前後歷時二十四年之久。

1 大內(宮城)方位的選定

元大都的設計規劃是“井井有序”的。虞集《大都城隍廟碑》說：“至元四年，歲在丁卯，以正月丁未之吉，始城大都，立朝廷、宗廟、社稷、官府、庫庾，以居兆民，辨方正位，井井有序，以爲子孫萬世帝王之業。”（《日下舊聞考》卷五十引）元大都確是經過“辨方正位”而“井井有序”地進行建設的，其重點在於確定朝廷、宗廟、社稷、官府、庫庾的方位，其中尤以朝廷宗廟最爲重要。所以《元史·劉秉忠傳》說：“命築中都城（按即大都），始建宗廟宮室。”《析津志》也說：“至元四年二月己丑，始於燕京東北隅，辨方位，設邦建都，以爲天下本。四月甲子，築內皇城位置，公定方隅；始於新都鳳池坊北立中書省。其地高爽，古木層蔭，與公府相爲樾蔭，規模宏敞壯麗，莫安以新都之位，置居都堂於紫薇垣。”（《析津志輯佚·朝堂公宇》第8頁）又說：“至元四年世祖皇帝築新城，命太保劉秉忠辨方位，得省基，在今鳳池坊之北，以城制地，分紀於紫薇垣之次。”（同上書第32頁）更說：“其內外城制，與宮室、公府，並係聖裁，與劉秉忠率按地理經緯，以王氣爲主。”（同上書第33頁）所謂“內皇城”或“內城”，都是指大內或宮城。所說“築內皇城位置”，就是確定宮城的位置在太液池以東地方。所說“立中書省”，就是確定北中書省的位置在後來劃定爲鳳池坊以北地方。據《析津志》和《元一統志》，鳳池坊近海子（即積水潭），在海子東北斜街以北，即今什剎海以北地方。北中書省在鐘樓之東，鼓樓之北。宮城和北中書省是劉秉忠設計大都時最早確

定的位置。所說“置居都堂於紫微垣”，“分紀於紫微垣之次”，就是把中書省比作紫微垣星，把中書省安置在紫微垣星的位置上。可知他首先把中書省和宮城的方位確定，有其特殊的重要用意。

與此同時，更重要的就是確定了全城中軸綫的位置。《析津志》又說：“世祖建都之時，問於劉太保秉忠定大內方向，秉忠以今麗正門外第三橋南一樹為向以對，上制可，遂封為獨樹將軍，賜以金牌。每元會、聖節及元宵三夕，於樹身掛諸色花燈於上，高低照耀，遠望若火龍下降。樹旁諸市人數，發賣諸般米甜食、餅餠、棗麵糕之屬，酒肉茶湯無不精備，遊人至此忘返。此景莫盛於武宗、仁宗之朝。”（《析津志輯佚·歲紀》第213頁）這是說，劉秉忠確定以麗正門外第三橋南一樹，作大內南門（即崇天門）對準的方向，因而這棵大樹被封獨樹將軍，每逢盛大節日都要在這樹上掛滿諸色花燈。這樣以大內南門對準外城南門外大樹，就確定了全城中軸綫的位置，也就使得宮城的中心位於全城的中軸綫之上，從而突出大都以宮城為中心的格局。

2 中心臺位置的選定和“坐南朝北”佈局的形成

在元大都設計規劃中，最重要的就是中心臺位置的選定。《析津志》說：“中心臺，在中心閣西十五步，其臺方幅一畝，以牆繚繞，正南有石碑，刻曰中心之臺，實都中東南西北四方之中也。在原廟之前。”（《析津志輯佚·古蹟》第104頁）這所原廟，就是後來元成宗所建的大天壽萬寧寺。在都城的設計建設中，建立中心臺作為全城中心點的標記，是元大都首創的。這個中心臺所以要在正南建立的石碑上刻曰中心之臺，因為這是全城南北向中軸綫的終點。這塊石碑所在之點正是向南對準麗正門外第三橋南一樹的一條南北向的直綫，即貫通全城的中軸綫。這條中

軸綫，從外城南門麗正門開始，經過蕭牆南門靈星門、宮城南門崇天門，穿過宮城，出宮城北門厚載門，蕭牆北門厚載紅門，經萬寧橋（即海子橋）而直到中心臺。於是全城的重要建築物都可以按照中軸綫來安排，有的安排在中軸綫的左右，有的就安排在中軸綫上^②（參看圖78）。

中心臺位置的選定，不僅可以由此確定全城中軸綫的方向和位置，而且可以由此確定對稱的東西南北四面城牆的方位，還可以確定東西兩面城牆正中城門（即東面崇仁門和西面和義門）的位置，又可以制定從中心臺向東通到崇仁門的橫街的位置，使得作為中軸綫的南北向大街和這條橫街成為“丁”字形交叉。

元大都之所以要選定金代建有離宮（大寧宮）的湖泊地帶作為全城的中心，選定宮城位置在太液池以東地區，選定中心臺在太液池上游稱為積水潭（今什剎海）的大湖的東北地方，不僅是為了取得豐沛的水源和解決漕運的困難，更重要的是為了適應都市經濟發展的新形勢，適應新興日用商品行市發展的需要，適應衆多都城居民日常生活必需品供應的需要^③。回顧一下北宋和南宋的情況。北宋汴京之所以能夠成為商業發達、經濟繁榮、人口衆多的都城，就是由於疏通了東南汴河，加強了和南北大運河的聯繫，使水上運輸事業得到大擴展。由此而形成了沿汴河和四周城門內外許多日用商品新行市的興旺，沿河近橋和城中心新街市的發展，都城中各種日用物資的作坊的擴展，各種新行市之間協作以及都城中各種商業和全國各地聯繫的加強，以至全國性市場的形成。南宋臨安之所以能夠成為十分繁華的都城，同樣是由於疏通了城中大河和城西北運河的聯繫，從而形成水上運輸事業的進一步發展，各種新行市和新街市在沿河近橋、四周城門和城中心的進一步繁榮，全國性市場的進一步的擴大。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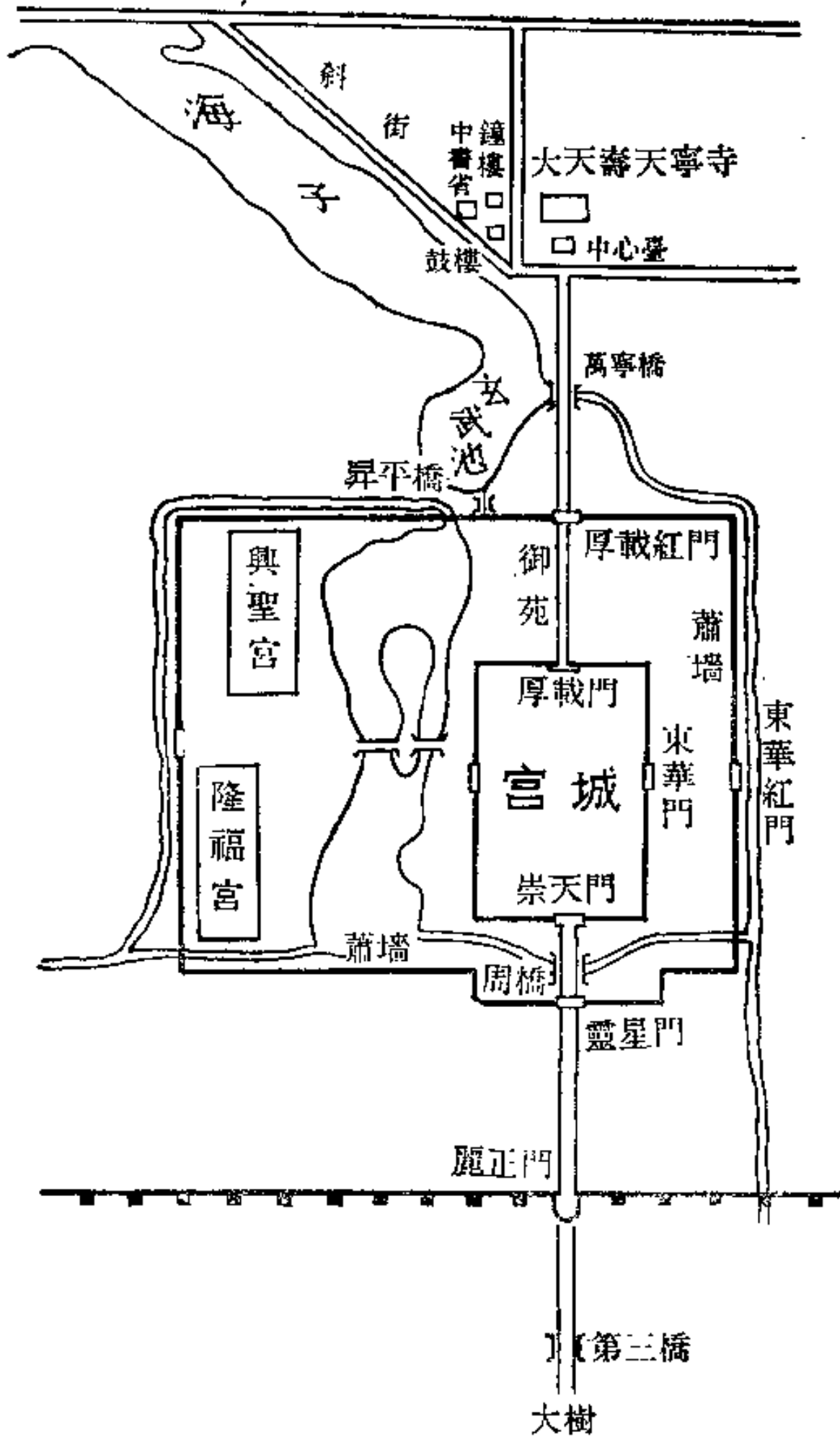


圖78 元大都中軸線示意圖

中都與之對比，就差得多，原因就在於沒有爲日用品新行市和新街市的發展創造有利條件。元大都的設計規劃者是看到這點的。大都的設計規劃者從水源及都市經濟發展的需要出發，把城中心選定在積水潭東北地方，把官城選定在太液池以東地區，其結果就使大都形成坐南向北的，如同南宋臨安一樣的佈局。大都西北的健德門是通向北方的重要門戶。健德門外十里建有接官亭，稱爲禮賢亭，用來迎送北來官員（《析津志輯佚·古蹟》第105頁）。皇帝每年四五月間車駕幸上都，八九月間車駕還大都，都是由從西北健德門經過中心臺以南，通向蕭牆北門厚載紅門的馳道（即中軸綫）而進出宮城的。

3 城中部鐘鼓樓的建設

金中都在皇城的東西長廊南端的東西兩側，建有文樓和武樓，即鐘樓和鼓樓，金又在汴京城中部州橋稍北建有文武樓（楊奐《汴故宮記》，見《元文類》卷二十七）。元大都沿用這種制度，在城中部建有鐘鼓樓。鼓樓，或稱更鼓譙樓，正名爲齊政樓，用《尚書·堯典》“璇璣玉衡，以齊七政”之義。大都鼓樓在中心閣稍西，樓上設有壺漏、鼓角，樓下有三門。《析津志》說：“此樓（指鼓樓）正居都城之中。”實際上並不在城的正中，而是位於中部的略偏西處。鐘樓在北中書省之東，鼓樓之北，至元年間建造，“閣四阿，簷三重，懸鐘於上，聲遠愈聞之”（《析津志輯佚·古蹟》第108頁）。馬可波羅在游記中特別提到大都的鐘樓：“城之中央有一極大宮殿，中懸大鐘一口，夜間若鳴鐘三下，則禁止人行。鳴鐘以後，除產婦或病人之需要外，無人敢通行道中。縱許行者，亦須攜燈火而出”（馮承鈞譯《馬可波羅行記》第二卷第八十三章）。

唐代長安原有街鼓制度，入晚街鼓打動後實行宵禁，坊門緊閉，街上禁止通行，除非產婦或病人帶有證件者。自從北宋汴京准許開放夜市後，街鼓制度被取消，街上通宵可行，每日清晨靠寺院行者打鐵牌子或敲木魚沿門報曉。南宋臨安也是這樣，靠寺院鳴鐘或行者沿街報曉。金在中都、汴京設文武樓，元大都更在城中設置規模較大的鐘鼓樓，作為早晚報時並禁止夜間街上通行的信號，後來這種制度就在許多城中推行。

（三）元大都運輸水道和宮苑用水道的疏通

1 通惠河的開鑿

元世祖任用太保劉秉忠設計建設大都，選定積水潭東北作為全城中心，是為為了便於開鑿都城中水上運輸通道，以適應漕運以及日用必需商品運入的需要，特別是為了適應都市經濟發展的新形勢和日益興旺的日用品行市的新需要。積水潭原是高粱河上較大的湖泊，要利用它作為大都城中水上交通的中心，首先必須把積水潭的水引向東南，使與城東南金代所開的閘河接通。原來此地的漕糧和日用物資，主要依靠長江下游，通過南北大運河先運到通州，然後再從通州轉運到此地。金代所開閘河，就是從高粱河中游引水東到通州，沿渠築閘節水，以濟漕運的。

大都建設時，為了把積水潭和城東南的閘河接通，在從中心臺到蕭牆北門厚載紅門間的南北向馳道（即中軸綫）上興建橋梁——萬寧橋（即海子橋，地點在今地安門外大街上的石橋），引積水潭水從橋下向東流出，繼而南轉，沿蕭牆的東牆直綫南下，出外城麗正門東的南水門，轉向東南到文明門外文明橋下，與閘河接通，成為後來命名為通惠河的一段，也就是《析津志》所說：

“蓬萊坊西，水自樞密橋，下南薰橋、流化橋，出南水門外，入哈達門（按即文明門）南文明橋下”（《析津志輯佚·河閘橋梁》第95頁）。這裏所說的三座橋，都是蕭牆東牆外橫跨這條新開河道上的橋。這條新開河道是比較寬闊的，使大船能夠從城東南的閘河進入到城中積水潭中。據實測，蕭牆東北角的河道寬度達27.5米^④。

但是積水潭以高粱河為水源，流量不夠充足。為了增加水源，進一步疏通航運，都水監郭守敬於至元二十八年（公元1291年）提出開鑿新閘河的規劃，次年春動工，到至元三十年秋鑿成。新閘河從城西北六十里外的神山（今鳳凰山）下，引白浮泉（在昌平縣浮村）西行，沿西山山麓會合了雙塔、榆河、一畝泉、玉泉等泉流，並開渠作堰，稱為白浮堰，導入甕山泊（今昆明湖），經由和義門北水關進入城中，注入積水潭，連同上述從積水潭向東南流出外城麗正門的一段，接通舊閘河，到通州入白河，全長164里104步，命名為通惠河。由於通惠河的開鑿成功，新水源的取得，積水潭便成為大都城中水上交通中心。當至元三十年秋建成時，元世祖從上都歸來，過積水潭，“見舳艫蔽水，大悅”（《元史·郭守敬傳》），當時不但漕運可以直達積水潭，而且大量運輸日用商品的船隻也可以會集到積水潭，因而積水潭東北的城中心區，如斜街、鐘樓街一帶，便成為商業最發達的地段。

2 金水河的開鑿

金水河的開鑿，是為宮苑用水的需要，所以又稱御溝水，它是和宮苑同時建設完成的。從西郊玉泉山下引水，從和義門南約120多米處的南水關入城，東行到北溝沿（金水河的殘迹）曲折南下，到近蕭牆西南角的地方，向東分成兩支。北面一支折而北

行，沿蕭牆西牆北上，繞過蕭牆東北角而沿牆東行，折而向南，注入蕭牆中間的太液池的北端（今北海）。這樣不僅增加了太液池的水源，而且成爲蕭牆西牆和北牆西半段的城壕，正與從積水潭引水沿蕭牆東牆南下的新開河相配合，使得蕭牆東西兩面都有了護城河。南面一支正東前進，進入蕭牆西南角，經隆福宮前，注入太液池（今中海）的西南角，然後又從太液池的東南角東出，橫經宮城前面，穿過宮城南門崇天門前的周橋下，一直向東，出蕭牆東南角，與東牆外沿牆南下的新開河（即通惠河的一段）交匯。

《析津志》說：“金水河流入燕城，即御溝水也。入南葫蘆套，盛雜（植）蓮花，復流轉入周橋。”（《析津志輯佚·屬縣》第243頁）葫蘆套是城內西南地區的著名苑囿，說明金水河曾曲折流到城內西南部，再向東流轉。《析津志》又說：“馬市橋，水自東流入咸宜坊，西至褰八總管府橋、順城（承）門石橋，轉東隆福宮橋，流入太液池，流出周橋右。水自西北來，而轉東至周橋，出東二紅門，與光祿寺橋下水相合流出城。”（《析津志輯佚·河閘橋梁》第100—101頁）這裏講的是金水河南面一支，說明這一支曾向南曲折流到順承門附近，直到順承門石橋，咸宜坊也在順承門裏倒鈔庫北。它轉折向東，經過隆福宮橋，流入太液池，再從太液池東到周橋。所說“出東二紅門”，當是出蕭牆東牆的一個城門，所說光祿寺橋，當即通明橋，在光祿寺西，金水河就是在此與沿東牆南下的新開河（即通惠河的一段）交匯的。

大都金水河的開鑿，是仿效北宋汴京的，二者同樣是從西面引水進入宮苑。五行於西方屬金，因稱金水河。不僅水名相同，所用開鑿引水的方法也相同。汴京的金水河是從汴河上架渡槽從西北水門入城的，大都的金水河所經的運石大河及高粱河、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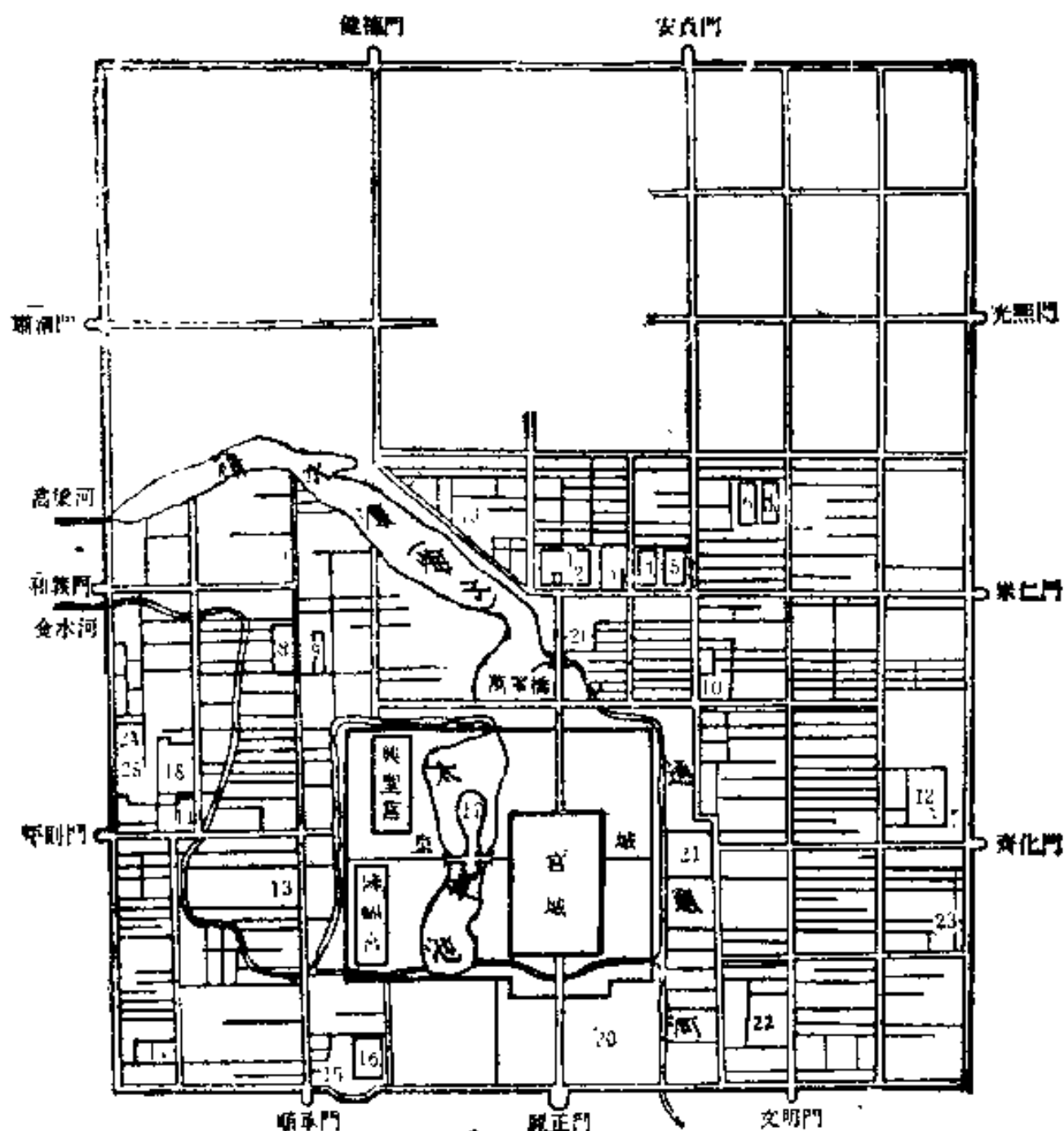
河，也“俱有跨河跳槽”（《元史·河渠志》引至正二十九年二月中書右丞相馬速忽等言）。這條金水河不僅供給宮中用水，還用於點綴風景，曾引進到太液池中的瓊華島上，汲水到山頂，經石龍口噴出。同時海子（積水潭）的水還曾引進到宮城以北的御苑，御苑東部建有水碾。

（四）元大都三套方城的結構

1 外城的結構形制

元大都共有三套方城，即外城、蕭牆和宮城。外城呈南北較長的長方形，史稱“城方六十里”（《元史·地理志》、《南村輟耕錄》卷二十一“宮闕制度”），據實測，周圍約28,600米，大體和記載相合。東西寬6,700米，南北長7,600米。北面城牆和東西兩面城牆北段，還保存有遺迹，即今北京北郊所謂“土城”。南面城牆在今東、西長安街的南側，其西段環繞海雲、可庵雙塔的地點，爲了將它們圈進城內，稍向外彎曲。東面城牆南門齊化門（今朝陽門）外以北因有不少大小泡子，城牆稍向內收，齊化門位置也略向南移，與西面城牆相對的平則門微有參差。外城共有城門十一座，北面兩座，東、西、南三面各三座。城外繞有城壕，四角都有巨大的角樓。東城牆，北爲光熙門（今和平里東，俗呼廣熙門），中爲崇仁門（今東直門），南爲齊化門（今朝陽門）；南城牆，東爲文明門（今東單南，又稱哈達門），中爲麗正門（今天安門南），西爲順承門（今西單南）；西城牆，北爲肅清門（今學院南路西端，俗稱小西門），中爲和義門（今西直門），南爲平則門（今阜成門）；北城牆，東爲安貞門（今安定門小關），西爲健德門（今德勝門小關）。城牆全用夯土築成，基部寬24米。城門外築有甕城，造有吊橋。

甕城爲元代末年加造。麗正門“門有三，正中惟車駕幸郊壇則開。西一門亦不開，止東一門以通車馬往來”（《析津志輯佚·城池街市》第2頁）（參看圖79）。



- 圖例 ——— 大街 ——— 胡同 ——— 城垣 ——— 河流
- 1——大天壽萬壽寺；2——中心閣；3——武庫；4——巡警二院；5——大都路總管府；
 6——國子監；7——孔廟；8——大承天宮；9——崇國寺；10——太和宮；11——大聖壽萬安寺（白塔寺）；12——太廟；13——萬松老人塔；14——城隍廟；15——海雲、可庵
 双塔；16——大覺壽寺；17——琼華島；18——社稷壇；19——北中書省；20——內中書省；
 21——福源院；22——御史臺；23——禮部；24——大天壽延聖寺（黑塔寺）；25——大水羅
 寺（青塔寺）；26——也里可溫十字寺；

圖79 元大都佈局結構圖

（依據《元大都的勘查和發掘》，《考古》1972年第1期，略有增補）

2 宮城和蕭牆的佈局

宮城周圍九里三十步，東西四百八十步，南北六百十五步，高三十五尺，至元八年(公元1271年)八月動工，次年三月完成(陶宗儀《南村輟耕錄》卷二十一“宮闕制度”)。按陶氏“里二百四十步”的說明，9里30步，合2,190步，與東西、南北步數的兩倍的和數正相合。明代洪武元年(公元1368年)大將軍徐達遣指揮張煥計度故元皇城，周圍一千二十六丈，比《輟耕錄》所記少六十九丈^⑤，可能所用尺度有出入。據實測宮城南北長約1,000米，東西寬約740米，與《輟耕錄》所記步數大體相符。宮城共有六門，正南爲崇天門，闕十一間，五個門道，高八十五尺。崇天之左爲星拱門，右爲雲從門，各闕三間，一門，高五十尺。東西兩面爲東華門和西華門，各闕七間，三門，高八十尺。北爲厚載門，闕五間，一門，高八十尺。四角有角樓。宮城南面有宿衛直廬，是防守駐軍之處。宮城以北爲御苑。

宮城之西有太液池，太液池以西，北爲興聖宮，南爲隆福宮。在宮城、御苑、太液池和興聖宮、隆福宮的周圍，築有東西較寬的長方形圍牆，當時稱爲蕭牆。蕭洵《故宮遺錄》說：“南麗正門內，曰千步廊，可七百步，建靈星門，門建蕭牆，周迴可二十里，俗呼紅門闌馬牆。門內數(一作二)十步許有河，河上建白石橋三座，名周橋，……度橋可二百步，爲崇天門。”《析津志》也說：“崇天門，正南出周橋，靈星三門分三道，中千步廊街，出麗正門。”(《析津志輯佚·城池街市》第2頁)從外城正南的麗正門，經千步廊街，進蕭牆正南的靈星門，經周橋，入宮城正南的崇天門，正是大都的中軸綫。

當時稱宮城爲“內城”，或者尊稱爲“內皇城”和“皇城”。如

前引《析津志》所說至元四年四月甲子築內皇城位置，就是這年確定宮城方位，內皇城即指宮城。《析津志》又說：“十月皇城東華門外，朝廷命武官開射圃，常年國典。”（《析津志輯佚·風俗》第205頁）所說皇城東華門外，即指宮城東門東華門外。直到明代洪武初年徐達命張煥“計度故元皇城”，皇城依然是指宮城^①。當時蕭牆和宮城都作為大內的一部分，蕭牆被看作大內的外周牆垣，或稱為“外周垣”。《南村輟耕錄》所記“官闕制度”說：“大內南臨麗正門”（《南村輟耕錄》卷二十一），所說大內即包括蕭牆在內，蕭牆南門靈星門正南臨外城南門麗正門。《析津志》載：“中書省在大內前東五雲坊內”（《析津志輯佚·朝堂公宇》第9頁），所說“大內前”即指蕭牆靈星門之前。《元一統志》也說：“萬寶坊，大內前右千步廊”；“五雲坊，大內前左千步廊”（《日下舊聞考》卷三十八引），所說大內前千步廊都指蕭牆靈星門前的千步廊街，可知靈星門以內即屬於大內。《析津志》載：“厚載門，乃禁中之苑圃也，內有水碾，引水自玄武池，灌溉種花木。自有熟地八頃，內有小殿五所。”（《析津志輯佚·城池街市》第2頁）又說：“昇平橋，在厚載門，通海子水，入大內。”所說厚載門，即指蕭牆北門厚載紅門，玄武池在萬寧橋西，即是海子（積水潭）東側的小湖。厚載紅門以內有御苑，引海子水（即玄武池水）經厚載紅門外昇平橋灌入御苑。此處所說大內即指蕭牆以內。

當時對蕭牆以內，可以統稱為大內。蕭牆以內，中部為太液池，具有離宮性質；東都為宮城，或稱“東內”；西部為興聖、隆福二宮，或稱“西內”。蕭牆內並無中央重要官署，只有為宮廷服務的官署和機構。宮城南門崇天門以東星拱門南有御膳亭，亭東有拱宸堂，是百官會集等候之所。宮城西南角樓之南有留守司，“專掌宮禁工役者”，也就是主管宮中建築工程的部門。宮城西

門西華門南有儀鸞局，至元十一年(公元1274年)設置，專管宮門管鑰供帳燈燭(《元史·世祖本紀》)。西華門以西有鷹房，至大元年(公元1308年)設置，專管狩獵鮮食以供宗廟祭祀(《元史·武宗本紀》)。蕭牆以內，宮城以外，沒有一所主管行政的中央官署，因此這裏既不同於以前唐代長安和金中都的皇城，也不同於以後明清北京的皇城。蕭牆只是整個大內的外圍的牆垣，當時並不稱爲皇城。

蕭牆的西牆以內，興聖宮的延華閣以西，西鹿頂殿門外之西偏有學士院，學士院內有生料庫，又南爲鞍轡庫、軍器庫、牧人、庖人、宿衛之室；宮垣東南隅有酒房，西南隅有藏珍庫(《輟耕錄》)。蕭牆的東牆以內，宮城以東地區，是御廚和相關的機構和官署所在。宮城東南角樓以東偏北地方有生料庫，庫東有柴場，夾垣東北隅有羊圈(《輟耕錄》)。沿着東牆以內，有柴場、御酒庫、酒坊等。爲了便利這些機構的對外交通和取得所需的生活資料，沿蕭牆的東牆開設有多處紅門，并在牆外沿着新開河(即通惠河的一段)上建有多所橋梁，與外城東部的街市相通。《析津志》說：“燒飯橋，南出樞密院橋、柴場橋，內府御廚運柴葦俱於此入。下則官酒務橋，光祿寺、流化橋。”又說：“此爲御河皇后酒坊橋。”燒飯橋，即“神道橋，在紅門東北，俗爲燒飯園橋。”燒飯園在蕭牆東牆的一處紅門東北，正當蓬萊坊之南(《析津志輯佚·古蹟》第115頁)，神道橋便是紅門外通燒飯園的橋。樞密院橋即“朝陽橋，在東華門外，俗爲樞密院橋”柴場橋“即保康橋，在柴房東，俗名柴垛橋”。光祿寺橋即“通明橋，在光祿寺西，俗名酒坊橋”。光祿寺橋即在蕭牆東牆的東二紅門以東的新開河上。《析津志》曾講到金水河“轉東至周橋，出東二紅門，與光祿寺橋下水相合流出城”(以上都是根據《析津志輯佚·河間橋梁》)。

據此可知，沿着蕭牆的東牆，有神道橋（即燒飯圍橋）、朝陽橋（即樞密院橋）、保康橋（即柴場橋）、官酒務橋、通明橋（即光祿寺橋）等，並開設有紅門，以通外城東部街市。

蕭牆和宮城的範圍已勘查清楚。宮城南門崇天門約在今故宮太和殿的位置；北門厚載門在今景山公園少年宮前，東西兩垣約在今故宮的東西兩垣附近。蕭牆東牆在今南北河沿的西側，西牆在今西皇城根，北牆在今地安門南，南牆在今東、西華門大街以南。牆基寬約3米左右。正南的靈星門在今午門附近。大都初建時，只有宮城，蕭牆是後來爲了加強保衛工作於元世祖晚年建成的。至元二十八年（公元1291年）二月，“建宮城南面周廬，以居宿衛之士”（《元史·世祖本紀》），就是《輟耕錄》所說“附宮城南面有宿衛直廬”。元成宗元貞二年（公元1296年）十月，“樞密院言：‘昔大朝會時，皇城外皆無牆垣，故用軍環繞以備圍宿；今牆垣已成，南北西三畔皆可置軍，獨御酒庫西地窄不能容。臣等與丞相完澤議，各城門以蒙古軍列衛，及於圍橋，置戍樓以警昏旦。’從之。”（《元史·兵志》）所說“皇城外皆無牆垣”，是說宮城以外原無蕭牆；所說“今牆垣已成”，是說這時蕭牆已全部築成。所說“南北西三畔皆可置軍，獨御酒庫西地窄不能容”，是說蕭牆東牆以內的御酒庫以西沒有充足的空地可以駐屯軍隊，因爲蕭牆東牆以內，宮城東牆以外，其中空間原來較窄，加上建築有御酒庫、柴場等爲宮廷需要的設施，駐軍的地盤更狹窄了。

蕭洵《故宮遺錄》說：“靈星門建蕭牆，周迴可二十里，俗呼紅門闌馬牆。”這是由靈星門而講到蕭牆的周圍。陶宗儀《南村輟耕錄》又說：“厚載北爲御苑。外周垣紅門十有五，內苑紅門五，御苑紅門四，此兩垣之內也。”這又是由御苑而講到外周垣和內苑垣，說明御苑是在“外周垣”和“內苑垣”的“兩垣之內”，外

周垣當即指蕭牆無疑。沿着蕭牆設有十五處紅門，駐屯有蒙古軍守衛。蒙古軍都是騎兵，因而蕭牆俗呼紅門闌馬牆，該是牆垣築得比宮城要矮得多。紅門所以設置多到十五處，該是爲了便利對外交通，例如前述東牆至少有五處紅門。《析津志》所說朝陽橋在東華門外，這個東華門當是蕭牆東牆的東華紅門。看來蕭牆的十五處紅門，除了正南稱靈星門以外，正東沿用宮城的門名稱東華紅門，正北沿用宮城的門名稱厚載紅門，其餘是按方向編號的，如東牆光祿寺橋以西的稱爲東二紅門等。

宮城厚載門以北，蕭牆以內的御苑，有松林和柳巷。在松林東北，柳巷御道之南，有熟地八頃，使用闌人耕種，引海子水曲折灌入，“若穀粟麻豆瓜果蔬菜，隨時而有。”“東有水碾一所，日可十五石碾之。”（《析津志輯佚·古蹟》第114頁）這和御廚等設施是配套的。

（五）元大都宮殿的組合和官府的分佈

1 主要宮殿的組合

元宮城內的主要宮殿，分爲以大明殿和延春閣爲中心的前後兩大組。

宮城正南崇天門以內有大明門，左右有日精門和月華門。大明門內有主體建築大明殿，地點約在今故宮乾清宮附近，這是登極和元旦、壽節舉行大朝會的正衙，格局和北宋汴京的大慶殿和金中都的大安殿相同。“殿基高可十（一作五）尺，前爲殿陛，納爲三級，繞置龍鳳白石闌，闌下（一作外）每楹（一作柱）壓以龍頭，虛出闌外，四繞於殿。”（《故宮遺錄》）這和現在太和殿的規模十分相似。大殿十一間開闊，東西二百尺，進深一百二十

尺。後有南北向的一道柱廊，長二百四十尺，寬四十四尺，高五十尺，直通寢殿。寢殿五間開闢，并有東西夾六間，後連香閣三間，東西一百四十尺，進深五十尺，高七十尺。大殿和寢殿連同柱廊合成平面“工”字形結構。寢殿的東西兩面和後面，都有小殿。整個四周，建有廊廡一百二十間，略呈長方形，共開七門，四隅有角樓。東西廊廡中間偏南設有相對的鐘樓（又稱文樓）和鼓樓（又稱武樓），都是五間開闢，高七十五尺（《輟耕錄》）。

後一組宮殿，橫貫東華門和西華門的御道之後。正門叫延春門，左右有懿範門和嘉則門。門內延春閣，九間開闢，東西一百五十尺，進深九十尺，高一百尺，三簷重屋，地點約在今景山公園南部。該組宮殿佈局和前一組基本相同，只是規模略小，但是寢殿之後又有較大的殿。延春閣之後有一道柱廊，長一百四十尺，寬四十五尺，高五十尺，直通寢殿。寢殿七間，東西夾四間，後香閣一間。寢殿兩側也有小殿，寢殿後有玉德殿七間，中設佛像；玉德殿後又有宸慶殿九間，中設御榻。整個四周的廊廡多到一百七十二間，四隅有角樓，東西廊廡也有相對的鐘鼓樓，各高七十五尺（《輟耕錄》）。玉德殿既是佛殿，又常是皇帝辦事之處。

宮城的厚載門雖是北門，但因整個大都坐北向南，厚載門顯得也很重要。“厚載門上建高閣，環以飛橋，舞臺於前回闌引翼，每幸閣上，天魔歌舞於臺，繁吹導之，自飛橋而升，市人聞之，如在霄漢。”（《故宮遺錄》）

宮城以西為太液池，池中有瓊華島，包括今北海和中海，原為金中都東北郊的離宮（大寧宮），元代改名萬歲山，又稱萬壽山。全部建築屬離宮性質。山之東有石渠，長七十六尺，闊四十尺半，“引金水河至其後，轉機運輿，汲水至山頂，出石龍口，注方

池，伏流至仁智殿後，有石刻蟠龍，昂首噴水仰出，然後由東西流入于太液池。”山頂有廣寒殿，七間開闊，東西一百二十尺，進深六十二尺，高五十尺。殿後石龍首，口吐所引金水河的水。仁智殿在半山腰中，三間開闊，高三十尺。山上多處設有小殿和小亭。山東有靈圃畜有禽獸。山南有圓坻，又稱瀛州，建有儀天殿，十一楹，高三十五尺，周圍七十尺，重簷，圓蓋頂，圓臺址，即在今團城地方。東有長一百二十尺的木橋，通到“大內的夾垣”，即是御苑圍牆和宮城北牆之間的通道。西有長四百七十尺的木弔橋，中間空斷，連有兩舟架成的浮橋。北有長二百多尺的石橋以通向萬壽山（《輟耕錄》）。

太液池以西，北為興聖宮，南為隆福宮，都是南北長的長方形。興聖宮所處位置偏東，隆福宮偏西。興聖宮當是妃嬪所居。隆福宮原為太子府，至大年間改為太后所居，而另在其西築太子宫。

興聖宮有以興聖殿和延華閣為中心的前後兩組建築，兩旁附垣有宿衛直廬四十間，南、北、西三門外有衛士直宿之舍二十一所。興聖殿七間開闊，東西一百尺，進深九十七尺，也有柱廊和寢殿，四周也有廊廡，但規模較小。延華閣五間開闊，方七十九尺二寸。其右有畏吾兒殿六間開闊，其西版垣外又有東鹿頂殿和西鹿頂殿，各五間開闊。

隆福宮有以光天殿為中心的一組建築。光天殿七間開闊，東西九十八尺，進深五十五尺，高七十尺。其後也有寢殿，四周也有廊廡。隆福宮以西有御苑，多為后妃居處，其中有香殿、荷葉殿、圓殿、歇山殿、棕毛殿等。棕毛殿是竹宮，在假山東偏，三間，泰定二年（公元1325年）建成（《元史·泰定帝本紀》）。隆福宮於明初為燕王邸，後改為萬壽宮，嘉靖間改建為光明殿，在今光明

殿胡同。

2 重要中央官署的分佈

元大都的中央官署是分散設置的，大多在外城的東南部和中部。

當至元四年(公元1267年)開始建設大都的時候，“始於新都鳳池坊北立中書省”。到至元二十四年創立尚書省，“時五雲坊東爲尚書省”。後來併尚書省入中書省，分爲北中書省和內中書省。北中書省設在鳳池坊以東，就是城中部的鐘樓以西地方。《析津志》說：“鐘樓，京師北省東，鼓樓北。”(《析津志輯佚·古蹟》第108頁)內中書省設在蕭牆正南靈星門東南的五雲坊內，正當千步廊街的東側。《析津志》說：“中書省在大內前東五雲坊內，外儀門近麗正門東城下，有都省二字牌扁。”(《析津志輯佚·朝堂公宇》第9頁)中書省的大門是面對靠近外城麗正門的東城牆下的。中書省之東有侍儀司署，正當水門之西。侍儀司署之後有南倉，即元之太倉(《日下舊聞考》卷六十四“按語”引《析津志》)。

北中書省西南，也還設有尚書省。閻復《尚書省上梁文》說所築新基，“左帶鳳池之水，右瞻龍冠之峯”(《元文類》卷四十七)。龍冠之峯就是龍峯，即在北中書省園內，後來改作翰林國史院，所以虞集說：“龍峯者，國史院中石名也”(《日下舊聞考》卷六十四引《道園學古錄》)。鳳池即指海子(積水潭)。《元一統志》：“鳳池坊，地近海子，在舊省前，取鳳凰池之義以名。”(《日下舊聞考》卷三十八引)舊省即北中書省。尚書省左有鳳池，右有龍峯，當在今什剎海的東北，北中書省的西南。

樞密院在蕭牆東門東華紅門以外朝陽橋(即樞密院橋)以

東，保大坊之南。《析津志》說：“樞密院，在東華門過御河之東，保大坊南之大御西，涖軍政。”（《析津志輯佚·朝堂公宇》第34頁）還有宣徽院設於樞密院西南。《析津志》說：“樞密院南轉西爲宣徽院，院南轉西爲光祿寺酒坊橋。”說明宣徽院在光祿寺橋的東北，光祿寺即在光祿寺橋（即通明橋）之西。

御史臺在外城東南文明門內澄清坊以東，樂善樓以北。《析津志》說：“臺在澄清坊東，哈達門第三巷。”（《析津志輯佚·臺諫叙》第38頁）哈達門即文明門，澄清坊就是因“地近御史臺，取澄清天下之義以名”（《日下舊聞考》卷三十八引《元一統志》）。《析津志》又說：“樂善樓在文明門裏百步，面東，御史臺南。”（《析津志輯佚·古蹟》第106頁）可見御史臺在樂善樓以北，離文明門一百步開外。

翰林國史院屢次遷移，至順年間遷到北中書省舊署，從此北中書省成爲翰林院所在。

六部公廨的地點，《春明夢餘錄》只講到“貢院在城東隅，元禮部舊基也”，“太僕寺在皇城西，乃元兵部舊署”。據此，禮部在今貢院東大街與西大街之間，兵部在今太僕寺街附近。《日下舊聞考》卷六十五按語說：“兵部夾道今仍稱太僕寺衙門，即舊署址也。”

太史院在城東南角的東城牆下，明時坊之西。楊垣《太史院銘》說是至元十六年擇地於都邑東墉下，《析津志》說：“明時坊在太史院東。”（《析津志輯佚·城池街市》第3頁）明時坊就是因“地近太史院”而得名（《日下舊聞考》卷三十八引《元一統志》）。太史院中建有靈臺，即司天臺。臺上設有天文儀表。

大都路總管府和巡警二院在城中部的中心閣、倒鈔庫以東地區。《析津志》說“齊政樓，都城之麗譙也。東，中心閣，大街東

去即都府治所。”又說：“(昭回坊)前有十字街，轉西大都府、巡警二院，直西則崇仁、倒鈔庫。西，中心閣。”(《析津志輯佚·古蹟》第108頁和116頁)大都路總管府，明永樂以後改爲順天府署。《春明夢餘錄》說：“順天府治即元大都路總治舊署也。”(《日下舊聞考》卷六十五引)順天府署的堂左，原有元大都路碑。

國子監在城東北的居賢坊之西。《析津志》說：“居賢坊，國學東，監官多居之。”(《析津志輯佚·城池街市》第4頁)國學即國子監，所謂監官即國子監的官員。《春明夢餘錄》說：“國子監在城東北，即元之舊學。洪武改爲北平郡學，永樂仍爲國子學，又改爲國子監。”(《日下舊聞考》卷六十六引)可知明清的國子監仍是元代舊址，在今雍和宮大街西。

(六) 元大都郊壇、社稷壇、太廟和原廟的建置

1 郊壇、社稷壇和太廟

元朝沿用傳統禮制，在大都南郊設郊壇。元世祖中統年間，在麗正門東南七里建祭臺，元成祖即位，進一步改建爲郊壇(《元史·祭祀志》)，地點當在今永定門外。

社稷臺始建於元世祖至元二十九年(公元1292年)，地點在外城“和義門內少南”，占地四十畝，分爲社壇和稷壇，兩壇都高五丈，方廣各五丈，相距約五丈。壇皆北向(《元史·祭祀志》)，在今西直門內大街的南邊。

太廟建於外城東面齊化門內的北邊。《元一統志》說：“元太廟在都城齊化門之北。”(《日下舊聞考》卷四十八引)前廟後寢的結構，東、西、南三面開有櫺星門，方向是朝南的，“門外馳道抵齊化門的通衢”(《元史·祭祀志》)。

太廟和社稷臺分別建置於外城東西兩面靠近於城牆的地方，這和北宋汴京分別把太廟和郊社建置於裏城東西兩面靠近城牆的地方有相似之處。

2 原廟的擴大建設

元代沿用宋、遼、金的禮俗，除太廟以外，建有供奉祖先遺像的原廟，其規模之大，耗費之多，遠遠超出宋、遼、金之上。元代皇帝沿用蒙古族潛埋的墓葬方式，不建設大規模的陵寢，因而特別重視原廟的建設。從元世祖以後，每個皇帝或皇后都在生前創設或擴建寺院，準備作為身後的原廟，如同漢代皇帝都於生前為自己建設陵寢和原廟一樣。這些原廟多數設在大都城內街道的衝要地方，或者建於郊外的山上。除大規模建設寺院，製作講究的佛像以外，并建築供奉遺像的神御殿，舊稱影堂，即所謂原廟。遺像由紋綺局織錦做成。原廟中藏有玉冊、玉寶，祭器都用金銀及玉、水晶、瑪瑙製成。世祖影堂并有真珠簾，并佈置珊瑚樹等。重要原廟還駐有軍隊防守^⑦。朝廷還往往賜給這些寺院大量的永業田和永業戶^⑧，收取租賦作為其維持和擴展的經濟基礎。

元代皇帝和皇后的重要原廟，現列舉如下：

一、大宣文弘教寺，世祖起建，曾賜永業田。見泰定三年十月中書省臣言(《元史·泰定帝本紀》)。地點不詳，相傳在西郊萬安山清代所建法海寺、法華寺的地方。

二、大聖壽萬安寺，又稱白塔寺，原為遼道宗時所建。元世祖至元十六年(公元1279年)開始擴建，十年建成，稱為大聖壽萬安寺，其建築一如內廷之制，常用作百官習儀之所。成宗時設世祖帝后影堂於大殿之西，設裕宗帝后影堂於大殿之東。到明

代天順年間改稱爲妙應寺。地點在平則門(今阜城門)內大街以北的“丁”字形交叉點。

三、大護國仁王寺，又稱高梁河寺，世祖至元七年(公元1270年)昭睿順聖皇后起建，三年建成。地點在城西高梁河濱，和義門西七里廣源閘之東。後來成爲昭睿順聖皇后和北安王那木罕的原廟。

四、大天壽萬寧寺，成宗大德九年(公元1305年)布爾罕皇后起建，地點在中心臺之後，並建有中心閣，一般就用中心閣作爲此寺的代稱。泰定四年(公元1327年)在此建成宗神御殿，後來成爲成宗、憲宗的原廟。明代稱萬寧寺，清代康熙年間重修，改稱淨因寺。地點在今鼓樓東。

五、大崇恩福元寺，武宗至大元年(公元1308年)起建，地點在文明門外，今崇文門外上四條胡同。武宗去世後，仁宗在此建成供奉武宗及二后的東西兩殿。明代稱崇恩觀。

六、大承華普慶寺，原爲成宗報德太后而建，武宗至大元年(公元1308年)太子大加擴建，跨數坊之地。太子即位，便是仁宗。此寺後來成爲順宗帝后和仁宗帝后的原廟，明代稱爲寶禪寺，在今寶產寺胡同，正當崇國寺的街西。

七、大天源延聖寺，又稱黑塔寺，原爲盧師寺，泰定三年(公元1326年)建顯宗神御殿於盧師寺，賜額爲大天源延聖寺(《元史·泰定帝紀》)。天曆元年(公元1329年)廢去顯宗神御殿(《元史·祭祀志》)。次年明宗皇后命令在此作佛事爲明宗求冥福(《元史·后妃傳》)。順帝元統六年在此立明宗神御殿碑(《元史·順帝紀》)，成爲明宗帝后原廟。《析津志》：“黑塔，大天源延聖寺，太平坊。”(《析津志輯佚·古蹟》第117頁)明正統年間改建爲弘慶寺，仍稱黑塔寺，但已無塔。白塔寺，青塔寺、黑塔寺相距

不遺。《春明夢餘錄》稱白塔寺“附近有黑塔寺、青塔寺，然寺存而無塔”。《日下舊聞考》卷五十二也說：“黑塔寺在南小街水甯胡同，青塔寺在阜成門四條胡同，相距里許，皆無塔，亦皆無寺額，獨各有碑可考耳。”所錄有明代張益和胡濙兩碑，張益謂寺在朝天宮、白塔之西，胡濙亦謂寺在朝天宮右。白塔、黑塔、青塔三寺齊名。《析津志》：“是月（四月）八日帝師刺麻（按刺麻是宮中佛殿之名）堂，下暨白塔、青塔、黑塔兩城僧寺俱為浴佛會。”（《析津志輯佚·歲紀》第217頁）據《析津志》“原廟行香”條，四月二十六日貞裕徽聖皇后（明宗之后）週年黑塔寺，十一月十一日莊獻嗣聖皇后忌日黑塔寺。

《日下舊聞考》卷一百四以為大天源延聖寺原名盧師寺，在西郊三十里外盧師山，明正統年間更名清涼寺，不確。但此地亦曾是顯宗原廟。《析津志》“原廟行香”條，十二月某日“顯宗皇帝盧師山。”原建於黑塔寺的顯宗神御殿，到天曆元年已廢去，這與黑塔寺顯然是兩個不同地點的寺。

八、大永福寺，又稱青塔寺，仁宗延祐三年（公元1316年）起建，英宗至治元年（公元1321年）建成，後來作為英宗帝后原廟。明代仍稱青塔寺，地點在平則門內西北地方（今四條胡同），與其東南白塔寺相距一里許。《日下舊聞考》卷五十二所引《五城寺院冊》所錄明張一桂《重修青塔寺碑》有說明。

九、大承天護聖寺，天曆二年起建，在西郊青龍橋西，即明清歷德寺所在。順帝時奉文宗及太皇太后御容於此。

十、延壽寺，原為遼所建，在琉璃廠東北余家胡同東口，遼聖宗曾安置遼景宗石像，元代用作明宗的原廟。

十一、也里可溫十字寺，天主教聖芳濟會所建教堂，建成於大德十年（公元1306年），地點在萬寧橋東北靖恭坊內，設有睿宗

之后峻魯和帖尼(或作莎兒合黑塔尼)的原廟。峻魯和帖尼被稱爲唐妃娘娘。《析津志》“原廟行香”條：十二月某日“唐妃娘娘阿吉刺也呈可溫寺，靖恭坊內。”^①

此外，世祖至元年間曾安置太祖、太宗、睿宗御容於翰林院，每年要春秋致祭。每年六月遣翰林院官員赴上都諸原廟“注香”，回到大都，要到健德門外禮賢亭住下，由宰輔百官恭迎入京，分別到各寺內有影堂者致祭。七月上旬，翰林院要遣大祝酒，會同宣徽院、光祿寺向翰林院三朝御容致祭（《析津志輯佚·歲紀》第220頁）。“八月一日，與祭太廟官，入中書受誓戒，詣各原廟行祭禮。”（同上書，風俗第204頁）原廟的經常性祭祀，有每月初一、初八、十五、二十三的常祭，又有元旦、清明、蕤賓、重陽、冬至以及忌辰的節祭。常祭用蔬果，忌辰節祭用牲。《析津志》“原廟行香”條，就是每年正月到十二月逢到各個皇帝、皇后的忌辰節祭的日程表，規定由“正官”或“大小官員”參與“行香”祭禮。

根據《析津志》所列忌辰節祭日程表，白塔寺對世祖和裕宗的忌辰節祭，都由大小官員一起參與，因為世祖是遷都大都的開國皇帝，地位特別崇高。此外黑塔寺對貞裕徽聖皇后（明宗之后）週年祭祀和忽都篤皇后忌日祭祀，南寺對曲律皇后忌日祭祀，福元寺對貞裕徽皇后忌日祭祀，延壽寺對明宗愍忌祭祀，也都要大小官員一起參與，這該是出於順帝對其父親明宗及其皇后等人的特別尊崇。而原廟中對成宗以下的皇帝及其皇后的忌辰節祭，都只有正官參與。正因為這些原廟的忌辰節祭需要全體大小官員和正官的參與，所以必須建築在城內外衝要的地方和交通便利之處。

元代雖然從建設世祖原廟開始，“歲時差官以家人禮祭供，

不用太常禮樂”（《析津志輯佚·太廟》第53頁），也沒有像北宋汴京和南宋臨安那樣由皇帝親自朝拜獻祭景靈宮（原廟）的隆重儀式，但是元代對於各個皇帝和皇后的原廟的忌辰節祭，還是十分隆重的，必須全體大小官員或正官參與“行香”之禮。因此所有這些設有原廟的寺院建築，都是十分雄偉的，內部也陳設華麗，祭器精緻。世祖的原廟設在白塔寺，是由遼所建的舊寺擴建的，世祖皇后的原廟也建在城外高粱河濱。在城內第一所準備作成宗原廟而新建的寺，即大天壽萬寧寺，就建在整個大都的中心，中心臺的後面，並成爲坐南向北的中軸綫的終點，也就是從官城和蕭牆正北門厚載門向北通到中心臺的馳道的終點。因這所寺內建有中心閣，人們就常用中心閣作爲這所原廟的代稱。《析津志》“原廟行香”條，就說忌日祭祀完澤篤皇帝（即成宗）和亦憐真班皇帝（即憲宗）在中心閣。這樣把原廟建在作爲中軸綫的馳道的頂端，看來是受宋代的影響。北宋汴京作爲原廟的景靈東宮和景靈西宮，就建置在宮城正南門宣德門向南通到州橋的御街的東西兩側，地位十分顯要；南宋臨安的景靈宮就建置在宮城正北門和寧門向北而轉向西北到新莊橋的御街的頂端。元大都把原廟建在作爲向北的中軸綫的馳道的頂端，和臨安把原廟建在作爲向北的中軸綫的御街的頂端十分相似。

附帶要說明一下，大都的宗教建築有多處受到宋代汴京和臨安的影響。大都設有東西太乙宮，太乙神壇設在蕭牆以外的東南角，西太乙宮設“在和義門內近北”（《析津志輯佚·寺觀》第93頁），很明顯是受到宋代的影響而設置的。太乙宮是北宋汴京開始建置的，汴京的東西太乙宮設在城外，中太乙宮設在城中。南宋臨安的東太乙宮設在新莊橋南，靠近景靈宮；西太乙宮設在西湖孤山。

還該注意的是，在蕭牆正南靈星門前，東邊建有太乙神壇。成宗“大德元年正月建五福太乙神壇”（《元史·祭祀志》）。西邊與之對稱而距離相等的，還建有祭祀紫微垣星的雲仙臺，明代稱為靈臺，清代康熙年間稱為觀星臺。《元史·成宗紀》載至元三十一年五月“祭紫微星於雲仙臺”。紫微星即紫微垣。元李洎孫《大都賦》說：“揭五雲於春路，呀萬寶於秋方；上法微垣，屹峙禁城。”（《日下舊聞考》卷六錄自《永樂大典》）五雲和萬寶是蕭牆正南靈星門前東西對立的兩個坊，東於五行屬春，西於五行屬秋，所以說“揭五雲於春路，呀萬寶於秋方”。微垣即指祭紫微垣的雲仙臺，所說“上法微垣”，就是說政治上要效法上天的紫微星，因為紫微星正當北斗以北。所說“屹峙禁城”，就是指雲仙臺正高聳直立於禁城之外。這說明元大都把太乙神壇和雲仙臺左右對稱地造在蕭牆正南靈星門的東西兩側，不是偶然的，是有其特別用意的。而且蕭牆這座三個門道的正南門，就叫做靈星，同時旁邊的坊就取名五雲，“取唐詩五雲多處是三臺之義”（《元一統志》），與雲仙臺之名正好相應。這與劉秉忠設計建築大都辨方定位的時候，說要“置居都堂於紫薇垣”、“分紀於紫微垣之次”，是密切相關的。

元代特別重視宗教建築，元上都於皇城以內四角都設有大的寺廟，而元大都對於宗教建築的設置更有進一步擴展，它於蕭牆以南的中軸綫的兩側對稱地建有神臺，並在蕭牆以北的中軸綫的頂端建有大規模的原廟。

(七) 元大都的街巷和坊的安排

1 街巷劃分和“八畝”方地的分配方案

元大都的街巷的安排是統一設計規劃的。每座城門都有通向城內的筆直的街道，兩座城門之間，多數加闢有一條街道，全城共有縱橫交錯的南北向和東西向街道各九條。中部因有積水潭，南部正中因為有蕭牆和宮城，街道有些曲折或中斷，積水潭東北并有斜街。街道的整齊劃分，是爲了有計劃的安排小巷和居民住的“坊”。

《析津志》說：“街制，自南以至於北，謂之經；自東至西，謂之緯。大街二十四步闊，小街十二步闊，三百八十四火巷，二十九街通。街通二字本方言。”（《析津志輯佚·街池街市》第4頁）今據實測，大街闊約25米左右，胡同寬約6到7米^⑩。以元代一尺約合0.3米計，五尺爲步，一步約合1.5米，大街闊25米，不過17步左右，比上述記載大街24步要狹得多，小街12步要寬得多，正好是大街和小街的平均數。當時馬可波羅在游記中，曾對大都的街道作出了具體描寫：

街道甚直，此端可見彼端，蓋其佈置，使此門可由街道遠望彼門也。城中有壯麗宮殿，復有美麗邸舍甚多，各大街兩旁，皆有種種商店屋舍。全城中劃地爲方形，劃綫整齊，建築屋舍。每方足以建築大屋，連同庭院園圃而有餘。以方地賜給各部落首領，每首領各有其賜地。方地周圍皆是美麗道路，行人由斯往來。全城地面規劃有如棋盤，其美善之極，未可言宣。（馮承鈞譯《馬可波羅行紀》第二卷第八十三章）

馬可波羅在這裏所說“全城地面規劃有如棋盤”，是指分配

給一戶貴族官吏所住的“方地”的劃分“有如棋盤”，並不是說衆多居民居住的“坊”劃分像棋盤如同唐代長安那樣的佈局^⑩。馬可波羅所說“方地”的分配是有根據的。“至元十□年始大城京師，……而貴戚勳臣悉受地。”（虞集《襄敏楊公神道碑》）“至元二十二年二月壬戌，詔舊城居民之遷京城者，以貲高及居職者先，仍定制以地八畝爲一分。其或地過八畝及力不能作室者，皆不得冒據，聽民作室。”（《元史·世祖本紀》）所謂貲高及居職者，無非貴族官吏以及有財富者，馬可波羅所說“以方地賜給各部落首領”，有些偏面。以八畝見方的“方地”作爲一戶建設住宅的基地，原是大都建設規劃中的基本單位面積。至元二十二年大都已全部建成，所以拿出這樣一個每戶住宅基地的分配方案來，按已定規劃進行分配。

大都是依據這個“八畝”方地分配方案，制定街巷劃分的規劃的。在大都的縱橫交錯的街道之間，普遍地排列有平行的東西向的胡同。今北京市內城東西長安街以北的街道胡同，也還沿襲元大都街巷的佈局，東西向平行的胡同排列得很有規律。元大都城內的東北和西北部分也還有平行胡同的遺迹。至於大都城以南明代以後開拓的街巷，就沒有這種遺迹可尋了。平行胡同之間的距離約爲五十步，除去胡同本身所占六步以外，實際間距有四十四步，約合68米，這與北京現存平行胡同的間距差不多^⑪。這種平行的東西向胡同，就是居民的“坊”的通道，當時“坊”的坊門都是東西向的。“八畝”一份的“方地”，就是整齊地排列在東西向平行胡同的南北兩側，這樣就使每戶住宅，都可以建築坐北朝南而向陽的主要廳堂和臥室，便於日照取暖和通風採光。這是照顧到華北氣候特點的設計。這種設計並非出於元大都的新創，也還是沿用過去北方長期建設都城的經驗。宋使

者路振《乘輅錄》記述遼中京南門朱夏門內“街東西各三坊，坊門相對”。這種南北向的大街上，東西兩側的三坊的坊門相對，說明三個坊門以內，正是平行的東西向的三條小巷，其結構應該是和大都相仿的。大都蕭牆靈星門南的東西兩個坊，五雲坊和萬寶坊正是坊門東西相對。

2 兩個赤縣所屬的坊

大都城內，蕭牆以外的居民區，最初劃分為五十坊，後來增加到六十多坊，直隸於左右警巡院管理。坊各有門，都有坊名。坊門以內，就是東西向的胡同。坊是以街道為分界而排列的。由於全城是坐南向北的佈局，坊以南北向的中軸綫為界，分別排列在蕭牆的東西兩面。南以蕭牆正南靈星門外的千步廊為界，北以蕭牆正北厚載紅門向北到中心臺的馳道（即中軸綫）為界，東屬大興縣，西屬宛平縣。這樣以中軸綫為界而分屬兩個赤縣管轄，還是沿襲唐宋以來都城的傳統制度。

明初洪武年間未建都以前北平府的規制，共有三十三坊。五雲、保大、南薰、澄清、皇華、賢良、明時、仁壽、思誠、明照、蓬萊、湛露、昭回、靖恭、金臺、靈椿、教忠、居賢、寅賓、崇教等二十坊，屬大興縣。萬寶、時雍、阜財、金城、咸宜、安富、鳴玉、太平、豐儲、發祥、日中、西城（成）等十三坊，屬宛平縣（《日下舊聞考》卷三十八，宛平縣所屬十三坊中漏記一坊名）。這三十三坊，大多是元大都中部和南部的坊，到明初還沿用着元代的舊制（其中只有教忠、崇教兩坊名不見於元代，當是明初改名）。所列舉的這些坊名，都是按由南而北的次序排列的。《清類天文分野之書》謂大興與宛平同為赤縣，屬元大都路，洪武中屬北平府倚郭縣（《日下舊聞考》卷六十五引），這是正確的。《析津志》說：“立

春，太史院奏某日得春，移文赤縣，以是年立春日支干，宛平縣或大興縣依上年故事塑春牛、勾芒神。”（析津志輯佚·風俗第202頁）這和北宋汴京立春前一日“開封、祥符兩縣置春牛於府前”（東京夢華錄卷六《立春》）相同。這說明大都城內確是分屬大興和宛平兩赤縣管轄，如同汴京城內分屬開封、祥符兩赤縣管轄一樣。

大興縣所屬中軸綫以東的坊，可考的如下（以下參看圖8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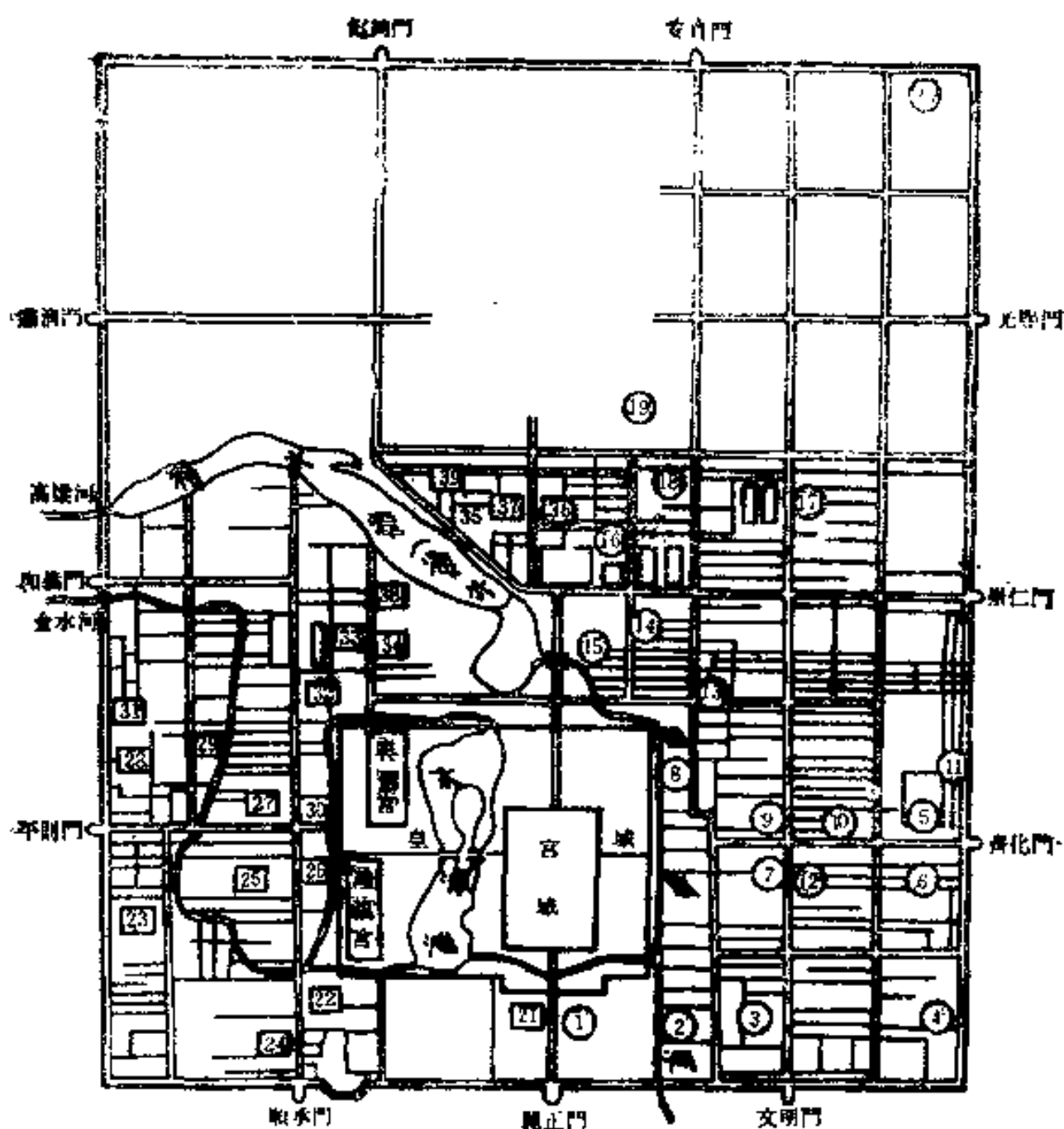
一、五雲坊，在蕭牆靈星門南的左千步廊東側，坊門在東，與右千步廊西側的萬寶坊相對。《元一統志》：“五雲坊，大內前左千步廊，坊門在東，與萬寶對立。”（《日下舊聞考》卷三十八引，以下所引《元一統志》出處相同，不再註出）五雲坊和寶萬坊相對，坊門也對立，說明坊門內有東西向的小巷作為通道^③。

二、南薰坊，《析津志》：“南薰坊，光祿寺東”。（以下所引《析津志》，都見於《析津志輯佚·城池街市》，不再註出）光祿寺在蕭牆東南角東二紅門（金水河與通惠河交接處）外，南薰坊當在蕭牆東南角以東地方。《析津志》：“蓬萊坊西水自樞密橋下南薰橋、流化橋出南水門外。”（《析津志輯佚·河閘橋梁》第95頁）樞密院橋即蕭牆東華紅門外的朝陽橋，朝陽橋以南為通明橋，在光祿寺西，又稱光祿寺橋，南薰橋當又在光祿橋南，以近南薰坊而得名。據此可知南薰坊當在光祿寺以東而偏南。

三、澄清坊，《元一統志》：“地近御史臺”。《析津志》：“臺在澄清坊東。哈達門（即文明門）第三巷。”澄清坊在文明門以內一百步闕外的御史臺西邊。

四、明時坊，《元一統志》：“地近太史院”。《析津志》：“在太史院東。”明時坊在文明門內太史院東，外郭城的東南角。

五、思誠坊、皇華坊和明照坊。《析津志》：“定真院在齊化



圖例 ○ 大興縣所屬坊巷 □ 宛平縣所屬坊巷

- ①五雲坊 ②南薰坊 ③澄清坊 ④明時坊 ⑤思誠坊 ⑥皇華坊 ⑦明照坊 ⑧保大坊
 ⑨仁壽坊 ⑩賓賓坊 ⑪修清坊： ⑫居仁坊 ⑬蓬萊坊 ⑭昭回坊 ⑮新泰坊 ⑯金臺坊
 ⑰居賢坊 ⑱靈樞坊 ⑲丹桂坊 ⑳泰亨坊 ㉑萬寶坊 ㉒時務坊 ㉓金鳳坊 ㉔甲財坊
 ㉕咸宜坊 ㉖安富坊 ㉗順正坊 ㉘福田坊 ㉙西成坊 ㉚由義坊 ㉛太平坊 ㉜和寧坊
 ㉝發祥坊 ㉞永錫坊 ㉟日中坊 ㊱聖仁坊 ㊲風池坊 ㊳析津坊 ㊴昭賢坊

圖30 元大都所設大興、宛平兩縣所屬坊巷分佈示意圖

門裏思誠坊南”(《析津志輯佚·寺觀》第87頁)。可知思誠坊在城東齊化門內。《析津志》：“思誠坊東，皇華坊、明照坊與上相對。”可知皇華坊、明照坊、應在思誠坊之西。《五城坊巷胡同集》謂思

城(誠)在東四牌樓東北，黃(皇)華坊在東四牌樓東南，明時坊之北；明照坊在東四牌樓西南，澄清坊之北，都該是元代舊址。

六、保大坊，《元一統志》：“近樞密院”。《析津志》：“在樞府北。”樞密院在蕭牆東門以外朝陽橋(即樞密院橋)以東，保大坊當在朝陽橋東北。

七、仁壽坊，《元一統志》：“地近御藥院”。《五城坊巷胡同集》謂在東四牌樓西北。

八、寅賓坊，《元一統志》：“在正東”。當在齊化門內太廟以西。《日下舊聞考》卷四十八引《說學集》，謂京師寅賓里有無量壽庵，是至元二十一年居士屠君出資七百貫買地十畝於太廟之西而建造。可知寅賓坊在太廟之西，今東四牌樓東北，思誠坊以西。

九、穆清坊，《元一統志》：“地近太廟”，因而得名。太廟之西爲寅賓坊，穆清坊可能在太廟之東或東北。

十、居仁坊，《元一統志》：“地近東市”。東市地點無考，如果與西市相對稱，當在今東四牌樓附近。

十一、蓬萊坊，《析津志》：“天師宮前”。“樞密院西爲玉山館，玉山館西北爲蓬萊坊、天師宮。”按《析津志》又說：“蓬萊坊西，水自樞密院橋下南薰橋。”《五城坊巷胡同集》又說天師庵隸保大坊，蓬萊坊當在蕭牆東北角，樞密院、保大坊以北，靠通惠河以東。

十二、昭回坊，《析津志》：“在都府南”。即大都路總管府以南。《五城坊巷胡同集》有昭回靖恭坊，自鼓樓東大街以南至皇城北垣，當是以昭回、靖恭二坊合併而成。昭回坊當在靖恭坊以北地區。

十三、靖恭坊，《析津志》：“在海子橋北”。(今本“靖恭”誤作

“請茶”) 當在萬寧橋(即海子橋)的東北地區。

十四、金臺坊，《洪武北平圖經志書》：“鼓樓在金臺坊”。“鐘樓在金臺坊東，即萬寧寺之中心閣。”（《日下舊聞考》卷五十四引）這是說明代東遷的鐘樓和鼓樓在金臺坊。《五城坊巷胡同集》謂明代的金臺坊在鐘鼓樓以東到淨土寺胡同東口，元代當大致相同，在中心閣以東，大都路總管府以西。

十五、居賢坊，《析津志》：“在國學東”。即在國子監之東。元代國子監到明清沿用。

十六、靈椿坊，《析津志》：“在都府北”。即在大都路總管府以北。

十七、丹桂坊，《析津志》：“在靈椿北”。丹桂坊又在靈椿坊以北，當在大都北部，明初減縮北城後，坊即廢棄。

十八、泰亨坊，《元一統志》：“地在東北寅方”。當在城內東北角，明初減縮北城後廢棄，其地不詳。

宛平縣所屬中軸綫以西的坊，可考者如下：

一、萬寶坊，《元一統志》：“大內前右千步廊，坊門在西”。在蕭牆靈星門西南，右千步廊西側，與五雲坊坊門相對。

二、時雍坊，據《五城坊巷胡同集》，明代有大小時雍坊。大時雍坊偏南，元時在大都南城牆以南，當為明代向南擴展時所增設。小時雍坊在西單牌樓以東到皇城西垣，正當順承門以內，蕭牆西南角的西南地區，當是元代時雍坊所在。

三、金城坊，《析津志》：“在平則門內”。《五城坊巷胡同集》記明代此坊自阜成門大街南到都城隍廟，當是元代舊址。《析津志》：“自廟（城隍廟）前巷口轉北，金城坊是。”（《析津志輯佚·寺觀》第67頁）都城隍廟在城內西南角，靠近順承門，金城坊在其北，又靠近平則門（即今阜成門）。

四、阜財坊，《元一統志》：“近庫藏”。《析津志》：“在順承門內金玉局巷口。”庫藏與金玉局巷的位置無考。按《析津志》：“坊（金城坊）之東，金玉府內有琉璃碧瓦所蓋八座藏，藏經板在內，甚為精製。……坊內有軍鐵庫。”（《析津志輯佚·寺觀》第67頁）金玉府營是金玉局所屬的府庫。金城坊內有軍鐵庫，坊東又有金玉府，庫藏亦該設在金城坊附近，“金城有堅固久安之義以名”（《元一統志》）。阜財坊當在金城坊之東南。

五、訓禮坊、咸宜坊，《析津志》謂此二坊，在順承門倒鈔庫北。據《五城坊巷胡同集》，明代咸宜坊在西四牌樓西南。《洪武北平圖經志書》：“羊角市在鳴玉坊、咸宜坊。”鳴玉坊在西四牌樓西北。可知咸宜坊在鳴玉坊之南。

六、安富坊，《析津志》：“在順承門羊角市”。羊角市在鳴玉坊、咸宜坊，安富坊當在鳴玉、咸宜二坊附近。《五城坊巷胡同集》記明代此坊在西四牌樓東南，當是元代舊址。

七、鳴玉坊，《析津志》：“在羊市之北”。羊市即羊角市。《五城坊巷胡同集》記在西四牌樓西北，當是元代舊址。

八、福田坊，《析津志》：“在西白塔寺”。白塔寺在今阜成門大街路北，明代屬於河漕西坊。

九、西成坊，《析津志》：“西成坊在正西”，與“寅賓坊在正東”相對稱。寅賓坊在東四牌樓東北，西成坊當在西四牌樓以西。據《光緒順天府志》所引《舊坊考》，明代河漕西坊即西成坊，自建朝天宮後，又分為朝天坊。河漕西坊、朝天坊均在阜成門大街以北。

十、由義坊，《析津志》：“在西市”。今西四牌樓北大街路西雙關帝廟，為元代勇武安王廟舊址，廟內有泰定三年所立吳律所撰碑，稱“都城西市舊有廟，毀久弗修”，泰定乙丑十月重修（《日

下舊聞考》卷五十二)，可知西市即在這一帶，由義坊當即在此地。

十一、太平坊，《析津志》謂黑塔在太平坊。黑塔寺在白塔寺和明代朝天宮之西，太平坊當在福田坊之西。

十二、和寧坊，虞集《襄敏楊公神道碑》：“而貴戚勛臣悉受分地，式臘公得地和寧里，在內朝之西北”。據此和寧坊當在蕭牆西北角以外。

十三、發祥坊、永錫坊，據《五城坊巷胡同集》發祥坊有崇國寺等，崇國寺建於至元年間，在今西四牌樓大街東，當蕭牆西北角以外西北地方。發祥坊當在和寧坊以北。《析津志》：“發祥坊，在永錫坊西。”永錫坊在發祥坊之東。

十四、日中坊，《元一統志》：“日中坊，地當市中，取日中爲市之義以名”。《洪武北平圖經志書》：“斜街市在日中坊。”即明代的日忠坊。在鐘鼓樓以西，包括積水潭東北的斜街在內。

十五、里仁坊，《析津志》：“在鐘樓西北”。鐘樓在中心臺以西的鼓樓之北。

十六、鳳池坊，《元一統志》：“地近海子，在舊省前，取鳳凰池之義以名。”《析津志》：“在斜街北。”據此，鳳池坊當在日中坊之北。

十七、析津坊，《元一統志》：“地近海子”。

十八、招賢坊，《析津志》：“在翰林院西北”。所說翰林院，不知是指何時的翰林院，如果指至順年間遷到北中書省的那個，則此坊在北中書省的西北。

十九、豐儲坊，《析津志》：“在西倉西”。會通河經由和義門北水關進入城中，所說西倉當指設在和義門內沿會通河的倉，可能即是和義庫。豐儲坊即因近西倉而得名。

二十、善俗、甘棠、遷善、可封四坊，《析津志》謂“在健德門”。

二十一、乾寧坊，《元一統志》：“地在西北乾位”。清遠坊，《元一統志》：“地在西北隅”。懷遠坊，《析津志》：“地在西北隅”，確切地點不詳。平在坊，《元一統志》：“坊在北方”，地點不詳。

(八) 元大都的行市和街市

1 城中心的行市和街市

元大都自從至元三十年(公元1293年)建成通惠河，不但漕運暢通，南方的商船也可以直接進入城中，停泊於積水潭，因而靠近積水潭的城中心，各種行市興起，街市也很繁榮。元李洎孫《大都賦》說：

鑿會通之河，而川陝豪商，吳楚大賈，飛帆一葦，經抵犖下。……往適其市，則徵寬於關，旅悅於途。靈鐘叩而蒲牢吼，操鼓動而元鼙呼，櫛桑騰景，臬門啓樞。百廛懸旌，萬貨別區。匪(非)但邇至，亦自遠輸。麩駝貂貉之溫，珠璣香犀之奇，錦紈羅氍之美，椒桂砂芷之儲，瑰繡耀於優坊，金璧飭於酒廬。(《日下舊聞考》卷六引，錄自《永樂大典》)

說明通惠河鑿通以後，東南的吳楚大賈，西南和西北的川陝豪商，都通過水上交通綫來到大都。所說“徵寬於關，旅悅於途”，確是事實。當時元大都有大量商品是不徵稅的。“元於大都腹裏設稅務七十三處，其在京城者，豬羊市、牛驢市、馬市、果木市、煤木所，有宣課提舉司領之。利網雖密，然自酒醋而外，若魚蝦藥果之屬，以及書畫、藥席、草屨、篠帚、甗瓦、柴炭、諸色燈、銅、鐵、線、麻纜、苧綿、草索、麩貨，皆為不合稅之物，比於

明崇文門稅課，條目疏矣。”(同上書卷六十三引《稼堂雜抄》)看來元大都徵商稅集中於許多大的行市如豬羊市、牛驢市、馬市和果木市之類，日常生活用品除酒醋以外，大多不徵稅。

從李涪《大業賦》所描寫的“市”的情況看來，市區還是設有市門的，每天在日出時(搏桑騰景)，鐘鼓敲動後(靈鐘叩而蒲牢吼，操鼓動而元鼉呼，蒲牢是傳說中能大鳴的神獸，元鼉是神話中能擊鼓的神物)，市門才開啓(車門啓樞)。市中各種商店都掛着幌子，是按商貨的品種分類排列的。

《析津志》：“鐘樓之制，雄敞高明，與鼓樓相望。本朝富庶殷實，莫盛於此。樓有八隅四井之號，蓋東、西、南、北街道最為寬廣。”(《析津志輯佚·古蹟》第108頁)大都城中心設鐘鼓樓的鐘樓街，正是市中心街道最寬廣的地方，也是最為“富庶殷實”的商業中心。“(鼓)樓之東南轉角街市，俱是針鋪。西斜街，臨海子，率多歌臺酒館，有望湖亭，昔日皆貴官遊賞之地。樓之左右，俱有果木、餅麵、柴炭、器用之屬。”(同上書)

鼓樓東南轉角街市上都是針鋪，當是針的行市所在。這樣多的針鋪，是北宋汴京和南宋臨安所沒有的，說明大都縫紉手工業有很大發展。鼓樓以西，積水潭(海子)東北有斜街，最是商業繁華區，有斜街市之稱。附近的日中坊，即取“日中為市”之義。因為積水潭是南來商船進入城中的集中停泊處，繁華的斜橋市當即因此興起。斜街西南沿海子的地段，又是風景優美的游覽區。《析津志》說：“草三亭(三字疑誤)，在南城者最多，率皆貴游之地。……北城惟斜街南有數處，如望湖是也。”“望湖亭在斜街之西，最為游賞勝處。”(《析津志輯佚·古蹟》第104—105頁)這裏好比臨安西湖的湖濱一帶，杭州豐豫門外有望湖亭三處，錢塘門外更有望湖樓(《夢梁錄》卷十二《西湖》)，元大都望湖亭之名即

米市、麵市，鐘樓前十字街西南角。

鵝鴨市，在鐘樓西。

柴炭市，集市，一鐘樓（是說一處在鐘樓）。

段子市，在鐘樓街西南。

皮帽市，同上。

帽子市，鐘樓。

珠子市，鐘樓前街西第一巷。

沙刺市，一巷皆賣金、銀、珍珠、寶貝，在鐘樓前。

鐵器市，鐘樓後。

窮漢市，一在鐘樓後，爲最（《析津志輯佚·城池街市》第5—7頁）。

說明鐘樓周圍地區全是重要的行市所在。米麵、柴炭和鐵器等日用必需品的市，帽子、緞子等服飾的市，金銀珠寶的市，都設在這裏。多數市沿街設置，也還有重要的市設在巷內的。沙刺是蒙古語珊瑚的意思，在鐘樓前有沙刺市，一巷全是出賣金銀珠寶的商鋪，這是大都金融業和珠寶業的中心，如同北宋汴京潘樓街南的界身巷全是金銀綵帛交易之所一樣，也和南宋臨安御街中段“兩行多是金銀鹽鈔引交易鋪”差不多。

米市、麵市都附設有碾房，用牛、馬、驢、騾牽引，“每碾必二匹馬旋磨，日可二十餘石”，當時有“碾望東南”而操作的風俗，因爲“貢賦糧米俱在江南”。也有用杵白的。“都中自以手杵者甚廣。”更有稱爲“蒜白”的，當是因杵的形狀像蒜而得名，“鐘鼓（樓）前及海子橋上多有之”（《析津志輯佚·物產》第230頁）。說明海子橋（即萬寧橋）一帶也還有米市、麵市。

海子橋一帶也是商業發達之區，除米麵市外，還有木器家具的行市。“鐵絡、量罐、栳（花）架、馬槽、大小木櫃、鐙（燈）檠、盤（高麗櫃子，木剝成或旋成，大小不等，極爲樸質。凡碗碟、盃、

盞、托，大概俱有）、櫥、矮桌、矮牀、門匡（框）、窗隔、蒙古棺（用大木去外皮，削成圓木，以鉞開作蓋，中剝作人形，冠服一如平時，合之以鐵條釘合之）。右此等木器多在海子橋南，甚多；哈達門外亦有，然皆粗作生活。”（同上書第231頁）

鐘樓以西，北中書省周圍地區也有行市。《析津志》載：

省東市，在檢校司門前牆下。

文籍市，在省前東街。

紙劄市，省前。

靴市，在翰林院東（《析津志輯佚·城池街市》第5—6頁）。

所說“省東”、“省前”，即指北中書省以東或以前。文籍市和紙劄市當是適應官吏和書生的需要。靴市在翰林院東，即是北中書省東，元代晚期翰林院即遷在北中書省內。《析津志》是元代末年著作，故如此記載。

據《析津志》說：“官大街上作朝南半坡屋，或斜或正，於下賣四時生菓、蔬菜、剃頭、卜算、碓房磨，俱在此下。剃頭者以綵色畫牙齒為記，碓則望東南偏為之。”（《析津志輯佚·風俗》第206頁）這個建有“朝南半坡屋”的“官大街”，當然是東西向的大街，可能是指鐘鼓樓前或北中書省前的大街。街上長廊式的“朝南半坡屋”，可能出於官府所建，如同北宋汴京和南宋臨安官府所建的“房廊”一樣，出租給商人經營商業。

鐘鼓樓以東，中心閣、倒鈔庫、巡警二院之東有大都路總管府，其東南有柴市。《春明夢餘錄》說：明代順天府治東南教忠坊有順天府學，“其地元之柴市也，文文山（即文天祥）授命焉。”明順天府治即元大都路總管府舊址。

2 城西的羊角市和西市

城西以羊角市最爲繁榮。據記載，羊角市在安富坊、鳴玉坊、咸宜坊一帶，當在今西四牌樓的西北和東南。《析津志》：“羊市、馬市、牛市、駱駝市、驢騾市，以上七處市，俱在羊角市一帶。”又說：“人市，在羊角市，至今樓子尚存，此是至元間(事)。後有司禁約，姑存此以爲鑒戒。”（《析津志輯佚·城池街市》第5—6頁）可見此處主要是畜牲的行市。所謂人市，當是奴隸的買賣，至元年間曾一度在此設立行市，把奴隸當畜牲一樣買賣，經政府禁止後撤消，而人市的樓子尚存。說明當時畜牲的市，還是沿用唐宋的制度，設有酒樓，用作看驗畜牲和談論、簽訂契約的場所。人市也如此。

城西還有西市。據文獻記載，由義坊在西市，元勇武安王廟即明雙關帝廟亦在西市。可知西市在今西四牌樓北大街一帶。西市的情況不詳，當是供應西部居民日常生活需要的街市。

大都大的著名的寺廟，都設在城西。這些寺廟中有廟市存在。例如姚燧《普慶寺碑》記載：“中建二樓，東廡通庖井，西廡通海會，市爲列肆，月收僦直(值)，寺須是資”（《日下舊聞考》卷五十二所錄）。可知大承華普慶寺特爲“中建二樓”，設置廟市，把作爲“列肆”的房屋，出租給商人，每月收取租金，以供寺的開支。

3 城東的舊樞密院角市和東市

城東有“舊樞密院角市，在南薰、明照二坊”（《日下舊聞考》卷三十八引《洪武北平圖經志書》）。南薰坊在蕭牆東南角以東地方，在樞密院以南和光祿寺以東而偏南，有南薰橋可通到蕭牆。

以內。明照坊在東四牌樓西南，樞密院以東地方。蕭牆東牆，從東華紅門以外的朝陽橋（樞密院橋）起，沿通惠河南下，有通明橋（光祿寺橋）、南薰橋等，可以與蕭牆以內交通，沿着蕭牆東牆以內有內府御廚及其相關的機構如柴場、御酒庫、酒坊之類。沿着蕭牆東牆的東南部所以會開設多處紅門并造有橋梁，就是爲了與城東的街市溝通，便於取得大內日常所需的生活資料。舊樞密院角市設在樞密院的東南角的南薰、明昭二坊，就是適應這種需要。這和北宋汴京宮城東門東華門外的街市，南宋臨安宮城北門和寧門外的街市一樣。估計此處街市所供應的，主要是各種高級的飲食品和奢侈的生活用品，以及珍貴的裝飾品和玩賞品，但也有日常生活必需品。《析津志》說：“柴炭市集市，一處在樞密院。”此可爲證。

城東還有東市在居仁坊，如同城西有西市在由義坊一樣，當在今東四牌樓附近。除有日常必需品的街市以外，還該有各種手工業製品和工藝品的街市。《析津志》載：“湛露坊自南而轉北，多是雕刻、押字與造象牙匙筋者，及成造宮馬大紅鞦轡、懸帶、金銀牌面、紅條與貴赤四緒條、士夫青匾條并諸般線香。有作萬歲藤及諸花樣者，此處最多。”（《析津志輯佚·風俗》第208頁）湛露坊是一個精緻的手工業製品和工藝品的作坊集中之地。據《元一統志》，湛露坊因“近官酒庫”而得名，確切地點不詳，但它是屬於大興縣管轄的城東的坊是無疑的，直到明初還是這樣。既有這樣的作坊，必然有銷售的行市和商店存在。

元大都的街市自有其特點，街市上多蒸作的麵糕。“諸蒸餅者，五更早起，以銅鑼敲擊，時而爲之。及有以黃米作棗糕者，多至二三升米作一團，徐而切破，秤斤兩而賣之。若蒸造者，以長木竿用大木杈撐住，於當街懸掛花饅頭爲子。”（“子”上當脫“幌”

字)這種賣餅糕饅頭的店,當街懸掛饅頭作標記,還敲打銅鑼來吸引羣衆。市上的醫師,也按各種不同的專科而懸掛標記。“市中醫小兒者,門首以木刻板作小兒,兒在錦襖中若方相模樣爲標榜。又有穩婆收生之家(按即產科醫生),門首以大紅紙糊蔑筐大鞋一雙爲記。專治婦人胎前產後以應病症(“症”原誤作“證”),並有通血之藥(按即婦科醫生),而生產之家,門懸草圈,上繫以紅帛,則諸人不相往來。”“醫獸之家,門首地位上以大木刻作壺瓶狀,長可一丈,以代赭石紅之。……灌藥之所,門之前畫大馬爲記。”這樣以形象化的標記來代替招牌或幌子,這是大都街市上的一個引人注目的特點。最特別的是“酒槽坊,門首多畫四公子;春申君、孟嘗君、平原君、信陵君。”(以上根據《析津志輯佚·風俗》第202頁,208頁,209頁)該是由於四公子“好客”吧!希望飲酒的顧客都和四公子一樣的“好客”。酒槽坊“又間畫漢鍾離、唐呂洞賓爲門額。正門起立金字牌,如山子樣三層,云黃公鱸”(同上書第202頁)。

4 城門口內外的行市

元大都也和北宋汴京、南宋臨安一樣,在四周城門口內外設有行市。因爲城門口內外,正是交通要道,外來客商會集的地方。黃文仲《大都賦》說:“若乃城闔之外,則文明爲舳艫之津,麗正爲衣冠之海,順城(承)爲南商之藪,平則爲西賈之旅。”其中麗正門因爲是百官上朝集中之地,所以“爲衣冠之海”;文明門外正是通惠河和開河交接的地點,南方來船隻都必須經過這裏進入大都,所以爲“舳艫之津”。順承門又是南來客商會集之處,平則門又是西來客商會集之地。

據《析津志》,大都四周城門口內外行市有如下多種(參看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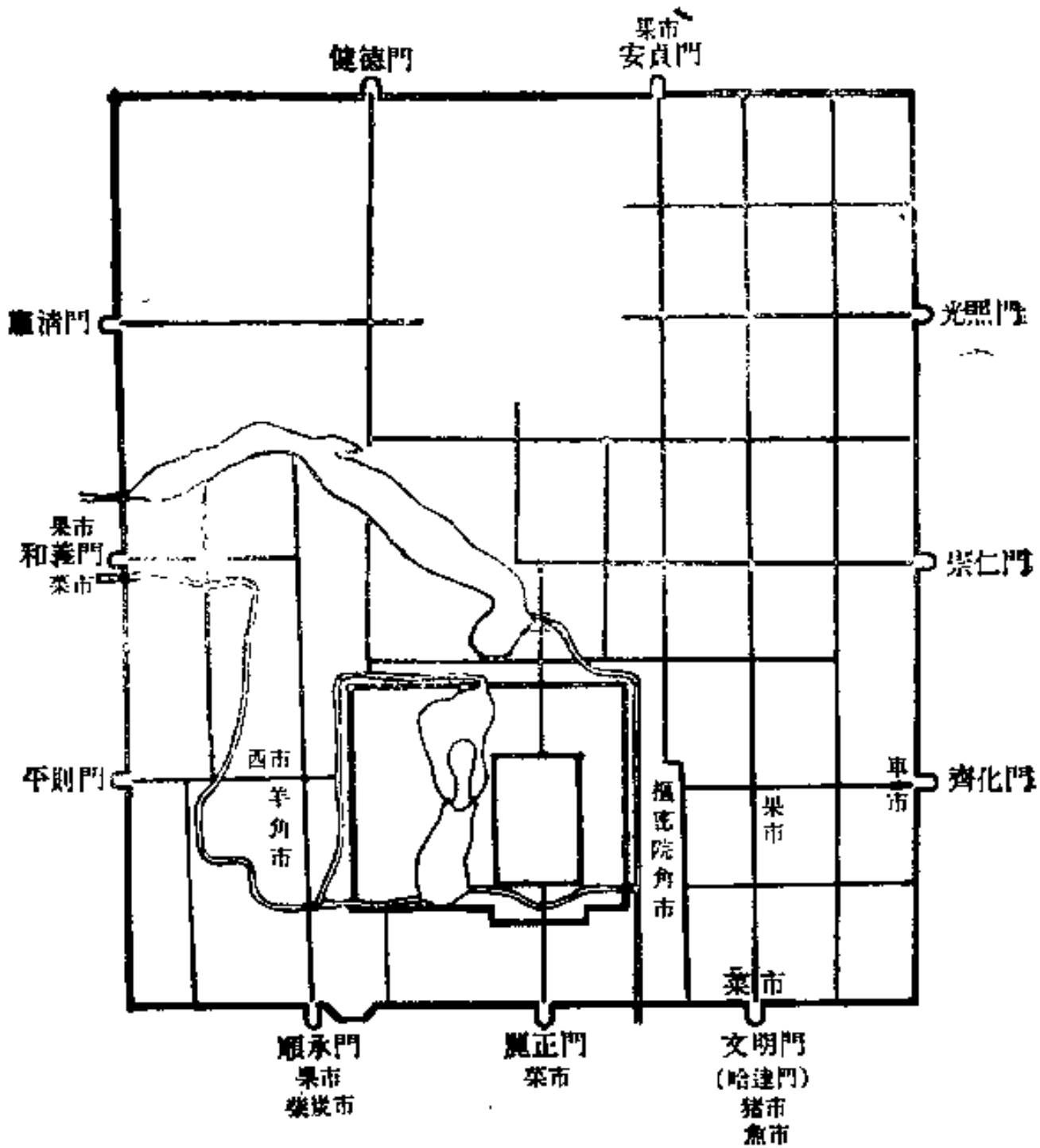


圖82 元大都城門口內外以及城東城西“行市”分佈示意圖

菜市，麗正門三橋，哈達門（按即文明門）丁字街，和義門外。

豬市，文明門外一里。

魚市，文明門外橋南一里。

果市，和義門外，順承門外，安貞門外。

柴炭市集市，一順承門外。

車市，齊化門十字街東。

拱木市，城西。

草市，門門有之。

窮漢市，一在文明門外市，一在順承門城南街邊，一在麗正門西，一在順承門裏草塔兒。

據此可知，文明門外有菜市、猪市、魚市等，因為文明門外水道，是南來商船進城必經之地。這裏也還有橋市，如同《清明上河圖》所描繪的北宋汴京東水門外虹橋上的橋市一樣。《析津志》說：“文明門南橋二所，於上發賣菓菜雜貨等物。”（《析津志輯佚·河間橋梁》第101頁）

齊化門十字街東有車市，因為這裏是通向東方水陸兩路的重要道所在，是南來客商會集之處，又是漕運物資積儲的地方。同時光熙門也是“運漕歲儲”之所。《析津志》：“光熙門，與漕壩相接。當運漕歲儲之時，其人夫綱運者，入糧於壩內，龍王堂前唱籌。”（《析津志輯佚·城池街市》第2頁）當時大都各城門內都設有積儲物資的公用庫。

城西有拱木市，當即木市。拱木原指兩手合抱那樣粗的木材。木市不僅出售大小木材，還兼售建築用的木材半製成品以及其他建築材料。《析津志》：“木市街停塌大杈、叉木柱、大小檣椽桶、並舊破麻鞋。凡磚瓦、石灰、青泥、麻刀。其破麻鞋，役人於水中滌洗曬乾，用刀斫爛，搗開茸茸，如麻苧。若驗船、做電泥坑，並用之。”（《析津志輯佚·風俗》第208頁）

煤市在修文坊前。修文坊的地點不詳，《元一統志》和《析津志》所列舉的大都城內的坊中，都不見有修文坊。都城居民除了用柴炭為燃料外，還用煤為燃料，開始於元大都，因而大都有煤市。大都居民所用燒煤來自西山，北山雖然也有煤，因質量不佳，都中人不取。“城中內外經紀之人，每至九月買牛裝車，往

西山窰頭載取煤炭，往來於此。新安及城下貨賣，咸以驢馬負荆筐入市，蓋趁其時。……往年官設抽稅，日發煤數百，往來如織。”（《析津志輯佚·風俗》第209頁）估計“城下”的煤市當在城西的城門外。

城外有些大寺在節日也有盛大的廟市。例如每年二月八日，“平則門外三里許，即西鎮國寺，寺之兩廊買賣甚大（“甚大”兩字誤作“富甚太平”），皆南北川廣精粗之貨，最為饒盛，於內商賈開張如錦。咸於是日南北二城，行院、社直、雜戲畢集，恭迎帝坐金牌與寺之大佛遊於城外，極其華麗。多是江南富商，海內珍奇無不湊集，此亦年例故事，開酒食肆與江南無異。”（《析津志輯佚·歲紀》第214—215頁）在這個廟市上，不僅有南北川廣精粗之貨，還會集有海內珍奇的商品；既開設酒食店與江南無異，還多江南富商參與，而且設有戲場，“雜戲畢集”。

據《馬可波羅行記》，大都每個城門外都有“附郭”，居民比城內更多，“有各地來往之外國人，或來入貢方物，或來售貨宮中”。“外國巨價異物及百物之輸入此城者，世界諸城無能與比。蓋各人自各地攜物而至，或以獻君主，或以獻宮廷，或以供此廣大之城市，或以獻衆多之男爵騎尉，或以供屯駐附近之大軍。百物輸入之衆，有如川流之不息。僅絲一項，每日入城者計有千車，用此絲製作不少金錦綢絹及其他數種物品。附近之地無有亞麻質良於絲者。固有若干地域出產棉麻，然其數不足，而其價不及絲之多而賤，且亞麻及棉之亦不如絲也。”說明當時大都城外還有規模極大的絲市，并有許多用絲製作金錦綢絹以及其他絲織品的作坊。同上書還講到：大都周圍約有二百個“市”，位置遠近不等，每“市”都有商人來此買賣貨物。此外還有“賣笑婦女不居城內，皆居附郭，因附郭之中外國人甚衆，所以此輩娼妓為數亦夥，

計有二萬有餘。”(馮承鈞譯《馬可波羅行紀》中冊第379—380頁)所說附郭二百個“市”，該包括大小各種行市和集市在內，說明大都各個城門外，所來往居留的外商和客商的衆多，大小各種行市和集市的興旺，興旺的程度超過城內的行市和集市。

5 南城的行市和街市

元大都西南有金中都舊城，元時依然保留，稱爲南城，因而大都或稱爲北城。上段所引《析津志》所說“南北二城”，就是指大都以及南城。南城所住，多數是原住的貧窮人家。當大都新建成時，曾下詔規定，舊城居民要遷往新城的，“以賞高及居職者爲先”，在分配到的八畝一份“方地”上“力不能作室者”不得冒據，因而許多貧窮人家仍然留居舊城。舊城中原來建有大量寺院道觀，多數也依然留存。《析津志輯佚·寺觀》中所記，大多在南城，數量是較大的。

《析津志》所載當時南城的市：

南城市、窮漢市，在大悲閣東南巷內。

蒸餅市，大悲閣後。

蒸粉市，披雲樓南。

鴿市，在喜雲樓下(《析津志輯佚·城池街市》第5—6頁)。

大悲閣即聖恩寺，原爲唐代所建，遼、金都曾重修，元代至元年間又重修，有閣供奉大悲觀音菩薩，“在南城舊市中”(《析津志輯佚·寺觀》第68頁)。說明此地原爲舊市在金中都的東南部，今宣武門外下斜街南口。披雲樓在大悲閣東南，喜雲樓在閣前(同上書古蹟第107頁—108頁)。可知這些市都在大悲閣的周圍。這裏原是金中都的街市，到元代依舊保留。

值得注意的是，蒙古兵攻佔金中都時毀棄的金中都的皇城，

到元代，有些地方已建有新的道觀、酒樓和槽坊。《析津志》說：

昭明觀，在舊皇城内，乃金朝昭明宮之故址也。（《析津志輯佚·寺觀》第90頁）

洗粧臺，在南城金故宮之西，壽安酒樓之北。此臺貯李妃以爲梳粧之所，今昭明道觀是也。殿後故基尚存。其壽安酒樓者，即南中和槽坊也。

壽安樓，在燕京亡金皇城内，東華門之西，街南中和槽坊也（《析津志輯佚·古蹟》第104頁，107頁）。

昭明觀就建築在金的昭明宮故址上，包括李妃的洗粧臺在內。在昭明觀以南的壽安酒樓以及街南中和槽坊，也都是建置在金皇城的廢址之上，說明原來皇城的廢址已逐漸發展爲街市了。

南城也還有些手工業作坊和從事手工藝的住戶。官府在這裏設有織染作坊，并設有織染局總管府。端午節按禮要由中書省禮部、資正院、中正院等進呈御扇。“資正院、中正院進上，係南城織染局總管府管辦，金條、綵索、金珠、翠花、面靨、花鈿、奇石、戒止、香粉、胭脂、洗藥，各各精製如扇拂，一如上位儀式。”（《析津志輯佚·歲紀》第218頁）南城西北彰義門外有碾玉工的住戶羣。《析津志》：“南城彰義門外，去二里許，望南有人家百餘戶，俱碾玉工，是名磨玉局。”（《析津志輯佚·古蹟》第115頁）附近當有玉石產地，碾玉是此地住戶傳統手工藝，官府并設有磨玉局管辦。

南城有些寺院道觀，節日依然有衆多居民前往燒香或游覽。正月十九日“都人謂之燕九節，傾城士女曳竹杖，俱往南城長春宮、白雲觀。官觀歲揚事燒香，縱情宴玩以爲盛節”。有些寺廟節日的盛大活動，都是南北二城的人一起參與的。如二月二日，

盧師山，“南北二城游賞如燕九節”，二月初八西鎮國寺的廟市等。但是，南城許多地方畢竟比較荒涼了，每年二月成爲北城居民“踏青鬥草”之地。“是月也，北城官員士庶婦人女子，多游南城，愛其風日清美而往之，名曰踏青鬥草。”（《析津志輯佚·歲紀》）

6 節日的集市

根據《析津志輯佚·歲紀》，大都每逢節日有供應居民節日風俗所需的特別集市：

正月一日，……車馬紛紜於街衢、茶坊、酒肆，雜沓交易至十三日。……市利經紀之人每於諸市角頭，以蘆葦編夾成屋，鋪掛山水、翎毛等畫，發賣糖糕、黃米棗糕之類及辣湯、小米糰。又於草屋外懸掛琉璃葡萄燈、奇巧紙燈、諧謔燈與煙火、爆杖之屬。自朝起鼓方靜，如是者至十五、十六日方止。

（三月）二十八日乃嶽帝王生辰。自二月起，傾城士庶官員、諸色婦人，酌還步拜與燒香者不絕，尤莫盛於是三日。道塗買賣，諸般花菓、餅食、酒飯、香紙，填塞街道，亦盛會也。

（端午節）都中於節前二三日，小經紀者於是（市）中角頭闖闖處，蘆葦架棚掛畫，發賣諸般涼糕等項。市中賣艾虎、泥大師、綵線符袋牌等，大概江南略同。

（六月）是月也，京師中多市麻泥、料斗粉、煎茄、炒韭、煎餅。

（七巧節）市中小經紀者仍以蘆葦夾棚，賣摩訶羅巧神泥塑，人物大小不等，買者紛然。

（八月）市中設瓜菓、香水梨、銀絲棗、大小棗、栗、御黃子、頻婆、柰子、紅果子、松子、榛子諸般時菓發賣。

都中以麵爲糕饋遺，作重陽節，亦稱闖闖中筵筵蘆席棚叫賣，如七夕、午節。市人又多以小扛車上街沿叫賣。

是月冬至日，太史院進曆，回回太史進曆，又進畫曆。後市中即有賣新曆者。

我們把大都節日集市和北宋汴京、南宋臨安作一比較，可知大都節日風俗的確“大概江南略同”。端午節“市中賣艾虎、泥大師”，“大師”當是“天師”之誤，就是汴京端午節“合泥做張天師”（陳元靚《歲時廣記》卷二十一）。艾虎，臨安也已有這個名目。七巧節市中賣“摩訶羅巧神泥塑”，汴京、臨安都作“磨喝樂”，或作“摩睺羅”。大都居民以三月二十八日嶽帝生辰為盛節，傾城官員士庶都去燒香；臨安居民早已有這種風俗，把三月二十八日東嶽聖帝誕辰作為主要節日，以為“其神掌天下人民之生死。”杭州設有五處東嶽行宮，香火都很盛，其中吳山行宮尤盛，從二月下旬起，燒香者就絡繹而來，到節日更有盛大的奉獻（《夢梁錄》卷二“二十八日東嶽聖帝誕辰”）。大都南北二城有四處嶽廟，以城東齊化門（今朝陽門）外二里的東嶽行宮規模最大，塑像出於名家劉元之手，“真一代絕藝”。此處從三月初起燒香者不絕，到廿日以後道途就堵塞，到節日，要“遣官函香迎入朝廷”，沿路有穿男裝的各色婦人朝拜（《析津志輯佚·祠廟儀祭》第54—55頁）。大規模的東嶽行宮之所以要造在齊化門外，因為這是南來客商會集之處。《析津志》：“齊化門外有東嶽行宮，此處昔日香燭酒紙最為利。蓋江南直沽海道、來自通州者，多於城外居止，趨之者如歸。又漕運歲儲，多所交易，居民殷實。”（《析津志輯佚·古蹟》第116頁）從江南經直沽（今天津）由海道而來到通州的南方巨商，都聚居於齊化門外，所有南方巨商都有信仰東嶽帝的風俗，因而對東嶽行宮“趨之者如歸”。因為南方巨商在大都經濟貿易中位佔有重要地位，這種風俗也逐漸為大都居民所接受。大都節日市上的風俗，所以和江南大概相同，該即受

南方商人的影響。

當時南方各種行市的商人盛行在東嶽行宮分別建立祭祀特定神殿的風俗。如元延祐元年長興州(今浙江長興縣)《修建東嶽行宮碑》(《兩浙金石志》卷十五),碑陰載有五熟行、香燭行、銀行、玉塵行、度生行、澆燭行、印紙行、馬行、篙師行、淨髮行、裁縫行、錦鱗行、糖餅行、果行、綵帛行、廚行、飲食行、酒行等建立各種神殿的施主姓名。看來元大都的東嶽行宮也該有各種行市在這裏分別建立特定祭祀神殿的地方,所以各行商人“趨之者如歸”。

(九) 明代南京結構的新發展

1 明代南京應天府城的建設

南京長期是江南的一個建都的地點。三國時吳建都在此,稱為建業;東晉和南朝的宋齊梁陳也都在此建都,稱為建康。隋攻滅南朝的陳,把宮殿城池夷為平地,另在石頭城設置蔣州,統治這一地區。唐代多次改換地名。五代時南唐又建都於此,稱為金陵,經過擴建,城周圍達25里45步,開始將石頭城及秦淮河都包入城內。其範圍,西起今水西門和漢中門,東至今大中橋,北起今竺橋和北門橋,南至今中華門。城中偏北原有子城,南唐改為官城,周圍四里。南唐滅亡後,北宋在此設江寧府,南宋改稱建康府。元代先稱建康路,後稱集慶路,作為東南地區的政治經濟中心。

朱元璋於元至正十六年(公元1356年)攻克集慶路,改名應天府,作為統一全國的基地,並準備在此建都。後十年,因為“建康舊城西北控大江(按即長江),東進白下門外,距鍾山關遠,而

舊內(指舊的大內)在城中,因元南臺爲宮,稍卑隘。上乃命劉基等卜地定,作新宮於鍾山之陽,在舊城東白下門之外二里許,增築新城,東北盡鍾山之趾,延亘周回凡五十餘里”(《明太祖實錄》卷二十一,丙午年八月庚戌朔)。到次年,闕丘、社稷、宮殿建成,所謂增築新城,只是在舊城白下門以東二里擴建一部分城垣,把建在鍾山之陽的新宮包括在內。明洪武元年(公元1368年)朱元璋在此即皇帝位,即明太祖。次年開始興建整個應天府的新城,經四年完成。洪武八年改建宮殿,洪武十年造成,制度如舊。洪武十一年(公元1378年)正月“改南京爲京師”,正式以南京爲國都。

應天府城就是現在的南京城,城周圍六十六里多,按照山丘、湖泊、河流等地理形勢,從防禦需要修建而成,因而平面成爲西北角伸出而南部突出的不規則形狀,南北長約二十里,東西長約十一里多。東北靠近鍾山西南麓,北面緊靠玄武湖,把鷄籠山、覆舟山包入城中,西北角直伸到長江邊的獅子山,東南包括秦淮河,將南唐金陵和六朝的建康及東府城盡包在內,成爲南京歷史上規模最大而建築最堅固的城。城牆平均高度在十二米以上,寬度在七米以上。城牆外層用特製城磚砌成,城磚由長江中下游一百幾十個府縣按統一規格製成,大型城磚上都印有監造府縣及造磚工匠姓名。每塊城磚平均長達40釐米,寬20釐米,厚10釐米,重約20公斤。城牆以花崗石作基礎,并在磚縫內灌入桐油、糯米漿和石灰汁,因而十分堅固。這是我國歷史上第一座月磚砌的都城。共設十三座城門:正陽門(今光華門)、通濟門、聚寶門(今中華門)、三山門(今水西門)、石城門(今漢西門)、清涼門、定淮門、儀鳳門(今興中門)、鍾阜門、金川門、神策門(今和平門)、太平門、朝陽門(今中山門)。其中通濟、聚寶、三山三門

是南部突出部分的城門，建築尤其堅固，各有三重到四重門洞（參看圖8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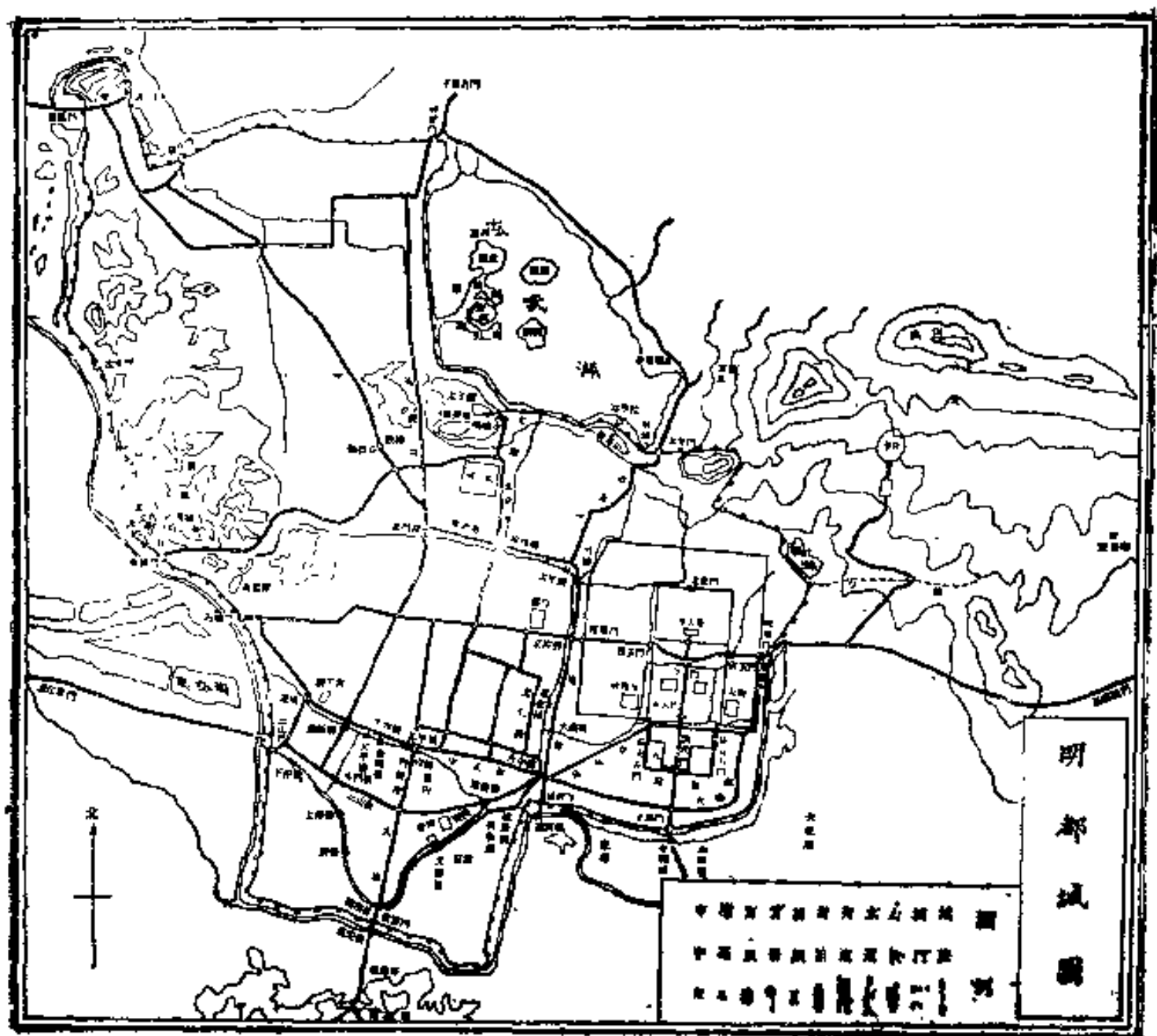


圖83 明代南京城平面結構圖

（據商務印書館1936年出版之朱撰《金陵古蹟圖考》重新繪制）

在應天府城的外圍，洪武二十三年又起建外郭城，周圍約一百二十里。外郭城更是從防禦需要出發，利用天然的山坡形勢，用土築成，東北包括鍾山，東南包容神機營和大教場，南面超越聚寶山（雨花臺），北面包容石灰山和玄武湖，西面靠近長江邊。

城東有仙鶴、麒麟、滄波、高橋四門，南有上方、夾崗、鳳臺、安德、小安德五門，西有馴象、小馴象、柵欄、江東四門，北有外金川、上元、佛寧、觀音、姚坊五門。共十八門。現在外郭城的遺迹已不存在，但人們仍沿用這些城門名作為地名。

鼓樓和鐘樓設在城內西北部北門橋西北。城內西北部設有軍營。應天府署設在城內南部中心內橋西南，江寧縣署設在聚寶門內鎮淮橋西北，上元縣署設在城中中正街以西。府學和貢院設在武定橋以北秦淮河邊，武學設在城中裕民坊東。城內主要街市在南部秦淮河周圍地區，城中內橋、城東大中橋、城北北門橋都有集市。四周城門外特別是靠近長江的城門外有各種日用品的行市，江東門外有糧食和家畜的市，儀鳳門外有竹木的市，清涼門外有布匹、綢緞、茶、鹽的行棧。

2 明代南京皇城和宮城的佈局

南京的皇城偏在應天府城的東部，即今逸仙橋以東，光華門以北地區。宮城居於皇城中部而略偏東，是填平燕雀湖而建築的，因而地勢南高北低。皇城和宮城的佈局，繼承歷代都城規劃而有所發展，有它的特點，這些特點後來成為改建北京的依據。

第一，宮城正南門稱為午門，午門連同左右掖門平而建成“回”形。午門之前，加建端門。在端門的東西兩側建有太廟和社稷臺。端門以南還有承天門。從承天門經端門到午門的御道東西兩側建有宮牆，把太廟和社稷臺隔在外面，使得這條御道的地位突出，成為通向宮城的唯一交通綫，因而承天門雖是建在皇城的正南，實際上成為進入宮城的正南第一道門（參看圖84）。

第二，正因為承天門實際上成為進入宮城的第一道門，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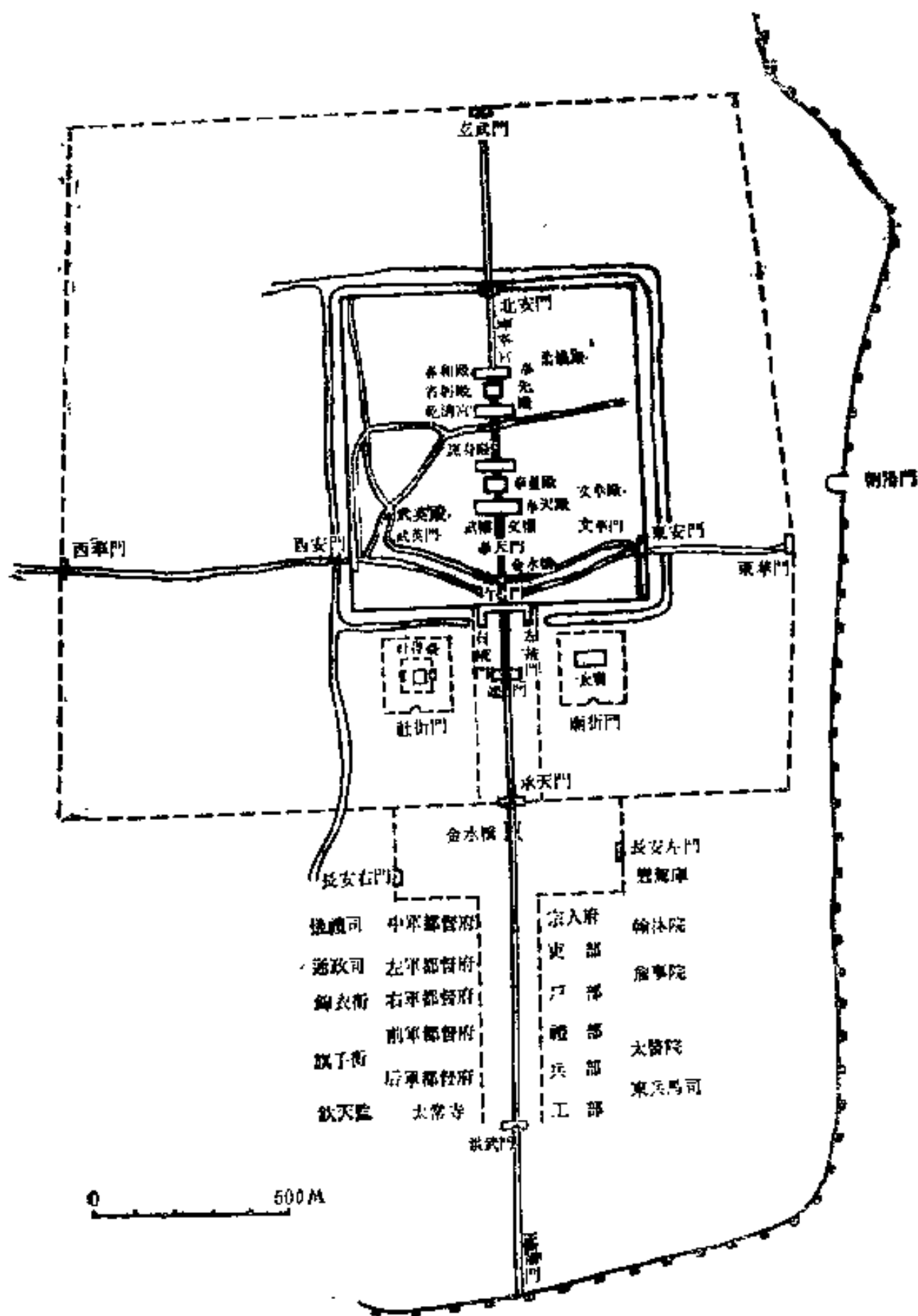


圖84 明代南京皇城宮城佈局示意圖

天門外正中御道東西兩側，建有千步廊。千步廊上建有連續的

廊屋，由南而北，到承天門前的橫街分別轉向東西兩面而成爲曲尺形，這和金中都宮城應天門外曲尺形的對稱的長廊基本上是相同的，從而使皇城前的宮廷廣場成爲“丁”字形格局。在這個“丁”字形長廊的南端設有洪武門，在“丁”字形的橫街的東西兩端設長安左門和長安右門。這個洪武門向南，正對大城的正陽門。洪武門向北經皇城的承天門、入端門到宮城午門，這條筆直的御道，就是一條中軸綫。在中軸綫上，承天門以外和午門以內都設有金水橋，這和金中都皇城宣陽門外設橋、元大都宮城崇天門外設周橋有相似之處。可見明初南京皇城和宮城的建設，正是繼承前代的規劃而有所發展的。

第三，洪武門以內，“丁”字形長廊的左右兩側，建有整齊排列的主要中央官署。《洪武京城圖志序》說：“六卿居左，經緯以文；五府處西，鎮靜以武。”左側的前排是宗人府、吏部、戶部、禮部、兵部、工部，後排是鸞駕庫、翰林院、詹事府、太醫院、東兵馬司。右側的前排是中軍都督府、左軍都督府、右軍都督府、前軍都督府、後軍都督府、太常寺，後排是儀禮司、通政司、錦衣衛、旗手衛、欽天監。因此實際上洪武門以北，包括兩側的中央官署，都屬於皇城範圍。洪武門實際上成爲進入皇城的大門。六部中只有刑部不設在洪武門內。刑部和都察院、大理寺并列爲三法司。三法司以及京畿道設在皇城西北府城以外玄武湖東。

洪武門內集中排列的中央官署，是明代君權高度集中的具體設施。洪武十三年（公元1380年）因所謂“胡維庸案”，殺丞相胡維庸及大批官僚之後，廢中書省，不設丞相，政事由君主親裁，六部尚書直接對皇帝負責，刑部、都察院、大理寺三法司亦由皇帝直接掌管。與此同時，廢大都督府，分爲左、右、中、前、後五府，即所謂五軍都督府，分掌軍籍軍政，分領在京衛所與京師以

外各都司衛所，但不直接統帶軍隊。戰時皇帝任命將帥統率衛所軍隊出征，戰爭結束，主帥還印，軍歸衛所。軍隊調遣雖屬兵部，但是任命統帥及指揮之權則歸皇帝。洪武十五年又改儀鸞司爲錦衣衛。儀鸞司本來只管皇帝出行的儀仗與警衛，改成錦衣衛後，就成爲皇帝親軍十二衛之一，而且不屬都督府，直屬於皇帝。錦衣衛原來如同其他諸衛一樣設有鎮撫司掌管刑獄，不久便增北鎮撫司專管“詔獄”，以原鎮撫司爲南鎮撫司掌管軍匠諸職。所謂“詔獄”，就是由皇帝親斷的重大刑獄。同時錦衣衛又主管偵緝“京城內外奸宄”，錦衣衛的權勢凌駕於三法司之上。當時把錦衣衛和五軍都督府都設在洪武門內右側，而把三法司設在皇城西北，就是由於這個緣故。

第四，從洪武門以南，到大城正陽門以北，保留有一段空隙，以便居民在這裏設置街市，并作爲交通要道。這點，也爲後來改建北京城時所效法。

第五，皇城東西兩面設有東華門、西華門，和宮城東西兩面的東安門、西安門相通。皇城正北的玄武門和宮城正北的北安門相通。

第六，宮城內全部建築，分爲前朝和內廷兩大部分。從宮城午門以內，經金水橋，有奉天門，東西兩側有文華門和武英門。奉天門內有奉天殿，東西兩側有文樓、武樓；文華門和武英門內有文華殿和武英殿。奉天殿是舉行大朝會的正殿。奉天殿以後有華蓋殿，華蓋殿後又有謹身殿。奉天、華蓋、謹身三大殿就是前朝所在。此後的乾清宮、省躬殿、坤寧宮就是內廷所在。這些前朝內廷的殿，均建設在從午門到北安門的南北向中軸綫上，在內廷中軸綫的東西兩側還建有奉先殿、柔儀殿、春和殿等。東側奉先殿是內廷祭祀祖先之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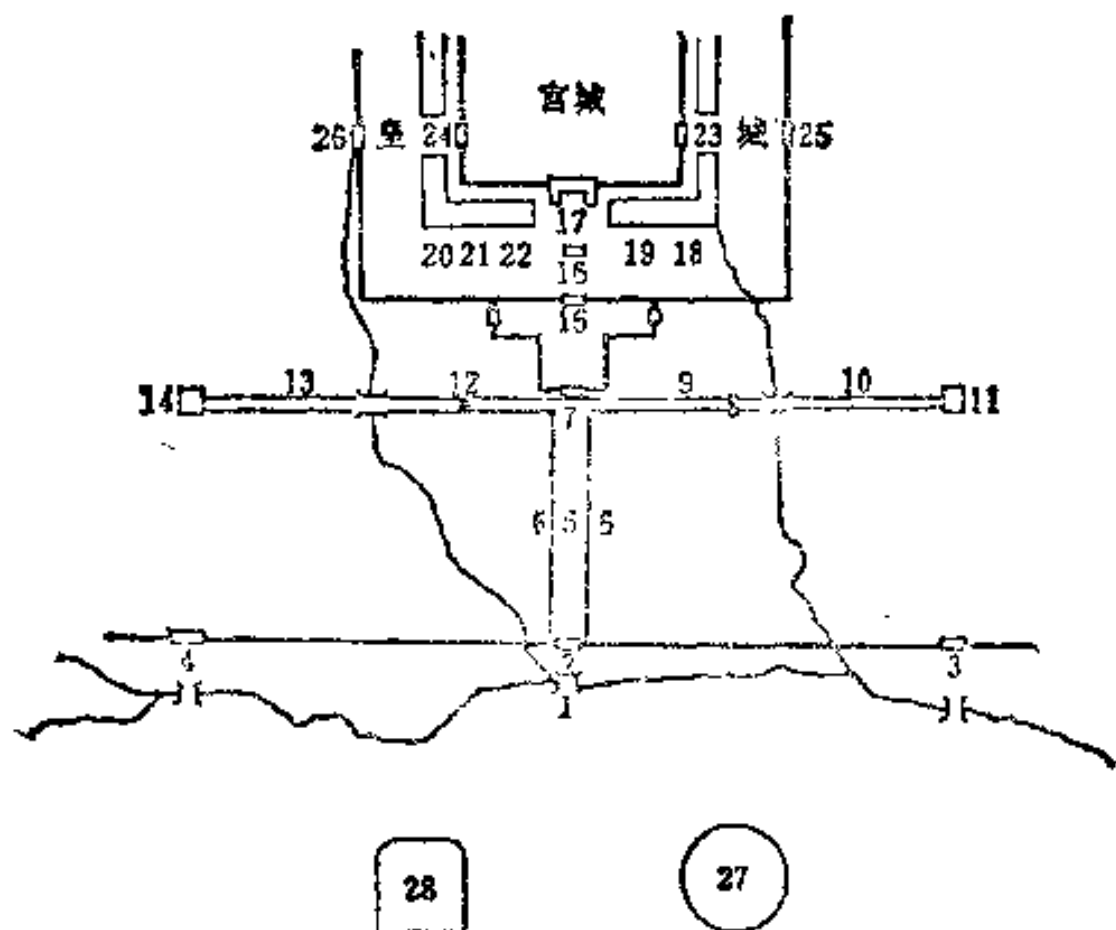
南京宮殿是逐步建成的。元至正二十五年（公元1365年）十二月動工，經一年多，建成奉天等三大殿和乾清、坤寧等宮。到洪武十年（公元1377年）準備定都南京，於是又擴建大內，午門設左右掖門，奉天門左右設東西角門，兩廡之間左右設文樓、武樓，并建文華、武英二殿。洪武二十五年又改建大內金水橋，建端門、承天門樓及長安東西二門。據說“卜築大內，填燕尾湖爲之，雖決於劉基，實上內斷，基不敢盡言也。二十五年後知其誤，乃爲文祭光祿寺竈神云：朕經營天下數十年，事事按古有緒。惟宮城前昂中窪，形勢不稱。本欲遷都，今朕年老，精力已倦，又天下新定，不欲勞民。且廢興有數，只得聽天，惟願鑒朕此心，福其子孫云云。”（王棠《知新錄》卷十二）整個皇城、宮城的設計，由劉基受命主持，最後經朱元璋親自決定，因此所有這種佈局，成爲明朝一代的定制。不僅中都臨濠（今安徽鳳陽縣）的設計規劃，大體上沿襲這種體制，後來明成祖遷都北京，整個北京的重新建設，也還是“規制悉如南京”。猶如孝陵由明太祖修建，故後來北京城北天壽山麓明十三陵的建設也都沿用孝陵的定制。

3 中都臨濠仿南京之制

明洪武元年（公元1368年）三月攻克汴梁，八月下詔以金陵爲南京，大梁爲北京。次年九月又以故鄉臨濠爲中都，命有司仿南京之制建設。建設工作進行了六年，後來劉基上奏，以爲“鳳陽雖帝鄉，非建都地”，因於洪武八年四月以“勞費”而停建。以後陸續拆遷，僅用作禁錮皇室罪犯之處。

明中都雖然沒有最後建成和使用，但是這個仿南京建設的規劃和佈局，對後來明成祖重建北京有着直接影響。鳳陽因爲不像南京那樣受地理形勢的限制，又沒有舊建築的影響，因而規

劃更爲整齊，規模更爲宏大。全城有三重方城，最內爲大內（紫禁城），周六里，高四丈五尺四寸，設有午門、玄武門和東華門、西華門，四角有角樓。皇城包容大內，周圍十三里半，高二丈，設有承天門、北安門和東安門、西安門。外爲中都城，周圍50里443步，呈扇形，土築牆高三丈，西南有鳳凰嘴山突出一角。共開九門。中都城正南洪武門以內，設有南北向的洪武街，兩側設有千步廊。仿南京之制，皇城承天門前設有“丁”字形廣場，南端設大明門，承天門與午門之間設端門。從洪武門經大明門、承天



- 1—鳳陽橋，2—洪武門，3—前左甲第門，4—前右甲第門，5—洪武街，
 6—千步廊，7—大明門，8—云濟街，9—中都城隍廟，10—國子監，11—
 鼓樓，12—功臣廟，13—历代帝王廟，14—鐘樓，15—承天門，16—端門，
 17—午門，18—太廟，19—中書省，20—太社，21—御史台，22—大都督
 府，23—東華門，24—西華門，25—東安門，26—西安門，27—屬丘，
 28—山川壇

圖85 明代中都臨濠洪武門內佈局圖

門、端門到午門的御道，長達三里多，設有御橋，左右兩側設置有文武官署、太廟和社稷。同時鼓樓、鐘樓和中都城隍廟、功臣廟也都設在皇城以前的橫街（雲濟街）上，左右對稱。洪武門以外南郊，設有左右對稱的園丘和山川壇，如同南京正陽門以外南郊設有大祀壇和山川壇一樣。皇城承天門外“丁”字形廣場的南門大明門這個名稱，曾為永樂年間改建北京皇城時所沿用（參看圖85）。

（十）明代北京城的改建

1 洪武年間緊縮北城牆和建設燕王府

洪武元年（公元1368年）三月明軍攻克汴梁，不久朱元璋巡視汴梁，並部署進軍元大都的戰略方針，必使“市不易肆，民安其生”。這年閏七月，右丞相徐達率軍包抄大都，攻克大都以東的通州，元順帝倉皇出走上都。八月二日明軍從齊化門登城而入，迅即克復大都。於是明改大都路為北平府，作為連年用兵蒙古的基地，成為北方邊防的重鎮。

徐達為了鞏固城防，命指揮華雲龍縮小城圈，緊縮北部比較空曠之地，重新建築北城牆。《洪武北平圖經志書》（《日下舊聞考》卷三十八引）載：

舊土城一座，周圍六十里。克復後以城圍太廣，乃減其東西迤北之半，創包磚甃，周圍四十里。其東、西、南三面各高三丈有餘，上闊二丈；北面高四丈有奇，闊五丈。濠池各深闊不等，深至一丈有奇，闊至十八丈有奇。城為門九：南三門、正南曰麗正，左曰文明，右曰順承。北二門，左曰安定，右曰德勝。東二門，東南曰齊化，東北曰崇仁。西二門，西南曰平則，西北曰和義。各門仍建月城外門十座。

據此可知，城圍縮小了三分之一，從周圍六十里縮改爲四十里，城門從十一座改省爲九座，廢去了東牆北端的光熙門和西牆北端的肅清門。新建的北城牆，不僅高度超過東、西、南三面一丈多，而且闊度增加了一倍以上，其目的在於防禦來自北方蒙古兵的進犯，十分明顯。而且命名北城牆新建的城門，左曰安定，右曰德勝，其鞏固城防的用意也很顯著。原來大都城牆只是用土夯築而成，這時“創包磚甃”，就是外包磚砌的層次，也是爲了加強防禦。後來北京的北城牆，比其他三面城牆要雄厚、高大得多，比南牆要厚3—4米，這是後來多次增修形成的，但是它的雄厚的基礎，就是洪武初年爲了防禦蒙古兵侵犯而建築的。

《明太祖實錄》記載洪武元年八月了丑，“大將軍徐達命指揮華雲龍經理故元都，新築城垣，南北取徑直，東西長一千八百九十丈。”所說“新築城垣”，即指新築北城牆和“創包磚甃”。所說“南北取徑直”，當是把南北向的東西兩牆修築得筆直。所說“東西長一千八百九十丈”，可能指新築北城牆的長度，但和明代《戶部志》所載永樂年間北牆長二千二百多丈（《日下舊聞考》卷三十八引）不合。據明代《寰宇通志》：“洪武初改大都路爲北平府，縮其城之北五里。”今北郊外土城，東西有兩大豁子，俗稱東西小關，即元代安貞、健德二門遺址，南距安定、德勝二門，正相當五里地（參看圖86）。

由於城區面積縮小三分之一，只保留原來大都中部和南部，居民的“坊”由原來五十多個縮減爲三十三個。行政區劃大體上沿用大都之制，在北平府下分設大興、宛平兩縣，城東部有二十坊屬大興縣，城西部有十三坊屬宛平縣。

大興縣二十坊：五雲坊、南薰坊、保大坊、昭回坊、靖恭坊、雲樁坊、金臺坊、澄清坊、明照坊、仁壽坊、教忠坊、崇教坊、蓬萊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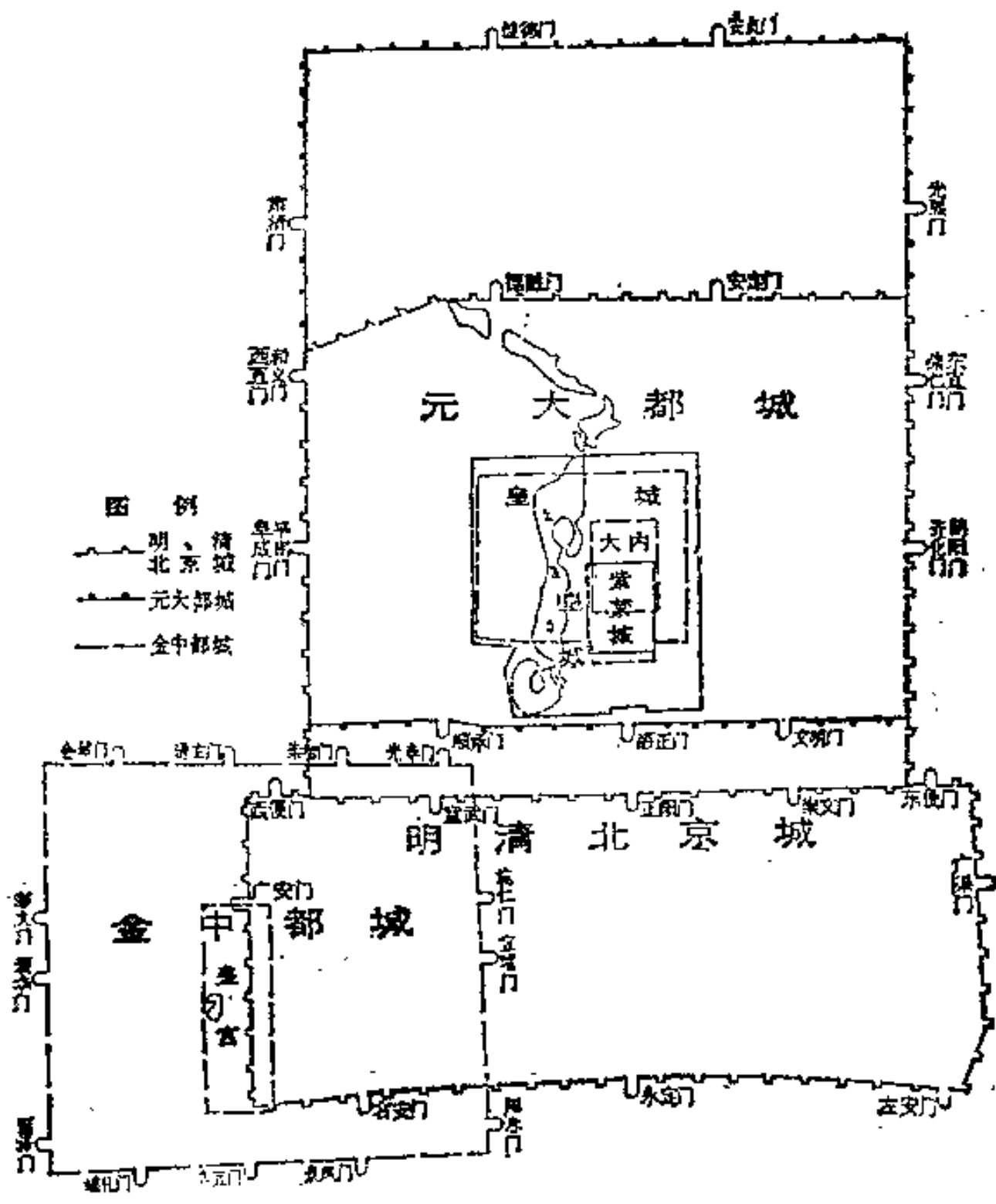


圖86 金中都、元大都與明清北京城位置示意圖

湛露坊、明時坊、黃華坊、思誠坊、居賢坊、賢良坊、寅賓坊。

宛平縣十三坊：萬寶坊、時雍坊、安富坊、豐儲坊、發祥坊、阜財坊、咸宜坊、鳴玉坊、太平坊、金城坊、日中坊、西城坊等（《日下舊聞考》卷三十八，原缺一坊名）。

三十三坊，大多沿用大都中部，南部所有坊的舊名，只有

崇教坊因推崇國子監、文廟而新定坊名。教忠坊亦因紀念南宋大臣文天祥在此被囚和被殺而新定坊名。文天祥曾在此地兵馬司被囚四年，最後被殺於此地柴市。洪武九年北平按察司副使劉崧在此建立文丞相祠（在順天府學東南）。

當時北平府署設在原元大都路總管府舊址，所有地方官署一律改爲北平府所屬，甚至原來都城隍廟也改稱爲北平府城隍廟，立有石碑一丈六尺，上刻“北平府城隍廟”六字，後來建都北京，這塊石碑又被埋地下，但仍露出“北平府”三字（朱國楨《湧幢小品》）。

洪武初年在把元大都路改爲北平府的同時，把原來元的故宮全部拆毀。《故宮遺錄》的著者蕭洵，當時任工部郎中，就是因爲隨大臣參與拆毀故宮的行動，得有機會看到蕭牆以內全部宮殿的建築，隨手作了記錄。

元故宮拆毀之後，因爲燕王分封在這裏，又有燕王府的建設。燕王府建築在元代“西內”地區，即隆福、興聖諸宮的遺址上，在大液池以西。洪武三年朱元璋封其第四子朱棣爲燕王，燕王府於洪武十二年十一月建成。王城設四門，南爲端禮門，內有承運門，中有十一間開闊的承運殿，後有圓殿及存心殿。承運殿左右兩廡設有二殿，周圍有廊廡。此後有前、中、後三宮，都是九間開闊。王城之外設有周垣，周垣也設四門，南爲靈星門，其餘三門和王城門同名。南門外，右側有社稷、山川二壇。王府沿用南京宮殿的規制，前有三殿，後設三宮。王城之外所設周垣，仿自元的蕭牆，因而南門也稱靈星門。燕王於洪武十三年才來到駐地北平。當時諸王的進駐封地，都在洪武十一年定都南京之後。燕王的進駐北平，更是在燕王府建成之後。

2 永樂年間遷都北京、重建宮殿和拓展南城牆

燕王朱棣來到駐地北平後，在指揮出征蒙古的軍事行動中，權力不斷擴大。洪武二十三年（公元1390年）擒獲故元太尉乃兒不花後，很得朱元璋的贊許。三年後，北平都司所屬將校，都奉命聽從燕王節制。洪武三十一年朱元璋病重，又命燕王總率諸王及邊防軍隊“同防邊患，又安黎民”。燕王成爲北方諸王中的最強者。這年朱元璋去世，由長孫惠帝繼位。次年（即建文元年，公元1399年）七月，燕王即起兵，自稱“靖難”，建文四年六月攻陷南京，即皇帝位，即明成祖，以明年爲永樂元年。

永樂元年（公元1403年）改北平爲北京，稱爲“行在”，并改稱爲順天府，同時開始移民充實北京，并着手疏通漕運的大運河。永樂五年開始在北京興建宮殿，首先把燕王府改建爲行宮，以備到北京巡視受朝。《春明夢餘錄》說：“初燕邸（即燕王府）因元故宮，即今之西苑，開朝門於前。”又說：“太宗（即明成祖）登極後，即故宮建奉天三殿，以備巡幸受朝。”奉天殿是舉行大朝會的正殿，在原來燕王府中起建奉天等三殿，就是要把原先的王府改成皇帝的行宮。永樂八年行宮的奉天殿已建成。永樂八年七月和十二年八月，明成祖兩次到北京，都在奉天殿接受羣臣的朝賀。永樂十五年（公元1417年）四月西宮建成，建有承天門、午門、奉天門等三道門。奉天門左右爲東西角門，奉天門內有奉天殿，殿的兩側爲左右二殿。奉天殿之後有後殿、涼殿、暖殿及仁壽、景福、仁和、萬春、永壽、長春等宮（《日下舊聞考》卷三十二引《明典彙》及孫承澤《天府廣記》卷二十一）。這個西宮的設施模仿南京的宮城，只是規模較小，已是皇帝行宮性質，與以前的燕王府不同^④。

與此同時，永樂正準備遷都，皇城、宮城和主要宮殿也正積極準備起建，不僅規劃已定，人力物力也多已調集。永樂十四年十一月下詔，命令羣臣討論營建北京宮殿的事宜，於是六部尚書等上疏，請大規模興建，興建工程於是全面鋪開，自永樂十五年興工，到十八年十一月完成，“凡廟社、郊祀、壇場、宮殿、門闕，規制悉如南京，而高敞壯麗過之”（《明成祖實錄》卷二百三十二永樂十八年十一月戊辰）。爲了使規制悉如南京，以便安排皇城以南千步廊兩側的中央重要官署，把北京的南城牆向南遷移。永樂十七年十一月“拓北京南城，計二千七百餘丈”（《明成祖實錄》卷二百十八永樂十七年十一月甲子）。永樂十九年（公元1421年）元旦明成祖到奉天殿受大朝賀，并升北京爲京師，取消“行在”的稱呼，同時南京變爲陪都，應天府各衙門都加上“南京”二字。這年明成祖受朝賀的奉天殿，已不是西宮的奉天殿而是紫金城中新建的奉天殿了，原西宮改換殿名，稱爲仁壽宮。

明代《工部志》（《日下舊聞考》卷三十八引）記載：

永樂中定都北京，建築京城，周圍四十里。爲九門：南曰麗正、文明、順承；東曰齊化、東直；西曰平則、西直；北曰安定、德勝。正統初，更名麗正爲正陽，文明爲崇文，順承爲宣武，齊化爲朝陽，平則爲阜成，餘四門仍舊。城南一面長一千二百九十五丈九尺三寸，北二千二百三十二丈四尺五寸，東一千七百八十六丈九尺三寸，西一千五百六十四丈五尺二寸，高三丈五尺五寸，壕口五尺八寸，基厚六丈二尺，頂收五丈。

由此可知，洪武年間沿用元代的門名，東北曰崇北，西北曰義和，到永樂年間，崇北已改東直，義和已改西直。到正統年間又有五門改名。《工部志》所標明的四面城牆長度，該是依據工程記錄的，比較可信。其中城南一面的長度有訛誤。根據近代測量結

果，北京內城的南牆和北牆的長度差不多而略微短些，因此這裏所說1,295丈，當是2,195丈之誤。根據這裏所列舉的丈數折合里數，南牆2,195丈，合12.11里；北牆2,232丈，合12.4里；東牆1,786丈，合9.92里；西牆1,564丈，合8.68里，合計總長度為43.11里。可知《工部志》所說“周圍四十里”，《明史·地理志》所說“城周四十五里”，都是約數^⑤。《明成祖實錄》所說永樂十七年“拓北京南城，計二千七百餘丈”。2,700丈，折合里數，正好15里，從中減去南城牆本身長度12.11里，僅餘2.89里，再平分到東牆和西牆上，則各長1.45里，可知當時拓展南城，只是把南城牆向南移動一里半左右。元大都南城牆在今東西長安街的東西延長綫上，據說人民大會堂施工期間，曾在府前街附近發現城壕遺迹。據記載，慶壽寺雙塔的位置正當元代所要築的南城牆要衝，築城時奉命遠三十步“環而築之”，圈入城內。寺址在今西長安街路北，南距今南城牆約一里半。雙塔既然“正當築城要衝”，可知雙塔的位置正當元南城牆的路綫上，足見永樂年間南城牆的向南拓展，確實只有一里半左右。

永樂年間在北京重建宮殿的同時，還曾重建鐘鼓樓。《明一統志》謂鐘樓永樂十八年建，這年正是明成祖重建宮殿完成，準備正式遷都的時候。元代鐘鼓樓原建在中心閣以西的鐘鼓樓街上，看來洪武年間已經把鐘鼓樓東遷到中心閣所在地。《洪武北平圖經志書》說：“鐘樓在金臺坊東，即萬寧寺之中心閣。”又說：“鼓樓在金臺坊，舊名齊政。”永樂十八年該是在那裏重新擴建，以配合遷都後作為都城的需要。鐘鼓樓這樣建在中心閣所在地之後，方向正對準皇城和宮城的正北門，作為全城中軸綫的終點。清代沿用這種佈局，成為“紫禁(城)後護”(乾隆《御製重建鐘樓碑記》)。

明成祖即帝位後，早有遷都北京的意圖。從永樂七年以後他留駐“行在”的時間增多，永樂十五年北巡以後就未再南返。永樂十五年於皇城東安門東南澄清坊內起建十王府，（今東安市場），通為屋八千三百五十楹，永樂十八年建成。把許多王邸設在皇城旁邊，這是加強中央集權的一種措施。朱元璋去世後，惠帝曾採取“削藩”的措施，先後削廢五個藩王。明成祖以藩王取得帝位，即位以後就進一步加強“削藩”措施，解除諸王兵權。這時在京城建設諸王府，就是為了便於就近監視管理。其地後來稱為王府大街。

配合遷都的另一重要準備措施，就是永樂十三年把原來元的禮部舊屋改為貢院，在今內城的東南角。張居正《京師重建貢院記》說：“按京師貢院，始於永樂乙未（按即永樂十三年），是時考卜未定，文皇帝（指明成祖）以巡狩御行輦，庶事草創，其所舉士，秋試不過數十人，春試率百餘人。”這年開始於北京開科取士，命令北直隸府州縣於順天府鄉試，並按洪武年間定制，此後鄉試以子、午、卯、酉年，會試以辰、戌、丑、未年，目的就在於從中選拔“天子門生”和重要官吏，從而擴大中央集權統治的基礎。

3 正統年間建城門樓、月城樓等

原來元大都只有城門一重，元代末年為了加強防禦，才在各城門外加築甕城，並在城濠上改建吊橋。《元史·順帝本紀》載：至正十九年（公元1359年）冬十月，“詔京師十一門皆築甕城，造吊橋。”經一年多時間築成。實際上，至正十八年四月甕城吊橋已在興建。一九六九年夏拆除西直門箭樓時，曾發現元大都和義門甕城城門遺址，門洞內青灰皮上有刻劃的題記，時間為至正十八

年四月二十七日。元大都城門的結構，依據考古工作者鑽探光熙門基址後推測，仍為唐、宋以來“過梁式”的木結構；元代末年所築城門外的甕城城門，已採用“四層券”的磚券門洞代替木結構“過梁式”門洞，這是唐宋“過梁式”木結構城門發展到明清“磚券城門”的過渡形式。這種城門結構在明代沿用了六十多年，到明英宗正統年間才全部改建。

據《明英宗實錄》，“京城因元之舊，永樂中雖略加改葺，然月城樓鋪之制多未備。”正統元年（公元1436年）十月“命太監阮安、都督同知沈清、少保工部尚書吳中率軍夫數萬人修建京師九門城樓”。從正統二年正月興工，到正統四年四月修造全部完成，計有九門正樓及月城樓、各門外牌樓、城四隅的角樓，其中正陽門的月城設左右樓各一，其餘八門的月城只設一樓。同時加深城濠，並在兩岸砌有磚石。九門原有木橋，一律改建石橋，並在兩橋之間設置水閘，使“濠水自城西北隅，環城而東，歷九橋九閘，從城東南隅流出大通橋而去”。原來城牆是土築的，洪武初年“創包磚甃”，外層包砌磚石。因為“內惟土築，遇雨輒頽”。正統十年六月命令“督工甃之”，於是內層也包砌磚了。根據拆除西直門箭樓時發現的元代甕城城門遺址看來，這時各城門以外的月城，就把原有甕城廢棄填塞而包入月城以內。月城即是城門外弧形的甕城。這時城門樓、月城樓等的修建完成，不僅是爲了鞏固防禦，也是爲了增加京師的觀瞻。

4 商業中心南遷和嘉靖年間南面外城的興建

元大都的商業中心在城內北部，集中於積水潭東北斜街和鐘鼓樓街一帶。明代初年因建都南京，不必漕運到此，運糧河道失修，積水潭日漸淤塞，湖面逐漸縮小。永樂年間因大城拓展南

城牆，把原來文明門外一段通惠河故道包入城中。宣德七年（公元1432年）擴展皇城東面，移東華門到河東，又把原來東牆外一段通惠河包入皇城以內，這樣使得城內河道和大運河的聯繫切斷，南來商船不可能像元代那樣經通惠河而進入城內和停泊到積水潭上，因而全城的商業中心也就隨交通的改變，從北向南遷移。

東城的東四牌樓和西城西四牌樓仍然是商業比較發展的地區，有東市和西市的名稱，西市常被作為用刑的場所。東城介於王府街和崇文街之間，正當南面澄濟坊和北面明照坊的交界，有著名的燈市，從每年正月初八到十八有盛大的集市。集市長二里多，“衢三行，市四列，市樓南北相向”。“夜則燃燈於上，望如星衢”。屆時外地商人來此銷貨，既有日用商品，又有骨董珍異；既有鼓吹、雜耍，又有烟火燃放，非常熱鬧（《帝京景物略》和《燕都游覽志》對此都有描寫）。西城金城坊南端城隍廟，有著名的廟市，每月初一、十五、二十五日，東起弼教坊，西到廟廡，有三里長的集市，圖書、骨董、字畫，珠寶、瓷器、宣德鐘，都有出售（《帝京景物略》和《野獲編》對此都有描寫）。廟市上飲食店也十分興隆。“刑部街田家溫麵出名最久，廟市之日，合食者不下千人。”廟市上有許多飲食之場，“內官家人呼為貓食，實南方糖果，諸出崔貓食店，市利與田家等”（史玄《舊京遺事》）。當時京中書肆多設在皇城以南大明門之右、禮部門之外和拱辰門之西以及城南偏西的琉璃廠。每逢舉行會試，書肆就設到考場之前；每逢燈市的節日，就遷到燈市；每逢城隍廟廟市的節日，就移到廟市。其他商品也都如此，燈市和廟市成為城內南部的東西二個盛大集市。

大城正陽門、崇文門和宣武門以南，更是商業發達之區。

正陽門外的大街東側有鮮魚巷(今鮮魚口街)，大街中心有豬市口(今珠市口)，大街以正西坊一部又有和大街並行的煤市口(今煤市街)。崇文門外東側正北坊中部有小市口，崇南坊北部有米市口(今細米巷)和柴市口(今幸福大街)。宣武門外宣北坊和宣南坊之間，廣寧門大街以西有東西向的菜市大街(今廣安門大街西段)、驛馬市街(今驛馬市大街)，驛馬市街以南又有南北向的米市口(今米市胡同)和果子巷(今果子巷)。這些地名都是重要的行市和集市所在。在西北德勝門橋頭和崇文門外、正陽門外，都有“窮漢市”，是小商小販和貧苦市民集中之處。據說“京師窮民儼舍無資，藉片席以棲身，假貿易以糊口”。“北京正陽門前搭蓋棚房，居之為肆，其來久矣。”(《日下舊聞考》卷五十五引《鴻一亭筆記》)

嘉靖以後，由於行會制度的推廣，各省士子來京考試的需要，正陽門外和宣武門外不斷有行會會館和各地會館的建設，更增加大城以南地區的繁榮。與此同時，許多小商人、窮苦人民沒有資財可住城內的，往往住在城外，集中住到南郊謀生的更多。當元大都初建成時，對城內住宅“份地”的分配，只限於蒙古貴族以及官吏和富人，原來住在金中都(當時稱為南城)的窮人就不可遷居大都城內，只能逐漸就近向大都南郊移居。永樂年間拓展南城牆，已將南郊一部分居民圈入城內，但是大部分南郊居民仍隔在南城牆以外。隨着南郊商業的發展，居民日益增長，城南形成大片市肆及居民集中區。

明代從明英宗正統年間開始，走向腐朽衰老的時期，不僅朝廷內部由宦官專權，政治腐化不堪，而且邊防力量日益削弱，終於發生“土木之變”。正統十四年英宗在土木堡(今河北懷來縣東)被瓦剌軍俘獲，瓦剌軍攻破紫荆關，直逼京師。由於新任兵

部尚書于謙率領軍民抗戰，終於迫使瓦剌軍撤退，從此北京城防又引起人們重視。由於城外商業發達和居民衆多，而蒙古騎兵多次南下進迫京師，有些具有遠見的官吏就屢次建議在北京城外圍加建一重外郭城。據《明憲宗實錄》，成化十二年（公元1476年）八月定西侯蔣瓌上奏，鑒於“正統己巳之變”（即土木之變）的教訓，加之“承平日久，聚衆益繁”，請按照太祖“肇基南京，京城之外復築土城”（指周圍一百二十里的外郭城）的例子，增築外城，“況西北一帶前代舊址猶存”。就是說，北面可以利用廢棄元代北城牆作為外郭城，再加築其他三面的外郭城。嘉靖二十一年（公元1542年）掌都察院毛伯溫等又建議修築外城。嘉靖二十九年“命築正陽、崇文、宣武三關廂外城，既而停止”。就是興築南城牆三門以外的關廂的外城，也就是只增築南面的外城，把這一帶關廂衆多的居民圈進城內。但是興築不久又停止了。到嘉靖三十二年給事中朱伯辰又上奏，再次建議利用原有土城故址建築外城，於是下令“相度興工”。閏月丙辰兵部尚書蕭豹等，上報“相度京城外四面”的結果，提出利用已廢棄元代北城牆，四面築外城七十餘里的具體設計規劃，共計南面18里，東面17里，北面18里，西面17里，其中有土城舊址可利用的約22里，應新築的約48里，經明世宗批准動工。到四月，明世宗怕工費重大，成功不易，又問嚴嵩等。嚴嵩等到工所視察，認為宜先築南面，“第用十二三里便當收結”，“東折轉北接城東南角，西折轉北接城西南角”（以上據《日下舊聞考》卷三十八引《明典彙》及《明世宗實錄》等）。

這時嚴嵩當國，政治已極腐敗。建外城雖早已經過多次建議，而到這時才決定動工，是因為這時韃靼（蒙古東部）的俺答正不斷進迫北京。嘉靖二十九年八月有所謂“庚戌之變。”當時俺

答大舉進犯，圍攻北京，一時京師戒嚴，調集各處援兵保衛京師。這是俺答進犯最嚴重的一次，嚴嵩等人聽任蒙古兵到近郊殺傷掠奪後安然返回。這年要興築正陽、崇文、宣武三關廂的外城的決定，就是在這種形勢下所作出的。但是所下的決心不大，不久又停工了。到嘉靖三十二年，由於形勢所迫，再次決定興建外城，並要求臣下經過調查而作出設計規劃。等到批准規劃，又聽從嚴嵩等人主張，依然是只興築正陽、崇文、宣武三關廂的外城。

據明代《工部志》（《日下舊聞考》卷三十八引）載：

嘉靖三十二年築重城，包京城南一面，轉搶東西角樓止。長二十八里，爲七門，南曰永定、左安、右安，東曰廣渠、東便，西曰廣寧、西便。城南一面長二千四百五十四丈四尺七寸，東一千八十五丈一尺，西一千九十三丈二尺，各高二丈，深口四尺，基厚一丈，頂收一丈四尺。四十二年增修各門甕城。

這條外包城南一面的外城，從嘉靖三十二年開始興築，大概經過四五年才全部完成。據喜仁龍《北京的城牆和城門》第六章“北京外城牆垣”所記錄，外城的外側壁上磚文有紀年的，有很多是嘉靖三十二年以前的，也還有嘉靖三十四年及三十六年的。所說長二十八里，實際上不足二十七里。南牆長2,454丈，合13.65里；東牆長1,085丈，合6.02里；西牆長1,093丈，合6.07里。共長26.74里。嚴嵩等人視察後所作規定，“第用十二三里便當收結”，事實上這個外城確實做到了十三里多便收結了。

這個外城，不像內城那樣原是元代有計劃建成的佈局，而是自然地逐步發展形成的商業區和居民區，而且許多地方是由小商人和窮人搭蓋棚房逐漸發展起來的。內城都是南北向並列的大街，東西向並列的胡同，街巷是平行地整齊排列的。外城的街巷

大多不是平行地整齊排列的，多數是曲折狹小或是斜向的街巷組成的，大街只有正陽門通到永定門一條長的南北向大街是筆直的，崇文門到燈市口和宣武門到菜市大街、驛馬市街的交接點的兩條短的南北向大街是直的，從廣寧門向西的東西向大街廣寧門大街和接連的菜市大街、驛馬市街是直的。胡同只有崇文門外崇北坊的北半部頭，二、三、四條東西向胡同是平行排列整齊的，其余大多數的街巷都是斜向或曲折的。

自從嘉靖三十六、七年外城建成以後，京師的地方行政分割為中、東、南、西、北五城，各城有所屬的坊，共計有三十六坊。據張爵《京師五城坊巷胡同集》，嘉靖三十九年五城所屬的坊如下（參看圖87）：

一、中城在皇城的東西兩側，東側從南而北有南薰坊、澄清坊、保大坊、明照坊、仁壽坊，西側從南而北有大時雍坊、小時雍坊、安富坊、積慶坊，共九坊。

二、東城，靠內城東城牆，從南而北有明時坊、黃華坊、思誠坊、南居賢坊、北居賢坊，共五坊。

三、南城，即新建外城以內，正陽門外東側有正東坊，西側有正西坊和正南坊，崇文門外有崇北坊、崇南坊，宣武門外有宣北坊、宣南坊、白紙坊，共八坊。

四、西城，靠內城西城牆，在中城以西，從南而北有阜財坊、金城坊、咸宜坊、朝天宮西坊、河漕西坊、鳴玉坊，共六坊。

五、北城，皇城以北及西城以上，從南而北有發祥坊、日忠坊、昭回靖恭坊、教忠坊、日中坊、金臺坊、靈橋坊、崇教坊，共八坊。

其中，中、東、西、北四城屬於內城，共二十八坊，與前述洪武年間三十三坊作比較，可知坊的劃分已有變動，不但坊數減少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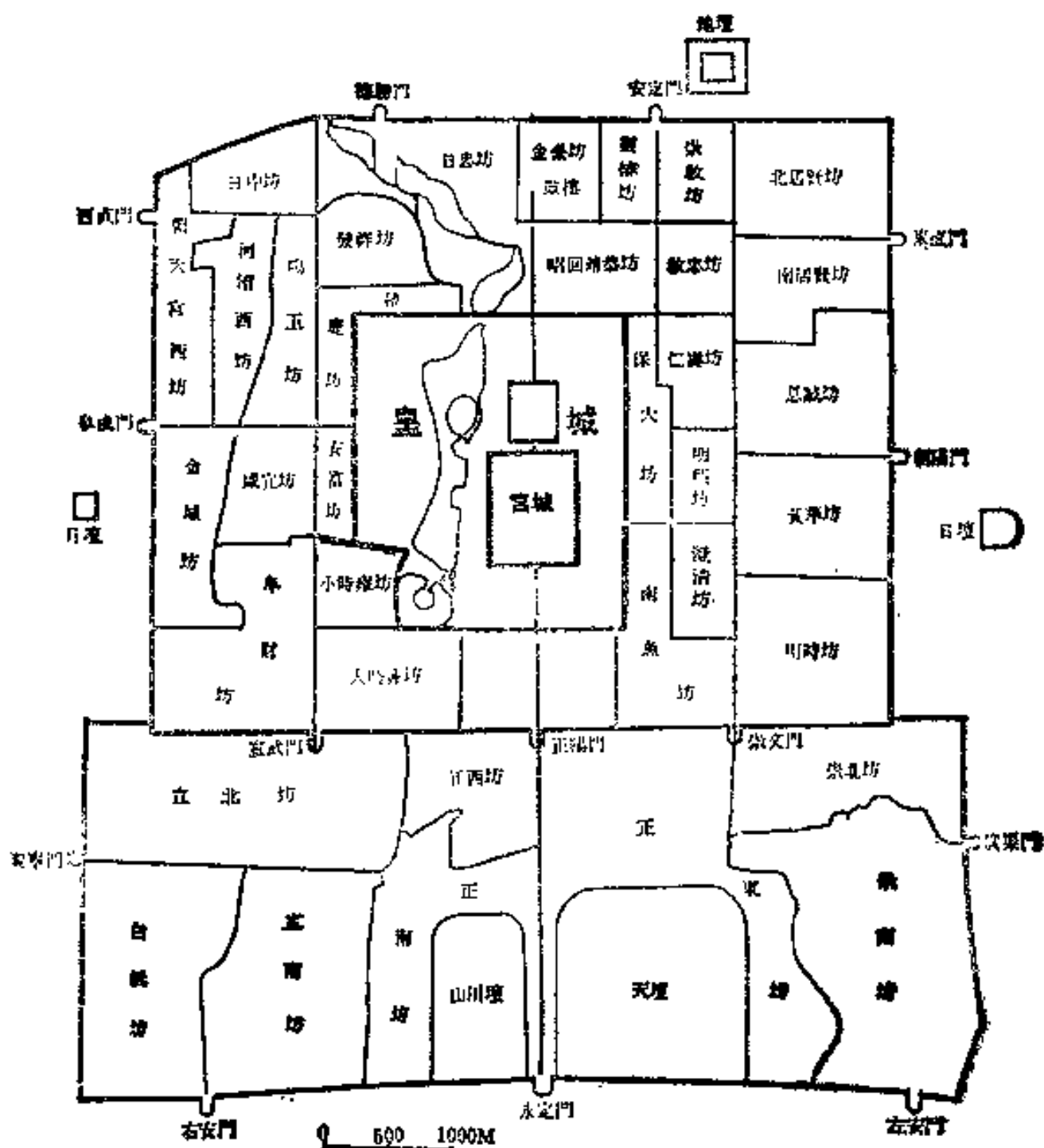


圖87 明代北京城內“坊”的分佈圖

(採自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編輯《明北京城復原圖》，收入《明清北京城圖》，地圖出版社1986年出版)

坊，坊名也有變更。如元代蕭牆靈星門南的五雲、萬寶兩坊，洪武年間尚存在，永樂以後當因所造皇城向南擴展而取消。又如時雍坊當因南城牆拓展，面積擴大，分為大小兩個時雍坊。再如昭回、靖恭當又因面積較小，合併為一個坊。徐莘芳編著《明北

京城復原圖》(收入《明清北京城圖》，地圖出版社1986年出版)，圖上各坊的排列、坊界四至及街巷分佈，就是依據《京師五城坊巷胡同集》的。據孫承澤《春明夢餘錄》所載五城所屬的坊，東城還有朝陽坊，西城和北城都有關外坊，關外坊當是城門外所設的坊，朝陽坊當是朝陽門外所設的坊。這些東城、西城和北城新設的城門外的坊，當是明代晚年因城外東、西、北三面居民人口增長而創設的。

當時五城分設有御史巡視，所屬有兵馬指揮使，設有指揮、副指揮等。同時設有巡城察院，分管坊市民事，如同元的左右巡警院。

當時街坊雖然是貴族、官吏與一般居民相雜，但是貴族與官吏也還聚居在一定地區，以便於保衛與出行。據史玄《舊京遺事》，“勳戚邸第在東安門外，中官在西安門外，其餘卿、寺、臺、省諸郎曹在宣武門，冠蓋傳呼爲盛也。”說明當時勳戚、中官和官吏都分別集中居住在一定的地區。

(十一) 明代北京皇城和紫金城的 重建及其官署分佈

1 依照南京規制重建的皇城和紫金城

明成祖以駐在北平的藩王而取得帝位，即帝位後立即改北平爲北京而準備遷都。他先在北京改建燕王府爲北京行宮，然後再大舉重建皇城、宮城和改建大城。靖難之役，以“清君側”爲藉口，討伐所謂“導誘建文，變亂成法”的奸臣，因而遷都北京後，對北京的建設，一切必須依照太祖的“成法”，所有“規制悉如南京”。

明成祖以及設計者，爲了把元代蕭牆和宮城的舊基，改建得“規制悉如南京”，把新建的皇城和宮城向南推移半里多（約400—500米），並把大城南城牆向南拓展一里半，使得皇城前面千步廊兩側有充分空間可以建置許多中央重要官署，並使大明門（相當於南京皇城前面千步廊南的洪武門）和大城正南的麗正門（後來改稱正陽門）之間，留有作街市的餘地。與此同時，在宮城正北玄武門外，建有高十四丈、周圍約二里的土山，估計是利用拆毀元故宮留下的渣土堆成，稱爲萬歲山，俗稱煤山（清代改稱景山），成爲“大內之鎮山”，作爲中軸綫部署的最高峯，全城突出的制高點，從而加強朝廷坐北朝南的威勢，改變過去元故宮坐南向北的形勢和中軸綫由南向北的佈局。

明代皇城和紫金城比元代蕭牆和宮城南移半里多，明紫金城正南的午門，大約在元蕭牆靈星門舊址附近；午門以內的金水橋，也即在元蕭牆以內的周橋舊址。它如同南京宮城一樣，午門之前建有端門，端門東西兩側建有太廟和社稷臺。端門之前爲承天門，承天門前有“丁”字形長廊，在“丁”字形的橫街東西兩端有長安左門和長安右門，在長廊南端設有大明門，在長廊左右兩側建有整齊排列的中央官署。在官城的午門以內，過金水橋有奉天門（嘉靖後改稱皇極門），奉天門以內，即是外朝主要宮殿所在。奉天門內左右兩側建有文武樓（嘉靖以後稱爲文昭閣，武成閣），正中的中軸綫建有外朝的三大殿，即奉天殿、華蓋殿、謹身殿（嘉靖以後稱爲皇極殿、中極殿、建極殿）。奉天殿是大朝會的正殿，華蓋殿用於召對羣臣和賜宴，謹身殿前有平臺，常用於召見大臣。奉天門東側又有文華殿，作爲儒臣進講經書之處；西側又有武英殿，用於召見大臣，並設有繪畫的“待詔”。三大殿之後，爲內廷所在。中軸綫上建有乾清宮、坤寧宮，此後即後苑，建

有欽安殿。乾清宮東南建有獻祭祖先的奉先殿，西南又建有養心殿。乾清、坤寧二宮東西兩側，爲東六宮和西六宮所在。另有交泰殿，爲皇后居處。大內西北有隆德殿（崇禎時改爲中正殿）、英華殿等，常用於祭祀神佛。

《春明夢餘錄》卷六，載有皇城和紫金城的規模：

皇城外圍牆三千二百二十五丈九尺四寸。其門凡六，曰大明門，曰長安左門，曰長安右門，曰東安門，曰西安門，曰北安門，俗呼曰厚載門，仍元舊也。牆外紅鋪七十二。登聞鼓院在長安右門外。紫金城內牆南北各二百三十六丈二尺，東西各三百二丈九尺五寸。其門凡八，曰承天門，曰端門，曰午門，即俗所謂五鳳樓也。東曰左掖門，西曰右掖門，再東曰采華門，再西曰西華門，向北曰玄武門。牆外紅鋪三十六。

特別值得注意的是，皇城承天門南面的“丁”字形長廊是作爲皇城的一部分的，因而長廊的南門大明門，成爲皇城的進出大門，作爲皇城六門之一。承天門雖然在建築結構上屬於皇城正南的門，但是因爲從承天門經端門到午門的御道兩側建有宮牆，把太廟和社稷臺隔在外面，使得御道成爲通向宮城午門的唯一孔道，實際上就爲進入宮城一連串三道門中的第一道門，因而承天門被作爲紫金城的進出大門，成爲紫金城的八門之一。

《春明夢餘錄》所說皇城的“牆外紅鋪七十二”，紫金城的“牆外紅鋪三十六”，是指防守的駐軍，每鋪設宮軍十人，環城巡警。至於所記皇城和紫金城長度的尺寸，當是依據《工部志》的，比較可信。《春明夢餘錄》所說皇城周圍長3,225.94丈，合17.92里，與《大清會典》所說皇城長3,656.5丈，《大清一統志》所說皇城長3,304丈，合18里有奇，略有出入。《春明夢餘錄》所說紫金城南北牆長236.2丈，東西牆長302.95丈，如果以當時尺度1尺=0.32

米折算，與現在實測南北牆長760米、東西牆長960米，正相吻合。

永樂年間營建北京的重點是“廟社、郊祀、壇場、宮殿、門闕”，要求“規制悉如南京”。宮殿的主體奉天殿，永樂十五年十一月建成，三大殿於永樂十八年完工。太廟、社稷壇、天地壇等，都是永樂十八年所建。前面已經談到，改建鐘樓也在永樂十八年。估計萬歲山的堆成也該在同時。天地壇和山川壇分別建置於麗正門（即正陽門）以南筆直大道的東西兩側，太廟和社稷壇又分別建置於從承天門經端門到午門的御道東西兩側，二者都建置在全城中軸綫的兩側。奉天等三大殿萬壽山中峯以及鐘鼓樓也正處於這條中軸綫上。這條中軸綫從天地壇和山川壇之間算起，穿過麗正門，穿越皇城和紫金城的中，經萬歲山而直到鐘鼓樓，全長達16里（8公里）。所有重要建築物都按照南京的規制，分別建置在這條中軸綫上以及兩側地方。

明成祖對遷都和營建北京的事，十分鄭重，自稱：“方遷都時與大臣密議，久而後定，非輕舉也”（《明史·夏原吉傳》）。正因為“非輕舉”，沒有大事宣揚，連營建的具體經過，記載也十分簡略。實際上，先後經營“凡二十年，工大費繁，調度甚廣。工作之夫，動以百萬”（《明史·鄒緝傳》所載鄒緝上疏）。而且明成祖在營建京城而準備遷都的同時，又在北京近郊為自己營建“壽陵”，便是長陵，“壽陵”的開工和建成在先，朝廷的宮殿開工和建成在後。長陵建在北京東北昌平縣東黃土山南，永樂七年五月開始營建，並“封其山為天壽山”。到永樂十三年九月建成。長陵是按南京太祖的孝陵規制起建的，孝陵的規制是按照當時宮殿的格局的，其中最主要的享殿就是按照大朝會的正殿奉天殿的規模建築的。長陵在天壽山中峯之下，共有三進院落。作為主體建築的

享殿稱爲被恩殿（嘉靖年間命名），造在第二進被恩門內，九間開闊而重簷，進深五間，總面積達1,956平方米。全部使用楠木，有三十二根巨柱，自頂至根，一木構成。中間的四根特大，直徑達1.17米，柱上飾有金蓮，其餘的柱都髹漆。階有三道，中間一道是“神路”，平刻爲龍形，東西兩道有階級，有白石欄三層。兩廡各有配殿十五間（今已不存）。

我們從長陵保存的被恩殿的規模，可以想見當年北京宮中新建成的奉天殿的情況。本來前朝作爲大朝會的正殿都是十一間開闊的，金、元兩朝的正殿都是如此，最初燕王府的主殿承運殿也是十一間。但因明太祖自稱“敦崇儉樸”，在南京所建宮殿“皆樸素不爲彫飾”，正殿奉天殿也減爲九間開闊。所以，明成祖營建北京，遵照成法，所建宮中奉天殿和壽陵享殿也都只九間，但是造得很高敞，所用材料和裝飾十分講究，遠遠超過了南京規格，即所謂“高敞壯麗過之”。當時南京的宮殿，在靖難之役中都被破壞，惟宮門殿座還多留存。仁宗、宣宗以後，曾稍稍修復，但未能恢復明初舊觀。

明代永樂以後，太監掌權，宮中管理不善，常常失火造成大災。就在京師宮殿告成的次年，永樂十九年（公元1421年）四月初八日中午，宮中失火，奉天、華蓋、謹身三大殿全部燒毀。這一大災迫使明成祖下詔求直言，大臣多數奏議“建都北京非便”，還有“言營建之非”，指出“耗費國儲”和“官吏橫征”以及“驅迫移徙”的，有人因此被殺。再次年，乾清宮等又發生火災，於是以奉天門爲正朝，因爲奉天門的結構，實與九間開闊而重檐的奉天殿相同，只有前後設置板門如同清代的太和門。後來仁宗、宣宗、英宗即位，也還沒有舉行大典的正殿。永樂死後，仁宗即位，大臣夏原吉因奏“困於漕運，請還南京”。洪熙元年（公元1425年）又下

令“諸司在北京者悉加行在二字”，並命重修南京皇城，準備明年還都南京，後因仁宗去世而作罷。宣宗時，北京仍稱“行在”。直到正統六年（公元1441年）九月，奉天等三大殿和乾清等二宮重建完成，到十一月初一日詔告中外，並命廢除北京各衙門署“行在”二字，南京各衙門署仍增“行在”二字。從此才重新確定北京為京師，而以南京為陪都。明代北京都城的建設也直到正統年間才完成。

正統年間是進一步營建北京的時期。從正統二年正月到四年四月，先建成了九門城樓、月城樓、牌樓、城四隅角樓，並挖深城壕，砌以磚石，改建木橋為石橋，用以鞏固城防，增加京師觀瞻。這些我們在前節已經叙及。到正統五年三月到六年九月又重建成三大殿和二宮。這是個大工程，是徵發現役工匠和操練官軍七萬人參與建造的（見《明英宗實錄》）。實際上參與建築的人不止此數，據說“當時起造宮殿火頭王長兒等十萬幾千人，佐工者豈止百萬”（陳繼儒《見聞錄》所載嘉靖年間海鹽鄭曉所說）。興工之前準備的材料數量也很大。“正統初，木植已積三十萬餘，他物稱是”（王棠《知新錄》卷十二）。當時朝陽門外和崇文門外設有大木廠兩所，凡各省採到木料都在二廠堆放。並設有黑窯廠和琉璃廠燒造磚瓦備用。

後來嘉靖和萬曆年間宮中又發生兩次大火。嘉靖三十六年（公元1557年）四月十三日申刻於大雷雨中起火，由正殿延燒到午門，到次日辰刻才熄，又燒毀奉天等三大殿以及文武殿和奉天門、午門等十五門。次年重建奉天門，改名大朝門。嘉靖四十一年九月重建成三大殿，改稱皇極、中極、建極；又改大朝門為皇極門。又重建文武樓，改稱文昭閣和武成閣。萬曆二十五年（公元1597年）六月皇極門起火，延燒皇極殿等，天啓五年（公元1625

年)到七年又重建成。乾清、坤寧兩宮，在正德九年(公元1145年)和萬曆二十四年(公元1596年)兩度毀於火，後又重建。

特別需要指出的是，皇城的東南隅有所謂南內，亦稱南城或小南城，建有崇賢殿和重華宮。嘉靖十三年七月命令在重華宮以西建設“金匱石室”，稱為皇史宬，用以貯藏“寶訓”、“實錄”。建築為宮殿形式，“四周上下俱用石甃，中具二十臺”，不用一根木料，面積兩千多平方米，內設雕龍鑲金銅皮的樟木櫃，用以貯存檔案。此後每一皇帝的“實錄”纂修完成，正本即貯藏於此。嘉靖、隆慶間根據《永樂大典》正本另摹的副本一份也貯藏於此。這是所謂“金匱石室”的典型建築和設備，用作國家檔案庫，考慮到了防火、防潮、防蛀和通風，設計上獨具匠心，別創一格，現在仍完好地保存，在今內城南池子南口東側。

2 明代北京的廟、社、郊壇的建置

明代在宗教建築方面，最大進步就是廢除宋、遼、金、元重視建設原廟的禮俗，恢復以太廟作為祭祖的主要場所。北京太廟也建於端門以東地方，始建於永樂十八年(公元1420年)，前有正殿，兩側有廡，後有寢殿。殿都九間開闔，每間一室，共分九室。正殿九室分貯諸帝后衣冠，祭則陳設；後殿九間分列諸帝后神主。嘉靖十一年改從古禮，“祖宗各建專廟”，嘉靖十五年建成九廟。二十年雷火災，其中八廟受災，因而重建太廟，恢復原來“同堂異室之制”。嘉靖二十四年重建成新廟（即今勞動人民文化宮所在）。

永樂年間除建太廟以外，也還按南京規制，在內廷乾清門以內東側建有奉先殿。殿分九室，如太廟的寢殿那樣，每室奉一帝一后的神主，每月每日都有規定的時鮮食品及糕點獻祭，由南

方一定地點採辦送來，南京特別設有專為奉先殿進獻的“進鮮船”，輓夫多至千人，因而耗費很大。但是明代同時取消了宋代以來耗費極大的原廟，取消了陵園內下宮（即寢宮）的建築，廢止了在陵園留宿宮女，在“寢”中日常供奉的方式，不能不說是一種進步。

北京社稷壇在端門以西地方，與太廟相對稱，是永樂十九年建成的，合祭大社、大稷於一壇，這與金、元分建為社稷二壇並列的禮制不同。壇方形，四面有石階三級，沿用元代禮制，壇上層用五色土，按五行方位分築。四周圍有矮牆，中間開門，北門外有拜殿廣五間，又北有享殿廣五間，深四間，單檐。社稷壇辛亥革命以後改為公園（即今中山公園），對外開放，享殿即今稱中山堂。

天壇建在麗正門（後改稱正陽門）以南筆直大道的東側，嘉靖年間擴建外城，圈入外城以內，正當永定門內大街東側。永樂十八年建成大祀殿，合祀天地於此，“其制十二楹，中四楹飾以金，餘施三彩”。其後改為青琉璃瓦，稱為天地壇。嘉靖九年（公元1530年）分祀天地，在大祀殿以南建圜丘，此地改稱天壇（即今天壇公園）。同時在安定門外另建方澤，即地壇。圜丘，為壇三層，平面圓形，上層徑五丈九尺，高九尺，中層徑十丈五尺，下層徑二十二尺，俱高八尺一寸。大祀殿，嘉靖十九年改建大享殿，二十四年建成。

山川壇建在麗正門南筆直大道的西側，於天壇對稱。也是永樂十八年建成，仿照南京山川壇的規制。南京山川壇，正中設七壇，分祭太歲、風雲雷雨、五嶽、四鎮、四海、四瀆及鍾山之神。兩廡設從祀六壇。北京所建，全如南京之制，只是加祀天壽山之神於鍾山之神下。嘉靖十一年（公元1532年）改建為天神、地

祇二壇，於仲秋致祭；另建太歲壇專祭太歲。還在太歲壇西南建有先農壇專祭先農（農神），並在壇南設有籍田，以便皇帝親祭先農並行耕籍禮。所有這些，都為清代沿用。

金自天德以後，分設南北郊和朝日、夕月二壇。在施仁門外東郊，設朝日壇於春分祭祀大明之神；在彰義門外西郊，設夕月壇於秋分祭祀夜明之神。明代沿用其制，嘉靖九年在朝陽門外東郊設朝日壇，於春分祭祀大明之神。壇方廣五丈，高五尺九寸，西向，壇面鋪紅琉璃，階九級用白石。同時在阜成門外西郊設夕月壇，於秋分祭祀夜明之神，並從祀二十八宿、周天星辰以及木、火、土、金、水五星。壇方廣四丈，高四尺六寸，東向。壇面鋪白琉璃，階六級用白石。二壇都附設有具服殿、神庫、宰牲亭、鐘樓、遺官房等。所有這些，都為清代沿用。

3 明代北京官署的設置

永樂年間中央重要官署，除了貢院原為元的禮部和太僕寺原為元的兵部（今太僕寺街東端）以外，多數沿用元代舊官舍，分散各處，還沒有按照南京的規制分別建在承天門南“丁”字形長廊的東西兩側。

開始在“丁”字形長廊兩側起建官署是在宣宗宣德年間，是爲了舉行大朝會和舉行祭祀、接待朝覲會同的需要。宣德元年（公元1426年）四月首先建成鴻臚寺於長廊東側後排中部，介於後來建成的工部和欽天監之間，看來是爲了鴻臚寺掌管朝儀，適應大臣上朝和舉行大朝會的需要。宣德五年二月又起建禮部於長廊東側前排的前端（靠大明門東側），於次年五月建成（《日下舊聞考》卷六十三及《天府廣記》卷二十一），當是由於祭祀天地宗廟社稷和接待“四方萬國朝覲會同”的需要。

英宗正統年間是大規模建設官署的時期。正統三年（公元1438年）首先建成總督倉場公署於東城明時坊表背胡同，以便加強管理倉庫廠場。正統七年在三大殿和兩宮重建工程完成以後，就下令按照南京之制，在長廊兩側以次興建官署，“其地有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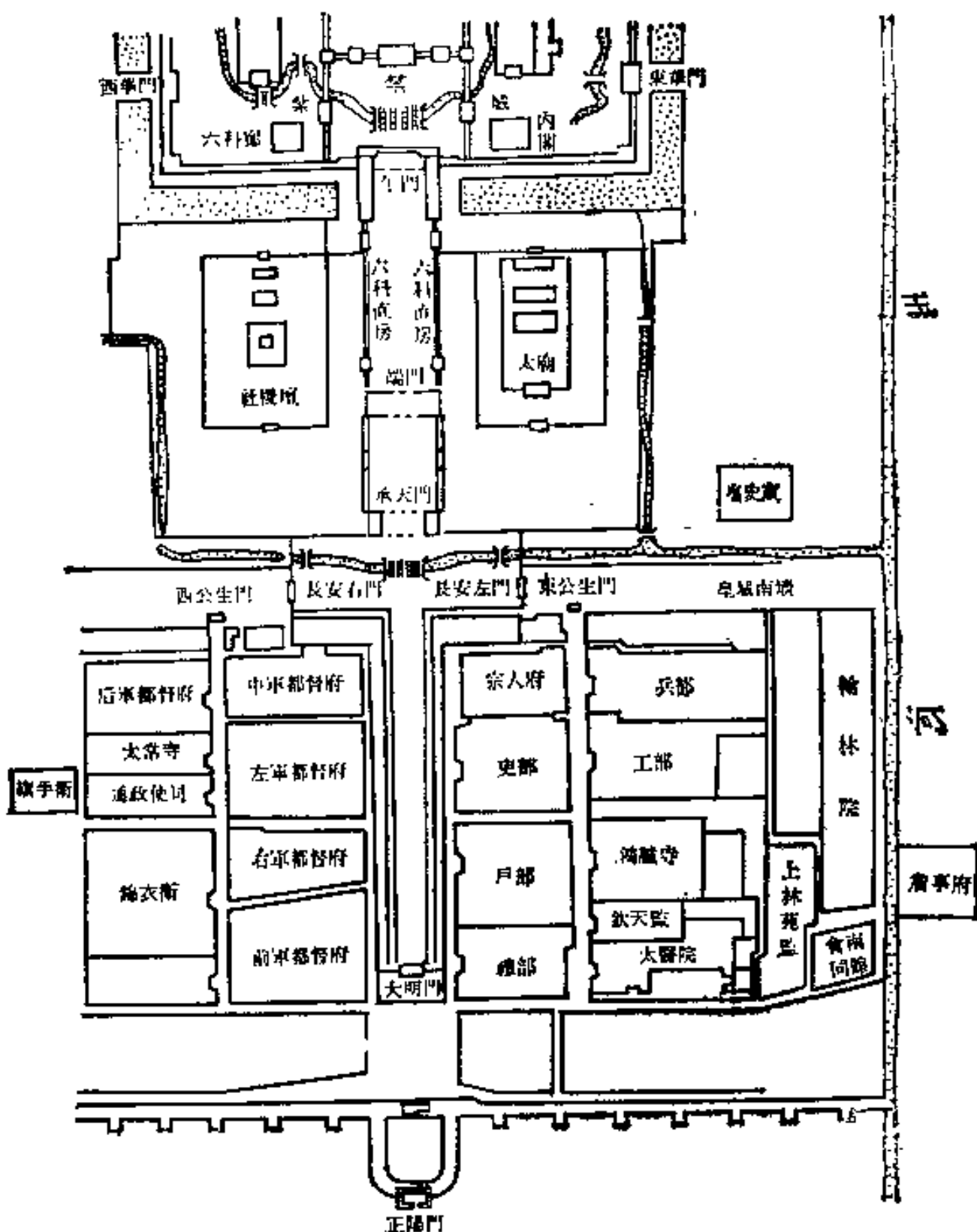


圖88 明代北京城大明門內佈局圖

民妨礙者，悉徙之”。原來五雲、萬寶兩坊居民該即於此時全部被徙走。這年四月“建宗人府、吏部、戶部、兵部、工部、鴻臚寺、欽天監、太醫院於大明門之東，翰林院於長安左門之東”（《天府廣記》卷二十一）。就是把“丁”字形長廊東側的中央官署，全部按照南京之制建成，由南而北，前排是禮部、戶部、吏部、宗人府，後排是太醫院、欽天監、鴻臚寺、工部、兵部。更有翰林院建在長廊東側末排靠玉河西堤。其中禮部、鴻臚寺，早在宣德年間已建成，這時當重加修整（參看圖88）。

明代南京皇城前面所列官署比較特殊的地方，就是長廊東側只有五部，而刑部與都察院、大理寺合稱“三法司”，另建在皇城以外西北角。這時爲了“悉如南京之制”，正統七年十一月，建刑部、都察院、大理寺於宣武街西（《明英宗實錄》），就是把“三法司”建在宣武門內西側阜財坊的長安街西，後來稱爲刑部街（今西長安街民族文化宮所在）。同時起建詹事府於長廊東側所建官署以外玉河東堤，今御河橋東。

永樂六年（公元1408年）爲了接待外來使者，改順天府燕臺驛爲會同館，在皇城東南澄清坊十王府以南（今王府井大街東三條胡同西口）。正統六年又分建南北兩個會同館，北會同館即用會同館改建，南會同館則設在長廊官署的東南角，翰林院之南（今東交民巷北正義路南口）。

正統八年又建五府、通政司、錦衣衛於大明門之西，其地原爲旗手衛公署，後遷到通政司之後（《天府廣記》卷二十一）。就是按南京之制，由南而北，前排是前、右、左、中四軍都督府，後排是錦衣衛、通政司、太常寺、後軍都督府，並把原來旗手衛遷到通政司以西。這樣長廊東西兩側的中央重要官署“悉如南京之制”建成。

大學士直舍，即內閣，設在午門以內東南隅文華殿西南，是殿閣大學士視事之所。這是嘉靖十六年（公元1537年）與制敕房、誥敕房同時建成的。六科（吏、戶、刑、工、兵、禮）直房則設于午門以外東西兩廊，午門以內西側原有六科廊，永樂年間歸併到六科直房。

工部所屬鑄錢的寶源局在東城黃華坊石大人胡同（原石亨舊宅），嘉靖年間設置。工部所屬制作的文思院在東城明時坊門柳胡同東側，正德六年改建而成。鑄錢原屬工部寶源局，天啓二年（公元1622年）戶部加設寶泉局於東四牌樓街北，由倉庫改建而成。禮部所屬翻譯的四夷館原在玉河橋西，永樂五年（公元1407年）設置，景泰三年（公元1452年）改稱四譯館，建設於東安門之東南薰坊內。國子監沿用元舊址，在北城崇教坊方家胡同北（今國子監胡同首都圖書館所在）。

以上為明代主要中央官署。正統十年開始命令內閣與六部、都察院、通政司、大理寺堂上官、六科掌印官會議。如果會議需要儒臣商討，則翰林院、詹事府左右春坊、司經局、國子監參與。

地方官署以順天府署為首要，設在北城靈椿坊（今交道口西北），即元大都路總管府舊址。大興縣署在北城教忠坊順天府學東北（今大興縣胡同北）。宛平縣署在中城積慶坊阜牆北大街中部（今地安門西大街）。中城兵馬司在仁壽坊紅廟街西（今南兵司馬胡同北），東城兵馬司在思誠坊三條胡同北（今東四三條胡同北），南城兵馬司在宣南坊閻王廟西（今兵馬司前），西城兵馬司在咸宜坊（今兵馬胡同北），北城兵馬司在昭回靖恭坊（今北兵馬司胡同北）。內東巡捕廳在潯清坊諸王館東（今東單三條胡同北），內西巡捕廳在金城坊（今巡捕廳胡同），巡按察院也在金城

坊(今按院胡同北)。

(十二) 清代北京的建置

1 清代北京宮殿的擴建和改建

女真貴族所創建的清朝，以代明朝清除農民軍為藉口，於順治元年(公元1643年)進入山海關，進據北京而定都。清代幾乎完全沿用明代在北京的建置，連城門名稱也未作變動；整個沿用明代皇城與紫金城的佈局，只改變了幾個重要的門名與殿名。但是宮城中陸續改建了重要宮殿，並有所增改；特別是提高了重要殿宇開間的等級制度，重新調整了部分宮殿的用途。皇城以內建築則有很大的調整和改建。

原來明代皇城正南承天門前的“丁”字形長廊(即宮廷廣場)南端有大明門，清代改稱大清門(辛亥革命以後改稱中華門)。這是磚砌券洞門，有三道券洞，上有琉璃斗拱和九脊頂，下段砌白石須彌座。清宮外圍的門，多數如此式樣。承天門，順治八年重修，改名天安門；與此相應，皇城正北的北安門改名地安門。天安門是一座高大的磚臺，有五道券洞門，磚臺全部塗丹，下為白石須彌座。磚臺上建有九間開闊而重檐的大殿。門前後各建有對稱的石華表一對。端門、東華門、西華門、神武門(紫金城北門)，都屬這種式樣而略小，只有券洞三道，外面作方門。午門，順治四年重建，沿襲明代形制，高臺平面建成“回”形，中部闢方門三道。臺上建築，由中部正樓九間、兩側廡各三間、四角方亭各五間及東西廡各十三間，合成一體，氣象雄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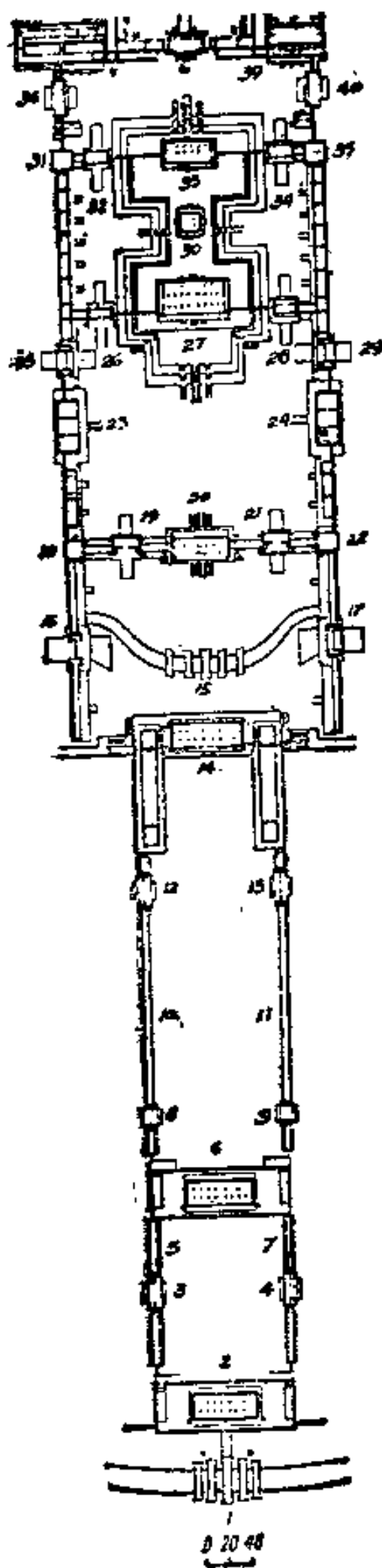
午門和金水橋以北，即是外朝的三大殿，明代稱為奉天殿(後改皇極殿)、華蓋殿(後改中極殿)、謹身殿(後改建極殿)，清

代順治二年改爲太和殿，中和殿、保和殿、太和殿前有太和門，其結構實與九間重檐的大殿相同，只是前後不作牆壁和格子門，設置有板門三道(參看圖89)。

明代大殿，以九間開闢爲最尊。清代恢復了金、元以十一間爲尊的體制，其次爲九間、七間、五間、三間。殿頂以重檐廡殿式爲最尊，其次爲重檐歇山式、單檐廡殿式、單檐歇山式、懸山式。這種體制是康熙年間建立的。

太和殿，原爲明代皇極殿，九間開闢，順治三年曾重建。康熙八年(公元1669年)改建爲十一開間。康熙十八年大殿火災，今殿是康熙三十四年再建的。原來明代皇極殿，大體上與長陵祿恩殿相同。祿恩殿九間開闢，五間進深，面積1,956平方米，而今太和殿十一間開闢，五間進深，面積2,377平方米，正相當於9與11之比。元代正殿大明殿十一間開闢，東西二百尺，深一百二十尺，高九十尺(《南村輟耕錄》卷二十一“宮闕制度”)。如今太和殿面闊63.96米，進深37.17米，高26.92米，正和大明殿的尺度相近。元代宮殿的規格，同樣以十一間、九間、七間、五間、三間爲等級。可以說，清代康熙年間重建的大殿，基本上恢復了元代的規格。太和殿外有廊柱一列，共十二根；殿內分列東西十二根柱，南北共六行，共七十二根。殿階基爲白石須彌座，前面踏道三出，石陛共分三級，每級繞有白石欄杆，欄杆和踏蹠都有精緻浮雕。

中和殿，原爲明代中極殿，又曾稱華蓋殿，重修於順治三年，平面方形，縱廣都是三間，圓頂，四面無壁，均安格子門和檻窗，實爲方形的大亭。殿前後兩面各有踏道三出，左右各有踏道一出。太和殿是三大節(元旦、冬至、萬壽節)舉行大朝會的禮堂，中和殿具有小禮堂性質。每遇大朝會，皇帝先在此升座，受內



- 1—外金水橋
- 2—天安門
- 3—社稷衙門
- 4—太廟衙門
- 5—西廡
- 6—端門
- 7—東廡
- 8—社左門
- 9—廟右門
- 10—西廡(朝房)
- 11—東廡(朝房)
- 12—闕右門
- 13—闕左門
- 14—午門
- 15—金水橋
- 16—熙和門
- 17—祜和門
- 18—儀仗
- 19—直殿門
- 20—太和門
- 21—昭德門
- 22—紫棧
- 23—弘文閣
- 24—休仁閣
- 25—右翼門
- 26—中右門
- 27—太和門
- 28—中左門
- 29—左翼門
- 30—中和殿
- 31—紫棧
- 32—后右門
- 33—保和殿
- 34—后左門
- 35—紫棧
- 36—隆宗門
- 37—內右門
- 38—乾清門
- 39—內左門
- 40—景運門

圖 89 清代北京宮城三大殿平面圖

閣、內大臣、禮部等人員行禮完畢，然後出御太和殿。或者用作舉行大禮前的準備之所。

保和殿，九間開闊，重檐，大體上明代萬曆年間重建建極殿的原構。康熙二十九年曾重修三殿，到三十六年完工。乾隆三十年（公元1765年）又曾重修三殿。如今三殿保存着乾隆重修之後的面目。保和殿常用於設宴接待外藩，或用於新進士的朝考等。

在午門以內、東西兩側的協和門、熙和門以外，有文華殿和武英殿，都是五間開闊。文華殿常用於大臣進講經書，武英殿常用於貯存書籍。文華殿之後有文淵閣，是乾隆四十一年（公元1776年）仿寧波天一閣藏書樓建設，用以藏《四庫全書》。閣有兩層，但在兩層之間另加暗層，實為三層。平面五間，西端另加一間按扶梯，因成六間，武英殿之南有南薰殿，乾隆十四年以內府所藏歷代帝后圖像藏於此處。外朝東西兩側的文華殿、武英殿兩區，實為皇帝講經藏書與進行文化活動的地方。

外朝三大殿，共同建立於一崇高廣大的“工”字形石陛之上。太和殿與保和殿建在前後兩端，而正方矮小的中和殿建在“工”字型石陛中間。後廷三宮也是同樣的佈局。乾清宮九間開闊，五間進深，順治十二年重建，康熙八年再建。交泰殿的形制正如中和殿。坤寧宮又是九間開闊，也是順治十二年重建。三宮共同建立於“工”字型石陛之上。乾清宮用於引見和召對臣下。交泰殿於明代用作皇后居處，清代用於設寶座，安放銅壺刻漏、自鳴鐘及御用寶璽。

乾清宮的東西兩廡有端凝殿和懋勤殿。懋勤殿之南有批本處，凡內閣擬票本章都要經此處進呈；批本處之南，西出為具華門，門南為內奏事房，每日內外臣工的進奏章，由外奏事諸臣接

入，交於此房進呈，得旨仍由此交出。從內奏事房轉南，有南書房，為內廷詞臣直廬。南書房之東為宮殿監等辦事處。

內廷三宮的兩側，東西各有六宮，明代合稱為十二宮，清代略有增改，以致不相對稱。紫金城東北部，東六宮以東，有寧壽宮及其後花園，規模比較巨大，為高宗傳位後的居處，後來慈禧太后也住在此。西六宮以西，有慈寧宮、壽康宮、壽安宮等，常為太后所居。

紫金城正北神武門，過橋即為景山，山上五峯有亭，乾隆十六年所建。景山東北有壽皇殿，乾隆十四年重建。大殿分九室，規制仿太廟，陳列皇帝祖先的畫像，舉行祭禮。

2 清代北京廟、社、郊壇的改建或因襲

清代宮殿以十一開間為最尊，因而將太廟前殿也改建為十一開間。明代太廟，正殿和寢殿都是九間開闕，清代改為前殿十一開間，中殿和後殿都九開間，這是乾隆四年（公元1739年）修繕完成的。

清代社稷壇沿用明代建置，不僅壇的建築依然如故，所用享殿五開間，也還是明代建築，即今所稱中山堂者。

清代天壇也因襲明代建置。圓丘在乾隆十四年（公元1749年）改建，面積有所拓展，而高度略減低，仍分三層，上層徑九丈，高五尺七寸，二層徑十五丈，高五尺二寸，三層徑二十一丈，高五尺，全部用白石砌成，每層周圍有欄楯，四面均出踏道九級，都沿用明代格局。壇四面築矮牆，中間設門，北門以北有皇穹宇，是一座單檐的圓形小殿，建於白石高基之上（基高九尺），東西南三面出陛，各十四級。周圍立朱柱八根，蓋藍色琉璃瓦，上安金頂。南面闕門，殿前左右廡各五間。

從皇穹宇往北，經成貞門，越月陸橋，再經祈年門，即祈年殿。祈年殿即明代大祀殿或大享殿，乾隆十六年改今名。這是一平面圓形三重檐的大殿，直徑30米，高38米，建於三層圓壇之上。壇制略如圓丘，而直徑較大，上層徑二十一丈五尺，二層徑二十三丈二尺，三層徑二十五丈，南北兩面三出陸，東西兩面一出陸，上層二層各有階九級，三層十級。壇上祈年殿，圓形，內外周圍各有朱柱十二根，中間立有“龍井柱”四根。檐三重。周圍十二間均安格扇門，無磚壁，上覆三層藍色琉璃瓦，上安金頂。祈年殿在光緒十五年被雷火焚毀，次年按原樣重建。祈年殿之後有皇極殿，它和祈年門，都是嘉靖二十四年建成的。

清代先農壇在外城永定門內大街西側，和天壇對稱，即原明代山川壇。其中有先農壇、天神壇、地祇壇、太歲壇，都是沿用明嘉靖以後的舊址，並繼續沿用明代的禮制。

日壇在朝陽門外東郊，月壇在阜成門外西郊，即是明代朝日壇和夕月壇舊址，僅建築略有改變。如明代日壇面鋪紅琉璃，月壇面鋪白琉璃，清代均改用金磚。

3 清代北京官署的因襲、調整和增設

清代北京中央官署，大多沿用明代建置，重要官署依然設在天安門前千步廊的東西兩側，東側官署全部未作變動，西側則作了很大的調整。

千步廊東側官署，仍沿襲明代設置，前排為宗人府、吏部、戶部、禮部，後排為兵部、工部、鴻臚寺、欽天監、太醫院。翰林院仍在長安左門東南，會同館改為會同四譯館，仍在玉河橋西街以北，詹事府仍在玉河東堤。

吏、戶、禮、兵、工五部，是當時朝廷的主要官署。吏部設有

文選、稽勳、考功、驗封四司。戶部按省分爲十四司，並有俸餉處、軍需局等，還設有大庫在署東北，緞匹庫在東安門內，顏料庫在西安門內，合稱三庫。所屬寶泉局設在東四牌樓街北，沿用明代舊址，明代在此鑄造錢幣，清代改爲局的公署，另設四廠鑄造。戶部所屬梁倉，都分設在城東朝陽門內外、東直門內、東便門外及德勝門外，總督倉場公署亦設城東。禮部設有儀制、祠祭、主客、精膳清吏四司，附設有鑄印局、會同四譯館及樂部公署等，樂部公署在景山西門外。兵部設有武選、職方、車駕、武庫清吏四司，工部設有營繕、虞衡、都水、屯田四司。署東有節慎庫，明代舊址，另設製造庫在長安右門外，丙、丁、戊三庫在西安門內，砲子庫在左安門內，鉛子庫與火藥局在右安門內。

千步廊西側官署，清代作了很大調整。前排原是明代的都督府，清代由於兵制不同，廢棄不用，逐漸成爲居民的胡同。後排官署，只有太常寺沿用明舊址，原設在後軍都督府之南，前面有關帝廟及土地神祠。太常寺之南，原爲通政司，通政司之南，原爲錦衣衛，清代都作了重大的調整。

最重要的調整，就是廢除錦衣衛。錦衣衛是明洪武十五年由儀鑾司改設的。錦衣衛居於皇帝親軍的首位，直屬於皇帝，並設有北鎮撫司專管皇帝親自決斷的重大刑獄，即所謂“詔獄”，常用刑訊逼供，誅連蔓引，造成牽連數萬人的大案。洪武二十六年廢止錦衣衛理“詔獄”，後二年又下令禁止“法外加刑”。但是永樂帝即位，就恢復用錦衣衛理“詔獄”，與東廠同樣成爲皇帝重用宦官進行殘酷統治的機構。到英宗以後，廠衛更進一步成爲偵察、緝捕、拷訊、誣陷的暴力工具。原來主管刑獄的三法司（刑部、都察院、大理寺），逐漸失去權力，最終被置於其控制之下。清代爲了革除這種弊政，於順治二年（公元1645年），取消錦衣

原來明代錦衣衛官署佔地較大，所設經歷司、南北鎮撫司等，均設在此。清代所設鑾儀司不過使用其部分舊址，清代遷來的刑部也用其舊址。清代《刑部冊》（《日下舊聞考》卷六十三引）說：“刑部公署，國朝即明錦衣衛故址移建，大堂壁間舊有錦衣衛題名碑，後燬於火。”大理寺設在刑部以南，“傳為明南鎮撫司故址”（同上書卷“按語”）。南鎮撫司也是錦衣衛的一部分。三法司中，只有都察院規模較大，不是原錦衣衛舊址所能容，設在原來明代通政司署舊址，而把通政司署移向西北，設在長安右門的西南，即西長安街南，與設在長安左門東南的翰林院遙相對稱。清都察院公署中，原有明嘉靖乙未通政司題名碑在大堂之左。

都察院中分設十多個道署，原來京畿道特設在刑部之南，乾隆二十年以河南道署與京畿道署對調。把京畿道設在大堂之右，作為首要的道署。都察院所屬巡視五城御史，每年輪差，公署在正陽門內。另有纂修法律的律例館，原設長安右門以外，乾隆三十七年移建太常寺之後，正當都察院西北。

明代內閣設在午門以內東南隅，即所謂東閣五間。清代稱內閣公署，改設在太和門之左，昭德門以內東南隅，除本堂以外，設有票籤房、蒙古堂、典籍廳、稽察房等。內閣後門之東為紅本庫，又東為實錄庫、書籍表章庫。六科直房仍在明舊址，在午門外東西兩廊。午門內東西兩廊，東為稽察上諭處及內閣誥勅房，西為繕書房及起居注館。東華門內有國史館，西華門內有續三通館，武英殿後有方略館，東華門外北池街西有俄羅斯文館。

前面談到，武英殿常用於藏書，文華殿後的文淵閣用於貯藏《四庫全書》。康熙十九年開始以武英殿左右廊房作為修書處，掌管刊印裝璜書籍。乾隆三十八年（公元1773年）仿宋元活字版印刷，設局於西華門外北長街路東，排印《四庫全書》中的善本，

稱爲“武英殿聚珍版”。

清代觀象臺沿用明代舊址，設在朝陽門城牆上。編印曆書的時憲書局，設在宣武門以內天主堂西。此地原爲明天啓年間御史鄒元標、馮從吾所建講學的首善書院，後來徐光啓與湯若望在此修訂曆法，稱爲曆局。清代繼續在此修訂時憲書。時憲書局設在天主堂西，是爲了便於西洋傳教士參與修訂曆法。天主堂在宣武門東，始建於明萬曆二十八年(公元1545年)，清代順治、康熙年間兩次重修，乾隆四十年(公元1749年)毀於火，次年又重建。當時因傳教士參與修訂曆法，得到了朝廷重視。

清代爲了掌管蒙古、西藏、新疆以及其他少數民族事務，特設有理藩院，在東長安街玉河橋。

雍正七年(公元1729年)因用兵西北，在皇宮隆宗門內設軍機房，後三年改稱辦理軍機處，簡稱軍機處，每日進見皇帝商辦軍政大事，成爲秉承皇帝執掌朝政的中樞。

清代順天府署仍是元明舊署，在地安門外鼓樓之東，堂左原有元大都路碑。順天府儒學署在府學胡同育賢坊內，也是沿用明舊址。大興縣署仍在安定門東南教忠坊，宛平縣署仍在北安門以西積慶坊，都是沿用明舊址。

國子監在城東北的崇教坊，仍是元明舊址。貢院也是明代舊址。

4 清代北京的地方行政設施

清代北京沿襲明代的地方行政設施而有所發展。地方首要的官署仍爲順天府署，沿用元明府署舊址，所屬有大興、宛平兩縣署。掌管治安的有隸屬都察院的巡視五城御史，簡稱五城御史。京城仍分爲東、南、西、北、中五城，每城分設滿漢御史各一

人，其下分設五城兵馬司指揮、副指揮等，大體上也是沿用明代制度。明代原設有巡城察院，如同元代的巡警院。清代則改設“提督九門巡捕五營步軍統領”負責全城警衛，俗稱九門提督。除守衛九門以外，內外城以及城牆上共設有一千一百個堆撥房（即巡察兵崗），連同城外共有一千四百六十一個堆撥房。城內街道、胡同上還設有一千七百四十六處柵欄，每處柵欄都有出入之門。全城實行宵禁，不僅城門入晚要下鑰，柵欄門于起更後也要關閉。除奉旨差遣及緊要軍務應及時開門外，自王以下，官民人等，一概禁止通行，由步軍校等分定街道，輪班值宿，步軍協尉進行巡邏。但是內城的前三門，每晚六、七時下鑰，到夜半要重開以便於上朝官吏通行。因此內城居民，夜間如到外城參與宴會，必須流連到夜半等城門重開再進來，稱為“候城門”或“倒趕城”。到清末，三門中崇文、宣武都已夜間不閉，只有前門夜間下鑰（夏仁虎《舊京瑣記》卷八“城廂”）。

爲了加強警戒，還在白塔山（即北海瓊華島）上及內城九門各安置有“信炮”五門，樹立旗桿五枝；後來又規定內城九門“信炮”增加爲十門，外城七門各設“信炮”五門，以便有緊急情況時放炮示警。

康熙以後，又在京師五城分設“司坊官”十五員，負責檢查管轄區內居民情況，對戶口門牌、戶冊要隨時檢查更正，對外來之人要詳究來歷，不使不法之徒混入。

清代貴族高官都居內城，對內城治安特別重視。清初規定內城“永行禁止開設戲館”，因而劇園多數聚於正陽門外大柵欄、肉市一帶，這樣就使得外城更加成爲熱鬧的繁華地區。

5 清代北京主要商業區的發展

清代北京主要商業區，大體上沿襲明代佈局，又有進一步發展。內城以東、西四牌樓一帶、外城以正陽門外大柵欄一帶最為繁榮，店鋪都很講究華麗的裝飾局面。《燕京雜記》說：“京師市店，素講局面，雕紅刻翠，錦窗繡戶，招牌至有高三丈者。夜則燃燈數十；紗籠角燈，照耀如同白晝。其在東、西四牌樓及正陽門大柵欄者，尤為卓越。中有茶葉店，高甕巨楠，細桶宏窗，刻以人物，鋪以黃金，絢雲映日，洵是偉觀。總之母錢或百萬或千萬，俱用為修飾之具。茶葉則貸之茶客，亦視其店之局面，華麗者即無母錢存貯，亦信而不疑。倘局面暗淡，雖積積千萬亦不敢貸矣。”說明北京鬧市區中大店鋪的裝璜遠比其他城市要講究。

當時北京因為來往居住的大官僚和大商人多，金融業是特別發達的。其中最重要的是銀號，相當於別地的錢莊，既發行和匯兌銀票，票面往往一張百金，還兼營存款放款。在清末新式銀行興起以前，銀號或錢莊是金融業中主要的信用機構。北京以明末清初已開設的恒興、恒利、恒和、恒源等四家銀號最著名，號稱“四大恒”，設在正陽門外大柵欄以東珠寶市。當時官場中以行使銀票為體面，因而銀號大得其利。其次稱為錢鋪，外城的錢鋪主要與漢官來往，從中取利。當時北京漢官大多居於外城。再次有所謂烟蠟鋪，也兼營兌換業，甚至發行錢帖，以此圖利。清代中期以後，山西商人所設票號，亦稱票莊或匯兌莊，除發行和匯兌莊票外，亦逐漸兼營存款放款，交游仕宦很是闊綽，往往放款給外放的官吏以及京官之有外放資格者，也常經手幫同官府出賣官缺，從中求利。更有幾百年老店因信譽好，兼營存款放款的。如柳泉居以幾百年的酒館而兼營存放款，以殷實可靠著

稱。更有金店，原本經營金銀珠寶貿易，因為官府大開捐官的門路，金店一變而為幫辦捐官的一種行業，其中掌鋪者結交官場，連通內綫，莫不利市三倍。還有質鋪，亦稱典當，經營高利貸性質的押款，更是盤剝貧民的行業。全城有典當一百多家，曾經擴展到三百多家，取息率在二分以上甚至三分，每年在正月清查滿期未贖取之貨，稱為“號貨”，由估衣行等前往選購。

京中大店鋪常有出名的商品，如外城儉居的熟肉、六必居的豉油、都一處的酒、同仁堂的藥、李自實的筆；內城長安齋的鞋、啓盛的金頂等。還有如王麻子的刀剪、馬應龍的眼藥，轉相仿倣，各有幾十家，都自稱老店，爭執不休。許多大店鋪往往兼營手工業作坊，製成商品，如製鐵器、鑄銅器、製藥、製香蠟、紡織、造酒、製糖果食品等。

藥店有專售秘製一種藥品、傳之幾百年而成為巨商者。如醬坊胡同莊氏獨脚蓮，土兒胡同同德堂的萬應膏，觀音寺雅觀齋的回春丹、鹿犄角胡同雷萬春的鹿角膠，都因而致富。著名的熟藥鋪如菜市口的西鶴年堂、大柵欄的同仁堂，每年所製膏丹行銷各省，有鉅萬的收入。

書畫古玩鋪、南紙鋪、刻字鋪、眼鏡鋪等，都集中於前門外偏西的琉璃廠，成為一條文化街。這是從明代開始的。乾隆年間因編修《四庫全書》，書商會集京師，琉璃廠書肆發展到幾十家，見李文藻《琉璃廠書肆記》和繆荃孫《琉璃廠書肆後記》。京中風俗，每年初三到十七日要逛廠，即到琉璃廠遊逛，這時店鋪和地攤上擺滿書畫古玩等商品。

大的飲食店稱為飯莊，多數稱“堂”，也稱為“園”、“館”、“樓”、“居”。許多著名的食店都有拿手的名菜。如打磨廠口內三勝館以“吳菜”著名，合南方人口味。半截胡同的廣和居以蒸

山藥、鱔魚、鱖魚、吳魚片等出名，常是士大夫會集之處。肉市的正陽樓以烤羊肉出名，八九月間最爲人們愛吃，切羊肉片薄如紙，蘸醃醬而炙於火，一旁放着酒尊，一面炙一面啖一面飲，成爲京中風尚。正陽樓的蟹也很有名，蟹從勝芳運來，要先經正陽樓挑選之後上市出售，因而蟹特佳，價亦貴一倍。戶部街的月勝齋，以出售醬羊肉出名，能裝匣帶到遠處。又有一種被稱爲“二葷館”的，是平民愛吃的地方，食品不離豬肉和雞肉，其中佼佼者如煤市街的百景樓，價廉而物美，只是客座嘈雜。

當時各地富商都到京師來發展營業。北京的匯兌銀號、皮貨、乾果諸鋪，都由山西人經營；綢緞、糧食、飯莊等，都由山東人經營。綢緞肆中稱“祥”的字號很出名，多屬山東孟氏開設。只有前門的泰昌是北京本地人所設，兼辦內廷貢品。南京人設有出售靴帽材料的“緞莊”，出售扇子的“扇莊”以及羊角燈店、刻字鋪、眼鏡鋪等。刻字鋪和眼鏡鋪也集中設在琉璃廠。光緒末年天津人閻氏在大柵欄開設福壽全，是合股創設的，規模很大，從綢緞、洋貨以至中外皮革、竹木器等，一切具備，這是北京第一家百貨公司，可惜因缺乏管理方法，用戶拖欠和夥計偷漏，終於破產自殺。

當時包工建築的商人也已出現。有稱爲探子雷的，“探子”是北京話“打樣”的意思），從清初開始經營，直到清代末年子孫還繼續營業。又有稱爲山子張的，以堆砌假山石出名。他們往往先用最低價取得包工的優先權，然後逐步因所包不盡而加價，從中取利，所謂“十包九不盡”。

清代北京沿襲明代的風氣，很盛行“廟市”，稱爲“趕廟”。每月初三外城西南的土地廟（宣武門外西柴木廠以西）有廟市，初四、初五內城西邊的白塔寺（即妙應寺，在阜城門內馬市橋西北）

有廟市，初七、初八內城西四牌樓和護國寺（在皇城西北）有廟寺，初九、初十內城東四牌樓和隆福寺（在東四牌樓西北）有廟市，合稱為“四大廟市”。每月上旬十天之內，這樣輪流在四處舉行“廟市”，使得集市俱有很大流動性，便於附近居民前往選購所需日用商品。四處的“廟市”也還有些自己的特色。如土地廟的廟市多家用器物，其中雞毛帚子也有多種，短者尺餘，高者丈餘。東四牌樓和隆福寺的“廟市”，多珠玉、珍奇玩器和錦繡、華衣。

內城有流動的廟市，而外城則有經常的集市，稱為東大市和西小市。東大市在前門（正陽門）外、從珠市口到打磨廠一帶，陳列有皮貨（包括皮衣）、估衣、木器（包括桌椅）、玩器等，由同行議價，清早集合，到中午散去。皮衣有精美者，亦有糟朽而以紙或布貼合的，俗稱“貼膏藥”。木器全是舊式，都從舊家售出，多用檀、梨硬木製成，質量要比東、西四牌樓嫁裝鋪出售的家具要好。嫁裝鋪出售的箱櫥、奩具，雖然也是硬木製成，但質量不佳，往往是染色的偽品。西小市在前門外的西邊地方，也賣皮服、椅桌、玩器，規模較小。在東大市和西小市的附近又都有窮漢市，出售破衣爛帽、破鞋等物。

適應都城居民愛好花草的需要，外城崇文門外、宣武門外的土地廟、內城東面的隆福寺和西面的護國寺都有花市。正月十五元宵節前後，前門以內的六部附近有燈市，稱為“六部燈”，其中以工部的燈最為出色。前門外的花市、菜市、豬市口和琉璃廠等處也都有燈市。內城東、西四牌樓也有燈市，後來遷移到廊房頭條。燈市上，不但出售各式的燈，也還出售百貨、珠玉、服飾等。正月十九稱為燕九節，廣安門外的白雲觀有盛大的廟會，與會者號稱萬人，也有廣大的集市貿易。

值得我們特別注意的是，隨着商業的繁榮，民間娛樂日益發展，江南的戲曲傳到了北京。明代萬曆年間，崑曲已在北京流行，民間演出的戲班和劇場在明末也已建成。清朝前期北京流行的劇種，先是崑曲，接着是梆子腔和弋陽腔，後來大有發展的是皮簧調。從乾隆五十五年（公元1790年）起，三慶、四喜、春台、和春等四大徽班陸續到北京長期演出，到嘉慶道光年徽班又同來自湖北的漢調藝人合作，並接受崑曲、秦腔的部分劇目、曲調和表演方法，形成以西皮、二簧為主要唱腔，以京胡為主要伴奏樂器的新劇種，於是作為北京地方戲的京劇大為流行。同時北京上演戲曲的戲院也日漸發展。早期著名的有查樓、月明樓等，後期著名的有三慶園、慶樂園、廣德樓、廣和樓（即查樓）等，以正陽門外大柵欄最為戲院集中之地。

6 清代北京琉璃廠“文化街”的形成和發展

正陽門外偏西的琉璃廠地方，原為海王村。明成祖於永樂年間開始大規模營建宮殿時，因門頭溝的琉璃窯離城較遠，運輸不便，遂另外在海王村建設琉璃窯，名為內廠。清代康熙三十三年（公元1694年）因宮殿基本建築完成，撤消海王村的內廠，於是此地情況發生變化，名為琉璃廠，實際上已成廢墟，變為郊外游覽和集市之處。潘榮陞《帝京歲時紀勝》（乾隆二十三年所作，收入《北平史蹟叢書》）曾描寫說：“琉璃廠……地基宏敞，樹林茂密，濃蔭萬態，烟水一泓。度石梁而西，有土阜高數十仞，可以登臨遠眺。門外隙地，博戲聚焉。每於新正元旦至十六日，百貨雲集，燈屏琉璃，萬盞棚懸，玉軸牙籤，千門聯絡，圖書充棟，寶玩填街。更有秦樓楚館遍笙歌，寶馬香車游士女”。說明當時琉璃廠已成形極其繁榮的春節集市。在這個集市上，固然有其不健康的

一面，不僅“博戲聚焉”，而且多“秦樓楚館”（妓院），但也還有其特色，不但“百貨雲集”，還有燈市，“萬盞棚懸”，更有“圖書充棟，寶玩滿街”。從北宋東京以來，大批圖書文物在集市上貿易，是都城集市的一個優良傳統。清代北京也是這樣，琉璃廠的文化街就是從此逐漸形成的。

從東漢洛陽以來，都城中的書店就起着傳播文化的作用。東漢初期的大學者王充原來“家貧無書”，就是依靠“常游洛陽市肆，閱所賣書”，從而“博通衆流百家”的。在都城中沒有創設圖書館以前，書店起着部分圖書館的作用，學者們經常到書店中選購圖書，並且委託書店代為找尋所需要圖書，因而與書店的店東和夥計成爲知交。無形中店東和伙計就成爲學者們的助手，他們通過實際工作，日積月累地累積這方面的知識和經驗，其中有不少人成爲通曉目錄學和版本學的專家。學者們也常常以逛書店、選購所愛好的圖書爲樂，成爲一種癖好，而且相沿成風。琉璃廠之所以能够成爲書店集中之地，與這一優良的傳統風氣有關。據藏書家李文藻在乾隆三十四年所作〈琉璃廠書肆記〉（收入〈南澗文集〉，又被收入〈京津風土叢書〉），當時此地的書肆已有三十一家之多，同時還有許多書畫古玩鋪、南紙鋪、刻字鋪、眼鏡鋪等，文化街已經很有規模。

乾隆三十七年（公元1772年），清朝網羅全國學者文士到北京，開設四庫館，編輯〈四庫全書〉，歷時十年才完成。在編輯〈四庫全書〉的過程中，學者們對每部書的源流、版本、真偽、史料價值，往往要作詳細的考訂，所需要的參考圖書，常常詳列書目送交琉璃廠書肆探訪；因而江、浙等地的書商雲集北京，而北京書商也經常奔走到各地去採購，一時北京琉璃廠成爲全國各地書籍會集交易的市場。這在書籍流傳和文化傳播中發揮了很大作

用。著名藏書家繆荃孫所作〈琉璃廠書肆後記〉(收入〈京津風土叢書〉)對此有進一步的記述。當時最著名的書肆有五柳居、文粹堂、延慶堂等。辛亥革命以後，琉璃廠書店繼續有一段發展時期。通學齋經理孫殿起，原為書店學徒出身，他在販買書籍過程中，記錄了編輯〈四庫全書〉以後刊印的書籍以及〈四庫全書〉中未收入的書籍，編成〈販書偶記〉二十卷(1936年出版，1959年北京中華書局重印)，對目錄學作出了貢獻。

當時琉璃廠的書肆與藏書家以及學者文士們關係密切。同樣，琉璃廠的書畫古玩鋪與收藏家、文物鑑賞家以及金石家、書畫家的關係也很密切，說明文化街起到了傳播文化的作用。

在清代，琉璃廠既是文化街，也還始終保持着集市貿易的特色。每年正月初三、初四到十六、七，是京中士女“逛廠”的佳節，不僅有燈市，還有雜技表演，還出售多種傳統的食品和兒童玩具。

-
- ① 內蒙古大學歷史系賈洲傑〈元上都調查報告〉，〈文物〉1977年第5期。
 - ② 趙正之〈元大都平面規劃復原的研究〉(收入〈科技史文集〉第二輯，1979年上海科技出版社出版)，開首有“元大都的中軸綫”一節，糾正了元大都中軸綫在明清北京城中軸綫之西即在今舊鼓樓大街南北一綫之說，肯定元大都的中軸綫即是明清北京城的中軸綫。元大都中軸綫北端中心閣，即今鐘樓址，向南經萬寧橋(即今地安門橋)至厚載紅門。元大都宮城前方有東西對稱的太乙神臺和雲仙臺，兩臺之間的中心點正位於現在故宮午門外的大道上，也正是元代中軸綫的所在。這也可證明元代中軸綫即是明清中軸綫。

- ③ 侯仁之《元大都城與明清北京城》（收入所著《歷史地理學的理論與實踐》1979年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開首有“大都城址的選擇”一節，着重說明選定新址是爲了有比較豐沛的水源，又爲新城的水運提供了有利的條件。
- ④ 本文所據考古資料，採自考古研究所、北京文物管理處元大都考古隊《元大都的勘查和發掘》，《考古》1972年第1期。
- ⑤ 王璞子《元大都平面規劃述略》（《故宮博物院院刊》第2期，1960年出版），指出《明太祖實錄》作一千二十六丈，《春明夢餘錄》所引相同，《日下舊聞考》、《古今圖書集成》、光緒《順天府志》等所引，都誤作一千二百六丈，多出一百八十丈。朱僕《元大都宮殿圖考》（1936年上海商務印書館出版）亦沿其誤。
- ⑥ 《析津志輯佚·歲紀》所說二月十五日“皇城遊”，就是“皇城望日遊宮室”，着重游歷大明殿、延春閣等宮室。皇城仍然是指宮城而言。
- ⑦ 《元史·兵志》載延祐元年“隆禧院官言：‘世祖影殿有軍士守之，今武宗御容於大崇恩福元寺安置，宜依例調軍守衛’。從之。”
- ⑧ 《元史·泰定帝紀》載泰定三年十月中書省臣言：“世祖建大宣文弘教寺，賜永業，當時已號虛費；而成宗復構天壽萬寧寺，較之世祖用增倍半；若武宗之崇恩福元寺、仁宗之承華普慶寺，租榷所入，益又甚焉。英宗鑿山開寺，損兵傷農而卒無益。”據《大護國仁王寺恒產之碑》，世祖皇后所建大護國仁王寺（即高梁河寺），賜給的地產和人戶十分巨大，在大都等處者，有水地二萬八千多頃，陸地三萬四千多頃；在河間襄陽江淮等處者，有水地一萬三千多頃，陸地二萬九千多頃，江淮酒館一百四十所，內外人戶三萬七千多戶，還有山林河泊以及出產銀鐵銅鹽煤炭之地等（《日下舊聞考》卷九十八所錄）。據《元史·仁宗紀》，至大四年十月“賜大普慶寺金千兩，銀五千兩，鈔萬錠，西錦綵緞紗羅布帛萬端，田八萬畝，邸舍四百間。”據《元史·英宗紀》和《文宗紀》，英宗即位，是年九月

建壽安山寺，給鈔千萬貫。文宗至順二年正月因英宗所建寺未成，又給鈔十萬錠，並以晉邸部民劉元良等二萬四千餘戶隸壽安山大昭孝寺爲永業戶。看來英宗所建的大昭孝寺所費巨大，曾冶銅五十萬斤作佛像，始終未建成，所以泰定三年中書省臣言“損兵傷農而卒無益”。

- ⑨ 徐莘芳《元大都也里可溫十字寺考》，收入《中國考古學研究》，1986年文物出版社出版。
- ⑩ 這是根據元大都考古隊《元大都的勘查和發掘》（《考古》1972年第一期）。同濟大學城市規劃教研組《中國城市建設史》則說：“中軸綫的大街最寬爲28米，其它幹道爲25米，胡同寬爲5—6米。”
- ⑪ 瑞典奧斯伍爾德·喜仁龍《北京的城牆和城門》曾引用馬可波羅這段話，對此有誤解。他把馬可波羅所說的“方地”看得和唐代長安的“坊”相同，於是認爲“元大都的每一個坊，據說佔地8畝，爲一戶人家所據”（許永全譯本第22頁，1985年北京燕山出版社出版）。
- ⑫ 參看趙正之《元大都平面規劃復原的研究》第十節“元大都平面規劃諸問題”，收入《科技史文集》第2輯。
- ⑬ 王璞子《元大都平面規劃述略》第七節“坊市分佈狀況”，對各坊位置有所考證，本文曾參考而加以增補，刊於《故宮博物院院刊》第二期。
- ⑭ 《日下舊聞考》卷三十四引《明典彙》：“奉天殿，永樂十五年十一月建。”有案語說：“《明史》，永樂四年詔以明年建北京宮殿。八年七月至北京，御奉天殿受朝賀。十二年八月至北京，御奉天殿受朝賀。則十五年之前已兩御北京之奉天殿矣。蓋明祖定大朝會正殿曰奉天。永樂時建都，遂仍其名，至是撤而新之，殿制皆自是年更定云。”這條案語有誤。永樂七年和永樂十二年明成祖所御的奉天殿，是西宮（即燕王府改建而成）的奉天殿；永樂十五年十一月建成的是紫金城中的奉天殿，是三大殿中首先建成的，兩者不

能混爲一談。

- ⑬ 明成祖所建西宮，稱爲仁壽宮。後來改稱永壽宮、萬壽宮，其中宮殿多次改建和增築。嚴嵩《萬壽宮頌》：“成祖繼天，變伐大定。駐蹕全燕，奠鼎凝命。周宅竊京，殷居毫邑。履重馭輕，四方之極。有宮穹穹，名曰仁壽。高朗軒夷，實惟斯宮。肇基帝跡，創始鴻圖。貽謀燕翼，爰二百年。”（《日下舊聞考》卷四十二引《鈴山堂集》）金鼈《退食筆記》：“萬壽宮在西安門內迤南，大光明殿之東，成祖潛邸也。殿東西有永春、萬春諸宮，翼而前。爲門者三，或曰即舊仁壽宮。明世宗晚年愛靜，常居西內。”（《日下舊聞考》卷四十二引）按大光明殿，嘉靖三十六年建成，是道觀性質，內奉玉皇。後有太極殿，內奉三清、四御，更後有帝師堂，清代改建爲方丈。西宮於嘉靖四十年大火災，宮殿燒毀，此後不斷重建和擴建。前堂稱萬壽宮，後寢稱壽源宮，當時稱爲西內。
- ⑭ 瑞典人喜仁龍《北京的城牆和城門》，根據現代測量的結果，認爲城牆實際總長應爲41.26里，他說：“根據已發表的現代測量結果，各牆長度如下：南牆6,690米，合11.64里；北牆6,790米，合11.81里；東牆5,330米，合9.27里；西牆4,910米，合8.54里。”（許永全譯本第35頁）按這是以著者當時的中國里制和國際度制換算的結果，當時1尺 = 32釐米 = 0.32米；1里 = 1,800尺 = 576米。明代永樂年間的工部營造尺，應該略短，大約1尺長30釐米多，因而總長度達43.11里。



附 錄

37

西漢長安佈局結構的再探討

楊寬

最近看到劉慶柱同志《漢長安城佈局結構辨析——與楊寬先生商榷》一文(《考古》1987年10期)，對拙作《西漢長安佈局結構的探討》一文(《文博》1984年創刊號)，提出了商討的意見。十分歡迎同志們提出不同意見，因為這是我國都城制度發展過程中帶有關鍵性的一個重要問題，通過商討將使歷史真相越辨越明。拙作前文的見解，原來見於拙作《中國都城的起源與發展》一書的“論西漢長安”一章中，當時抽出來略加補充而先發表，目的就在於徵求意見，提供討論。現在拙作《中國都城的起源與發展》一書，已先譯成日文，去年11月在日本出版^①，這一問題也已引起日本學術界重視。本文只就劉同志所提出的四個問題，再作進一步的探討。

一、長安城是內城還是外郭城

經過考古發掘和調查，結合文獻已經畫出準確平面圖的西漢長安城，我認為屬於宮城性質，同時帶有內城的性質。劉同志否定這一看法，認定“漢長安城就是西漢長安的外郭城”。這是我們要再探討的第一個問題。

自從西周初期周公在洛陽建設東都成周，開創小城連結大郭的佈局，這種佈局曾長期沿襲推廣。《吳越春秋》佚文所說：

“築城以衛君，造郭以居民”（《太平御覽》卷193所引；《初學記》卷24所引“民”作“人”，當出於避諱），就成為歷代都城建設的準則。我之所以認為長安城帶有宮城性質，因為西漢繼承了秦代建築成羣大宮殿的風氣，長安城內的主體建築就是以未央宮為中心的五個宮，並且與城外西邊的建章宮，有架空的複道相通，成為一個大型的宮殿建築羣。五個宮滿佈於城內南部和中部，占用城內大部份面積。而且從它的發展過程來看，長安城就是由宮城擴展而成的。《三輔黃圖》說：“高祖七年方修長安宮城，自櫟陽徙居此城，本秦離宮也。初置長安城，本狹小，至惠帝更築之。”又說：“長樂宮本秦之興樂宮也。高皇帝始居櫟陽，七年長樂宮成，徙居長安城。”所說“方修長安宮城”和“徙居長安城”都指長樂宮城。《史記·高祖本紀》就說：七年二月“長樂宮成，丞相以下，徙治長安”。《史記·漢興以來將相名臣年表》亦載：高皇帝七年“長樂宮成，自櫟陽徙長安”。當時所說的“狹小”的長安城，不是別的，就是長樂宮城。說明“初置長安城”，只是個長樂宮城，原是秦的興樂宮，所以《皇覽》說：“秦有小城，至惠帝乃始大之”（《雍錄》卷二引）。由此可知惠帝時所築長安城，本來就有擴大的宮城性質。

自從漢高祖帶着丞相以下官員，徙居長安城即長樂宮城以後，接着在長樂宮以西修建壯麗的未央宮，又在未央宮以北創建北宮，於是到惠帝時，就築擴大的長安城，把長樂、未央、北宮都包容在內，並在北面留有餘地。但是到漢武帝時，又進一步向北擴建宮殿，長樂宮以北建了明光宮，未央宮以北建了桂宮，又增修北宮，因為所留餘地有限，不能再在城內擴建，於是“以城中為小”，跨越西城牆，興建規模更大的建章宮，用架空的複道與城內諸宮相通，長安城內這樣充滿着皇宮，成為城內主要且占地最

大的建築，長安城作為擴大的宮城，是顯而易見的。

還值得注意的是，在高祖和惠帝兩代，主持興建長樂、未央兩宮和長安城牆工程的，是由軍匠出身、擔任“少府”官職的陽成延（一作陽咸延）^②，陽成延以主管“天子私藏”和“天子供養”的“少府”官職，長期主持兩宮以及長安城牆的興建工程，長安城作為“衛君”的宮城，也由此可見。

但是必須明確指出，這種宮城，不同於後世只建皇宮的宮城。若以後世都城制度來衡量，這種宮城就具有內城性質。戰國以來，隨着中央集權政體的出現，原來的宮城以內就有中央官署的設置。隨着社會經濟的發展，在外郭商業和手工業發展的同時，適應掌管經濟方面的官署的需要，以及貴族官僚生活上的需要，宮城以內就有官營手工業作坊甚至市場的出現，當然商人、工匠以及其他生產者也會雜居其間。例如戰國時代齊國都城臨淄，在西南的小城以內，在官殿遺址桓公臺周圍，東西兩部發現鐵器作坊遺址，南部發現冶銅作坊和鑄錢作坊遺址。因此這種宮城已具有內城性質。西漢長安城內是同樣情況，宮城具有內城的性質，除主體建築五個宮和宗廟以外，還存在大建官署、倉庫和高官府第，也還有鑄錢作坊等，也還有市，雍門以東就有孝里市，同時也還有商人、工匠以及一般居民的“里”。我們不能以後世的宮城來衡量它。我認為西漢長安城是具有內城性質的宮城，所以我在前文中指出，戰國時代中原各國都城的小城屬於宮城性質（或者說內城性質），西漢長安城的性質依然是宮城（即內城）。並不是像劉同志所說那樣我“把內城與宮城混稱”。

劉同志把長安城看作外郭城的理由是，城內居住大量百姓，並有繁榮的市場和發達的手工業作坊。因為劉同志認為長安的大市——東市和西市都在長安城內，居民的一百六十個“里”全在

長安城內。我認爲這是可以商討的。東市和西市問題留待後面討論，這裏先談一百六十個“里”的問題。

根據《漢書·地理志》，元始二年（公元2年）長安戶口統計，戶80,800，口246,200，平均每戶只有三人，顯然人口數字偏低。一般意見認爲這個人口數，只是成年人繳納算賦的數目，並不包括整個人口數字，如以每戶平均五人計算，人口當在40萬以上；再把皇族、士兵、僮僕、游士、客商等計算在內，全城人口當在50萬以上。當時高官府第不在“里”內，一般居民住在“里”中，如果8萬戶、40萬人分居160個“里”，每“里”平均要住500戶、2,500人。根據考古發掘結果，與文獻記載相合，長安城內面積共36平方公里，南部中部全爲宮殿、宗廟、官署、高官府第，按考古測定的平面圖來看，僅存北部五分之一面積可以容納居民的“里”，但是北部的西面也還有官署、大官府第以及市與作坊，居民的“里”主要分布在東北一角。即使按五分之一面積計算，也只有7平方公里，怎能容得下160個“里”、8萬戶和40萬人口？劉同志認爲這樣“城內大多數人偏居於城內一隅”，正是尖銳階級對立的明顯反映。我們認爲，即使住得十分擁擠，至少也該像齊國都城臨淄的外郭那樣，有18平方公里面積，才容得下7萬戶到10萬戶的人口。漢武帝說：“齊東負海而城郭大，古時獨臨淄中十萬戶。”（《史記·三王世家》褚少孫補）可知西漢統治者早已認識到，只有城郭大，才能容得下衆多居民。

關於這點，早已有人看到。我過去沒有注意，最近看到作爲高等學校建築專業教學用的《中國建築史》（1982年中國建築工業出版社出版），已經指出：“考古發掘及文獻記載表明，長安城內用地絕大部分被五座宮城所占，而記載有閭里160個，但宮殿以外所剩地面已有限，不可能容納這麼多居住閭里，所以多數閭

里應在外郭中。據記載，城內向北出橫門有外郭，向東出三座城門外，也都有外郭，向東南去下杜城（漢宣帝的陵邑）則有大街，這幾個方面都可能是長安居民叢聚之處。按照漢以前內城外郭和造郭以居民的傳統觀點，長安城有外郭也是可以想象的。也只有這樣，才能容納160個閭里和8萬戶居民”（第37—38頁）。原來這部集體編寫的高等學校教科書，已先我而提出這樣的看法。所不同的，我認爲長安城外，主要存在北面三門以外的北郭、西北雍門以外的西郭和東北宣平門以外的東郭，北郭和東郭比較大，東西兩面其他二門和南面並不存在郭區。

還要附帶提一下，劉同志在講到長安城的設計思想時，認爲“實際上，漢長安城的設計思想很可能受到《周禮·考工記》的較大影響”。所說《考工記》的影響，就是每面三座城門，每門三個門道，每條經由城門的大街均分爲並行的三條道，從未央宮北闕直對橫門、橫橋的大街，形成一條中軸綫，中軸綫的前面是朝廷所在，中軸綫的後面有市，即雍門以東的孝里市，正與《考工記》所說“旁三門”，“國中九經九緯，經塗九軌”，“面朝後市”相合。但是我們要指出，《考工記》講的是王城的體制，並不包括外郭，據此正足以證明長安城並非外郭城。還有一點要指出，西漢長安城每個城門外一定距離設有“外郭亭”用於郵傳和防衛。如果像劉同志所說長安城就是外郭城，那末，爲什麼城外遠距離的“亭”還要稱“外郭亭”呢？也是講不通的。

二、長安城外是否存在廣大郭區

這是我們要再探討的第二個問題。我認爲長安城外存在着較大的郭區，其中北郭和東郭面積較大。劉同志則否定這一看法，認定長安不存在郭區。

從整個我國古代都城制度發展歷史來看，“郭”的建設有一個發展過程，初期的“郭”是沒有郭城的，是利用原有山川加以連結而用作“郭”的屏障。清代學者焦循《羣經宮室圖》在“城圖六”下所作說明，認為西周東都成周，“郭方七十里，南繫於雒水，北因於邙山”（《逸周書·作雒篇》），說明成周的郭郭是依據洛水、邙山等山水加工連結而成。他並且引用《左傳》證明春秋時代鄭國都城新鄭，郭郭也是“依水而成”，雖然設有“桔柣之門”和“純門”等郭門，“郭非四面有垣如城然也”。這是個很高明的見解，具有發展的觀點。春秋戰國時代郭城的建築逐漸推廣，也還有利用山川加工作為屏障的。晉國都城新田在今山西侯馬市西北，已發現“平望”、“牛村”等宮城，在這組宮城東南有冶銅、制陶、制骨等作坊遺址，當是郭區所在，但沒有發現郭城，郭的屏障也該是利用澮水等河流加工連結而成。從西漢長安、東漢洛陽直到北魏洛陽，郭的屏障都是利用河流、溝渠、以及新開漕渠加工連結而成的。因為大河和漕渠都築有堤防，這種防禦自然災害的工程可以加工改造成為防禦盜賊和敵人的工程，春秋戰國時代開始興建的方城和長城，就是利用大河堤防連結山地而築成^③。這是古代慣用的修築防禦工程方法。從戰國以後，到隋唐以前，“郭”的建築形式，既有築郭城的，也還有利用原有河流及其堤防加工連結而成的，較大的“郭”往往採用後一種辦法。直到隋唐的都城，才出現雄偉的郭城建築。

西漢長安的北面郭區是以渭水作為屏障的，從未央宮北闕有大街向北直通橫門，由橫門有大道向北直通渭水上的橫橋，稱為橫橋大道，這是從未央宮正門北闕直貫城內中部、北部和北郭的一條中軸綫，從此可以通往渭北的五個陵邑，成為都城連結北方五個陵邑的咽喉，因此在橫橋附近的郭區設有北郭門稱為都

門。因為當時長安城距渭水只有三里，整個北郭就在渭水以南三里範圍內，向西延伸到雍門（西城牆北門）以外地，向東延伸到宣平門（東城牆北門）以外廣大地區。從宣平門東出有大道直通漕渠上的橋梁，並向東一直通到霸水上的霸橋，與霸陵相聯繫，成為長安向東進出的重要咽喉，因此在漕渠上的橋梁以東設有東郭門，稱為東都門。

劉同志完全否定長安城外有郭區存在，主要理由有三點：第一，考古工作已開展三十年，長安城外未發現北郭和東郭的郭城遺址。第二，對於如此浩大的建郭工程，史家不會略而不載，而《史記》、《漢書》都沒有這方面的記載。第三，在所謂北郭和西北郭內，很少發現漢代遺迹、遺物，地下多為淤沙層。在所謂東郭內，宣平門以東2公里有大量秦漢墓葬，並非人烟稠密之地，出西北雍門也有墓地。我們認為，這都是以後世的郭城形制作為衡量的標準。其實，西漢長安的郭區本來就沒有郭城的建設，從西周在成周建設郭區以來，本來可以在郭區設置墓地，例如臨淄的外郭城中就有大墓發現，曲阜古城中更有許多墓地。至於北郭地下多淤沙層，少遺迹遺物，可能是渭水長期泛濫的結果。

劉同志否認當時長安的外郭門稱為都門，認為“東都門因其在長安東出的御道上，又位於宣平門之東，故以鄰近的宣平門——都門為名”，並引《漢書·王莽傳》“兵從宣平城門入，民間所謂都門也”為證，還說：“實際漢長安城城門亦稱都門”。據我看來，此說大有問題。除宣平門以外，其他十一座城門，古文獻上沒有稱都門的，古文獻上都只稱東郭門為東都門，《漢書》在《元帝紀》、《昌邑王傳》、《疏廣傳》等三處提到“東都門”，都指東郭門，沒有一處指宣平門的。《後漢書·劉盆子傳》所說“遂攻東都門，入長安城”，亦指東郭門，我在前文已列舉證據。東都門原是東

郭門的稱呼，宣平門之稱爲東都門是出於民間的混稱，所以《三輔黃圖》說“宣平門，民間所謂東都門”，《漢書·王莽傳》也說“民間所謂都門也”。這樣特別指出是“民間所謂”，就是說“都門”並非它的本名。怎麼可以顛倒過來，說宣平門本名都門，東郭門反而是“以鄰近的宣平門——都門爲名”呢！

劉同志爲了否定郭區存在，還對“東郭門”作出否定的解釋，認爲人們把漕渠“與宣平門以東祖道交彙處稱爲東郭門（即東都門）”，“東郭門大概就是祖道跨漕渠之上的一座橋”，“所謂東都門不過是座象徵郭門的建築”。劉同志把宣平門以東的大道稱爲“祖道”，看來出於誤會。《漢書·疏廣傳》說：“太傅受少傅，上疏乞骸骨歸，公卿大夫爲設祖道，供張東都門外。”所說“祖道”是說出行時祭祀路神，所說“供張”是說在路旁設帷帳而餞行，並非此處有條道路叫祖道。《三輔黃圖》說：“飲馬橋在宣平城門外”，並以飲馬橋與橫橋、渭橋、灊橋並提，飲馬橋可能就是宣平門外漕渠上的大橋。《三輔故事》說：“滕公墓，在飲馬橋東大道南，俗謂之馬冢。”（《史記·夏侯嬰傳》索隱引）可見此處確有大道。東郭門該與漢魏洛陽城東的東郭門差不多。洛陽東郭門是在漕渠的“七里橋”以東一里，“郭門開三道，時人號爲三門”（《洛陽伽藍記》卷二景興尼寺條），當是利用附近漕渠堤防加工擴建而構成的。長安東郭門也該在漕渠的橋梁（可能即飲馬橋）以東地方，同時在東郭門外還有外郭亭叫軹道亭。據記載，從宣平門到軹道亭有十三里的距離，可見當時長安東郭的面積比較大。程大昌《雍錄》卷二《漢長安城圖》和楊守敬《水經注圖》都把東都門畫在漕渠以東地方，是不錯的④。

長安東郭門決不是像劉同志所說，只是跨漕渠上的一座橋，不過是象徵性的建築。請看漢昭帝去世後，龔遂陪同昌邑王劉

賀進京奔喪路程上的對話，就可清楚地看到東郭門即東都門的確鑿存在，決非象徵性的。《漢書·昌邑王傳》：“賀（劉賀）到霸上，大鴻臚郊迎，……旦至廣明東都門，遂（龔遂）曰：禮，奔喪望見國都哭，此長安東郭門也。賀曰：我嗌痛不能哭。至城門，遂復言，賀曰：城門與郭門等耳。”從此可知，霸上是長安東郊，按禮應由大鴻臚“郊迎”，到廣明的東都門，即是東郭門，進門即是都城，按禮奔喪者要哭，所以龔遂說：“禮，奔喪望見國都哭，此長安東郭門也”。當時廣明必然有具體都門存在，龔遂才會這樣說，要劉賀照禮一“哭”，如果只是一座橋，不過是象徵性的郭門，龔遂要劉賀按禮“哭”，怎麼可能有這樣的“禮”呢？接着到了城門，即宣平門，龔遂又重複說同樣的話，該是按“禮”進入“都門”與進入“城門”必須同樣的“哭”，說明“都門”與“城門”在“禮”具有同樣的地位，劉賀回答說：“城門與郭門等耳”，正是這個意思。如果郭門只是象徵性的，劉賀怎麼可能說“城門與郭門等耳”呢？

劉同志根據張澍輯本《三輔舊事》中二條史料（出處不詳），斷言一百六十個閭里都在長安城內，是不足信的。依據文獻和漢簡，可以考見的長安里名不到二十個，絕大多數無法推定它的所在。只有孝里在雍門以內，函里在雍門以外，是可以斷定的^⑤。《水經注·渭水》和《三輔黃圖》都說雍門，“其水北入函里，民名曰函里門”。所說北入函里的水，是指經過雍門外北上的沔水，可知函里即在雍門以外的西北地方。據此可知西北雍門內外，無論城區或郭區都設有居民的里。其實班固《西都賦》早已指出，從街衢、閭閻到九市，是充滿“城”和“郭”的。《西都賦》說：“內則街衢洞達，閭閻且千，九市闢場，貨別隧分，人不得顧，車不得旋，闕城溢郭，旁流百廛，紅塵四合，烟云相連。”這十句是連貫押韻的一整段，這裏以街衢閭閻和九市並論，說明街

衝、閭里和市場都不但“闡城”而且“溢郭”。劉同志爲了否定郭區的存在，對“闡城溢郭”別作解釋，認爲這是“屬於漢賦中常常使用的駢偶詞句，異字相對，以示文章的規整，這裏闡與溢，城與郭實際同意，張平子《西京賦》中把漢長安謂之城郭，即可爲證”（見於注釋^②條）。這是說，班固爲了使用對偶的詞句，虛構寫成“闡城溢郭”，實際上“溢郭”即是“闡城”。這種虛構的解釋，是不符歷史實際的。張衡《西京賦》說得十分明白：“於是量徑輪，考廣袤，經城洫，營郭郭。”李善注引《公羊傳》“郭者何，城外大郭也。”這樣以“經城洫”與“營郭郭”相提並論決不是爲了文章對偶而虛構的。至於《西京賦》說：“徒觀城郭之制，則旁開三門，參塗夷庭，方軌十二，街衢相經”。所說城郭之制，也是兼城和郭而言，並非城郭混稱，因爲三門和街衢正從城區通向郭區。

應該看到，作爲我國古代鼎盛時期西漢王朝首都的長安，是很有規模的。居民8萬戶，人口50萬以上，不僅是全國的政治中心，又是全國經濟文化中心，而且在它的北面和東面陸續建有七個陵邑，強制各地豪富遷來聚居，商業發達，經濟繁榮，人才輩出，人口衆多，實際上成爲長安都城的重要組成部份。就是班固《西都賦》所說：“若乃觀其四郊，浮游近縣，則南望杜霸，北眺五陵，名都對郭，邑居相承，英俊之域，絨冕所興，……蓋以強幹弱枝，隆上都而觀萬國也。”所說“名都對郭，邑居相承”，正是指東北兩面七個陵邑與長安郭區相對而相承。當時建設長安的整體設計思想，包括皇宮城區、郭區以及四郊近縣在內，都是爲了“隆上都而觀萬國也”。既有以北闕和東闕爲正門的未央宮，作宮殿建築羣的中心；又有以北面橫門和東北面宣平門作爲正門的城區，再有以橫門外的都門和宣平門外的東都門爲正門的郭區，更在北郭以北設有五個陵邑，東郭以東設有二個陵邑，作爲支援和拱衛

京都的四郊近縣。這樣以西南的未央宮和西南的城區，和東北的廣大郭區相結合，並與東北兩面的七個陵邑相連結，構成了長安的整體佈局。皇宮和城區是一國的政治中心，郭區和七個陵邑是一國的經濟中心，那裏有與全國各地經濟發生聯系的市場存在。整個面向東方與北方的長安城郭結構十分宏偉壯麗，佈局十分雄偉浩大。

三、東西兩大市是在城內還是在外郭

東西兩市確是當時長安的大市。《漢書·食貨志》曾談及王莽更改長安東西市令以及五都市長名稱的事。所有文獻記載，內容基本一致，西市由六市組成，東市由三市組成，每個市“方二百六十六步”，合稱九市。東西兩市是對稱的，六市在道西，三市在道東。我的前文認為東西兩大市都在北郭，以洛城門外的杜門大道為界，道東設有東市，道西設有西市。西市實際上集中分佈於橫門外的橫橋大道的東西兩側，從杜門大道來看，都是杜門大道以西。而劉同志則認為東西兩市在城內西北隅，當橫門以南，夾着橫門大街，在雍門大街以北地區，就是考古勘察所發現的橫門大街以東0.5265平方公里面積的“市”遺址，和橫門大街以西0.2457平方公里面積的“市”遺址。

我認為目前發現的雍門大街以北二個“市”的遺址，與文獻所說由九市組成的東西兩大市不合。按文獻記載，雍門以東，城內確實有市，並非東西兩大市，而是孝里市。《漢宮殿疏》（《太平御覽》卷828引）有“孝里市在雍門東”，宋敏求《長安志》卷五說：“孝里市在雍門之東”。當時長安不僅城區有小市，郭區還有東西兩大市，就是《西都賦》所說的“闐城溢郭”。張衡《西京賦》說：“爾乃廓開九市，通闕帶闐，旗亭五重，俯察百隧，周制大胥，今也惟

尉。”閻文儒先生早在《金中都》一文（《文物》1959年第9期）的注釋中，已指出“廓與郭相通，九市全設置在郭外”，並且認為大市設在外郭是傳統辦法，漢魏洛陽除金市外，大市都在城外。只是他認為《三輔黃圖》中“九市”條已經唐人竄改，九市是指郭外的槐市、柳市、直市等等，與我的看法不同。日本學者佐藤武敏先生《漢代長安的市》（載《中國古代史研究第二》，1965年出版），也早已斷言東西兩市都在城外郭中，並已指出《西京賦》所說“廓開九市”，即謂九市開設郭中；還認定西市在橫門以外的橫橋大道，並據《三輔黃圖》所說覆盎門一號杜門，推定東市所在的杜門大道在覆盎門外。臺灣學者馬先醒先生《漢代長安城之營建及其形製》（載所著《漢簡與漢代城市》，1976年出版）所附漢代長安城區劃略圖，把西市畫在橫門外，東市畫在洛城門以內大街與宣平門大街的交接處。說明早已有些學者確認西市在橫門以外的北郭，對東市位置尚有不同看法。查《三輔黃圖》所引《西京賦》“廓”字正作“郭”，說明古人早已認定此處“廓”字與“郭”相通。《三輔黃圖》又載：“又有柳市，東市，西市（原脫六字，從張宗祥、陳直依據《玉海》卷16“漢都長安”條補充），當市樓有令署，以察商賈貨財賣買貿易之事，三輔都尉掌之。”（陳直《三輔黃圖校證》30頁）正與《西京賦》所說“今也惟尉”相合。據《漢書·百官公卿表》，長安市令是京兆尹的屬官，而東西二市的令署不屬京兆尹而由三輔都尉掌管，也可見東西二市如同城西的柳市一樣，不在城內。

《廟記》載“夾橫橋大道市樓皆重屋”（《三輔黃圖》），《宮闕記》載“夾橫橋大道南有當市觀”（《太平御覽》卷191引）。我認為佐藤先生等斷言西市在橫門以外的橫橋大道是不錯的。橫橋大道是從橫門通向渭水上橫橋的大道，與城內未央宮正門北闕通

向橫門的大街相連接，具有中軸綫性質，又是通向渭北五個繁榮陵邑的樞紐，因而成爲商業發達之區，設有長安最大的市——西市，夾着橫橋大道就設有作爲西市的令署的市樓或當市觀。現在劉同志認爲《廟記》所說“不確”，因爲市樓應該矗立於市井中央，夾着橫橋大道，市樓不可能林立。我認爲文獻記載十分確切，西市共有六市，分布在橫橋大道兩側，每側三市，也就是“夾橫橋大道”。兩側六市的中央都矗立“重屋”的“市樓”，因而說：“夾橫橋大道，市樓皆重屋”，沒有什麼“不確”之處。劉同志又對《宮闕記》所說“夾橫橋大道南有當市觀”，別作解釋，認爲橫橋大道南應指大道南端的“橫門以南”，因而推想橫門以南160米處發現的大型建築遺址中的主體建築，可能就是長安市的市樓（或稱當市觀）。據我看來，這一解釋和推想，不符文獻原意。原文是“夾橫門大道南有當市觀”，怎麼可以避開“夾”字，解釋爲橫橋大道以南甚至是橫門以南呢？原意該與《廟記》所說相合，是說夾着橫橋大道，在橫橋大道的南段有當市觀，因爲西市的六市分佈在橫橋大道南段的兩側。

《廟記》和《宮闕記》都說：“旗亭樓在杜門大道南。”這是說東市的令署在杜門大道南段。古文獻上都說長安九市，“六市在道西，三市在道東”，相互對稱。西市既在橫門以外北郭的橫橋大道南段的兩側，對稱的東市就在北郭的杜門大道南段的東側。《水經注·渭水》明確記載“洛城門本名杜門”，位置正在橫門以東，杜門大道應即在洛城門外。同書又指出“其外有客舍，故民曰客舍門”。正因爲該城門靠近東市，門外成爲旅館集中之區。洛城門外的杜門大道，穿過洛城門，與城內南北向的洛城門大街接連，洛城門大街又和東西向的宣平門大街交接，這裏是通向東郭的交通要道，又是衆多居民聚居之區。當時在杜門大道南段

東側設有東市，就是適應廣大東北郭區或城內東北角衆多居民的日常生活需要。至於覆盎門一名杜門，本來與洛城“本名杜門”有別，但因覆盎門或簡稱杜門，不少文獻所說杜門就是指覆盎門。但是杜門大道不可能在覆盎門外，覆盎門是長樂宮南出的城門，並非居民經常出入的通道，周圍並無居民，那裏不可能形成商業發達的大市。呼林貴同志《漢長安城東南郊》（《文博》1986年2期），根據近年覆盎門外發現大量平民漢墓，時代從文景帝時直到新莽時，斷定東南郊是長安居民長期使用的墓葬區，認為“很可能是整個長安規劃中的一個組成部份”。據此也可見這一帶不可能設有東市。現在劉同志斷定杜門應指覆盎門，認為《水經注》所說洛城門“本名杜門”，“屬於訛誤”，並且把“旗亭樓在杜門大道南”，解釋為旗亭樓在東南郊的杜縣（即下杜城）附近。我認為這一解釋並不可信。《廟記》和《宮闕記》等古文獻上這句話，都是和夾橫橋大道的市樓相提並論的，講的都是長安的大市，怎麼可能忽然講到杜縣去呢？這樣把《水經注》明確的記載說成“訛誤”，顯然論據不足。

在廣大郭區的大道旁設置大市，原是春秋戰國以來的傳統方式。例如鄭國新鄭的大市稱“達市”，設在外郭“純門”以內稱為“大達”的大道旁。《爾雅》所謂“九達謂之達”，是九輛馬車能同時並行的大道。又如齊國臨淄的大市設在外郭稱為“莊”的大道旁，“莊”是外郭直貫南北的“六軌之道”，所謂“莊岳之間”是戰國時代人口最密集和最繁華之區。西漢以後也還長期推行這種制度，東漢洛陽，除城內設有金市外，東郭有馬市，南郭有南市。唐代長安在郭城分設東西兩大市，依然承襲西漢長安在郭區分設東西兩大市的佈局。

四、長安設計思想的淵源及其建設規劃

張衡《西京賦》講到長安的營建，“經城洫，營郭郭，取殊裁於八方，豈啓度於往日，乃覽秦制，跨周法。”這是有根據的。長安城內的佈局是參照《考工記》的，前面已經述及。長安整個城郭結構，就是沿襲西周東都成周和戰國時代中原諸侯中大國都城以及秦都咸陽西面小城連結東面大郭的格局而有所發展的。我曾列舉戰國時代齊國臨淄、韓國新鄭、趙國邯鄲和秦都咸陽的城郭結構作為證明。現在劉同志舉出燕下都宮殿在北部，楚國郢城（紀南城）宮殿在東南部，秦國櫟陽城宮殿在中部偏北，晉國新田（即侯馬平望、牛村等古城）、魏國安邑以及魯國曲阜宮城在中部，認為我所說戰國中原各國都城有西面小城連結東面大郭的共同特點的說法難於成立。我要指出，燕、楚兩國不在當時中原諸侯之列，而且燕下都是防衛用的陪都性質；當秦獻公遷都櫟陽時也還不在中原諸侯之列，《史記·秦本紀》所謂“秦僻在雍州，不與中國諸侯之會盟，夷翟遇之”。直到秦孝公任用商鞅變法，遷都咸陽，秦的都城制度才與中原諸侯相同。至於春秋時代晉國都城新田，外郭也在一組宮城的東南，宮城並不在中部。戰國時代魯國都城曲阜，仍保留西周春秋時代的體制，該是因為已成弱小之國，沒有像齊、韓、趙等大國那樣對都城進行改建和擴建，因而沒有形成西城連結東郭的格局。至於魏國都城大梁，未發現遺址，至今情況不明。魏國舊都安邑（即禹王城）由大、中、小三城組合而成，大城在東北部，中城在西南部，小城在中部，因未詳細鑽探和試掘，三城的關係不明確。有一種看法，認為東北的大城是郭城，中間小城是宮城，西南的中城是秦漢的河東郡治。但是中城北牆夯土中含有戰國瓦片，中城也可能原是

戰國時代所築，城內所以滿佈漢代文化層，是漢代長期使用所造成。中城當是帶有內城性質的宮城，和西南中城相連結的中間小城，只是宮牆性質。如此西南城區連結東北大郭的佈局，還是與中原諸侯國都一致的。即使退一步說，西南的中城確是漢代郡治，是漢代擴建，那末中間的小城依然處於大郭的西南。總之，安邑的宮城並不在中部，依然是西南宮城連結東北大郭的佈局。戰國時代中原大國如齊、韓、趙、魏都城，都是西城連結東郭的佈局結構，無一例外。

至於劉同志所說秦都咸陽佈局，宮城(或宮殿區)在大城的北部，也不符合事實。原來秦的咸陽宮與興樂宮(即漢長樂宮)僅一水(渭水)之隔，建有橫橋連通，〈三輔黃圖〉所謂“渭水貫都以象天漢，橫橋南渡以法牽牛”。咸陽宮不可能遠在北邊的咸陽原上。咸陽宮以及咸陽城址已因渭水長期泛濫和不斷向北移動而被沖毀；所以至今尚未發現城址遺迹。至於咸陽原上發現的秦代宮殿建築，當是秦始皇在城旁擴建的宮殿。關於這一問題，目前存在不同意見，但是城址已沖毀當是事實，因此只能依據文獻以及其他考古資料來作推斷。關於這方面，我曾在〈中國都城的起源與發展〉中寫有一章專門論述，在此只約略談一下。

值得注意的是，自從秦在商鞅變法中創建新都咸陽之後，咸陽的都城制度曾被作為模式而推廣。秦惠王滅蜀後，派遣張儀與張若主持建設成都，就是“與咸陽同制”的，成都因而有“小咸陽”之稱。成都就是採用西面小城連結東面大郭的佈局，就是左思〈蜀都賦〉所說：“亞以少城，接乎其西。”具體說來，就是“少城與大城俱築，惟西南北三壁，東即大城之西墻”(李膺〈益州記〉，今有輯本)。成都古城作正方形，每面三里，中間隔有南北向的城牆，把方城分隔成西面小城和東面大郭。小城與大郭的南

北長度相同，只是東西寬度有大小之別，因此小城成狹長方形，大郭成較寬的長方形。秦都咸陽該是同樣的佈局，只是規模較大。模仿咸陽都城的秦始皇陵園，也正是同樣的格局，只是規模較小，西面建築陵寢和陵墓的雙重小城正是狹長方形，東面包括兵馬俑坑在內的大郭，也該是較寬的長方形，兵馬俑坑正當在大郭的東門以內。

西漢長安沿襲西周東都成周和戰國中原諸侯都城以及秦都咸陽城郭佈局而有所發展，是很明顯的。西周東都成周的西面小城和東面大郭的佈局為戰國中原大國所沿襲^⑥。齊國都城臨淄，帶有內城性質的宮城處於大郭的西南角，因此宮城以東門和北門為正門，東門和北門遺址的門口兩側前面都有向外突出部分，築有門闕。西漢長安城同樣以東門和北門為正門，已發掘的東城牆城門宣平門和霸城門，同樣在門口兩側都有向外突出部分，用築門闕。不僅如此，作為朝宮的未央宮，也以東闕和北闕為正門，臣下上書、奏事和謁見從北闕，諸侯大臣朝見從東闕。張衡《西京賦》說：“朝堂承東，溫調延北。”“承東”的“朝堂”指未央宮前殿，“延北”的“溫調”指前殿以北的溫調殿，亦稱溫室殿。而且郭區同樣以東郭門和北郭門為正門，稱為東都門和都門。由未央宮北闕一直向北有大街通過橫門，再由橫門一直向北有大道通到橫橋，設有都門（即北郭門），形成一條由朝宮向北直貫城區與郭區的中軸綫。這種雄偉的佈局，就是沿襲西周東都成周和戰國、秦代都城制度而進一步擴展的，對後世有深遠影響。同時沿着在這條中軸綫，在城內靠近雍門有孝里市，到郭區橫橋大道兩側還有六市組成的西市。這種在城區設有小市和郭區設有北市的佈局，對後世也有深遠影響。

西漢長安的建設，該是有其一整套的規劃而按步就班地建

成的。漢高祖在位時，只因天下未大定，人力物力又有限，僅建成了以未央宮為核心的核心部分，要待惠帝時才繼續築城，並作進一步建設。長安的最初設計規劃者是丞相蕭何，具體主持建築工程的是少府陽成延。未央宮及其前殿、東闕、北闕以及武庫、太倉，都是高祖時蕭何親自設計建成的。未央宮一開始就建成東闕和北闕作為正門，並把儲藏武器的武庫造在長樂、未央宮兩宮之間，把儲備糧食的太倉造在長樂宮以東，形成東西向一橫排的大小建築羣，作為都城長安的核心部分，接着又在北闕向北作為中軸綫的大街東側起建北宮，說明當時蕭何的設計思想已很明確，整個長安城郭是北門和東門作為正門的。長安城牆是惠帝元年正月開始起建的，當時蕭何仍為丞相，主持營建者仍為少府陽成延，因而保持着推行政策的連續性，長安城是按照原定規劃按步就班地築成的。據記載，惠帝元年“始作長安城西北方”（《史記·漢興以來將相名臣年表》）。為什麼要從西北方開始興建長安城呢？因為西北方的橫門是長安城的正門，從未央宮北闕向北作為中軸綫的大街正穿過橫門。這種首先重視正門和中軸綫的建設規劃對後世都城的建設有深遠的影響。當時限於人力物力，城牆是逐年分批建成的，直到惠帝五年九月才全部建成（九月即年終，當時以十月為歲首）。惠帝二年蕭何去世，由蕭何推荐的曹參繼任丞相，長安城牆依然按照蕭何原定規劃完成，也就是“蕭規曹隨”政策的一個重要部分。

等到長安城牆全部建成，惠帝六年六、七月間，緊接着又建成西市和敖倉。雖然敖倉不在長安，同時興建的西市和敖倉，也還是長安建設規劃的一部分，而且也是個重要部分。敖倉原是秦代所建，在當時黃河與濟水分流處，是積儲中原糴糧支援京師和邊塞的重要轉運站。當時所以要重建，主要是保證支援都城。

長安糧食的供應，這是繼蕭何設計創建太倉之後進一步的經濟建設。西市是長安最大的市，由六市組成，地處北郭作為中軸綫的橫橋大道的兩側，是通往渭水以北城市的樞紐所在。當時在長安城牆完工之後，緊接着在北郭興建大市，並在黃河中游重建敖倉，都是很重要的經濟建設，因而史書特為記載。到此長安都城的基本建設才完成。從整個長安按步就班地逐步建成的過程看來，很明顯是有整套建設規劃的，包括後來的陵邑建設在內。

- ① 拙作《中國都城的起源與發展》日文譯本，西嶋定生監譯，尾形勇、高木智見合譯，日本學生社1987年11月出版。
- ② 《史記·惠景問侯者年表》記梧齊侯陽成延“以軍匠從起邲，入漢後為少府，作長樂、未央宮，築長安城，先就功侯，五百戶”。《漢書·高惠高后孝文功臣表》相同，陽成延作陽城延。《漢書·百官公卿表》載：“高帝五年，軍正陽成延為少府，二十一年卒。”按陽成延入漢為少府，高后六年卒於宮，正好二十一年。可知陽成延亦即陽成延，“成”與“咸”形近，“咸”字恐誤。
- ③ 詳拙作《戰國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80年出版）第295—301頁。
- ④ 劉運勇《西漢長安》（北京中華書局1982年出版）說：“解放後對漢長安城遺址的勘察發掘，證實了只有一道城牆。至於文獻記載上所謂都門或外郭門，應指城門外大道上掌管地方治安的機構——亭的門戶（第17頁）。”這一說法，我也認為不確。外郭亭應與外郭門有別。外郭亭既用於警衛，又用於郵傳，常是官吏與旅客中途留宿之處，因而亦稱郵亭。如秦都咸陽西門外十里有杜郵亭。西漢長安十二座城門外一定距離都有外郭亭，但並非都設有外郭門。如設有外郭門的，外郭亭應在外郭門之外。宣平門外的外郭亭叫軹道亭，《雍錄》卷七以為軹道亭在東郭門外，是不錯的。這種制度為東漢洛陽所沿用，東漢洛陽每個城門外一定距離也都設有外郭亭。《元河南志》所載《後漢京城圖》在不少城門外書有外

郭亭的亭名。

- ⑤ 參見馬先醒〈漢長安里第考〉，收入所著〈漢簡與漢代城市〉，臺灣省臺北市簡牘社 1976 年出版。
- ⑥ 參見拙作〈西周初期東都成周的建設及其政治作用〉，上海華東師範大學〈歷史教學問題〉1983年4期。

三論西漢長安的佈局結構問題

楊 寬

我在一九八四年發表〈西漢長安佈局結構的探討〉一文(《文博》1984年創刊號),提出一些看法,供大家討論,目的就在於徵求不同意見,促進這方面的進一步探討。一九八七年劉慶柱同志發表〈漢長安佈局結構辨析——與楊寬先生商榷〉一文(《考古》1987年10期),提出了商榷的意見。我在一九八九年發表〈西漢長安佈局結構的再探討〉一文(《考古》1989年4期),反駁了他的商榷意見,作了進一步的闡釋。現在又看到劉慶柱同志發表了〈再論漢長安城佈局結構及其相關問題——答楊寬先生〉一文,對我的反駁意見作了答辯。與此同時,劉運勇同志發表〈再論西漢長安佈局及形成原因〉一文,參與討論,是在他所著《西漢長安》一書(1982年中華書局出版)的基礎上作進一步的探討(以上兩文均見《考古》1992年7期)。我早就說過,歡迎大家來參與商討,因為這樣將使歷史的真相越辯越明。這些九年間反覆爭論的問題,主要是目前經過考古發掘調查結合文獻而畫出的西漢長安城,是擴大的宮城兼內城性質,還是外郭城性質?城外是否存在廣大郭區?東西兩大市在城內還在外郭?這種佈局結構的設計思想的淵源及其建設規劃如何?我認為,這些問題的討論,已經由於爭辯而得以比較深入,現在我就按劉慶柱同志的答辯與劉運勇同志參與討論的意見,再進一步申說我對這些問題的

主張，供大家討論。

一 長安城是擴大的宮城而具有內城性質

西漢長安城是擴大的宮城，古文獻上有明確的記載，未見有任何異議。《三輔黃圖》早就說明高祖“方修長安宮城”本是秦的離宮，“初置長安城，本狹小，至惠帝更築之”。《雍錄》卷二引《皇覽》也說：“秦有小城，至惠帝乃始大之。”惠帝所築的長安城原來就是擴大的宮城，十分清楚。《雍錄》卷三“長安宮及城”條也說：“地（指長安鄉）有秦興樂宮，高帝改修而居之，即長樂宮也，此本秦之離宮，故不立城郭，至惠帝始大起民丁城之，蓋數年後而訖功也。”是同樣的意思。現在劉慶柱同志解釋說：“高祖築宮城不立城郭，是因為新王朝剛建立，當時國家人力、物力、財力之困難。漢惠帝上臺後，國家財力、物力較前大有改變，於是決定改變過去不立城郭的狀況，大起民丁，立城郭。惠帝修長安城不是作為擴大宮城而修的，這是顯而易見的。”我認為這個解釋不符合《雍錄》作者的原意。《雍錄》所說“此本秦之離宮，故不立城郭”，是說此地原有的秦興樂宮本是離宮性質，因而沒有建立城郭；所說“至惠帝始大起民丁城之”，正是說惠帝起建了這個擴大的宮城。《水經注·渭水》說：“長安有秦離宮，原無城垣，故惠帝城之。”是同樣的意思。《雍錄》所說的“不立城郭”，就是《水經注》所說“原無城垣”，並沒有涉及整個長安的城郭的建設問題。

原來惠帝所建的擴大的宮城，在長樂、未央、北宮以北還留有餘地，到武帝又進一步向北擴建明光宮和桂宮等，又“以城中為小”，跨越西城牆而興建更大的建章宮。我說：“長安城內這樣充滿着皇宮，成為城內主要且占地最大的建築，長安城作為擴大的宮城，是顯而易見的。”現在劉慶柱同志反駁說：惠帝時“三宮面

積總和12平方公里左右，約佔長安城總面積的三分之一，因此就很難說惠帝時修築的長安城屬於擴大的宮城了。”其實，正是因為惠帝時修築的長安城原是擴大的宮城性質，武帝才會向北擴建明光宮和桂宮等，又“以城中爲小”，把建章宮造得跨越西城牆而用架空的複道與城內諸宮相通。我在《西漢長安佈局結構的探討》中已經指出：由於西漢繼承了秦代建造許多宮殿建築羣的風氣，宮殿造得多而大，既然要包容有許多宮殿的建築羣，宮城就不能不造得很大，所以它的面積不但遠遠超過戰國時代中原大國以及秦代的宮城，而且超過了西周東都成周的王城。並且還指出：儘管長安宮殿和城牆是陸續建成的，但仍是以秦都咸陽作爲模式的。正如張衡《西京賦》所說的“乃覽秦制，跨周法”。薛綜注：“跨，越也，因秦制，故曰覽，比周勝，故曰跨之也。”

在高祖和惠帝兩代，主持興建長樂、未央兩宮和長安城牆工程的，是擔任“少府”官職的陽成延（一作陽城延或陽咸延）。我認爲，陽成延以主管“天子私藏”和“天子供養”的少府官職，長期主持兩宮及長安城牆的興建工程，可見長安城具有“衛君”的宮城性質。現在劉慶柱同志認爲我所說陽成延擔任“少府”官職，出於誤解。他依據王先謙《漢書補注》的說法，認爲陽成延的“少府”即是“將作少府”，將作少府掌治宮室或土木之役。其實，王先謙的這個解釋並不正確。《漢書·公卿百官表》就明確地說：“高五年，軍正陽咸延爲少府，二十一年卒。”這個陽咸延不是別人，即是陽成延，“咸”該是“成”字之誤。根據《史記·惠景間侯者年表》陽成延本來出身軍匠，“入漢後爲少府”，高后六年卒於官。從高祖五年到高后六年，正是爲“少府二十一年卒”。馬先醒先生《漢代長安城之營築及其形制》一文（收入《漢簡與漢代城市》，臺北簡牘社1976年出版）早已指出：“只據《功臣表》觀之，陽

城延之官職似為將作少府，即將作大匠，但據《百官公卿表》，則知陽城延確為少府。”又說：“陽城延以掌山海池澤之稅之少府，而負築宮城之全責，則不但說明築宮城旨在養天子，且顯示漢初築宮城之財源，是出於少府，即來自商稅。”（見該書234頁）

“少府”原是皇帝私有的小府庫，以別於朝廷所有的“大內”。少府官職總管徵收賦稅與皇室的產業及事務，包括所需物資的供應與所需器械服飾的製造，宮殿、宗廟和陵園的建築。秦代少府除了徵收工商稅與山澤開發之稅（包括鹽鐵之稅）以外，還徵收人頭稅。人頭稅是軍賦的性質，用於軍費開支。同時大量使用徒隸與徵調服役的“更卒”作為勞動力，因而少府成為秦代搜括財富、奴役人民和推行暴政的主要機構。漢代初期對於少府職掌逐步有了減削，把人頭稅劃歸大司農徵收，軍費改由大司農開支。中外有些學者認為將作少府原是屬於少府的官署，具體主管宮殿、宗廟與陵園的建築工程，費用原由少府開支。到漢代，將作少府改成獨立官署，費用改由大司農開支。這個推斷是合理的。看來當漢代開國之初，陽成延以少府之職，主管宮殿與長安城的建築時，將作少府尚屬於少府，陽成延是以少府這個高官來指揮將作少府等屬官具體進行的。陽成延於惠帝三年與五年，兩次調發長安周圍六百里以內的男女十四萬多人建築長安城，於春正月調發，三十日即罷。同時於三年六月調發諸侯王、列侯所有徒隸二萬人長期建築長安城，即《長安志》卷五所說“長役不止”。這樣要從六百里周圍兩次調發十四萬多人服役，又要從諸侯王、列侯那裏調發兩萬徒隸來長期使用，不是少府的權力、物力和財力是不能勝任的。將作少府“掌修作宗廟、路寢、宮室、陵園土木之功”（《後漢書·百官志》），這樣大規模築城不在其職司之內①。

《漢書·地理志》的長安戶口統計為八萬八百戶，人口二十四萬六千二百，平均每戶只有三人，根據一般估計，當是成年人繳納算賦的數目，如以每戶平均五人計算，人口當有四十萬以上。長安居民四十萬人分居一百六十里，每里平均要住五百戶，人口二千五百。長安城內面積共三十六平方公里，南部中部均為宮殿、宗廟、官署、高官府第，僅存北部五分之一約七平方公里的面積，我認為不可能容納一百六十里、八萬戶和四十萬人口。現在劉慶柱同志認為我的人口估計偏多、偏大。長安戶均三人，是由於三輔地區戶均明顯低於全國戶均的人口數，長安每里居民也不會有五百戶之多。據他的推算，“《漢書》記載長安城中每里約四十戶，東漢時代每里居民五十戶，也有文獻記載，先秦和秦漢時代每里八十戶或一百戶的，若按每里中人口最多的百戶計算，長安城中一百六十個里也不過一萬六千戶，……長安城五分之一面積的東北角只有七平方公里，那麼長安城中的一百六十個里不是容納不下的問題了，而是綽綽有餘。”又說：“長安八萬戶不只在城中一百六十個里內，還應包括在長安城附近郊區鄉村之中。”

據我看來，劉慶柱同志這一估算的根據不確。《漢書·平帝紀》記元始二年“起五里於長安城中，宅二百區，以居貧民”。如果宅一區住一戶，每里只有四十戶。但是漢代住宅稱為“區”的都是指較大的宅舍，所有皇帝賞賜給大臣的住宅都以“區”為單位，常見“賜宅一區”的記載。錢劍夫先生《秦漢貨幣史稿》（湖北人民出版社1986年出版）曾討論這個“區”的問題，認為元始二年“宅二百區，以居貧民”，這個“區”可能是個“大雜院”（見該書362頁），每一區當住許多戶貧民。至於《風俗通義》佚文所說“里有司，司五十家”，來源於《周禮》“五家為鄰，四鄰為里”，與《國語》

“五家爲軌，十軌爲里”，講的是古制，並非東漢時代的里制。先秦和漢代文獻中確實講到一般的里有五十戶到一百戶，但是長安城郭中的“里”是不能以一般的“里”來估計的。《三輔黃圖》說：“長安間里一百六十，室居櫛比，門巷修直。”張衡《西京賦》也說：“街街相徑，廛里端直。”說明長安城郭中的“里”排列得很是整齊，住宅十分密集。當時每個“里”設有“閭”可以檢查和監督來往出入的行人。《漢書·張敞傳》講到在里中捕捉小偷的情況：“偷長以赭汙其(小偷)衣服，吏坐里閭，閱出者，汙赭輒收縛之，一日捕得數百人。”這樣在里閭檢查出去的行人，一日內捉得小偷數百人，足見當時長安的治安很不好，同時也可以看到當時“里”中所住人口的衆多。歷代都城中坊里的戶口特別多，不能以一般的里閭來估計，這不僅西漢長安如此，此後歷代都城都是如此^②。如果按照劉同志的估計，西漢長安一百六十里只有一萬六千戶，作爲西漢都城內的總戶口數，未免太少，太不近情理了。如果說長安八萬多戶大部分住在附近郊區鄉村，更不合情理了。

西漢長安的設計受到《考工記》的影響是很明顯的。長安城的佈局結構，正與《考工記》所說“旁三門，國中九經九緯”，“面朝後市”相合。我曾指出，《考工記》講的是“王城”的體製，並不包括外郭，據此也可以證明長安城並非外郭城。現在劉慶柱同志又認爲“國中”即爲“郭中”，《考工記》所講的就是都城的城郭形制。其實《考工記·匠人》所說“營國”的制度，從來經學家都認爲“王城”而不包括外郭。鄭玄注：“國中，城內也。”賈公彥疏把“旁三門”解釋爲“王城面各三門”，從來沒有人異議，直到今天也還如此。賀業鉅先生《考工記營國制度研究》^③指出《考工記》的營國制度沒有提到郭，是正確的。

西漢長安城是擴大的宮城而具有內城性質，從其內容可以看得很清楚的。因為除了主體建築五個宮和宗廟以外，也還有大量官署、倉庫和高官府第以及市和作坊等。關於這點，我在〈西漢長安佈局結構的探討〉中已經列舉。既然長安城是內城性質，城外有廣大的郭區是可以肯定的。

二 長安城外的北郭、東郭、西郭結構

要判斷每個都城的制度的性質，不僅要看其內容，還要看其作用，更應該從其發展變化的過程中去分析。從城郭制度的發展歷史來看，是很清楚的。西周初期周公在洛陽建設東都成周，開創了西邊王城連結東邊大郭的佈局結構，大郭利用原有山川加工連結而造成“不可逾越”的屏障，即〈逸周書·作雒篇〉所說：“南繫於雒水，北因於邙山”。春秋戰國時代，中原諸侯中的大國都沿用這種佈局，或者造成郭城，如齊都臨淄，或者利用原有河流加工連結，把防禦水災的堤防加工改造成大郭的屏障，如春秋時代鄭國的新鄭等。兩漢沿用這種“城”和“郭”連結的制度，利用原有河流和新開漕渠加以連結而作為大郭屏障。漕渠的開鑿往往兼有作為大郭屏障的作用。東漢北魏的洛陽，這種制度由於〈洛陽伽藍記〉有比較詳細的記載，可以看得十分清楚。西漢長安的這種制度，因為〈三輔黃圖〉和〈水經注〉等書記述簡略，不容易看清。但我們只要加以比較，還是很清楚的。

漢魏洛陽城，與西漢長安同樣是個擴大的宮城而具有內城的性質。秦及西漢時，洛陽城內已建有南宮與北宮。光武帝定都洛陽，沿襲舊制，起建南宮前殿，明帝又重建北宮。南北兩宮南北縱列，與西漢長安的未央、長樂兩宮東西橫排不同。南北兩宮不僅面積大，而且居中占有主要地位，靠近南北城牆。同時倉

庫、官署以及貴族官吏住宅充滿全城，其為擴大的宮城而具有內城性質十分明顯。所不同的是，西漢長安無論宮門、城門和郭門，都以東門與北門為正門，而漢魏洛陽則以南門為正門。西漢禮制，到未央宮參加朝會要從東闕進入，上書與要求謁見要到北闕，主管接受上書與謁見的公車司馬也設在北闕。東漢禮制，參加朝會要從南門進入，上書與謁見也要到南闕，公車司馬也設在南闕^④。正因為禮制的變化，就使得都城佈局發生重大變化，西漢長安是東向與北向的，而漢魏洛陽是南向的。同時郭區的分佈也就不同，西漢長安主要有北郭、東郭和西郭，漢魏洛陽主要有南郭、東郭和西郭。可是所有郭區的結構基本相同，同樣以天然河流與新開漕渠作郭區的屏障，同樣以橋梁與郭門作為郭區的門戶，或者以橋梁與外郭亭作為郭區的關口。

根據《洛陽伽藍記》，洛陽東郭是水路交通樞紐所在，交通發達，以新開漕渠（陽渠）作為屏障。陽渠從城外東南角引洛水北上，成為一條南北向的大渠，到上東門（即北魏建春門）以東七里折而一直向西進入上東門，把東面郭區大部分包容在內。同時在上東門以東七里的漕渠上建有橋梁，稱為七里橋，並在橋東一里建有“門開三道”的東郭門。這裏是來往旅客行人離別相送之處，這與西漢長安宣平門外的東郭門情景相同。洛陽西郭以“南臨洛水，北達芒山”的張方溝作為屏障，在上西門（即北魏閭闔門）以西七里的張方溝上建有張方橋，東漢稱為夕陽亭，是上西門的外郭亭所在^⑤。夕陽亭亦稱“洛陽都亭”，具有郭門性質，並常為駐軍與梟首示衆的地方，這與西漢長安以外郭亭為郭區的關口也相同。洛陽的南郭在南城牆與平行的洛水之間，從南城牆到洛水只有四里地。南郭就是南城牆與洛水之間東西寬六里、南北長四里的地區。這和西漢長安的北郭在北城牆與渭水之間

東西寬十多里、南北長三里的地區，結構基本相同。洛陽以偏東的平城門作為主要交通的正門，洛水上建有浮橋，這和長安以偏西的橫門作為主要交通的正門，渭水上建有橫橋，性質相同。漢魏洛陽之所以會有與西漢長安如此相同的結構，該是東漢都城的建設沿用了西漢的制度。

西漢長安的北郭，位於北城牆與平行的渭水之間，東西寬十多里而南北長三里。靠西的橫門是正門，通過橫門向北有“橫橋大道”直通渭水上的橫橋，在橫橋南側有郭門和外郭亭，王莽曾改稱為朔都門與左幽亭，是用《尚書·堯典》“宅朔方，曰幽都”的典故。朔都門即是北都門，可知這和宣平門外的東都門同樣重要，是都城的正門。由未央宮的北闕一直向北有大街，通過橫門，經橫橋大道而到橫橋出郭門。大街不但是來往北方，特別是通往北方五個陵邑的交通樞紐，而且是整個長安城郭的中軸綫。這和東漢洛陽的由南宮的南闕一直向南，通過平城門，經平城門外的浮橋的大道，性質基本相同。北城牆靠東的洛城門，又稱杜門，通過洛城門向北有杜門大道，直通到渭水邊。臨渭水也有外郭亭，王莽改稱洛城門及其外郭亭為進和門與臨水亭。臨水亭當因臨渭水而定名。《唐兩京城坊考》卷一“三苑”條，在“西包漢長安城”中的禁苑中，有渭水亭，“按臨渭水，當在苑之北”，該即王莽所改稱的臨水亭。北城牆中間的廚城門也有外郭門，王莽改稱為建子門與廣世亭，這個廣世亭也該在渭水邊。《漢書·成帝紀》載：“建始三年秋，關內大水。七月虜上小女陳持弓聞大水至，走入橫城門，闖入上方掖門，至未央宮鈎盾中。”應劭注：“虜上，地名，在渭水邊。”說明渭水邊有人民聚居之處，虜上當是此中一地，那裏該有居民的“里”存在。

西漢長安的東郭，在東城牆與漕渠之間。東城牆北門宣平

門是來往東方的交通要道，向東經過漕渠上的橋梁，橋東有東郭門，稱爲東都門，在東都門外有外郭亭叫軹道亭。從宣平門到軹道亭有十三里的距離，足見東郭是比較廣大的。《三輔黃圖》講到“飲馬橋在宣平門外”，並且把飲馬橋與橫橋、渭橋、灞橋、便門橋相提並論，足見是大橋。在宣平門外的大河只有漕渠，飲馬橋當是漕渠上的大橋。《唐兩京城坊考》卷一“三苑”條，在“西包漢長安城”的禁苑中有“飲馬門”；“按漢宣平門外有飲馬橋，此門蓋以橋爲名也。”《唐兩京城坊考》所附“西京三苑圖”上有“飲馬門”在宣平門東北較遠的地方，與距宣平門十三里的軹道亭，地點相當。晉代元康二年潘岳（字安仁）爲長安令，上任時，也是經飲馬橋而進入宣平門的。《文選》卷十載潘岳《西征賦》：“戾飲馬之陽橋，踐宣平之清闕，……展名京之初儀，即新館而蒞職。”李善注引《長安圖》曰：“漢時七里渠有飲馬橋。”漢代的東都門和外郭亭，當即在飲馬橋以東。

現在劉慶柱同志認爲，“軹道亭稱爲外郭亭當與漢武帝元光六年修漕渠有關。西漢中期漕渠修築後，它成了長安城東面的一道天然屏障，可能當時人們也就習慣上把長安城與漕渠之間視爲東郭。”長安東郭的形成與發展，自當在元光六年漕渠修築以後，東郭門的建設與軹道亭的稱爲外郭亭亦當在漕渠建成以後，但是這個東郭確鑿存在，決不能像劉同志那樣認爲東郭門是象徵性的。我們只要把西漢長安與漢魏洛陽兩個東郭加以比較，就可見長安東郭也如洛陽東郭同樣確鑿存在，同樣介於東城牆與漕渠之間，同樣介於東城牆北頭城門與東郭門之間。洛陽東郭門是“門開三道”的大郭門，長安東郭門不知其詳，但是具體存在是可以無疑的。

上次我曾引用昭帝去世後，龔遂陪同昌邑王賀進京奔喪路

程上的對話，來證明東郭門即東都門的確鑿存在，決非象徵性的。當他們到廣明的東都門時，龔遂說：“禮，奔喪望見國都哭，此長安東郭門也。”劉賀說：“我嗑痛不能哭。”正因為進東都門即是都城，因而要劉賀按禮一“哭”，如果郭門是象徵性的，龔遂就不該要劉賀按禮一“哭”了。怎麼可能有這樣為象徵性的郭門而哭的“禮”呢？當他們到城門即宣平門時，龔遂再次要劉賀照禮一“哭”，劉賀對答說：“城門與郭門等耳”，說明郭門與城門在“禮”具有同樣的地位，郭門決不是象徵性的。現在劉慶柱同志辯解說：“在劉賀看來，宣平門（城門）與東郭門（郭門）在‘禮’上具有相同的地位，這正說明其性質相同，而相對未央宮東闕（即東宮門）而言，在‘禮’上它就與宣平門和東郭門不同了，因此劉賀才有哭如儀的不同反映。”這個辯解很難令人信服。如果說宣平門與東郭門在“禮”上具有相同的地位，為什麼宣平門是確鑿存在而東郭門是象徵性的呢？如果說“城門與郭門等耳”是對未央宮東闕而言，因城門與郭門在“禮”上的地位不同於未央宮東闕而不哭，必須要到東闕才“哭如儀”，他可以據“禮”力爭，何必說“我嗑痛不能哭”這種推託的話呢？

西漢長安的西郭，在西城牆與泂水之間，面積比較狹小。《水經注·渭水》和《三輔黃圖》都說雍門“其水北入有函里，民名曰函里門。”馬先醒先生《漢代長安里第考》（收入他的《漢簡與漢代城市》），考定函里在雍門外的西北方，是正確的。我曾引用而加了一條注，沒有引用原文。現在劉運勇同志不同意這點。馬先生說：“唯考《長安水道圖》，知雍門之內無水，《水經注》所謂北入函里之水，係指泂水而言，泂水則係過雍門之外而北入渭，是知函里當處長安城外西北方，而非長安城中諸里之一。”我認為此說有根據。現在劉運勇同志認為泂水枝津“在雍門附近分水

一枝由北而流入門內的函里”，看來缺乏根據。現在所有漢長安城的實測圖，包括劉同志所舉出黃盛璋先生《關於水經注長安城附近復原的若干問題》一文的附圖^⑥，泜水枝津沒有流入雍門以內的。《唐兩京城坊考》的《西京三苑圖》中所畫漢長安城，其形制於傳統漢長安圖中是最接近新的實測圖的，泜水也是過雍門外而未流入雍門。雍門也有外郭亭，王莽改稱為章義門與著義亭，著義亭未詳所在。

我們比較一下西漢長安的北郭、東郭、西郭與漢魏洛陽的南郭、東郭、西郭，其結構基本相同，同樣利用河流與新開漕渠作為屏障，同樣以橋梁與郭門作為郭區的門戶，或者以橋梁與外郭亭作為郭區的關口，或者兩者兼而有之。只是由於朝廷重要禮制的變化，西漢長安無論宮門、城門、郭門都以東向和北向的作為正門，而漢魏洛陽則以南向的為正門，因而外郭的分佈也發生變化，長安有北郭而無南郭，洛陽有南郭而無北郭。兩京的東郭的具體建成，都當在漕渠建成以後。西漢長安的東郭建成當在武帝元光六年開鑿漕渠以後，東漢洛陽的東郭建成當在光武帝建武二十四年修建陽渠之後。

從城郭發展的歷史來看，一個“城”發展為“城”和“郭”連結的佈局結構，首先由於政治上和軍事上的需要。到戰國時代，一般縣城都已是“三里之城”結合“七里之郭”，各國都城當然都有“城”和“郭”連結的佈局。同時，郭的發展是根源於社會經濟的發展，人口的增多，特別是手工業和商業的發展和繁榮。隨着中央集權的政治體制的確立與發展，都城成為全國的政治中心，因而需要擴大的宮城而具有內城的性質。隨着社會經濟的成長，手工業和商業的繁榮，需要大郭成為居民集中的聚居區以及市與作坊的發達之區。隨着君權的加強，朝會和元旦大朝會有一

定的禮制，都城的佈局結構就必須由朝東、朝北改爲坐北朝南，因而西漢長安與東漢洛陽的佈局就發生重大變化。從班固《東都賦》與張衡《東京賦》中可以看到大段描寫元旦大朝會的盛況，這在他們的《西都賦》與《西京賦》中是看不到的。關於這方面，我已在《中國都城制度史研究》一書中加以闡明（此書正排印中），這裏不多談了。

三 東西兩大市建設在北郭大道旁

東西兩大市是西漢長安諸市中的大市，具有代表性，是很明顯的。西市是惠帝六年建成長安城牆之後，與敖倉同時興建的，可見十分重要。東市建成的年代不詳，李劍農《先秦兩漢經濟史稿》推測是高祖六年“立大市”時所建，可是此時高祖尚未徙入長安，因而這一推測尚難肯定。東市在文帝、景帝、武帝時期常被作爲行刑示衆的地方，也該是大市所在。王莽曾於長安及五都，設立“五均官”，因而把長安東西市令及五都的市長稱爲“五均司市師”（見《漢書·食貨志》卷下），同時把東市稱“京”，西市稱“畿”，王孫卿曾被任命爲“京司市師”（《漢書·貨殖傳》），可見東西兩市確是長安具有代表性的大市，不是別的市可以比較的。

我主張東西兩市建設在北郭的大道旁，主要有下列四點根據：

第一，東西兩市即是長安九市，就是“六市在道西，三市在道東”。所謂“道”，是指城門通向郭區的大道。西漢長安城內的道路叫“街”，只有城外郭內的道路叫“道”。

記述長安大市情況的古文獻，無論《三輔黃圖》所引的《廟記》，班固《西都賦》李善注所引的《漢宮闕疏》和《太平御覽》卷一

九一引的《宮闕記》，一致都說長安有九市，“六市在道西，三市在道東”。班固《西都賦》說：“九市開場，貨別隧分。”馬衡《西京賦》說：“爾乃廓開九市，通闕帶闔。”這個長安有九市的記載，與東西兩大市的記述，並不矛盾而是一致的，因為西市有六市，東市有三市，合成九市。現劉慶柱同志認為這個“九”是虛數，是汪中《釋三九》的“九”，並認為“長安九市之說不確”，這是缺乏根據的。所謂“六市在道西，三市在道東”，這個“道”該是城外郭內的大道。西漢長安城內的道路一律稱“街”，《三輔黃圖》引《三輔舊事》所說“長安城中八街九陌”，確實無誤，八街的名稱都還可考。長安十二個城門中，只有八個城門有通向城內的大街，其餘四個城門因靠近宮殿，只成為出入宮殿的通道，沒有交通的大街。長安十二城門中，所有出城門通向郭區的大路，則一概稱為“大道”。例如出北面橫門向北通到渭水上橫橋的稱為“橫橋大道”，出西面章城門向西北通過渭水上的“便門橋”而到茂陵的稱為“便門橋大道”，出東面宣平門向東通過漕渠上的“飲馬橋”的也稱“大道”。《史記·樊鄴滕灌列傳》索隱引《三輔故事》說：“滕文公（即夏侯嬰）墓在飲馬橋東，大道南，俗謂之馬冢。”

第二，在郭內大道旁建設大市，是從春秋戰國以來，直到唐代的傳統設施，西漢長安也該不例外。

春秋戰國時代中原各諸侯國的國都，建設外郭的目的之一，就是設立“市”以適應社會經濟發展的趨勢和適合居民生活上的需要，因而常在郭內大道旁側建設大市。例如春秋時代鄭國的新鄭，大市稱為“遠市”，就設在外郭的“純門”以內稱為“大遠”的“九軌之道”旁側。杜預指出“遠市”是“郭內道上市”（《左傳·莊公二十八年》杜注）。戰國時代齊國臨淄的大市稱為“岳”，就設在郭中貫通南北的、稱為“莊”的“六軌之道”旁側，因而“莊岳之

間”成爲齊國人口密度最高而最繁華之區。西漢長安的東西兩大市設在外郭的大道兩側，就是沿襲這個傳統佈局。接着漢魏洛陽繼續沿襲這個傳統佈局，城內有“市”設在宮牆西邊，稱爲“金市”，大市分設在東西兩郭的大道旁。在東城牆北頭城門上東門（北魏稱建春門）外一里多，漕渠上的東石橋南側有“馬市”，這個馬市東漢已存在，並用作行刑示衆的地方。在西城牆中閭城門西陽門以西的大道南側，北魏有“洛陽大市”，市的周圍有八里，並且與四周十個“里”相結合而組成。在東城牆南面城門青陽門外三里的孝義里，還有“洛陽小市”，同時在南郭有四通市，唐代長安的東西兩大市也分設在郭城的東西兩部的中心地點。

第三，《三輔黃圖》引《廟記》敘述長安九市，說到“夾橫門大道，市樓皆重屋，又曰旗亭樓在杜門大道南”，可知西市是在橫門大道的兩側，東市在洛城門外的杜門大道南段，因爲洛城門亦稱杜門。合稱長安九市的東西兩大市設有令署，屬三輔都尉管轄，與左馮翊所屬四市設長丞不同。

現在劉運勇同志認爲橫橋是長安與諸陵邑的交通樞紐，因而橫門內西北一隅及橫門外“夾橫橋大道”一帶成爲工商貿易活動的中心，爲大市集中之地。這一論斷很正確。同時他也認爲“旗亭樓在杜門大道南”可能指東市的市樓，只是主張東市在洛城門南而不在洛城門外。其實，東市既在杜門大道南，杜門大道該是由洛城門通向北郭的大道，當時稱爲“大道”的道路都在城外，不可能在洛城門以南。同時他又認爲“橫門外夾橫橋大道的市，當屬漢朝臻於極盛時，長安城內工商業高度發展，爲城市佈局所限制，不得不向外蔓延的產物。”據我看來，東市既在杜門大道南，與東市相對的西市正好在“夾橫橋大道”的兩側。東西兩

市正東西並列於北郭。

長安城內外的“市”的分佈是個複雜問題，既有所謂“長安九市”，又有所謂“長安四市”。據《漢書·百官公卿表》，京兆尹的屬官有長安市令、丞，左馮翊的屬官有“長安四市四長丞”。《三輔黃圖》所引《廟記》，在敘述“夾橫橋大道”和“在杜門大道南”有旗亭樓或市樓之後，接着說：“有令署以察商賈貨財買賣貿易之事，三輔都尉掌之。”據此可知，西漢長安的許多“市”分別為三個官署所掌管。張衡《西京賦》在敘述“廓開九市”，“旗亭五重”之後，說：“周制大胥，今也惟尉”。這個“尉”當即三輔都尉^⑦。可知三輔都尉管轄的合稱“長安九市”的東西兩大事“有令署”，這與左馮翊所屬“長安四市”設長丞是不同的。都尉是“典兵禁，備盜賊”的武官（《漢官儀》），該是由於東西兩市規模大，參與交易的人數衆多，治安問題比較複雜，因而特別由三輔都尉來掌管。左馮翊所屬的“四市”，在宋敏求《長安志》卷五所列舉的長安的“市”中，作為一個市名，與東市、西市等並列，看來是有道理的。陳直《漢書新證》，認為漢城遺址中出土有東西南北四市封泥，是左馮翊所屬長安四市長所用者。我認為，可能“四市”內因分設東西南北四市而得名^⑧。

劉運勇同志認為《長安志》以“四市”與東市、西市並列不確，東市西市應包括在“四市”中，“四市”即指東、南、西、北四市。從《漢書·劉屈氂傳》所記戾太子引兵“驅四市人凡數衆，至長樂西闕下”，與丞相軍混戰的情況分析，“四市”應在城中，不可能在城外，這可以和遺址中出土東西南北四市封泥相印證，因而斷定東西兩市應在城中。這一判斷看來證據還不足。《資治通鑑》卷二十二胡三省注：“二都及二京賦皆謂長安中有九市，《廟記》曰：長安市有九，……凡四里為一市。此言四市，蓋以東、西、南、北分為

市也。一說四市者，東市、西市、直市、柳市也。”王先謙《漢書補注》又認爲“此時倉卒烏集，何能定爲某市之人，四市人猶言諸市人耳，四者廣博之詞，胡說失之泥矣。”我認爲，戾太子所驅使的“四市人”確是應在城中，可是戾太子調發守衛京師的“北軍”沒有成功，立即引兵驅使“四市人”爲他作戰，他使用來驅使“四市人”作戰的兵力有限，倉卒之間不可能把分設於東西南北的四個“市”上的羣衆趕來集中到長樂宮西闕下。所說“四市”只能是一個市，或者如王先謙所說是抽象的“廣博之詞”^④。

第四，長安有不少商人以及富商大賈住在郭區，諸陵邑更有許多從關中徙來的商人與富商大賈，“夾橫橋大道”的大市正適應這個需要，因而不斷地得到發展與擴大。

西漢一代曾七次從關東徙移大批貴族、官吏及富人充實關中，並借此建設作爲長安衛星城的陵縣。高祖九年徙移齊、楚貴族及豪傑十多萬人到關中，後來主要安置於長陵，也還有些豪富安置在長安附近，後來長安富商中有田氏可以證明。接着六次徙移關東人到陵縣，除了官吏與豪傑以外，就是富人。官吏人數不可能很多，主要是豪傑和富人。元朔二年徙茂陵的富人規定要“訾三百萬以上”，本始元年徙平陵的富人規定要“訾百萬以上”，因此長安與陵縣中不乏富商大賈，如長安有富人王孫氏、魚氏、左氏、摯氏、丹氏、田氏、樊氏、葉氏等。《史記·貨殖列傳》說：“關中富商大賈，大抵盡諸田，田裔、田蘭，韋家栗氏、安陵杜杜氏亦巨萬。此其章章尤異者也，……以末致財，用本守之。”富人“以末致財”必須通過市上交易。諸陵縣中雖也有“市”，只不過是小市，如茂陵的市上可買肉（見《漢書·游俠傳》），因而“夾橫橋大道”的大市就適應了這個需要，得到了不斷的擴展。我認爲，“夾橫橋大道”的西市，創設是在惠帝時，其擴展應在大

量移民和創建陵縣以後。

我主張目前長安城西北隅已發現的“市”的遺址，即文獻上所說“孝里市在雍門之東”，而不是由九市組成的東西兩大市。現在劉慶柱同志認為，這個雍門並非長安城的雍門，另有雍門和孝里市在今咸陽市東郊。《漢書·外戚傳》載：鈞弋夫人之父“死長安，葬雍門”，顏師古注：“雍門在長安西北孝里西南，去長安三十里”。劉同志認為這樣的標點不確，應是“雍門在長安西北孝里，西南去長安三十里”，同時“西南”應為“東南”之訛。在他看來，顏師古注《漢書》凡言“長安”者為漢長安故城，唐長安城則稱之為“京城”，因而此注“長安”為漢長安城，雍門為另一地，二者相距三十里，孝里東鄰秦的杜郵亭，杜郵亭又名孝里，孝里市即因孝里而得名。我認為這一考證，看來出於誤會。原來的標點正確，“長安”當指唐代長安城，雍門在唐代長安城的西北，孝里的西南，相去唐代長安三十里。《水經注·渭水》說杜郵亭“今名孝里亭”。《文選》卷十潘岳《西征賦》說：“索杜郵其焉在，云孝里之前號。惘輟駕而容與，哀武安（武安君白起）以興悼。”李善注：“杜郵，亭名，在咸陽西，今謂之孝里。”杜郵是秦都咸陽西門外十里的外郭亭。我們沒有證據可以證明杜郵在漢代已改名孝里，孝里之名後起，怎麼可以據此斷定漢代的孝里在那裏而且另外有個雍門呢？

劉運勇同志指出長安人口中有相當多的人屬於有市籍而居於市井中，不是一百六十里的住戶。的確，長安有眾多的商人，市租的收入僅次於臨淄。主父偃對景帝曾說：“齊臨淄十萬戶，市租千金，人眾殷富，巨於長安。”（《史記·齊悼王世家》）可是也還有不少行商，特別是囤積居奇的富商大賈，沒有市籍而居住於市井之外者。《史記·平准書》講到：“而富商大賈，或踴見役貧，轉

穀百數，廢居居邑，封君皆低首仰給。”又說：“諸賈人末作，賈貸賣買，居邑稽諸物，及商以取利者，雖無市籍，各以物自估。”看來也還有不少商人住在特設的“里”的。北魏的“洛陽大市”四周有十個“里”，分別住有各種商人，如東面有通商里與達貨里住有行商與手工業者，另有準財里與金肆里住富人。同時“洛陽小市”東北有殖貨里，住“以屠爲業”者。唐代洛陽，北市東北有殖業坊與豐財坊，東南有毓財坊，南市以北有通利坊，西市以北有廣利坊，依然沿襲這種習俗。所有這些坊里的名稱，都與商人謀利有關，不是偶然的。唐代長安在東西兩市的周圍里中也同樣居住有不少商人^①。看來這種習俗，西漢長安已經開端。《居延漢簡釋文》第五七六二號：“庚辰之過客居長安發利里者。”《居延漢簡甲編》附三七號：“長安有利里宋買年廿四，長七尺二寸，黑色。”（以上見馬先醒《漢代長安里第考》所輯錄）發利里所住的“過客”當是外來客商，住在有利里的宋買，可能因善於做買賣而得名。

① 關於少府職掌的特點及其性質，請參看拙作《從少府職掌看秦漢封建統治者的經濟特權》一文（《秦漢史論叢》第一輯 208—226 頁，陝西人民出版社 1981 年出版）。少府是九卿中執掌財政、物資、建築、製造、事務、後勤的皇帝的總管，地位高而權力大，財力與物力充沛，因此“將作少府”不可能簡稱爲“少府”。秦二世二年陳勝派遣周文率幾十萬人，攻入函谷關而深入到戲（今陝西臨潼東北），少府章邯獻計赦免在驪山營建陵園的刑徒七十萬人，組織成軍，“授兵以擊之”，由章邯爲將統率，結果把周文打敗，並進一步打敗陳勝。這個少府，《史記》的《集解》和《資治通鑑》胡三省注都以爲是掌山澤之稅以供天子私養的少府，是正確的。章邯在倉促之間能夠把驪山刑徒組織成軍而出擊得勝，就是由

於他任少府官職，營造陵園的驪山刑徒本來屬於他掌管。章世所任的少府也不是將作少府的簡稱。日本加藤繁《漢代國家財政和帝室財政的區別及帝室財政的一班》一文（收入加藤繁《中國經濟史考證》第一卷，吳傑譯本，商務印書館1959出版）曾推斷將作少府起初隸屬於少府。勞幹先生《秦漢九卿考》一文（收入《勞幹學術論文集》甲編下冊861—866頁，臺北藝文印書館1976年出版）也認為“將作少府之職乃由少府而分者”，我認為是符合實際的。

- ② 如北魏建都平城，郭城中坊大者四五百戶，小者六七十戶。北魏建都洛陽，東郭區建春門外的建陽里有二千多戶。唐代長安郭城中的坊，估計一般有一二千戶，多的有五千戶以上。
- ③ 賀業鉅《考工記營國制度研究》（中國建築工業出版社1985年出版），第二章“王城規劃”中第四節指出沒有提到郭，見該書61—64頁。
- ④ 《漢書·高帝紀》：“七年二月至長安，蕭何治未央宮，立東闕、北闕。”顏師古注：“未央殿雖南向，而上書奏事謁見之徒，皆詣北闕，公車司馬亦在北闕焉。”《後漢書·百官志》：“公車司馬令一人，六百石，掌官南闕門，凡吏民上章，四方貢獻，凡徵詣公車者。”
- ⑤ 《洛陽伽藍記》卷四記北魏崔延伯“出師於洛陽西張方橋，即漢夕陽亭也。時公卿祖道，車騎成列。”這在夕陽亭祖道，與西漢疏廣“上疏乞骸骨歸，公卿大夫爲設祖道，供張東都門外”，祖道的情景相同，足見夕陽亭具有西郭門性質。夕陽亭在東漢洛陽城雍門以西，見於《元河南志》所附《後漢京城圖》中（《永樂大典》卷九五六一）。
- ⑥ 黃盛璋：“《歷史地理論集》第43頁，人民出版社1982年出版。
- ⑦ 《文選》卷二張衡《西京賦》李善注：“市有長丞而無尉，蓋通呼長丞爲尉耳。”所說不確。

- ⑧ 《長安志》卷五列舉長安之市，有四市、柳市、東市、西市、直市、交門市、孝里市、交道亭市。劉運勇同志認為把東市西市納入“四市”中，恰好九個市場，即長安九市。這與《三輔黃圖》所說“長安九市”即“六市在道西，三市在道東”不合。而且所有文獻中未見有南市北市，可以與東市西市相比的。因此我推測，可能“四市”因一個市內分設東、南、西、北四市而得名。據《漢書·百官公卿表》，京兆尹屬官有長安市令丞，左馮翊屬官有“長安四市四長丞”。一般說來，稱“令”的比稱“長”的要大些，稱“令”者當是大市，稱“長”者要小些。《三輔黃圖》所說合稱“長安九市”的東西兩大市，有令署而屬三輔都尉掌管，當然不包括在屬於左馮翊管轄而設有“長丞”的四市之內，這是顯而易見的。
- ⑨ 戾太子因巫蠱之禍而殺江充及胡巫，被迫起兵，曾得皇后許允，“發中厩車載射士，出武庫兵，發長樂宮衛卒”。武帝命丞相劉屈氂“堅閉城門，毋令反者得出”，並調發三輔近縣兵追捕。太子又矯制調發長安中都官囚徒抵抗，繼而太子調發守衛京師的北軍未果，太子就引兵驅使“四市人”數萬到長樂宮西闕下，與丞相軍混戰五天而失敗。估計太子驅使“四市人”到長樂宮西闕下，向西闕進攻，因為他們早已佔有武庫，以此作為指揮作戰的據點，並可以用武庫的兵器來分發用於戰鬥。武庫即在西闕的西南。可是太子用來統率與驅使“四市人”作戰的兵力有限，“四市人”又是烏合之眾，因而混戰五天，死者數萬人，終於失敗。
- ⑩ 例如唐代長安西市東北的延壽坊有“鬻金銀珠玉者”（《唐闕史》卷下“王居士神丹”條），西市東南的興化坊有“以販繒為業”的（《太平廣記》卷四八六《無雙傳》）。西市西南的懷德坊，住有富商鄒鳳熾，“四方物盡為所收”（《太平御覽》卷四九五引《西京記》）。西市西南第二坊豐邑坊，“多假貨方相送喪之具”（《西京新記》卷三）。